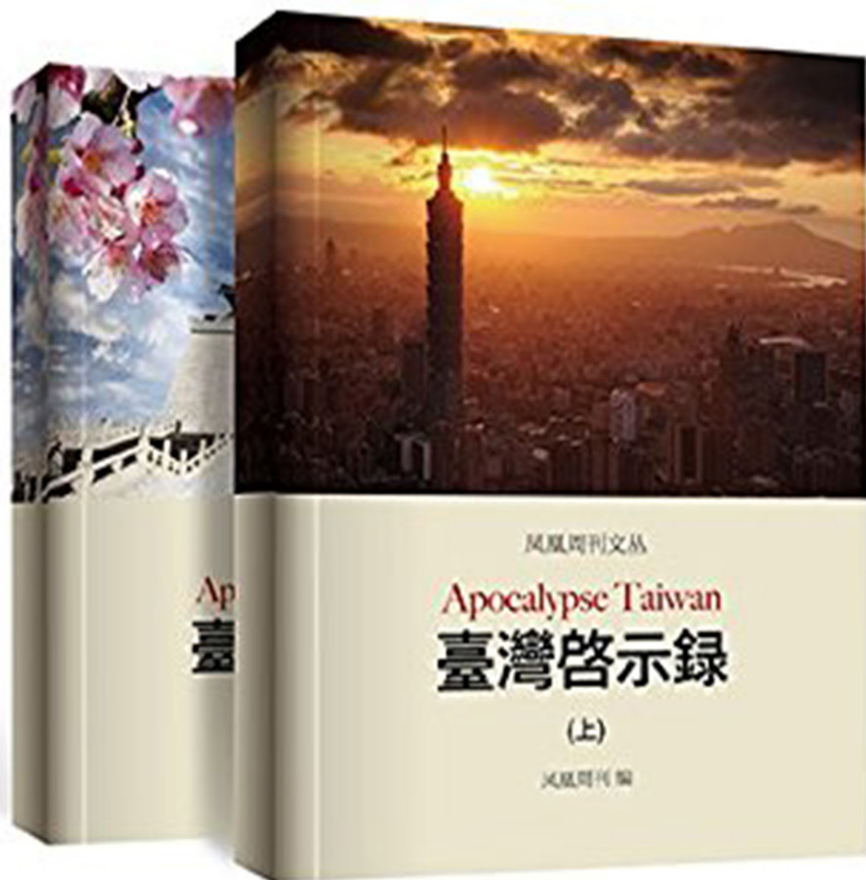
《凤凰周刊》文丛

台湾启示录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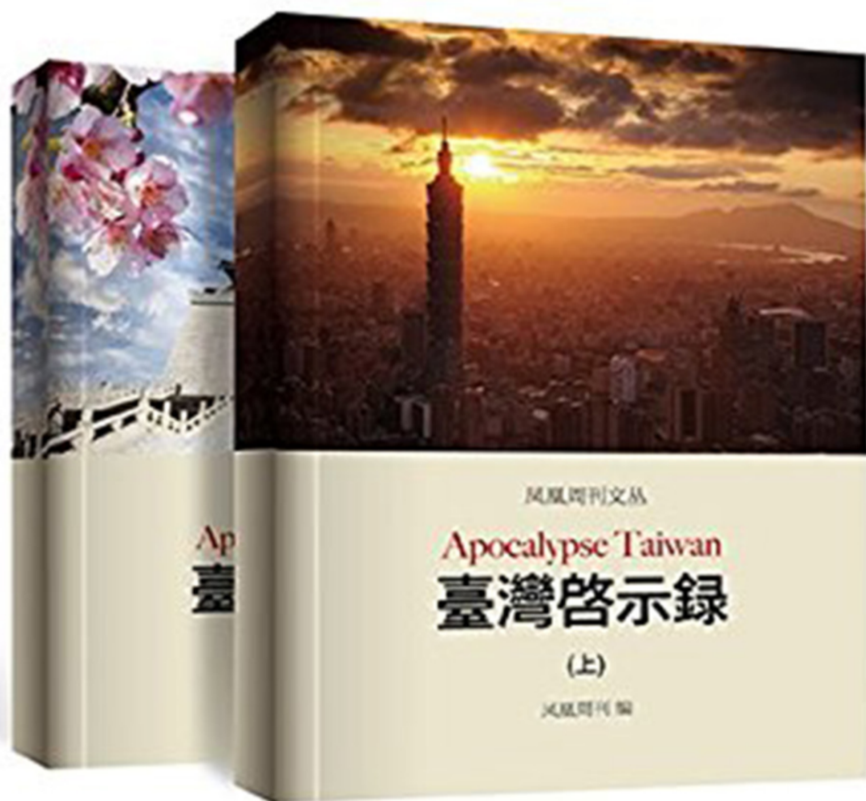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凤凰周刊》文丛

台湾启示录合集



第一章 政坛激荡

第一篇 台湾新党二十年

第二篇 台湾泛蓝政党的统一观

第三篇 台湾马王政争背后的党政关系

第四篇 国民党迁台后的四次大政争

第五篇 台湾各党资金来源一览图

第六篇 直击台湾“九合一”选举

第七篇 台湾县市议长选举蓝营大逆袭

第八篇 台湾“美丽岛”世代退场

第九篇 台湾“绿二代”全面接班？

第十篇 台湾“第三势力”风云再起

第十一篇 新媒体改变台湾政党组织方式

第十二篇 台湾的“领导人魔咒”

第二章 暗淡的国军

第一篇 台湾南海政策：低调看守

第二篇 “阿拉伯之春”中的台湾军售风波

第三篇 透析台湾兵役制改革

第四篇 台湾自研潜艇困局

第五篇 台湾军队重建“反情报队”

第六篇 黄铭俊：台湾关心解放军的一举一动

第七篇 台湾自研无人作战飞机困境

第八篇 台湾军法系统走入历史
第九篇 大船，小船，无船？台湾海军发展走到十字路口
第十篇 日本欲向台湾出售武器？
第十一篇 无解的困境： 台湾军队深陷蓝绿对立泥潭
第十二篇 台湾陷“防务民营化”难题

第三章 探秘烽火岁月

第一篇 抗战前夜的政制与宪法讨论
第二篇 台湾官方拟公开戒严时期史料
第三篇 台湾左翼书刊查禁史
第四篇 台湾特工香港出书内幕
第五篇 揭秘台湾情治系统十年内斗
第六篇 曾经的全球反共产革命中心-探秘台湾政战系统
第七篇 台湾“北一女”传奇
第八篇 第一代台湾中共地下党的兴起与沦陷
第九篇 台湾“叛逃者”的大陆人生
第十篇 《台湾1895》 宏大主题败于“硬伤”
第十一篇 台湾的“中国式宪政”
第十二篇 五四传统在台湾

第四章 文艺拾零

第一篇 那段台湾文学出版“小”盛世

第二篇 台湾，独立书店风景

第三篇 追寻台湾的阅读趣味 台湾读者热衷的大陆书籍

第四篇 台湾文化地标进军大陆 诚品：演绎书界传奇

第五篇 台湾“国宴”变法

第六篇 扶摇直上的台湾当代艺术

第七篇 孔子在台湾

第八篇 台湾电视：越过底线的战争

第五章　台湾边角料

第一篇 台湾苗栗负巨债陷破产危机

第二篇 台湾高铁面临破产窘境

第三篇 台湾爆发“灭顶”计划

第四篇 杀警案促台湾新一轮大扫黑

第五篇 直击“全能神”在台湾

第六篇 台湾土壤污染治理启示录

第七篇 台湾高官政要如何“居住”

第八篇 台湾特色的医疗困境

第九篇 台湾器官移植的非市场化经验

第十篇 台湾出租车治乱之路

第十一篇 台湾调涨最低工资背后

第十二篇 台湾“政论节目”退烧

第十三篇 台湾重启死刑再掀波澜

第十四篇 岛内或将取消户口簿 台湾户籍与人口政策演进

第十五篇 解密岛内神秘情色应召行业 台湾“性工作”除罪化进行时

第十六篇 Taiwan Health Care 全球排行第二优 台湾健保模式全揭秘

第十七篇 “台湾式诈骗”西进揭底

第十八篇 台湾选战拼创意

第十九篇 台湾物业管理的“居家宪法”

第二十篇 台湾的十月

第二十一篇 百万台湾老兵归乡内幕

第六章 下一代 争夺战

第一篇 台湾高校的复兴

第二篇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 台湾新竹清华建校始末

第三篇 台湾拟重修教科书排“独”

第四篇 台湾对外华语教育阵地收缩

第五篇 台湾“十二年国教”改革引争议

第六篇 台湾国学教材“登陆”幕后

第七篇 台湾国学教材之演变

第八篇 生源危机重创台湾私立高校

第九篇 台湾课纲“微调”之争
第十篇 台湾野草莓学运 炮轰集游法
第十一篇 台湾学运中的网络战
第十二篇 现场直击：谁的“立法院”？
第十三篇 台湾学运：世代焦虑还是政治斗争
第七章 起底两岸
第一篇 两岸侨务争夺战
第二篇 冈比亚台湾断交始末
第三篇 大陆城镇化中的台湾商机
第四篇 台湾老兵遗产大陆防骗记
第五篇 台湾政治人物的大陆退休生活
第六篇 一部台湾电影 两岸为何视角不同？
第七篇 实存名亡的“外交休兵”
第八篇 旧金山中华总会馆“撤旗”风波
第八章 看见台湾
第一篇 台湾的失忆与失意
第二篇 为什么要有两岸青年交流
第三篇 台湾美食X宗罪
第九篇 台湾掌中戏“通天教主”黄海岱仙逝
第十篇 台湾繁体中文保卫战
第十一篇 制造台湾？创造台湾？

第十二篇 台湾发明了文创？

版权信息

凤凰周刊文丛——《台湾启示录》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5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5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00110177-0146-151202

最后修订：2015年12月02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序

即使不怎么喜欢台湾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作为华人世界的民主灯塔，台湾在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社会的建设上确实走在了整个华人世界的前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人们提起台湾时，总会想到这个岛上经济起飞的奇迹、民主转型的顺畅以及影响整个亚洲的文艺明星。蒋经国、孙运璇、李国鼎、王永庆、罗大佑、林青霞……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名字闪耀在当时华人世界的星空之上。

那时的台湾，高唱着《明天会更好》的旋律，以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关心着“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那时的台湾，拥有着青春的骄傲和真心的面容，每个人都期待着明天的确会更好。

彼时，大概没有人能够判断，十几年后的台湾会被贴上如今这么多负面的标签：经济奇迹不再，从亚洲“四小龙”之首跌至垫底；多元社会带来更多社会撕裂，国族认同取代经济政策成为每次选举的重心；民主政治逐渐失控，大有取代泰国，成为亚洲街头政治风向标的势头。兼济天下的胸怀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近年流行起来的“小确幸”。有台大教授统计过，在这所台湾的最高学府，近三成的毕业生的人生理想是“开一家咖啡厅”。

青春期刚过，依然年轻的台湾竟遇到了迷茫的中年危机，曾经白手起家的台商精神逐渐没落，经济建设的热情逐渐转为内部撕裂的动力。年轻人一边与马政府和全球化对抗，一边高唱《岛屿天光》感动自己。歌词里不再关心“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转而充斥“现在是彼一日，勇敢的台湾人”般自我感动但视野狭窄的表达。

从《明天会更好》到《岛屿天光》，时光整整三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台湾的变化被记录在音乐家的旋律中，小说家的文字中，电影人的影像中，以及记者们的报道中。

作为在两岸三地颇具影响力的时政、财经、文化期刊。《凤凰周刊》自创刊起，秉持着“为全球华人提供独立意见”的使命，对台湾政治、经济、文化进程有着独特的关注与报道视角。十年以来，也积累了各领域的台湾报道数百篇。从时政、社会、文化、经济、教育、军事、两岸关系等各方面丈量着台湾一路走来的艰难历程。

本合辑是《凤凰周刊》专门为亚马逊用户提供的台湾专刊，收录了

近四年来90篇本刊经典的台湾报道，以及本刊之外两岸青年写的几篇文章。不仅能向各位读者描述现在的台湾是个什么样子，还能告知各位台湾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在如今速朽的新媒体时代，《凤凰周刊》愿用我们深厚的积累，带给您这个时代少有的厚重的阅读体验。

《凤凰周刊》将持续对台湾新闻予以关注，也将陆续推出更多的专题类合辑，愿我们能用独特的视角和专业的解读为您持续带来优质的报道。感谢您的阅读。

第一章 政坛激荡

第一篇 台湾新党二十年

记者 / 马军

8月17日，台北市的新党创党二十周年党庆大会，台湾政坛“大佬”和社会名流齐聚一堂。马英九送来花篮，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到场祝贺，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媒介名人赵少康也回到“娘家”共庆盛会。

新党主席郁幕明在此大喜日子却爆出惊人消息，宣布“退出蓝军”，令政界侧目。他还表态将广招人马，参加明年的“七合一”选举和2016年“总统”大选。

新党一向是“正蓝旗”之代表，抛出这种情绪话兴许是向马英九发泄不满。新党籍前“立委”李胜峰解释道，新党过去以“大局为重”和国民党合作，牺牲颇多，现在只剩两席台北市议员（过去曾有21席），这些牺牲并没有救得起国民党，因此必须抛掉“国民党情结”。

“乱世中的北极星，不求执政权，但要发言权”，这是新党在Facebook上的标签。20年前，国民党“十四全会”前夕，国民党“立法院”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联线”的部分成员因对李登辉不满，宣布退出国民党别组新党。第二年，新党联合几家小党参加“立委”选举，一举夺得120多万票，成为具有“关键影响”的第三大党。

曾经的台湾第三大党，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境。一面是号称最捍卫“中华民国”的政党，一面是和中国大陆走得最近的政党；坚守着“深蓝”的意识形态，却要面对着泡沫化困境。

新党诞生于台湾民主化初期，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化，它的命运起起伏伏，死忠票源的流失、选举制度的改革，都使得像新党跟其他台湾小党一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身为小党的泡沫化危机

一年半以前，台湾“立法委员”选举结果出炉，新党仅获得1.48%的政党选票，距离5%的门槛差距不小。再加上唯一提名的分区“立委”吴成典在金门输给了国民党籍候选人杨应雄，新党在2012大选中颗粒无收。同为国民党、民进党之外的小党，亲民党在党主席宋楚瑜“母鸡带小鸡”的策略下，成功拿到5.4%的政党票，获得两席“立委”，再加上平底原住民选区的林正二，亲民党成功拿到“立法院”组成党团所需的三个席

位。台湾团结联盟（以下简称台联）更是在蔡英文的默许之下一路尾随民进党进行选举，成功分得8%的选票，拿到三席不分区“立委”，同样获得组成党团的资格。

台湾“立法院”八成以上的案件由政党协商通过，也就是说，拥有党团的亲民党和台联虽然在“立委”席次上跟国、民两党无法分庭抗礼，但是在政党协商的过程中，他们与大党的话语权是相同的。在台湾迈入稳定两党制的当下，亲民党和台联手中的“立法院”党团，最起码可以保证他们在未来四年内，不用担心自己的泡沫化问题。

而新党则不一样，从曾经的“立法院”第三大党，到2008年的4%政党票，再到2012年的不到1.5%，新党及其支持者一步步地看着自己的支持者越来越少。“我们过去为了大局，牺牲了太多，牺牲到现在只剩两位台北市议员了。”郁慕明说。

1995年台湾“立法委员”选举是新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参加的选举。在这场选举中，新党获得122万票，拿下21席“立委”，成为当时“国会”中的关键少数。在李登辉时代，凭借着“国会”的席次新党频繁与民进党、原住民“立委”结盟，与执政的国民党对抗。

然而新党辉煌的时刻并没有维持多久，2000年台湾大选后，失败的宋楚瑜所成立的亲民党抢走了原本属于新党的支持者。第二年的选举中，亲民党提名了许多原属于新党的市议员参选“立委”，最终使得新党惨败。若不是在金门选上县长和一席“立委”，新党差点从此完全退出“立法院”。

2008年，台湾“立委”选举采取单一选区两票制，新党全力冲刺5%的政党票门槛，却功亏一篑，仅获得4%；2012年，这个数字减弱为1.4%。选举开票当天，新党就曾考虑是否要辞退党工，关门歇业。然而在几天的考虑之后，新党宣布郁慕明留任党主席，新党不关门，继续维持运作。“新党支持者必须抛开国民党情结，我们不需要和谁协商，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郁慕明将矛头指向了新党的国民党情结。

新党的国民党情结

新党前身是国民党内的“新国民党连线”。1988年蒋经国逝世，蒋氏家族在台湾政坛的影响力逐渐降低，李登辉时代开启。1990年，台湾政坛新星赵少康、郁慕明、陈癸淼等人，有感于国民党高层黑金腐败及暗助“台独”的现象，成立了“新国民党连线”，诉诸国民党内部改革，与以

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对抗。结果1992年“立法委员”选举时，“新国民党连线”的成员有1/3未获得提名，且未获得提名者以外省籍居多，此被视为是国民党中央对外省籍党员的抗争。

“一次吃饭时李登辉看到我就问我‘为什么说我独裁’,看到陈水扁就用闽南话喊‘干杯’。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关系不一般。”事后赵少康回忆道。

1993年，新国民党连线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请问总统先生”问政说明会，吸引大批群众到场支持。之后，连线成员跨越浊水溪，在高雄中学举办问政说明会时，被民进党人士包围殴打。事后国民党中央对新国民党连线冷嘲热讽，连线成员认定此事是国民党中央与民进党合谋所为，坚定了另组新党的准备。

1993年8月10日，新国民党连线正式组成新党，十几天后举行了成立大会并讨论通过了党章。“当时我们想注册叫做‘新国民党’，但是‘内政部’不准，没办法就只好叫做新党。”郁慕明曾对《凤凰记者》说道，“不过没关系，现在国民党搞本土化，不是有人建议老K（KMT，指国民党）把名字从‘中国国民党’改为‘台湾国民党’吗？他们前脚改成‘台湾国民党’，我们后脚就去改成‘中国国民党’”。

新党成立伊始，风头正盛，第一次选举便大获全胜。更是坚定了其参加各级选战的决心。1994年，赵少康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长，与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和国民党候选人黄大洲较量。在“总统”尚未直选的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是台湾民众能参加的最高层级的选举，因此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这场选举中，赵少康打出“中华民国保卫战”的口号，将选战拉到“国家认同”的层次。选举结果，陈水扁以43%的不过半支持率获胜，赵少康拿到30%的选票。对于赵少康的失利，新党认为是李登辉最终下令弃黄保陈造成的，而国民党则指责新党分裂蓝营，导致陈水扁渔翁得利。

事实上，新党与国民党的对抗一直是以李登辉为目标，1996年台湾大选，林洋港和郝伯村退出国民党，虽然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对抗李登辉，但整个选战新党一直提供支持，李登辉下台之后，新党与国民党便展开合作，2001年，两党共同推举王建煊为台北县长候选人。

2004年3月，陈水扁凭借“两颗子弹”逆转国亲联盟的“连宋配”，连任成功。年底的“立委”选举，新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将自己的七位参选人送到国民党登记为国民党员，这令当时积极推动国、亲、新三党合并的连战相当兴奋，亲自为新党的候选人办法政党推荐书。2005年郁慕明访问大陆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还沾沾自喜地提起此事：“除了吴成

典，我们把七位候选人都送回了国民党，新党不是为一党之利、一党之私。”

而国民党对新党也不薄，2006年，新党主席郝龙斌宣布投入到国民党的初选机制中，参选台北市长。党内初选中，候选人叶金川批从新党来的郝龙斌是政治变色龙，却受到国民党高层的批评，最终被迫退选。

两岸交流先锋

2012年12月23日，因年初选举成绩不理想而沉默将近一年的新党，在台北召开“请问台湾人民”巡回演讲活动的第一场。在挂有巨幅“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和孙中山头像的舞台前，新党主席郁慕明表示，如果马英九决定遵照“宪法”，宣布追求“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回到蒋经国路线、恢复“国统纲领”的话，新党就回归国民党，郁本人也向亲民党宋楚瑜负荆请罪。

在演讲会上，新党秘书长李胜峰表示，新党就是要“面对统一、纵横中国”，台湾要“大大方方、光明磊落地在台面上谈统一，而不是在大陆说一套，回到台湾又说一套。”

新党作为台湾统独光谱上最靠近统一的一党，在公开场合主张两岸统一并不是第一次。2005年，在国民党“和平之旅”、亲民党“搭桥之旅”之后，新党组团从台北到北京展开了一周的“民族之旅”。实际上，早在2003年，郁慕明就曾经率领新党五位新科议员赴大陆交流访问。

郁慕明1940年出生于上海，8岁随父亲来台湾参加一个博览会。“本来打算是带我二哥去，结果因为临出门书包还没收拾好，我父亲一怒之下就决定带我去了，谁知道一来就难回去了”，郁慕明回忆说，“这也说明了两岸就是一个国家，从上海到台北只要有船票谁都能上船，根本不用护照”。

除定期参加两岸交流的项目之外，新党还搭建了一些两岸交流的平台。2013年3月，新党在党部宣布，正式成立“台湾平潭关系协会”，作为推动“前进平潭，深化两岸交流”的机制。郁慕明表示，新党会全力地、积极地参与平潭岛的开发。

孤独的正蓝军

2009年“立委”补选，新党推出姚立明参选，打出“大安区‘立委’补选的唯一选择——正蓝”的宣传标语，并发布“国民党可以一党独大，不可以一党独霸”的宣传口号。然而最终还是不敌资源丰厚的国民党籍候选人

蒋乃辛而失败。

2000年10月，因为“核四”问题，台湾“朝野”关系日趋紧张。为了形成“立法院”绝对多数，新党主张泛国民党整合，这也是“泛蓝”概念的首次提出。之后随着亲民党向公共政策性政党的转变以及国民党的本土化改革，新党成为“泛蓝”阵营中意识形态最为鲜明的政党。

新党在全盛时期，努力的方向是一个真正代表不同族群的本土性的政党。1995年本省籍人士陈癸淼担任新党总召集人之后，曾经在新党推动过族群融合的选举政策。在当年的“立法委员”不分区代表席次的分配上，新党推出的陈癸淼、郑龙水、林郁方和陈一新分别代表着闽南本省族群、弱势族群、客家族群和外省族群。然而随着台湾政坛的本土化趋势逐步深入，台湾“中国人认同”越来越低，这也使得“中华民国”的概念在台湾越来越模糊。针对这种趋势，郁慕明在选举广告中大声说道，“‘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绝对不能退让。”

新党的每次造势活动中，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不可缺少的元素，2004年11月27日，在陈水扁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之际，新党举行“背‘国旗’，救国父”晚会，新党八位“立委”候选人及其支持者每人捐出10cc献血，将失色的青天白日旗染成满地红。目前，新党是唯一一个坚持每年都在“国父”孙中山诞辰或忌日举办纪念仪式的政党，也是唯一一个在每年7月7日都举办活动纪念抗战的政党。今年7月7日，新党的一些青年委员和青年志工身着抗日时期国军军装站立于台北街头，显得特别醒目，也特别突兀。

台湾小党沉浮录

由于组党相当方便，台湾除了政坛上主流的国民党、民进党两大党外，还有几个知名小党以及200多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他们激烈争夺着两大党瓜分剩下的政治版图。

“总统”轮流坐庄，“立院”有绝对多数。从任何角度上说，台湾都已经迈入了稳定的两党制。

而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外，台湾还有至少240多个政党争夺着国、民两党留下来所剩不多的政治版图。在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国民党曾经分裂出亲民党和新党，民进党也曾分裂出建国党。在台湾小党的分分合合、起起伏伏中，台湾的政治格局一次次被重划，民主发展也一步步前进。

台湾众多小党的命运，本身就是台湾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剪影。

林立的小党

2012年大选期间，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选会”）副主委刘义周遇到一个麻烦事：人民最大党打来电话，抗议“中选会”的选票印刷效果——人民最大党的党徽是一个彩色的“大”字，结果体现在选票里的“大”字因为黑白印刷的缘故，仅仅体现出“人”字形。再加上每个党徽外都有一个黑色的框框，所以印在选票上的人民最大党，变成了一个“囚”字。

为了节省经费和民众的时间，从2012年起，台湾的“总统”大选和“立委”选举放在了一起。选举当天，除去地方向乡、里长的选票，“中央”级别的选票台湾民众要拿三张：“总统、副总统”选票，分区“立委”选票，以及不分区“立委”选票。

所谓分区“立委”，即选民所在的那个区所产生的“立委”，2008年开始，台湾施行“单一选区两票制”，每个民众所在的选区只产生以为“立委”。而另一张不分区“立委”的选票则印有11个政党的标志，每位选民在倾向的政党下做标记。投票结束后，按照政党的得票比例划分每个政党的不分区“立委”的席次。根据2012年的选举规定，5%以上的政党票可获得2席“立委”资格，8%可获得三席。

于是，在分区战场基本被国民党、民进党两大党垄断的情况下，不分区“立委”便成台湾各个小党的必争之地。2012年，共有11个政党参与不分区“立委”的角逐。除了人们熟知的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新党和台湾团结联盟之外，还有绿党、健保免费连线、台湾国民会议、人民最大党、台湾主义党和中华民国台湾基本法连线等。

台湾之所以小党林立，从其根源，还是因为政党成立的门槛太低。根据台湾《人民团体法》规定，若想成立政党，只需取得30人连署，并在30天内送到“内政部”备案便可以获得承认。2007年李敖筹组“中国智慧党”之时，便从大街上拉来30位学生作为连署。而至于政党的组织形式、日常活动等等，台“内政部”一概不管。这也导致了台湾超过200个政党里，有多一半找不到办公地址。

当然，台“内政部”对党的名称还是有着基本的审查，否则在现有的200多个政党之外，台湾还会增加诸如名为“丐帮同盟”“台湾海盗党”和“林书豪党”的政党。

现在只有五个党派在“立法院”有席次，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台联以及无党联盟。此外，还有新党、劳动党两个党拥有县市议员的席

次，剩下的200百多个党绝大多数都没有体制内的发言空间。

曾经的小党

政党林立的现状，在5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初到台湾之时，以“反共抗俄”的名义在台湾岛内搞“党禁”，除了跟国民党一同到达台湾的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之外，不允许其他政党活动。而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在资金上仰赖国民党划拨的“反共抗俄宣传费”，在力量上也很难与这位“老大哥”进行抗衡，于是始终处于“卫星党”的位置，靠选举时国民党礼让的几个位置过活，也被后来的著名党外人士黄信介讥笑为“花瓶政党”“厕所里的花瓶”。

中国青年党于1923年成立于法国，创建初期即与周恩来等旅法共产党员进行斗争，鼎盛时期曾经是中国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大党。1949年，青年党随国民党渡海来到台湾，与民主社会党并列为台湾党禁之下的合法的在野党。在台早期，还曾有党员当选省议员等公职，但当党禁解除之后，中国青年党逐渐分裂为青年中国党、中国民主青年党、中国民主正义党、中国联合党等十几个小党，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自从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便无人当选过任何公职，目前已被社会所遗忘。

与中国青年党有同样命运的还有中国民主社会党，民社党与国民党一起迁至台湾后，曾一度被党外人士视为珍宝，不少反对国民党的党外人士，都以民社党身份参加地方选举，并颇有斩获，花莲县、基隆市、高雄市曾经产生过民主社会党党籍的党员。1954年“总统”选举中，民社党还曾一度提名徐傅霖参选，结果大败而归。“雷震案”之后，民社党拒绝接受国民党由国库拨给的“反共抗俄宣传费”，可称民社党对国民党最大的抗争举动。与青年党一样，党禁之后民社党四分五裂，丧失所有党公职席次，淡出台湾政坛。

其实“解禁”之后，台湾岛内对组党依旧存在限制。台南一位名叫王老养的老农，对共产理想十分信仰，在台南老贾建立了一个共产山庄，并以此为总部，成立了台湾共产党。“我从1989年便开始筹划建立台湾共产党，直到2008年才注册成功”，王老养说。

对王老养不太友善的不止台湾管理政党的“内政部”，王老养在2000年试图参选“总统”之时，还曾被“中选会”以拿不出保证金和学历太低（小学肄业）的名义退回。

除了王老养的台湾共产党，台湾还存在台湾民主共产党、“中华民

国”共产党、中华共产联盟等名字和“共产”相关的政党。其中陈水扁的堂弟陈天福分别在“中华民国”共产党和台湾民主共产党做过总书记。陈天福成立台湾民主共产党之时，便把成立日选择在了大陆60年国庆的2009年10月1日，“我就是要走台湾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与大陆和平统一”。

选举带来的政党潮

1996年，台湾迎来第一次“总统”直选，当选的李登辉号称自己是“台湾400年来第一位台湾籍领导人”“中国5000年来第一位民选领导人”。有政治野心的人们发现，政党不再是领导一呼百应的礼堂，而是选票市场中开疆拓土的公司。此后，台湾每次选举前后都会涌现出几个新的政党，细分选民，对症下药。

1996年，面对民进党中央提出的“大胆西进”“大联合”等中间政策，一些不满于民进党束手束脚的“台独”人士，创办了建国党，主张“中华民国”已经不复存在，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是非法统治。建国党创办初期，大部分党员来自于台湾教授协会和台湾教师联盟，都是讲台上的教师。因此，民进党曾私下戏称建国党为“五点半党”，讽刺这些教授和教师都是每天五点半下课之后才来搞政治的“业余分子”。

2000年，民主进步党获得执政权，国民党首度在野，李登辉辞去党主席职务。此时台湾“立法院”内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组成在野联盟，提出“总统罢免案”。退休的李登辉为了稳定政局，走第三条道路，联合自己的子弟兵筹建新政党。台湾团结联盟（以下简称台联党）创党元老黄宗源称，他是台联党党证编号第三号，第一号和第二号分别预留给李登辉和萧万长。

台联党是一个以本土化为诉求的政党，成立于2001年8月12日，创党时主要以国民党本土派的党员组成。李登辉被台联党尊为精神领袖，但实际上李登辉从未加入过台联党。

根据2012年的选举结果来看，台联党是现在除国民党、民进党外的台湾第三大政党，若以的票数来看，台联是除了国、民两党以外，唯一一个获得百万选票以上的政党。

选举之外，促成台湾小党成立的另一个因素便是政治运动。2006年，台湾爆发百万红衫军倒扁运动。运动结束之后，以施明德为首的倒扁干部组成红党参与了2008年的不分区“立委”的角逐。失败之后，2012年施明德再度重来，以“台湾国民会议”的名称再度参选不分区“立委”的

选举，不分区“立委”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让一些学者、教授、专家等立法需要而又不擅选举的人物有机会进入“立法院”。但实际操作中，国民党和民进党往往将该机会当做是党内政治大佬不战而胜的保送名单。2012年选举之时，施明德曾经开记者会痛斥说国、民两党的名单“根本不能看”。而施明德提出的名单里，排名第一位的就是他现任的妻子陈嘉君。

今年因国军“洪仲丘案”而号召20万人走上街头的纯公民团体“1985联盟”也被视作是下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台湾民众对政党政治普遍失去兴趣、政党动员越来越难的当下，能够鼓动起20万人走上街头的力量绝对不容忽视。

从意识形态到具体政策

十几年来，台湾民主的发展曾经伴随着族群撕裂的阵痛。这种阵痛在新兴政党的形态上便可有所体现。台湾政坛几个大党中，除了宋楚瑜勤勉亲民的“省长”形象型塑出的亲民党，国民党、民进党、台联党、新党等赢得过“立法院”席次的政党均占据着台湾统独分野的意识形态的两段。而随着单一选区两票制的改革，“立委”候选人们必须争取大多数的民众投票才可选上，也导致台湾的选举文化从政策极端化到政策中间化发展。

这种选举文化的变迁在选举结果上可见一斑。2012年不分区“立委”票开出之后，人们惊讶的不仅是新党从上一次的4%降到了这次的不到2%；绿党和健保免费连线表现得却非常出色。

绿党前身是成立于1996年的绿色本土清新党。在政治选举中，往往被误认为是深绿民众组成的党。而实际上，绿党主张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注重草根民主，是不折不扣的公共政策党。

绿党从1996年成立以来便参与国民大会的选举，除曾经在云林县选上一席国民大会代表职务之后，从未在任何一场选举中获胜；但是因为其长期关心劳工、弱势和环保议题等，一直保留着其强大的影响力。根据2012年选举结果的统计，绿党已经超过新党成为台湾第五大党。

健保免费连线简称“健保党”，总部设在台北市中正区林森北路的一个地下室里。与其说这是一个政党，不如说这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不分区参选人的候选名单的三个人分别来自不同的三个党：中华家国党、尊严党以及台湾共产党。健保免费连线成立半年不到，竞选经费仅有新台币500万元。虽然在全台布局的18位党员中无人当选。但是在不

分区政党票上获得了超过16万票，得票率却超过1%，虽然未达5%的门槛，得票率却居于第七位。而号称在全台拥有120个地方党部、主张台湾人民都热血的台湾主义党，仅获得0.2%的选票。

第二篇 台湾泛蓝政党的统一观

特约撰稿员 / 许剑虹

“太阳花学运”之后，面对气势高昂的“独派”，属于“统派”的声音开始在台湾社会中有组织、成规模地爆发，一时间引人关注。同时为声援在越南排华暴动中遇害的两岸同胞，中华统一促进党于5月17日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前，举办了一场名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的集会活动。 “当日在没有动员号召的情况下，约有600多人自发地高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站出来参加活动，由此可见‘统派’的声音在台湾社会上尚未完全消失。”中华统一促进党主任胡大刚先生说。 这些自发参与活动者，并不全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党员，他们包括中国国民党、新党与亲民党三大泛蓝政党的支持者。有着不同党派背景的泛蓝人士拥有反对“台独”的共识，但由于对当前中国大陆政局的不同看法，他们面对“两岸统一”这个选项时，表现出繁多芜杂的观点。这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

泛蓝阵营的面世

最早使用“泛蓝”与“泛绿”两个名词来形容台湾当前“统独”两大阵营者，是检察官出身的新党创党元老高新武先生。发明这两个词汇的原因，在于高新武发现越来越难以“统派”或者“独派”的名称，去划分在2000年大选中投票给连战、宋楚瑜与陈水扁的选民。因此分别使用了国民党与民进党党旗上的颜色，归纳出了所谓的泛蓝与泛绿两大阵营。

从高新武当时命名的角度来看，泛蓝阵营指的是国民党、新党还有亲民党等三个自称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信徒，并且捍卫“中华民国宪法”法统的政党。

本身主张两岸走向“终极统一”的高新武先生，非常了解在“中华民国”已经失去实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理念时，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哪怕是国民党、新党与亲民党的支持者，均不可能接受剩下来唯一可行的统一模式——让台湾依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为了国民党、新党与亲民党不至于在本土意识高涨、且进入了民主化时代后的台湾失去选民支持，从而导致泛绿阵营在岛内独大，高新武也有意以“泛蓝”这个包容性更大的名词，来取代“统派”这个在台湾已经遭受妖魔化的用语。

为了和民进党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支持，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藉

由宣告坚持“不统、不独、不武”政策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统派”色彩。同时，马英九希望统治结构以第二代外省籍留美精英为主的这个政权，避免遭到“出卖台湾”大帽的指控。

国民党坚持不统不独

如今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当权派，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上传承了两蒋时代的亲美反共战略；对内则从争取选票的考虑出发，积极拉拢中间甚至浅绿（泛绿）的选民。所以刻意降低民族主义的色彩，一来寻求美国在外交与军事上的支持；二则让在台湾主张“不统不独”的主流民意继续支持其政权。

马英九所重用的政府官员与核心幕僚，无论是现任“行政院长”的江宜桦、“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还是驻美代表沈吕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全是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精英，此一事实让目前由马英九主导下的中国国民党难免沾上浓郁的亲美色彩。

撇开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政治精英对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美式价值的认同不说；这些自小接受反共教育长大的第二代党国精英深知，自己的政权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别提持续抵制来自于大陆的统一要求，就连在岛内与民进党的势力抗衡都不是易事。因此仅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国民党都无法摆脱其亲美色彩。

在岛内，为了争取选民最大程度的支持，马英九不仅坚拒与中国大陆开启政治谈判，同时也在意识形态上尽其可能的向泛绿阵营靠拢来争取中间人士的支持。这一系列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他本人多次以“总统”身份参加“二二八事变”的纪念活动，乃至于向八田与一等日据时代殖民地官员鞠躬致敬的行为。

部分此类行为，让许多岛内的蓝营支持者感到不可思议。民间历史研究者武之璋先生就多次表示：马英九亲近绿营的行为并不只是为了巩固选票的权宜之计而已，同时也表明了这位国民党出身的“总统”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了民进党的史观。

在这样的情况下，“马英九政府”不仅要与统派保持距离，就连面对东海与南海的主权问题时，还会公然向国际社会表达绝对不与大陆合作的态度。这正是当今国民党在看待两岸关系时的基本立场。

新党有最浓的民族主义色彩

泛蓝阵营内并非只有中国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还有新党、亲民

党、最后冒出来的中华统一促进党这三个“兄弟党”。他们对于“中华民国”的国家定位，乃至于海峡两岸未来的政治走向，与国民党并不一致。

1993年8月10日，一群不满意李登辉“台独”路线的国民党中生代政治精英在台北市成立了新党，彻底改变了原先两个政党相互制衡的台湾政治格局。

虽然当时的新党与李登辉领导下的国民党处于对立面，但是开宗明义地打出了追求“国家统一”与“捍卫‘中华民国’”的旗号，并标榜自己是“继承国父遗志的正统国民党”。可以说，若不是有新党这么一个与国民党系出同源的统派政党存在，还不会有泛蓝的概念存在。

新党与国民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领袖人物除了七位出身于“新国民党联机”的党内改革派外，还容纳了不少中华社会民主党、劳动党与工党等主张两岸统一，反对两蒋在外交上拉拢美日围堵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新党不仅民族主义的色彩更为突出，同时更代表“小市民”的利益。

新党始终如一强调“中国人”的民族立场，在面对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主权问题时，认为两岸政府应该密切合作，共同守护祖先遗留下来的领土资产。

党主席郁慕明认为，台湾不应该继续花费大量的金钱购买美国军火，或者持续扮演美国围堵大陆的马前卒角色。而是应该藉由发展“非战之区，和平之岛”的概念，来维持海峡两岸之间的和平发展与交流，并将省下来的“国防预算”用来促进台湾民生的发展。

对于两岸制度上所存在的差异，郁慕明在目睹了台湾走向民主化后的各种乱象后，认为大陆最好是以“两个半主义”取代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他认为无限上纲的民权主义不会带给两岸人民一个稳定的社会，所以大陆的政治改革应该按部就班缓慢进行，绝对不能够急进。

当林飞帆与陈为廷等人公开提出支持台独后，身为新党青年委员的王炳忠与林明正两人马上旗帜鲜明提出两岸走向统一的立场，替许多长年来自我压抑的台湾统派人士一吐心声。在受访中，王炳忠坚定地表示，如果他再不出来代表沉默的大多数发表意见，或许未来整个台湾社会只剩下主张“台独”的声音了。

尽管新党近年来已经开始致力于挖掘本土出生的青年精英入党，然而一直以来给人们强烈的“外省党”形象却始终挥之不去。鉴于其主要决策者大多数都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因此始终无法在台湾中南部的草根

社会中扎根。

亲民党熟稔乡土情结

成立于2000年的亲民党，是一个以宋楚瑜的意志为宗旨的泛蓝政党。这个政党比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更乐意讨论统一问题，而且也反对台湾对美军购，但是在相当程度上与新党有所不同。

长期观察亲民党的台湾政治学者王立本认为，曾担任过台湾省省长的宋楚瑜有着多年在中南部地方上耕耘的经验，因此比活动范围限缩在北部地区的新党更加容易获得台湾本土人士的支持与信赖。

不论是2005年首度访问大陆与胡锦涛会晤，还是今年再访北京与习近平见面，宋楚瑜都反复告诉大陆领导人千万不要将台湾人民的“本土意识”与“台独”主张划上等号，同时必须要在两岸实践统一的过程中，尽一切可能地尊重台湾人民的感受。

这也正是为什么宋楚瑜会对习近平提出“四个体谅”，并希望大陆政府能够不要完全以负面态度看待台湾的“太阳花学运”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了解，一个无法让台湾老百姓尤其是无法让台湾基层与年轻选民打从心底里面接受的“统一”，无论是对哪一方而言都是后患无穷的。

与新党比较，亲民党的起落更取决于宋楚瑜个人表现。但是因为这个政党在争取两岸走向统一道路的同时，更懂得去拥抱台湾人民的乡土情结，所以在选举中不至于像前者一般遭到边缘化。

中华统一促进党对北京最友好

前身为保卫中华大同盟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是泛蓝政党当中的一个突变体。其核心人物，并不像国民党的马英九、亲民党的宋楚瑜与新党的郁慕明那般是蒋经国在生前所积极栽培的党内青壮派精英，而是江湖出身的前竹联帮领袖张安乐。

中华统一促进党的诞生，受到了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结果的影响。许多支持连战与宋楚瑜的泛蓝选民，目睹到国民党、亲民党与新党缺乏足够的能力制衡利用制造“三一九枪击案”而再度获得执政权的“陈水扁政府”，因此需要一个更加坚定拥护统一立场的政党出现，才能够压制“台独”的嚣张气焰。

虽然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干部与支持者中，有不少人出身自国民党、新党与亲民党，且他们当中包括其总裁张安乐在内的许多人对孙中山、两蒋等国民党历史人物表达了尊重的立场。但是该党大体而言不像其他

泛蓝政党那样强调与国民党的渊源。

如同其他三个泛蓝政党一样，中华统一促进党也强调“三民主义”。差别在于该党认为中国大陆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三民主义”时，除了民权主义，早就超越了台湾。所以，中华统一促进党是四个泛蓝政党当中唯一打出愿意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推动两岸统一目标的政党，并认为这是台湾保存其民主制度的不二法门。

比起只认同“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新党与亲民党，中华统一促进党在拥护“中华民国”的同时，从“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角度出发，并不否定五星红旗作为另外一面代表中华民族的旗帜而存在。因此，中华统一促进党更倾向于海峡两岸在共同建立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国号、新国旗与新宪法的情况下完成统一。在“我们都是中国人”的集会活动中，张安乐以南海主权冲突还有越南排华事件为例，不断表示台湾人民在海外的权益，唯有透过一个强大的祖国才能够获得保护，而不是将一切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第三篇 台湾马王政争背后的党政关系

记者 / 马军

9月8日，马英九以“总统”身份召开记者会，发表名为《台湾民主法治发展的关键时刻》的声明，认定王金平为民进党“立法院”党鞭柯建铭关说，并称“这是台湾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

三天后，马英九以党主席身份抢在考纪会召开之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严词批评王已不适任“立法院长”，“应该要知所进退”。在马英九监视之下，国民党考纪会给予王金平“撤销党籍”的处分。在马王政争中，马英九的身份始终在“总统”与党主席之间变换，而民主政治下，本应对“总统”进行监督的“立法院长”却被“总统”剥夺了权力。到底是政治斗争，还是制度漏洞，马王政争背后的台湾党政关系值得重新进行检视。

行政：尴尬的“以党领政”

虽然已经形成稳定的民主政治，但是国民党“以党领政”的行政方针并没有过丝毫改变。时至今日，国民党依旧在“行政院”周四例会的前一天，即每周三召开党内例会，讨论第二天“行政院”例会的主题和内容，而“行政院”的例会，更像是国民党例会的执行会，将党内的决议贯彻给每一位内阁成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党主席比“行政院长”有更多的政务影响力，这也是为何马英九宁愿得罪党内改革派的舆论也要坚持连任党主席的原因。

作为党主席，马英九有权力对党内的人事进行布局。尤其是在选举期间，在哪个县市派谁出征，基本上都是党主席的一句话。马英九在“行政院”的两大爱将，“行政院长”江宜桦和“内政部长”李鸿源在任职初期都不是国民党员，直至最近才正式填表加入国民党。当时岛内就有分析认为，江李二人加入国民党，一方面是马英九为了巩固自身党内地位的举动，另一方面是为2014年选举做准备。

在安排不分区“立委”的名单上，党主席的权力也非常巨大。王金平出身高雄，是国民党内少有的能在南部存在影响力的政治人物。2008年大选之前，马英九曾经多次邀请王金平担任其副手，被拒之后，便一直将王金平放在不分区“立委”名单第一名。国民党党章规定，不分区“立委”只许连任一次，马英九为送王金平进“立法院”，利用党主席的权力修改党章，让已经连任两次的王金平再次名列不分区“立委”名单中。

作为选举的负责人，党主席理应为败选负责。台湾媒体披露，马英九此次之所以决定对王金平“痛下杀手”，是因为国民党“四大家族”（对连战、吴伯雄、郝龙斌、朱立伦的戏称）准备提案要求马英九表态为明年的七合一选举负责，倘若明年选举失败，马英九要辞去党主席，而“四大家族”中意的党主席人选正是王金平。

对于曾经唯一的执政党，台湾民主化之后国民党长期以来背负着“独裁者”的包袱，“以党领政”的说法总是让人不自主地想起国民党一党独裁时的种种做法。为此，国民党历任党主席都曾经多次寻找“以党领政”说法的替代品。

每次国民党党内选举时，要求对“以党领政”检讨声则更是此起彼伏。2012年9月国民党中常委改选完毕之后，面对新任中常委，马英九提出“以党领政”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党辅政”的时代已经到来。虽然在说法上有了改变，但是国民党中常委通过中常会建言影响行政院施政的做法并没有改变。

讽刺的是，近年来唯一赞同“以党领政”的则是王金平。今年1月，王金平在美国率团庆贺奥巴马连任时就曾表示，他一贯支持马英九竞选连任党主席，也一贯支持马英九主张的“以党领政”。“‘以党领政’比较符合台湾目前的环境，政策形成与推动都比较一致”，王金平如是说。

立法：当党纪遇上国法

台湾“立法院”“立委”分为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分区“立委”和由政党推荐并按政党得票比例产生的不分区“立委”。而拥有三席及以上席次的政党则可组成党团，党团设总召集人、干事长和书记长三位干部。狭义地说，“党鞭”一词专指党团总召集人，广义上讲，党团三长均可被称为党鞭。

党鞭和不分区“立委”的任命和提名受到党的制约，所以党鞭和不分区“立委”一般来说比较听话。分区“立委”与政党的关系则十分微妙，一方面，分区“立委”出于对党的忠诚及对选举时政党支持的回报，原则上要支持党提出的法案；一方面，当自己所在政党的政策侵犯到自己所在选区选民的利益时，“立委”又要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与党中央对抗。面对民意与党意的矛盾时，“立委”往往以缺席投票或者请假的方式避免尴尬。对此，国民党也修订相关规则约束党籍“立委”。

《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组织暨运作规则》规定，党团对巨大争议事项要求记名表决，无故缺席或表决时不支持者，每次扣新台币一万元

整，并可连续惩罚，每月不超过十万元。持相反意见且不听劝阻者，国民党将对其公开谴责并讨论处理。此规定甚至写明，重大事项需要表决时，党员甚至不能请假。

2010年12月28日，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时，为防止选票流向政敌吴健保，国民党要求13位国民党籍的台南市议员全部“票投自己”。结果13位党籍议员仅有3位贯彻党意，其余10人全部跑票。此事令国民党高层震怒，下令祭出党纪开铡，将10名跑票党员全部开除党籍。

在党纪面前，党员跑票的现象已经不多，政党对党籍“立委”的控制大大加强。加之国民党本身席次优势较大，即便有一两个委员跑票，在“立法院”还是有多数优势。但是几年来马英九的政策在“立法院”屡遭碰壁，“立法院”多数优势根本无从发挥，马英九认为是王金平在“立法院”的做事风格削弱了国民党的席次优势。

面对国民党的席次优势，民进党常见的推迟议会议事的办法就是占领王金平的主席台，王金平也从未使用过“宪法”赋予的“警察权”驱散民进党“立委”，而是经常面带笑容地看着两党“立委”在本属于自己的位子上互呛、拉扯甚至撕打。王金平不喜欢让“立委们”一人一票地投票通过法律，而是喜欢以党团协商的方式通过法案。这让国民党有劲儿没处使：本来席次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党团投票和民进党就是一票对一票，甚至仅拥有三席的亲民党和台联，在党团投票时也能和国民党平起平坐。

更让马英九上火的则是两岸服贸协议。王金平听从了民进党的抗议，要求“立法院”将服贸协议逐条审查通过，而不是马英九力主的打包审查。这让马英九无法接受，假使服贸协议中某条款无法通过，那么已经和大陆签署协议的马英九不仅要面对“背信”的名誉，更是会让大陆怀疑马英九是否还有足够能力影响台湾的“立法院”。

文化：跨越党派的左右逢源

台媒流传着一种说法，这次政争是没有朋友的“总统”PK没有敌人的“院长”。政争爆发之后，一向亲马的某蓝营电视台第一个公布民调，认为马英九支持率降低到仅剩11%，而蓝营电视台的政论节目也不敢公开支持马英九，只是将焦点聚集在王金平和柯建铭的涉案细节中。绿营媒体和蓝营部分反马势力则火力全开，对马大批特批，替王金平出气，让王金平的支持率不降反升。

马王政争爆发之后，国民党内“立委”纷纷观望，罕有人第一时间出

来站队。而民进党则火力全开维护王金平，更有民进党“立委”申请大法官“释宪”，要求认定不分区“立委”的资格不会因为失去党籍和消失。一时之间，民进党人展现出了在支持陈水扁时都没有表现出来的团结，被台湾媒体戏称民进党地下党主席的王金平大有“转正”之势。

南部出身的王金平向来有“蓝皮绿骨”之称，借李登辉重用本土派的东风踏入台湾政坛。2005年马英九当选国民党党主席之后，便一直有声音鼓动王金平成立台湾国民党。作为国民党内资历最深的本土派人士，左右逢源的王金平的确有实力组成自己的政治势力。马王政争爆发之后，又有民进党大佬劝王金平自行组党。

历史上，从国民党出走的政治大佬都有组党的传统——郁慕明成立了新党，宋楚瑜成立了亲民党，而李登辉则担任了台湾团结联盟的精神领袖。虽然第三势力在台湾稳固的两党制下并没有夺取政权的空间，但在国民党执政低迷的当下，王金平有足够的实力成为影响未来台湾政局的关键少数。

第四篇 国民党迁台后的四次大政争

特约撰稿员／杨素

台湾的9月并不平静，马英九以台湾领导人、国民党主席之尊，痛批“立法院长”王金平介入司法，不适任“国会”领导人，又坚持国民党考纪会须停止王金平党权。连番炮轰酿成政争僵局，更让国民党内斗再度摊上台面。

其实国民党历来要搞到党内巨头兵戎相见场面并不多，老蒋时代不过出了一次放逐陈立夫，全面压制CC派；蒋经国御下更严，更无挑战者。直到解严后国民党中央权威日减，才先后出现李登辉开除郝柏村、林洋港，1999年开除宋楚瑜，或连战开除李登辉局面，最后都是具领袖魅力的反对者出走后实质分裂而告终，包括新党、亲民党，乃至于以李登辉为核心的台联都因此而生，也陆续付出沉重代价。

蒋介石放逐陈立夫 CC派就擒

1949年蒋介石转进台湾。但之前他早已对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及CC派掌控的国民党中央与党机器高度不满，决意来台后着手整治党内派系。当时陈果夫已因病而远离核心，陈立夫则成为箭靶。除了CC派影响力外，尤其传言陈立夫曾在1945年后访美之际，代表国府极力拉拢共和党参选总统的杜威，因此被赢得大选的杜鲁门及民主党视为政敌。1949年后国民党多次向美求援，民主党不但置若罔闻，据闻撤换陈立夫更是妥协条件之一，让陈立夫格外尴尬。

尤其蒋介石起用团派的陈诚组阁后，CC派深感将遭边缘化，先发动派系背景中常委向老蒋力斥陈诚之非；老蒋力挺的“立法院长”改选案与“行政院长”紧急处置权限案等两案都在CC派立委杯葛下无疾而终，搞得陈诚向老蒋当面请辞，逼蒋表态，甚至要求老蒋下令陈立夫即起闭门思过。就连蒋介石的改造案，也遭CC派人士当面驳斥改革应由下而上，最好先由干部作成建议再执行，大扫老蒋面子。

深感掣肘的蒋介石因此决定全面清洗陈立夫与CC派地盘。首先，老蒋退回陈诚辞呈，并下令不准陈立夫参加“总统府”会谈，之后虽然陈果夫、陈立夫先后上书求情，但蒋介石连党务都不再允许陈立夫参与。他并公开点名陈立夫“误党、自私”，并放话CC派“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来改造，跟陈立夫去好了”。同时中央党部呈送文件他一概不阅，原封退还，中常会也拒不出席。

蒋介石雷厉风行下，CC派不敢再挡，改造案顺利过关，授权蒋介石遴选人选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大陆时期400多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职权。党中央全面改组，陈诚跃居核心，蒋经国也挤入领导班子，却排除CC派讨论与参与，仅张道藩、谷正纲、洪兰友三人被老蒋指定留任。

但蒋介石并没有收手，他放话要求张道藩研究陈立夫出国一事，等于下最后通牒，陈立夫先避往台中，并在可能被逮捕疑虑下，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出洋。老蒋给了他24小时，因此陈立夫于1950年8月4日离台赴美隐居。连陈果夫逝世也不准他回台奔丧。据说陈立夫辞行时，宋美龄致赠一本《圣经》，但陈立夫指着墙上老蒋肖像说，“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另一个上帝也没有用”。

李登辉铲除非主流 催生新党

两蒋执政时间，大权在握，根本没人敢于正面挑战，也无所谓政争，党内虽有派系，却是用来制衡不同势力的手段。但蒋经国突然过世，党内大佬与中生代各拥山头，并无奥援的李登辉是否接任代理党主席，立刻引发激烈争议。

当时内一派人士主张无须选出代理主席，应采中常委轮流主持中常会之集体领导模式，并积极动员宋美龄在临时中常会时发难。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李焕收到宋美龄函件后，随即致电官邸派的“行政院长”俞国华与中时报系负责人、中常委余纪忠征询意见。余纪忠力主如期提出，俞国华则认为丧事未毕前不宜处理继任问题，决定中常会暂不提代主席一事，等蒋经国奉厝后再提。

之后，官邸派仍联系中常委通气争取支持；但多数国民党中常委认为李登辉代理主席毋庸置疑，以赵少康为首的39名青壮派立委更联署声明公推李登辉代理党主席。结果中常会当天，宋楚瑜临门一脚，批评俞国华迟不讨论李登辉代理主席案并随即离去，在压力下，李登辉无异议接任代理主席，也开启国民党流派之争。

李登辉之后通过李焕与宋楚瑜等青壮派穿梭，逐渐掌控党机器，将官邸派的俞国华等人撤换，继而李焕去职，连番动作引发党内质疑。终于在1990年国民党临中全会讨论“总统”提名方式时，李登辉与同属本省籍中生代的林洋港正面对决，林洋港虽找上陈诚之子陈履安搭档，并喊出党内票选诉求，但国民党仍以起立鼓掌方式保送李登辉与李元簇搭档参选，党内反李势力因此一触即发。

“反李”的非主流派最后动员大批“国代”，推选林洋港与蒋纬国正式参选，并指控李登辉有共党背景，意图毁党；由于当时大批资深国代尚未退职，“正副总统”又是由“国代”选举决定，情势颇为紧张。李登辉因此一方面找来党内八大老劝退林洋港，同时说服蒋孝武以蒋经国曾宣示蒋家不会再角逐大位而要求蒋纬国退选，才逼得林蒋松手，政争无疾而终。

但李登辉深觉国民党既有势力对他的威胁，因此一方面被动支持民进党与学运，藉力使力，推动来自大陆的资深“国代”退职，让立委与“国代”都由台湾地区选举产生，加上把“总统”选制由间接选举改为直选，让他不再受到传统势力牵制。他并在“国会”中透过以本土为号召的集思会，逐渐消解以统一为主轴的两岸政策，声援民进党本土主张，与国民党内以改革、两岸开放为诉求的青壮精英打对台。

李登辉的两手策略非常奏效，连民进党等反对派都对他寄予厚望，党内包括林洋港、郝柏村等实力派都成为党中央新路线下压制对象。也因此赵少康、郁慕明等外省籍菁英先筹组“新国民党联机”，继而被迫出走，于1993年8月另创新党抗衡。虽风头甚健，国民党则元气大伤。

李登辉开除宋楚瑜 亲民党集结

1995年，李登辉撕毁对林洋港只选一任“总统”的承诺，决意竞选连任；加上路线渐偏向“台独”，让林洋港以及郝柏村等人至为不满，离开国民党自行参选，陈履安也同时以无党籍身份参选。这些重要人物虽未另组新党，但逐一出走使国民党传统势力形同被党中央清除干净，加上李登辉吸引亲绿选票而高票当选，一时间环顾党内外无敌手。

至于从“二月政争”开始为李登辉立下汗马功劳的宋楚瑜，虽号称与李情同父子，但因受到党内敌视排挤，因此从担任省主席开始，被李登辉刻意安排到基层磨练，没想到宋楚瑜以蒋经国经验为师，越做越有心得，广受好评，参与第一次省长直选获得大胜，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引发叶尔辛效应疑虑。

宋功高震主，李登辉芒刺在背，虽安排连战作为接班人以制衡，但宋楚瑜各地深植关系网络、用政绩拉拢民心的做法，却使得李登辉无法坐视，因此以“修宪冻省”名义一举翦除宋楚瑜势力，并往“台独”方向更进一步。宋楚瑜则先以“辞职待命”离开省长职位，吸引民众目光，紧接着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2000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也随即遭李登辉撤销党籍。

只是宋楚瑜长期耕耘的声势仍在，除长期培养的省府团队外，并有为数相当多来自省府、地方派系与国民党青壮派民代与政治人物逐步加入，国民党二度分裂。虽然最后宋楚瑜因国民党机器发动的兴票案影响声势，被影射挪用党产在美置产而声势下跌，终于与连战两败俱伤而以高票落选，也导致国民党失去政权。

宋楚瑜崛起引发蓝营内部的版图迅速转移，但在政党轮替后，他并未选择蛰伏或重回国民党，而是另成立亲民党成为台湾第三大党，成为泛蓝共主之一。亲民党立委人数一度逼近三成，不但严重压缩新党空间，连带让国民党的国会过半优势显得很脆弱，很长一段时间元气大伤。

连战开除李登辉 台联诞生

另一方面，政党轮替后，国民党内普遍对李登辉有无“弃连保扁”相当质疑，更有相当多人批评李登辉激进的两岸政策，加上戒急用忍路线引发民众疑虑，经济下滑，使国民党严重受伤害，李登辉顿时成为党内众矢之的，不得不在连战“逼宫”下交出党主席，离开党中央。国民党改由连战当家，虽使大多数泛蓝民众感到情绪上受到弥补，也埋下了党内亲李人士再分裂的因子。

此后，因陈水扁在“扁连会”后片面宣布停建核四，羞辱占“国会”多数的国民党，连战发起在野联盟，结合国亲新三党势力，力主恢复两岸和解路线，重回“九二共识”，反对李登辉所提“两国论”，等于全面推翻李登辉时期重大主张，也使得遭边缘化的李登辉与国民党渐行渐远。终于，部分国民党亲李的本土派人物，决定发动反扑，结合地方派系，自创台湾团结联盟参与“国会”选举，并奉李登辉为精神领袖，首任党主席为李登辉政府时代的“内政部长”黄主文。

李登辉随后也号召党内本土派出走，不但协助筹款，更公开替台联站台，痛骂国民党背离他的本土路线，联共反台，结果在党内批判声中遭撤销党籍，他也顺势成为绿营极力拉拢的独派大佬。台联由于吸引部分亲李的本土派人士，加上部分偏绿人士投入，因此创党三个半月时间，便在“立法院”改选中一举斩获13席立委，取代新党成为台湾第四党派。当然，其壮大也代表国民党面临第三次分裂。

回到马王之争，这是国民党近年来第四次党内重大争议。事实上，回顾国民党多次大规模政争，虽然总掀起腥风血雨的权斗厮杀，但最后结果都是党中央收割战果。也因此在国民党政治文化下，王金平想要一举击败马英九掌控党机器的几率可说微乎其微。

只是国民党目前最迫切的危机仍在明年立委与地方首长选举，及2016年大选。台湾经济情势低迷，民众对马团队普遍印象不佳，马英九支持度早已跌破谷底。如此弱势是否因王金平与支持者反弹而持续削弱，甚至发生分裂危机，付出更大代价，则是政争表面化后国民党这间百年老店必然要解决的难题。

第五篇 台湾各党资金来源一览图

记者 / 马军

2013年年底，台湾“监察院”公布一年一度的政党及政治人物的政治献金收支结算。马英九、吴敦义参加2012年大选的政治献金还剩222万元新台币，而落选的蔡英文、苏嘉全的账户还剩4589万元新台币。

政治献金制度在台湾已经运行十年，不仅将原有台湾混乱的政商关系规范化、公开化，也让民众可以直接调阅各政党、政治人物的政治献金状况。不仅让外界可以一窥各政党的资金来源，也使民众对台湾各企业对蓝绿阵营的倾向一目了然。

规范透明的政商互动

所谓政治献金，指的是由企业、个人向从事竞选活动的政党或个人提供的各种无偿援助，包括现金、有价证券、不动产等。究其本质，实际上是规范化的政商互动。根据岛内传闻，在台湾选一个县市议员需要数百万新台币的资金，县市长则需要上千万元，而台北、高雄这样的“直辖市”市长选举则需要上亿，“总统大选”则要花费更多。

1998年年底台北市长大选，民进党在中山足球场举办的“抢救陈水扁”造势晚会，光是便当钱就耗费了超过1000万新台币。如果没有商人和企业提供大笔的政治献金，单凭台湾政党和政治人物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承担这种开销的。

台湾政商之间的互动早已有之，解严之前，企业家和国民党政治人物打交道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因此被打上“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负面观感。

光复之后，国民党全面接收了日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遗产，并将其转化为党营事业与国营事业。在中央层级，国民党通过党国事业来严密地控制经济活动。地方上，则给予地方派系和本土势力经济活动的独占权，利用农会、渔会、地方合作社、小型工程，甚至黑道等地下经济来换取当地商人对国民党的支持。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企业与政治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丧失了许多原有的特权，开始拉拢企业主。李登辉推动了国营事业民营化、金融市场开放等举措，但私下将许多党营事业分发给特定的财团，甚至通过将资本家纳入国民党体制中的方式与资本家结盟。

李登辉时期是台湾“黑金”政治最为泛滥的时期，随着政治民主化进

程与经济私有化进程的同时推进，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开始勾结，社会反对“金权”的声浪开始四起。1991年，随着台湾“国会”即将迈入全面改选之际，“立委”林正杰等33人开始起草政治献金草案，并且经过了十余年的议会斗争，终于在2004年3月18日由“立法院”三读通过，并由陈水扁在当月签字生效，开始实施。2008年2月16日起，台湾“监察院”开放一般民众查询历年选举政治献金收支情况，企业界对蓝绿党派的支持也开始一目了然。讽刺的是，下台后的陈水扁，成为了全台湾首个适用该法被起诉的被告。

目前，台湾“监察院”把所有公职选举全都纳入监管范围，从“正副总统”到“立委”，从县市长到县市议员，甚至乡镇长和村里长都必须设立接受监督的政治献金专户。由于台湾选举众多且时间不一，政治献金账户已经不限定于选举期间开放，只是每逢选举年，各政党及政治人物的政治献金收入都会有所提高。

“政治献金法”规定，企业可以捐钱给固定的候选人，也可以捐款给政党，由政党进行分配。对已同一个政党，营利事业每年的捐款总额不得超过300万新台币，对某个参选人捐款，每年总额不得超过100万元。参选人收受的政治献金，如果有剩余，每年度要向台“监察院”申报，如果政治献金在4年内没有支用完毕，就要“缴交国库”。

对于300万的额度，许多政治人物和企业都表示制定得过低，但是也有办法进行突破——以下属分公司名义进行捐赠。2012年，台湾远东集团就分别以元鼎投资、远银国际租赁等旗下公司名义向国民党“马吴”阵营捐款。同时，也以远银国际租赁等名义捐钱给民进党“蔡苏”阵营，两不得罪。不少企业都会选择同时经营同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个大党的关系，即便选举年站队表态只捐一方，也会在非选举年两头押宝，以求政策上得到便宜。

一般来说，企业不愿意让自己的政治倾向曝光，面对“政治献金法”的规定，为了避免得罪“风水轮流转”的政治人物，不少企业都选择两头捐赠。但是也有企业倾向明显：台湾台塑集团2004年时曾是民进党的铁杆支持者，但由于陈水扁当局保守的两岸政策限制了其在大陆的产业布局，因此在2008年之后便开始转投国民党怀抱，成为了国民党的固定捐款者。

收入不同，活法不同

由于商界人士对政坛变化更为敏感，历次大选中蓝绿双方所获得的政治献金数额也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政治局势的“晴雨表”。2004年，陈水

扁携执政优势迎接国亲联盟的“连宋配”，选举中民进党的政治献金专户有462笔捐赠，而国民党只有82笔。到了2008年，由于陈水扁的贪腐传闻和马英九的清新形象，大选双方的政治献金数额发生翻转，“马萧配”的政治献金额度为6.8亿新台币，而民进党的“谢苏配”仅有4亿元新台币。

相比于国民党庞大的党产，作为“小党”的民进党只能对有限的捐款进行精打细算，党中央对候选人的支持远不及国民党“给力”，但“投资回报率”显然比国民党高很多。

2006年的台湾北高市长选举中，国民党中央对参选台北和高雄的郝龙斌、黄俊英的补助款都超过了1/3，而民进党对谢长廷和陈菊的竞选支出基本依赖自己筹资，党内的补助仅有15%。

而在2009年底的台湾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党部向各地候选人提供了总额超过2亿新台币的巨额经费，其中云林、嘉义、屏东、花莲、金门等地的国民党候选人有70%的竞选经费依靠国民党中央补助。民进党补助最高的苗栗县也仅有50%，而嘉义、彰化等地，民进党基本上都没有金钱支持，民进党籍候选人的选举经费基本都是靠个人募集所得。

历次选举中，无论是造势晚会的规模，还是选前广告的投放，财大气粗的国民党都比精打细算的民进党要“阔气很多”。在2012年大选造势晚会上，协助“蔡苏配”站台的谢长廷就曾公开抱怨：“国民党就是一个‘大怪兽’，电视台选举广告都是他家的，他们太有钱了。”但总体来说，民进党的投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国民党，最好的例证是2009年宜兰县长选举：国民党向候选人提供了2000万新台币的支持，而民进党只是象征性地提供了2万元新台币给候选人，而最后民进党战胜了国民党，获得了北台湾唯一一席的县市长宝座。

选举经费的其他来源

台湾政治献金制度走过十年，虽然将台湾之前的政商互动制度化并公开化，一定程度杜绝了商业利益对政治决策的绑架，却也为不明财产来源提供了借口：陈水扁就曾因为以“政治献金”为名向企业家索取巨额现金被起诉，而马英九心腹赖素如面对受贿指控时也辩称，所收贿款是政治献金，以求脱罪。

近些年的选举中，台湾政治人物也尝试规避巨额政治献金给自己带来的政治与道德风险。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蔡英文为凸显国民党巨额党产的“大怪兽”形象，推出了“三只小猪”的个人募款计划，结果总共

获得了超过13万笔的个人捐赠，远远超过“马吴配”的1.1万笔。在蔡英文7亿多元新台币的政治献金收入中，有超过5亿来自个人捐赠，营造出蔡英文“接地气”的草根形象，反观“马吴配”的选战资金中，最大来源是国民党捐给马英九的2.3亿新台币。

除此之外，根据台湾“选罢法”规定，如果候选人得票达1/3，可以按票数每票补助30元新台币，政党票超过5%的，每票可以获得50元补助。就此一项，2012年选后马英九便可从“国库”中获得超过2亿的选举补助款，而选输的蔡英文也至少能拿到1.8万亿新台币。

政党票方面，国民党拿到2.9亿新台币补助款，民进党有2.3亿新台币。台联党因为获得超过8%的选票，不仅获得三席“立委”资格，更获得5900万新台币的选举补助款，参加2012年选举对于之前年收入仅1000万元新台币的台联党可谓是划算的买卖。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由于得票没有过5%，不仅拿不到选举补助金，选举经费都打了水漂，甚至连1500万新台币的选举保证金都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可谓是2012年大选最亏的人。

精彩推荐：《政府花钱谁说了算》



点此阅读

第六篇 直击台湾“九合一”选举

记者 / 马军

“蓝天变绿地，好难过……”

11月29日，随着开票进程的进行，国民党溃败已成定局，林佑铭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晒下了三张草原的照片，并配上了上述文字。

此前一天，林的朋友圈晒出的是广州飞往台北的机票。作为刚到大陆台企工作仅一年的职场新人，林此次回程拿到了一定程度的路费补助。他此次回台的目的非常简单：投连胜文一票。

为防止民调影响选情，台湾法律规定，选前十天任何机构不许公布民调。选举十天前的封口民调中，国民党在台北和台中的连胜文与胡志强都落后于绿营的候选人柯文哲和林佳龙。国民党不仅在台湾展开了以“抢救”为主题的选举造势活动，大陆的上海、广东等台商密集的地区也都出现了画有连胜文和胡志强照片的大型看板。

广东某地举办的一场台商酒会中，国民党官员和当地台商协会的负责人纷纷上台讲话，鼓励台商紧密团结回台投票，会场上大屏幕里滚动显示着连胜文和胡志强的照片，会场的最后，还响起了“团结就是力

量”的音乐。

台商攻势不再管用

《凤凰周刊》记者选前得到的消息，连胜文阵营根据内部民调估计台北市选战输赢在两万五千票之内，对此,连阵营最后的打算是：想尽办法在最后时刻催出一万张票来，再动员一万五千名台商回台投票。

国民党在选情危机时刻想到台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08年“总统”大选，马英九在民进党最低迷的时刻大胜谢长廷200多万张票。由于当时两岸还没有直航，国民党又大胜对手，台商的重要程度并未十分凸显。

但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民调一直十分接近，甚至选前十天，民进党内部民调判断蔡英文会获得最终胜利。正是因此，蔡在最后时刻没有转向拥抱有助两岸和平的“九二共识”，反向拥抱了代表“台独”势力的李登辉。

马英九为了挽回颓势，在最后一周大打电视广告，富士康老板郭台铭、HTC老板王雪红、创新工坊老板李开复……行走两岸如雷贯耳的成功台商以一天两个的频率占据了2012选前最后一周的政治广告。在这十几个广告中，所有的商人如出一辙地支持“九二共识”、支持两岸和平、支持国民党、支持马英九。

财力上完全与国民党不可同日而语的民进党，整个选举只在选前一天在《自由时报》上购买了半个版的版面，刊登了李登辉的一篇亲笔信。最终，在台商大佬们的“狂轰滥炸”下，马英九以51.6%的得票率战胜蔡英文的45.63%，获得险胜。

在败选演讲中，蔡英文声称自己输在了“最后一里路”上，而民进党随后的败选分析上，确定这“最后一里路”就是两岸政策。

随即有台湾分析机构称，根据最后一周未被公开的民调计算，国民党发起的这轮台商攻势至少成功唤起了5%选民对民进党两岸政策的恐惧，进而将票转投给了马英九。也就是说，若不是这最后一周的选举广告，2012年获胜的将是民进党的蔡英文。

换句话说，即使不算十几万台商自己的选票，光是通过做广告的方式，台商就能影响几十万张选票的投向。

但是此次“九合一”选举，台商的支持并没有给国民党候选人加分，

反而失掉了很多分数。

“九合一”大选期间，大陆台商成功代表的顶新集团爆出“黑心油”事件，一时之间台湾岛内人心惶惶。因为顶新几乎垄断或参股了台湾所有食用油品牌，几乎所有餐饮业和家庭全部中招。“黑心油”事件爆发之后，由于国民党连战家族和顶新魏家的亲密关系，连胜文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虽然连胜文在竞选策略中喊出“对于黑心厂商要罚到死，罚到倒”，但依旧无法摆脱负面影响。岛内多家民调机构显示，顶新“黑心油”事件的爆发至少让连胜文失去5%的选票。

在此之前，另一位台商成功的代表也已经被扣上“红帽子”。2011年，已经拥有台湾《中国时报》《旺报》以及中视、中天等电视台的旺旺中时媒体集团申请购并台湾主要有线电视网络之一的中嘉网络，引发台湾学界和媒体的主要关注。当时台湾舆论担心，由于旺旺集团蔡家在大陆经商，与大陆官方互动密切，并购后的旺中集团将控制超过40%的台湾媒体，担忧对台湾的“言论自由与民主”带来伤害。

最终，在汹汹民意下，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认定不予通过此购并案。对此，有台湾反垄断部门官员表示：“政府本无意阻挡此购并案，但在汹汹压力下不得不向民意妥协”。

而蔡家旗下的中天电视台，在3月“太阳花”学运期间因反对学运被学生视作“亲中”媒体，甚至学生发起“抵制中天，拒绝在播放中天电视台的餐厅吃饭”等抵制活动。

也正是在蔡家、魏家全部被贴上“亲中”的“红色标签”后，国民党不得不祭出最成功的台商——郭台铭。

“我今天穿得够不够蓝？”在11月23日举办的“挺到底”造势晚会上，面对国民党的支持者，郭台铭走上晚会舞台，向选民呼吁“我是台北市民，拼经济的决心无比强烈，因此站出来挺连胜文”。

舞台上，郭台铭向支持者挥舞着手臂，演讲时也不时振臂高呼。这些竞选是候选人经常做的“必选动作”，郭台铭做的并不自然。“这是我的选举处女秀，我把它献给连胜文”。

撑完连胜文之后，第二天郭台铭随即来到台中，出席中台湾产业发展论坛。在论坛中，郭台铭向媒体喊话“如果胡志强当选，我一定会来台中投资，至少投资2000亿台币”。

对此，同一天也在台中拜票的蔡英文表示：“在这次选举中，有些

企业家错误频频，其实已经某种程度逾越了一个企业家在台湾社会所扮演的角色。”而对于郭台铭的表态，台湾舆论也并不买账。台湾政治评论员胡忠信表示：“一个真正爱台的企业家，是不会看市长是谁才来投资的，郭台铭你这样的举动，到底是做给台湾人看，还是做给对面的大陆看？”

“‘太阳花’学运之后，台湾社会反全球化、反两岸权贵的思潮火热，这时候台商都是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只要是在两岸经贸中获利的一方，都会被特别的检视”，台湾资深媒体人周玉蔻对此解读道。

传统议题逐渐失效

“柯先生，作为一个无党籍候选人，你自称是白色的医师，却一直参加民进党甚至‘台独’团体的活动，还亲手撕毁‘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但是为了选举，你又说‘中华民国’是你的底线，请问你如何解释这个矛盾？”

11月12日的台北市长辩论会上，面对“台独”倾向浓厚的柯文哲，有公民团体提出如此的疑问。

去年5月11日，柯文哲应激进“台独”组织“908台湾国”邀请，到“新国名运动”大会为“台独”运动站台，会上撕毁自己的“中华民国身份证”道具，领取“台湾国”身份证。

此外，柯文哲一直是陈水扁医疗团队的一员。据《凤凰周刊》从台湾“监察院”获得的视频资料，在呼吁陈水扁保外就医的医疗团队中，柯文哲始终在列。

对此，柯文哲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有现在和未来。作为一个候选人，我希望你们看到的是我的现在和未来。我的身份证现在还在身上，国民党却花大价钱在报纸上买半个版的广告攻击我。”

长久以来，认同“中华民国”还是认同台湾被视作是台湾社会最大的政治分野。认同“中华民国”，认同中国人身份的国民党、亲民党、新党被视作是传统蓝营；认同台湾主体性意识，追求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台联党则被视作是传统绿营。

“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台北看蓝绿，台中看派系，云林看新台币’。”台湾民调机构未来事件交易所执行长洪耀南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国民党迁台后，大量军公教人员随即来到台北，国民党在台北的势

力最为雄厚。根据之前历次投票县市，台北的民众蓝绿比为6比4。即使1994年民进党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所得票数也不过43%，民进党候选人从未在台北获得过超过半数支持。

正因如此，连胜文阵营在选举最后阶段拼命诉求柯文哲的“台独”倾向。选举最后阶段，国民党连续在台湾报纸上刊登半版广告，广告上刊有一双撕毁“中华民国”身份证的大手，试图以此唤起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死忠派的支持。

此外，蓝营大佬也纷纷站出来指责柯文哲是“披着白衣的墨绿”。新党党主席郁慕明称：“柯文哲自称代表在野大联盟，但就是用在野联盟包装，欺骗台北市民。明明自己是深绿，此时却将不反对‘中华民国’，明明自己是民进党，却要包装成无党籍……”

前“行政院长”、“参谋总长”郝伯村也站出来抨击柯文哲是“日本皇民后裔”。对此，柯文哲反讽道：“郝伯村应该知道中山樵和石冈一郎都是谁吧，他们一个是孙中山的日本名，一个是蒋介石的日本名。”

“这场台北市选举，是一场很奇怪的选举，也是一场非典型性的选举，国民党的一切招数最后全都失效了。现在的台北，由于受年轻世代的冲击，对于蓝绿、统独这些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周玉蔻表示，“过去我们认为，台北是个蓝绿六四开的地方，现在可能已经五五开，甚至三点五比三点五，剩下的三成中间选民是完全没有政党倾向的，完全看候选人的实力。”

“在台北，45岁以下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上一代人那样，对蓝绿、‘统独’感兴趣，他们关心的就是自己买不起房、薪水不涨”，另一位在“行政院”工作的台湾公务员称：“两岸经贸虽然为年轻人带来了一条活路，但是几年后他们发现这些钱都被有权有势的人赚走了，年轻人根本没获利，当然会对国民党不爽。”

台北市长选举的最后结果，连胜文大输柯文哲25万张票，正式宣告其最后所有将选举主轴拉回到“蓝绿对立”的政策失败。

在另一个战场上，执政已经13年的国民党台中市长胡志强也大输民进党候选人林佳龙21万张票，这意味着台北的选举或许从此不再看蓝绿，台中的选举从此也不会再看派系。

11月8日，马英九在台中出席一场造势活动后，特别前往市议员候选人颜莉敏的家拜访了她的爸爸和哥哥，现台中市议会议长林士昌等台湾黑派大佬悉数到场。拜访过程虽然没有对媒体公开，但场内还是传

出“胡志强冻蒜（当选）、林士昌冻蒜、颜莉敏冻蒜”等口号声。

颜莉敏的父亲是台湾黑道大哥、前“立法委员”颜清标，而她的大哥颜宽恒则是现任的“立委”。由于掌控着台湾最有声望的妈祖庙——大甲镇澜宫，颜家不管是从财力上还是人脉上都可称当地一霸，不仅不需要政党资源便可在地方选举中连续获胜，甚至在国民党这样的百年老党需要帮助时，可以给予一定的资源。

自第一届台中县长选举以来，台中政权就一直掌控在地方派系手中。早年间，台中林家和陈家两大家族分别用红色和黑色作为文宣主要颜色，故被称作是“红派”和“黑派”。交手几次之后，红黑两派达成协议：县长轮流当家、议长、副议长也是如此。

2010年之前，胡志强已经做满两届台中市长，本应退休。2010年台中县市合并成为大台中市，胡志强才得以继续竞选连任。此次“九合一”选举之前，胡志强在台中已经任职13年。13年间，被视作是国民党内最会处理人际关系的胡志强，非常善于摆平红黑两派：红派如果担任副市长，黑派一定担任政府秘书长。此次国民党依旧提名胡志强，就是因为党内除胡之外，没有人能摆平两大派系。

而选举过程中，国民党的竞选主轴也都放在红黑两派的协调上。选前一周的黄金周末，胡志强选择来到原台中县举办造势活动，廖了以、黄仲生、颜清标等红黑两派大佬纷纷出面相挺，呼吁选民票投胡志强。

实际上，11月初，民进党曾故意放话，称已经搞定台中黑派，亲绿媒体也放出话称“国民党派系整合失败”。为此台中黑派还专门发表声明称：“这次选举，我们黑派早已达成共识全力支持胡志强，比任何一次都会更团结，更有凝聚力。”

选举之前，由台湾媒体报道称，郭台铭出资三亿新台币帮助胡志强整合台中黑红两派势力。当黑红两派势力全都出面力挺胡志强之后，国民党对胡选情担忧的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缓解。但最终还是没想到，胡志强在台中大输21万张票。而在国民党自认为派系整合成功的原台中县，就输了15.8万张票。国民党做了往常选举都会做的事，却没有拿下这次选举。

学运世代纷纷登场

“这一步，我们走了十年”。得知自己当选台中市长后，民进党候选人林佳龙动情地对支持者说。

2005年台中市长选举，林佳龙就曾挑战过胡志强而被击败，随后深耕台中十年，从陈水扁发言人、新闻局局长、“立法委员”终于熬成了台中市市长。

和林佳龙有共同经历的还有新当选的桃园县长郑文灿、基隆市长林右昌。郑文灿2009年曾经参选桃园县长失败，此次终于如愿以偿。而林右昌在此次选基隆市长前，曾参加2009年基隆市长选举和2012年“立法委员”选举，均以失败告终。

林、郑、林三人都是民进党深耕地方多年最终夺回执政权的中生代代表，不为人知的是，他们三人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经历：“野百合”学运一代。

1990年，台湾爆发针对于国民党万年国代的“野百合”学运。学生占领城市中央的“中正纪念堂”，要求国民党对“国民代表大会”进行改选，林佳龙、郑文灿二人都是当年台湾大学活跃分子，亦都是学运领袖。

此后，在学生运动的要求下，国民党势力开始逐步退出校园，民进党则趁机而入，将学运中涌现出的学生积极分子纳入到自己的政党体系中。林佳龙在学运结束后赴美国耶鲁大学就读博士班，毕业后回到台湾出任陈水扁政府的“国安会”咨询委员；郑文灿在学运之后则直接进入政坛，成为民进党的文宣策划；林右昌则被当时的民进党主席林义雄发掘，直接进入民进党中央工作。

“必须承认，民进党在青年工作上显然要比国民党做得好，虽然国民党有青年团等青年工作机构，但是不管是做事风格还是重视程度都比民进党落后很多”，一位国民党青年团员对《凤凰周刊》如此说道。

国民党多年以来对青年世代培养不力，最终反映在这场选举上。不仅地方上党内提名人选是捉襟见肘，在争取青年世代选票时也举步维艰。

选前最后一天，连胜文在报纸上刊登终极竞选广告，广告上连胜文和几个白发老人坐在一起，配文是：“这一票请听父母的话”。而柯文哲选前十天在网络上刊登出来的广告主题是：“你有多久，没有听你孩子的话”。

根据选前民调显示，连胜文和柯文哲在年轻族群中的支持率是惊人的二比八。选前柯文哲一直呼吁年轻人出来投票，“不要只在家里当键盘一族”，而连阵营则一直希望投票当天天气能够差一点，让年轻人不愿意出来投票。

“野百合”世代全面接管台湾的地方政治，另一场学运涌现出的“新血”也开始进入到台湾的政治体制中。

此次选举，刚刚25岁的薛呈懿当选宜兰县议员，成为全台最年轻的议员。而29岁的陈纪冲则高票当选为集集镇的镇长。在今年3月份的“太阳花”学运中，薛呈懿和陈纪冲都是学运中涌现出的政治力量，第一次选举就扳倒了当地的传统政治人物。

民进党在此次选举中，推出了名为“民主小草”的“80后”年轻人培养计划。计划中推出的47名候选人中，拿下9个里长和6个乡镇市民代表席次，表现十分亮眼。

今年5月1日，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宣布，在台北的6个选区中，每一个选区都将推出一名政坛的新鲜面孔，让这些“80后”为民进党注入新的活力。在台北的这6个新人里，包括了谢系嫡系人马、谢长廷的儿子谢维洲、苏贞昌担任当主席时的发言人王闵生、蔡英文的人马王威中、扁系在民进党残存势力“一边一国连线”的许家蓓、现任议员新潮流系的徐佳青以及民进党资深当红议员简余晏的助理简书培和颜若芳。

周玉蔻对《凤凰周刊》分析，民进党新人的出现方式集中体现了民进党的传统风格，那就是“派系协调，初选激烈，但初选后大家相当团结，为胜选不遗余力。”

选举结果，民进党在台北市培养的这六位“80后”全部高票当选，而这些年轻人全部持反对服贸、支持学运的观点。相反，国民党并未提名任何支持服贸的青年投入到市议员选举中，新党提名的两名支持服贸、反对学运的年轻候选人则全都以不足1%的得票率落败。

开票当天，连阵营和柯阵营纷纷在自己的竞选总部前搭好舞台，连阵营如以往选举般由主持人不断地向在场支持者宣读最新开票数据，而柯阵营则主办了一场全部由民间艺人和大学生担任主角的音乐会。

放眼望去，连阵营的支持者中若不是有大陆学生参加，几乎全都是中老年人，不少人还手持自己当年和蒋经国的合影。而柯阵营的舞台前，几乎全都是载歌载舞的年轻人。蔡英文在开票当晚，定义这场选举是“青年世代的胜利”，如果蔡英文是对的，那国民党此次“九合一”输掉的则不只是现在，还有未来。

第七篇 台湾县市议长选举蓝营大逆袭

记者 / 马军

“好……”在一阵欢呼和唏嘘声中，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蒋根煌抽中议长职位，成为新一任新北市议长。这是台湾史上首次在两轮投票都打平的情况下由抽签决定议长人选，国民党幸运中签。 全台22个县市议会中，“九合一选举”大败的国民党竟选上了17席议长职位，民进党仅获得3席，无党籍得到2席。而在六个“直辖市”中，国民党囊括5席议长，仅有高雄落在民进党手中。在“九合一”选后的低迷气氛中，国民党扳回一城。

新北市议长由国民党蝉联之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甚至国民党议员均表示非常惊讶和错愕。根据一个月前的选举结果，新北市66席议员国民党仅有26席，民进党则有32席，其他党派和无党籍共有8席，民进党优势明显。

“九合一选举”期间，蔡英文亲自督军新北市，不仅让游锡仅以微弱劣势落败，议员选举民进党也大获全胜。当时台湾媒体分析道，蔡英文已经达到了将朱立伦卡在新北市长位子的目标。议长选举前，台湾舆论纷纷表示未来四年新北市长朱立伦的日子不会好过，蒋根煌凭借运气拿到议长职位，结果让外界十分惊讶。

更惊讶的选举结果则出现在台南市，台南市议会57个席次中，民进党占据超过半数的29席，国民党仅有16席，其他党派12席次。结果台南市的议长宝座由国民党籍李全教获得。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至少有5名议员把票投给了国民党籍候选人。

选前，蔡英文罕见地下达重令，要求民进党党员全部按照党的决议投票，而且必须亮票给检票员，一票都不许跑，违反者一律开除党籍。

按照现行台湾法律规定，议长选举投票属于“无记名投票”，但并不属于“秘密投票”。也正是因此，“亮票”行为在台湾是否违法还有争议，此前的几次判决中，有地方法院将“亮票”视为无罪，也有法院将“亮票”行为视为泄密罪处理。

在7月进行的“监察委员”提名过程中，国民党为护航“监委”要求全体党籍“立委”亮票，结果遭遇民进党“立委”以霸占主席台的方式杯葛。此次蔡英文要求全党亮票，被质疑在不同事件上采取“双重标准”。

面对质疑，台北市议员、民进党中央发言人徐佳青表示：“亮票是

为了防止自己的议员不被国民党买走，本质上是对党员的一种保护”。长期以来，乡镇代表会会长和县市议长的选举是全台湾选风最败坏、买卖票最多的选举。台南市议长选举过后，市长赖清德马上对媒体表示，此次选举绝对有金钱介入，要求检调机构介入彻查。民进党中央也在等候具体调查结果，一旦查出，绝不姑息。

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如果是党内出现分裂的情况还算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投给国民党，那一定是有金钱的因素介入”。据了解，在历次台湾县市议长选举中，对于某些关键选票的价格在五百万新台币左右，选情激烈的情况下，价格可能上升至最高一千万。

为防止党员“跑票”，台湾各政党曾花招百出，国民党曾将党籍议员在选前全团送往美国夏威夷度假，并且全程没收手机，防止被对方买通。

除此之外，民进党地方议员跑票行为还与家族政治、派系政治有关。“以我们云林为例，很多人都是家族势力很大，他不在乎有没有党员的身份。”前“立委”许舒博称，“像我们云林的议长，以前是国民党、后来加入台联，这次是民进党籍，照样都能选上，他也就不会害怕被某个党开除了。

第八篇 台湾“美丽岛”世代退场

记者 / 马军

4月14日，当台湾政坛还在清理“太阳花”学运带来的遗产时，民进党两大“天王”苏贞昌和谢长廷却突然丢下两颗震撼弹：一个上午，两人先后发表声明宣布退出五月份进行的民进党党主席改选。退出之后，原本三个太阳竞逐的民进党党主席只剩蔡英文一棵“独苗”，这也几乎意味着如果不出意外，蔡将被保送上2016年“总统”候选人的大位。而更重要的是，随着学运的结束，民进党内部要求新老交替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谢长廷和苏贞昌的渐居幕后，民进党“美丽岛”世代除了“南霸天”陈菊以外，已全部退居二线，在台湾政坛呼风唤雨近40年的“美丽岛”世代开始落幕。

“新老交替”成托辞

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最近得到了一个新的称号：后羿。原因是他在“太阳花”学运结束之后的一则呼吁。

学运之后，赵天麟看到其背后隐藏着的青年人的力量，以及台湾社会深层的世代矛盾，提出了民进党要世代交替的呼吁。而在赵天麟呼吁后两天，民进党两颗“太阳”谢长廷和苏贞昌便宣布退出党主席选举，赵天麟便因为成功“射日”，获得了“后羿”称号。

对于这个称号，赵天麟并不反感，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射日’的初衷，但是如果是为了党内改革，叫我做十次后羿我都愿意。”

据台湾媒体分析，实际上苏、谢二人的退出与世代交替的呼声并无太大关系，世代交替只是二人走下权力大位的托辞。苏贞昌接下来很有可能宣布投入到刚刚升格为“直辖市”的桃园市长的选举，或者取代游锡堃挂帅新北市长选举，进而参选2016。而谢长廷的退出则完全是因为“知趣”：其在2008年“总统”大选失利后便宣布退出政坛，人马和实力都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谢的“一中架构、宪法共识”的两岸定位极其接近国民党的“九二共识”，也不被民进党内部普遍认同。根据《凤凰周刊》记者之前在台湾的走访，连包括谢系人马在内的台湾政治人物，没有一人看好谢长廷能够当选主席。

对于苏的退选，民进党“立委”吴秉的说法是“社会责难太多，党主席难以求全”；而“立委”邱议莹则为苏贞昌抱屈，认为其这段时间忙里忙外却得不到好的评价，是其决定后退一步的主要原因。

苏、谢二人以完成“世代交替”宣布退选，获得保送的蔡英文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在4月14日当天就发出声明称，人民会肯定苏、谢为民主的付出，而她会“坚定承担、承前启后”，完成世代传承和党的改革。

党主席的派系斗争

除了“后羿”之外，赵天麟“逼宫”苏贞昌后最被外界检视的是其“谢系”子弟兵的身份。不过对此赵天麟并不否认，他称民进党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标签，隶属哪个派系，谁的人马，内部人士一目了然。

民进党“立委”们也从不避讳自己的派系属性，为苏贞昌退选开脱的吴秉睿和邱议莹便是苏贞昌的嫡系人马。

据台湾媒体披露，苏贞昌在3月底参加“太阳花学运”号称的五十万人大游行之后便决定不再参选，原因是“实在选不下去了”。整场学运中，学生似乎只认蔡英文一个民进党政治人物，其余不论是苏贞昌、谢长廷还是施明德，即使是出现在对抗警察、保护学生的场合，也依旧被学生呛声。

实际上，在苏贞昌做出退选的决定之后，民进党内部的派系还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苏贞昌在宣布退出党主席前三四天，已经通知民进党各派系核心成员自己将要退出的决定。各个派系也据此情况进行了沙盘推演。谢系人马犹豫于是否在苏退选的情况下继续参加选举，而和苏贞昌关系良好的新潮流系则希望苏贞昌收回决定，并且派大佬陈菊游说蔡英文，希望蔡能够礼让苏贞昌继续担任党主席，自己直攻2016。

而蔡英文则回绝了陈菊的游说，表态参选到底的决心。在此情况下新潮流系也表示，即使苏贞昌不选、新潮流系也不会支持谢长廷。在此情况下，谢长廷也宣布退出党主席选举，既保留了颜面，也给之后和蔡系人马继续合作保留了空间。

公开的派系政治可称是民进党特有的特色，无论是民进党成立之初的路线斗争、执政之后的人事安排以及再次在野后的两岸政策调整，都能看出其背后派系政治的作用。实际上，作为一个成立不足三十年的政党，派系之间的斗争也极大程度上的保证了民进党的“民主性”，相比于国民党的党主席，民进党的党主席处境更艰难，除了要承担各项选举的成败，还要面对募款的压力。

但相对于决策圈极小的国民党，派系政治也让外界更容易看透民进

党内部的政治生态。这也使得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台湾分别有“伪君子”和“真小人”的评价。派系政治的公开存在，也使得年轻人在民进党出头更加容易。与苏贞昌关系密切的新潮流系，就以善于培养年轻人而闻名。民进党新生代的代表赖清德、蔡其昌等人，都是新潮流系培养出的优秀人才。

“美丽岛”世代退场

苏、谢二人退出选举，没有任何派系出身的蔡英文即将回锅民进党党主席。无论是从世代角度，还是从派系角度看，“美丽岛”三个字都面临着从台湾政坛退场的现实。

1980年2月发起的美丽岛事件军法大审，让“美丽岛”第二代，即辩护律师纷纷崭露头角。1981年11月，谢长廷和陈水扁当选为台北市议员，苏贞昌当选为台湾省议员，宣布辩护律师世代正式“弃法从政”，而1994年至2000年则是“美丽岛”律师团全面爆发的“高光时期”：1994年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1997年苏贞昌当选台北县长、1998年谢长廷当选高雄市长、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美丽岛世代内部进行了一次新老交替，“美丽岛”第一代逐渐退居幕后，第二代全面掌权“当家”。

而在民进党成立之时，“美丽岛”也作为两大派系之一在台湾政坛有着极强的影响力。作为当时最为著名的党外媒体，《美丽岛》杂志的主要人物黄信介、施明德、许信良、吕秀莲等人在民进党成立后迅速成立“美丽岛系”，与邱义仁、吴乃仁等“十八飞鹰”领导的新潮流系平分了民进党内部资源。“美丽岛系”与新潮流系两派互相合作与斗争，开启了民进党初创时期的派系共治局面，也为民进党定下派系政治的基调。



1988年至1991年间，民进党的“中执会”和“中常会”基本上都由“新

潮流系”和“美丽岛系”平分，而当“美丽岛”律师团逐步掌权之后，陈水扁领导的“正义连线”和苏贞昌、谢长廷领导的“福利国连线”则逐步走上舞台，“美丽岛系”随着黄信介的去世以及许信良等大佬的出走而逐渐式微。

“美丽岛系”影响力逐渐被取代之后，陈水扁便盯上了“新潮流系”，2006年7月，在陈水扁的主导下，民进党通过“解散派系”的提案，禁止民进党内部以设立办公室、招募会员、募款等方式进行派系的运作，也禁止任何党内公职人员加入派系。原有派系在组织上已经消失，但仍以各个政治大佬嫡系部队的方式运作。2008年，“新潮流系”便成立“台湾新社会智库”，以智库的方式重新存在。

而随着派系组织的消失和2008年台湾政党再度轮替，“美丽岛”世代也开始走下坡路：谢长廷参选2008铩羽而归，苏贞昌竞选台北市长输给郝龙斌，陈水扁卸任后身陷囫囵更是为律师世代的形象大打折扣。实际上，2006年“红衫军”倒扁时，“美丽岛”第一代领军人物施明德牵头反对自己曾经的律师陈水扁，“美丽岛律师团”的形象跌到谷底。

时至今日，曾经辉煌的美丽岛世代再次面临退场。和上次不同的是，施明德、许信良淡出政坛后还有律师团世代接班。而随着台湾民主的深化以及无派无系的蔡英文逐步做实党内权力，“美丽岛”世代后继无人，或许从此正式消失。民主启动时的大佬逐渐退场，这对不断深化中的台湾民主进程未必是件坏事。

第九篇 台湾“绿二代”全面接班？

记者 / 马军

在民进党内“蔡氏旋风”的逼退下，民进党前主席苏贞昌宣布不会参加针对2016大选的民进党初选。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贞昌就此淡出台湾的政治圈。作为民进党“四大天王”之一，苏贞昌除了要帮2016年的各位党内候选人站台助阵之外，还要帮助其女儿站台。

春节期间，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宣布将投入2016年的“立委”选举。在此之前，前“行政院长”游锡之子游秉陶也宣布参选“立委”。加之去年底已经高票当选台北市议员的谢长廷之子谢维洲，以及一直活跃于政坛的陈水扁之子陈致中，民进党扁、吕、游、苏、谢五位大佬中，除了终身未婚的吕秀莲之外，其余四人的子女均有意进军政坛，台“绿二代”有全面接班之势。

在“绿二代”浮出水面之前，台湾岛内一直是国民党籍的“蓝二代”牢牢把持政坛要位。台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前台北市长候选人连胜文、新北市长朱立伦以及前桃园县长吴志扬均属“蓝二代”。

去年爆发“太阳花学运”之后，台湾岛内掀起“反中”“反商”“反官二代”的巨大声浪。在此背景下，“蓝二代”全面失势：马英九声望持续低迷；连胜文、吴志扬纷纷落选；朱立伦也仅是以微弱优势战胜游锡，狼狈保住新北市长大位。

与此同时，民进党却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刮起青春风暴，其推出的“民主小草”计划收获颇丰。以台北市议会选举为例，民进党推举的6名“80后”候选人全数当选议员。其中包括民进党大佬谢长廷的儿子谢维洲。

在谢维洲模式的鼓舞之下，陈致中、苏巧慧和游秉陶先后宣布参选2016年的“立委”选举，其中陈致中的参选过程颇费周折。

2010年，陈致中在未得到党内提名的情况下脱党参选高雄市议员，当选后因涉案被撤销当选资格。2012年陈又以党外身份参选“立委”，导致绿营分裂，并让国民党在深绿的高雄渔翁得利。

2013年9月，陈致中曾向民进党高雄市党部申请再入党。但当时民进党中央认为，陈致中2010年退党参选视同除名处分，需等5年后才能重新入党，并错过2016“立委”选举的提名。

随着阿扁出狱，陈家政治地位提升，在年初陈致中再提入党案之后，民进党判定陈致中2010年退党参选是党内协调结果，不受5年条款限制。今年2月25日，民进党再入党审查小组召集人陈明文表示，民进党已经通过陈致中再入党案，陈符合党内2016年“立委”参选资格。

虽然已经获得党内初选资格，但“绿二代”们的上台之路依旧漫漫。苏巧慧将在初选时遇上同为“官二代”的前“立委”廖本烟的儿子廖宜琨；游秉陶将遇上自己父亲昔日的“行政院发言人”庄硕汉；陈致中将在初选中遇到高雄市海洋局长赖瑞隆。对手势力均不容小觑，三位“绿二代”能否顺利从党内突围还是一个未知数。

相比之下，民进党内现任的资深“立委”们的初选过程看起来则会顺利得多。在73个选区中，至少20个民进党现任“立委”在党内初选时都没有对手，将同额竞选。相比马英九、郝龙斌等“蓝二代”们的平步青云，至少在党内“绿二代”们还未显现出太多的特权和优势。

正因为党内初选困难重重，陈致中、苏巧慧和游秉陶并不忌讳展示自己“绿二代”的身份，这与当选台北市议员的谢维洲有所不同。在去年年底的选举中，谢维洲屡次拒绝父亲谢长廷为自己站台。但苏巧慧对媒体表示，自己不会逃避“苏贞昌女儿”的光环，并且使用“超越冲冲冲”的选举标语，用各种形式和自己外号“冲冲冲”的父亲建立起关系。

不过对于“绿二代”高调进军政坛，台湾民众反应并不强烈。根据台湾亲蓝媒体《中国时报》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民众并不乐见“绿二代”在政坛的出现。作为台湾最大的“绿二代”，陈致中身上有着诸如“贪腐”“伪证”“嫖妓”等多个负面标签。初入政坛的苏巧慧、游秉陶等除了要利用好自己父亲的政治资源外，还要避免陈致中参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十篇 台湾“第三势力”风云再起

记者/马军

春节过后，重新上班的李柏岳从主管那里接到的第一张表格不是新一年工作任务，而是一张入党表格。碍于主管的情面，李柏岳最终还是填写了表格。对政治充满兴趣的李本人并不反对加入政党，唯一让其耿耿于怀的是，这次加入的“民国党”，李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今年以来，诸如民国党之类的新政党纷纷成立，试图在不到一年之后的“立委”选举中分得席次，扮演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积极来看，在国民　党人气低迷的当下，“第三势力”或许处在史上最佳的发展时期；悲观地说，在两大党依旧垄断着台湾政坛绝大部分资源的情况下，欲在明年初的选举中取得佳绩，“第三势力”的盘算则过于乐观。

新政党接连成立

3月18日，民国党新党员李柏岳被叫至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参加该党的“扩大成立大会”。在大会上，李柏岳见到了他第一批的党内同志：现场5000个坐位座无虚席，参加大会的几乎都是和李一样大的年轻人，这种场面在李柏岳30岁的人生中，还是第一次见到。

会议现场，李柏岳意料之中地见到了自己的党主席，从国民党tui党的“立法委员”徐欣莹。这位从新竹县政治世家走出的“立委”，在2012年的选举中获得了 全台第一高票。会议上，徐欣莹向外界正式宣告政党的成立，徐本人自然成为首位民国党籍“立法委员”，民国党也成为了继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台湾团结联　盟和无党团结联盟之后，第六个在“立法院”拥有席次的政党。

民国党2015年3月13日在台“内政部”正式备案成立。党主席徐欣莹表示，2016年“立法委员”选举中至少会推出10位区域“立法委员”候选人，并且将加入“不分区立委”的选举，争取更多的政党票。


2015年3月18日，民国党扩大成立大会，主席徐欣莹致词。

出乎李柏岳意料之外的是，此次大会台湾各大政党的大佬竟然云集一处，国民党籍“立法院长”王金平，国民党“党鞭”赖士葆，民进党“党鞭”柯建铭，前新党“立委”姚立明以及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悉数出席。

现场5000多年轻民众力挺，也让这些大佬们大吃一惊，在场蓝绿政要们纷纷表示，该党在未来“有得一拼”。

此后几天，民国党招兵买马，不少年轻世代的政治明星加入该党。3月22日，徐欣莹的弟弟徐世勋也宣布加入民国党，成为该党首席台北市议员。在去年年底进行的 “九合一”选举中，徐世勋在没有任何政党支持的情况下以无党籍身份高票当选。4月11日，在2014年以第一高票当选新竹县议员的邱静雅也加入民国党。

民国党的党旗、党徽设计，以金黄色为底，中间镶嵌“国徽”，寓意“青天白日满地黄金”，象征丰收与希望。虽然党名和党徽和国民党非常接近，但台“内政部”最终还是批准了该政党的成立。为了不与国民党混淆，徐欣莹在面对记者时，特意重复三次“这不是国民党党徽”。

除了民国党外，律师林峰正组织的“时代力量”，野百合学yun领袖、台大社会系副教授范云组织的“社会民主党”等新兴政党也纷纷成立，目标直指2016“立委”选举。

主打民生牌

台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新党、台联党、亲民党等两大党外的第三

势力政党，除了亲民党因其主席宋楚瑜的个人风格外，其余第三势力政党均以明显的意识形态作为自 己立党根本：其中新党坚决反对“tai独”，主张两岸统一。而以李登辉为精神领袖的台联党，则以追求“台湾.独立”为终极目标。

此次兴起的“第三势力”政党潮则完全忽略意识形态问题，不在统独问题上做文章，对统独问题甚至避而不谈。民国党只是表示，立党宗旨是政党合作不再恶斗，关注台湾“内政”，“国政维新，强国富民”。

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政见包括“提高薪资，捍卫中产阶级”、“年近改革，建构平等社会安全体系”、“财团、富人增税”等，将重点放在经济和民生领域，对两岸关系并无着墨。

范云表示，之所以成立“社会民主党”，是由于台湾目前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穷忙”、政治议题操作“黑箱”化。从蓝绿执政的过往成绩看，两大党均不值得期待，社会民主党将是台湾未来的中坚力量。

但新党主席郁慕明对于主打民生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台湾几乎所有问题的症结还是卡在两岸关系上，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民生问题根本没办法解决。

近年来，随着台湾主体意识上升，至少在县市长选举和“立委”选举中，统独议题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下降，这使得绿党、树党、健保在线等诉求环保、民生的政党愈发 活跃。2012年的“立委”选举中，号称在全台湾有120个地方党部的台湾主义党，仅获得了0.2%的选票，列在政党得票排名的最后一位。老牌第三势力政 党新党仅获得了不到2%的选票。

面对2016年“立委”选举，社会民主党设定的目标是至少拿下5席不分区“立委”。按照现有选举办法估算，社会民主党至少需要拿下200万张政党票才能达到目标，这至少需要每七名投票者中有一名投给该党。

根据前两次大选的记录，除两大党外，其他第三势力政党均未取得过如此成绩。上次选举，台联党取得的8%政党票已经被视作是奇迹。

但随着年轻世代与互联网崛起，台湾政治的参与方式也在悄然改变。传统依靠乡亲邻里和地方桩脚拉票的方式逐渐失效，通过互联网发起“公民运动”逐渐取代政党组织，成为台湾社会运动的第一动力。

有台湾媒体评论称，在缺乏强大组织的情况之下，民国党和社民党只能依赖本党的政治明星争取较好的选举结果，但按照台湾之前的经验，无论是新党、亲民党还是台联党，都只能在两大党的夹缝中求生

存，很难与其进行正面的“阵地战”。

或许，这波第三势力的崛起与以往会有所不同，根据台湾某智库做出的最新民调显示，有45%的民众考虑会在2016年的“立委”选举中支持第三势力。

第十一篇 新媒体改变台湾政党组织方式

记者／ 陈祥

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官方网站——“国民党全球资讯网”在元旦全新改版，增加了在线入党和在线加入志工的功能。民众想要加入国民党，只需要填写简单的线上入党申请，户籍所在地的党部将会主动联系申请者；民众还可以下载入党申请书，并与户籍地党部电话联系。

大陆网友对如此容易的入党方式感到好奇，他们潮水般涌去围观，使网站变得缓滞。

本刊从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得到确认，在2013年元旦当天有50人申请入党，10天内有2000人申请入党。截至1月23日，已有数千人申请入党，数百人申请加入志工行列。国民党方面承认，目前申请入党者里有许多是来自海外与大陆人士，遗憾的是，入党仅限于“领有中华民国身份证”者。

“但这些友好力量，本党仍然十分重视，文传会新媒体部会通过海外网络向海外及中国大陆的网友交流，向世界展现台湾自由、多元的政治生态。”国民党文传会的人员告诉本刊记者。

不断创新的吸收党员方式

目前的线上申请入党流程，还只是刚起步的尝试。国民党在未来对流程还会有调整，一切围绕着方便民众，争取从申请入党、取得党籍到领取党证，都可以在家里完成。

申请书需要填写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出生地、户籍地、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教育程度、现职、宗教信仰、一名或两名入党介绍人的信息、联络方式、申请理由。不需要写冗长的入党申请书。

在“审查意见”上，申请书设置有工作责任区（小组）；区级党部；县级、支级党部（直辖市、省级党部）。只要这几个空格被签上批准后，一个新的党证字号就诞生了。

新网站设有“志工园地”专区，供志愿者参加公益活动。其实这也是一个吸收入党的方式，据文传会的人员介绍，通过国民党网站的信息投身公益活动的非党员或非青年团成员中间，多数人会在集体合作后选择加入国民党。

上线首日，国民党官网的浏览量超过8000人次；上线后的三周内，

日平均浏览量在6000人次以上。国民党方面宣称这些点击量超过过去的两倍，事实证明打造一个新的对话平台起到了作用。

除了借助新的宣传工具外，国民党还实行适度的物质刺激。一个成熟的做法是在2010年开始签约对党员实行特价的商业场所，如商店、饭店、旅馆等，这类场所已经蔚成规模，甚至已分布到海外。此种会员制有很大的诱惑力，如小吃店可以打9折并扣掉尾数，购物和看电影最低可在5折之下。

2012年，国民党推出“党员悠游卡”的构想，包含了党员证功能的这张卡可以充值和进行小额交易，不断更新的卡面图案增加卡的收藏价值。在本刊采访国民党文传会时，对方表示党员悠游卡尚未定案，但一直在为此方向的规划而研究商议，并期盼在今年年内推出。

在吸收党员方式的创新上大费周章，这是国民党过去难以想象的。全面民主化后，政党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化为街头政治，互相比赛谁造势高，谁更亲民。2000年，国民党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同时在“立法院”失去第一大党地位，不利的形势使得党员流失严重。

国民党为了整理队伍、清点有效人数、召回因路线分歧而出走的同仁，在2000年9月重新登记了党员。到同年12月，清点党员人数达105万人。

2002年，大陆媒体曾广泛援引台湾媒体的消息，据称国民党有70万党员流失。调查结果来自保险公司给党员办理平安保险的业务。国民党规定党员每年缴纳500元新台币的党费，同时根据党员保险实施要点，一次性缴足500元或更多金额的党员可以享受用党费中的230元办理保险。在2001年，保险公司统计有61万党员，在2002年只剩下34万人，而此前掌权时期的国民号称有250万党员。

除了选举失利造成政治大气候不利于国民党外，造成党员流失的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员呈现老化结构。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百年老党，占据党内各要职的人年龄偏大。

对此，国民党对自身组织构架进行了大改革，尤其是以投票所为单位组建党的基层组织单位，同时使基层组织往社团化、义工化方向发展。在2000年，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林丰正提出国民党将朝着本土化、年轻化、多元化、民主化、精实化、草根化、社团化、义工化、社区化方向发展。

年轻人是争抢的重点

国民党在改革党务时，将队伍年轻化作为一个改革方向。在组织改进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常会）通过行政管理委员会提交了精实案，不仅裁员节流，且为年轻人留出职位。

直选党主席，在中常会中加入青年保障名额，要求各级党组织干部中40岁以下者不少于25%……国民党以种种措施，试图扭转自己在外界眼中不够年轻化的印象。

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马英九的竞选总部就盯上了新媒体。他们以走偶像剧风格的微电影形式，推出“国旗女孩”、“爱情签证”等点击率超过20万的网络广告；也把马英九“总统”的脸书经营到了144万粉丝，把台湾加油赞的脸书发展到22万粉丝。此外，国民党推出多款Apps软件，如早安打卡机、熊爱台湾大乐队、台湾平安福等。

大选结束后，国民党设立了隶属于文传会的新媒体部来争取年轻人的选票。人员便是选举期间做新媒体宣传工作的人。一方面是追随媒介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鉴于网络专业人员为马英九获胜作出了显著成绩，使国民党更加认识到网络互动的重要性。

不久前，国民党秘书长曾永权表示，国民党以党辅政，但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少阅读报纸，多数是从网络上获得资讯。他鼓励县市党部人员除了深入基层外，必须要在网络上多花精力，他颁布的一项具体措施是让县市议员、议会党团、村里长、乡镇市长、乡镇民代表等从政的党员将脸书（Facebook）串通，且要定期考核。

在大红大紫的新技术面前，传统的招收青年的手段也没有被放弃。国民党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已办理了27个培训班期，受训人数有1800余人。

国民党青年团于2006年创立，规定参加者必须是年龄在40岁以下的学生。组织和技术创新是相辅相成的，新媒体的工作者很多是青年团成员。青年团大出风头的几次活动有：2009年莫拉克台风时号召青年救灾；2010年以72位美女站街，号召青年学习黄花岗72烈士，捐血回报社会。除了高调参加活动外，青年团的一大工作重点是课程培训，激起青年在关注公共事务的同时，加深对国民党的认同感。

中山留学奖学金、大专优秀青年奖学金、大专院校济难助学金，这些也是国民党在青年学子中打造形象的手段。还有不少看上去极为简单的措施，例如在中央党部大楼内开辟免费看书的中心。

传统的形象包装上，国民党让1982年出生的殷玮担任新闻发言人，

殷玮兼任青年团执行长，他在大学时期就是著名的辩论手。另一位发言人是生于1976年的女记者李佳霏。发言人的年轻化，拉近了国民党与年轻人的距离。

国民党的主要对手民进党在吸收青年上同样绞尽脑汁、多管齐下，且民进党长期以来善于吸收青年人，它在抓住青年的心理、与青年沟通、培养青年上都占优。

青年军便是民进党的青年组织，国民党目前所做的青年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借鉴对手的做法。

民进党开放线上入党模式比国民党要早，双方的流程和表单内容都差不多。

2012年12月，民进党的“绿色商店”联盟上线，这是民进党学习国民党的做法。这150多家商店都是党员所开，为党员优惠服务，如一家理发店给党员9折，一家车行给党员1年保固2万公里优惠，一家蔬菜站卖菜给党员打8折……民进党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将矛头对准马英九政府，党部表示“绿色商店”联盟是党员们在民不聊生的马英九政府时代里，见证了党员同甘共苦、患难见真情的可贵精神。

随着台湾多元政治的发展，各政党必然会有更多匪夷所思的手段来促销自己。

第十二篇 台湾的“领导人魔咒”

记者 / 马军

“马英九，X你X啦！”伴随着一声台语的脏话，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贴有马英九画像的沙袋上。这是2014年3月份“太阳花”学运时发生的一幕。

为阻碍马英九政府通过和大陆签署的服贸协议，几百名大学生破门闯入并占领了“立法院”。在“立法院”周边，参加运动的反马民众创意百出，用各种形式表达着对马英九的愤懑。

根据多家台湾民调显示，此时的马英九执政支持率只有9%，相较于2008年上任时的超高人气，马英九用了六年时间从政治巅峰走入了谷底。

马英九的前任陈水扁也是在执政第六年陷入泥淖。2006年起，陈水扁家族的贪腐弊案逐渐被曝光，群众抗议运动四起。狼狈熬到任期以后不足半年，陈水扁便被戴上手铐被收押，直至今年才借保外就医的形式得以出狱。

“当选过关，落选被关”“上台前风光，执政后狼狈”“后一任口碑总是不如前一任”，似乎已成为困扰台湾领导人的最大魔咒。

无论是陈水扁还是马英九，都是在众星捧月中上台，一片挞伐中结束任期。虽然马英九还有不到一年半的任期，但早就有绿营政治人物为其设计好了下场：“阿扁放出来后，监狱不必拆了，马英九会进去住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参选之前，曾在某“台独”造势场合如此表示。

蓝绿恶斗，民主内战

“解严”后，台湾转型曾因社会动荡小、流血冲突少等因素被视作世界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典范。直到今天，无论根据哪一种指标来看，台湾仍然远远领先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台湾长期居于五十个“极发达地区”的前25名。

当陈水扁逐渐陷入贪腐传闻之后，台式民主又被贴上了另外的几个标签：“‘立法院’乱象”“民粹”“为反对而反对”。在诸多负面观感中，使用程度最广也是最贴切的一个词是“民主内战”。

“以前是大陆搞文革，台湾搞经济建设。现在两边倒过来了，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后，台湾反倒在自己的岛内搞起了‘文革’”。面对长期以来

低效的行政效率和蓝绿恶斗，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亚中如此感慨道。

张对台湾“文革”的感慨并非言过其实，自陈水扁意外当选“总统”之后，台湾经济开始持续滑落，至今已经从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龙头，跌落至最后一位。 2000年，台北市长卸任的陈水扁参选“总统”，在蓝营分裂为连战和宋楚瑜两大势力之后，以不到40%的得票率当选。面对国民党占有绝对优势的“立法院”，台湾首次陷入“朝小野大”的分裂政府局面。

陈水扁八年，经济政策乏善可陈。对此，民进党将责任推给国民党，认为是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杯葛使得许多经济法案无法过关，而国民党则认为陈水扁的“台独”倾向才是罪魁祸首，其任内两岸关系的恶化导致了台湾经济的边缘化……

不仅是蓝绿两党，台湾学界也将陈水扁八年内不理想的经济表现归罪为“分裂的政府”。“当阿扁当选‘总统’，国民党占有‘立法院’多数时，台湾学界甚至不知道执政党到底是谁。陈水扁的经济法案在‘立法院’很难通过，国民党通过的法案阿扁又不怎么执行，台湾的经济就这样滑下来了。”前“国大”代表、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周育仁曾如此评价。

陈水扁伴随着贪腐风暴下台之后，国民党在2008年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不仅“总统”选举马英九大赢谢长廷221万票，“立法委员”的选举中国民党也大胜，113席次国民党赢得81席，占据绝对多数。

“请大家放心，绝对不会有一党独大的问题，人民最大”。在马英九的胜选晚会上，时任国民党主席的吴伯雄试图用这样的表态缓解民众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担忧。

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民众发现当初的担忧确是多余：虽然国民党一党独大，但大量经济政策依然无法推行。马英九执政时期，民进党在“立法院”虽然始终未曾过半，但其“战斗力”却始终超过国民党：锁门、霸占主席台、抢走麦克风、撕毁登记表……民进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阻止议案通过，国民党虽然“朝大野大”，但政策推行依然寸步难行。

2013年夏天，“马英九政府”与大陆签署了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对此政策持质疑态度的民进党用各种方式拖延表决八个月后，马英九试图通过“立法院”人数优势强势通过法案。无法阻挡的民进党只好祭出最后的办法：打开“立法院”大门，让学生占据“立法院”。

制度设计并非主要原因

抗议学生对马英九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权力无法制衡。在学生看来，马英九可以随意撤换“行政院长”，借此控制行政权，也可以通过党纪来约束党籍“立委”，控制“立法权”。

在学运现场，“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这一口号被喷绘在“立法院”的外墙上。学生为自己占领“立法院”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台湾的“总统”权力太大，几近独裁。

持同样看法的还有不少政界人士，“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就是要立法权监督行政权，国会监督总统，但台湾并不是如此”。前民进党主席、倒扁运动总指挥施明德表示，“台湾的‘总统’都有以党领政的积习，国民党这么搞，民进党当年也是这么搞的。这样一来，台湾的‘总统’权力就特别大，大到‘立法院’无法监督。”

在施明德看来，未来台湾应该修法，将现在倾向于“总统制”的制度修改为“内阁制”。

“改成‘内阁制’以后，台湾就没有了‘总统’，或者将‘总统’虚位化。哪个党在‘立法院’担任多数，哪个党的党主席就来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长’，这时，这个‘行政院长’就必须来‘立法院’接受质询，如果做得不好，就可以在任期内换掉，台湾实权领导人有了制衡，民众的怨气也不必积累八年才能释放。”



“九合一”选举之后，台湾蓝绿两党罕见地在“内阁制”修法上达成共识。1月5日，台湾“立法院”一口气提出11条“修宪案”，试图融入更多“内阁制”精神。

对于“内阁制”的推动，目前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最为上心，在国民

党几乎无缘2016年大位的情况下，朱立伦希望国民党在“立法院”拼得多数，并以“内阁制”的改革契机来掌握实权，制衡蔡英文。

目前台湾岛内对“内阁制”最大的反对力量则来自于蔡英文，面对2016年很有可能到手的“总统”大位，蔡英文显然不会对“内阁制”的改革感兴趣。讽刺的是，“九合一”选举之前，面对不被制衡的马英九，蔡英文曾是岛内呼吁“内阁制”改革最大声的政治人物。

但实际上，实行和台湾一样的“半总统制”的情况并不鲜见，从波兰、法国到韩国比比皆是，这是一种很主流的欧亚地区政治体制。即使台湾“内阁制”改革成功，最高行政首脑从“总统”改为“总理”或“首相”，民进党在“立法院”内照样可以通过霸占主席台、瘫痪议事日程等方式阻挡法案的通过。 简单的制度设计改革并不足以让台湾走出“民主内战”的窘境，台湾由“国家和民族认同分歧”带来的社会肌体疾病，才是造成其政治困境的主要原因。

无法调和的“统独”矛盾

“为什么台湾的民主相较于其他地方显得更不易调和？因为台湾有着特殊的社会矛盾”，前台北市副市长吴秀光曾感触道：“不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或者是亚洲其他国家，社会都是以阶级来划分的，选举的过程中资方肯定希望政府少干预经济，而劳动者一方则希望政府能够多课有钱人的税分给他们，这种矛盾是可以调和的。但台湾的民主是以‘统独’为分野的，这就不可调和。”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外省精英几乎占据了台湾全部公职，国民党政权的行政效率与清廉程度甚至不如日本殖民者。具有长年被殖民经历的台湾民众看来，对祖国的回归被有些人认为似是又陷入了另一段殖民。

随后长达几十年的民主运动中，摆脱“中华民国”体制的“台独”运动与脱离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民主运动几乎难解难分，在激进的绿营政治异议者看来，不仅国民党的统治非法，“中华民国”这一国家也并不合法。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这种认知更加强烈。在逐步开放竞争性选举之后，台湾也罕见的形成了以族群认同为分野的政治对立。

2012年败选之后，蔡英文曾在败选演说中称民进党败在了两岸关系这“最后一里路”上。事实上，台湾蓝绿两党在经济政策、福利政策上相差不大，两岸政策几乎是两党政见的唯一差别。但正是由于两岸政策触及台湾民众的“统独情结”，导致两个政党都难以调头。

2014年3月份爆发的“太阳花学运”现场，学生恶搞马英九的漫画遍地皆是，对马英九的讽刺和侮辱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诉求。在学生看来，马英九同意和大陆签署服贸协议不仅犯了经济上的错误，更是一种出卖台湾“主权”的政治行为。学生对其声讨，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对“卖国贼”的挞伐。

学运后期，整场运动几乎从单纯的反服贸诉求变成了全面“反中”的运动，在李登辉、陈水扁时代接受教育的年轻人鲜有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对于“大陆情结”极深的马英九，学生对其的批判几乎不留任何余地。

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徐火炎看来，“统独情结”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政策选择，更多的是深植于民众心中的情感，这种情感几乎没有商量与妥协的余地。也正是如此，不论蓝绿的台湾领导人才会陷入寸步难行的魔咒：陈水扁无论做出何种举措，都会被国民党支持者视作是走向“台独”的举动；而无论马英九如何行政，也都会被扣上“亲中卖台”的红帽子。

根据台湾多个调查显示，虽然绝大部分民众对“统独”选择都比较务实，认为现阶段与大陆最好的关系就是“维持现状”，但其背后，几乎每个民众都有自己对台湾未来“倾统”还是“倾独”的终极理想。无论是李登辉、陈水扁还是马英九，其任何政策走到最后，都会被贴上“统独”的政治标签。

马英九任内无论是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还是后续服贸、货贸等经济议题，其推行遭遇到的阻力几乎全部来自于政治层面。实际上，马英九在第二任已经减缓了和大陆的交流进程，面对大陆政治谈判的压力，马英九也一直秉持着“不统不独不武”和“先经后政”的中间路线。

但即便如此柔和，马英九仍无法摆脱绿营支持者心目中“亲中卖台”的印象。蓝绿两营任何人上台，坚持“原教旨主义”将会对政经现实造成极大危害，加剧政斗冲突；如果彻底抛弃本党派的“原教旨主义”，又容易开罪本派别的核心死忠粉丝。即使往中间靠拢，试图超越群族与“统独”，也并不能松懈对手的防备，缓解责难。所以，两方谁上台，无论左中右走哪条道路，都是“无路可走”，动辄得咎。

民进党经常将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长期诉求“群族悲情”，给国民党扣上“亲中卖台”的红帽子，显然是很常用的政治招数。但挑动族群对立和政治矛盾，对民进党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未来即便蔡英文上

台，服贸、货贸等问题依然棘手：如果蔡英文坚持不通过服贸，台湾经济在东亚会有更加边缘化的趋势；如果通过服贸则无异于自打嘴巴，证明自己当年的反对纯属政治操作。

为了避免自己任内难堪，据悉，蔡英文已经准备要求民进党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中对服贸、货贸等政策放行。如果服贸、货贸政策让台湾得利，这笔功劳将记在民进党和蔡英文身上；一旦服贸、货贸政策出了问题，这笔账将算在马英九头上。

除了蔡英文，李登辉和陈水扁都是炒作“统独”矛盾的高手。陈水扁从入狱开始到如今出狱，始终未曾承认自己是贪腐犯，一口咬定自己是被马英九政治迫害的。而来源不明的巨额资金，陈水扁也一口咬定是准备留给台独势力的“建国基金”。也正是因此，陈水扁即使入狱六年，还有一大批死忠能够痴心不改的等待，在这些支持者看来，陈水扁并非人神共愤的贪污犯，而是为了“台独”事业牺牲自己自由的“伟大斗士”。

“‘统独’情结不仅让台湾的政党很难合作，还容易让政党的矛盾更加的你死我活化，对政敌的打击越激烈，自己就越感到光荣，觉得正当性越强。”吴秀光称。

如今陈水扁已经成功保外就医，有台湾舆论称，希望以此化解蓝绿矛盾，终结冤冤相报的政治文化。但显然这种期待太过于理想化，“统独”情结已经深植于台湾的政治文化中，短时期内并无化解的可能。只要坚信陈水扁贪钱是为了“台独建国”的民众存在一天，马英九“亲中卖台”的红帽子就不可能被完全摘下。民进党也不会就此放过马英九。

陈水扁在狱中曾不止一次地说“活下去就是为了看到马英九悲惨下场”，民进党中生代“立委”陈其迈、段宜康等人早已放话，等马英九下台后，会用尽一切办法把他关起来，台湾领导人“魔咒”至少到马英九这里还看不到终结的迹象。

蔡英文当下已成人气女王，但2016年她真的上台执政，可能也逃不过陈水扁、马英九的政治宿命。

540元/年
共计36期
挂号邮寄为648元/年

订阅热线
（0755）2593 4567
（ 010 ）6528 1005



第二章 暗淡的国军

第一篇 台湾南海政策：低调看守

撰文/陈思

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范丽青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海峡两岸都有责任加以维护。而台“国安局长”蔡 得胜则于5月21日透露，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越南等周边国家官员在公开或私下，都一再要求台湾不要跟大陆联手；并证实，台湾“中油”在太平岛附近有一个油井独立开发计划。

事实上，纵观台湾60年来的南海政策可知，虽然台湾在南海邻近国家及地区中，最早投入对南海的经营，但由于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因此不论是对美、中等大国，甚至是对菲、越等小国，通常都不愿采取强硬态度以对。

1946年，国民党政府于抗战胜利后派出海军特遣舰队，巡行中沙、南沙、西沙等群岛，并替各岛命名。当时国军在南沙群岛最大且唯一有淡水的太平岛，驻守一个排陆战队，并设立气象台等单位。

1950年，解放军攻克海南岛，国府在撤退时，将太平岛守军一并撤出，仅留距台湾较近的东沙守军。至于西沙守军，则宣布“起义”，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台湾始终将主力放在防止解放军进犯金马等大陆沿岸岛屿，对遥远的南沙投注资源非常有限。

1960年代之后，由于两岸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竞争白热化，台湾面对大陆方面票数愈来愈多的压力，因此在南海问题上，不敢对菲律宾、越南等“邦交国”采取强硬态度。一个例子是：1971年，台湾海军运补南沙途中，发现菲律宾正在登陆中业岛。当时指挥官下令备战，但最后台北方面传来命令“不打”。同样例子发生 在越南方面：南越（西贡政府）于1973至1974年先后拿下鸿庥岛、南子礁，又利用驻守敦谦沙洲的国军因防台风撤回太平岛的机会，将其占领。投鼠忌器的 蒋经国最后选择仅作口头抗议，不派兵强行夺回。不料，第二年北越就攻入西贡，消灭越南共和国，完成统一。台湾等于两头落空：既失领土，也没保住“邦交”。随着南沙诸岛几乎被邻近各国占光，台湾也就以保持现状为满足。只是对太平岛与东沙岛，仍持续加强防务。

1999年，台湾似乎开始有意在南海政策上积极作为。这一年年初，台湾“内政部”公布“中华民国领海基线”，这是台湾方面几十年来首度明

确公布领海范围。一般认为此举的重点是将钓鱼岛海域 纳入，以求未来对日谈判时作为基础。主权议题敏感的金门马祖、西沙、南沙等海域，则并未公布。有趣的是，最近引发区域紧张的中沙黄岩岛，正属于1999年 台湾公布的领海范围之列。然而，实际上几十年来，台湾从未派人真正占领过黄岩岛。

1999年上半，屡次传出政府打算批准企业投资，将东沙与 南沙建设成海上观光景点，借此也可强化主权、避免他国夺占之议。不过，这一进程被意外中断。当年7月，李登辉在接受德国广播电台访问时抛出两岸属于“特殊国与国关系”的主张，后来被通称“两国论”。此论一出，立刻使得1996年导弹危机后好不容易和缓的两岸关系，再度进入战争边缘。以往在台海对面的解放军战机，大举出海，甚至挑战海峡中线。当时盛传最可能遭受攻击的，就是福建中部外海的乌或东沙群岛。

这之后，台湾军方虽然作了不少宣示“南海 防务坚强”的动作，但这年11月，台湾“国防部长”唐飞却在“立院”公开证实：东沙与南沙的防务，未来将要移交给新成立的海巡署。他更坦言：一旦战事爆发，东沙、南沙“没有防守能力”。他并指出，邻近各国“都肯定我方为降低冲突所做的努力”。也就是说，随着大陆带来的压力骤升，台湾放弃在南海积极作为的准备，一切以不惊动其他邻国优先。

2000年1月底，海军陆战队正式将东沙、南沙移交给海巡署。海巡署接收两岛之后，即将重武器退役，使岛上只剩下20公厘机炮与81公厘迫击炮。2006年，鉴于周边各国对南沙群岛的经营日益积极，纷纷以填海等方式兴建飞机跑道，台湾当局决定在太平岛上兴建飞机跑道。2007年12月，太平岛跑道工程完工。2008年2月2日，陈水扁亲自搭机飞抵太平岛，强调是“首位视察南沙群岛的台湾领导人”。至今军方每 两个月会派一架C-130飞太平岛，不过由于跑道总长不到4000，又必须携带返程燃油，因此运载能力大打折扣。虽然延伸跑道的提议已经提出很久，不过目 前尚未着手实施。

马英九上台后，更强调不当“麻烦制造者”，因此南海问题在岛内也继续走“低调化”与“非军事化”路线。

不过，近年来，“立法院”、民间学者、退役将领、媒体等力量反而变成催促行政部门采取较强硬立场的大力推手。如前述“国安局长”蔡得胜表示台湾“中油”有南海开发计划，也是因应“立委”们提出的“当局应付诸实际行动、包括石油探勘及太平岛生态与气象等资料搜集”等敦促而说出的，但计划的实际操作进度目前尚未可知。在“立委”的压力下，虽然东沙、南沙的驻守部队仍由海巡署担任，但派往两地的士兵，现在都先

会由陆战队进行新兵训练。

第二篇 “阿拉伯之春”中的台湾军售风波

特约撰稿员 / 黄山伐

台湾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快速发展，至90年代达到高峰。与经济成就不同，台湾却在“邦交”战线上屡屡败北，“邦交国”数量一年比一年少。为稳住台面上与台面下的“邦交”，一系列被人骂为“凯子外交”的措施就成为台湾当局不可避免的手段，其中就包含军事援助。目前已知的台湾援外军事物资中，小到几把轻机枪，大到军舰飞机，林林总总颇为可观。尤其在2011年，外界把台湾对外军售与遥远的“阿拉伯之春”联系起来，引起一些不大不小的“风波”。

从利比亚到伊朗的台造军品

2011年曾有传言称，台湾制造的轻武器在发生内战的利比亚不断出现，还有岛内网民上传照片为证，但台湾“国防部”多次强调自制轻武器从未赠送或卖给利比亚，除非是“获赠友邦”通过黑市盗卖，因为台军早年确曾发现有非洲军阀武装持台造步枪的前例，但绝非通过官方渠道获得。可是在最近，又有好事者在著名的个人影像网站“Picasaweb”上贴出利比亚新政府士兵同恐怖组织“博科圣地”作战时操作台湾造T-74通用机枪的照片，显见流入利比亚的台造武器不在少数。

据之前去过利比亚采访的西方记者透露，卡扎菲统治时期，利比亚在遭受国际制裁期间不惜代价从武器黑市进口武器，包括来自台湾的“非邦交国”制造的军火也来者不拒，因此这些“万国牌”全都在2011年内战期间“人品大爆发”，成为各国记者聚光灯下的明星。

据知情人士透露，流入利比亚的台造武器很可能源自乍得。在2006年台湾丧失与乍得的“邦交”前，曾在那里派驻大量技术人员和各类公司，其中就包括“黑白两道通吃”，什么生意都敢做的中油公司，台湾很可能经该公司悄悄运去大批军火。一位曾在非洲待过的台军教官声称，乍得政府曾多次向台湾无偿索取T-86步枪和T-74通用机枪，用于武装北部部落民兵。“查德（乍得）政府每次向台北报上来的求援武器数量大得可以武装一个师，可查德常备军才几千人，可是为了不得罪他们，我们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可到后来，乍得当局拿到台造武器后，不光用于配备民兵，还经常暗中资助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叛军。

如果说流散一些枪支到恐怖分子手里不算什么，那么台湾牵扯到向伊朗提供敏感军事设备的事情恐怕就没那么轻松了。据报道，伊朗早在欧美进行经济制裁出台之前就开始通过一些“非正规渠道”获得核物资，

一些被定位为“双重用途”的物资因兼具军民两用性质而未被列入禁运名单，这给伊朗以可乘之机。

伊朗往往通过一些“前沿公司”或“中间人”获取这类物资，其中就包括台湾。2010年5月，年届40岁的台湾商人陈易兰在美国迈阿密法院被判有罪，罪名是“密谋向伊朗出口（军民）两用物资”。陈易兰在法庭上承认，从2007年开始，他就将美国物资运往伊朗，其中包括可作为军用的MIL-S-8516密封化合物、玻璃金属密焊和MIL-C-81703循环密封连接器等。同时，陈易兰还被控向伊朗运送P200微型涡轮发动机以及一些零散配件，这款发动机可被用于军用无人机。

曾有美国媒体怀疑，一些台商可能与伊朗离心机技术公司（TSA）有瓜葛，该公司已造出P1和P2型离心机。今年2月15日伊朗总统内贾德与TSA公司主管穆罕默德·贾法尔共同开启新一代离心机的运转，标志着伊朗与美国的核矛盾进一步升级，而在此过程中，台湾商人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关注。

台湾武器撑腰“失败政权”

纵观以往所有台湾援外军火中，数量最多的当属台湾“军备局”所属联勤兵工厂制造的轻兵器。20世纪60年代，受美国撮合，约旦国王侯赛因与蒋介石有过私交，约旦皇家陆军还曾派人到台湾受训。2008年，一群持神秘步枪的约旦特种部队出现在安曼阅兵式上，照片在西方军事论坛里引起诸多猜测，经台湾网友解密，原来这是台湾联勤出品的T-86步枪。据岛内刊物披露，陈水扁当权时期，台湾“外交部”为了和约旦“套关系”，遂由“机密外交费”项目上“揩油”，自己买下400支T-86步枪送给约旦皇家部队。因为对T-86的表现满意，后来约旦干脆自己掏钱追加购买1万支T-86，当然在价钱上，台湾方面也是“极尽结与国欢心之能事”。

有约旦做榜样，以打造七星级帆船饭店闻名的石油富国阿联酋也看上台湾轻武器。据报道，2003年，阿联酋迪拜酋长国曾派出外员，搭乘专机直飞松山机场，洽谈采购大宗台版轻兵器事宜，目标盯上更高级的T-91步枪，首批数量高达1万支。此单生意原本已经谈成，陈水扁还为此特令台军推迟换装T-91，没想到这条消息被媒体披露而“见光死”，结果造出来的T-91步枪只好拿给宪兵使用。

不过，真正最早让台湾军火名声大噪的却是M16步枪的“台湾表弟”——T-65K2，该枪是台湾联勤第205厂按实物测绘仿制的，最大的外观特征是取消提把。1989-1991年，利比里亚军事独裁者多伊为抵抗泰勒领导的“民族解放军”，曾央求台湾供应数千支步枪和一批迫击炮。当

泰勒武装猛攻首都蒙罗维的亚时，多伊的卫队手持T-65K2步枪，挟持着一群拿着木棒的学生，与敌人进行殊死血战。这些画面后来被美联社、路透社记者发到国际媒体上，一张利比里亚士兵拿着T-65K2步枪扫射平民的照片还在1990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令台湾当局吃了个“哑巴亏”。

作为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国”，巴拿马多年来也是台湾力保的对象，该国部队的许多武器都是由台湾援助，自然也少不了T-65K2步枪。1989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发动推翻巴拿马总统诺列加的“正义事业”行动，美军从被俘的巴拿马士兵身上搜出众多轻武器，里面赫然出现大量T-65K2步枪。

除了大宗的轻武器之外，台湾曾将若干舰艇用于援外，其中包括多项成功与不成功的案例。1979年，中国造船公司曾建造出PBF-1和PBF-2导弹快艇，其间曾试射过“雄蜂-1”型反舰导弹（后改称“雄风-1”型），后因性能不够稳定，无法满足海军需求，台湾海军遂另购入2艘以色列造“德沃拉”级导弹艇，并以此为蓝本研发出现役的“海鸥”级导弹艇。

在台湾援非军用飞机方面，连台军自己都不敢用的T-33教练机和UH-1H直升机等老旧机种成为援助的主角。1997年，莱索托王国要求台湾赠送2架UH-1H直升机，还要求台湾派遣第46独立作战队的教官训练自己的飞行员，此举引起台湾空军内部极大抗议，认为去那个“艾滋病人口超过50%的国家”很危险。但为了稳住与莱索托的“邦交”，台湾一面好言解释难派教官的原因，一面花钱聘请莱索托的邻国南非派人教授直升机驾驶技巧，同时还煞费苦心地将UH-1H的赠送数量提升为4架。

“军火邦交”拓展国际空间

展望未来，台湾“军火邦交”无法走出赔本赚吆喝的怪圈，尽管当局不再提“大送爱心”，但保住“邦交底线”的思想仍将使大量台湾军火流向海外。据悉，台湾“外交部”手里拿着的“邦交国”要求军援的申请至少还有几十份，品种涉及装甲车辆、枪炮、弹药乃至战斗机。许多退役的台湾军官警告，过分的外援需求很可能影响台军战备。毕竟台湾现在从岛外引进武器的环境被大大压缩，当局应摒弃“穷家富路”的旧思维，不能成为别人予取予求的“福利院”。

其实，武器外销早就被台湾当局看成是比“撒钱外交”更隐蔽更安全的“拓展国际空间”的手段。于是，不少国际军火掮客揣摩透台湾当局的心理，纷纷跑到台湾采购枪械，还煞有介事地打包票能帮台湾搞定与某

某国的“外交事务”。一位岛内人士曾透露，几年前，一个东南亚军火中间商曾通过秘密渠道，向台湾“外交部”洽购自动步枪，并暗示交易一旦成功，台湾就得到某国的“外交协助”。等到台湾兴冲冲地把货物廉价卖出后，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分析人士指出，受限于技术、零部件使用以及政治等问题（特别是装有美制零部件），台湾可供出口的自制武器其实并不多，特别是高端武器更不可能出口，像“经国”号战斗机、AT-3“自强”号教练机、“天弓”系列防空导弹、“雄风”系列反舰导弹等想出口可谓困难重重。今后除了轻武器和弹药仍值得关注外，装甲车辆恐怕也是热门出口“潜力股”。

第三篇 透析台湾兵役制改革

记者 / 陈祥

台湾军方努力推行的募兵制，遭遇了困境。据台湾媒体报道，军队上半年只招到3600人，距离今年的招募目标2.9万人尚远，导致下半年的招兵工作面临巨大压力。但是，军方发言人罗少和宣称，媒体的说法与事实有落差。今年的招募人数目标是21928人，到8月底已招10236人，军方有信心完成招募计划。即便按照罗少和的数字，大半年过去了，完成今年的募兵任务仍显艰巨。

2015年，台湾将废除征兵制，全面实行募兵制，规模在20.05万人。但计划裁军6万的“精粹案”因国防组织六法未过，导致被拖延一年，又鉴于募兵不足，外界估计募兵制的全面实行也可能延后。台湾军方高层宣称，即使募兵制被迫后延，1994年次役男免予当兵仍然是确定的事。

现在采取全募兵制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日本，其他皆是募兵征兵制混用。台军在实行全募兵制之前，役期已经缩短为1年，核心的技术岗位依靠长期服役的志愿兵和军官，勉强运行着，只有海军是志愿兵为主。据官方的理念，推行募兵是台湾社会发展水平和生育率现状所决定，但是否成功对其财政、公关布局皆提出考验。

生育率低致推行募兵不容缓

马英九政府力推募兵制主因有四：（1）台军军事战略的变化；（2）生育率低；（3）民进党执政时服役期缩短至一年，已经严重损害军队质量；（4）军事的日益高科技化对操作人员的要求越高，募兵制替代征兵制、募兵征兵混合制是未来趋势。

在1968年前，台湾在军事战略上采取攻势战略。从1968年到1992年，为攻、守势战略转换期。之后采取守势战略，但前后有区别，2000年之前是“防卫固守，有效吓阻”，之后调整为“有效吓阻，防卫固守”。词语次序的调动，意味着轻重缓急的调整。催生这一差异的因素，是1996年台海危机导致两岸互信基础瓦解。此后，大陆不断加快军备现代化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对台军造成重大压力。

“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的战略思想沿用迄今，台军的具体部署是以更加强大的海空军威慑大陆发动两栖登陆战。虽是守势战略，但一旦爆发冲突，本岛之外才是主战场。从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更新程度来看，陆

军明显落后于海空军，更新速度也落后于对岸陆军，但够用就行。

在境外决战的主旨下，台军面临的不是一场依赖人力消耗的国土防御战，而是一场要求能快速部署兵力、精确打击敌人、信息化主导下的局部战争。这对作战人员的要求更高，很可能预备役人员刚动员起来，战争输赢就已成定局。因此新一代的台军在“有效吓阻”的前提下，以快速反应、立即作战为目标。

“内政部”颁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台湾的生育率为0.895%，世界倒数第一。在《中华民国九十八年四年期国防总检讨》中，明确提到推动全募兵制的原因之一，是面临生育率超低的现状。适合服役的年轻人将逐渐减少，因此打造一支“小而精、小而强”的常备部队，也是符合“国情”的。这份文件，是台湾自2008年立法规定，“国防部”必须在新任“总统”就职10个月内提出“四年期国防总检讨”，审视与确立国防战略及军事战略，并表述未来的国防发展方向。

退役海军中将兰宁利，目前在“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担任“国家安全组”政策委员，他是当年制定募兵制的规划者之一。兰宁利承认，生育率低是促使采取募兵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希望用长年服役来弥补人数不足。实行募兵制后，新人入伍就签四年合同，每年所需兵员数就变成原先的1/4，勉强够用。”

台“国防部长”高华柱在去年愤怒表示，正是因为征兵制已经被玩到扭曲变形了，所以才会推行募兵。对于民进党在执政八年里逐步缩短役期的政策，军方高层人士皆表示强烈反对，因为一年役的兵员无法承担岗位责任。“民进党缺乏最基本的国防常识，陈水扁不择手段讨好老百姓而修改《兵役法》，把两年改为一年，当他降到1年，还规定每年114天休假的时候，兵的质量完蛋了。”

陆军退役中将帅化民是募兵制的制定者和推动者，目前跟兰宁利同在《国家安全组》。他告诉记者，陈水扁在任时，他不愿意起草募兵报告，直到他为兵力大降而痛惜时，才答应连战的要求，参与起草募兵报告。

征兵制在人权、自由话题上饱受争议。蓝绿两阵营当前都赞成募兵制，“台湾的政治形势不允许搞征兵制了，回不了头了，如果有政客敢提议征兵制，他是下决心跟民意为敌”，帅化民说。

全民征兵模式，即义务兵役制，第一次在一个大国得到全面实践，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1793年8月，法国第一次实行征兵，以应对扑面而来的欧洲君主国家的联军。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刺激了民族主义热

情，这使得义务兵役制成为可能。美军实行现代式全募兵制是在1973年，艰难起步的募兵制最终在海湾战争中证明成功，使美军走出了越战阴影，它凝聚了比任何时代都要优秀的人才团队。

军事科技的进步，另一面是日益复杂化，需要有专业人士操作装备。而人员的军事素质高低，与服役时间即经验成正比。在征兵制下，岗位人才一到达服役期限便退役，这不仅造成人才流失，还有随着装备复杂化提升的人员培训成本消耗加剧。

高科技装备的普及率正在增长中，这需要越来越多的受过高水平训练和教育的人才。因此，军官、士官占部队人数的比例一直在增长，这些人员只有付给他们足够的报酬才会入伍、继续服役。尤其是士官队伍日益庞大，因为对军官而言，晋升意味着调离原单位，而士官几乎是整个服役期都固定在一个岗位上。

从世界军事体制变革的趋势来看，长年受训的职业军人在军中比例越来越大，“菜鸟”能临阵使出劲的岗位越来越少。因此，募兵制是主流方向，台湾也不例外。

募兵使训练长期化和专业化

迁台以后，台湾继续大陆时期的征兵制，一直维持到2000年。之后是征兵制与替代役制并存，直到募兵制代替前两者。

替代役的服役者，经成功岭3周军事训练后可不入军队，选择各种服务方式，有警察役、消防役、社会役、环保役、医疗役、农业服务役、教育服务役等多达15种方式。其四大信念是爱心、服务、责任、纪律。替代役将于2018年逐步取消。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全台湾男子的服役期为陆军两年，海空军三年。依次执行的精实案、精进案、精粹案，在裁减兵力的同时，逐步缩短了役男的役期，从两年减少到一年十个月，此后又逐年减去2个月役期，到2008年变成一年役。同时慢慢扩大招募志愿役士兵，为最终实行全募兵制做好经验积累。

这般缩短役期的变化，收效很差。一年役时，六周新兵训练之后，去专科训练中心或学校受训四周或六周，这些训练不成熟的士兵到了各自单位后是无法使用的。即便是两年兵役，也公认只有半年堪用。半年训练，一年实习，剩下半年的成熟阶段，却让退役时间步步紧逼。

征兵制下每年的入伍新兵相对多，导致训练场地和设施不足，只好

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从各兵种的战友论坛上看，经常出现这样一幕：师傅所带的徒弟尚未熟悉业务，师傅就退役了，一切业务得靠徒弟自己摸索，于是在头几个月的考核评比中，得分很低。

海军是受缩短兵役影响最小的，因为志愿兵多。“按照过去的经验，海军三年，士兵要到第二年的时候才可以正式用，第二年结束到第三年的时候，才算比较纯熟。”兰宁利说。

全募兵实行后，专业训练将变得更有规划，更专业，并告别师傅带徒弟的简陋模式。以即将接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为例，兰宁利分析，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合格水准不是依靠训练就能获得，必须将整个基础教育体制脱胎换骨。

既然是职业军人群体，部队需要对每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负责。帅化民告诉记者：“养兵不是给米饭吃，是要进行训练。以前是由部队长自己训练，现在一个合格的战车兵要到步兵学校接受基本的步兵训练，再去装甲兵学校进行装甲兵训练，去炮兵学校训练。就像到医院看病，以前赤脚医生一个人就看完了，现在各科室划分越来越细。”

兰宁利说：“很多后勤工作如厨房、固定单位如机关杂务统统外包给商人，军人不担任割草这样的工作。因为训练成本太高，每个人要用在刀口上。”

据帅化民介绍，募兵和征兵混合实行的当下，是最糟糕的。月薪2.7万元的志愿兵和月薪5000元的义务兵在一起执行任务时，义务兵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拿钱少，凭什么干同等量的活。把新兵（义务兵）老兵（志愿兵）一起放在操场上训练稍息立正，老兵烦不能耐。这都对军队造成不良影响。

但募兵数量少，战时缺乏后备兵员，帅化民在制定政策时安排了配套措施。从2013年开始，男性必须接受四个月的军训。为了便于管制，短期服役者采取整补整退的方式，然后编入后备役，每年定期回营复习训练。兰宁利则强调：“整个密集的训练对于地面作战的步兵来说要达到营级规模。陆军核心部队依然以步兵为主，将来一旦动员，募兵部队的退伍者回来补充作战部队，并担任四个月训练士兵的基本干部。”

四个月的训练内容已经定下，据兰宁利介绍，首先是六周的入伍训练，剩余时间用于基础的营级及以下的地面训练。“技术含量高的的兵种如海军，基本已实行全募兵制，不需要分配四月役期者。这些短期训练兵大部分用于地面防卫，但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到营的教练一级，我们分别有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教练。”根据每个作战区的需要，主要

将他们分配在陆军、空军，担任各种勤务工作，比如对大桥、水库、机场的警卫、后勤补给工作。除了要求掌握步兵轻武器使用外，也会安排反坦克武器、肩扛式防空导弹等稍微复杂的装备。

台湾社会上曾有过激烈讨论，很多人希望大专院校学生可以选择大一、大二的暑假，或者毕业后参加军事训练。“国防部”表示强烈反对，坚持这四个月是扎扎实实的、没有休假的。帅化民认为将训练不足的人送到战场上是炮灰，在八年抗战中已积累了足够惨重的教训。

考验财政和招募工作

募兵制效果的好坏，主要瓶颈在财政上，初期的人员费用预计达600亿新台币。在制定报告书时，兰宁利和帅化民都倡导将此作为国防预算之外的额外预算。

“国防部”最终认为这是不可行的。首先，台湾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在“国防”预算外再加一个预算；其次，募兵制造成的费用相当一部分不是在“国防”预算内，如退伍后大学学费属于教育部编制、职业训练费用归辅导会、经济部的编制。

募兵制必然导致本占军费支出的一半的人事经费的猛涨，但也能释放出大量人力用于经济建设，使得税收上升。但总的预计，军费上涨是不可避免的。人事费用必将影响到装备更新维护、训练成本投入。同时，募兵制又能做到保持训练成果、节省训练经费、减少武器损耗。这中间如何权衡，外界只有种种猜测。

除此以外，征兵制还存在着不少在商业社会里日益凸显的弊病。虽然人员薪水支出上比起募兵制来耗费低甚，但它浪费的社会隐形成本是无可估量的。年轻人中断学业、事业进军营，待出来后还要重新适应社会工作，甚至重新起步。另外，不乏有人为了躲避兵役而绞尽脑汁，或在社会中诱发不公正现象。军方人士相信，时间越长，募兵制将比征兵制省钱，因为技术纯熟的士兵不容易用坏武器装备。

作为最低军衔的二等兵，若是志愿服役，月薪有27915元新台币，这还不算地域、特战、海勤等部分加给，另有结婚、生育、丧葬、子女教育、国内进修等补助。升到一等兵后，薪资为29480元，上等兵则是31045元。在军营外，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平均月薪是2.2万左右。但在环境自由度的衡量下，很多人对军队职业逡巡不前。

军方想要从自由流通的就业市场里汲取更多体能好、知识高、意志强的青年，除了收入和福利有吸引力之外，还需要和所有企业单位一

样，综合升迁空间、职业生涯规划、工作环境与内部管理、个人成就感、对工作的认同程度等条件。很多条件在现在并没有定案，帅化民回忆自己在“国防部”时，发现空军开小差的少，原因是承袭美国的习惯，值班时间之外皆是个人时间，而陆军从早上5点半一直操练到晚上10点，人人厌倦，这些经验都将考虑在内。

为配合募兵制，制度建设、营房环境建设都需要全部更新。军官、士官可以接家眷来营房附近，子女有幼儿园与中小学可读，军营犹如一个成熟的社区有电影院、教堂、购物中心、酒吧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便军人收入与外界相差不大，但因为军人福利众多、吃穿住行免费，纯收入将远高于外面。四年役期满后，如果不再继续服役，也有了做生意的第一桶金子。

2009年，军方模仿好莱坞大片制作了变形金刚版的募兵广告，轰动一时，并在今年获得日本NHK评奖“全球军队招募影片”第二名。在1分4秒长的广告中，作为台军现役主力装备的F-16战斗机、康定级护卫舰、M60坦克，纷纷变成威武神气的金属人。军方表示将在今年10月份推出更精彩的版本。

此外，军方推出多种各种匠心独运的纪念品，手榴弹外观的马克杯，战车用方形油壶状的水壶，用数字迷彩的方式呈现的提袋、笔记簿、资料夹等。“国防部”人才招募中心少校严国晋对外介绍，在网络、广播、招牌张贴在内的广告投放形式之外，该机构于2009年和中天综合台的电视节目《大学生了没》合作，不仅让军官学校的学子介绍军中生活，还由特战队员、海军军官、飞行员以自身经验招徕大学生们的兴趣。

作为政策指导单位的招募中心，其成立的背景是每年需要补充军士官员1万人，而之前是陆、海、空、联勤、宪兵、后备司令部各自为战。在考察了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募兵机制后，成立了中心，统合了军队招募资源，有了更强大的宣传、行销能力。它设立北部、中部、南部地区招募中心，在各县市成立服务站和联络站，并与“教育部军训处”协调招募事宜。

军方在设计时考虑到了招募东南亚的华裔青年，甚至设想到服役8到10年后取得“中华民国国籍”。但受限于政治敏感度，目前尚未推行，兰宁利表示未来必将放宽限制。

第四篇 台湾自研潜艇困局

特约撰稿员 / 吴戈

台湾军方3月12日放出风声，已向国防工业委员会提出一项为期四年的潜艇自制研究计划，计划包括设计工作、装备获得、建造能量、测试验收四方面。

目前在台湾军中服役的潜艇由于过于老旧，常被戏称为“古董级”。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台军售潜艇8艘，鉴于大陆方面的压力以及国际形势等因素，美方出售潜艇的意愿日益走低，此军售计划迄今还未落实。台媒体评估，这是美国无意对台出售潜艇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台湾并没有制造潜艇的经验，台海军初步具备潜艇压力壳的研制技术，但战斗、声纳、鱼雷发射管等关键技术，仍有待国外技术支持。《自由时报》披露，台军方目前已组成项目小组，准备在德、意、俄等国家求关键技术人才，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台军方亦声明，潜艇是其向美国军购的重要项目，目前美国行政部门仍在跨部会审议中，无论潜艇是自制或向国外采购，均需美方的支持与协助。

台湾为何难买潜艇

即使在出售上毫无问题，美国自身无法为台湾建造潜艇，也是2001年布什政府宣布售台潜艇时就众所周知的现实。此后12年，这项军售的经历极为怪异。

早在2001年，美国骨干舰艇制造商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以荷兰“海鳝”级为基础，为埃及新建两艘柴电潜艇的合作流产，原因之一据说就是因为与售台潜艇有关系。

2003年，美国又试图从正面临财务困境的西班牙IZAR集团为台湾购买S-80潜艇。同一年，意大利4艘退役的“萨乌罗级”潜艇（以及另外4艘即将退役的）被五角大楼推荐给台湾，但这批1980~1992年间入役的潜艇几乎与台军现有的荷兰艇一样高龄。

2004年，岛内又风传获得日本潜艇的可能性，据说美方愿促成以废铁名义购入15艘已转为训练用的“春潮”级潜艇，改装后转售台湾。

直到近年，随着2009年希腊宣布出售4艘德国U214型潜艇的首艇，

以填补其他3艘的欠款，以及2012年泰国因政府变动和决心难下放弃购买4艘德国海军退役的U206A小型潜艇，有关台湾接手的可能性都屡见报端。

这些事无果而终并不奇怪，因为这个局面其实已延续超过20年。

从荷兰RDMS公司1992年试图售台6艘“海象”级，1996年出售荷兰海军退役的两艘“旗鱼”级开始，到1993年德国HDW公司的209型和法国DCNI的“鲉鱼”级、1996年澳大利亚潜艇公司的“柯林斯”级，乃至阿根廷船厂无力完成的两艘TR1700级最终在1996年拆解，台湾均未能染指。

而在2001年4月23日布什政府批准售台潜艇前，仅到2000年，美国国务院已第八次拒绝美国利顿-英格拉斯公司为台湾建造HDW设计的209/1400型潜艇，也不允许美国企业帮助台湾配套、组装或中期改进第三国售台潜艇。

此外，利用“海鳝”级、“柯林斯”级、土耳其许可证生产的209型、台有部分产权的“海龙”级改进型，甚至俄罗斯“基洛”级的设计，由英格拉斯或通用动力公司电船分部制造，在台总装的潜艇方案络绎不绝，但直到克林顿政府任期最后时刻，美国也不敢松口。

实际上，近20年世界常规潜艇迅速扩散，中国周边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均加入了俱乐部，韩国更从引进走向了出口。台湾在多次制造商或进口国遭遇困难被迫转让时也难以插手，原因只有一个：当事国政府拒绝发给出口许可。

压力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作为极少数可能根本改变台海局面的武器，潜艇显然是北京最不愿看到台湾获得的。它即使无力与大陆潜艇对抗，只因天然的隐蔽性，其生存力也比战斗机强得多，无论用于攻击登陆船队、封锁大陆港口、保护台湾外海交通线，都具有战略意义。再加上大陆反潜力量的薄弱，分量就更为加重。

因此，大陆无论从施压还是奖赏两方面，都对阻止台湾获得潜艇倾尽全力。1992年，眼看着RDMS濒临倒闭，曾在1981年就因售台潜艇而使对华外交关系被降为代办级的荷兰政府得到中国7架福克-100客机的合同。2011年10月，德国哥廷根大学两位经济学家研究指出：凡是接见达赖的外国领导人都得到了对华出口连续两年下降平均8.1%的惩罚。

即使出口取得突破，出于对华关系的长期性，售台潜艇的国家也很难长期保证部件供应和技术支持。对夜长梦多，台湾海军在军购中早已深有体会，对日本和俄罗斯这样的高危来源就更不用说了。

另一个客观原因在于，西方国家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所有领域都有绝对优势与大陆博弈的几乎只有美国，这是只有美国得以连续对台军售的背景，作为极少数美国不能生产的武器之一，售台潜艇也意味着美国要在本国重开已消失40年的常规潜艇生产线。

即使选择不影响核潜艇生产的英格拉斯公司，如果欧洲厂商连设计和部件也不敢提供，法律又禁止利用美国核潜艇的技术，美国不管是改进或全新设计，时间不说，成本恐怕连现在每艘5亿美元的高价也无法封顶。而且，美国难道要因为售台合同而投入已经饱和的柴电潜艇国际市场？

并非技术问题

台湾能否造得出潜艇，美国2049研究所主任兰达尔.施里弗说得有道理：“朝鲜造得出来，哥伦比亚毒贩造得出来，有的大学也能造（科研艇），台湾为什么不能？”

论工业水平，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原中国造船公司）1977年就能建造长378.4米的油轮，现在专以集装箱轮见长，最大能制造8241标准箱的10万吨集装箱轮，以及排水量20.25万吨的散货轮、44.5万吨的超大型油轮、海上石油钻探生产平台，还有排水量4104吨的“成功”级导弹护卫舰和排水量1.7万吨的补给舰。

2005年6月，该公司人士曾指出，引进美国“佩里”级技术建造的“成功”级，除武器系统外全部由台船建造，首舰制造成本比美制高出约20%，但第二艘后就不再需美国技术顾问，到第八艘时制造成本已比美制低32%。

可以说，具有民船整船设计和生产能力的台船公司要涉足潜艇，用其主席谭泰平的话说：“主要问题是技术支持和原材料采购，能力、人员和生产线设备都不是问题”。

分别处在严重封锁和长期制裁下的朝鲜和伊朗也能开发小型潜艇，的确可资借鉴，但是其前提是纯粹以有无问题为目标，以非对称作战为重点。同时，作为2001年巨额亏损后重组，2008年由原官营转为民营的产物，台船公司做不到不计代价，也没有大把石油美元。所以，台湾自制潜艇看似主要面临总体设计、试验、材料、工艺和关键配套系统等技术问题，实则是经济和政治问题。

对内，这个项目要面临“立法”机构和公众对项目透明度、成本和合理性的巨大政治压力，当然也少不了在野党与执政党的对抗需要。比

如，虽然马英九2008年5月首次当选，7月就探讨潜艇问题，但2000~2008年在野期间国民党在“立法”机构阻止潜艇特别预算案超过60次。

对外，这个问题涉及台美关系和美国利益，后一种利益既包括美国从中渔利的动机，也包括借此控制台湾军备水平和台海军事平衡的用意。据台船人士2005年透露：当时台军138亿美元潜艇预算中有26.88亿美元为自制潜艇准备，但扣除配套设备和材料采购，约有25.2亿是美方的技术服务费。

因此，对自制潜艇的可行性，台湾自身也长期模棱两可。

早在1994~1997年的军事整建中，经过详细计划和成本评估，台湾有关方面就认为利用技术转让，增加一些设备和设施，采取“外国图纸、岛内制造”的FB/DC模式，完全能够自制。此后成立的“潜艇自造跨部会推动小组”也持相同结论。

可是，直到2008年8月台“防务部”门发言人仍表示：“（自制潜艇）应该是不太可行，美方并不同意台湾拥有建造潜艇技术，加上台湾本身评估自制潜艇并不符合成本效益及需求，毕竟潜艇仍有台湾无法取得的关键技术”。2009年台船试制出一个达到国际标准的潜艇艇段，台防务部门首脑仍表示自制潜艇只是“一厢情愿”。

2013年传出潜艇自制，台海军主张4年内研制1500吨以上原型艇，也有“立委”主张500~1000吨的“近海型潜艇”。其实，台海军官员承认：刚刚起步，还很难说能造哪种潜艇，关键在于能找到何种人才和图纸。这再次揭示了台湾自制潜艇受技术来源决定的根本瓶颈。在此局面下，台湾直接从全球引进造艇关键技术，以及战斗管理、声纳和鱼雷等配套子系统，绝不可能是一个纯商业问题。

各国公开为台湾自制潜艇提供帮助，无不面临大陆的外交和经济压力，美国是否愿意并有能力帮助这些国家一一化解或补偿压力，从而帮助台湾顺利获得帮助，目前毫无动静。

台湾自研潜艇之远景

台湾自制潜艇并非没有有利一面。虽然以中山科学院等现有军事科研实力，台湾很难全面突破潜艇技术，但潜艇技术发展百年，相关的知识、试验手段、配套设备在民用科研和工业领域也有充分沉淀。受新一轮高技术革命推动，无论是无人潜航器（UUV）和先进声纳等新设备，还是海底测绘、水下通讯联网等新技术，以至海洋工程等相关领域，都

与曾经封闭的常规潜艇技术日益交叉。

不管是将潜艇技术化整为零，利用军民两用技术或“民转军”手段，还是通过重金聘请国际人才参与研发，都是大陆很难通过外交手段阻拦的。据研制人员公开发表的文章称：大陆在研制“蛟龙”号深潜器时，虽然得不到最高性能的美国自用产品，但仍然能从美国采购到部分精密配套部件。

不过，自制潜艇即使可行，台湾仍需要认清长期成本。诚然，让美国充当总代理和技术咨询，代替台湾消化各种来源的引进技术，不光曲折、昂贵而被动，到头来还发现根本不可行。与之相比，台湾直接全球吸收、消化技术要省力得多，还能给台湾工业带来100亿美元的经济好处。

然而这恐怕只是眼前。虽然近十年来常规武器制造技术在全球总体上呈扩散态势，巴西、土耳其、韩国等国军工产业均不乏亮点，但国际市场的拓展仍难度不小，战斗机、潜艇等主战平台尤其如此。实际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老牌中等强国在军工领域也长期犹疑在依附与自主之间，英国对本国潜艇科研工业基础的维持也是进退两难。

自身市场有限，台湾自制潜艇的订单将很快枯竭，对并无决心和国际政治条件大力拓展军工出口的台湾，这个成本恐怕是为自制而激动的“立委”们远远来不及想的。潜艇科研和生产能力要保持先进、自主和可持续，恐怕IDF“经国”号战斗机，甚至“云豹”步兵战车等项目更应该先树立一个成功的范例。

台湾自制潜艇的第二个长远考验是野心的平衡，不管多需要潜艇，它只能在台湾安全现状的大格局下，从现实出发加以考虑。

台海军力平衡正在向大陆有利的方向变化，但以美国现有的军事技术优势和外交承压能力，在更为敏感的主战平台不易更新的条件下，通过电子信息和先进弹药技术的局部改进，仍能维持台军一定的装备技术优势。

因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急需潜艇的判断。不管现有潜艇如何破旧，它本来就是上世纪80年代台湾军购的偶然突破，布什政府当年的承诺也是美国国内对台军事支持分寸的触顶之举。

作为进攻性突出而用途广泛的武器，对美国来说，潜艇的确可能使台海平衡调节过度。

至于大陆庞大的常规潜艇力量，美国并非忽视，通过售台反潜巡逻机，加上日本和驻日美军的反潜实力，已能平衡。抑制大陆进攻力不等于加强台湾进攻力。在美台军售中，反导、防空、反水雷、抗登陆、反潜等领域较为突出，而不光能够夺取制空制海权，还能向对方纵深发起攻击的战斗机、大型水面舰，则与潜艇一样，被有意控制，使台湾保持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而在台海缺乏军事主动权的局面，显然有利于美国。

只要美国并不担心潜艇的劣势打破台海军力平衡，对台湾自制潜艇就很难热心，台湾很可能只能走南非乃至朝鲜、伊朗的道路。

充分利用当代新技术的军民两用性和国际人才资源，台湾四处化缘，集腋成裘，拥有潜艇并非不可能，问题在于，它是什么水平和规模，取决于具体的运作水平，能对台海起何种作用，则现在还很难说。即使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它改变不了台湾在安全上全面依赖美国的局面。

第五篇 台湾军队重建“反情报队”

记者／陈祥

台湾军队中被撤销了12年之久的三军“反情报队”将得到恢复。官方认为，台湾军方加强反情报工作，是迫于当前军中间谍案频出的现实，但民间不少人激烈反对，他们称昔日的“反情报总队”是军中“东厂”。平时最喜欢拿“共谍”渗透来说事的绿营，未表示强烈反对，绿营的《自由时报》给予此事和所谓“共谍”案的报道，是台湾媒体中最多的。

反情报队就是为了抓“共谍”

10月23日，“国防部”决定在军事安全总队下编列陆、海、空军工作组即反情报队，科学仪测小组即测谎小组。“国防部”解释了测谎小组的用途，驻外和外出深造的军人在离台前、返台后，必须接受忠诚测验。

知情官员将军事安全总队的编制概况告诉台湾媒体，它本部有各业务组室，还有情报研析中心，在各县市设置有机动组。随着此次整编，军事安全总队的人数从200余人增加到300多人。扩编导致人手不济，军事安全总队希望本单位的退伍人员能回来，并说明非军人也能担任反情报及测谎工作，台“国防部”直截了当地表示，增设这些单位就是为了抓军中间谍，而且直指这些间谍是仅为大陆服务的。外界质疑军方的做法是否会影响两岸关系。10月21日，当民进党籍“立委”萧美琴质问“国防部部长”严明，两岸目前处于什么关系？严明回答，军事上“我们是敌对关系”。严明还承认了台湾“国防”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北京。

就在不久前，马英九在“双十谈话”里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萧美琴正是认为马英九此言会打击台军士气，故向严明问询。外界议论严明的话体现军方对马英九的不满，而严明对此表示政治归政治，军事归军事。

长久以来，台军的唯一假想敌就是解放军，两岸的谍战故事充满了种种精彩之处。军方近年接连破获前陆军少将罗贤哲、特勤退役军官陈蜀龙、海军退伍军官钱经国等案件，这使得台军对内承受的安保压力变大，对外面对公众的重重质疑。军方不得不采取措施强化侦办间谍。

在破获近期的一系列案件中，军事安全总队赵代川上校居于首功，他升迁成为“总政”战局保防安全处长，并将于今年年底晋升少将。

台军在情报战中退守

台军的每一桩间谍案，在破获以及审判时刻，都会引发岛上媒体的热切关注，犯罪嫌疑人的现役或退役前的军衔军职、涉案程度、情报泄露概况、如何出卖情报、获得多少报酬、中间人关系等要素，基本上都被清晰公布。

总体来看，其犯罪行为集中于陈水扁执政以来，涉案军官或前军官的最高军衔是中将。间谍门遍布海陆空三军，军情局人员尤其多。犯罪形式，无非是情报转让，获得酬金。如何开始间谍生涯，则有很多共通性，最常见的有三种：去东南亚旅游时跟对方接洽；已经退役的军中老友或前长官“先下水”，然后拉拢现役的军官朋友泄露情报；亲戚是在大陆发展的台商，作为中间人的亲戚说服现役军官叛变。

《自由时报》援引了一位不具名的权威人士的话，中共目前将情报战线上的重点转为在大陆就读的台生、在大陆做生意的将官子女、经常往来两岸的退役将领。

间谍们的判刑结果，从无期徒刑到一年徒刑都有，无死刑，量刑视出卖情报造成的危害性。不少军官出卖的情报，其价值并不高，尤其是退役多年了的人仅靠自身来搜集情报，即便退役前军衔很高，但部队的技术资料和作战计划发生了不小变化。原宪兵司令部中将副司令陈筑藩就为自己喊冤，他告诉《自由时报》记者，自己没拿一毛钱，没有提供机密资料，没有危害“国家”安全。“像选情分析这种东西，每个星期都会有，报纸杂志分析的也一大堆，还有国民党的文宣，有什么涉及政治敏感性的吗？发出政党文宣是为争取选票，绝对没有涉及机密或国家安全。”他辩解道。

最新一起间谍案，是空军439联队少校战资官郝志雄，他泄露了联队里E-2K预警机的相关资料，这影响到了美台军事合作。国民党“立委”丁守中表示，此案不仅对台湾的防空造成严重冲击，还会使美国担心所售的军事技术泄露到大陆。国民党“立委”林郁方质问“国家安全局”局长蔡得胜，间谍案的发生如此密集，“你们和‘国防部’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的管道，告诉他们要加强保密防谍的工作？”

《中国时报》前资深记者亓乐义分析间谍频出的原因，主要内因是解严后军队管理没以往严格，很多民事纠纷无法用军事手段来处置；其次是两岸关系好转，敌我意识变得相对薄弱，“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在条例上都有，但我们法律赋予它们的职能在萎缩。”外因当然是大陆经济发展规模超过台湾，经济手段在情报战中是很重要的。

反情报总队曾是军中特权单位

过去，“总政治作战部”下辖反情报总队。它是台湾情治系统中编制最小的单位。总部下设5个科，分别是情报搜集、侦防、监听、人事和后勤，另外设有南、北、中三个站，17个外勤机动组。

反情报总队的公开职能是负责军纪，实际上专门办大案，为“总政作战部”搜集各地政治情报，故拥有很大特权，被称为“政战制度的铁卫部队”。办案时，它与“国家安全局”、军事情报局有协调关系。平时，它在各部队的军营附近都布置了机构，不仅搜集部队的考核资料、演习地区状况等情况，还有权在任何军用通讯网络上进行监听，随时检查军队情况。

台军在2001年实行精实案，撤销了各军种里的反情报队，反情报总队改称为“军事安全总队”。其任务明文规定是“掌握军中有安全顾虑分子，状况紧急时，会同战场督战队作果断处置；督导贯彻保密协定，实施全面保密检查，确保部队安全；建立官兵反情报责任感，共同防范敌人渗透，侦察阴谋破坏，以保护战力及行动安全”。在具体行动上，它继承了反情报总队的一切。

一些台湾民众一听反情报总队的名字，就条件反射般认定是“东厂”。很大原因，是它被1997年江国庆冤案的阴影笼罩。当时，空军的反情报队草草将空军士兵江国庆误当成奸杀幼女的凶手而枪决。2011年元凶出现，军方颜面丢尽，而江父在十几年里一直为讨儿子的清白而奔波，更加凸显军方的错误处置造成的恶果。

不过，亓乐义认为上述观点是多虑了。“现在的反情报工作队性质跟当年不一样，现在的环境是防御性的，只需要防止情报外泄。”

第六篇 黄铭俊：台湾关心解放军的一举一动

记者 / 陈祥　黄铭俊

57岁的黄铭俊，是台湾本省籍国民党党员。上世纪70年代末，他毕业于政战学校（现为“国防大学”政战学院）新闻系，此后长期在三军大学担任讲师，在军队文宣刊物担任记者、编辑，负责大陆问题研究。他读过70到90年代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的大陆军事类报刊。

90年代初，黄铭俊以陆军上校军衔退役，时任安全局图书档案馆馆长。现为菁典军事文化出版公司总经理、香港《亚洲周刊》评论员。他在台大附近开设菁典军事书店，并为多位“立委”担当国防建言提案执笔人，一度担任过简氏的大中华区代理人。

黄铭俊和现在担任台湾“三军司令”、“参谋长”级的这批高官差不多同年；同时，他与台湾一批老资格的军事评论家及军事杂志创办人关系颇深。他拥有在台湾军内外长期关注和研究解放军的独特经历。

从1949年到1979年，台海双方一直是剑拔弩张准备武装斗争。此情形下，彼此间必然有清楚的了解。随着双方关系改善，尤其是马英九上台后军事关系缓和，互相间探底的迫切性虽有减弱，但台军仍然把解放军当做假想敌。台湾军方依然会投入很多精力用于了解大陆的军事情况。台军内部对解放军是很注重的，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比其他人格外注意，毕竟同文同种使得我们接触资料很方便。随着双方敌意降低，台军在看待解放军时变得更加客观，是很自然的现象。

政府之外最关心解放军的，除了军刊，便是高校内的各种学术团体，它们孜孜不倦对大陆军事动态做资料搜集、研究。

1984年1月，台湾第一份民间军刊《尖端科技》发行。《尖端科技》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它突破了禁忌，除了军方之外，民间可以公开探讨军事问题，这包括了讨论解放军。以前，每一本刊物都要经过有关单位的审查。现在，台湾军刊受到的限制非常少，只要不是太离谱，有关单位不会干涉你。

台湾目前的防务设计是由军事防卫和全民防卫这两项构成。为贯彻全民“国防”的理念，军队通过向民众开放营区，让民众了解国防的知识和意义。最近几年来，每两个月就有一个部队营区开放，甚至一个营区反复开放多次。开放日有很多展示，如炮兵操作炮、各种装备的模拟展示、海军火炮模拟射击和操作、装甲步兵小分队演习或故障维修演习、

让来宾坐上装甲车转一圈……这展现一个大背景，台湾在防务上是对民众开放的，允许民众获取机密外的所有公开信息，并且得以亲身体验。

台湾现在的军刊从业人员，基本上是从《尖端科技》和《全球防卫》这两份老牌杂志出来的。编辑们往往都是退伍军人，毕竟台湾男性的服役比例很高。很多军刊作者可能是军官、军事从业人员。台湾各种武器的参数，都是被公布的。只有在具体战术应用上，编辑会根据心中的红线来自动过滤，绝大多数人不会去逾越它。

虽然台湾军刊关注最多的当属台湾军队，但几乎每一本都会提到解放军的新装备、演习、部署情况，其中装备领域是重点。如大陆的武直9和武直19，跟台湾的“海豚”直升机是同一原型，我们就会做很多比较工作。关于解放军的战略、战术，我们也有涉及，但不是很多，因为这方面信息获取困难。

台湾报道解放军，很多资料来自外电，包括大陆军刊、报纸、网站，台湾人很容易上大陆的军事网站，台湾军刊编辑都会看大陆的军刊。台湾军刊以就事论事为主，很少有情绪性反应。值得庆幸的是，大陆最近五年的军刊也在减少情绪，以前的军刊对台湾是从头到尾的嘲笑和否定。

可能是语言环境的不同，简氏的刊物在台湾的发行量并不大，虽然很多单位会根据它建立资料库。我在简氏时，为其写了不少有关台湾军力的报道，但没有发表过对解放军的看法。

我对解放军变化的最直观感受，就是最近十年来武器装备突飞猛进。不过，我们普遍认为装备的品质不如美国同类武器，因为缺乏验证。纸面性能再优秀的新装备，未经实战就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像大陆发展武直10，台湾购买“阿帕奇”直升机，大家普遍认为前者的性能跟欧洲“虎”式武装直升机接近，但离鼎鼎有名的“阿帕奇”有距离，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说法。武器系统跟操作人员素质、战术应用有莫大关系，“阿帕奇”经过一、二次海湾战争，还在很多战场上出现并取得优异成绩，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第七篇 台湾自研无人作战飞机困境

特约撰稿员／ 谢瑞强

从2013年12月6日起，连续两天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军民通用科技产业加值应用成果展”在桃园巨蛋体育馆举行。在展会上，台“中科院”展出了“天弓三型”防空导弹和多型无人机，其中两款造型独特、具备隐身能力的无人作战飞机（UCAV）最为引人注目。

军力失衡下的台湾选择

台湾军队一直将解放军作为主要假想敌，其武备发展颇具针对性，在军备竞赛中无法取得量的优势情况下，台军将质放在武备发展的着力点。大陆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地缘特点使具备快速跨越地理障碍的空军成为台军防御的主力，60多年来，台军始终将空军建设摆在军队建设的首位。

综观两岸60多年的空中军备竞赛，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两岸空军所装备的战机在质量上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任何一方都没有获得较为明显的优势。90年代之后至21世纪的头几年，随着台湾空军自研的“经国”号战机和外购的F-16A/B及“幻影-2000”战机陆续服役，其装备的第三代战斗机数量超过了300架。

反观大陆空军，虽然这一时期采购了苏-27和苏-30战机，但第三代战机数量却不及台湾空军的1/3，在第三代战机性能处于同一水平的情况下，大陆即使拥有大量的第一、二代战机也无法改变整体实力弱于台湾空军的窘境。

台湾空军曾不断炫耀：一旦海峡上空发生空战，台湾空军“完全能取得制空权”。虽然其中夹杂着某些吹嘘的成分，但这种炫耀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当时大陆空军整体实力弱于台湾空军。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自研和外购第三代战机数量的增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大陆空军实力爆发性增长让台空军的优越感迅速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持续的焦虑感。

台湾媒体报道，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大陆空军第三代战机从100余架猛增到800多架，而且这个数量仍会持续扩大，更有台湾军方人士感叹：“大陆空军仍在不断加强空中力量，两岸军力已经失衡。”

更让台湾空军担心的是，大陆的第四代战机歼-20和“利剑”隐身无

人作战飞机已经试飞，两种战机一旦入役，两岸空军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为了避免差距过于悬殊，台湾空军一方面推进F-16C/D战机的采购计划和F-16A/B战机升级计划；另一方面努力游说美国向台湾出口F-35第四代战机。

由于F-35战机研发过程一波三折，服役时间一推再推，加上台湾没有参与F-35战机项目，生产的F-35战机将首先用于满足11个参与国，其他国家或地区只能排队购买。台湾《中时电子报》曾推算，即使美国愿意提供F-35战机，台湾空军至少要等到2030年才能装备F-35战机。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何缓解两岸空军差距越来越大的困境，成为台湾空军当下面临的紧迫问题。

早在2000年台湾就提出了研制第四代战机的“庐山计划”，第四代战机的技术难度远超第三代战机，没有基础扎实的航空工业及电子工业，独立研制第四代战机无异于痴人说梦。由于没有美国的支持，“庐山计划”直到现在只完成了第一阶段（研制隐身涂料），而整机的研制计划至今还未启动。

或许受全球研制隐身无人作战飞机热潮的启发，台湾将目光转向了研制隐身无人作战飞机。

目前各国研制的隐身无人作战飞机均是机动性较差的隐身无人攻击机，与具备4S能力（隐身、超机动、超音速巡航、超级信息优势）的第四代战机相比，隐身无人作战飞机只需具备隐身和超级信息优势两项能力，其技术门槛相对较低，若有美国的技术支持，台湾航空工业基础还是能支撑项目的发展。

2008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指出，隐身无人作战飞机在未来的台海冲突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不容乐观的前景

台湾很早就希望拥有无人机，在2002年出台的“国防白皮书”列出了10项代表“国防”实力的关键技术，其中无人机技术位列第10项，这是台湾首次公布引进、发展无人机计划。

出于惯性，起初台湾将获得无人机的希望寄托于外购。根据计划，台湾将采购两种无人机，第一种是美制“捕食者”无人作战飞机；第二种是以色列“哈比”反辐射无人机。

从2002年起，台湾每年的对美军火订单中都要求美国向其出售“捕

食者”无人机。由于“捕食者”具有极强的攻击性，美国以不符合台军防卫性战略为由多次拒绝出售。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台军就下令其管辖的“中科院”研制无人机，受制于落后的航空工业基础，自研无人机项目发展缓慢，性能亦无法满足台军要求，外购四处碰壁，台军只能将目光转向岛内。

起步阶段，台湾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即先研制技术相对简单的无人侦察机以增强台军的战场侦察能力和电子进攻能力，待技术水平提升之后适时启动技术复杂的无人作战飞机。目前已经研制出了“中翔”和“天隼”两个系列的无人侦察机。

随着无人作战飞机的快速发展和无人机技术的进步，台湾无人机发展战略在2008年发生了较大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更加依靠自己能力发展无人机和紧跟潮流发展无人作战飞机及长航时无人战略侦察机。

从此次展出的隐身无人作战飞机的模型看，台“中科院”在研的两种隐身无人作战飞机都采用了当下流行的飞翼加机背进气道隐身布局，结合隐身涂料，两种隐身无人作战飞机的隐身性能应该能够达到世界主流隐身无人作战飞机的水准。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隐身无人作战飞机设有内置弹舱，可携带精确制导弹药，利用战机优异的隐身性能和可观的作战半径，对大陆纵深目标进行突袭。岛内军事专家认为，隐身无人作战飞机具有低可探测性、滞空时间长等优点，战时台军可能将其用于攻击大陆机场、二炮等高价值目标，迟滞大陆军事行动的展开。

此外台湾还可在隐身无人作战飞机基础上发展隐身无人侦察机，进一步增强台军的侦察监视能力。

隐身无人作战飞机作为一个复杂的作战系统，涉及了隐身设计、动力技术和导航系统等多项高精尖航空技术，这对基础薄弱的台湾航空工业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从台湾以往研制无人机的历史看，台湾隐身无人作战飞机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台“中科院”研制的“中翔”和“天隼”两个系列无人侦察机服役之后事故频发，在2009年演习中，一架“中翔”2型无人侦察机从台东香兰靶场起飞后不到5秒钟便失控坠毁。

“天隼”无人侦察机也存在可靠性不高的缺陷，2013年1月，台“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装备的一架“天隼”无人侦察机起飞5分钟后就坠落在跑

道上，这是台军从“中科院”接收、测试“天隼”无人机以来第三次发生事故。

“中翔”和“天隼”属于常规气动布局的非隐身无人机，技术难度远低于隐身无人作战飞机，但其服役后的表现却不尽人意，饱受各方诟病，技术更为复杂的隐身无人作战飞机即使顺利研制出来，其可靠性受到怀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就算研制出隐身无人作战飞机，台军会不会采购也是个未知数，上文提到的两个系列无人侦察机在台军服役的数量远低于预期，而今年完成首架原型机研制的“长征”长航时战略无人侦察机遇到的情况更要糟糕。

《台湾苹果日报》2013年12月23日报道，“中科院”正在研制专案代号为“长征”的长航时战略无人侦察机，已于当年完成首架原型机，但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22日证实，空军目前无此侦察机采购规划。

“中科院”的“长征计划”，五年耗资近30亿元新台币(1元新台币约合0.21元人民币)预算。由于空军乱改作战需求，要求延伸无人机的作战半径，以期能深入江西、广东沿岸一线机场侦察。因为无法满足空军新增的作战要求，以致原先研发成果无法量产。此举遭外界批评，研发完成却不采购，形同浪费。

精彩推荐：《新加坡：榜样危机》



点此阅读

第八篇 台湾军法系统走入历史

记者 / 马军

“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送走这匆匆的一天，值得怀念的请你珍藏，应该忘记的莫在留恋……”1月12日晚10点整，位于台南六甲的台湾末代军事监狱“日新山庄”如往常一般准时播放了费玉清的《晚安曲》，一分钟后，监狱大门的探照灯全部熄灭，在押的最后一批60余名军囚准时睡觉。与往常不一样的是，此时的“日新山庄”大门岗哨却是灯火明亮，不时出入的工作人员在做着移监的最后确认工作。

这是“日新山庄”作为“国防部”旗下军事监狱的最后一晚。第二天一早，这里最后的一批在押犯人将被移送至“法务部”管辖的台南监狱和台南看守所。2005年新店军事监狱关门之后，“日新山庄”已经是台湾最后一个军事监狱。伴随着旋律悠扬的《晚安曲》，“日新山庄”也如“匆匆的一天”般被送进历史，台湾军法系统就此消失。

军法系统消失

1月13日上午8点22分，台南市警方和国道警方护送着两辆囚车共65名军囚，从“日新山庄”军监大门出发，半小时后分别到达台南监狱和台南看守所。根据台南监狱副典狱长的说法，此次移监有30人被移送至

台南监狱，35人移送至台南看守所。

“日新山庄”原址台南市北区，30多年前迁至环境优雅清幽的台南六甲地区。这里曾经关押过许多台湾著名军囚：因勒索下属而获刑的陈水扁侍卫长何雍坚、涉及拉法叶军购弊案的前海军上校郭力恒，都曾关押于此。20年前，“日新山庄”在押犯人最多时一度高达2000余人，此次被移送的最后一批军囚，大多数为逃兵和吸毒者。

1月17日，台湾军方和“法务部”举行了交接仪式，监狱的不动产以及避雷器、割草机、电视机等动产一并移交给了“法务部”。“日新山庄”也从军事监狱移转给了台南监狱，初步规划为台南监狱的分监。

军事监狱的关门也意味着台湾军事法院系统也就此走入历史，台湾各级地方法院接收了军事法院移交的157件案件、167名被告。2000年私吞上亿经费的“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刘冠军已改由事发地台北士林地方法院通缉，而“叛逃”大陆的世界银行前副总裁林毅夫的卷宗也已经移交至了金门高分检，检察长邢泰钊随即在13日中午发布了通缉令。

林毅夫于1979年在金门阵前“逃往”大陆，为稳定军心，台湾军方一直以失踪方式处理此案，直至2002年才正式宣布通缉林毅夫。此次改由地方通缉之后，林毅夫能够回台再度引发讨论：相较军法系统，地方法院更易获得减刑和进行公共讨论。去年8月，台湾军监已经进行了第一波移监，总共200多人被移送至地方监狱，其中就包括设计拉法叶案的郭力恒。移至地方监狱之后，郭力恒随即申请减刑并获准，目前已经成功出狱。

昔日“地狱”改公园

台湾“国防部”下属的军事看守所、军事监狱以及位于宜兰礁溪的陆军明德班和位于高雄凤山的海军明德班，一度被台湾阿兵哥们称作是“国防部”的四大地狱。有趣的是，这些阿兵哥们心目中的地狱都有很典雅古朴的名称：少年监狱名为“明阳中学”，桃园分检看守所名为“怀德山庄”，绿岛监狱名为“绿州山庄”，新店军事监狱名为“明德山庄”，陆军第六军团看守所名为“仁德山庄”，而名为“日新山庄”的台南六甲军监则在《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中取名，希望犯人能够改过自新。

据服刑者回忆，昔日的军事看守所和军事监狱经常发生霸凌案件，入狱的逃兵经常遭到看守和“狱霸”的欺负，甚至会遭到性侵害。2002年4月，宜兰明德班就曾有林姓士兵被重体力训练累死，每年被军事监狱

关到精神错乱的更是不胜枚举。一旦刑满踏出监狱，服刑者第一件事就是往监狱里丢一块石头，代表永不再见，然后找地方洗澡、理发换上全新衣服。这种传统也曾闹出笑话：曾有两位刑满出狱者被送出大门后，丢石块时不小心砸中了大门岗哨的宪兵，随即被当做“袭击宪兵”现行犯再度抓获。

随着台湾社会的逐步开放，军法系统也越来越受到关注，霸凌案件发生也越来越少。近年来，在台湾军事监狱服刑更像是一份工作：周一至周五上班，七点起床，十点睡觉，周六日可以打篮球和看电影，平时的生活也非常充实。监狱里，囚犯们被安排了多项课程，木工、陶瓷技术和手工皂是最常见的科目。最近几年，六甲军监出产的“日新山庄”牌环保手工皂成为了台湾知名的伴手礼，经常卖到缺货。日新山庄搬走之后，当地人最懊悔的就是再也买不到这种物美价廉的手工皂，长年由日新山庄提供免费便当的20多名当地独居老人的饮食也成了问题。

此次向“法务部”移交的六甲军监，将会移作台南监狱的分监使用，而2005年裁撤的新店军监，已经被“法务部矫正署”拿来当做戒毒所使用。目前，台湾大多数军事题材的文化公园都是由监狱改造而成。位于高雄凤山的海军“明德班”，曾经一度是关押六个月刑期以下军囚的地方，被称作是军事监狱预备班。目前已经被当地政府接收，改造成为军事历史文化园区，供游客体验“蹲苦牢”的感受。绿岛监狱则早已改造成旅游景点和博物馆，招揽世界各地的游客。

是民主？还是民粹？

2013年7月4日，国军下士洪仲丘在禁闭期间遭到大规模体能训练后身亡，引发台湾社会和政坛的大地震。马英九先后两次前往台中洪家上香致歉，一周之内更换了两位“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更是因此提出辞职并且彻底退伍。

洪仲丘之死还引发了台湾“白衫军”运动，因为不满洪仲丘案中政府遮遮掩掩的行为，25万民众身着白衫占领了台北“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并且成功逼迫台湾立法机构修正通过新的“军事审判法”，规定承平时期军人犯罪回归一般司法机关追诉和审理，军法系统退出历史舞台。面对“军事审判法”的修改，主导“白衫军”的“1985公民联盟”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这是人民的力量最终解开了台湾军方官官相护的黑幕，是民主的胜利。

根据台湾“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军中最近三年中死亡人数高达2088人，其中五成被界定为“自杀”和“意外死亡”，而真正“作战死亡”的仅有5

人。军法系统对于频发的军队死亡案件草草结案的方式早就引发了民众极大的不满，洪仲丘的死亡使这种情绪得到了总爆发。

因死了一个下士就废除整个军法制度，台湾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并质疑“立法院”的修法是迫于民粹的压力。再生受刑人服务中心社长董念台则干脆到台北地检署告发洪仲丘姐姐及公民“1985行动联盟”成员涉嫌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董的理由很简单：“‘1985联盟’胁迫政府废除军法，国军未来无法再训练士兵。”洪仲丘案爆发时一位尚在服役的士兵就向本刊记者透露道：“军方不少人反对修法，一些将军也开始担心将来的队伍不好带了。”

“90年代军队还比较受重视，那时候两岸关系紧张，军方要买什么东西基本上都能拿到钱，军队训练也正常”，这位士兵向记者说道，“现在训练差多了，有的地方跟放羊差不多。”洪仲丘死后，面对要求检讨“军审法”的汹汹民意，新党主席郁慕明在“脸书”上写道：“一个义务役男入伍当兵大半年，增胖近30公斤，说明了什么问题？军队究竟是管教过当，还是训练不严呢？”

洪仲丘案导致军队一度全面暂停士兵悔过禁闭制度。台湾“国防部”1月7日发布了新的悔过执行方式，新方式被命名为三八制：上课八小时（其中还包括一小时休息），休息八小时，睡眠八小时。在这种制度下，受惩戒者不必进行体能训练，不用站岗，不必服公差，每天能够睡足八小时。新悔过执行方式一出，便有台湾媒体评论道“除了团团和圆圆，恐怕没有比这种生活更爽的了。”

第九篇 大船，小船，无船？台湾海军发展走到十字路口

特约撰稿员 / 萧萧

3月14日，台湾海军首艘采用穿浪三体船设计的“沱江”号导弹巡逻舰在宜兰下水，预计明年成军服役。下水仪式上，台军高层称，该舰比中国海军022型导弹艇“强太多了”，台湾媒体则纷纷称该舰是台军的“航母杀手”。

“沱江”号的下水，标志着延宕多年的台湾海军“换船事业”正式开启。一直以来，台湾海军自诩拥有海峡局部控制权，上世纪90年代初“二代舰”纷纷服役，实力达到巅峰。但好景不长，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崛起、解放军装备水平提升，使得军力对比发生逆转。面对这种情况，台湾海军的发展也到了关键时刻，存在着从“大船”、“小船”到“无船”三种使命抉择。

“大船”行不通

海军因航运而生，由于大型舰船具有远洋航行能力，自然是海军最正统的选择。但从台湾海军目前所处的环境看，“大船”却是条走不通的路。最根本原因是为了夺取海上交通线，无非是以海上决战击毁敌人兵力或将敌人兵力封锁于港中、取得制海权，为此己方舰队不仅要获得相对于敌人的优势，才能在决战中取胜或者迫使敌人退入港中。

不过，建立豪华的“海上决战舰队”是相当烧钱的，于是台湾岛内有人提出建设护航性质的海军，比单纯以夺取制海权为目的的决战海军更加经济。然而，护航固然有效，却也“备多而力分”，除非交战方能将所有航运船只同时集结成一个船队，再由整个舰队进行掩护，否则会导致舰队分散，使敌方各个击破。反之，如果交战方只集中舰队保护一部分航运，其余的航运船只就会处在无掩护状态，因此以“护航海军”代替“海上决战海军”的思路是走不通的。

如果台北致力于取得相当范围内的制海权，台湾海军不仅得重夺与中国大陆的舰艇性能优势，还得拉开差距，这在两岸日益悬殊的经济规模面前毫无可能。

有人也许会寄望于台湾买到美国最先进的濒海战斗舰（LCS）来扭转颓势，但该舰根本不是为传统海战设计的——除了建造以来不断曝出问题，濒海战斗舰其实是为近岸水域遂行“不对称作战”的，例如对付水雷与自杀快艇，执行反恐、反海盗、派遣特种部队等低烈度任务，缺乏

合适的武备与传感器到大洋上与敌方舰队交锋。

面对这种状态，台湾海军有人提议重点发展潜艇力量，通过“渗透封锁”的方式剥夺对手的制海权，“既然敌人无法对台湾水下兵力取得控制权，就不能以最经济的方式对其所有航运实施同步保护，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求更不经济的护航。这正像是二战期间德国的做法，逼迫英美盟国投入至少四倍于己的兵力，才不致惨败”。

不过，以潜艇进行水下破交的“大船”策略，还是问题重重。不同于取得制海权的一方可用水面舰艇对商船实施临检与拘捕，没有制海权的一方使用潜艇破交，只能用缺乏甄别的机会直接击沉商船方式，此举在政治上无异于“自杀”——如果台湾海军胡乱使用潜艇，未来将没人敢把潜艇交给他们使用。

以如今两岸贸易的繁盛，以海运为目标的长期“经济绞杀战”不太可能发生，因此中国大陆一旦需要夺取台湾，全面跨海作战是比较合理的选择。以此为设想，台湾海军对“大船”的运用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其主要军港均在大陆日益强化的战斗轰炸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的威胁之下，或许台军能利用开战的预警把“大船”提前开往远海机动，让解放军最初的攻击落空，并在对方登陆的关键时刻重回战场。

然而，姑且不论出港后是否躲过大陆优势舰队的追杀，台军“大船”到远海机动势必要存放更多的油料、淡水乃至补给，因此挤压所能携带的武器数量，当舰上有限的弹药用尽，“大船”又如何能躲避攻击？

“小船”难生存

在上述劣势的考虑之下，“小船”成为台湾海军的第二种选择。国际通行的制海权理论是指导优势一方的，劣势一方不能控制海洋，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海洋拒止”，阻止敌方强行入境。其做法是以小博大，改用吨位小、数量多的船只，装载可“一击致命”的鱼雷或反舰导弹。

既然台湾不必在远洋保卫航线，只要阻止解放军登陆，“小船”就成了“不对称方案”——就总吨位而言，排水量小的“小船”除了配备反舰导弹之外几乎省略一切，因而能构成更大的火力，迎击两栖登陆舰队。

但就目前态势分析，“小船”恐怕也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生存能力。如果说防空火力更强的“大船”都还无法在飞机与导弹涵盖的近岸地带活动，几乎毫无防空火力可言的“小船”生存机会只是更加渺茫，因为它连远海机动能力都没有，躲不过开战时的首波攻击。

过去“小船”是利用灵活的机动与快速航行，配合天色掩护与沿岸小岛、海岬的遮蔽，骤然发动突袭而取得战果，但这些方法在今日科技面前早已不再管用。

雷达的出现打破日夜的分别，高分辨率的分辨力也使海岸地形不足以混淆搜索，何况台湾较为平直的海岸无法提供这类掩护。精确制导武器更令最轻快的船只都难逃毒手，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小船”海军在美军空袭下覆没的惨剧殷鉴不远。

美国政府曾于2001年批准向台湾出售8艘柴油动力潜艇，但项目至今没有取得进展。不久前台“海军司令部”表示，鉴于美国尚未回应台湾购买柴电潜艇的请求，台方已开始评估自主建设潜艇的可行性，并称当地造船协会预计将在2014年6月前制定一份全面的可行性评估报告。

倘若台湾真能获得潜艇，的确是对飞机与导弹的最好抵抗。然而，台湾海军规划中的潜艇究竟要怎样的规模？太小的潜艇不仅没有适当的传感器，也缺乏续航力进行远海机动，落得像水面“小船”一样，还在港中待命就被击毁；大型潜艇虽然不会有这些问题，但造价较高意味着数量不可能太多，结果还是与水面“大船”一样，在回港补充时暴露在攻击之下。

“无船”最明智？

如果“大船”与“小船”都行不通，台湾海军剩下的最后选择就是“无船”。在“海洋拒止”思维里，岸基飞机与导弹是岸炮的另一种延伸，它们也是最有效的近岸海战武器。对台湾而言，机场被威胁的状况和港口一样严重，但舰艇、飞机无非是延伸导弹射程的平台，这意味着只要导弹本身射程足够，就用不着平台携带。

岸基反舰导弹部署只要有良好的疏散与伪装，就算面临敌方压倒性的空中优势，也难以被发现和摧毁。它不需要搭载平台，不仅少了补给的问题（储藏点即发射点），经费更能全部用于购置可供排山倒海式“饱和攻击”的导弹。在技术上看，这类岸基导弹已十分成熟，剩下的问题只是目标获得及指挥管制，相对容易解决。

在目标获得方面，无论“大船”还是“小船”，光凭自身传感器都难以探知水平线之外的目标，需要飞机乃至卫星的协助。如果台湾机场遭到破坏，台军机群经疏散部署后仍可以在一天派出数十架次执行任务，虽然这样薄弱的力量不足以抵挡敌机群，但作为岸基反舰导弹的耳目，用来提供发射前的大致目标位置仍是绰绰有余。

对于台湾海军当前的做法，岛内军事专家杨温利十分不满。他认为台军积极推动的各项装备升级计划无非是新“小船”淘汰旧“小船”，新“大船”淘汰旧“大船”罢了，这显示台军高层不肯承认两岸实力差距的事实，将建军战略从“争夺制海权”转向“海洋拒止”。对于杨温利的观点，岛内多数学者认为过于“激进”。毕竟“无船”作战不像海军行为，倒类似陆军炮兵在近岸海战的运用。

台退役将领兰宁利指出，相对于“大船”与“小船”，无论从可行性、战斗效率、成本效益还是所需技术来看，“无船”方向或许是台湾海军最明智的选择。尽管出于平时维权、外岛补给、武力展示、海上执法、人道救援、港口访问等需求，海军仍需要舰船、特别是“大船”来担，当在具体兵力结构调整时，要把更多战备任务从舰船转移到岸上。

第十篇 日本欲向台湾出售武器？

特约撰稿员 / 田聿



图：**2012年10月14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军官在“剑龙”号潜艇的夹板上执勤。许多国家都想获得日本的柴电潜艇制造技术。

日前，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挣脱“武器出口三原则”限制的日本正谋求在新出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名义下，向盟友澳大利亚输出潜艇建造技术，这一举动竟然引起台湾当局的“非分之想”。由于美方答应售台的8艘潜艇迟迟没有下文，以至于台湾方面在非正式场合向日本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探询引进日本潜艇和其他军备技术的可能性。

7月1日，台北举行了一场名为“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的研讨会。据台湾《旺报》报道，日本国会众议员大家拓在研讨会上称，日本在法理上的确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将防御性武器出售给台湾”，他表示日本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并未将台湾排除在外，台湾对日本是个“有潜力的市场”。

日版“台湾关系法”尚难出台

大家拓称，在政治上，日本要出口武器是非常困难的事，像出口给澳大利亚苍龙级潜艇（澳大利亚有意替代现役科林斯级潜艇），如果这个计划实现的话，将是日本在二战后最大规模、同时也是最具影响的武器出口计划。他特别强调，日澳潜艇项目可能成为日台类似贸易的“参考”，只是日本政府仍面临诸多法律法规需要修订，同时要考虑美方的想法，但只要日本政界在对台军售的方案上取得“共识”，出口防御性武器给台湾是可能的。

1967年，日本佐藤荣作政权提出“不向共产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国禁止的国家、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或可能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出售

武器的“武器出口三原则”。然而，基于“三原则”采取的禁运措施在安倍政府以前就曾被多次打破。

日本《新华侨报》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40多年来，日本武器出口呈“V”字形走势。类似的武器装备出口已有先例，2011年日本政府曾通过美国政府向阿富汗空军提供海上自卫队的飞机螺旋桨，理由是民间也曾使用。2014年1月安倍访问印度时称，决定结束对印度的武器出口禁运，出售给印度水陆两用飞机，印度政府官员称，日本和中国的紧张局势使日本同意印度的要求。6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问日本时，安倍表示将向菲律宾提供10艘二手巡逻艇。《华尔街日报》曾披露，除了菲律宾，日本还在研究向越南提供巡逻艇。

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有1000多家涉及军工生产的企业，其中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12家骨干企业，为自卫队提供90%以上的武器装备。但是，目前这几家企业军工产品仅占总产品的2%-10%，尚有很大潜力。由于出口武器装备不仅可以维持和加强军工产业的技术基础，而且大批量生产更可以获得丰厚利润。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出售武器给台湾，势必破坏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台湾岛内媒体表示，售武问题在两岸关系中向来是敏感问题，日本未必敢卖，台湾也未必敢买，这是现实。有关日版“台湾关系法”问题，台湾方面自是求之不得，现在关键在东京的态度。美国版的“台湾关系法”曾对中美关系发展造成极大影响，日本若制定“台湾关系法”，必然也会冲击本已出现矛盾的中日关系。

大家拓认为，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还需要一些时间，现在南海争议局势紧张，日本已与菲律宾、越南建立合作机制，但遗憾的是有关东海、南海的争议都不见台湾身影，这就导致日方对建立日版“台湾关系法”的议题有所疑虑。大家拓还表示，据日方观察，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下，过去两三年美国对于台湾的态度有些“模糊不清”，但最近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开始有明显改变，美方开始将台湾视为“维护地区安全的一环”。

“鸭子划水”的非正式交流

日本拥有独立自主而且先进的柴电潜艇技术，除了澳大利亚有意向日本引进潜艇技术，对于过去踏遍全球、寻求柴电潜艇而不获的台湾来说，“日本选项”始终没有放弃。本港《军事家》杂志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指出，包括请日本厂商协助建造、通过美国采购退役日本潜艇再转手售台等，都被台湾“国防部”纳入方案考虑。尽管之前种种努力都因日本忌惮中国大陆的压力而未能突破，不过随着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大幅恶化后，外界对“中日不慎擦枪走火”的忧虑空前升级，不排除日本铤而走

险。

虽然马英九当局常给外界一种“亲中”印象，但台日之间“鸭子划水”似的非正式防务交流仍获得稳定推动。本港《亚太防务》杂志披露，日本自卫队经常派人来台，例如近期就有陆自西普连人员到台湾海军陆战队进行交流。知情者称，日本海自正悉心保存退役的春潮级潜艇，视“适当机会”向台湾提供并非没有可能。

今年6月中旬，台湾海军在台北召开“潜舰国造”会议，广邀岛内外相关厂商与会。据一位与会人士表示，虽然台湾造船界对“潜舰国造”展现高度热情，但如果没有外国技术母厂的支持势将无法落实，这项政策能否贯彻仍有许多环节待解决，因而或新增日本技术指导的来源选项。

民进党执政时期是台日安全合作最热络的时候，双方不仅互派人员观摩军事演习（例如台军的“汉光”演习和日本自卫队的“富士火力综合操演”），每个月还会在台北市秘密举行安保会议，针对双方的安全合作需要，东京特意在“准官方”的日本交流协会驻台北办公室里增设20-25人的保安小组。据悉，台日定期举行安保会议的事情并未知会美国，但以美国在台日布设的严密情报网，美方显然是心知肚明，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有知情人士透露，台日安保会议通常是分组进行，与海空军相关的会议较多，陆军方面较少，但有时也会进行跨军种会议。日本与会的军官是以佐（校）尉级为主，虽然军衔较低，但学识与专业度都不错，与会的台湾军官虽然军衔较高，但日方却私下抱怨他们专业能力不强。

台日安保会议涉及海军的事务最多，例如日本海上自卫队平时严密监控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地区动态，日方经常通过安保会议向台湾提交有关解放军潜艇活动的情报资料。会议有时还会涉及双边军品采购，最具代表性的是台湾海军成功级护卫舰所用的美制LM2500燃气轮机，它也是海上自卫队多款舰艇使用的主机。此外，当年台湾的海巡舰艇也被允许进入日本港口停靠，只是为了避免引起注意，通常选择在晚间进出日本港口。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也曾出口日本若干装备，如陆上自卫队所用的74式和90式坦克的模拟训练器就是台湾“中科院”研制的。据台湾《工商时报》披露，受2011年“3·11”大地震破坏及日元升值等不利因素影响，包括三菱、川崎、富士三大航空制造业巨头在内的日本企业不得不前往海外寻求产能，其中台湾汉翔公司分到一块“大蛋糕”。

为了进一步对日宣传台企实力，近年来，台湾多次派出由“工业局

副局长”领衔的展团参加日本名古屋航展，寻求争取岛内的汉翔公司参与日本三菱重工牵头的MRJ支线客机项目。要知道，MRJ正是中国大陆力推的ARJ-21客机的主要竞争对手。有意思的是，汉翔也在致力于同中国大陆大飞机事业建立合作，着手成为大陆C-919干线客机的分包商，但由于汉翔仍掌握台军多项敏感技术，军方人士忧心汉翔此举可能导致机密外泄，因此台湾“经济部”和“工业局”从内心更希望汉翔与日商合作，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当局“搭桥牵线”往往侧重日企的原因。

不过，在台湾历经第二次政党轮替后，马英九当局因钓鱼岛问题一度中断台日安保会议，台湾官员也多次出面澄清，双方目前已没有台面下的安全合作了。

但据一位香港军事专家指出，对日钓鱼岛事务交涉中，台湾的斗争意愿远小于中国大陆，且马英九当局多次公开放话“不与大陆联手保钓”，因此台日重启“防务旧梦”的可能性依然很高。他认为，台日钓鱼岛冲突的核心实际是渔权，日本长期不准台湾渔船在此作业，因此一旦日本决心集中火力对准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渔权方面达成某种妥协，进而恢复双方军事交流的难度并不大。另据岛内消息灵通人士介绍，马英九当局有意在近期恢复“台日安保会谈”体制，恢复对日安全及防务交往。

第十一篇 无解的困境：台湾军队深陷蓝绿对立泥潭

特约撰稿 / 中人

台湾军队的日子日益难过，除了全岛财政日渐衰颓限制了新装备之研发与购置，它还深陷在族群分裂的政治生态中。当“国家”认同出现激烈分歧，在野党以“政治反对”的决绝态度，反对执政党的任何施政。这不仅体现在防务上，实则覆盖了全社会，大如核电站建设的存废、服贸协议之争等，小如一场上了规模的交通事故、一栋楼的坍塌等，都能让民进党对国民党展开猛烈攻击。

政治的操作、媒体配合反对党的攻击宣传、国民党政府轻易就迫于民意而发出过度干预与打压，使得台军的兵制、组织改革、领导统驭等工作举步维艰。久而久之，在一般民众眼中，台军形象江河日下，庶几成了黑道流氓、罪恶渊薮。

绿营事事反对“外省人”军队

迁台后，国民党执掌军队久矣，民进党必定要以非传统手段掌握时机进行宣传与攻击，方能受到群众之认同，进而胜选。民进党在台湾的基层群众动员能力，正在于他们硬造出一个“台湾民族”，又靠绿营知识分子构建起一个悲情的“台湾民族叙事”。在绿营看来，国民党等于外省人，也等于财团、高官，军、公、教人员等于既得利益者。以外省人为主，又是国民党所创建的特殊团体——军队，遂成为其重点抨击对象。批评越猛烈，赢得选票越多。

但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治军方式比自己的批评对象更糟糕，昙花一现的震公司便是一个案例。它成立于2008年1月28日，在同年2月23日宣告解散。前证交所董事长、民进党新潮流系大佬吴乃仁担任董事长，幕后是由“行政院”副院长兼“国安会”主委邱义仁操作。设立公司的主要目的，是规避台湾在军购上与外国政府“国对国，政府对政府”的形式，改以私人企业的身份顺利自国外进口先进武器。

原始设定公司资本额约新台币4.5亿元，“中国钢铁公司”子公司“中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5000万元，中华电信子公司“中华系统整合股份有限公司”投资3000万元，“国防部”预定出资45%即约4.5亿元。原始构想，是将拉斐特（台、法两方高层在“拉斐特”级护卫舰军购中收佣金，合同上有排除佣金条款）军购案中的非法佣金作为成立公司的资本，以剩余佣金再向法国购买武器。最终，震公司成为一个由公股设立、民进党高层掌控、军方无发言及主导权的“公股民营”军火公司。无

法监督，又替利润丰厚的国外军火商做代理，台军只能受其摆布而浪费巨资。

事实上，台湾军购向来都是以政府对政府的模式进行，最重要原因即是以军购将政治绑约，即以军购的方法获得卖方国政治上的保障或利益。此外，可保障外购装备的后勤支持及系统更新顺畅。“成功”级护卫舰是如此，“拉斐特”级护卫舰、“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亦如此。民进党设想，一旦震公司成立且运作，军购绑政治的利益将不存在，但是外购装备必然随政治外交环境的变动而受重大影响。震公司刚废止，法国即停止对台出售“幻影”战斗机及“拉斐特”舰的维修零组件。两政府在对等条件下所签的军购合约都能反复，那么企业间的关系稳固度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执政的民进党已经从震案摸索出丰富经验，开始对台军内外军购展开系统的布局。如亲绿的龙德造船，几乎包办了海军轻型舰艇的承造，但每一次的成品莫不让海军气急败坏。原始设计不断被修改、主机组成过于复杂、钢板强度不足……诸多问题困扰着海军。

F-16C/D战斗机的军售风波，是民进党事事搞“政治反对”的一例子。台湾争取美国F-16C/D战斗机军售已久，但由于F-16C/D对地攻击能力强大，美国防部及国务院把它列为攻击性武器。碍于《八·一七公报》及一旦销售必然引起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对，美国势必不会出售此机予台湾。

美国军方及美国在台协会官员，已就目前台军飞行员数目及座舱比做过精算，即便台湾顺利购入F-16C/D，也无足够的人员从事操作及维修。美方建议升级原F-16A/B软件即可，故在最后否决此军售案。当时台湾已做好三种二代战机的中期性能提升计划，购买F-16C/D的急迫性已不存在，遂停止向美国提出军购要求。

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民进党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丝机会。2011年8月16日，民进党“立委”蔡煌琅、陈亭妃召开民进党团记者会，怒斥马英九已与对岸达成“卖台”协议，丝毫不想保卫台湾。

民进党对台军造成的最大影响或曰改变，是逐次缩短兵役期，最终让募兵制必然而至。为争取青年选票，陈水扁在“总统”候选人时期就打出缩减兵役期的口号，待上任后大力推动该政见，陆军从两年役缩成一年役。

然按照经验与常理而言，一个陆军士兵之养成需至少两年时间；第一年熟习本身装备与个人战技、体能之训练，第二年与班兵进行协同作

战训练。一年的兵役时间去掉一个月的新兵训练，一或三个月的专长训练，再加上假日、三节与周休两日、日常的生活勤务，一个士兵根本连单兵的战技与装备使用都尚未完备或熟习即要退伍。军中常识归常识，但事已至此，没有任何政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延长兵役期，这是票房毒药。最终，台湾干脆结束征兵制度。

媒体涉军报道，语不惊人死不休

台湾独特的政治生态，塑造了同样独特的舆论环境。媒体变相成为各政治团体的传声筒，更鉴于竞争压力，媒体报道往往夸大事实，并擅长借助政论名嘴们的耸人听闻言论来吸引人气。台军形象近年来不断下跌，固然与其传统的不当管教有关，但媒体报道功不可没。在高度娱乐化、八卦化的台湾媒体眼中，军队已成为“米虫”、“黑狱”形象。洪仲丘案件是最典型的例子。

洪仲丘在部队不当使用智能型手机与随身碟，违反“信息安全保密规定”，还“擅自篡改本人作战训练成绩内容，以便通过未来参加公职考试之资格审核”而遭到旅信息安全官、副旅长何江忠提报惩处。洪仲丘致死原因已证明为“非故意”，然而案件成为全民热点事件。

媒体一面倒将此案从“违规惩处”报道为“不当管教”致死，故意忽略验尸、悔过室录像、军医院医护人员证词等各项科学证据，将焦点集中于“洪员为何会死？”而不去全面报道何以“洪员会遭悔过处分”，引导民众认为军中又出现不当管教致死的冤案。

类似事件都给“名嘴”们提供巨大的舞台空间，“名嘴”张友骅在2013年7月17日于“新闻龙卷风”谈话性节目中，随口将何江忠描绘成收厂商回扣的贪官。2013年7月18日，《苹果日报》头版指控旅部连上士代理士官长范佐宪在外担任签赌组头，涉及暴利讨债。《苹果日报》、《壹周刊》及《自由时报》记者更在未获当事人同意下，径行至范佐宪家中以强迫方式采访范员父母。过后证明，以上指控是子虚乌有，但台军形象已遭严重损伤。

很多时候，媒体的涉军报道建立在对军事常识的无知上。典型如2015年2月15日《苹果日报》报道，海军146舰队“成功”级“子仪”号护卫舰士官长吴孟修于12日晚参加欢送餐宴后失踪，翌日早被发现陈尸马公军港海底。报道认为，该舰未能在离港部署前确实清点人数，必是海军军纪松懈所致。

从事过海军舰艇职务的人员都知道，舰艇起碇只有“人赶船没有船

等人”之事。因为军舰离港部署即是处于作战状态，港口航道规划时程已定，船舰油量消耗惊人，断不能为个人因素而待机舶碇。媒体不明海军作业程序及管理模式，直接宣称军纪败坏。

就算台军实际无过错，军方对媒体扭曲报道的回应往往无甚效果。在蓝绿对立的社会态势面前，军方身负漫长戒严年代造就的历史包袱而如履薄冰，只能抱着“与人为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懦弱龟缩心态，任媒体无情凌迟、予取予求。

2010年12月18日，海军开放花莲贺田山的固海营区“雄风”二型反舰导弹阵地，供媒体参访。“中国之翼”出版社记者，藉参访之便丈量各准备处室、装备、碉堡之尺寸及附近地貌，并于该刊公开所得数据与照片，造成基地机密尽失。最终，“国防部”不想节外生枝，此泄密事件不了了之。

马英九轻易屈从舆论，让军方寒心

深陷反对党和媒体舆论攻击中的台军指望国民党政府出面帮忙，但马英九却顺从“民意”倒打一钯。许多军人对此感到寒心。

最近一个闹得全岛轰动的案例，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泄密”事件，因艺人李倩蓉在社交平台上上传她去航特部601旅参观相片而引起。民进党和众媒体皆给予猛烈批评和讽刺，马英九震怒之余严惩军队相关人士，连负责全军军令的“参谋总长”亦遭记过处分。

带李倩蓉参观的601旅作战队前副队长劳乃成中校，成为众矢之的，媒体还挖出他带装具参加私人聚会的照片。马英九直指劳乃成中校私自携带飞行装具回家造成泄密，劳乃成被撤职，并被列入年度淘汰名单。按陆军作战想定及陆航内部规则，攻击直升机飞行员个人“飞行经理装备”（飞行员穿戴于身上或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物品）是能带回家的。台军作战想定中，第一波攻击后，基地与跑道设施均遭击毁，飞行器已转移至战术疏散集结地。此时，飞行员须在任一时间、地点受命后向集结点集合并立即登机作战。所以飞行员必须是已经着装完毕，只待进入座舱后将各仪器与链接线路接上。

601旅最初对劳中校记三次小过的惩处算是适当。但马英九屈服于舆论攻势，只因震怒即对陆军下重手，引起军中的强烈不满。台湾社会有一条铁定律，蓝绿双方不管对方如何道歉，绝不宽恕，只有追打落水狗。绿营是永远追骂处处想当“好人”的马英九，不管他做什么。

在治军上，马英九的最大诟病是最终贸然推行了募兵制。应财政及

适役人口的减少，台湾从1997年7月1日起陆续推行了“精实”、“精进”、“精粹”三个兵力结构调整案。而为了推行马英九一厢情愿的完全募兵制，部队要更加一步裁并转移经费至募兵方面，这就是目前喋嚷不休的“勇固案”。

“勇固案”一大争议是将海军陆战队裁并至陆军，实际上两者作战形式大不相同，陆战队除了要具备传统地面作战技能外，还必须接受两栖载具驾驶、使用与逃生、载具转换、登陆后滩岸作战、火力支持与协调、岸轰火力支持、扫雷、物资装载、登陆舰队队形、抢滩作业、后续物资运补……这些东西是陆军无法提供的。在军方眼中，马英九仅为完成自己竞选时的政见，就任意破坏兵力结构。台军将领通过力争保留下陆战队，不知道还能存在多久。

台湾目前推行募兵制是最适合的：一来不用维持一支为数众多、义务但缺乏战力的庞大队伍；二来可释放社会所需人力。最重要的是，募兵将建立一支专业、服役年限长，而且是“志愿”人员组成的军队。但是完全募兵须有必不可少的配套方案，薪资、部队中教育、志愿役人员退役后之就业就学辅导与辅助等繁杂业务要一起推动。而且最让军队担心的是，由征兵转为募兵的期间，出现的战力人员缺口要如何填补？

美军在越战后实施完全募兵制，但按照前驻伊拉克美军总指挥官戴维·霍威尔·彼得雷乌斯所言，直到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美军的全募兵制部队才发挥了实力。试想，以美国军费充实、科技发达的程度也花了20年才让志愿役部队具备了优秀的战力，马英九说要在三年内完成完全募兵制近似于痴人说梦。结果，这几年来募兵制屡屡遭受各种阻碍，更显得台军举步维艰。

（作者为台湾军刊从业者）

第十二篇 台湾陷“防务民营化”难题

特约撰稿员／安然

自从2011年推进“精粹案”以来，台湾军方为了配合马英九当局以全募兵制的防务改革路线，大力进行人员精简与机构缩减方案——除了将官编制从400人压缩到300人以下，台军常备兵力编制员额也下调到21.5万人。正因为台军正在“全募兵制”的道路上飞奔，导致各军种部队的兵员征补和人力资源分配捉襟见肘。于是，台湾“国防部”开始将与作战训练任务无直接关系或者专业性要求不高的一般性行政后勤业务（如伙食、清洁等工作）劳务外包给民间公司。一时间，“防务民营化”的话题在岛内传得沸沸扬扬。

早在2012年3月22日，时任台湾“国防部长”高华柱在“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就为募兵制大唱赞歌，他还以阿富汗美军基地岗哨警戒也是外包民企（私人军事公司）为例，指出未来台军除开离外岛守军和作战部队所属驻地营区外，各级后勤厂库的警卫安检人力都将改为外包，由民间安保企业负责。

2015年年初，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表示，目前已有“国防部”文化营区（即军闻社和《青年日报》报社所在地）、三军总医院内湖院区等非战斗、非机密性军事单位的大门警卫勤务外包出去，伙食勤务部分（如“国防大学”与“国防部”文化营区等机关）也已在办理之中，相关程序都是依照当局的“采购法”，通过公开招标交由民间公司负责。罗绍和特别强调，“国防部”精简非一线作战人员编制，更深一层意思是配合当局扩大内需商机的政策大方向，由此扩大民间就业市场，创造服务业产值。

民营化历经数十年

对台军来说，民营化政策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当时“国防部”裁撤各军种（包括联勤）与民间公司性质雷同的军品生产厂（如联勤粮秣厂、被服厂、空军肥皂厂），将军人军属领取的口粮实物配给改为货币，原本由各军种自行设立管理，专供军人子女就读的中小学、幼儿园移交地方教育系统。甚至为了配合当局希望打破日企垄断台湾重型卡车市场局面，“国防部”特意将联勤第201兵工厂改组为华同汽车公司，与美国通用汽车合作生产美系重型卡车，可结果是市场竞争力不足，企业亏损严重，最终被民间厂商并购收场。

不过，台湾当局真正系统性推进防务政策民营化与资源军转民变

革，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其历经“精实案”、“精进案”、“精粹案”等多轮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卖断或出租，以BOT或RT方式处理已无军事价值的军队营房（各军种俱乐部、招待所，闲置营区、靶场、宿舍、眷村），补充军费预算，改为非营利性公共服务甚至工商业用途（如将原陆军后勤学校分部营区腾出，供鸿海集团使用；将关东桥新兵训练中心腾空，供竹科园区厂商扩建厂房）。部分原由各军种自行负责储备与定期更新的战备粮秣，改由当局“农委会农粮署”储备，原本由各军种受补给单位按月向联勤总部提领的编制内车辆行政用油，改为按车发放类似现金储值卡的加油卡，由受补单位车辆直接前往民间加油站加油（仍需记账）。各军事单位内开放民间便利商店公司进驻经营，逐步取代过去的兵站。

部分原由空军运输机与海军人员运输舰负责的外岛定期人员物资补给任务，改由租赁民航包机与商轮执行，负责军机研发生产的空军航发中心移交“经济部”，改组为公营汉翔公司，部分军事单位负责非一线战备训练任务的行政用车改为购买商用车辆，或改用招标方式向民间公司租赁，维修业务一并外包，不再另行编制预算购置此类须定期折旧报废的资产。

有意思的是，当初逃台时，台军“政战部”为了满足大陆籍军人的休闲娱乐需要，设置了平剧队、艺工队、军乐队与军中剧校，因社会形态和大众文化变迁，也在这股“民营化”浪潮中被逐步撤并或移交其他当局部会（如“文建会”）管理。另外，过去基于“反攻大陆”需要设立的台中市后里区马场（负责军马培育繁殖），也一并移交地方当局。

在强调“军以战为首”的角色单纯化与专业化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台湾当局落实防务民营化的结果，使得与作战并无直接关联的军医、后勤保障、文化娱乐公关、教育培训等机构大幅缩减。台湾“国防部”还根据工作职位的敏感程度与机关任务性质，安排文职公务员甚至聘请退役军人接手岗位（如聘用退役飞行教官）。

优点与局限

从国际通行做法来看，防务民营化政策思维与做法的优点不少。

首先是突破传统“金字塔”式官僚组织结构所导致的决策流程僵化、命令信息传递被扭曲等缺陷，摆脱在依法行政前提下所衍生的人事、预算、组织法等行政程序法律或命令的拘束，有利于争取时效。其次，军方官僚体系面临人力、预算、物力、时间、知识技术等资源的匮乏与有限问题，“借力使力”，引进民间既有的商业部门财务、物流、绩效评估

等管理知识、人力与研发产能，提高机关组织经营效率，减少人事费与作业成本等经常性支出，使军队专注于作战训练等核心任务。再次，也有利于军方建立与民营产业间的良性互动，有助“国防部”与军方争取相关利益团体对军费预算的政治支持。

从总体经济与公共资源分配角度来看，军事部门无疑是偏纯消费属性的组织，让军费预算尽可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回馈内需经济，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增加内需市场的民众就业机会，无疑能创造延伸效益，在宣传上也能证明和平时期维持军队存在的正当性。

不过，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局限。传统军事体系运作的核心价值与组织结构、软硬件子系统设计侧重“任务导向”，强调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环境下，软硬件系统配置仍能正常运转，重视理性与可预测性，软硬件子系统在功能设计上强调重复与备份设计。但在民间社会，商业体系强调资源利用最大化和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免有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的现象，所以民间商业市场经济运作逻辑与军事体系运作逻辑上有抵触之处，无法完全套用民间商业经济活动的供需关系模式。

防务民营化政策的真谛是引入充分的市场竞争，平时固然有助于军方压低获得劳务、物资或信息技术的交易成本，但战时或灾害时期承包商能否正常履约、维持应有的服务品质与时效，则要打上问号。而且，陆军和依赖陆地永久化后勤保障设施的海空军，基于任务与所面对的威胁形态，委托民间企业提供服务的办法在实际操作时也难以一体适用，毕竟台湾本岛缺乏防御纵深，全岛在开战时就是一个无前后方之分的战区，这与美国偏向海外投送兵力，没有迫在眉睫的强大军事威胁的大环境有着本质差别。

此外，身处战区或灾区等高风险环境，不论军人或承包当局合同提供服务的平民，与军人面对一样的风险，但受伤、残废、被俘甚至丧生所能得到的赔偿、抚恤或保险等实质补偿却因为法律身份认定上的盲区，很可能造成“同工不同酬”的局面。除了影响战场一线军人的士气外，换个角度审视，也等于身为雇主的政府将军事行动衍生的外部成本与道德风险转嫁给平民，提供劳务或受军方委托代行强制性公权力时，更易产生道德风险与法律争议（例如美国黑水私人军事公司涉嫌在伊拉克滥杀平民事件）。况且，如果缺乏军事训练的平民在战地执行诸如后勤保障任务，可能还得额外派出军队保护，反而成为军队的累赘。

“军转民”遭遇水土不服

另一方面，经由军转民过程，由军事机关转型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如改制的台湾汉翔公司），当组织的核心价值由“任务导向”转型为“利润导向”后，原本被赋予支援军队建设和推进“军工自主”的政策性任务沦为次要。在市场竞争和维护自身生存发展的考虑下，民营企业在向军队提供服务时难保不会阳奉阴违，质量下滑。事实上，台湾当局对那些原本担负军品研发生产的单位进行民营化改革，往往异化成“放牛吃草，生而不养”，还美其名曰“完成阶段性任务”，完全将它们当作负担，一改了之，撒手不管。

而军方原有的专业人力或公有资产（营区土地房屋、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转化为商业用途，若处理不当，缺乏合理透明房舍公开竞争与监督问责机制，容易沦为决策层便宜行事、“公库通私库”的利益输送。例如，位于台北市大安区黄金地段的原联勤总部信义俱乐部原址土地，在陈水扁当政时期所谓“活化公营资产”政策下，被移交给“财政部国有财产局”后出售，卖给同陈水扁关系密切的财团，该财团在刻意闲置土地多年后挂牌出售，转手赚取高额暴利，招致舆论哗然和“监察院”介入。又如，位于新竹县市交界的前笃行营区（即关东桥新训中心），在营区整建后不久，却在陈水扁一声令下立即腾空，改建为竹科龙潭科技园区工厂用地，不仅浪费公帑，更遭“监察院”点名弹劾。

某些具有持续性的军方后勤支援任务，更因为承包提供劳务或资本物品的民企之间相互转包，或军方与原有承包商合约到期时，可能发生难以确保服务时效与质量的公共问责性问题。

军方一旦将涉及劳务或实物资本物品的服务改为外包商务，事前的招标竞争与事后的绩效评估等政策监督把关就显得更为重要，但军事官僚体系由于相对封闭，内部成员同质化程度高、且重视服务传统与价值取向（说白了就是长幼有序、论资排辈，服过义务兵的人对军中那套“学长学弟制”组织文化“潜规则”多半心领神会）。举例来说，军队相比文官体系，对身份利益回避的“旋转门”公私分界法制条例观念淡薄，台军过去就有职业军官退伍后靠山吃山，承揽相关专业领域的军品零部件招标业务，形同另类“官官相护”的生态和利益共同体“食物链”。

台湾当局在军事领域推进民营化，客观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但军事部门与民间商业企业应该形成互补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彼此补充而非完全取代，毕竟军事业务市场化是一个选项，却不是唯一的解决路线。即便在充斥着重商主义、决策过程与相关信息高度透明化的美英等国，民营化作为政策工具在国防军事领域应用已相当普遍，但其政界、军界和专业媒体对外包商务过于泛滥，缺乏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估机制的

现象也不乏反省之声。

以台湾当前的政治与经济互动生态而论，当局与军方决策层盲目照搬西方防务民营化的路数，把外包商务当成“军民一体适用”的万能神药，实在有些水土不服。

要想让防务民营化走得更远、更稳，台湾行政当局除了要健全完善招标采购法规或行政程序外，对承办各级军事单位外包商务或商品租赁采购业务的军职或文职人员要强化法治、军事专业素质培训，避免沦为“私相授受，便宜行事”的重灾区。此外，还要健全相关法制与利益回避规范，决策者也必须有政治担当，挡得住来自利益集团的施压游说。只有如此，防务系统引进民营化策略，才能达到精兵简政，实现即时性后勤支援，有效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政策目标。

第三章 探秘烽火岁月

第一篇 抗战前夜的政制与宪法讨论

撰文/傅国涌（历史学家）

自1933年12月起，胡适和《独立评论》的同人们讨论政制问题，参与者包括蒋廷黻、吴景超、常燕生、丁文江，以及在《东方杂志》撰文的钱端升等人，他们从1934年1月起为《大公报》写“星期论文”。讨论断续将近一年，胡适在12月9日为《东方杂志》撰写的《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他的一个小结。

在逐一反驳了蒋廷黻、钱端升等主张专制或独裁的观点之后，胡适说：“在这一年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党部人员公然鼓吹‘领袖独裁政治’，而一方面又是政府郑重地进行制定宪法的工作，正式开始所谓‘宪政时期’。已公布的宪法草案，是经过一年的讨论与修正的结果，这几天就要提交五中全会去议决了。然而‘领袖独裁’的喊声并不因此而降低。”他注意到此前10月20日北平出版的《人民评论》第57期有《斥胡适之自由思想》，就公然主张领袖独裁制。同一期另有《为五全大会代表进一言》一文，其中建议：“即由党产生党魁以宣布独裁，既不必再循训政之故辙，亦不必急于召开空洞无物、徒供军阀政客贪污土劣利用之国民大会。”

正当他为此感到不解之时，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同日，蒋发表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谈话中也明确：“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那一刻，汪、蒋握手言和、公开承诺不走独裁之路，至少给他带来一些小小的鼓舞。

民主与独裁的讨论

此文还未刊出，另一轮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又在《大公报》揭幕，这一天胡适发表了《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人民及社会团体间，依法享有言论结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则政府必当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对于汪蒋通电里提出的这些原则他深表赞赏，认为通电中用“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一语，要比宪法草案中用“依法”和“非依法律”一类字样清楚多了。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汪、蒋通电前后几天，就有无制服、无公文的人员到

北大东斋搜查并在路上拘捕学生，清华文学院长在办公室被无公文的人员拿出手枪来逮捕。

老朋友丁文江读了此文和他在《东方杂志》上的文章，1934年12月18日在《大公报》发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文，他不同意胡适关于“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的说法，认为“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

丁文江直言：“汪蒋两先生尽管通电来说独裁政治不是必要，而事实上国民政府何尝不是变相的独裁，不过不是蒋廷黻、钱端升两先生理想的独裁而已。岂但我们的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不久或者要遇着空前的经济恐慌。在没有渡过这双重国难以前，要讲民主政治，是不切事实的。”因此他主张往“新式的独裁”路上努力，第一步就是“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这当然是胡适不能同意的。

这一轮的讨论比上一轮要深入，吴景超、张奚若、丁文江等见解不同的文章在《大公报》作为星期论文”发表，有的由《独立评论》转载。《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也刊登了张佛泉、陶希圣、陶孟和、陈之迈、吴景超等人的讨论文章。

12月30日，吴景超发表《中国的政制问题》，清晰地将这个问题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政治？是独裁政治还是民主政治？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第二，我们愿意要有一种什么政治？这是一个价值的问题。第三，怎么就可以达到我们愿意要有的政治？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对这三点，他的看法是，“中国现在的政治，是一党独裁的政治，而在这一党独裁的政治中，少数的领袖占有很大的势力。”他认为这一点不单在野的人有许多这样看，就是在朝的人也是同意的。“关于第二点，因为包含一个价值问题，所以意见就分歧了。”他表示与胡适一样赞成民主政治，“我个人赞成民主政治的理由是很简单的：第一，民主政治是理智的政治，谁能够说服大众，谁就可以当权；第二，民主政治是自由的政治，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赞成政府，或反对政府，都有充分发表的机会；第三，民主政治是和平的政治，假如我们对于政府不满意，可以提出我们的主张来，以求民众的拥护，假如民众赞成我们，我们便可上台，不必流血，不必革命；第四，民主政治是大众的政治，凡是公民，都有参政的权利与义务，民众与政治，可以打成一片，没有统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别。”

据他观察，“中国的智识阶级多数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国民党在理论上也是赞成民主政治，不过觉得实行民主政治还没有到时候就是了。”对于技术上的问题，他认为，要努力在中国的环境中培植民主政治的条件，“这是和平的——同时却是很吃力的——工作，大部分可以用教育的方式完成的。”如何用教育方式来完成？他没有展开。

“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

1935年1月20日，陈之迈在《独立评论》发表《民主与独裁的讨论》，简明扼要地提出，“被治者有和平的方法来产生及推倒统治者是民主政治的神髓，抓住了这层便有了民主政治。”

对于汪精卫、蒋介石通电中“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他认为便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我们对于民主政治，不可能陈义太高，太重理想，而着眼于把它的根本一把抓住。对于现存的带民主色彩的制度，如目前的国民党全代会，能代表一部分应有选权的人民，并能产生稍为类似内阁制的政府，应认为是一种进步；……对宪草里规定的国民大会，则应努力使它成功。我们不斤斤于普选，因为那只是程度问题；我们不斤斤于代表机关是否真能代表人民，因为哪国的议会都不是反映着社会的一面好镜子。”他强调的是“先抓住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就是“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

胡适指出，陈之迈所说正好可以补充吴景超所谓的“技术”问题。 2月17日，他在《大公报》发表《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政治信仰》，尤为认同吴景超和陈之迈的见解，认为他们“清楚明锐的分析，——已可算是得着了一点新的意义了”。

北大教授陶希圣在1月20日的《独立评论》发表的《民主与独裁的争论》说，“胡适之先生主张的民主政治，很显然的是议会政治……如果以议会政治论和国民党相争，国民党内没有人能够同意。”胡适一方面表示，我们现在并不愿意“以议会政治论和国民党相争”，另一方面又认为，“新宪草规定的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省参议会、县议会等，都是议会政治的几种方式。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而在这样走上民主宪政的过程上，国民党是可以得着党外关心国事的人的好意的赞助的。”

参与这场“民主与独裁”讨论的有地质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他们的学科背景不同，观点也各不相同，甚至非常对立，但是讨论问题的态度是从容、理性的，不以观点不同而剑拔弩张，各人均经过认真的思考，并摆事实说道理，对话的姿态

大于论战，关于民主还是独裁的这两轮讨论，大致可以代表了那个时代受过最好的学术训练、真正关怀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现实环境下最真实的声音，他们争的不是输赢，更不是权力或利益，而是以自己所属的国族为念，要说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在他们当中并不缺乏。

从1935年2月13日到24日，《大公报》连载张君劢专文《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主张折中独裁制和民主制，搞一个集中心力的国家民主政治。《大公报》2月13日的社评《中国不适宜于独裁》表明的立场，与胡适基本一致："今后训政结束之后，国民党之地位，自仍可为中心势力，但同时宜本遗教所示，以培养民主政治之宪政为目标"。

对"公民宣誓"的争议

1935年9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各方对国民党这次全会寄望甚切。9月7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社评《对于五全代会之期待》，直言："人类美德之一，为忏悔。国事至此，凡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享优厚机会之人，皆宜至诚忏悔，自咎负国。"

11月12日，五全大会在中山陵前姗姗迟开，《大公报》在刊登这则消息的同时，报道了宋哲元电呈大会，要求开放政权、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与民更始，努力复兴大业。11月22日大会闭幕前一天，《大公报》报道，大会决议接受宪草，授权第五届中执委会修正宣布，国民大会期也由中执委会决定。

1936年5月5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故被称为"五五宪草"。接着，公布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年满二十岁，经公民宣誓者，有选举国民大会代表之权。"

所谓"公民宣誓"的誓词为："正心诚意，当众宣誓，从此去旧更新，自立为国民，尽忠竭力，拥护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采用五权宪法，务使政治修明，人民安乐，措国基于永固，维世界之和平，此誓。"

王芸生直言自己只是无党无派的国民，大体上同情于国民党，并且对于国民大会寄有很大的期望，但他发现要参加国民大会的选举，须先确定公民资格，如何才算公民，须经过一次公民宣誓。"我从各方面来审查我自己，或尚勉强够一个公民的资格。我誓愿尽忠国家，永不做违反国家利益的事，但是叫我举手宣誓信仰三民主义，却踌躇了。我不反对

三民主义，并且在原则上是赞成的，但若一定叫我举手宣誓，承认不折不扣的信仰，最低限度，还得给我一个充分的时间，再把三民主义仔细的读几遍。这是一道门坎，迟留在这个门坎外边的，想来当不止我一个人吧。”（王芸生《五寄北方青年》，1937年4月26日《国闻周报》）这是当时许多人的担忧。清华大学教授陈之迈这样批评，“一方面倡导国民大会的选举及宪法之制定，一方面则用种种方法使得不赞成国民党的人丧失其国民之资格（例如不肯为国民宣誓的人们），实令现在热心中国政治的人感觉悲观。”他分析说，有政治意见的人，在国民大会选举之中便根本没有发表意见之机会，不肯宣誓的人根本便无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而事实上有政治意识而又服从三民主义者亦早已加入了国民党，所以余下来的只是一般无政治主张而希图藉此钻营者，或一般庸碌浑噩的‘老百姓’，以不敢或不便违背政府的功令而宣誓而投票，造成了官僚土劣威胁利诱的材料。”（《从国民大会的选举谈到中国政治的前途》，1937年5月2日《独立评论》）

清华政治学系研究生宋士英表示，“此项态度实为目前绝大多数国民之心理与态度。再如国民大会组织法，虽因多方责难而修正，但修正的结果，反而加重国民党特殊之地位。”他批评“国民党向以人民之保姆自居，……但今后既主实施宪政，而又不甘抛弃此保姆之观念，仍以特殊之政党自居，则为严重之错误。”（《中国宪政的前途》，1937年5月16日《独立评论》）

针对这种“包办”观念，王芸生也说：“现在无论是谁，只要是中国国民，都有对修正中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发表意见的权利。我以为要实现一个民主化的国民大会，除了在立法技术上注意之外，最根本的是观念问题。在观念上，应该洗刷掉包办的思想。这一点是应该由国民党来放大襟度的。”对于宪草上的“三民主义共和国”，他认为“在一个尊严的国家之上，还是少加些形容词的好”。

这种缺乏明晰主张的犹豫，一方面是国民党内高层矛盾的呈现，也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蒋介石的内心缺乏路线。相隔八年，抗战胜利后来到重庆的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曾对胡乔木等人说，“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还说过，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宪法不是用来点缀门面

1937年，对国民党承诺的宪政，知识分子既不乏批评也不无期待，毕竟这是代价最小的一条路。5月7日下午，北大学生自治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原来准备组织的“宪法研究会”，修改为“国民大会各科法规研究

会”。

5月23日夜，胡适读了张佛泉的《我们究竟要甚么样的宪法？》一文，忍不住也写了《再谈谈宪政》，认为两人见解很接近，他概述张的观点：“（1）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只不过是一种过程，这正是我当年立论的用意。我说民主宪政是幼稚的政治，正是要打破向来学者把宪政看的太高的错误见解。（2）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开始时不妨先从小规模做起，人民有力量就容他发挥，这也是和我的‘逐渐推广政权’的说法很接近。干脆的说，我们不妨从幼儿园做起，逐渐升学上去。”

他批评“现在的最大毛病就在不肯从幼儿园做起”，年满二十岁经国民宣誓即有选举国大代表资格，他认为这就等于“普选”了，“因为不识字的人也可以教会背诵公民宣誓的”。对于国大的规模，他认为初办宪政就搞一千四百四十人的国大，“这又是不肯从幼儿园做起的大错误”。

这一年，胡适、王云五等发起为张元济七十岁生日贺寿，吴经熊写了一篇长文《过去立宪运动的回顾及此次制宪的意义》，表达对商务印书馆和张元济事业的推许之后，他回顾了立宪运动的历史及这次宪法草案产生的经过和意义，他也清楚地知道，“宪法虽经颁布，人民未必即可唾手而获宪政的美果。宪政之能否实行，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一方面是关于负施行宪法责任者的，一方面是关于国民的。”

就前者而言，第一要有行宪的诚意，“宪法虽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他自己是不能实行的。”第二要有守法的精神，宪法不是用来点缀门面、粉饰太平的，其价值和效用全在于能见诸实行，“而能否见诸实行，则又大半系于执政者之是否能守法”。就后者而言，一是要认识宪法，二是要参加政治、督促政府，三是须有护宪的力量。“我们渴望将来的宪政能够成功。因此我们希望执政者和国民两方面均具有行宪所应具的条件。”（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

原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集的国民大会，以来不及筹备为理由延期至1937年11月12日召集，总算日期确定下来了，实施宪政的预备都在进行当中。《大公报》上不时有相关消息，比如，经各方反复讨论，此次国民大会的职权限于制定宪法及决定宪法施行日期。4月23日的社评为此感到高兴，认为国民大会“得以专心一志，郑重努力于根本大法之制定”。陶希圣认为各党参加国民大会问题，以至宪法问题，值得学界热烈讨论。透过《大公报》和《独立评论》等报刊，包括他和萧公权、张佛泉等学者的讨论文章不断。

陈之迈在《从国民大会的选举谈到中国政治的前途》文中尖锐指出，自1924年改组以来，“国民党便抛弃了议会政治的主张而采取了一党专政的理论。”他认为，“国民党要领中国走上民主之路，便应该切实开放政权，容许并保障反对国民党的政党之存在。”

可以说，宪政问题与对日问题、共产党问题是当时最受注目的三大问题，也都是关系着民族兴衰的要命问题，几个问题之间的消长起伏，最终决定了一个历史时段的走向。那些年中，《大公报》那班人、胡适等北大一班人和商务馆的《东方杂志》，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宪法和相关问题的讨论上，没有想到日本全面侵华的步伐越来越紧，这一切都要被中断。到1937年7月4日，胡适还在《大公报》发表《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他认为宪法里不可有一句不能实行的条文，比如宪草第137条规定“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在中央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区及市县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

而在当年的国家预算案中，教育文化费只占到预算总额的4.28%。难道宪法颁布之后就能每年增加那么多的教育经费？如果不能，则不可留在宪法里做一条具文。依此标准，他主张暂时把宪草里的第六（经济）和第七（教育）两章完全删去。又依此标准，宪草第五章（地方制度）的县长民选和市长民选两条，如果此时不能实行，也都应删去。至于国民大会职权中的“创制法律、复决法律”也决不是那每三年集会一个月的国民大会所能行使的，这一类空文也应该删去。这样删改之后，“五五宪草”大概可以成为一个字字句句可以实行的国家根本大法，可以做宪政的开始了。

这些讨论是认真、更是诚恳的，但此时离发生卢沟桥事变只有三天。当然，即便在7月7日之后，战火已烧起，7月18日出版的《独立评论》还在发表陶希圣《国民大会的一个解释》和王赣愚《整军与我国宪政前途》等文章。

第二篇 台湾官方拟公开戒严时期史料

撰文 / 杨素

为深化转型正义、促进人权发展，台湾“文化部”部长龙应台日前宣布，将向“行政院”争取，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或“匪谍”审判为罪名的相关行政公文、判决书等档案，整理后开放，并提供研究，呈现“以受难者为核心”的历史拼图全貌。

事实上，台湾在戒严时期，许多以“叛乱案”、“匪谍案”为名的政治案件，都面临侵害人权、不当审判等严重问题，造成相当多冤假错案及历史悲剧。因此，台湾于解严后即设立“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对有问题案件进行补偿，该基金会于今年9月依法定期限宣布解散，累积一万零六十七件卷宗，数量相当惊人。

在龙应台争取下，这批卷宗已移交“文化部”保管。她认为，这批档案的公布等于“让历史见到光”，也使台湾在人权路上更往前一步。相关消息传出后，也获得外界不少好评，认为是对受害者及家庭争取正义的一种正面响应。

戒严时期的不当审判

1949年，国民党转进台湾，两岸从此陷入紧张对立僵局长达数十年。但事实上，为戡平共产党绵延不断的攻势，肃清在台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以便于统治，国府早在1947年7月即下令总动员，让台湾进入非常时期，导致多次民变发生，例如“2·28”事件、四六事件都是在此背景下爆发而酿生悲剧。

1949年5月，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更宣布全台戒严，严格限制大陆人士入台，使台湾步入戒严时期，长期笼罩在党政军体制压力之下。尤其1950年韩战爆发，蒋介石重新获得美国支持，为建构威权体制，国府更透过《戒严法》、《刑法》“内乱罪”、“惩治叛乱条例”与“检肃匪谍条例”等法律实施高压统治，因而导致非常长时间的“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时期，不光台湾人，许多来自大陆的外省人士也成为监控、打压对象，特务与军警势力横行，以肃清“匪谍”为由，任何人随时可能因为政治因素而惹祸上身，造成严重的压抑与恐惧，甚至食不知味，睡不知觉。一如知名学者殷海光所言，人们对岛上“无所不在的恐慌，都有了种近乎非本能的反应。”

由于基本人权根本无法得到法律保障，加上军法、司法单位高度操控，不少人以“叛乱”罪名被逮捕、拘禁、审问和处罚。甚至接续病故的蒋介石，在蒋经国前出任台湾领导人的严家淦，因年轻时曾遭指控检举，其政治侦防档案“类别栏”竟出现过“匪嫌”字样。大学时期曾参加地下党读书小组的李登辉，也曾因“附匪”罪嫌而遭长期监控，甚至忧心因此获罪。

直到1987年解严，废止“惩治叛乱条例”等法律，长达数十年的白色恐怖时代才告结束。不过直到李登辉执政末期，台湾在野力量展现政党轮替的架势，加上李登辉协助，先通过“‘2·28’事件补偿条例”；随后，包括民进党与当时许多蓝营人物也纷纷呼吁国府正视白色恐怖伤害，比照“2·28”给予补偿，查明真相。

1998年，台湾“立法院”制定“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与“案件补偿条例”，正式开始不当案件实质补偿作业；凡戒严时期触犯内乱、外患罪或匪谍案经判决有罪或裁判交付感化确定者均可申请，基金会依案情审酌，除认定叛乱“确有实据者”外，均可给予适当补偿；失踪、死亡最高可获600万元台币补偿，监禁超过十八年半以上可补偿590万元台币。以给予政治受难者某种程度的平反与救济。

只是经过15年时间，基金会结束业务后，仍有1500名受难者未提出申请，这些个案有的是被枪决的老兵，有的家属在大陆或根本没家属。更有亲绿团体批评基金会只着重补偿，反而部分由“国防部”主管档案仍受限《个资法》不得公开，无法进行完整调查报告，因此受害者根本没有得到真正平反，真相仍未明。

受难者质疑真相未明

虽有了金钱补偿，甚至台湾历任领导人道歉，但许多受难者家庭的不满其来有自。

首先，档案繁浩却迟未能公开；其次，原本依《戒严法》规定，戒严时期犯“内乱外患”等罪者，解严后可依法上诉，但偏偏推动不当审判案件补偿机制的同时，“立法院”提前通过《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剥夺政治犯解严后上诉的权利，导致政治犯“叛乱罪名”未能得到平反，无法透过公开审判过程厘清真相与责任。

更让国府难堪、理亏的问题，则出在蒋介石的责任追究上。例如戒严时期政治案件为速审速决，基本上都会交付军事审判，军事审判结果则须上呈军事长官核覆；往往是上签呈给“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核

定，跟着是“总统府”内秘书长与参军长核阅。各方加注意见后，最后上呈蒋介石核定。

试问，以当时将领导人置于台湾之上的思维，甚至曾有因蒋介石不满军事审判官判决，因而要求惩处审判官的案例，又有谁敢违逆蒋介石核覆的指令？因此他的裁示，便形同于实质的终局审判，如何确保审判的独立性？

换言之，蒋介石以台湾党政军领导人身份，在核覆流程往往扮演最关键角色，稍有不慎，就可能因不当、不法的作为，使人权受到戕害。

以1960年雷震案为例，拘捕时不交出拘票，仅以“叛乱嫌疑”四字就予以逮捕；宣判前、还没到核覆阶段，蒋介石便已召集“副总统”以下14名要员商议处理腹案，最终蒋介石裁示出“刑期不得少于10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等指示，形同违法地干涉、介入审判；最终雷震也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被逮捕，并被军事法庭判刑十年。当然所有法律与政治责任都须由蒋介石承担。

又如台北师范学院学生陈正宸因叛乱罪嫌被捕案，初审判决无罪，却被蒋介石下令发还严为复审，前后来回驳回四次之多，直到陈正宸被判处死刑为止。更别提其他案件也曾出现蒋介石在公文中亲批，“凡判处十二年以上徒刑者一律改处死刑”；“凡已入匪党而不事先自首者，不得赦免应处极刑为要”的记录。

这些问题不仅是一般升斗小民面临威胁，孙立人、吴国祯、雷震的殷鉴不远，任哪一个都曾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却要遭遇非法的不当迫害。国府抓不到吴国祯，却以包庇匪谍知情不报为由，将吴手下财金大将、台银董事长任显群下狱。作家柏杨，被视为小蒋旗下笔杆班底，却因翻译一篇幽默漫画，被视为影射蒋氏父子，以共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等罪名判处12年徒刑，送绿岛监禁。

甚至这些对于效忠领袖的监控与非法打击，还延伸到国民党军队当中，让多名将领因此蒙冤遭不当审判，甚至枪决。例如黄埔军校一期、曾获青天白日勋章的名将李玉堂，因妻子与中共地下人员有所联系，未经合法审判便遭秘密逮捕后被处决。出身黄埔二期的台籍将领李友邦，也系因遭人诬指涉及蔡孝干匪谍案，“包庇窝藏中共间谍”，因而被枪毙处死。

同样出身黄埔一期的“总统府”参军徐会之，1950年涉嫌叛乱，原被判刑5年，然老蒋却在签呈亲批“应即枪决可也”，但遍翻国府法规，没有一条法律允许“总统”可对被告变更原判决而直接加刑，因此蒋介石不

但触法，更为实质的是不当审判。

类似问题的恶化，恣意妄为地偏离法治程序，当然是出在案件未循正常程序均交由军事法庭负责审判的做法上。事实上，一直延续到解严前，包括引发国际高度争议的1980年美丽岛事件大审，都明显刻意忽略法律“除现役军人以外都不受军法审判”的规定而便宜行事。

尤其难以置信的是，国府于1948年12月10日宣布所谓的“全国戒严令”，当时台湾并不包括在戒严范围内；直到来年11月才透过“行政院会议”决议将台湾划入戒严接战地域。不过当时蒋介石已下野，李宗仁赴美，竟没人完成“总统宣告”程序；就算是陈诚宣告台湾地区局部戒严，也须依法由“立法院”追认，但也未有此一记录，兵荒马乱之际的决策，让人啼笑皆非。

公布档案计划路仍迢迢

基本上，这批移交“文化部”的卷宗，分为行政公文、历史文件两类，其中，历史文件包括判决书、自白书、案卡都属复印件；正本保存机关包括档案管理局及“国防部”等。内容包括病例、指纹、血型、身份证字号、护照号码、兵籍号码、出生年月日、地址、电话等数据，开放前需要逐笔进行遮蔽，保护个人隐私。不过受难者的判决书数字化部分，“文化部”则规划在两个月内让逐字档上网公开。

至于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及公开历史信息间达到平衡，目前仍待细部规划，龙应台表示，绝对会注重个人隐私，不会让当事人及家属受到二度伤害。此外，当前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卷宗，在新庄部本部库房建置恒温恒湿设备；接着则是重新分类、汇整、编目、排序、装订，相关整饬作业预计2016年完成；并在合法、建立完整制度的前提下开放，提供民众网络申请使用。

一如那句老话，“谁掌握了过去，便控制未来”。对历史的回眸、弭平伤口的努力，真是如此重要；或正如龙应台所说，“每份卷宗，就是一个人的一生蹉跎，一整个家族无可弥补的悲剧”。“也唯有打开档案，直视历史，台湾社会才能真正地抚平伤口，走向包容”。

第三篇 台湾左翼书刊查禁史

特约撰稿员 / 王彦晨

国共内战结束，迁台之后的国民党政府检讨内战失败原因，认为大陆失守与文艺阵地失陷有很大关系。为防止共产主义思想入侵，遂在台开始大力扫除左翼书刊。因追求百分百言论自由而自焚的郑南榕与曾经一时风起云涌的党外杂志，都与此背景有关。

图书查禁的时代背景

台湾光复初期的1945年到1949年，民众开始接触大陆传来的中文图书，如国语读本、科学新知、实用技术等，也包括章回小说、武侠小说和连环图画，左翼思潮书刊也在此时传入。

根据台湾国史馆协修蔡盛琦的研究，除了日治时期就有的左翼文学和思想，外省左翼知识分子如王思翔、周梦江、黄荣灿、朱鸣冈等人来台，也对这一股左翼思潮推波助澜。

这批大陆来台知识分子大致归为几类，其一是随陈仪接收政权抵台的“记者团”成员，如“中央社”记者叶明勋、《大公报》记者李纯青等；其二是如黄荣灿、朱鸣冈等木刻版画美术工作者和为谋职而来的雷石榆、楼宪等抗战期间活跃的文艺人士。最晚抵台的是台湾省编译馆的许寿裳以及受他邀聘而来台助编的“未名社”成员李霁野、李何林等人。

战后的台湾思想解放，《三民主义》一时间人手一册，但同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都被视为建设的蓝图；可惜现实社会的挫败令知识分子转向，鲁迅随即成为文化界的新标竿，而描绘社会底层的木刻版画，生动地叙说着民愤，也让多数不谙中文只懂日文或文盲的劳动大众颇生共鸣。

鲁迅文学作品在战后台湾是公开推广的。很多台湾知识分子战后读中文都是由中国1930年代作家如郁达夫、茅盾、沈从文等人开始。其中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始会员，1947年东华书局策划出版“中国文艺丛书”的杨逵曾说，当时很多团体走入地下和共党接触，但他不愿意也不想离开台湾，才翻译鲁迅、老舍等人作品，且中日文对照，以求读者能接触先进作家。

50年代国府开始大举查禁图书，依据最多的是戒严法中的“为匪宣传”，另如“匪酋匪干及附匪分子著译作”、“匪伪书店出版社出版”和“匪报刊载之文章”等，也都是主要查禁理由。

大网一撒，举凡巴金、老舍、田汉、曹禺、李广田、丁玲、胡风等人作品均在查禁之列；另如何公超的《青年书信》、王琼编的《最新应用文手册》，只要内容有一篇是符合上述标准的，均在查禁之列。

例如在合集或丛书中，只要转载或摘录有“附匪分子”，同样会遭到查禁。即使是许多声誉卓著的鸿儒硕学，一旦人留在大陆，如史学界的陈寅恪，哲学界熊十力，文学界钱锺书、郭绍虞等人，他们的著作都一律被认定为“匪书”。

战后在台湾出版的左翼图书以中日对照的文学作品为主，其他图书则是仰赖进口，在40年代的台湾各大城市书店中，甚至可见到马列的经典，知识分子也被诱发出强烈的求知欲。

专卖左翼进步书刊的书店，如黄荣灿的新创造出版社，后来则改成三联书店“台湾分馆”。三联书店北京总店负责人黄洛峰则派中共党员曹健飞来台，曹本人曾表示，他1947年1月来到台湾新创造出版社，开始由上海进口中文书贩卖，生意兴隆，但不久二二八事件发生，书店有人监视，查抄书籍也雷厉风行，外地书常收不到，不久即奉令自行停业，而在11月时关歇。

到1948年时，左翼图书仍大量进到台湾。若干大型书店如上海永祥印书馆台湾分馆、东方书店台湾分店、经纬书局台湾分局等出版的图书，许多日后都被视为左翼或“附匪”的出版品。

1950年6月13日国府颁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计十五条条文，将共党以外的“叛徒”和“叛徒”勾结的人等一律纳入，展开“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左翼分子。据估计从1950年到1954年，在台湾展开的政治肃清有3000人以上遭到枪决，8000人以上遭到刑期监禁处分。后来政治案件才逐渐减少。

在这些庞大数量的逮捕案件中，许多就是以“阅读”、“私藏”、“销售”“反动”书刊罪名被捕。叶石涛1951年因“知匪不报”入狱，判刑5年，坐牢3年，原因是战后他曾和一位台共人士来往，并向他购买“匪书”，因而致祸。叶石涛曾说，光复当初，台湾知识分子连什么是“中共”都不知，又没有任何禁令，哪本书可读，哪本书不可读，谁又能判断？

掌握图书查禁主导权的“第四组”

查禁图书的机关，违反“出版法”由台湾省政府查禁，违反“戒严法”由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查禁，但实际上，背后是由第四组主导。

所谓第四组，指的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四组。中改会在1950年8月5日成立，成为当时国民党中央最高政治决策机构，过去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交到第四组手上，首任主管是曾虚白。

第四组一般直接发文给机关单位，要求执行销毁和取缔工作，而执行的相关行政部门也常有请示决策的公文。第四组在刊物检查和查禁中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组除了直接发文指示查禁工作，也有权订定执行标准和规范。1950年代蒋中正在“总统府”组成“宣传会报”，每周召集一次，成员也由蒋中正指定，会报由他亲自主持，会中的报告经蒋批示，也成为国策依据。

1952年“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后，“中央委员会”第四组在查禁书刊上仍掌握主导权；1955年马星野出任第四组主任时，蒋虽不再主持宣传会报，但仍非常重视，故在第四组之上设宣传指导委员会，由黄少谷任主任委员。第一线由保安司令部执行，但第四组则在决定和解释权方面有不容轻估的话语权。

一般而言，查禁对象都是指向书店、书报摊、租书店和租书摊等，而学校和图书馆则是以公文命令方式，直接下令撤架处理。

不过图书馆内的禁书事实上一直存在，并未完全销毁，1954年还发现有胡汉民讲演集《国民党的真解》在流传借阅；1955年因为各机关和学校图书馆中仍存有不少1949年以前的大陆出版品，当时曾有一波图书馆自清运动。到1956年，保安司令部还发现台湾省各大小图书馆仍存有1945至1949年间的大陆出版杂志、报纸。

台湾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曾任《中国时报》社长的王健壮在读高雄中学时，就曾在学校图书馆发现闻一多、陈独秀等人的被禁图书。

被查禁的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的查禁起于1959年的“暴雨行动”，专门针对坊间流传的武侠小说展开扫荡禁察。1959年12月31日由警总负责执行，台北市于1960年2月15日出动大批官警，分为229个小组检查，光是一天就查获48052本，16日又继续查获14521本。

15日到17日3天的时间，全省各地同步取缔所谓的“共匪武侠小说”97种12万多册，许多武侠小说出租店，几乎“架上无存书”，而“查禁图书目录”所列“暴雨项目查禁书目”也多达400多种。

以还珠楼主的各式武侠小说为例，从1951年起几乎每年都会列入查禁名单，光1955年被查禁的《蜀山剑侠》就多达50集，一旦被查禁，对租书业影响很大。

早年台湾武侠小说在1945至1949年由大陆进口到台湾，在一波波查禁后，几乎被扫尽一空，但后来则被台湾的翻印本所取代。例如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在1957年7月13日查禁的是香港的版本，但到1958年查禁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已是台北的出版社出版。也有的武侠小说虽在香港连载出版，但被查禁的则是台湾翻印版，而非香港传入的版本，例如《风虎云龙》《域外屠龙录》《关西刀客》。

这些翻印版本的武侠小说非常受欢迎，书商往往改个书名和著者，再翻印上市，例如1959年查禁的“玉郎”作《箫声剑影》，其实就是金庸的《碧血剑》。

有的武侠小说作者虽然有名也受欢迎，但还不到“暴雨专案”，就先因陷“匪区”而被列为“匪书”。如专写武侠小说的作家郑证因，他的武侠小说在租书店到处可见，但到了1954年确定他人在上海，才开始下令查禁。

连环图书、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是租书店三大支柱，由于被查禁的书目往往都是受欢迎的类型，租书店因此还被当局要求以联保方式杜绝租书业出租“利匪”书刊。1954年查禁郑证因的七种武侠小说，租书店内几乎一扫而空，当局顾及一般业者生活起见，只好分阶段查禁，先将1949年作者“附匪”后出版书籍一律收缴，半年后再将1949年以前所出版的书籍全部查禁。

租书店另一类畅销书是言情小说，以张恨水为代表，他的小说被归为鸳鸯蝴蝶派，全以章回小说体例写成，作品多达100多部，在1920到1940年代流传最广，后来还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但全部被查禁。

当时所谓“附匪分子”的作品，除了人陷大陆，不管内容一律查禁，金庸人不在大陆也不算“陷匪”，但因为他在香港撰写武侠小说，在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晚报》连载，就也算上“附匪”；田风的《域外屠龙录》、锺文泓的《风虎云龙》和牟松庭的《关西刀客》，这些武侠小说都因曾在香港《新晚报》及《文汇报》左翼报纸连载过，所以都被查禁。

一个世代的思想断裂

从《查禁图书目录》中可以看出每年的查禁种数，1951年台湾省政

府和保安司令部共查禁26种图书；1952年两单位查禁的图书为146种；但1953年的记录只有一本《儿童环游世界记》。

由于1945至1949年间由大陆流传到台湾的“匪伪”图书大都被列入查禁名单，文学、小说、学术、休闲作品一空，不良刊物随之取而代之，包括一些黑色内幕新闻、黄色刊物填补空间，文坛一片混乱；1954年由台湾“中国文艺协会”发起的文化清洁运动应运而生，揭开“文化清洁运动”的序幕，扫除“赤、黄、黑”三害，禁书也正式分为三类。

但在文化清洁运动下，1954年虽查禁了98种，但种类没有因清洁运动有太大变动，而整个文清运动也在内部象征性惩处10种期刊后草草结束。

根据蔡盛琦的研究，整个1950年代既是国府迁台后的第一个10年，也是文化检肃最激烈的10年，大环境在白色恐怖和恐共气氛下，大规模逮捕左翼人士，更使得查禁图书不仅是文化场域的肃杀，也成为统治者藉此巩固政治权力，企图重建国家秩序的举措。

主导的第四组是文工会的前身，其所编印的《宣传周报》中，可以见到查禁范围之广，几乎1930年代的出版品一网打尽，它管制的不仅是阅读的自由尺度，实际上查禁的是书中的思想和知识。第四组所操控的模式是：一面查禁有碍政治思想的图书，一面引导创作和阅读。

特别的是，有些反共小说也在查禁之列，如孙陵的《大风雪》，因描写九一八事变的哈尔滨，生活崇尚俄化，多使用“共匪”词汇而遭到查禁；穆穆（穆中南）的《大动乱》，因“结构以‘匪党’叛乱为经，以政府失败为纬，对白部分对‘匪’近于夸张，对政府有落伍征词”遭查禁；以及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因“挑拨阶级仇恨，暗示颠覆政策”被查禁。

1952年查禁铁风出版社的《三民主义问答》，原因令人啼笑皆非，其打印方式由左至右排印，有违总裁“中文应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书写”的训示，就遭查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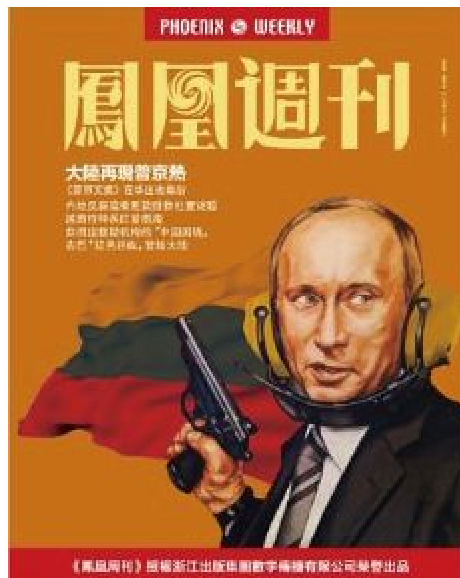
总之，1950年代的图书查禁，影响最深、手段最严、打击最广，其不仅反映统治者大陆失败后高度掌控社会的无所不用其极，同时表现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杀一人的作风；由庶民的角度，不仅可能因言祸，即使并非作者、出版商等文坛中人，也可能因为错读、错买而惹祸上身。

伤的也不止是文化、知识，更是一个世代的思想断裂。它奠基在反共抗俄为全民中心的背景下，但缺乏言论思想自由的社会，是否迈向国

家长治久安的必经之途？此举宰制文学发展、剥夺学术自由、切断思想传承，一直到1987年解除戒严才结束台湾漫长的图书查禁历史。

(本文根据蔡盛琦的研究采写而成)

精彩推荐：《大陆在线普京热》



点此阅读

第四篇 台湾特工香港出书内幕

特约撰稿员 / 李舒宁

2012年6月，台湾特工庞大为因在香港出书披露谍战内情，涉及台湾如何获得大陆重要情报等机密内容，被台湾司法机构以泄露情报资讯罪判处三年半徒刑。

庞曾任军事情报局第六处副处长，负责策反、反间、心战等业务，任内曾用化名“王宝元”两度潜入大陆，2000年以上校官阶退伍。2009年起，他用笔名“庞家均”撰写《台湾军情局高官回忆录——情报札记》，隔年在香港出版。该书披露其早年潜入大陆策反解放军少将刘连昆的个人经历，以及1996年台海危机时如何获得大陆“哑巴弹”的重要情报、陈水扁执政时期如何监听连宋等诸多内幕。

“把秘密带进棺材”曾是台湾情治界的一条铁律。但近年来，台湾情治系统退休高官相继出书，其中包括曾任“国安局”局长的丁渝洲，退役后出版个人回忆录，并未遭到司法侦办。但2007年，萧台福撰写《情报生涯三十年》，出版时却遭司法单位查扣，原因是他在书中批评，“国安局”局长多数是现役上将由军职转任，个人意志强烈，是情报工作的大灾难。

庞大为此前因在岛内出书已经获刑1年零6个月，缓刑期间再次不顾后果，出书放言，触犯圈内禁忌，根源或在于岛内政党轮替后“情报生态丕变”，在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治过渡时，情治系统水土不服，陷入系统性危机。

“少康专案”

庞大为，1948年生，河北人，毕业于军情局情干班十五期。军情局十五期出了不少战将，包括台湾前“国安局”副局长王西田、前军情局香港站站长叶炳南，都与庞大为同期。庞大为曾先后三次被派驻香港，在香港活动逾十年，另又曾派驻菲律宾与加拿大等地从事海外情报工作，情报生涯中三次荣获“国军楷模”称号。

情治圈人士说，庞大为在军情局任职时，绩效相当好，也是军情局迁台后，唯一一位成功策反大陆现役将领的情报员。庞大为自己也曾说，他与中共国安情报部门斗争30年，最后不是上中共法庭，却上了“中华民国”法庭，实在令人唏嘘。

庞大为情报生涯的高峰，就是参与“少康项目”，却也因该项目埋下日后与军情局决裂的火种。他所任职的军情局六处，负责对大陆进行策反、心战谋略与反间工作，是军情局极重要的单位。庞大为任职该处副处长五年余，为“少康项目”的实际承办人。其所承办策反的刘连昆少将（代号“少康二号”），曾任职解放军后勤总部的军械部部长，也是军情局策反工作中军阶最高者。在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少康二号”提供台湾大量情报，后遭大陆判处死刑。

1990年代，庞大为担任军情局六处副处长时，曾用化名“王宝元”两次潜往大陆，与刘连昆晤面，是军情局唯一见过刘连昆的高阶干部，也是军情局派进大陆职位最高者。

两人首次晤面在1992年11月。时年59岁的刘连昆于25日从北京搭火车南下，27日凌晨5时抵穗，住进广州东方宾馆。同一时间，军情局派庞大为上校化名“王宝元”，以少将名义入大陆，与刘连昆晤面。11月27日上午10时，透过已经替军情局工作年余的解放军大校邵正忠（代号“少康一号”）介绍，两人在越秀公园见面。

刘连昆有备而来，主动告知庞大为，他已想好化名，叫“刘明”，取其“留名”音意。不过，军情局于策反成功后所呈给参谋总长刘和谦上将与前“总统”李登辉的大签，刘连昆的正式化名是“高至明”，代号是“少康二号”。其待遇比照国军少将，每月月薪给3500美元，情报奖金另发，

退休后由军情局照顾生活与福利。

这次晤面，庞大为代军情局赠给刘2万美元做为见面礼，刘则“回赠”12件中共军委机密文件。自此，刘连昆成了军情局最高级的内线。

1994年，刘连昆退役。军情局于当年12月5日，再度派遣庞大为入大陆与刘晤面：一是物色接班人选；一是建立战略情搜方向，并加强预警情报。

由于军情局约聘人员李志豪的“背叛”，庞大为这次甫入广州即遭中共国安部门跟监。为摆脱盯梢，二人晤面延迟了一小时，见面后，庞交给刘10万美元支票。因刘连昆在家翻拍文件照片，被妻子撞见，大吵一架，这笔钱系军情局出资，让刘在北京另外置屋，专属工作之用。

这次晤面后，刘连昆继续为军情局服务，并且在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输送了极具价值的战略情报。当年3月，大陆在台湾“总统”大选时发起军事演习。根据刘连昆提供的情报，演习的底线原先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员潜舰、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解放军编列了40亿人民币以上，约合台币近200亿元，规模惊人。

台湾开始展开反制的军事部署，美国也表达强烈关切，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中共高层担心爆发大战，立即下达“三不原则”：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这些讯息，透过刘连昆即时提供，让台湾领导人“老神在在”，顺利完成选举。

发愤著书，二度判刑

刘连昆后来败露，于1999年被大陆处死，庞大为扼腕叹惜，唏嘘不已。2000年7月，庞大为在军情局服务满30年，以上校军阶退役，化名“王宝元”，开始著书。

2001年底，庞大为写完第一本书《情报作战纪实》，约有400页，分为三卷，依序为情战忆旧、缅北情怀与心得感言。书中约有100页篇幅，系撰写刘连昆事件真相与影响，他本人两次奉命前往广州与刘连昆晤面的经过，以及刘连昆失事探源与责任归属，为相当珍贵的第一手大陆情报工作资料。此外还有相当篇幅撰写其前后三次派驻香港和菲律宾的“往事”，并评论汪希苓、胡家麒与徐筑生等历任军情局长的功与过。

次年7月，庞大为接着写第二本《情报作战话题》。全书约450页，内容则属杂谈，约有60余页篇幅，谈军情局内部人事与干部素养问题，多以情报工作内幕、实例举证，内容“相当辛辣”，更屡屡为文针砭情治

圈内部人事倾轧，评论历任军情局长的功过毫不手软，并为此得罪情治高层。尽管有人拍案叫好，但庞大为违背“把秘密带进棺材”的情治铁律，却是不争事实。

事实上，庞大为这两本书并无引述任何机密文件，文章全属回忆，仅将其个人与菲律宾参谋总长的合照，以及刘连昆撰写的私人问候信函公开。只是庞大为记忆过人，加上平日有做笔记习惯，文章又夹叙夹议，其所曝内幕，比机密文件还吸引人。

但其第三本书《情报作战参考》，因2003年间“国安局”局长殷宗文病逝，系为纪念殷宗文任内功绩而写。庞大为在书中引用23件军事机密资料，更附上14件机密的签呈复印件，因此被依收集和泄露“中华民国国防秘密文书罪”，判刑1年零6个月，缓刑4年确定。

遭台湾法院第一次判刑后，庞大为坦承相关资料确实是机密文件，但他出书纯粹是纪念殷宗文，书中还附上挽联、祭文，以及纪念殷宗文的文章，只送给军情局内部人士，并没有图利外流。事实上，这些已编印的书籍，由于军情局介入，不曾对外发行，刊印份数相当稀少。

殷宗文是庞大为的上司，在任期间，对庞的确照顾有加。殷本来允诺让庞大为晋升少将，但庞因诊断出血癌，依规定无法晋升。殷得知后，派庞到加拿大情报站治疗休养，所有经费都由情治单位支付。

事实上，庞大为退伍之初，一度认为生命已近尾声，加上身体状况极差，为能延续生命，每半年须前往美国治疗，前后注射2000多针，全身能找到注射针孔的地方已不多了。庞大为拼命写书，最初动机是因血癌，才会在三年里写了六本书。

而情治圈人士认为，庞大为书中对军情局有相当严苛批评，对历任局长均不假辞色，且指名道姓地骂了几位军情将领的操守、人格与能力，加上他的反台独立场，才会“因文闯祸”。

知情人士透露，军情局当初为阻止庞大为出书，经过谈判买断版权，所以六本书均未对外发行，全让军情局收走。庞大为身边留的几本书，也只送出几本给前军情局局长余连发、戴伯特等人，“当时没事，事隔数年却以泄密罪判刑，目的显然是警告。”

不过，庞大为似未理会这种警告，在缓刑期间，他又整理自己《情报作战参考》等三书精华，另用笔名“庞家均”，2010年初在香港出版《情报札记》，书中内容除“少康项目”外，还包括资助接触大陆民运人士的“正文项目”、撤换前军情局局长沈世籍等内幕。

该书经送台湾“国防部”鉴定，认定泄露六项国家机密、一项军事机密，遂二度判刑3年6个月。其时，庞大为已患血癌多年。他并不认为自己泄露了什么机密，声称写书是为自己立碑，即使惹来风波，让有限的余生毁誉参半，也要留下纪念。

检讨刘连昆失事

庞大为著书大谈刘连昆事件，另有一层深意是为个人辩白，撇清其与刘连昆失事的责任。此前，台湾情治圈内部有人批评庞“贼喊抓贼”，直指刘连昆失事责任，系因庞大为出任务时犯下关键错误，以及军情局遭到双面谍李志豪误导。

对此，庞大为强调，刘案失事绝非他任务失败，其实当年刘案的相关承办人员都有责任。他的书中辩称，当年密赴大陆见刘连昆，大陆国安部门虽然派人跟监，但始终无法得知他要见谁，他当时察觉被跟监，顺利摆脱后，才得以见到刘连昆，一切过程都有回报检讨，当时军情局内部评估是处置得当，圆满达成任务。

“我在1994年12月见刘连昆，但刘直到1999年才失事，如果当时就已经事迹败露，刘连昆怎么可能还陆续提供重大情资给台湾？这样的案件对大陆国安官员而言，当然抢破头要争功，如果当时真有追查到刘连昆，怎可能全没有查办动作？”他说。

至于双面谍李志豪渗透到军情局泄密，（李志豪，香港籍，被判无期徒刑，目前在台湾军事监狱服刑），庞大为承认，军情局确实曾遭李志豪渗透，李是军情局秘密编制人员，后来被六处吸收。当时的六处处长是王鼎，庞担任副处长，不过，李志豪只负责二线部署，准备在澳门拱北关接应，并没有负责他在大陆的所有活动行程，要不然早就事迹败露。

庞大为强调，他在大陆出任务，行程都由自己安排，李志豪只知道他下榻的饭店；他自刘连昆处取得的情资，并不交由李志豪带出，而是交由“交通”张志鹏和另一位盛小姐带出，完全和李志豪无关。“怎能说我犯了致命错误？根本就是栽赃！”庞大为认为，只因他出书，情治内部遂全力打击他。

那次出任务，庞被跟监，军情局也因此事后揪出背后是李志豪泄密。至于刘连昆失事案，原因众多，当年李登辉对外释出“哑巴弹”机密，也曾被外界视为刘连昆失事原因之一。不过，庞大为表示，刘案泄密的公开源头是李登辉及其幕僚，但秘密源头却是军情局内部的共谍，

还有上海国安部门监听电话，意外破获刘连昆的情报网。同时，军情局内部曾有共谍殷伟俊提供给中共的情报，包括刘连昆提供的中共中央军委文件等机密资料，让中共有侦察线索和方向。

直到今天，庞大为都认为，如果不是台湾情治单位过度运用刘连昆，刘连昆身份就不会被识破。以刘连昆提供的情报价值，台湾早该见好就收，安排刘连昆安享天年，而不应为争取绩效，拼命压榨，直到榨干。

外行当道，痛定思痛

刘连昆事件是刺激庞发愤著书的主因之一。他在《情报札记》一书的开篇中激情表白，“2009年是刘连昆先生为台湾情报工作牺牲的第十个年头，介绍刘先生的事迹是这本书的主要意义，以示战友们对他的永志不忘。”

据其友人透露，庞大为之所以退休著书，一是为彰显无名英雄事迹，另一原委即是他认为军情局没有让刘连昆“善终”，接办官员为了升官拿大笔奖金，没有及时收手，把刘连昆“用到干为止”。

在其所著《芝山春秋》（未公开出版）一书中，庞大为透露，除1996年中共台海军演的关键情报外，刘连昆还提供了中共军力部署重心移向东南与印度、中共潜舰潜伏台湾海域、中共于沿岸部署俄制防空飞弹等诸多重大情资。前“国安局”局长殷宗文本希望刘连昆工作三到五年即“退休”，让他得个“善终”，但军情局接办官员不但“抓着不放”，而且非常“外行”，情战指导能力有限，犯下更改“交通”和代号、派人到北京与刘连昆晤面等一连串错误，导致刘连昆失事。

该书还指出，刘连昆于1999年3月初被捕，军情局在4月上旬又派“交通”杨铭中入陆联络，一周后随即失事，杨被判无期徒刑。军情局均未立即处置，致一个月后的5月中旬，中共又破获敌后情报员吴某，并予判刑六年。庞大为痛批军情局承办人员“麻木不仁”，如此接连失事，承办人员却于同年6月升任军情局执行长并晋任少将。

庞大为指名批评军情局，要求追究责任。在另一本《芝山风云》中，指名道姓，直斥这些搞垮“少康专案”的后辈。而在《情报札记》中更痛斥陈水扁当政八年，“严重破坏了情报工作的伦理制度，工作精神沦丧，成效退步，士气低靡”，情治系统“人心失落，忠信荡然，以至恩义断绝，令人痛心疾首”。

鉴于当前台湾“情报领导阶层胸无大志，素养不足，得过且过”，庞

大为寄望于政党轮替后，马英九对情治单位进行改革重整。而《情报札记》一书，或许能刺激台湾情报工作者痛定思痛，重拾战力。

第五篇 揭秘台湾情治系统十年内斗

特约撰稿员 / 李舒宁

台湾的情治系统，主要是延续大陆撤退前的中统与军统。中统由陈立夫主导，并有所谓的ＣＣ派，退到台湾后，参考美国联邦调查局组织，转变成调查局；军统则是由戴笠主导，来台之初称为保密局，后又改称情报局。

1984年“江南案”是台湾情治界的一个分水岭。情报局因为派台湾黑社会帮派分子赴美，刺杀写《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被改制为军情局，不再做暗杀活动，转而专责大陆情报工作。而早期以对中共斗争与政治侦防为主要职责的调查局,也转而以岛内为主， 着重进行贪污、渎职、逃漏税等经济犯罪侦防。

2000年政党轮替后，调查局因兼负政治侦防与经济犯罪，与岛内政情息息相关，受到扁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时隔不久，调查局即卷入洗钱弊案风波而颜面扫尽。其“上级指导单位”“国安局”遂取而代之，坐稳台湾情治系统的龙头。

“国安局”成立于1954年10月，局本部设在台北市阳明山仰德大道110号。设立之初，主要是为了配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台的活动，督导和协调军情局、调查局以及宪兵司令部、总政治作战部、警总等单位的情治工作。

作为台湾最高情治机关，“国安局”名义上隶属于“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简称“国安会”），但实际长期为军方所控制，其预算由“国防部”参谋本部编列，人事安排也必须经参谋总长同意，而且，“国安局长”都由现役将领转任，一般由二级上将担任，下设3名副局长，均为中将级。

2002年3月，“国安局”曝出“国安密账”，高达35亿元新台币的秘密经费在岛内惹起轩然大波，“国安局”两任局长殷宗文、丁渝洲皆因“未落实秘密账户稽核管理机制，且对属下管理疏忽，犯有严重过失”而遭弹劾：殷宗文被迫请辞“总统府”资政、丁渝洲请辞“国安会”秘书长。陈水扁旋以亲信邱义仁接任“国安会”秘书长。

邱义仁是民进党创党十八人小组成员之一，也是陈水扁“总统”选举的操盘手，地位举足轻重。陈水扁让他入主“国安会”，意在政党轮替后插手操控政治上偏蓝的情治单位，由此引发了台湾情治系统的新一轮恶

斗。

邱义仁入主“国安会”

邱义仁操控情治单位的一个主要动作，是在“国安会”与“国安局”之间成立“606项目”。该项目启动于2004年6月6日，因而得名，本意是整合台湾战略情报与情搜系统，减少两边的落差和情报资源的浪费。

然而，在岛内蓝绿相斗的政治大背景下，该项目纳入官僚系统运作之后，却完全变调了，不但在情报运作上没有发挥功效，反而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成为台湾“国安会”有意掌握“国安局”运作的权力游戏。

“606项目”第一次开会在阳明山麓的“天籁温泉”会馆，“国安会”与“国安局”一级主管都到场，时任“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向“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输诚表态以保官位，意味着“安全局”这一政治属性深蓝的机构向绿营执掌的“国安会”效忠，同时也正式宣告“国安会”将指挥权力伸入到“国安局”的情报运作之中。

紧接着2004年9月1日，江泽民请辞军委主席，这是最近十年来仅次于邓小平去世的最重要的情报。“国安局”栽了个大跟头，不但没有掌握到这条大情报，而且分析错误，于事实已经发生一周后，竟还告诉“总统府”“江泽民明年才会交出军权”。

曾经，台湾是对大陆情报作战的第一把手，是中共情报的国际权威，美国之所以与台湾交换情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台湾的大陆情报做得够权威。此前关于邓小平健康与去世的情报，美、日情治圈都要靠台湾证实，如今“国安局”却沦落到江泽民交卸军委主席，不但“后知”，甚至还“误判”。一波情治内斗，已是风雨欲来。

“国安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进一步插手“国安局”。9月17日，星期五，“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召开机密会议，会议内容是针对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进入胡锦涛时代的情势分析。“国安会”副秘书长王西田在会上发言剀切，直陈“这个事情很严重”！散会后，王西田还追着邱义仁“报告”，强调“国安局”漏失这种大情报，一定要检讨惩处。

会后，邱义仁随即晋见陈水扁。两人是例行会面，固定在周五傍晚5点到6点。陈水扁每周一下午与“国防部长”会面，周三是“国安局长”，周五则是“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有没有听进王西田的话，建议陈水扁检讨惩处“国安局”，外人无法得知。

不过，事后来看，陈水扁并没有公开惩处“国安局”，却藉此事件让邱义仁在情治系统内“遍地插旗”，深度插手偏蓝的情治单位。

邱义仁伸进情报圈，其第一个“情治盟友”，“指拨带路”的人，就是历任军情局处长、“国安局”主任秘书的王西田。“国安会”有近30位编制内的正、副、助理研究员。邱义仁授权副秘书长与咨询委员，每人自行找三至四人。王西田是前“国安局”局长殷宗文的得力助手，他从“国安局”调了三个人，加上殷宗文原来的办公室主任，这个以王西田为首的“五人小组”，就成了邱义仁了解“国安局”运作的“小雷达”。

起起落落王西田

王西田，彰化县人，军情局干训班十五期毕业，为情治圈极少数科班出身的本省籍人士。王西田曾任军情局驻马来西亚站站长，后调芝山岩军情局本部，负责东北亚情报工作。他在情治圈被视为殷宗文人马，在殷宗文任军情局长时即蒙提拔，直接操作刘连昆的“少康一号专案”；1993年殷宗文由军情局长调任“国安局长”后，仍然把王西田拉到“国安局”任二处处长，负责刘的专案。1996年台海危机前后，刘连昆的情报让台湾与美国情报系统刮目相看，王西田因功晋升中将。

王西田晋升中将过程，是“国安局”一大悬案。其时殷宗文转任“国安会”秘书长，接任的“国安局长”丁渝洲在上报的该波升任名单中原有王西田，却因“国防部”有将官员额管制，在最终阶段把王西田刷掉。老长官殷宗文出面，“国安局长”丁渝洲找参谋总长汤曜明讨论，最后是上大签给李登辉核定，由李另行发文将王西田升中将，而王也由一处处长、主秘、驻美特派员一路升至“国安局”首席副局长。

事实上，王西田熟悉大陆与美、日等情报工作，是台湾情治界中最具实务经验者，但争议性也最大——李登辉时代的“明德项目”，以及用金钱收买美日政客的“国安密账”丑闻，王西田均是参与要角之一。

2004年，薛石民担任“国安局长”，王西田被“高官送客”，请去“国安会”担任副秘书长，二人遂结下梁子。王随即倒向邱义仁，成为邱义仁了解“国安局”运作的“先头部队”。不过，王西田带枪投靠行径，也在情治圈引发议论，遭致诸多打压。

扁政府的历任“国安局长”，包括丁渝洲、薛石民、蔡朝明与许惠佑，都忌惮王西田，也都出手动过王。有报道说，大陆方面在破获刘连昆案后，深知对大陆渗透最力的灵魂人物就是殷宗文与王西田，不断放出王西田已为大陆吸收的反间情资，并透过台湾的情报系统传到层峰耳

中。时任“国安局长”的丁渝洲针对王西田做了两次测谎，王因心血管疾病两次测谎都没有通过，时任副局长的韩堃还一度要对王进行监控，但在“国安会”秘书长殷宗文力阻下，才没有进一步行动。

如果此说属实，大陆方面的反间计显然奏效，王西田以情战立功，此后始终无法更上一层楼，每任“国安局长”都借此进行权力斗争。薛石民干脆把他逐出“国安局”；蔡朝明任局长期间，因担心王接替他的位置，甚至还对王抄家，清查王的接触对象、银行账目，并且不让王再接触对大陆情战布线的机密事务。

“国安局”内设6个处：一处负责海外，二处负责大陆，三处负责岛内，四处负责战略情报，五处负责科技情报与电讯，六处负责密码的管理、研究。许惠佑到任局长后，不让熟悉大陆与海外情报工作的王西田与闻机要，只让王督导四处，负责“公开情报”工作。所谓“公开情报”，就是媒体舆论、网络等公开信息，却具有情报价值者。情治圈曾有人戏称，“王西田在“国安局”只负责剪报工作”。

王西田因为是由“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指派回“国安局”任首席副局长，随时有可能取代许惠佑出任局长。许再次翻出旧案，以“叛国罪嫌”对王西田实施情报监听，更把王西田由“国安局”首席副局长送到“国安会”当咨询委员。王西田曾任“国安局”主任秘书，后调升“国安会”副秘书长，再升任“国安局”副局长，如此经历，降调“国安会”咨询委员，震撼情治圈。尽管王西田职位起起落落，但加起来前后四任“国安局长”，硬是没有扳倒，就是因为王西田背后有邱义仁力挺。

由于王西田等人的带枪投靠，加上“六０六”项目的运作，让邱义仁在“国安会”秘书长这个职位上，成为半个情报头子。他不仅听取情治单位特别是“国安局长”的重大情资报告，而且每半年一次，主动到“国安局”与决策情治官员开会，下达未来半年的情搜指导要项指令。换言之，“国安局”的老板不再是“总统”，“国安局长”不再只是对“总统”一人负责，“国安会”秘书长也成了“国安局”的“上级指导员”。

历任“总统”都是“情报头子”

除了现任“总统”马英九外，台湾历任“总统”都是握有实权的“情报头子”，特别是两蒋时代，更是如此。

众所周知，蒋介石在大陆时期，最信任的情报头子是军统负责人戴笠。败退到台湾后，蒋介石仍一手掌控情治单位，但没有再让戴笠这种集情治大权一身的人物出现，当他退位前后，仅对情报局长叶翔之信任

有加。

蒋经国接触情治系统，始于“国安会”初创时所设立的资料室。他与蒋介石一样重视情治，但绝不会让戴笠或叶翔之这种独揽情治大权的人出现，而是让几个情治首长维持恐怖平衡的均势，不会有人独大。除了沈之岳、王永澍，汪敬煦、汪希苓等都是他信任的情治首长。江南案后，大汪与小汪内斗，蒋经国作壁上观，这是其驾驭情治系统的经典手法。

至于李登辉，任内十余年，只用了宋心濂、殷宗文与丁渝洲三人。李深谙情治之道，把情治当作政治工具，宋心濂倒向李，情治单位介入政争，宋心濂也成为李登辉扳倒郝柏村、李焕、蒋纬国等非主流势力的要角之一。

李登辉势力巩固之后，则运用情治系统大做“国安外交”，才会出现如“国安密账”这种机密大案。此外，因1996年的台海危机，李登辉放手让殷宗文用尽所有手段情搜大陆。殷前后派遣百人次以上的军情干部前往大陆，是军情局规模空前的敌后行动。情报员一次驻大陆两年，各单位于大陆每建立一个基地，发赠奖金30万元。某一单位前后即派遣40余人次入陆，前后建立26个基地，仅奖金即领了600余万元。

然而李登辉与情治首长并无私交，不像两蒋视情治要员为自己的锦衣卫般。由于李视情治单位为工具，为他巩固政权的宋心濂，卸任后在阳明山洗温泉过世，李仅表致悼之意，退休后极少谈论宋。至于殷宗文，双方更为“国安密账”而闹翻，殷宗文后因癌症过世，李虽致悼，但情治圈熟悉内情人士均知，李、殷已分道扬镳。

在两蒋时代，“国安会”秘书长是个虚位，从来没有获得实权，更不可能碰情治这块，都是“总统”独揽情治大权。蒋经国一度考虑让叶翔之担任“国安会”秘书长，但这也是高官送客，把这位眼中只有蒋介石的人架空。

蒋经国生前最后任命的“国安会”秘书长是蒋纬国，蒋纬国虽贵为皇亲，也想碰情治，但情治首长都知道蒋经国才是主子，致其徒劳无功。李登辉初任“总统”，蒋纬国加入非主流阵营，与前台湾省主席李洋港搭档选正、副“总统”，想与李打对台，结果“国安局长”宋心濂站在李这边，还监控蒋一举一动。蒋纬国知道电话被监听，还特别从德国进口一台反监听的高科技设备反制。

蒋纬国与宋心濂虽是一个较特殊的例子，但仍可看出在两蒋时代与李登辉掌权初期，“国安会”秘书长与“国安局长”的关系。这个时代，“国

安局”编制虽在“国安会”，但实际运作上，双方并无隶属关系，“国安局长”的老板是“总统”，“国安会”秘书长一点都管不着。

这种互不隶属的关系，到李登辉后期殷宗文当“国安会”秘书长时，出现了第一次变化。军人出身的殷宗文由“国安局长”接任“国安会”秘书长一职，这是台湾首例。殷宗文想求表现，于是大做所谓的“国安外交”与“情治外交”，只是“国安会”有将无兵，又没有钱，于是殷宗文回头找既有密账又有人的“国安局”。

而当时的“国安局长”丁渝洲也不是省油的灯，虽多所配合，但也有另起炉灶的雄心，于是殷老给丁穿小鞋，丁也秘密调查殷在“国安局”的经费运用，最后双方在扁政府初期，因国安密账案直接冲突，结果两败俱伤。

殷宗文藉“国安外交”与“情治外交”想指挥丁渝洲，这是“国安会”第一次想控制“国安局”，某种角度说，这是扁政府后来实施“六０六”项目的一个实验。在李登辉的默许下，殷宗文并没有成功，关键即在于李登辉仍是情报头子，“国安局”的老板是“总统”，而局长还是每周定期向“总统”报告事情，李不会假手“国安会”秘书长执行。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绿营扁政府执政。丁渝洲没多久也转“国安会”秘书长职，但任内因“国安密账案”遭弹劾而辞职。丁由“国安局”而“国安会”，与殷宗文一样也想统合“国安局”与情治系统的情报资源，但丁并没有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他没有得到陈水扁的指示或默许，因为他不是绿营人士，得不到扁的信任。

之后两度担任“国安会”秘书长的邱义仁，是扁两度竞选“总统”的选举操盘手，这种并肩作战的信任，才让扁默许邱义仁做“半个情报头子”。如此，才会有“六０六”项目，“国安会”半年就给“国安局”下情报工作指导的情事。邱义仁也成为扁、李政府中唯一可以插手情治，而且能得到“国安局长”充分配合的“国安会”秘书长。

马英九体制性危机

到了马政府时代，“总统”、“国安会”秘书长、“国安局长”间的三角关系，则又是另一番风味。

马英九是出了名的“不沾锅”，有些退休的情治高阶首长甚至认为马因道德之故，根本看不起甚至嫌恶情治单位。除了因“总统”身份而必须接触之外，马英九几乎不碰情治事宜，与两蒋或李扁四人相较，可说是“不闻不问”，是唯一不想当情报头子的“总统”；其好处是不会把情治

当政治工具，例如非法监听反对人士等；缺点则是少了治政的耳目，颇有失聪失明之虑。

马英九对当情报头子没兴趣，便产生一个问题，谁是情治机关的老板？马英九上任迄今，只用过苏起与胡为真两个秘书长，苏起深受马信任，他也插手情治事务，有相当实权，因此，“国安局长”会听他的话，现任“国安局长”蔡得胜更是苏起向马英九力荐的。

马英九第二任“国安会秘书长是胡为真。胡个性谨小甚微，而且与马关系远不如苏起，因此虽然形式上仍对“国安局”情报工作有所指示，但胡常让“国安局”自行决定，碰到与情治相关事宜，也常让蔡得胜全权处理。

然而马接手后的情治系统，对大陆的情报作战能力低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台湾情报系统曾是对大陆情搜最直接、最快速、最权威、最绵密的，在短短十余年间，“国安局”因沉溺内斗而疏于情报作战，如今已沦落到只剩下当年不到20%的能量，而且相关的情战网络也随着改朝换代而逐渐凋零，远离权力核心。

这种危机始于陈水扁时代。扁当政期间的情报指导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大陆守势，美日攻势”。由于认美国为台海安全的保障，“国安局”对美积极展开情报活动，而在大陆，自1999年刘连昆失事后，“国安局”及“国防部”军事情报员已经很难建立情报网搜取情报。尤其是2003年，军情局怀疑内部已遭大陆国安部门掌握，在连续几个情报网失事后，将军情局建制人员全数撤出大陆，以致漏掉江泽民交卸军权这种重大情报。

台湾对大陆情报出现警讯，有很多因素，主要是第一线的敌后情报员，于政权轮替后，“不知为何而战”。情报工作重情义，陈水扁当政时“外防渗透，内防变节”，采取一连串防范措施，如不准现职情报员与退职人员联络，致经验传承断层。另外，情报只求“绩效”，采取杀鸡取卵的手段，布建要求短期收割见效等等，诸多情报指导政策，被情治圈讥为“外行领导内行”。

上述原委，才是陈水扁时代大陆情报大量萎缩的根本症结。“国安局”如不在短期内积极培养情战人才，弥补接班的断代裂痕，未来一处、二处没落，情战部门只剩下三处（国内处）还能积极运作，国安局将沦为比调查局甚至还不如的情报单位，而这可能是马英九执政时隐藏的最大体制危机。

第六篇 曾经的全球反共产革命中心-探秘台湾政战系统

撰文/段宇宏

1960年1月5日，台北的气氛有如过节，街头多处张灯结彩，松山国际机场，蒋介石亲率文武百官和各方使节迎候多时，空军派出24架战斗机升空护航。排场搞得这么大，因为有一位贵客即将到访——南越总统吴庭艳。

吴庭艳访台一周，与蒋介石会谈七次，在陈诚陪同下飞赴各地检阅海陆空各兵种演习，访问军校和连队。给吴留下最深印象的，居然不是军事装备和作战方法，而是“士气、纪律、忠诚”。吴问秘诀何在，答“政治作战”之效用。

南越当时的局势一团糟糕，军令政令不能统一，吴庭艳焦头烂额。他特意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希望能派一名将军到南越协助整训军队，意即帮越军建立一套政战体系。

越南战争期间，北越这头接受着苏联、东欧和北京的军事、经济援助，中共还直接派顾问团和总计32万部队入越，在南越一边，却秘密活跃着一支“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

自越战始，拉开了台湾全球输出“反共产革命政治工作”的序幕，亚非拉面临共产党游击队威协的多个国家亦派出军官赴台学习，使台湾一度成为全球的“反共智慧”中心。

国军政工流变

近现代军队政工制度起源于苏联，国共两军都以俄为师，建立了各自的军队政工制度。

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的效果，现在一般认为最大的作用是解决了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其实不然。苏俄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始于1924年国民党一大之后，至1927年6月结束，共资助约1280余万中国元，其实是杯水车薪；因为从1924年至1928年，广州国民政府仅军费开支就有约2亿元，平均每年4000余万，1927年军费开支5000余万之外，还剩余470多万。

国民党真正得益于苏联的，还是后者的政党制度，解决了其组织效率问题，从而大大提升了资源吸纳和人力动员之能量。

以前的党组织过度涣散，此后变得紧密；以前长期经费紧缺，通过

整顿党政组织解决了财政问题；同时还大幅度提升宣传鼓吹能力。重中之重则是以前没有自己真正的军队，所依赖之部队又叛服无常，通过建立黄埔军校和军队党代表制，解决了军队忠诚问题。

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为“主义”作战的“党军”，党的组织细胞进入军队，实现了以党建军和以党控军。这与当时各支军阀部队依赖个人魅力、人脉裙带来控军治军截然不同，军队的忠诚与效率亦非军阀部队可比。

但国民党学习苏军政工制度，只停留在皮毛上，党组织仍是自由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杂合体，众多党内精英对苏俄布尔什维克政治工作有种本能的排斥，孙中山本人也只抱着一种应急主义的态度，内部批判之声从来不断，而不像中共始终将政工提升到党和军之“生命线”的高度。

清党之后国民党急不可耐地抛弃政治工作，加上以前的政工多由共产党员来做，所以军队政工几乎陷于停顿。南京政府成立，军委会政治部及各级政工组织很快被撤销，另成立政治训练部来抓军队政治工作，职责只有宣传与联络，并无实权。

蒋介石本人对政工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也是迫于“剿共”的需要，三十年代初，设立了海陆空军司令部“剿匪宣传处”、训练总监部“剿匪训练处”、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军队政工略有恢复，但总体相当衰微。北伐时期党代表与部队长官平起平坐的景象再未出现过。

连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都认为，军中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不过“贴标语，叫口号” 而已，无足轻重，天下之事，可用武力了之。

1935年，国民党认为军队中再建一套党组织系统纯属添乱，遂下令撤除军中各级党部。直到抗战爆发，才又在军中重新建立从军委会政治部、战区政治部到连指导员的各级政工制度。

由于人员经费匮乏，政治部以师级单位为中心，军和集团军一般不设实级政工部门。政工人员从抗战前的3000余人增长到1940年3万余人。抗战后为行宪政，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政工又逐步被废除。

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全党对政工的意识谈薄，从未形成共识，没有提升到战略高度，政工建设出于应急时有时无；蒋本人又是从军队入主中枢，不管在何时，他始终亲睐军队“首长一元制”。

蒋要求军中党务和政工由军事首长或政工人员兼任，政工人员只是

首长的幕僚，需服从首长指挥。其实很多军事首长从来轻视政工，经常讥嘲他们是军中之“姨太太”，所以国军的政治工作从来不能与中共军队相提并论。

为应抗战之急所谓抓军队政工，主要是大量吸纳官兵入党，一度使军人党员数量大增，占了党员总数的61%。士兵们常集体宣誓入党，但不收党费，没有党证，党的组织活动几乎不存在。尽管如此，亦颇有成效，在多次战役中，政工人员的牺牲和负伤比例，按其总数来说，相当之高。

所以在国民党那，长期党建废弛，党权式微，甚至居于军权和政权之下；政工人员待遇差、权利小、地位低，由于这些因素，又使政工无法长进，形成恶性循环。

台湾政战输出

国民党迁台后，反思失败原因，以蒋为首皆认为党政军组织涣散，是导致在大陆溃败的重要因素，而这一切又与政工建设有着密切关系，既不能防渗透，也不能保密，同时亦不能使军令政令坚决贯彻。

蒋重新整党改组的同时，也在思索建立一种既不同于共产党，又能让西方国家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威力的“政治工作”制度，政战制度就这样产生了。

因为主要针对防止共产党的“颠覆渗透”，国民党认为共产党的组织及活动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对手，单纯靠武力不能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有一套相应的组织和方法体系，以凝聚自己及动员民众，涉及到政治、经济、文艺等各领域的斗争，即“非直接军事武力作战”。

说白了就是一定程度借鉴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动员模式，同时理论上又融入民族文化、三民主义和“普世价值”。

从1951年在复兴岗建立政工干校（国防部政治作战学院之前身）开始，国民党的政工体系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和思维逐步搭建起来。与此同时，“国防部”政工局更名为“总政治部”，60年代初再改名为“总政治作战部”，隶属于“国防部”，即今天的政战总局。总政战长官仍被定位为参谋总长的幕僚，军中仍实行“一元制”。

政战学院学生毕业后，分发至各部队担任政战排长、辅导长、政战官、心辅官。总政治作战部下直属两个机构：军事发言人室、政治作战计划委员会，还分设六个政战处，分管组织、训练、心战、宣传、反情

报等事务。

蒋经国委托他的心腹王参与政战建设，王先从处长升到政战学校校长，最后官拜总政战部主任，成为国民党政战理论的构建者。蒋经国最初认为政战学员的培训应为速成，两年制最好，在王的建议下，后来政战学院按照高校的学制来建设，使学生具有大学本科教育。

“如果政工干部没有学历和渊博学识，根本无法服众。”这是王强调的观点。政工学员不仅要了解党义和敌情，还要接受体育、戏剧、音乐、新闻、外语和政治学等训练。蒋介石认为，军队还要承担一些社会功能，凝聚社会共识，协助宣导政府方针，如军队建立国语推广成人班、全岛旅行的文化小组，这些成员多数由政战军官来充任。

向南越和柬埔寨派出“军事顾问团”则是政战输出的肇始，其成员都是政战军官。王曾应邀赴南越和柬埔寨访问，协助该国建立政战体系。虽然南越和柬埔寨朗诺政权最终失败，但在合作期间，受援国与军事顾问团相处融洽，对他们的盟友美国反倒是一肚子怨气。这些国家后来流亡到西方的官员将领谈起往事仍是此种态度。

所在国在经济、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援助并深受其影响，但精神上更青睐政战顾问团为其制订的战略，实操中台湾只能提供非物质支持，具体影响力有限；正是这种矛盾之处导致了政战体系无法有效运作，亦不能复制台湾的领袖、政党及组织经验。

好评如潮“远朋班”

因为“好评如潮”，加上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历史之长久、经验之丰富、教训之惨痛、反思之深刻”，早已闻名世界，亚非拉诸多政局不稳，尤其面临共产党游击队威胁的国家纷纷派出军官到台湾深造，学习政治作战技术。

台湾为此专门开设了一个“远朋班”，即政治作战训练班的别称，其中不少学员后来成为亚非拉国家的政要，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战培训的同时，还附带有经济和技术援助，自然亦是外交斗争的一个组成部队。

这些外国军官还要被教授如何在民主转型中克服低效混乱，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如何协调关系。最有趣或说令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占课时近一半的政治作战理论学习和个案研究，个案均来自国民党多年来与中共斗争的历史案例。

政战教官常对学员解释何为政战，国民党政战与中共政工的区别，

这亦是不少学员常问的问题。“共产党以‘仇恨’来进行组织动员，而我们以‘仁爱’进行组织动员，他们鼓吹‘阶级斗争’，而我们提倡‘阶层协作’”政战教官常从基本概念娓娓道来。

这些国家获得部分政战经验和灵感，也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同样无法复制台湾模式，他们不具备一个历史悠久的“革命性政党”，也没有威望极高的魅力型领袖。但所在国执政者无疑都感激台湾的援助，厌恶美国盟友的“自以为是”和“愚蠢低效”。

柬埔寨的朗诺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两张画像，上方大幅的是蒋介石画像，下方小幅的是尼克松画像。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巴拉圭著名的军政府领导人，把首都的一条街道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并在街中心塑起了一个蒋介石铜像。

可以说，那个时代虽然美国在冷战的另一方扮演了老大哥角色，并因自身的国力产生巨大影响力，成为遏制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最大堡垒，但台湾无疑在第三世界的精神层面扮演着比美国更受欢迎的角色，成为那个年代的全球反共智囊中枢。

第七篇 台湾“北一女”传奇

撰文/王丰

傍晚时分，走在华灯初上、行人如织的台北西区街头，偶尔会见到一些身着草绿色制服、黑色长裙的中学女生，穿梭在书店林立的重庆南路。她们文静娴雅的外表，经常会令外地朋友好奇，她们究竟是哪所学校的学生？

其实在台北，绿衣黑裙的装束是与一个名词固定联系在一起的—“北一女”。“北一女”的全称是“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这个中学在台湾可谓是妇孺皆知、如雷贯耳。曾有人说，“仅仅学业成绩好，是进不了‘北一女’的，仅仅凭有钱也是进不了‘北一女’的，即使学业成绩好又有钱也未必就能进‘北一女’读书。”一所女子中学到底有何独特之处？且让我们把故事的景窗拉回最初的画面。

百年历史沧桑

公元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这年也是日本占领殖民台湾的第九年，殖民当局拆毁了台北文武庙（孔子庙和关帝庙），兴办了一所名为“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第三附属学校”的女子学校。首任校长尾田信直将办学宗旨定为培育“贤妻良女”。当时日本天皇还颁给尾田“敕语誊本”，肯定该校的办学绩效。这所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专为培植“贤妻良女”而创办的女子学堂，只有日本女孩才有资格入学，台湾籍女子完全被摒除于校门之外。即便创校三年后，“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第三附属学校”已改名为“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第三附属高等女学校”，三个年级的学生总人数亦不过99人，连同9名老师，全校师生才百来人，而绝大多数学生依旧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台湾总督府官员眷属，或者日本高阶公务人员的小孩。

这所被台湾本地人称为“第三高女”，仅供日本殖民者女弟子就读，专事培养日式三从四德贤妻良母为教育导向的女子学校，在1921年改校名为“台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学校”，在这一年，“台北第一高女”打破只招收日本女学生的惯例，第一位台湾籍的女学生林双弯，在该校完成了高中学业。这位女生出身鼎鼎大名的台湾名绅，台中雾峰林家家族。此后，台湾本地人也以女儿是否能进入“台北第一高女”，作为在殖民统治体制下，自家身份地位高低的寒暑表。实际上，这座热带岛屿之上，极少数“辱承”倭人垂怜“恩准”进入“台北第一高女”的台籍女生，清一色全是岛内各大家族仕绅的女弟子，其他普罗大众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

车，天资聪慧，连跨进校门的资格都没有。

1925年，台湾基隆煤矿大王颜国年的女儿颜梅，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台北第一高女”毕业。颜家是台湾排名前列的巨富，毕业以后，颜梅旋即被乃父送到日本深造，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毕业以后，再回到母校“台北第一高女”任教，专门教授日语课程。

话说这位颜家的贵千金颜梅，12岁那年奉父母之命，去日本留学，不巧遇到日本关东大地震，天灾地变迫使颜梅打道回府，回台湾就读“台北第一高女”，毕业之后，再次渡海东瀛，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返回母校“台北第一高女”担任学校的第一位台籍日文教师。和基隆颜家有姻亲关系的魏清德家族（魏清德的儿子魏火曜，娶颜国年之次女颜碧霞为妻），又有三位女公子（魏淑昭、魏淑顺、魏秋婉）分别考进“台北第一高女”，到了颜家（国年）和魏家（清德）的第三代、第四代，总共已有16人考进“台北第一高女”的后继学府—“北一女”。国民政府光复台湾，人民就学的机会一律平等，再也不复存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教育权利要挟人民的情况。

日据时代“台北第一高女”揭橥的校训为“正、强、淑”，从这三个字得窥统治者办学的宗旨，是要透过军国民教育把殖民地学生教养成日帝的顺民。学校教育与授课内容，多在教导学生在父权政治的屋檐下，“忠于天皇”，忠于帝国主义体制。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日据时代的学校十分重视学生生活教育，对学生的礼仪和纪律要求十分严格。

全台湾中学的楷模

战争结束，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国府一改过去日本殖民统治的毒化教育，开始大力推行国语（即普通话），实施中文教育，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学生继续升学。当然，此时“台北第一高女”也已改成中文名字“台湾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简称“北一女”）。台湾光复后第一任校长是胡琬如女士，胡女士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1945年间，“北一女”全校学生亦不过143人，老师大部分来自大陆。因为久处日本殖民统治，学生长期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绝大多数人不懂普通话，本地学生听不懂大陆籍老师之乡音，上课与日常沟通颇为吃力。尽管如此，到台湾教书的大陆籍教师，莫不抱持满腔热忱，悉心奉献。好学不倦的学生，也终能从师长身上，学到毕生受用的宝贵知识。

江学珠原本在大陆江苏省立松江女中任职，江校长是“北一女”第二任校长，她在“北一女”一待就是22年，是“北一女”在任最久、建树最多的校长。主政“北一女”期间，江学珠坚持五大办学理念：行政和谐、严

格教学、以身作则、操守廉洁、锻炼身体。

光复之后，“北一女”之所以能成为全台湾中学的楷模，首屈一指的明星学校，与江学珠校长的无私奉献脱离不了干系。服务“北一女”22年间，终身未婚的江学珠，和她的妹妹“北一女”校医江学女士，一块住在“北一女”校舍一隅的旧屋子里，终年以校为家。除了无私奉献，江学珠更重要的功绩，是她为“北一女”延揽了许多大陆来台的饱学之士。

江学珠起早赶晚，一心一意只想把学校办好。每天清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她已经在司令台边的老榕树下打太极拳了。夜深人静，夜间部学生放学后，江学珠还不得闲，她只身持着手电筒巡视校园，一层楼一层楼查看门窗有没有锁好，一切安顿好了，才返回住处，继续处理白天尚未完成的校务。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为了准备联考（即大学升学考试，大陆称之为“高考”），学校开放教室让学生可以留校夜读，用功的孩子们总是在江校长的催促下，依依不舍地离开教室，而江学珠也总不忘叮咛大家，早点休息，早睡早起有精神。

江学珠尤其令人敬重有加的，是她不仅将全付心血投入“北一女”办学工作，还在她服务“北一女”22年间，居然不拿一毛钱薪水，因为，她自认已经拿了一份国大代表的薪水，不该再浪费公帑。早年国大代表的薪水十分微薄，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江学珠度过了简约的22年办学岁月。

“北一女”向来是全台湾最优秀的女生菁英的荟萃之所，集天下英才而教之，自然要延聘最富于教学经验及学有专精的师长。江学珠本着用人唯才的原则，到处寻访绩优的教员，每逢大学毕业的季节，江学珠总会请秘书人员去师范大学查询各系所毕业班名列前茅的学生，邀请他们到北一女任教。江学珠非但绝无一般学校校长的官僚作风，对学校的老师更是礼贤下士，尊重有加。当学校决定遴聘某位老师任教时，她一定会亲自到老师的家里，当面送上聘书，以示诚意。

“北一女”知名校友

建校迄今107年的“北一女”，远的不说，光是台湾光复以后毕业的知名校友，就多如星辰，难以计数。在女性菁英竞相出头的世纪，岛内经常出现传媒的仕女，“北一女”毕业校友一直是指标社群，这些重量级菁英，始终是台湾战后社会活力的动能源头。

初中高中都在“北一女”就读的刘贞婉，于1944年入学，台湾大学毕业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修得物理学博士，稍后进入美国国家航

天总署（NASA）巴沙迪那喷射推进实验室工作，不但获颁杰出贡献奖，甚至还有一颗小行星是以她的姓氏命名。

1951年考进“北一女”初中部的作家陈若曦，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表示，进“北一女”第一年的学生制服还是白衣黑裙，到了1952年，学校配合国府当局战备政策，规定学生制服一律改成绿衬衫、黑长裙，学生上身服装的颜色和邮差制服如出一辙，因而许多人都称“北一女”学生为“邮差”。斯时，“北一女”校誉日隆，跻身台湾执牛耳的明星学校，“北一女”同学穿起如同信差般的草绿制服，引为学生最有荣耀感的颜色图腾。

陈若曦在一篇自述文章中透露，江学珠校长是她少女时代偶像，江校长留着清汤挂面的发型，每天早晨带领着师生打太极拳，为了办学终生未嫁。毕业前，陈若曦一直想象自己也学江学珠那样，抱着独身主义，用自己全部的生命精华勾勒完美的中学蓝图。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胡台丽，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写道：“在江学珠校长教育生涯末期进入绿园的我们，仍然每天笼罩在她以校为家的身影中，唱着她作词的校歌‘维我女校宝岛名高，莘莘学子志气凌霄。修养健全人格，具备科学头脑，力行三民主义，实践国父遗教；公诚勤毅校训孔昭，齐家治国一肩双挑。为国家尽至忠，为民族尽大孝，继往开来为我女界增光耀’。当时一入学就进行智能分班测验，所谓的实践班就是把‘具备科学头脑’的学生聚集起来，往理科发展。”但是，胡台丽不讳言，不多久，她就发现自己不是真的“具备科学头脑”，开始质问，为什么“科学头脑”就是比较优越？侧看“北一女”这页历史，似乎不难窥见犹在战争边缘的两岸中国人，虽然双方喊的政治口号南辕北辙，但却殊途同归地走上“科学报国”的教育思维模式。

作家朱天心在她一篇怀念母校“北一女”的文章中写道：“那时候治校人非常性格，非常自信，给学生们量大且自主的时间自处（例如准时下课，例如至今我仍不明白为什么‘北一女’独有的星期三半天小周末），以致有机会早早试着探险教室以外的人生：泡重庆南路书店，坐满半场国宾戏院，乃至冶游到淡水阳明山、基隆，或者什么都不做下了课也不回家地坐在光复楼的窗台上晒太阳，与死党好友偷偷交换各自未来的梦想，那些傻话盟誓屡屡被远处传来的乐仪队练习声给打断。”走过世纪风华，走过漫天战火，走过杯弓蛇影的白色恐怖岁月，台湾一群拔尖的少女们却在“北一女”巍峨的高墙之内，在同时拥有开明与专制双重性格的主事者主导下，喜出望外地找到一片宽广的自由天地。

毕业于1976年“北一女”和班的前立法委员雷倩，在怀念文章中说：“当年的和班，仿佛打从头便注定伟大。高一的导师萧圣雪教我们抛

开书本，背唱美国名歌学英文；数学老师常常放牛吃草，留给我们胡涂的时间；这些小小的出轨，在头发必须短到耳上一公分的年代，给了和班一股莫名的坚持：我们要活得更恣意，更理直气壮，更精彩。”如今，台湾的青年学子早已脱离“发禁”的桎梏，年轻的孩子们很难想象前辈们会为了头皮上的那些十万烦恼丝，是否能多蓄留一公分，和学校的军训教官争得你死我活。然而，也有那么一群青年，看重的不是头皮上的自由，而是头皮下的自由。

台湾前副领导人吕秀莲也是“北一女”的校友。在一篇访问吕秀莲的文章中，勾勒出吕秀莲的回忆图像。吕女士当年特别喜欢孙中山的远见与开创思想，又欣赏胡适自由开通的风范，所以取笔名“逸之”，兼容并包了孙逸仙、胡适之两氏的字号，以示对他们的尊崇。

吕秀莲就读“北一女”时期，一口气结交了九个国外的笔友，分布于亚、欧、美、非四大洲九个国家。吕秀莲认为，这不仅仅增进了她的英文能力，也扩大了她年少时的宏观视野。

回首“北一女”时光，最令吕秀莲难以忘怀的，仍是江学珠校长和“北一女”的教育理念：莘莘学子志气凌霄。

台湾现任领导人马英九的四个姐妹，全是“北一女”毕业生。大姐马以南回忆当年：“那一年我考上北一女初中，弟弟（马英九）刚上女师附小，于是每天带他上学，就这样走读六年。”马以南回想当年上学情景：半小时的徒步路程，两旁的店家有弹棉被的，做榻榻米（日式房舍专用之席榻）的，还有一家四方蛋行。马以南回想，有时弟弟不想走路，爸妈给钱坐三轮车，姐弟俩商量好，省下车钱，取道中华路，买个饭团之类的吃食，两人分一半，边走边吃，上学的路上好开心。

马以南回忆，“北一女”鼓励学生朝多方面发展，故而安排了各种课外活动，课程均有名家莅校指导。马以南参加的活动包括合唱团、演说班与舞蹈班。她自豪地告诉朋友，应付日常生活的十八般武艺，几乎全都来自“北一女”学生时期的训练。学校不单单要灌输学生各种知识，成为大学联考攻无不克的考试高手，更让学生学会了烹饪、点心、裁制衣裳、唱歌跳舞等诸多生活技能。

日后，出国深造六年返台，马以南走在台北街头，乍见穿着绿衣、黑裙的“北一女”学生，不禁热泪盈眶，因为那些“小绿绿”的形影，正是校友们青春岁月难以磨灭的深情印记。

今年，正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北一女”从日本殖民当局建校迄今，也逾百年历史，这个驰名海内外的台湾顶尖女校，源起于台北市

中心的一块风水宝地。根据“北一女”校史记载，“北一女”的所在位置，在清朝恰处于台北城的文庙、武庙的交界口上，四周涵盖的区域，除了清朝台北城内占地最大、主建筑面积最大的文庙之外，还包括文庙邻近的农家田地。

“北一女”之所以能蜚声国际，长期执岛内女子中学之牛耳，是否和校园居占昔日台北城的“地王”，受到文武两圣的精神“加持”相关，一直是台北市民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

精彩推荐：《阿扁出笼，台独抬头？》



点击阅读

第八篇 第一代台湾中共地下党的兴起与沦陷

特约撰稿员/王丰

历经在大陆摧枯拉朽全面溃败覆灭命运之后，蒋介石父子终于明白：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大溃败的总和，恐怕还不如在隐蔽战线上的全盘尽输，来得令其痛心疾首。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十期，有一篇署名“罗迈”的文章《怎样执行党组织上的精干政策和隐蔽政策》。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即大陆解放后首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共产党人》等刊物应是早就呈送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的，然而，老蒋当年压根没打开看过。这份中共党刊，一直到台湾，才逐渐引起蒋家父子的重视，并从此成为内调局（内政部调查局，是“中统”的后继单位）、保密局（军统的后继单位）的内部必读文章。

其中有段话，让蒋介石刻骨铭心：“秘密环境中的党组织，不宜数量上的过多，也不宜地域上的普遍，而应该是建立又精干又隐蔽的、必要的支点……最好的隐蔽自己的方法之一，是使自己的党员和组织深入到社会里面去，在社会的深处生下自己的根基。”这正是国民党当局统治大陆23年间想做但没做到的事，但共产党做到了。

地下党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从1927年初一路缠斗到1949年底，地下党愈战愈勇，最后才能乾坤一掷，把国民党政权一路赶到台湾去。然而，教人意外的是，1949年以迄1950年，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却无从乘胜追击，在岛内隐蔽战线一场恶战中，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整个颠覆，几乎整锅端走。

1949、1950年之交，原是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溃退台湾之后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也正是这场胜仗，让蒋氏父子得以在岛内站稳脚跟，保住他们最后一块根据地。

光明报事件

台湾地下党组织始于台湾光复。1945年8月，在国民党政府开始接管台湾的同时，中共中央于延安决议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并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派其入台。

1949年4月6日，在台发展多年的省工委显示了自己的实力，成功推动了反美反蒋的“四六学潮”。当时，参与的学生唱的都是大陆学运歌曲和解放区的歌曲，令当局极度恐慌。不过，台湾地下党党组织也因这

一成功而大意，才酿成之后的“光明报事件”。该事件是台湾地下党遭颠覆的起点。

学潮3个月后，有人在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刊物《光明报》（按：事后证实该报是地下党基隆工委会的所属刊物）。数日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尤其彭孟缉被骂得最凶，他稍早曾当面报告蒋介石，说台湾的地下党根本不成气候。

3天后，保密局特务抓到在台大校园散发《光明报》的学生，当中一人供承，报纸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提供的。其后保密局特务，荷枪实弹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印报器材及大量共产党宣传资料。钟太太蒋碧玉也是一名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特务们，她幽幽地说：“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地死去！”

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一直顽强未屈。但某日，钟浩东显然已经被日以继夜的讯问整得精疲力竭、濒临崩溃边缘，在神智不清的状态下，他忽然反问讯问他的特务谷正文：“老郑怎么样？”谷正文立即问钟浩东，老郑是谁。待钟清醒过来后，死都不肯说了。

这是保密局特务第一次听见“老郑”这个名字。特务已查知钟浩东是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合理推论，老郑应该是比钟浩东层级更高的人。

钟浩东夫妇被捕之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44个地下党。轮番侦讯告一段落后，每个人都像被挤光的牙膏空罐子，钟浩东、蒋碧玉夫妇等7人被枪决，其他人等按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徒刑。

从钟浩东嘴里，特务始终问不出老郑的底细。但1949年10月31日，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兼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泽民被逮捕。保密局特务在其随身笔记簿里，又发现了“老郑”二字。陈泽民终究熬不住刑讯的疼痛，说出了老郑落脚处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

保密局特务立刻派出一组人员，24小时在屋内外隐密处轮班守候。但埋伏了一个多月，都不见任何人前来。这期间，保密局特务又抓获了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化名杨春霖，台湾嘉义人）。

此时，随着大陆国共内战基本结束，中共急于开展对台湾的解放工

作，台湾地下党也召开一连串的秘密会议。1949年12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发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

“老郑”落网

巧合的是，就在这项指示发出不久，1950年1月1日深夜，老郑就在台北市泉州街26号，被一直在此守株待兔的保密局特务逮了个正着。不过，抓他的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此时并不知道自己抓的就是中共在台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

在保密局本部，老共产党出身的谷正文，虽然是第一次见蔡孝乾，却始终直觉对方身上的某种气质很熟悉。审讯中，他突然幽幽一笑：“没想到你是个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蔡孝乾一怔，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参加过长征？”谷正文说：“你身上那股傲气，说明你是长征干部。”蔡孝乾顾左右而言他，继续表达抗议：“我不习惯被人铐手铐说话。”

在中共内部，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资历，通常是位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项基本条件，而蔡孝乾身上正有谷正文记忆中这类老干部特有的傲慢。

事实上，蔡孝乾是惟一参加过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人。有关蔡孝乾的传奇故事，在他尔后坦白供承的回忆中（按：蔡孝乾的供词，后来整理成他的回忆录《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有非常完整的交代。

根据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的档案资料显示，台湾共产党于1928年4月成立于上海，初期主要成员以旅沪青年为骨干，蔡孝乾当时就位列台共中央委员。

1928年8月，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大肆搜捕台共分子，蔡孝乾偷渡到福建漳州，并慢慢融入大陆的红军系统。这期间，他因缘际会，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熟识，并在曾经于上海大学教他俄文的老师任弼时的提携下，进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还与毛泽民、毛泽覃等毛泽东的弟弟们成为好友。

追随大部队完成长征，最后来到陕北的蔡孝乾，自此与其他台湾籍共产党人有了不同，长征成为他最大的资本。但这种自视不同，也正是他日后在工作和生活中脱离群众的开始。

“老郑”脱逃

“老郑”落网最初几天，保密局特务对他进行了一连串侦讯，但老郑

毕竟是久经阵仗的老革命，对特务的问话，总是不着边际地兜圈子。而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似乎胸有成竹，暂不急于逼问过甚。

1950年1月初的某一天，谷正文临时有任务赶赴高雄，他把侦讯老郑的任务移交给手下特务牛树坤等人，临走前还特意交代牛，“老郑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他”。

某日中午，老郑吵着想吃延平北路波丽露西餐厅（台北早年最贵的西餐馆）的牛排。牛树坤一肚子恼火，却只能依长官临走时的交代，买来牛排。饱餐后，老郑凑近牛树坤耳根说：“为了感谢你买牛排给我吃，我要投桃报李，抓到人保你升官。”牛树坤不疑有他，马上带人跟着老郑前往所称地点抓某联络人。

快到时，老郑告诉牛树坤，一会儿离自己远一点，以免让对方有所警觉。牛树坤信以为真，放任老郑暂时单独行动，哪知离远一些后，老郑趁牛注意力松懈，一个急转身狂奔。牛树坤方知上当，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一路穷追。而老郑正在窃笑脱身时，却被一个熟悉的人影一把就揪住衣襟，喊道：“郑先生，你要去哪？”原来，另一个保密局特务张清杉不放心牛树坤等人带老郑出门，悄悄在一边盯梢。

老郑被抓回牢笼不到半天工夫，牛树坤却急功近利，又带老郑前往台北市武昌街，指认老郑之前所称联络人的住家。谁知走到一处黑暗的转角，老郑冷不防窜进一家黑漆漆的木材行，牛树坤追赶不及，人早已在暗夜中逃得无影无踪。

煮熟的鸭子飞掉，不只令谷正文遭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处分，记大过两次，还让蒋介石气到跳脚。老蒋之后多次追问“老郑”的事，毛人凤每次都被问得抬不起头来，只有唯唯诺诺答复“克日把他抓回来”。

老蒋身边的“余则成”

1950年1月中，老郑落网逃走之后的某日，毛人凤突然想起，他在老郑的记事本里看见过一个可疑的名字“吴次长”。而台湾这么点地方，惟一一个姓吴的次长，只有“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1950年2月底某夜12点多，特务直接敲吴石寓所大门，带走了吴石和吴太太。在保密局人员讯问下，吴太太承认老郑曾经多次到吴家，并称：“很久没有看见那个人来了……”特务人员因而认定吴石是地下党。不久后，吴石在自白书中供承，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将之递交给上级领导老郑。

台湾时期，吴石是已知的地下党潜伏人员中在国民党内军阶最高的官员。他是福建闽侯人，17岁那年与好友吴仲禧一起投入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了辛亥革命。吴仲禧在抗战前夕加入共产党，吴石受吴仲禧影响很深，曾经偷偷阅读《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并与叶剑英、周恩来都有数面之缘。

国共内战爆发之后，1948年6月，吴仲禧经吴石引介，任职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后来奉调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吴石任职国防部史政局长期间，曾协助吴仲禧为中共取得徐蚌会战（大陆称为“淮海战役”）的重要军事情报。

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前夕，吴石因担任国防部史政局长，负责保管近500箱军事机密档案。除假意运走百余箱无关紧要之档案，其他300余箱重要机密档案，吴石均于福州解放前夕交由其副官王强留在福州，之后移交给解放军。

1949年8月中旬，吴石奉命撤退台湾，转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中将。

1949年年底，为加强取得岛内军事情报，中共华东局派遣长期在上海、香港之间活动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湾与蔡孝乾及吴石联系，担负传递情报之“交通”任务。朱谌之利用女婿王昌诚在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担任主任的关系，办妥入境证件抵台。

朱谌之与蔡孝乾，均曾前往吴石寓所，吴石多次交付重要军事情报予蔡孝乾转交朱谌之，或直接交付予朱谌之。交付的军事情报包括台湾地区防御地图、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兵力与火炮配置图、台湾海峡海域洋流资料、空军机种、岛内基地与机场，及台湾适合登陆地点资料分析等。

由于有女婿警界之身份掩护，朱谌之始终未受怀疑，直到蔡孝乾被捕，蔡供出朱谌之的地下党身份。此时朱谌之正利用吴石签署的特别通行证，从台湾渡海到舟山岛，眼看距离大陆仅一步之隔，只要多给朱谌之一天时间，她即可成功返回大陆，向组织归队报到。谁知最后关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封电报打到舟山，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当即循线截捕朱谌之。

1950年6月10号，吴石、朱谌之等4人，被台湾当局执行枪决，其他同案人员被处以不同之徒刑。

电视剧集《潜伏》播出后，有大陆网友猜测“余则成”的原型便是吴

石，网友的理由是："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地下谍报工作的最高级潜伏人员为数并不是很多，至于官阶到保密局天津站副站长那个位置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基于这样的原因，说余则成的原型就是那位在台湾被蒋介石杀害的吴石将军，似乎也是可以让人理解的。"此言不谬。

致命一击

老郑给中共地下党带来的致命性一击，是在他第二次被捕之后发生的。

1950年3月9日，保密局特务侦悉，有一名住在台北中山市场的老台共，名叫黄天。老郑脱逃之后，起初一直带着他的妻妹栖身在黄天家里。保密局特务埋伏数日，抓到了黄天，并施以各式酷刑。黄天嘴巴、鼻孔、眼角喷出了鲜血，头发也渗出血水，不断沿着额头汩汩冒出。阵阵哀号中，黄终于招出了老郑的落脚处。保密局特务张清杉随即直奔嘉义粪箕湖（今改名奋起湖）林姓医师家。

天下就有这等荒谬的巧事，张清杉坐车到嘉义之后，旋即乔装成农夫模样，换骑一部破旧脚踏车，沿着乡间小路，一路颠簸逡巡，四处寻觅可疑人等。不多时，张清杉瞧见远处有个穿西装的身影，迎面走来。张满腹狐疑，生活条件如此贫困的台湾南部农村，哪来穿西装的阔佬？正纳闷时，与那人已近至20米之内，张大喜："这不是老郑嘛！"两人四目对望，老郑绝望地说了一句："怎么又是你！"张清杉诡秘一笑，一把揪住老郑，铐上手铐："这次不会再让你跑掉了！"

老郑二度被捕，保密局终于追查出"老郑"的真正底细。蔡孝乾全盘招供了自己参加中共组织的详情，并透露一项讯息：台湾省工委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逃到大陆，暂避风头。蔡孝乾重回牢笼的第三天，洪幼樵在基隆码头被逮捕。

关于蔡孝乾投降的经过，谷正文的说法是，将一直与蔡孝乾相好的蔡的小姨子送进牢门，蔡就招了。这个说法可信度无从证实，但可以推想的理由是，两个多月的逃亡，让来台湾后过惯小资生活的蔡感到精疲力竭、无法忍受，再加上吴石被抓、组织大部遭破坏，意味着蔡在台湾最大的情报来源断线，蔡自觉大势已去，又架不住刑讯逼供，所以就范。

1950年3月，是地下党台湾同志最黑暗的一个月份。台湾省工委会重要干部几乎一网成擒，张志忠、林英杰、洪幼樵、简吉、张明显、吕

焕章、计梅真等人全部被抓获，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

据谷正文的回忆录中形容，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几名地下党干部被捕之后，曾在牢房中集体批斗蔡孝乾。张志忠指着蔡孝乾破口大骂，指其生活腐败，诱奸14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陈泽民指着蔡孝乾鼻子痛骂："我们的失败都是你蔡孝乾一个人造成的，其实到处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根本没有办法开展新关系。"

仅以保密局的特务所见，陈泽民、张志忠等人对蔡的指控至少可以被部分证实。以隐蔽战线最基本的常识判断，蔡孝乾的这些作为确实存在着多项致命缺陷，不仅没有资格领导地下党隐蔽战线的工作，甚至连当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够格。

谷正文在评论蔡孝乾领导的地下党时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致命伤。谷称，如果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党的人，能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的斗争史说不定要改写。

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任职于"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情报局"等情报单位，授予少将衔，上级交付其任务为专事写作及研究分析工作。重要著作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等。1982年10月，蔡孝乾因病卒于台北，得年74岁。

台谍中的中共英烈

从1950年1月初蔡孝乾第一次被逮捕，到同年3月初第二次被捕，他先后供出了分布岛内各地的地下党员名单。据不完全统计，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共有400多人以"匪谍"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台湾省工委成立以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相较于蔡孝乾的变节投降，中共地下党里也有许多威武不屈、至死不降的无名英雄和钢铁般的硬汉。

据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表示，张志忠是被他逮捕的地下党当中，他评价最高的一位，因为张"威武不屈"。原台湾地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在回忆文章中，引述昔日同志回忆称，张志忠被关进保密局黑牢后，只要看见有同志被抓捕进来，就大叫："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

不死！”劝诫被捕同志坚不吐实。甚至蒋经国亲自劝降，张志忠依旧不动如山，蒋问：“张先生，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只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

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求仁得仁，被特务绑赴台北马场町枪决。1998年1月，中共中央经多年核实，确认张志忠为烈士。

1950年5月中的一次会议上，蒋经国（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向与会干部宣称，光是因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1800多人。

第一阶段的隐蔽战线斗争固然失败了，但是地下党人依然前仆后继。1950年4月，省工委会发出旨在重整地下党组织的“四月指示”，下令各地在逃干部及人员迅速整理组织，进行深入隐蔽的群众工作，保存干部，蓄积实力。不知是否汲取蔡孝乾当年招摇过市的教训，党组织严令，从乡村到山区，禁止坐火车、坐汽车，不走公路、大路，专门走小路、夜路，住山洞、溪边、荒地、丛林。

岛内第一波的隐蔽战线斗争，地下党显然屈居下风。但是，贯穿整个1950年代，地下党仍然屡仆屡起，从不放弃，国民党当局的神经从来不敢放松。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积极酝酿“反攻大陆”，几乎每年“双十节”都要举行阅兵大典。1957年5月6日，一个化名聂世民的地下党，伪装成投奔国民党的“反共义士”，经由香港赴台湾。不料，在台活动两个月后，即被台湾保安司令部逮捕。据保安司令部侦讯记录显示，聂世民的工作任务是要趁台湾“双十节”阅兵典礼时，暗杀蒋介石，或暗杀派驻台湾的高阶美国官员。

虽然蔡孝乾、聂世民等人的任务彻底失败了，但地下党的阴影始终在蒋介石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也是当年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对内对外不惜“扩大化清洗”的重要原因。蒋介石曾训斥国民党军政干部：“你们通通不认识敌人，像你们这样麻木不仁，怎么会成功？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奸匪就在你身边。”

第九篇 台湾“叛逃者”的大陆人生

撰文/王骞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两岸不断相互策反，以优渥待遇吸引对方阵营人士投奔，韦大卫、朱京蓉、王锡爵，这些彼岸的“叛逃者”至此岸即成“起义者”。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两岸政治氛围日渐和缓，但这些投奔事件的主角们，仍未得到对岸最后的“宽恕”，面对故土家园，止于隔海相望，历史的一页迟迟未能翻过。

平淡的当下

聊了一下午旧事，总是笑眯眯的朱京蓉起身打开灯。陈设简单的客厅里只有几个灯泡还能亮，趴着乌龟的鱼缸成了最明亮的物件，泛着幽幽的绿。这套空军分给他的住房，位于北京的北四环外，他和妻子、两个儿子住了十几年，现在房子旧了，一个儿子刚搬出去。

到今年5月，朱京蓉来大陆整40年了。1969年5月26日，他的教官国民党空军上尉黄天明开着T-33A型喷气教练机到达广州，坐在教练机后侧舱位的他，就这样被动投诚了共产党。那年6月的《人民日报》上，报道了他们“驾机起义回归大陆”的消息；20多岁的他们手持《毛主席语录》，还高喊着刚学会的“毛主席万岁”。

因长年在大陆军队系统工作，到大陆后他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三年前从空军指挥学院科研部副部长任上退休后，这个规定才算失效。如今朱京蓉每周有六天去一家台湾人的饭店当顾问。

“累，今年不想干了。”这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更像谦虚而不是抱怨。唯一的休息日，他留着或陪夫人逛街，或接待来自台湾的朋友，偶尔，也去东边会会住在望京的韦大卫，喝杯酒。

韦大卫比他早来大陆13年，开到大陆来的还是蒋纬国的专机“塞斯纳”。已经81岁的他，看上去比年轻时瘦小了一圈，手脚略有不便，上下楼梯要扶一把。新买的房子里平日就他和夫人住着，儿子常来探望。天气一冷，他甚少出门，太阳好时，老夫妇就带着收养的流浪狗在小区里散步。

朱京蓉在北京每年能见几次的，还有王锡爵。1986年开着华航货机飞来大陆的王锡爵，只比韦大卫小一年，自中国民航总局华北分局副局长任上退休后，如今住在国务院机关管理局分配的公寓中。喜欢游山玩水的他，前几年还常陪住在台北的夫人赴各地观光，近年游兴大减，只

是每周在跑步机上练练腿脚。

对这些年岁渐长的“叛逃者”们来说，那些惊心动魄的逃亡生涯，已经离开当下愈来愈遥远。朱京蓉用“平淡”两个字形容现在的生活，对他们而言，这份平淡亦是幸福。

无奈的“叛逃”

从1940年后期到1970年后期，每一个来自国民党阵营的逃亡者，都曾让那个时代的大陆民众倍加确信，盘踞在小岛上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是多么黑暗可怕。大陆改革开放后，这样的逃亡者，又成为“台湾人民响应祖国和平统一号召”的铁证。

相同的政治话剧在台湾也不时上演，唯一的差异在于，大陆叛逃者大多成为“向往自由的反共义士”。为鼓励更多的人起事，1958年，台湾颁布《共军官员起义归来优待规定》，按照起义者开来的飞机机型，奖励黄金，据说最高给过7000两黄金。1960年代的大陆也出台过类似政策。

但具体到每个“叛逃者”的身上，真实的逃亡原因却未必和政治黄金有多少关系。

带着朱京蓉一起回大陆的黄天明，从未公开透露过他回大陆的真实原因。据朱京蓉了解，黄天明曾是台湾雷虎队中能参与九架飞机飞行表演的资深飞行员，某次代人受过后，他被贬到空军学校当老师，始终心气难平。

1956年逃来大陆的韦大卫，原是广西人，1948年报考国民党的海军军官学校，结果被军舰拉到台湾直接当兵。虽然国民党不断宣传“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以稳定军心，韦大卫还是打定主意要逃回去。广西的家里，有他的父母、大哥和两个妹妹。离乡7年后，韦大卫才找到机会飞回大陆，那架“塞斯纳”上，还藏着他的两个朋友，这两人后来一个安家南宁，一个落户成都，他们回来的理由仅是“想家”。

王锡爵自称逃离台湾原因有三：想家、认同两岸统一，还有早先他在华航当机长时发生的一次飞行事故。当时他开着一架波音707从关岛飞往夏威夷，快到终点时发现迷了路，差点让上百名乘客迫降海面。最后虽凭他个人经验安全到达目的地，事故主因是美国的航空公司提供给华航的电脑计划有误，美方在王锡爵落地后还打来电话致歉，但华航不敢追究美方责任，仍将王锡爵从正驾驶降职为副驾驶半年。耿耿于怀的

王锡爵和在台北的夫人都没通个气，就回了大陆。

从近年两岸媒体的报道可见，“叛逃者”的动机除了政治倾向等因素外，多半也包含个人的难言之隐。1981年开着美制F-5F战斗机在福州降落的黄植诚，因非空军官校毕业，在军中前途受打压；1989年在广东上空弃机跳伞的林贤顺，无法忍受妻子引发的流言，来大陆后还要求与妻子离婚。

据大陆军中人士介绍，从1946年到1989年间，国民党空军有102人投奔大陆，而解放军里至少有15名军官逃往台湾，究其原因也基本不离个人家庭问题，或在军中遭遇的种种难言之隐。

“文革”际遇

朱京蓉的被迫叛逃，使他成为这群“叛逃者”里最为特殊的人物。

1969年6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黄天明和朱京蓉。会上，周恩来宣布“朱京蓉协助教官驾机起义也立了功”。一直担心自己下场如何的朱京蓉松了口气。会后，中共安排他们前往大陆各地游览半年。上海的纺织厂、造船厂，东北的钢铁厂，地下660米的煤矿，让朱京蓉对大陆的生产力印象颇佳。

其时大陆正经历“文革”，他们参观的工厂是否在正常运作很难判断，朱京蓉也没有机会了解真正的大陆社会正经历怎样的起伏。但当时台湾尚处于经济起飞前夜，那些工厂矿区本身的庞大已让他们开了眼界。

一次偶发事件，曾让他惧怕留在大陆。当时他和同行军官闲聊，3岁跟着父母到台湾的朱京蓉，说自己从小就想当飞行员，那名军官闻之色变，说自己从小就立志为人民服务，两人争执了几句，对方要批斗朱京蓉。朱京蓉哭了三天，提出去香港定居。“去了香港，台湾也会派人暗杀你。”一句话，把他吓了回来。

1969年11月，空军司令吴法宪宣布两人加入解放军，朱京蓉被任命为空军第九航空学校第二训练团参谋，原是国民党上尉的黄天明，被任命为第三训练团副团长，两人均比在台湾的军职高出一级。

因不准部队参与“文革”，朱京蓉平稳过了许多年。但进入民航工作的韦大卫，在“文革”中历经折磨。

韦大卫回大陆时，正遇上政府搞公私合营。一位北京的私营业主告诉他，如果拒绝公私合营，政府不但要你养着工人，还不给你批生产原

料。“政府也有它的一套。”韦大卫的清醒让他既不喜欢这些，也难讨人喜欢。

“文革”开始后，他拒绝周恩来的保护，和民航批斗他的人互贴大字报。1968年，民航专案组以“驾机叛国投敌阴谋”首犯的名义，将他送进沈阳皇姑区监狱。5年间，每隔一天他就得挨专案组的审讯人员一顿打，被逼承认罪名。

1974年10月，已被转移到北京继续关押的他，乘看守疏忽，从望台上跳出高墙，溜进城找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接待人员将他的情况上报叶剑英，他才得以安然度过“文革”。那时他已被打断过两根肋骨，妻子也被专案组逼迫跟他离了婚。

比韦大卫晚20年来大陆的王锡爵，有幸未遇此种波折。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夫人与他在北京重逢。

禁地

在部队工作的近40年，朱京蓉从来不谈台湾，早年是他没人可谈，后来是怕惹麻烦主动不谈。

1970年的春节前，他刚到部队时，虽然是周恩来宣布过的立功者，却没人敢靠近和他说话。他被单独安排在一个办公室，到晚上办公室又成了卧室。这年11月，他和同事介绍的工厂女工结了婚，他说从此下了班，至少有个能说话的人。

大陆开放后，经济日益代替政治成为大陆人的生活重心，部队里的年轻人对台湾也充满了好奇，知道他经历的飞行员，有时跑来问问他台湾什么样，他总是笑笑，避而不答。这习惯还救过他一次。1976年他在青岛疗养，排队时遇见范园焱，两人没说话，第二年范园焱开着米格战斗机逃到了台南。“如果那次说了话，我就死定了。”朱京蓉说。

不能言说的台湾，对朱京蓉而言更是不可归去的台湾。近十几年，两岸关系时好时坏，但即使关系最融洽时，经济方面俨然一体的两岸，对这些“叛逃者”们来说依然是一片禁地。

1992年从美国回大陆探亲的李显斌，1965年驾轰炸机逃往台湾，一回大陆，即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敌叛变罪处15年徒刑，2002年因病在大陆去世。而1975年逃至大陆的吴渺火，1998年返台探亲后，被判处4年徒刑。

前几年，母亲去世时，朱京蓉曾向台湾提出返乡奔丧。毕竟台湾从

未宣布他属于“叛逃”，黄天明和他在飞行训练时“失踪殉职”才是台湾当年的官方口径，即便他被宣布为叛逃罪，此时也已超过台湾刑法中20年的追诉期。台湾方面在商讨许久后，答复他只能从机场直接到殡仪馆参加葬礼，葬礼完毕后立刻返回机场。当时军职在身的他，看到条件如此苛刻就未能成行。

和朱京蓉一样，王锡爵也是有家难回，至今他的夫人仍在台北定居，他说：“两岸不统一绝不回台湾。”

旧事难忘

2009年春节后的一个下午，朱京蓉和记者讲起幼年居住的眷村、爱唱川剧的母亲，还有那个被父母留在四川江安老家，恨了他们一辈子的二哥。

每隔一会儿，他都会跑进屋子里，拿出几张照片，让图像帮助记者更好地理解那些过往。他的记忆充满了细节，就连当年刚跨出飞机时，拿着枪包围上来的民兵留着什么样的发型，都能描述得清清楚楚。

对于那些已经模糊的记忆，朱京蓉还能梦到。比如1948年被母亲抱着走上国民党空军运输机的场景已经模糊，但在他的梦里，一次次出现的、长长的用钢板搭建的野战跑道却永远都能保持明晰。

王锡爵也是如此。《凤凰周刊》在一年多前曾刊登过台湾作者郭冠英采访王锡爵后，写的一篇回忆他和张立义往事的文章。文中提到张立义驾机在包头上空出事那天，本该轮到王锡爵开这架飞机。“郭冠英写错了，那天就该是张立义。”王锡爵说。为了纠正这个细节，他多次给《凤凰周刊》发送传真，直到杂志答应刊登一个特别的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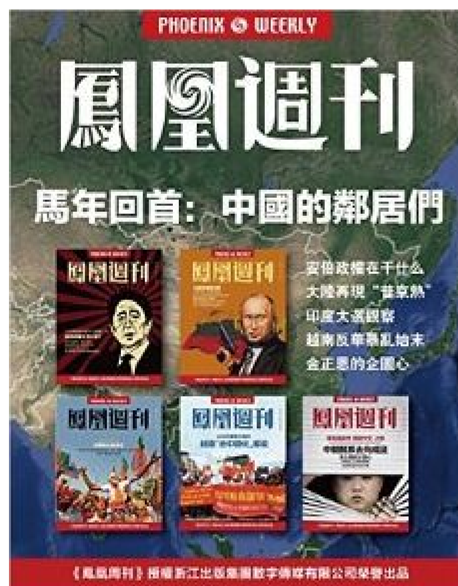
接受采访时，他给记者播放了一张光碟，那是朋友在他飞离台湾后，录入的港台地区各家媒体对他的电视报道。面对电视里他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的画面，他对本刊记者说：“我这辈子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较之这两人的念旧，韦大卫甚至连年轻时的恶习都固执地保留着，每顿饭都得就着三两二锅头才吃得下，谈起话来烟不离手。当年就是靠着这两样，让看守飞机的警卫和他成了哥们，使得他有机会偷到“塞斯纳”。

“今年，我很想回去看看”，朱京蓉说，他打算重提申请，尝试突破禁忌。半年前，两岸已经实现“三通”，从北京直飞台北仅需3小时。只

是3小时的空间距离，不知他们还需花多久才能逾越。

精彩推荐：《中国的邻居们》



点此阅读

第十篇 《台湾1895》 宏大主题败于“硬伤”

特约撰稿员/闻心

“八国联军刚刚火烧了圆明园。”演员李雪健做梦也想不到，就是从他嘴里说出的这句穿帮台词，竟让一部历史大戏从此在观众面前抬不起头来。和以往制片方哭着喊着请他出山不同，这一次，在36集历史剧《台湾1895》里扮演灵魂人物李鸿章，却是他自己上赶着“要拍的”。“因为我觉得它超过了一般戏的分量。”李雪健说。

号称反映100多年前两岸同胞反侵略壮举的《台湾1895》，近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高调亮相。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荧屏上强烈的主旋律意味很快就被荧屏下的火药味所淹没——由于剧中历史硬伤太多，而且其中有不少是连普通观众都能一眼看出的“低级错误”，几天来不仅让一个又一个专家学者前赴后继地跳出来说话，观众网友的激烈质疑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认为“台湾悲壮历史被拆解得支离破碎、错误百出”。甚至有网友尖锐指出：“不懂历史请不要拍历史剧，《台湾1895》严重误导观众。”

思考、警醒、图强，才是拍摄的真正目的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曾在越南抵抗法国侵略20多年，协助冯子材将军夺得广西凉山大捷的黑旗军，在1895年抗击日本强占台湾的战争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把自己的热血洒在祖国的宝岛台湾上。左宗棠、张之洞、刘铭传以及他们的志同道合者为保卫台湾殚精竭虑，两岸同心抗倭保台，无奈列强环伺，清廷政治腐朽，台湾被割让给日本。

再现这段惨痛历史的《台湾1895》好事成双，不但有幸11月6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开播，11月8日起更登陆台湾的纬来电视台，一部剧两岸同播，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该剧试图透过甲午中日战争的硝烟，让人们回望1874—1895这段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屈辱史，通过聚焦中国近代史上标志性事件——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作为立体观察自1873—1945年近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切片，不但再现了台湾被割让的历史全过程，讴歌了两岸同胞奋勇抗争的精神，更以近乎白描的手法，从狂啸的枪口、炮口上，从一个个屈辱的历史条约里，让帝国主义列强弱肉强食的贪婪本性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腐朽、崩溃的内因跃然荧屏。

刘永福的黑旗军为何被调往台湾？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为何中途离职？北洋重臣李鸿章为何保船避战？当时远东最大铁甲舰“镇远”、“定

远”为何成为甲午海战的牺牲品？总导演韩刚介绍，为了逐个揭示当年一些历史谜团，该剧在剧本创作、导演拍摄、演员表演、史料镶嵌、特技运用、美术置景、服装道具等方方面面，都忠实贯彻了真实还原的原则。此外，这部剧还采用84段客观旁白以还原历史的真实，特别制作了120多分钟的特技，共近600多个镜头，利用高科技手段还原战争、海战等场景。

“拍摄《台湾1895》，不应只为某种功利目的，思考、警醒、图强才是拍摄《台湾 1895》的真正目的。”韩刚说，刘永福、刘铭传、沈葆祯、冯子材、邓世昌、刘步蟾、丘逢甲、徐骧，以及海峡两岸仁人志士同仇敌忾，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慷慨悲歌，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一个饱受百年屈辱的民族，复兴之路任重道远。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对“和谐，发展，富国，强军”予以重视。

《台湾1895》出品人、九州音像出版公司总经理杜大宁说，深入、全面展现这段历史的电视剧，《台湾1895》是头一部，“和近代史上其他的一切屈辱都不同的是，台湾的被割让是近代中国“改革”失败的直接结果。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由这一结果上溯原因，才是本剧真正着力点所在”。

宏大主题在“硬伤”面前败下阵来

不过，开播没几天，该剧即被观众指出有大量史实错误，随着女作家阎延文为该剧挑错的博文的发表，这种挑错也愈演愈烈。比如两朝权臣李鸿章、左宗棠被误称为“三朝元老”；剧中提到赫赫有名的老将冯子材时，提督、总督分不清；早在1881年已经去世的慈安太后1884年还能发“懿旨”；字幕中把张之洞“张冠张戴”成另一位“张大人”张佩纶，其中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第2集中李鸿章的一句台词：“八国联军刚刚火烧了圆明园。”自此，大家都开始责备制片方的“无知”：“火烧圆明园发生在1860年，主要参与者不是八国联军而是英法联军，剧中时间又是在1874年，该剧连最起码的近代史常识都没有。”

如此宏大厚重的主题就这样在一些“硬伤”面前败下阵来。

“这部戏开播前宣传说是反映100多年前两岸同胞反侵略壮举的历史大戏，但我看到现在，感觉这不过是一部‘清宫戏’、‘辫子戏’，见不到台湾，离‘1895’也很远。”曾以10年之功写作《台湾三部曲》的女作家阎延文如此表达她对正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台湾1895》的失望。《台湾1895》的宣传语反复强调：全部“剧情几乎与史书无异”，“该剧剧情严

格按照史书拍摄，却比历史教科书更鲜活”。在阎延文看来，这些细节漏洞看似稍微严肃认真就能避免，但实际是创作态度和历史观上出了毛病，缺乏对历史的敬畏。“如果观众真把这部电视剧当历史教科书看，剧中抗法的‘烟鬼’和‘嫖客’已不仅是‘雷’倒全国观众，更要‘雷’倒100多年前浴血奋战、埋骨台湾的2000多名大陆保台英魂。”阎延文在博客里言辞激烈。

而制片方却觉得阎延文们多少有些小题大做了。

制片人赵鹏透露，该剧在后期阶段，编剧杨晓雄突然去世，让整个剧组措手不及，对于出现的纰漏，希望观众谅解。

“现在出现的问题，只是一些小问题。”杜大宁强调，历史学家和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都以各种形式予以指导并参与创作。在杜大宁看来，这是一部“瑕不掩瑜”的力作，目前历史正剧很难一点硬伤都没有，“不过我们会在第二轮播出时，把之前所有存在问题的地方都进行修改”。

观照真实历史，影视人任重道远

除了板上钉钉的硬伤，一些历史情节的编排也让台湾历史研究者们感到遗憾。阎延文指出，除了片名《台湾1895》有“台湾”二字外，该剧几乎看不到台湾本土英雄的身影。男一号李鸿章、女一号慈禧太后，海报宣传的全部8个主要角色中，没有一个台湾本土爱国英雄。“这段历史中，有多少值得表现的事件却一笔带过，有多少值得宣传的英雄却弱化处理，有多少值得抒张的爱国情结却没有依托史实展开。”阎延文说，全剧共有80余段旁白，可对石门抗日却连一句介绍都没有，台湾原住民作为中国人捍卫祖国宝岛的抗日保台第一战，用一分钟就一笔带过了。清朝总理衙门官员与日本公使对话场景中，清朝官员竟称台湾原住民为“生番”！

更让阎延文诧异的是该剧对抗法将士形象的塑造。1884年大陆赴台抗法名将刘铭传、孙开华等人，与台湾民众并肩奋战，浴血保台，最终取得台湾抗法胜利，法国远征军司令孤拔也死在澎湖。据报道，2004年9月，台北市宣布把120年前在中法战争中阵亡的清军将士入祀位于南港的公墓。阵亡清军将兵很多是湘军，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台湾，与台湾义勇军一道保台奋战，最后客死他乡。而在《台湾　1895》中，这些抗法将士是如何出场的呢？剧情先是设置了三个士兵抢夺大烟的场景，“来一口，来一口”地叫唤，大烟鬼形象跃然而出。而后，该剧又设置了一个捉奸的场面，制造出了吸引眼球、毫无遮拦的视觉效果，把爱国名将孙开

华的下属营官杨得标，赤裸上身提着裤子推向观众。

“历史正剧和一般剧类不同，它承担着再现历史空间、普及历史知识、还原历史人物的任务，往往又寄托着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关系到华夏子孙的文脉传承。”在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教授葛颖看来，《台湾1895》令一些观众不可容忍，其定位于“正剧”，却飘忽着“戏说”的影子，井水犯了河水，难怪不对味。

对于目前国内播出的电视剧正剧中的硬伤，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闫强表示自己也曾经发现不少：“《康熙王朝》这部电视剧拍摄得很不错，但是也有很多硬伤，比如说孝庄皇后总是说我‘孝庄’怎样怎样，其实孝庄是她死后的谥号。”闫强表示，正剧存在历史常识硬伤会对普通观众造成影响：“一般的观众都把正剧当作历史来看，包括电视剧中一些戏剧冲突、情感戏、称谓、时间上的错误等会让观众误以为都是史实。尤其对青少年的影响比较大。”

“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都只是快餐文化，想要真正地了解历史还得通过权威的历史著作，”南京大学教授、清史专家崔之清教授认为，观众千万别拿电视剧太当回事，“你不能要求编剧都是历史学家，就好比我是研究历史的，但我却没有能力做编剧。编剧也是要吃饭的，不要对他们太苛求。”

然而，台湾的1895，是中国人心中最深的痛。直到今天，海峡两岸还在承受着100多年来骨肉隔离的痛苦，“1895”这个历史符号，对今天的中华民族仍然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最大程度地真实反映、观照这段历史，让两岸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影视工作者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

第十一篇 台湾的“中国式宪政”

记者/段宇宏

台湾的现行体制诞生于1946年的南京，一直延续到现在。早年孙中山梦想的宪政，在台湾已经稳定巩固下来。

今年台湾大选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尤其是华人世界的关注，国际社会也给予较高评价。马英九获胜后，谢长廷在镜头前向其道贺，对己方进行检讨，双方表现出的平和与理性深受学者和媒体称道。

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的观点，一个社会当较为和平地进行两次政党轮替后，标志着民主政治进入成熟稳定期。转型时期，原来的执政党开启政改，在大选中失去政权，但没有边缘化，在野时仍成为第一大党，几年后又通过大选夺回政权。近期西方媒体和专家纷纷发表评论说，对于后发国家的政治转型，台湾的经验得失可资借鉴。

宪政构架与孙中山学说

台湾宪政历程和政体变迁，是中国现代宪政史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和大陆民国时代。　　孙中山的“宪政三段论”（军政、训练、宪政）和“五权宪法”构思，来自于他鼓吹“不学英美”的想法，这起始于同盟会时代。在《中国同盟会军政府之宣言》中，他将革命程序划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同时也开始向党人宣讲五权宪法。1914年，为反袁世凯，孙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其总章中进一步明确为“军政、训政、宪政”。

孙认为，西方三权分立理论和制度设计，把考试权和监察权交给行政部门，实为“行政专制”；选举中对性别、财产等有一定限制，并非彻底民治。他把国家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在民，由“国民大会”来行使，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治权”在总统和五院（行政院、立法院、考试院、司法院、监察院），五权相互制约，互不隶属。

经历过袁氏称帝、二次革命、张勋复辟、护法运动一系列事件，孙中山认为民众可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先知先觉”的自然要启蒙和号召后两者，为宪政进行“民众素质”的铺奠，这是他“训政”思想的来源。后来国民政府印制的很多“训政”资料中，也解释为：训政期间，官民同时进行民主训练和宪政教育。

1920年代初，孙中山引入苏俄的“以党治国”理论，形式上借鉴了部

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方式，但坚拒其意识形态；处理同志关系，仍要按中国人旧有的感情和思维对待。也因为如此，国民党史上没有发生过党内的大清洗和路线斗争，党内长期有不同观点团体和派系存在，宪政的推动，在内部有诸多“活口”。

孙中山几十年成形的政治思想体系，尤其是“五权宪法”，长达近百年的实施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和弊病，无数学者专家曾进行过探讨；孙当年所指责的西方政治弊端，后来通过民权运动和议会改革，也基本解决；但它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宪政历程和政治生态产生极深远影响（后来包括民进党在内的很多台湾政党在组织形式上也效法国民党）。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马若孟把孙氏的这套政治思想称为“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民主体系”。

“五五宪草”甫生即亡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孙中山早已辞世，他本人只提出五权宪法大纲，没有对具体操作进行详尽描绘，这个任务由力主马上实行“训政”的胡汉民、孙科来完成。

1928年10月，胡、孙拟定《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从理论、原则、制度方面说明了关于五院制度的设计与操作。后来陆续通过一系列法规和文件，“训政”体制得以建立，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

这一时期，宪政框架形式上已形成，但是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具有最高的“指导监督”职能，处于五院之上，“训练”国民掌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

1931年，蒋把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让给林森，对“组织法”进行修改，主席和国民政府的权力转移到行政院，主席成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蒋开始担任行政院院长。总统（主席）和行政院长孰为首长，职权如何划分，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争议，一直延及今天的台湾。

1932年，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成立了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聘国内著名法学家36人参加，孙自兼委员长，开始主持起草工作。第二年6月，吴经熊拟就的宪法草案初稿完成。初稿中几个重要条款是：总统、副总统由国民大会选出，军人非退职者，不能当任；总统为国家元首，不直接负行政责任，任期四年，不得连任；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免；省长民选，但在县一级未完成自治前，暂由中央任免。这部宪法，体现明显的内阁制特色。

草案初稿公开，遭到党内反对，主要认为总统不得连任的规定过严，要求改为连任一次或两次。1934年2月，重新定稿的草案公布，又体现出总统制色彩。党内高层在讨论时指出，此草案牵制太多、权力未能集中，运作必难灵敏，戴季陶写信给孙科说：“立法不可作悬想。”孙科又再次进行大幅修改。

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总统权限得到大增；此宪法具有强烈的孙中山政治学说特色。当年5月，《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相继公布，筹选国大代表。

中日关系日益紧张，日本在华北地区频繁滋事，华北地区未能选出国大代表，国民大会无法召开。第二年夏，除东北、台湾等日占区和察哈尔、北平、河北等被日本侵扰地区外，其余各地的国大代表选举均已完成。

原拟定于1937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因抗战全面爆发而中止，中国进入战时体制，宪政之路一阻断就是10年。

生于战乱的宪法

抗战期间，中央民意机构以国民党组建各党派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暂代，各党派通过参政会对于宪政的探讨筹备并未停止，一直延续到1947年，但实质性的进展，是在抗战结束后。

1943年9月，蒋在参政会提议设立“宪政实施筹备会”，后又更名为协进会。该会在宪政方面未有太多作为，但是推出一系列关于人权和新闻自由的法令，为战后民主运动留下法律空间。

1946年2月，国民党公布了根据此前多次政协会议达成的协议，其中规定第二年5月5日，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负责制宪。国代名额新增台湾、东北等地区150名；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国民党230名、共产党200名、青年党100名、民盟100名、社会贤达70名，国共两党在自己上述名额中，各让出10名予民盟），总计国大代表为2050名。

但是到5月间，国共军事冲突不断升级，6月全面内战爆发。11月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主要由1937年选出的国大代表构成，共产党与民盟没有参加。大会主席胡适接受了宪法草案，并开始审议。国民大会对宪法草案的审议经过了三读程序，对某些问题的争议相当激烈。在151条草案中，维持了104条，修改了40多条，增加了27条。

这部宪法草案是国民党联合民社党、青年党制订，由民社党领袖张君劢起草。蒋介石要求以“五五宪草”为蓝本，张君劢与青年党领袖李璜坚拒，张李二人信奉“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德国魏玛宪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应以其为蓝本。

经过双方的争论、协商，最终得以调和折衷，以孙中山五权宪法为基础，又结合西方三权宪法和内阁制。与“五五宪草”相比，有诸多修正，如淡化国民大会功能；大幅提升立法院地位；更多权力从总统转至行政院，行政院要向立法院负责；县级自治提升到省级，省长民选产生，省可以制定省宪法。张君劢使宪法更倾向于内阁制，所以蒋介石曾邀请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自己担任行政院长。

1947年1月1日，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在如火如荼的内战中正式公布，并规定从当年12月25日起施行。1948年3月，新选出的2800多名国大代表前往南京报到。一个月后，张群、王世杰等721名国大代表联名提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一案，要求给予总统和政府紧急处置权。

依张、王等人的意见：这是“行宪”和“戡乱”并行不悖，值非常时期，或因政府的守宪守法而无法处理危机，或因政府为应付“戡乱”而藐视宪法使其变成具文。又根据《胡适年谱长编初稿》，此案最早由国大代表莫德惠提出，胡适第一个连署。5月份，这一临时条款实施生效，实质上也等于基本冻结了宪法。

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退出大陆，把五院制与这部宪法及其附属的“临时条款”移置到台湾，宪法在大陆地区失效，但在台澎金马，一直维系这个法统至今，成为中国历史上施行时间最长的一部宪法。

戒严期的宪法活口

1949年5月，台湾省主席陈诚与警备司令部联合宣布“戒严令”，这一戒严就长达38年。“1950年后，虽然有宪政的框架和名义，但是无宪政之实，因为临时条款和戒严令将宪法中很多民主自由权利冻结了，当然，宪法还留了一个活口。”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曲兆祥说。

曲兆祥所指的活口是“地方自治”。“我认为，这几十年的地方选举对解严后的全面政改与和平转型有奠基作用。”他说。戒严期间，“中央政权”、“中央民意代表”、省长、直辖市长的选举被冻结；县市、乡镇的行政首长和省级议会的议员开放选举，符合条件者都可参加，并且经常有党外人士当选，但是禁止以政党形式介入。雷震作为国民党高层干部

和知名人士，因坚持组建政党和以政党形式介入地方选举，触碰了国民党的底线，引来牢狱之灾。

根据当时国民党高层的解释，“戡乱戒严”是为了“救亡图存”，而保留地方自治，是为了最终实现宪政，进行“民主训练”。“只要不违宪，不违反‘戡乱条款’，既使有国民党当局不喜欢的人当选，它也没办法，很难罢免掉，”曲兆祥说，“几十年来，鲜有罢免成功的案例！”

1950年至1951年，台湾先后完成第一届县市议员和县市长普选；普选前，民政厅贯彻“训政”思想，调集各县市选务人员集体演习，参加讲习的人就有2616人。此后，地方议会每两年改选一次，县市长每三年改选一次。

1950年代，国民党对地方自治干预还较多，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社会结构的改变也影响到地方选举；六、七十年代，参选人越来越年轻，学历越来越高，选举日益规范化和激烈，候选人们在竞选中猛烈抨击对方和批评国民党已司空见惯。早期民选的县市长，出身于上等家庭的占了60%，到1971年，降到10%，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崛起。

“万年国代”与宪政危机

根据1947年的宪法，国大代表要在1953年进行改选。第一届国大代表的法定数额是3000余人，要过半数才能召集国大。可是第一届国大代表散居在港澳台和海外的也没达半数，后来到台湾报到的国大代表仅千余人。国大代表又“至关重要”，可以选举总统，修改宪法和临时条款。蒋介石1950年3月在台北“复行视事”，在1953年底，又得面临第二任总统选举。

司法院出来释法，称国家发生重大变故（大陆地区已无法选出国代），第二届未能依法召集前，第一届委员可继续行使职权；立法院将法律条款修正为“国民大会非有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人数之出席不得开议”。这样一来，“万年国代”就产生了，先后于1954年5月至1990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至第八次会议。

1960年代中后期，很多国大代表过世或病重无法出席，才逐步开放“增补选”。1972年3月21日，蒋介石参选第五任“总统”，景象十分壮观，救护车从阳明山山上排到山脚，因为大量的国代已经80多岁，还有不少打着点滴，挂着尿袋，插着呼吸器，上山投票需要医护人员精心照顾；但是比起他们将要选出的85岁的蒋介石，老国代还算年轻。

蒋经国在1986年和1987年先后解除党禁、报禁、戒严令，为全面政改和宪改铺平道路；但是在大量历史原因造成的宪政积弊没有解决前，蒋经国就去世了。很多问题在1990年代初爆发出来。

1990年23月，选举第八任“总统”的国民大会召开，万年国代们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选“总统”了。会议期间，国代自行通过临时条款，将任期延为9年，提升出席费的预算，大幅度扩权，引发解严后第一次宪政危机。后来的历次宪改，国大都是重要“革命”对象。

3月19日，有3万余学生和市民聚集在中正纪念堂，要求全面改革国大；立法院、地方议会亦对国代大力挞伐。接下来的三个多月，李登辉集合各党派和学者召开国是会议，探讨宪改和政改问题。国民党高层基本达成共识，由李登辉、宋楚瑜等高官拜访老国代，苦口婆心劝他们“退休”。

次年2月，召开第二届国大临时会，其主要任务是修改宪法和废除“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便合法选出第二届国大。长达两个多月的临时会，场面非常惊心动魄。民进党从街头运动中崛起，草根性较强，其成员多数缺乏“克制力”，经常冲上主席台表达肢体语言，导致双方的代表打成一团。到4月份，临时会总算在“拳打脚踢”中完成自己的任务。

此后的历次修宪中，国大的功能逐渐被削弱。2000年的宪改，国大被转型为“任务型”机关，规定“只有当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总统、副总统弹劾案，才选出国代，召集国大会议”，因此得名“任务型国代”。

2004年8月，在宪政史上首次由立法院召开修宪会，198名立委全数通过一项提案，剥夺“国民大会”仅存的几项“任务”，把它下放给全体公民，此提案还提出“废除国民大会”。但是这个提案要最终生效，依宪法只能由国民大会通过，所以必须选举国大代表和召开国民大会。

一个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2005年5月选举出国代，这一届国代的产生，就是为了完成“自杀”使命。6月7日，国大以249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立法院的提案。最后一届国民大会主席叶菊兰敲下议事槌，宣布散会，国民大会从此消失。

七次修宪与和平转型

1986年9月28日，在朱高正的提议下，民进党在台北圆山饭店突然宣布成立。此时台湾还未解除党禁，民进党人士已经作好被抓捕的准备；时间一天天过去，相关机构没作出任何反应。该党在年底还参加国

大代表和立委的增补选，这是史上第一次以反对党形式参加选举。

从蒋经国开启全面政改到2005年，台湾共进行了7次修宪，其重要内容有：立委和国代全面改选，1994年时把下一届“总统”产生方式改为直选，省长和直辖市长由民选产生并废省（宋楚瑜成为首位民选省长，也是最后一任省长），行政院长的任免权交给“总统”，废除被诟病多年的国代等。立法院也陆续出台和修订很多巩固宪政的法律，如1993年10月，立法院通过增订人民团体法五十条之一，明文禁止任何政党在大学、法院和军队设立党团组织。

2000年，国民党内部分裂出亲民党，选票流失，导致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微弱优势胜选，台湾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曲兆祥认为民进党的执政简直是世界政党史上的“奇迹”，“从成立到执政，只花了14年！”

民进党在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台。很多绿营人士最担忧的是如何与军队相处及军队的反应，这是转型中最头疼的问题。苏进强还提到，陈水扁上台时，军队将领情绪普遍低落，私底下对民进党的抵触和不满时有所闻，在演习靶机上出现扁字猪头涂鸦，给陈提拔的将领贴上绿色标签，加以歧视。苏又称，幸好陈水扁尊重军队传统，高级将领们民主素养较高，基本服从了民选的三军统帅，才顺利完成政党轮替，算是有惊无险；不过军队的反台独传统容易造成“国家认同”混乱。

曲兆祥表示，民进党的台独性质，致使过去朝野两大党对很多议题的争论都容易导向统独之争，这是台湾独有的特色，使得本该更大幅度提升的民主质量和经济发展持续8年低迷；希望今后能够克服这种障碍，把精力更多放到民生和经济上来。

第十二篇 五四传统在台湾

特约撰稿员/周为筠

1969年5月4日，已罹患癌症晚期的殷海光，挣扎着从病床上爬了起来。破天荒地在家中燃放了一长串爆竹，作为对五四运动50周年这个重要日子的纪念。

劈里啪啦的鞭炮声打破了现实的沉寂，烟雾在身边回环萦绕，时日不多的他仿佛拨开迷雾，又看到了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其实，殷海光并没能赶上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但生于1919年的他却和先一代陷在岛上的蛟龙人物胡适、傅斯年、罗家伦，把五四精神播散到荒芜已久的小岛，让这个久未泛绿的化外之地沐浴到五四精神的圣光。

五四运动在台湾

台湾自甲午战败割给日本，殖民者妄图消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一面挥舞屠刀，肆意杀戮；一面挟持大和文化，强行同化。

就在大陆爆发五四运动前夕，岛内曾兴起一场政治改良性质的“六三法”撤废运动。所谓“六三法”是指在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的翌年，日本以“法律第63号”发布“关于施行于台湾之法律”。自此日本对台湾实行了独裁的总督统治。

当五四运动以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崭新的姿态震撼世人，无疑为正在寻求出路的台湾作出了清晰而具体的回答。其时为撤废“六三法”而苦苦奔忙的台湾青年蔡惠如，闻讯后前来大陆，接触到科学、民主的新思潮，接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后，思想开始发生裂变，便满怀赤子之心地奔赴新文化运动战场。

不久，蔡惠如等人便放弃“六三法”撤废运动，另行发起了“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即要求设置一个由台湾居民选出议员组成的议会。此举在1921年受挫后，岛内成立了图谋台湾文化启蒙与发展的“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族意识觉醒和文化重建开始。到1928年，就学于上海大学的台湾青年甚至成立了台湾共产党。

至此，台湾的政治运动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如滔滔江河不可阻挡，已发展成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而台湾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亦随之兴起和发展起来。号称岛内唯一言论的《台湾民报》，不时介绍转刊胡

适、鲁迅等人作品。新文学在台湾由此流播，到上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尤以鲁迅作品为最。这时郁达夫则借机亲访台湾，成为与台湾亲密接触的新文学作家，轰动了台湾知识界。

在台湾真正高举新文学旗帜，要推作家张我军。他在《台湾民报》上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新文学运动意义》等一系列评论文章，将五四新文学思潮直接注入，开启了台湾新文学的时代。他具体从白话文入手，与黄呈聪、黄朝琴等陆续发表有关白话文的论著。

五四运动对于日据时代台湾的启发，从思想观念到政治运动实践，从白话文推广到新文学阅读与模仿，从语言革新到新精神的锻造，各个方面都对寻求民族解放的台湾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的另一种命运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光复后的台湾重回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较为复杂。早期孙中山曾因政治原因，对五四运动给予支持，但是由于他深受章太炎、刘师培等国故派革命民族主义者影响，所以坚信维护传统文化是民族生存之本。孙中山对待五四运动态度犹疑不决，直接影响到继任蒋介石。

较之孙中山，蒋介石则更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试图切断爱国的五四政治运动与最初推动五四运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间联系。蒋介石将五四的意义缩小为学生的爱国示威，主要赞同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对于全盘西化和激烈反传统则不敢苟同。

自1949年以后两岸暌违，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亦愈发背道而驰。在大陆，五四运动被宣扬成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成为激进主义的思想宝库。在台湾，五四被戴上了赤色的帽子，逐渐成为一种政治的禁忌。

大陆强力宣传五四，使得中共成了发动五四的功臣，这让国民党不是滋味。蒋介石决定争夺五四的诠释权，发动五四主导权论战。当年的学生领袖罗家伦承命向大陆地区广播，说明五四运动是爱国青年自动自发，是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行动的合流，与两年后才正式成立的中共无关。台湾还将5月4日定成“文艺节”，以示纪念。

然而，这只不过是政治的需要，蒋介石对五四运动的怀疑并没改变，而且将之渗透到官方政策，在1966年亲手发动了颇具保守意味的“文化复兴运动”。而当时大陆正发动轰轰烈烈的“文革”，深受五四影响的毛泽东将五四中激进的一面发挥到极致。

蒋介石如此评价五四运动自有深远的政治和文化理由，避免了五四的激进主义的冲击，对台湾洗尽殖民色彩和恢复传统文化亦功莫大焉。但对五四精神在台湾的传播确是一场顽固的阻遏。

五四蛟龙陷孤岛

由于缅怀五四有导致反传统的危险，五四虽是一个可以被提及的历史符号，但岛内却禁止大规模地谈论和宣扬。与五四一起诡异的是像鲁迅等一批赤色作家，阅读他们几乎与政治恐怖相连。然而，五四的萤火在黑暗中仍旧闪烁不止，因为毕竟有五四时期的蛟龙人物在。

五四在台湾的启蒙首推傅斯年，这位当年学生游行总指挥赴台之后出任台大校长。他把台大办成心目中的北大，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当时台大学生反对当局腐败的学潮时有发生，傅斯年虽对学生中的共党分子不宽容，但对当局肆意逮捕学生亦极为不满，这位当年扛大旗的五四领袖向警备司令部彭孟缉喊出：“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台大逐渐成了台湾的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最难能可贵的是成为延续五四精神的堡垒。来台仅一年就逝世的傅斯年在台湾影响力极大，在知识分子精神失落的时代，他就像青年们的一座灯塔。

作为五四另一位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则毅然站出来和当局辩论，表现出了一个五四战士的使命感。罗家伦于1950年发表《五四的真精神》一文，试图说明五四不仅仅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他通过回忆五四运动，来告诫国民党不要走向“反动”。在1955年五四那天，他还承命向大陆广播澄清五四运动真面目。

要论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则非学术界领袖胡适莫属。胡适始终怀念着那个激情与梦想交织的时代，他虽不赞同五四的学生运动，但梦想新文化启蒙能让老大中国得以再生。在1949年逃亡美国的船上，胡适仍忙碌着筹办《自由中国》杂志，让五四的民主与科学两项核心价值能够在台湾扎根。

这份杂志在胡适这个精神领袖号召下，以殷海光为主笔，雷震为实际工作负责，展开新的一轮思想启蒙运动，逐渐打破岛内思想的沉闷和政治的禁忌。当时青年无不追看《自由中国》，借以看清楚现实。

1957年《自由中国》发表纪念五四的社论，结果当期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当局认为当下首要目标是“光复大陆”，而《自由中国》则表明继承五四精神的决心，要求恢复五四自由论争的气氛，这成为双方彻

底反目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局对《自由中国》一次次的警告、打压，这份杂志非但没偃旗息鼓还愈战愈勇。终于当局撕破脸皮，1960年彻底查封《自由中国》，把雷震投进监狱。

然而，五四精神一旦复兴就不会泯灭。在这一草木皆兵的时刻，傲骨嶙峋的殷海光仍公开为雷震鸣冤，对国民党极权政治进行批驳。殷海光作为台湾最负盛名的政论家，在《自由中国》时期因勇气和雄文而名扬天下。他认为五四的民主、科学启蒙并没有完成，在经历了天崩地坼的政治动荡后，最急切的是要完成五四未竟的事业，使得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殷海光也确实自命为五四后期人物，他以“五四之子”自称，来宣誓自己是跟着五四的脚步迈进。

殷海光在大学校园里，流露出青年导师的风格。自被傅斯年聘为台大讲师以来，一直与一班青年纵谈国事，成为他们的思想舵手。他把启蒙价值带到课堂上，教会学生怎么去独立思考。台大一些年轻讲师、助教和学生们，如陈鼓应、李敖、林毓生、张灏等，逐渐以殷海光为精神领袖，以演讲与发表文章的方式，继续科学方法、民主启蒙精神，批判当局和时政。他们在校园里推动着民主、自由与科学精神，并引介当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种种思潮。当时被拿来与五四相媲美，甚至称之为“新五四运动”。

不过五四运动面对的主要敌体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这次“新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虽是反传统，但重心已从文化转向政治，敌体已调整为极权。反对极权必定受到来自极权的打压，随着《自由中国》被封门，殷门弟子们一个个被开除公职，殷海光自己也受迫害而陷入困顿之中。

让殷海光蜷缩在一潭死水里是难以想象的，要他在肃杀环境中噤若寒蝉也是不可能的。不自由，毋宁死。在五四50周年那年，殷海光在贫病中撒手长逝。

野火烧不尽的精神

野火烧不尽的五四精神，很快被“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继承。接过五四火把的殷门弟子纷纷麾集旗下，《文星》成为他们新的发声之地。这份杂志代表着上世纪60年代台湾青年冲破传统、向思想权威挑战，几乎成为五四运动在台湾重新演练的场地。

李敖他们不断提倡现代化与民主自由，开展“中西文化论战”批判传统文化。《文星》后来干脆把批判的矛头掉转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公开

批判当局压制言论。当局认定《文星》和李敖已对其统治构成威胁，于是在1965年处以停刊。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大学杂志》诞生了，在政治高压之下又重新提出复兴五四精神的要求。蒋经国之于《大学杂志》，颇有当年《自由中国》创刊时蒋介石的角色意义。这份杂志朝着书生论政方向进行改组，陈鼓应等青年呼吁政治革新，时时撩拨着当局的脆弱神经。

这段时期的台湾社会激荡着热情与理想，发生的钓鱼岛主权事件就是典型。钓鱼岛诸岛隶属于中国，1970年美国与日本签署归还冲绳协定，竟不顾事实“决定交还日本”。当时台湾留美学生在爱国保土的旗帜下，纷纷抗议美日勾结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他们向官方机构递交抗议书，喊出了“外保国土，内除国贼”，与五四运动的口号如出一辙。

这场“保钓”运动迅速传遍台湾，在岛内形成一场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台湾处于戒严状态，禁止学生运动尤其是示威。“保钓”运动自然引来一连串政治干预，这更激起了学生们的义愤，矛头开始指向当局的独裁统治，变为要求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

1972年3月台北校际学生组织读书会遭拘捕，台大学生郭誉孚挥刀自刎，写血书以示抗议。此事立即激起海外舆论纷起。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发表声明，抗议美、日无耻行径。

“保钓”运动宛如另一次新五四运动，因为其口号正是半个世纪前五四运动的口号；而且两者所反抗的强权都是日本。这场运动激发了台湾青年政治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打破了校园和学界的沉寂，并形成了关心国是、讨论国是的热潮。

1972年5月，美国仍宣布如期将钓鱼岛交予日本，轰烈一时的“保钓”运动陷入低谷。而这次学生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到70年代末发酵成熟，终于酿成一场文化论战。

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宛如一场新五四新文学运动。所不同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对的是文言文的旧文学，而乡土文学一方坚决抵制外国文化艺术思想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主张文学向民族立场回归；另一方则重视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艺术思想，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态度。

跟着五四的脚步

五四的火种在台湾那么多年从来没有熄灭过，并且逐渐有着燎原之势，各个阶段都不断出现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政治文化运动。而五四精

神最敏感的地方无疑是民主，1977年中坜事件、1978年美丽岛问政运动，台湾民主化从小而大竟铺天盖地而来。

蒋经国在接二连三的状似惊涛骇浪的政治事件中，始终有进有退地采取适合事宜的政策。这可能跟蒋经国的身世与经历有关。蒋经国年轻时也深受五四运动影响，在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他与其他爱国青年一样参加示威，事后被学校开除学籍。不久，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游行被关押两周。后来在五四以来革命思潮影响下，竟迫切去红色苏联留学。

蒋经国对待台湾一轮高过一轮的民主运动，从开始的强压到默认，最后开放党禁和报禁，到1987年不得不宣布解严。

进入90年代后，五四在台湾已经家喻户晓。朝野人士每年在五四这天，都要以各种方式谈民主，思考大选后的台湾民主发展。而马英九似乎更有着浓重的五四情结，他多年来每到五四都要发文发言以示纪念。他曾在2004年质疑陈水扁政府以“民主”的名义无限地扩张权力，号召台湾文化学术界成立“民主行动联盟”，要推动“新五四运动”。2006年台湾举办“五四名人书札”展览，马英九还参观了胡适、鲁迅、毛泽东、罗家伦、傅斯年等手迹。今年五四迎来90周年之际，台湾定是迎来一场大庆。

历次五四精神在台湾的传播，让当年的历史情形和心境重演一遍，有若为台湾新生代所办的一场中国近代史的补课。我们再回眸那段壮丽的精神日出时，并非只是某种为了忘却的纪念。五四点燃了民主与科学之火，擂起了思想解放的战鼓，直到今天的台湾，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并为之继续跋涉前行。

第四章 文艺拾零

第一篇 那段台湾文学出版“小”盛世

撰文/杨照

1970年代是台湾文学出版的“小”盛世。说“小”，因为那个70年代的盛世，是由“五小”带领风骚的。“五小”，指的是五家在70年代极为活跃的出版社——尔雅、洪范、九歌、纯文学和大地。这五家出版社几乎专注只出文学书。

“五小”之“小”，有两层对照关系：一层和当时的老牌出版社相比，他们是“小”。老牌出版社要么有官方背景——像“正中书局”属国民党，“台湾书店”属省政府，“幼狮书局”属于救国团，“黎明”则是“国防部”的附设单位等等……要么是在大陆时就已经有了深厚基础的，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远东书局”等。这些老牌出版社都在名义上参与了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印制，光靠分配这部分的收入，财务上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五小”没有这种背景，也就没有这种来自公家的照顾，他们必须扎扎实实面对读者、面对市场，出一本书得一本书的收入，当然相对地规模较小。

另一层，对照于当时新起的综合出版社，只做文学书的“五小”是“小”。新的综合出版社，发展最快最顺利的，是《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崛起过程中，开拓出来的关系企业——“时报出版”与“联经出版”，它们有报社母体的充裕资金，又有报纸上的宣传支持，做起出版当然比较容易成功。“五小”也没有这种背景，不可能有它们那样的大手笔。

那“五小”有什么？它们有共同的文学热情，它们还有丰沛的文学人脉联系，掌握作者，作为出版的泉源。“纯文学”的创办人林文月，曾担任《联合报》的副刊主编，提携新人不遗余力，慧眼提拔了许多文学作者；“九歌”的创办人蔡文甫，也长年负责主编《中华日报》副刊，主要的工作、主要的本事，也就在于不停地邀稿，给各方作者写热情洋溢、鼓励有加的信件。还有不可遗漏的条件是：他们自身也都是杰出优秀的小说、散文创作者，和其他文学作者间有着同志情谊，分享同样的艺术创作甘苦。

尔雅出版的创办人隐地（柯青华），也是先以小说作者身份在文坛

出道。接着，他将精力用在编选台湾最早的“年度小说选”，显现在编辑上的特殊眼光。然后又担任过一阵子《书评书目》的主编，改行跨足办出版社，毋宁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大地”的创办人是姚宜瑛，出身记者，但不久之后就转而从事散文和小说写作，又接编《中国文选》，出版了一本《当代女作家小说选集》，以此为基础，转而自己开起出版社来。

唯一不具备明确作家身份的“五小”负责人，是“洪范”的叶步荣。然而叶步荣的出版社，有重要的合伙股东——两位在台湾文学史上留下经典不朽作品的诗人——杨牧和痖弦。痖弦同时也是那个年代台湾最炙手可热的编辑大将，主持《联合报》副刊和《幼狮文艺》的编务。杨牧、痖弦的人脉，足以保障“洪范”在出版上不缺稿源，而且杨牧为“洪范”所出的每一本书亲撰折页介绍，很快就被视为“洪范”书籍无可取代的重要特色。

文学作家、编辑经营的出版社，专注出文学书，固然是件自然的事。但比较令人惊讶的是，文学作家、编辑经营的出版社，专出文学书，竟然能够逃脱经营不善、快速倒闭的预期结局。并不是这几位文人别具经营长才，而是那个时代台湾的社会气氛，特别有利于文学阅读。

国民党的威权体制与新闻审查，压抑了政治与社会讯息的传播。各家报纸的政治、社会新闻大同小异，于是彼此竞争的焦点，就转移到了比较不敏感、比较不犯忌讳的副刊上了。激烈竞争下，报份增长最快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也就有了最活泼最精彩的副刊内容，连带地，阅读副刊就成了社会上许多人每日必要的活动了。如此一来，社会上的文学人口在那些年中快速激增。

这些养出了文学胃口的读者，刺激、维持了“五小”的出版活力，倒过来，“五小”及其作者显现的文学热忱又刺激、扩张了台湾社会的文学爱好，彼此互相推波助澜，冲荡出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少见的“文学当道”风光。

精彩推荐：《大陆中产阶级沉浮》



点此阅读

第二篇 台湾，独立书店风景

撰文/苏惠昭

坐落于孔庙的斜对面的深宅里，有老房子蕴存的温敦沉静气息，用心营造的独特空间氛围，和一本本暂歇于此并静静等待的书。

这是一家书店的自我介绍，很多爱书人被这段话诱引到台南，然后它逐渐成为“人文/缓慢旅行”必游的一站，“不到草祭买本书就白来一趟台南”。书店的名字叫“草祭”，主人是曾任摄影师的蔡汉忠。

每一个爱书人心里都有一间理想的书店，它一定不会大如金石堂、诚品之收罗所有类型书籍。它一定根据主人的品味、喜好呈现特有的样貌且难以复制。它通常隐藏在城市一角的巷弄等待被发现。还有，它不太可能赚钱，能够生存下来的，都各自有各自的坚持，以及一份美好的因缘。

这样的书店，现在我们称之为独立书店。

许多年以前在还没有金石堂、诚品，乃至只要端坐计算机前就可以浏览、下单的博客来网络书店的年代，中型书局和街角书店并存，它们卖书也卖文具，扮演小区的“微型文化中心”。尔后大型、连锁、复合浪潮滚滚来袭，再更进一步迈向再也回不去的网络时代，中型书局与街角书店节节败退残存者无几，因为它们太像大型连锁书店的缩小版了，这就成了独立书店诞生、滋长的土壤。某些时候，人们欲望着从“大众”脱逃，特别是别有怀抱的文青、知青、愤青们，以证明一个更个人化、更具独特性的自己，而独立书店正足以提供这样的舞台。

位在台大学区的唐山书局算是独立书店的前辈，30年前热爱人文社科书籍的陈隆昊为了解决自身“找不到书”的困扰，干脆开一家以台大学生为主要客源的书店兼出版社，它也成了戒严时期知识青年寻索共产主义思想的“地下仓库”，有着说不完的与警备总部纠缠的故事。时移事往，如今的唐山书局仍在一面倒向市场、媚俗的世态中坚持一路走来的身姿。

相对于没什么门面、幽幽暗暗的唐山，淡水河畔三岁大的二楼书店“有河book”别有一番风情。除了文学、电影、旅游、生态书籍，以及与唐山并称拥有最多的诗集，它还有街猫来去，有咖啡香，有每周主推书，有一位诗人女主人隐匿，有北艺大学生作品，有来访诗人在玻璃窗上留下的玻璃诗，有比书更吸引人的壁画和手稿，还有不定期上演的读

诗会、电影放映会、音乐聆赏会。“有河book”带给满街摊商的淡水另一种层次的风景。

位在新北市永和的“小小书房”则陈列以文学艺术为主的独立出版品、二手书、童书和独立发行的CD，办读书会，主人刘虹风把书店看成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人安静地对抗以传授技能为主的成人教育。

每一间独立书店的主人其实都在对抗，试图于现实中点燃理想的火苗，对“东海书苑”主人廖英良来说，他要对抗的是走进大型连锁书店时那种“太多华而不实的书”涌来的坏情绪，以至他甘愿顶下书苑经营，十多年来几度迁移，现在的“东海书苑”停留在台中美术馆区，卖环保、性别议题、本土历史文化书籍，也卖诗集，卖独立发行的CD，卖咖啡餐饮，这是他理想中的书店，只有他想要的书和音乐，并且不是观光景点，而是一处避难所，一盏微亮的灯。

嘉义的“洪雅书房”不只是静默的对抗，而是用战斗的姿态存活着。主人余国信为社会运动者，“洪雅”则为了传播思想而在1999年诞生，以书作为抗争的武装，有人预言撑不过三个月，如今进入第13年，办过600场以上的公益演讲，嘉义旧监的保存、历史建筑“玉山旅社”之修治都有“洪雅”活跃其间的身影。

当一家家独立书店变成为文化景点，当台湾“文化部”新修定的《补助办理文学阅读推广作业要点》首度把独立书店纳入补助范围，每一家独立书店的每一天其实都在为生存搏斗，在与大型连锁书店的低价折扣拔河。有人称这一群文化人为“贴在现实水平上飞行的理想者”，却是一场疲累而没有安全网的飞行。

有些独立书店倏忽就消失了，如银色快手夫妻的布拉格书店。因为开设在租金高昂的师大商圈，理想抵不过现实，一周年后便办了告别式，却留下了脸书继续与粉丝沟通交流，书店于是在虚拟世界中活了下来。

第三篇 追寻台湾的阅读趣味 台湾读者热衷的大陆书籍

撰文/苏惠昭

2010年，有一本书狠狠冲击台湾社会大众，它分上下两册印行，上册《医行天下：寻医求道》，下册《医行天下：拉筋拍打治百病》，作者萧宏慈。因为上下册分售，应用篇的下册销量约为上册两倍。《医行天下》上下册分别占据博客来排行榜年度百大之第二和第十名；下册是诚品年度畅销书第三名、金石堂年度畅销榜医疗保健类第一名并被选为“十大影响力之书”。《医行天下》上下册在台销量粗估有四五十万册，两岸交流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大陆作者在台湾如此翻云覆雨，以致他所推广的拉筋拍打风行草偃成全民运动。

大陆作品渗入台湾

事情总有个源起。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日，中国大陆作家作品悄悄渗入台湾，进入广大人民阅读生活的？答案，一般不是指向二月河便是余秋雨。

1992年尔雅出版社出版由白先勇引荐的余秋雨历史人文散文集《文化苦旅》，结果反应热烈，既是当年金石堂“年度十大影响力书”，也获《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至今十多年过去，《文化苦旅》历久弥新，更是中学老师必开书单。“中国文字可以写成这样美，我从未曾见过。”一位企业家解释他着迷《文化苦旅》的原因。

余秋雨也几乎一人垄断了历史人文散文这个文类，此后台湾凡引进同类型作品都被拿来与余秋雨比较。套句尔雅负责人隐地先生的话，余秋雨红，但红过了头，红到出现“反余”声浪。

《文化苦旅》出版那一年，台湾还有一本轰动的畅销书，张戎的自传体小说《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那段中国大陆犹如神秘大地的年代，“文革故事”对台湾读者恒常有吸引力。

然后从1994年起，巴比伦出版社陆续推出二月河授权版《二月河作品集》。无趣的历史课本，不会说故事的历史学家，以及基因里与中国历史的某种连结，台湾一股由《三国演义》扎下基底的中国历史热一直在寻找出口；也就是说，一个历史小说，或以小说方式论说历史的市场老早就准备好了；1985年由食货出版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已经预告，到二月河作品一问世，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帝王系列，仅仅透过口碑传播，读者几乎是一本一本地等待，一整套一整套地购买，乃至

组成“二月河读书会”相互切磋，“你读过二月河了没？”成为考验是否理解政治斗争的通关密语。

余秋雨和二月河确实是两大高峰群，一个指向历史人文散文，一个指向历史小说，这两块正是台湾读者兴趣浓厚而台湾作家无从也无力处理的，唯有向古老的中国大地索求。1996年出版，明陵挖掘纪实录的《风雪定陵》也便成了当时受到热烈讨论的大书。余秋雨、二月河与1990年出场的《河殇》也不同，《河殇》某种程度被当作教科书读，但阅读余秋雨和二月河，始于纯粹的阅读乐趣。

台湾拉出的大陆当代文学线

台湾读者也并没有独独钟情于历史，要认识变化中的中国大陆，当然不能不读当代小说；无论语言或故事，其中的差异性充满了正反两面的魅惑，所以时间再往前推几年。1986年，台湾出版界便有一个大工程，郭枫主持的新地出版社以“拥抱中国土地，开拓民族文学”之名，推出“当代中国大陆作家丛刊”，之后再由其中分出“女作家卷”。台湾读者初次大规模接触当代大陆一线作家如阿城、张贤亮、莫言、冯骥才、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汪曾祺、张辛欣、王安忆、铁凝、舒婷、刘索拉、北岛、王蒙、刘再复、张承志，丛刊指标当然是阿城《棋王　树王　孩子王》，而莫言和王安忆后来则成了洪范、麦田等出版社长期经营的作家；莫言以《红高粱家族》，王安忆以《长恨歌》，奠定在台湾的大家地位，加上余华和苏童，王余莫苏四人应该是台湾读者最熟悉也持续阅读的大陆中生代重量级作家。作品虽然没有晋入畅销榜，却拥有固定的读者，并备受文学评论家青睐。

新地出版社特别拉出一条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线。远流出版小说馆1988年开张，编号第一的书是张大春《四喜忧国》，第二号就是古华《芙蓉镇》。编辑显然有意将大陆文学置放在“当代华文作家”脉络，不希望独立成线，这也是后来出版社如麦田文学、时报新人间或联合文学普遍的做法。远流小说馆后来出版了苏童《妻妾成群》，余华《十八岁出门去旅行》、曹冠龙《阁楼上下》等作品。《妻妾成群》因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触及“纯文学”以外更广大的读者；《阁楼上下》则是1993年《中国时报》开卷版选出的十大好书（开卷版好书通常是“叫好不叫座”的指标）。至于余华，还要等到1994年麦田出版《活着》，才正式被读者接纳。联合文学在2003年推出新版《芙蓉镇》，2007年麦田还为《活着》做了个特别纪念版。

1990年代后台湾纯文学书受到非文学书挤压，吹起轻薄短小风，而与更具阅读乐趣与知识含量的历史书相较，厚实沉重的大陆当代文学明

显不易经营，出版社在理想与市场之间不断测试读者口味，寻找平衡点；文学作家名单陆续加入了王朔、严歌苓、高行健、虹影、贾平凹、李锐、蒋韵、韩少功、苏晓康、张炜、池莉、陈染等，一个乱枪打鸟年代。高行健于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联经1990年即出版他的《灵山》，卖了3年总共卖出180本，前仆后继，如滴雨入海，无关文学评价，这是大多数大陆当代文学作家在台湾的命运。其中当然也有获青睐的，譬如虹影《饥饿的女儿》，譬如陈丹燕《上海的金枝玉叶》。隐地说过，如果他要在尔雅出版的近七百种书中选出十大，《上海的金枝玉叶》必然名列其中。

透过中国当代小说，台湾读者勾勒了一幅由《红高粱家族》、《妻妾成群》、《活着》、《饥饿的女儿》、《废都》等想象与真实相互交串组合的中国大陆图像，问题是现实的中国已经快步走到一个小说不及的所在，台湾所认识的大陆当代文学家已不足以跟进，他们说的故事也成了某种历史，所以除了历史，台湾人民也亟求了解“正在进行”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黑暗与光明，这反映在出版社的选书上，在文学这一块，“争议”、“话题”与“大众”明显成为新世纪新标准，阎连科《丁庄梦》是“再次封杀之作”；韩寒“反大人文学”的《三重门》在大陆创下爆炸性的销量；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填补了撕去的历史扉页”，她说故事的口气又何其动人；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宣称是“台湾首发，大陆禁书”。如果有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的书更好，如刘震云《手机》、毕飞宇《青衣》，如麦家《风声》，纯爱小说《山楂树之恋》则直接以“张艺谋电影”营销。郭妮青春小说《麻雀要革命》则被与《流星花园》相提并列。韩寒获选为2010《时代》周刊“全球百大影响人物”后，半年之内有三家出版社出版他的《青春》、《他的国》等四本书。《杜拉拉升职记》和《蜗居》这两本“电视小说”，带领台湾读者直击现在进行式的北京、上海生活。慑于“百家讲坛”威力，几个收视率高的节目（书）一一渡海来台，有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刘心武《揭密红楼梦》、钱文忠《玄奘西游记》。

只是在“补习”经典这一部分，“实用性与阅读乐趣”至上的台湾读者似乎还没有准备好。

如果说台海两岸读者在阅读小说这件事上有惊人的一致性，除了余秋雨、二月河，那么就是《狼图腾》、《藏獒》，以及盗墓小说。《狼图腾》不只是小说，还被台湾企业家当作研究民族性格与企业经营的教本。盗墓小说，或天下霸唱《鬼吹灯》，或南派三叔《盗墓笔记》，这一派混和中国古文化、各家邪术的神秘惊悚小说，对台湾通俗小说读者来说既是全新品种，又是台湾作者所写不出来的题材，新鲜刺激没有纯

文学的门坎，一时之间蔚然成风，如流行疫病蔓延。桐华《大漠谣》三部曲，这一款把背景设立在西汉，两男夹一女的爱情小说，也拥有不少书迷。

也有明知此路难行的尝试。科幻一直是台湾小说很弱的一环，2011年，台湾出版了评论家王德威谓之“想象奇诡，气势磅礴”，“堪称百年中文科幻小说首选”的刘慈欣《三体》系列，这对台湾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有待观察。藏族伟大英雄史诗、阿来重新演绎的《格萨尔王》，也降临台湾找寻知音。

承续二月河，历史小说或小说历史这一块，不管是以小说笔法写史的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奇情冒险的月关《回到明朝当王爷》、《大争之世》，或是被誉为“二月河接班人”酒徒的《隋乱》、《开国功贼》，再或“比小说还好看”的李开元《秦崩》、《秦谜》，把中国历史精炼成话本小说的袁腾飞《历史是什么玩意儿》系列，从来生生不息。用当代语言写历史，最好是有点好笑的，台湾读者很着迷这种表演。

台湾读者最大的憾恨，恐怕也是完全欠缺会说故事的历史学者或历史小说家。

在这样的景况下，迟来的残雪和史铁生，更显寂寥。暴雨一般猛烈的冯唐小说，到得台湾忽然安静无声。杨红樱、郑渊洁、郭敬明、尹建莉、王树增、笛安、小桥老树、周国平，这几位名列“2010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作家，台湾人多不知他们何许人也。事实上台湾出版过笛安《芙蓉如面柳如眉》，还有王树增《长征》三大册。毕飞宇和刘震云是异数，他们遇到了愿意经营系列作品的九歌出版社。

超越意识形态的新书写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拥而至的结果里，很少去追寻产生这结果的原因，于是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去寻找那些可能令人不安的原因。”中国大陆的快速变化，变化到小说家如余华都不能不受惊扰，必须诚实无愧地写出小说无法承载的，他的观察和思索。

一如余华，顺着中国大陆的发展，台湾读者也开始追寻历史与小说以外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现在与未来，于是有人出版“披露了改革开放下九亿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困境”的《中国农民调查》；有人出版凌志军《成长》、《联想风云》、《改变》、《中关村》，吴晓波《中国·崛起》、《大败局》。潘石屹《我用一生去寻找》、冯仑《非常道》的出现，某种程度代表中国地产大亨对台湾取得发言权。郎咸平《注意！重点不在GDP》、《中国即将面对的14场经济战争》、《谁在谋杀中国经济？》，反映了台湾对中国经济未来更深一层理解的渴求。《未成熟的国家》、《极权的诱惑》，“中国最年轻的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被台湾认可作为“认识中国”的引路人。2008年，宋鸿兵《货币战争》一路无阻打入畅销书榜，接下来的续篇，以及勾红洋《低碳阴谋》、李德林《高盛阴谋》、孙兆东《世界的人民币》。台湾人万万想不到，新一代中国大陆经济学家、分析师、银行家正在一点一点地松动数十年来台湾以英美财经书为首的阅读版块。

但一切都敌不过一个教人如何自助养生的萧宏慈，毕竟健康比赚钱大。

《寻医求道》创造了中国大陆书在台湾的销售高峰，可以在中医诊所看到它，也可以在从来不买书的人家里看见它。台湾媒体则称萧宏慈“萧大侠”，望之如大旱盼云霓。撰写《黄帝内经养生智能》系列养生书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活到天年》系列养生书的中国养生大家武国忠中医师、《求医不如求己》的“中国第一医家”郑幅中（中里巴人），如今亦无一不是台湾民众信奉的养生老师。

超越意识形态，没有省籍隔阂，在中医学这一块，中国大陆与台湾，一个和平的故事正在书写中。

第四篇 台湾文化地标进军大陆 诚品：演绎书界传奇

撰文/张薇

这是2010年6月1日的新闻：诚品董事长吴清友公开宣布，将在2014年设立大陆第一家诚品书店，地点不在之前设定的北京、上海或深圳，而是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东畔。苏州政府官员连续3年到台北拜会诚品是促成首家诚品落户苏州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不会是中国大陆的唯一一家诚品。2009年12月，吴清友已经明确表示，诚品将在香港成立控股公司，与大陆或香港不动产业者合作进军大陆市场，争取各城市的支持，所以未来10年，诚品有机会在中国开出100家店。

2008年，在诚品书店20周年记者会上，吴清友勾勒了诚品未来20年的蓝图，其中之一就是到大陆开店。“大陆展店”在诚品其实已不是新闻，2005年起诚品即以图书物流事业先行，到大陆探测市场水温，协助过山西新华书店、北京出版发行集团建置图书物流系统，亦取得新华书店云南与广东物流案，与大陆出版界互动积极。

诚品的大陆布局随着时局的流变步步为营。2007年，在诚品信义店两周年庆的记者会上，吴清友布达诚品新任执行副总人事，吴洁，他不到30岁的女儿，东吴大学英文系毕业，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广电硕士。1989年诚品诞生那一年吴洁才11岁，18年后以接班人的态势走进诚品，但她走进的不是一个爱书人的梦幻天堂，而是面临严峻经营与转型压力的战场。爱泡诚品以吸收文化艺术养分的“诚品咖”也终于知道，从1989年到2004年，这家代表台湾文化高度的书店一直处在亏损状态，但是它不能倒也不会倒，这是吴清友对台湾的承诺。

不会倒，但诚品必须彻底改变，在“作为文化指标”这面指向天际的大旗下，从精英的、非主流的到拥抱主流与大众，这是专业经理人吴洁赋予自己的诚品改造任务。一开始诚品是一家人文艺术书店，现在它当然还是书店，但诚品的书店面积缩减也是事实，应该说，现在的诚品是一家由书店奠基，聚结人潮，进而让各式各样商品滚动的大商场。这个大商场之所以散发百货公司没有的独特魅力，则是“诚品”这个品牌所代表的理念与价值。

诚品故事

1989年3月12日植树节，一家定位为“人文艺术小型专业书店”的诚品书店在台北市敦化南路诞生。那一年的台湾，“小虎队”初红乍紫成为全民偶像，侯孝贤《悲情城市》得了威尼斯影展金狮奖，表演工作坊

《这一夜谁来说相声》演出次数破了剧场纪录，虽然股票开户人数破三百万，但豪宅几稀，“低调奢华”的市场尚未开发，民众还要再等待9年台湾才有第一家星巴克进驻。诚品的高雅古典与欧洲贵族气质遂让很多平民百姓在惊艳之余，带着一声“这里的东西不知道要有多贵”的嘘叹过门不入。

很多人不敢进去，理由是这里看起来太高尚了，只穿地摊T恤破牛仔裤配一双拖鞋的自己，好像不配进去里面消费。这对不讲究“气质”和优雅的台湾人来说，毋宁是一种震撼教育。

但台北多了一家人文艺术书店，这在当时并不算是个大新闻。

其实吴清友原来就是一个风雅的人，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人，他出身台南将军乡，台北工专（现台北科技大学）机械科毕业，事业群以代理欧美厨具起家的诚建公司奠基，是个成功的商人。但他又患有先天性心脏扩大症，在动过一次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开心大手术后，人生的大梦从纯粹的“在商言商”滑向了人文艺术，滑向了对生命的全面观照。而有什么能够涵盖生命的每一个领域呢？吴清友想来，唯书或阅读。书是如此神圣又如此普罗，它需要一个宽敞明亮的空间来搭配与陈列，逛书店的人脚下踩的是原木地板，飘进耳朵的是古典音乐、新世纪音乐，触目所及皆书味浓厚的服务人员和精致海报，并且有各种与书、与阅读相关的活动可参与。

这是吴清友理想中用来“款待”客人、能够带给人好心情的书店，一开始他没有企业化经营的打算，也没有想过要做连锁。

所以诚品是一小步一小步改变的，每一步的改变都指向不同的未来，它的改变来自吴清友对书店经营知识的累积，也来自于充满创意与理想的一群“诚品人”。于是从“人文艺术小型专业书店”开始，接着成立画廊和诚品艺文空间，举办海报卡片展，也推出有别于畅销排行榜的“诚品选书”，并为此写下一段宣言：“我们不选：已经再版的书，没有版权的书，会被时间淘汰的书，以及媚俗之作。我们选的书：学术、专业、一般均可，议题不一定要严肃，但要有创作与出版的诚意，所以它可以是任何一种书。”

这段宣言很能代表某种吴清友以其人其身示范的“诚品人精神”，诚品也以这样的精神，某种不同于世俗的品味，吸引气味相同的人聚集、分享，然后再共同创造。很多台北人发现，他们其实一直在渴求诚品这样一个梦幻空间，或者说，就是诚品看见了蓝海。1991年表征诚品阅读态度的《诚品阅读》创刊，以孤独做主题。

成立一周年，诚品推出“梵谷百年祭纪念活动”，接下来一年是“莫扎特200周年系列活动”，第三年“现代文学与60年代”。第四年“人间谬思对话”。第五年“台湾一项阅读革命正在进行”，到第十年以“创世纪，阅读者的故乡”为名举办周年庆时，主流媒体前前后后大规模推出“检验诚品”报道，这时候的诚品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全台有20家分店的大型连锁书店，从初始的“六人小组”扩充到600人的团队，光是敦南总店一年就有500到800场活动，地位等同于台北故宫与台北市立美术馆的“民间文化中心”，文化观光不可错过的景点。换句话说，一个强大有力的文化品牌已然打造完成。通过强势企划，诚品可以做到让大部头的冷门书“大爆热门”，很多出版社都知道，有些书只有诚品能卖，譬如夏宇的诗集。

诚品艺文空间也成为前卫艺术的筑巢之所，1994年所举办的“男男女女，新文化——同性恋专题”，开启台湾同性恋议题热潮。1998年它更在台北火车站前天桥挂起一祯祯巨大的台湾作家照片，入侵公共空间举办“文学天桥作家影像”，给予熙来攘往的民众新的视觉体验。

1997年“诚品讲堂”开跑，以延伸阅读，深化思考，扩张领域，定义关怀的新知识之旅，先行设定“都市空间与建筑”、“说书”、“哲学”、“台湾研究”四大领域为课程范畴。“诚品讲堂”等于为台湾设立了一所“诚品大学”。

1998年出版的《诚品副作用》则是李欣频的诚品文案集，也是一部文字风格化的诚品企业史，一本台湾广告文案的奇书。

各种关于诚品的论述四面八方纷然洒落，每一个文化人都有自己的诚品体验、诚品观察，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说：“这是个让人感动的地方。”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出国巡演时会想家，而“想家时总是会想到诚品”。其中文化评论家南方朔说的“（诚品）书已非书，书店早已不是书店”，“而是一种品味、一种仪典、一种市集，梦幻东区的另一种梦幻”，最能代表诚品所要构筑的“诚品意识”——“在书与非书之间，我们阅读”，在书与非书之间的诚品，不论卖的是面包、咖啡、衣服、提包、鲜花，都是阅读，不阅读的人进到诚品也因此沾染了文化艺术，借着一杯卡布其诺完成了想象中的阅读。

诚品帝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建构起来。《商业周刊》以“精致与古典，诚品将梦想带给普罗大众”为题，抢在1998年率先做了诚品专题，封面是着卡其色裤，白衬衫，打一条暗红白点领带，十指交缠于腰前的吴清友。

《商业周刊》分析，诚品打破了传统书店的经营模式，由品牌先奠

定成功基础，再带动商场、书店与零售的复合式经营，并以巧妙的交叉营销结合三者。零售服务得以快速展店的魔法在于“复制”。“7-11”就是快速复制的成功模式，诚品与“7-11”不同之处，在于它懂得结合区域特色，做到“连锁而不雷同”，譬如青少年聚集的西门店就多了漫画与罗曼史陈列；世贸店开在与国际接轨的商业区，主打“阅读企业人文”。天母店的定位是“阅读休闲生活”，台大店则是“阅读社会人文”。

以书和书店为核心打造出诚品品牌，藉由事件营销与活动营销维持高来客数，虽然消费者到诚品来不一定买书，更多是到现金流量高的商品部、餐饮部，或者毛利高的零售事业，营收因此拉高，所以书的营业额虽然只占总营业额的三成，却扮演了催动引擎的角色。

吴清友的梦想越来越大，卖场也越来越大，发展到一定程度，面临的就是转型。转型的诚品必须突破两大困境：第一，它的财务不能被理想拖垮。第二，它不能只反应中产阶级的品味。

第二个十年

诚品用第一个十年扭转了台湾人对书店的想象，让台湾的某一个部分变得精致美好的“不像台湾”。第二个十年，诚品走得更远，一年举办的活动高达两三千场，2005年开幕的信义旗舰店，号称“台湾书店终极版”，“集合诚品所有美学体验的集散地”，投下的装修费高达6亿台币，加上一亿元押金和2亿元的库存书费，另外还得月付3000万元租金。2500坪（1坪约等于3.3平方米）的商场面积是敦南店的三倍大，从地下二楼到地上六楼共八个楼层，其中二到四楼是书店，地下楼为美食街，六楼有餐厅和专办演讲和展览的“诚品厅”。当有人质疑诚品到底是书店或是商场时，诚品的说法是“我们的文化质量很高”。当外界怀疑诚品是否能够承担如此大的营运压力时，吴清友这么回答：“一个人由心念去发展一个事业，这个事业自会去寻找它的出口。”吴清友有信心信义店第一年就会赚钱，但这却不是他现阶段思索的重点，他想的是诚品在亚洲，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

信义店并没有如预期的赚钱，但损益平衡，开幕第一年，吴清友又动了一次心脏血管大手术，推入加护病房时他写下“诚品万岁”四个字，意思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珍惜这个台湾人一起创造出来的、得来不易的成果。

2007年，敦南诚品店开始24小时不打烊。

台湾人当然“以诚品为荣”，诚品无价，但诚品品牌再亮，形象再

好，也必须面对财务报表，提出创新的转型策略。吴洁接班后最大的动作，就是把书店和百货合为一体，整合书店事业部与商场事业部为通路事业部，更进一步以输出Know-How取代自己辛苦开店营运的压力，以与勤美合作的台中勤美绿园道商场为例，就是由诚品取得五个楼层，引进书店、酒窖、咖啡、餐饮等业种，除书店由诚品自己经营，其他业种皆由诚品招商引进。书店的利润低，阅读人口下降，坐上经营者位置的吴洁终于明了，“书店的风光若不靠商场的获利支撑，无法走下去，那是生存的平衡”。

“事业自会去寻找自己的出路”，未来的诚品，不论在台湾或大陆，都会以这样的策略为发展主轴，走大型旗舰店路线，办国际级大展，证明自己是新一代的文创产业平台。 诚品，从来不只是一家书店。

第五篇 台湾“国宴”变法

撰文/王丰

台湾，从收归中国版图以迄清朝乃至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以其地方政权之地位，历来不曾举办过任何“国宴”形式的盛大餐会。直至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蒋介石在台湾延续其小朝廷，一整套富于大陆遗风的厨艺特色以及国府先前逐步积累的“国宴”仪式传统，也随之“播迁”到了台湾。

半个多世纪以降，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三任“总统”时期的“国宴”，可谓“萧规曹随”，没有太大的变化，大体上是早年祖国大陆原中华民国“国宴”特色的移植。李登辉上台以后，随着岛内政治气候的微妙转变及李氏个人国族认同迥异于两蒋，不论是菜谱还是宴会仪式内容都随之起了极大变化，开始朝极具台湾地方特色的趋势发展。陈水扁当政，企图别创一格，完全扬弃两蒋时代遗留的“中国风”，最后竟沦为全台“政治流水席”。马英九上任迄今，“国宴”仍有浓浓“台味”。

若纯从美食文化之考究、餐饮气氛之营造等方面品评，台湾的“国宴”确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况味。

老蒋的“国宴”

蒋介石在位时期的“国宴”，与其说它具有“蒋介石风格”，不如说它具有浓浓的“宋美龄风格”来得更贴切。

据官邸服务人员表示，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历来操办“国宴”都委诸于台北圆山大饭店，而圆山饭店厨房在举行国宴前一两个礼拜，会以工笔中楷在精美的菜单用纸上，誊写一份菜单，派人呈送到官邸，上面写着恭呈总统暨夫人。蒋介石向例不过问菜单琐事，均委由宋美龄全权处理。宋美龄在掌握了外宾饮食习惯讯息后，最后裁夺。

宋美龄确认菜单以后，负责烹调制作“国宴”的台北圆山大饭店的厨房，便开始忙碌起来。基于安全考虑，依循大陆时期以来的惯例，蒋宋两夫妇出席“国宴”场合，使用的菜肴餐点，乃至饮用的开水、饮料，全由士林官邸厨房按照“国宴”菜单照做一份。表面上，蒋介石、宋美龄食用的餐点和国宾的一模一样，但实际上，国宴宾客吃的是台北圆山饭店烹制的，而蒋介石夫妇食用的是由官邸厨师亲手调理的。

“国宴”会场，照例有两位侍者专为蒋介石、宋美龄送菜倒茶，但这两位侍者其实是穿上圆山饭店侍者制服的“冒牌货”，真实身份是蒋的侍

从副官。

为防止下毒，“国家安全局”检验单位配备简单的仪器设备，全面检验圆山饭店制作的餐点。甚至从圆山厨师展开“国宴”烹制作业之初，“国家安全局”人员已先行进驻，包括“国宴”所有食材、锅碗瓢盆，甚至连饭店厨房水龙头的水质，都要事前详加检查，才敢放心让厨师制作菜肴。大师傅在做菜时，厨房站有好几个侍卫，目不转睛地监督做菜。

一般而言，蒋介石时期的“国宴”均有固定流程模式。举1966年2月15日南韩大统领朴正熙访问台湾时的“国宴”为例。蒋介石夫妇、朴正熙夫妇相继进入“国宴”会场，这时，乐队奏起“总统进行曲”，意谓“总统”抵达餐会会场。国宴开始前，司仪宣布全体人员肃立，演奏韩国国歌。

随后，蒋介石、朴正熙即彼此礼貌揖让就座，宾主开始用餐。当天的菜色有：冷雀肉冻、三色清汤、烘酪粉龙虾、炸黄油嫩鸡、烘鲜麻菇菜花、馅肉青生菜、华尔道夫色拉、特色冰淇淋，餐后饮料有两种选择：人参茶和咖啡。

从这份菜单里，可以看出这场盛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像烘酪粉龙虾、华尔道夫色拉、特色冰淇淋都是西餐菜肴或点心，其他菜色则是典型的扬州菜。

“国宴”必定要有音乐串场，营造饮食氛围。招待朴正熙当天，“中国广播公司国乐团”到场演奏国乐，包括《呦呦鹿鸣》、《喜相逢》、《春江花月夜》、《阿里郎》、《万寿无疆》等。

宾客用餐完毕，服务人员清理完桌面后，由宾主双方致辞。东道主蒋介石致词后，即邀在座贵宾举杯，彼此祝福。朴正熙致答词，同样在讲完话后邀请全体举杯，互道祝福。

“国宴”仪式进入尾声，司仪宣布全体人员肃立，会场演奏东道主“中华民国”国歌。最后，两方元首握手致意，各自离开会场，这时乐队再度奏起“总统进行曲”，欢送两方元首。

在宋美龄的主导下，“国宴”除了仪式细腻，一丝不苟，连餐饮用具也都会选用最高档货色。以餐具为例，1950年代，宋美龄特别指定圆山饭店进口最昂贵的银制烛台，制作银制中式餐具，还不惜斥巨资购置绘有传统唐草图案的英国骨瓷餐具。

不过，那次宴请朴正熙的地点是在甫落成启用的台北阳明山中山

楼，“国宴”那天适逢大雨，再加上中山楼正是温泉密集区，室内外弥漫着浓浓的硫磺气。空气中的硫化物分子，让“国宴”工作人员吃足了苦头。原来，硫化物一碰上银制刀叉，马上发生化学反应，刀叉表面产生硫化银。负责筹划“国宴”的国府高层，万万想不到硫化物竟会惹来大麻烦。

据工作人员计算，大约7分钟内，所有曝露在空气当中的银制刀叉，表面因硫化银作用而失去光泽，原本亮晶晶的银器将瞬间变黑。在如此盛大的场合，银质餐具变黑，难免让主人生窘、客人不安，说不定还以为食物有毒呢！为了确保用餐质量和“国宴”贵气，负责人遂特别交代服务人员在一旁拿秒表计时，每隔6分钟，即在银器变黑之前，就由工作人员为宾客换一套新的银刀、银叉。撤换下来的发黑餐具，立即调派工作人员清理表面硫化物。

于是，光是为了清理这些发黑的银刀、银叉，工作人员忙到第二天清晨4时，才基本清理完毕。朴正熙听到这个消息，还曾向工作人员致意答谢。

要预备一餐精致的“国宴”，每个环节的工作都有难以言说的艰辛。例如蒋介石喜食鱼翅，蒋官邸制作的鱼翅近悦远来，任何人吃过一回，必定终生难忘美味。但这道菜需拿漂洗清爽的鱼翅、上品老母鸡、蹄膀、整只金华火腿、葱、姜等香料，一起搁在大锅内，以文火熬煮将近20个小时。

除了台湾的“幕后老板”美国以外，为了确保国府在联合国的地位以及考虑整体外交战略、石油资源等因素，蒋介石特别重视与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宴请这些国家的元首时，也别具巧思。

1958年5月，伊朗国王巴勒维到访台湾，蒋介石非常重视。由于当时蒋将大量预算投入军事准备，台湾财政十分拮据，但蒋仍决心倾其全力做好这次迎宾。当年台湾的机场连块像样的迎宾红地毯都没有，巴勒维访台前，蒋介石特地派人到香港花20万港元买了一条长近30米的红地毡，铺在台北松山机场。之后还下令“总统府”、“外交部”、“国防部”、“台湾省政府”，并动员台湾的回教团体，合力组成一个筹备小组，针对伊斯兰教的礼仪、食宿、交通，以及安全，作全方位部署。

于是，巴勒维抵台当天的国宴上，伊斯兰教人口寡少的台湾，当局居然网罗了由全台特选的清真名厨，共准备了30多道名菜款待远来的稀客。回教协会还派了阿訇，依照伊斯兰教的教规，在宰杀有血动物时诵

可兰经。

外交讲究现实利益，从“国宴”菜色的档次，也可看出两方彼此的关系。

1970年代，台湾积极推动“十项重大建设”，需要向国外大量融资借贷。当时，盛产石油的沙特阿拉伯是台湾最大的“金主”，所以1971年沙国国王费瑟访台时，“国宴”安排也极其细腻有致，菜色有：梅花拼盘、鸡茸粟米羹、牛肉包子、鸡丝春卷、原盅排翅、生炒鸽松、干烤虾丸、蚝油三菇、伊府炒面、花色细点、杏仁甜菜，餐后点心为各色鲜果，饮品为清茶、咖啡。

“国宴”餐桌上光是杯子至少有6种，包括水杯、雪莉杯、红酒杯、白酒杯、香槟酒杯及饭后酒杯等，而按用途区分，刀叉更多达10多把。没吃过西餐的人，极可能根本不知该如何下手。

服务人员不论是上菜、上汤，还是上点心、送饮料，时间计算之精准，韵律之严整，更是“国宴”最重要的基本条件。而在宋美龄细腻精密的规划督办之下，圆山大饭店也总能完满达成任务。待蒋介石去世，宋美龄退出“第一夫人”角色，国府的“国宴”似乎顿失其主，服务质量也随之明显下降，偶有服务作业各种闪失趣闻传出。

严家淦接任“总统”后，某次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以“国宴”款待外国元首。上到第三道菜鱼翅时，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端着热腾腾的鱼翅，刚走到严身后，却脚底一滑，手上托盘里那碗鱼翅，不偏不倚，洒在严家淦的肩膀上。女服务员登时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站在严身后的侍卫长一个箭步冲了上来，拿起毛巾为严拭去西装肩膀上的鱼翅汤汁。

所有外国访宾、各国使节、文武百官全看傻了。严家淦毕竟见多识广，马上以幽默化解了尴尬：“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你们啊，我终于有机会换新西装了。”翻译人员也照原句翻出来，惹得全场宾客哄堂大笑。工作人员私下窃窃私语，还好浓稠的鱼翅不是扣在“总统”头上，不过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蒋介石时代，更不知要捅出多大的娄子，要害多少人丢官呢！

严蒋时代的简约“国宴”

时序进入严家淦时代、蒋经国时代以后，“国宴”的风格迥异于前。以每桌开销单价而言，比老蒋时代便宜了许多。加上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后力行宴客时“五菜一汤”的“梅花餐”运动，“国宴”被限定一桌酒席的

预算只有3800～4000元新台币（约为人民币800～1000元）。

严蒋时代“国宴”成本降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省略了宴会上的余兴节目。就以1966年5月20日庆祝蒋介石连任第三任“总统”举行的“国宴”为例，宴后还有别开生面的晚会活动，节目内容包含联勤总司令部施放的烟花，京剧演出折子戏，包括加官、孙悟空大战金鱼精（蒋最喜欢看京戏里的孙悟空）等。照蒋介石定下的规矩，不论是京剧团还是像绍兴戏戏班子，都一律要给演员打赏。当年适逢蒋介石80大寿，台湾“中央银行”曾发行蒋介石华诞纪念金币，蒋介石常以金币作为打赏之用，每人发一枚，重量有一两重。这些开销都算在“国宴”项下，成本当然偏高。

省去了余兴节目，减少了昂贵的菜色，连赴宴的衣着也跟着简化。早年，蒋介石主持“国宴”必定配合来访元首的衣着，决定自己是穿长袍马褂还是中山装。到了蒋经国当政，环境越发西化，各国元首流行穿燕尾服出席“国宴”，礼宾单位建议蒋经国订做燕尾服，但他仍坚持应该节用爱民，不愿意订制新燕尾服，又惟恐失礼，故而想出一个权宜之计，吩咐佣人用白手绢缝制成三角巾，插在旧西装的左上方口袋里，权充宴会西服。

然而，随着台湾经济逐步起飞，对外经贸顺差逐步扩增，严家淦、蒋经国时代的“国宴”菜色倒不比蒋介石时代差，如鸡汁燕窝、车轮罐鲍早已是“国宴”的必备菜式。

不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经常秘访台湾，到台北和老友蒋经国聚会。吃腻了“国宴”的李氏，常和蒋经国吃永和豆浆等各种小吃。有一回，李光耀上阿里山旅游，忽然又想喝豆浆，“外交部”担心外面小店的卫生条件不好，一方面急电永和豆浆店师傅，一方面请军方派车，把豆浆店师傅，连同锅子、灶子、黄豆，利用军用吉普车从台北一路送到阿里山宾馆。足证“国宴”的魅力，在凡人的味蕾之上，远不及永和豆浆店的烧饼、油条、豆浆。

李登辉式国宴：由俭入奢

李登辉早在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及“副总统”任内，已经是一个吃遍四方的美食家了，他酷爱西餐牛排，也喜吃日本料理，中菜偏爱广式海鲜。就任“总统”后，他完全废弃蒋经国节用爱民的原则，非但大量增加“国宴”次数，宴席菜色尤其讲究品味口感，根本不计成本，豪奢程度前所未见。其任内“国宴”另一变革，则是他开始聘用大批女性服务员，一改早期“国宴”全部任用男性服务员的惯例。

自蒋介石以来，“国宴”向来是台北圆山大饭店的专责任务，这也是圆山主要的财源。李登辉当权后，打破“国宴”由圆山大饭店包办的惯例，开始把“国宴”的利益与任务下放给民营五星级饭店，经常到台北市亚都、丽晶、西华等五星级饭店接待外宾。

尽管“国宴”下放给民间，但李时代的菜单却一点也不平民化，例如其就职第九任“总统”的“国宴”菜单包括龙虾沙律、一品排翅、海鲜金冠饺、蚝皇鲜麻鲍、芦笋鲜干贝、黑椒牛柳、菠萝鸡球、蘑菇石斑鱼、莲蓉酥饺、椰汁冻糕、四季水果11道餐点。就是蒋介石当年招待沙特阿拉伯国王费瑟，也不过才11道餐点。

况且，当时蒋介石盛情款待费瑟，图的是从沙特阿拉伯借贷到推动“十项重大建设”的巨资，而李登辉基本漫无目的，动辄端出龙虾、麻鲍、排翅，是向外宾彰显所谓“台湾钱淹脚目”的财大气粗，还是为了争取“入联”或“过境美国”满足其私人虚荣心呢？

陈水扁的“政治流水席”

继李登辉下放“国宴”到民营酒店，2000年当选“总统”的陈水扁，则更把“国宴”民粹化。

陈水扁就职典礼当天的“国宴”，由陈水扁取名为“四季宴”。陈水扁在《阿扁总统对四季宴的期许》一文中声称：“阿扁在台湾土生土长，饮食习惯与斯土斯民并无二致，所以此次国宴的食材多采用台湾本地物产，甚至亦将家乡小吃列入。从这里面可以看见阿扁的生活历程━相信同时也是许多乡亲父老的共同经验；因此，‘吃果子，拜树头’，一些从未在办桌上出现的常民菜色，例如碗，也将纳入这次国宴的食单中……”

陈水扁揭举了“常民菜色”作为他颠覆及取代蒋介石以来的4位“总统”贵族菜色的“国宴”形态。李登辉的鱼翅、鲍鱼不见了，因为陈水扁声称：“此次食单中不见保育类动物；这是现代人应有的基本态度，本来无足标榜。但为了提醒大家保护涵育大自然的重要性，再次强调应不为过……”

然而，“四季宴”终究有名无实，陈水扁还是依循往例，请台北圆山大饭店的厨师，来烹煮这场“常民菜色”的宴飨。从菜单内容看来，陈水扁何能真正做到“常民”：玫鲑白玉（鲑鱼、带子、鲑鱼卵）、虱目丸汤、台南碗、龙腾珠海（龙虾）、烟熏龙鳕、烤羊小排、芋薯松糕、参元甜粥、宝岛鲜果。前番自我标榜，迹近呓语梦话的矫情宣示。

除了在台北这个政治中心举办“国宴”，陈水扁更绕着台湾岛南北到

处搞“国宴”，分别在台湾南部的高雄餐旅学院、花莲县远来大饭店、屏东县三地门“原住民文化园区”、台南大亿丽致酒店、新竹县关西镇莱馥度假村、台北县政府大楼、台东娜路弯大酒店、苗栗县三义乡西湖度假村、台北国宾饭店、高雄第一科技大学等岛内南北各地巡回举办。

这种环岛流水席式的“国宴”模式，简直就是陈水扁在延续其环岛选举的气氛，已经完全破坏了“国宴”应有的严肃规制。

马英九的“节能国宴”

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就职后的“国宴”，定在高雄的汉来大饭店举行。马英九标榜就职“国宴”要考虑“食物里程”，以“节能减碳”为原则，原本宴席上采用的食材宜兰鸭改为屏东鸭，减少运送过程消耗的油与产生的二氧化碳。

可令人不解的是，1164名出席“国宴”的国内外宾客，大阵仗往返奔走于台北、高雄两地，乘坐的小车、大车不是烧汽油就是用电力，人比宜兰鸭重几十倍，难道不比长途运送鸭子更有违“节能减碳”的原则吗？

不过，马英九不像过去几任“总统”那么讲究吃倒是不争的事实。就职“国宴”包括拼盘、主菜与甜品、水果在内，共有9道菜色，食材都是台湾本地产品，像是澎湖土鱼、明虾、甲仙芋泥、台南关庙放山鸡、高雄美浓条、梅干菜、台东的南瓜、西瓜、高树菠萝、旗山木瓜、坊山芒果、花莲百合、东港樱花虾、屏东龙胆鱼等。

从李登辉到马英九，台湾的“国宴”已经从“外交功能”退化为“内政功能”。“国宴”从结交国际友人的目的，蜕变为岛内政治宣示的舞台。马英九与前任几位领导人相较之下，固然无法跳脱这个大格局，但马英九最大的优点是，他就任近一年间，除了就职“国宴”，其他“国宴”都颇为低调，较能回归“国宴”原有的严肃。

种种迹象显示，美食对马英九的吸引力，的确不如台湾前几任领导人。倒是他的传记记载，他留学美国与周美青结婚时，请喜酒的餐厅是美国“彭园餐厅”，这家湖南馆子的老板彭长贵却真正是台湾早期为蒋介石烧“国宴”菜肴的名厨，是台湾凤毛麟角得湖南“谭厨”真传的大师傅。

如今“彭园湘菜馆”光是在台湾北部就有7家店，创办店东彭长贵已经年过九旬，过着息影山林的半退休生活。眼下，倒是有不少号称是御厨的年轻师傅，在广告牌上以斗大字体写着“国宴御厨某某某”。

历经李登辉、陈水扁两任“总统”各行其是的“改革”，“国宴”规制已

乱，而近年台湾荷包日渐缩水，“国宴”的形式与内容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过去半世纪的“国宴”故事，亦随着政治领袖的逝去，尘封于历史角落。

第六篇 扶摇直上的台湾当代艺术

特约撰稿员/胡永芬

身价一夕翻红

在今年3月的纽约苏富比拍卖和4月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再创新高，而台湾当代艺术作品在这两场拍卖会上，也都有非常稳健、逐步上升的成绩。

此前已经热了整整一年的台湾市场，上一季秋拍压轴最后一场。2007年12月9日举办的中诚国际拍卖会上，55岁的台湾艺术家杨茂林1993年作品《热兰遮纪事》，320万元台币起拍（当时这个估价已经超过杨茂林画作的行情），结果在短短一分半钟以内，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1300万台币落槌，1456万元台币成交；而接下来的拍品，48岁的艺术家郭维国1993年作品《台湾岛》，瞬间又是一片标牌在半空中纷起的激烈竞逐，并最终以1600万台币落槌，1792万元台币成交，刷新了一分半钟之前才创下的，台湾当代艺术最高价。

3分钟之内，台湾当代艺术作品连续创两次新高纪录，而且迅雷不及掩耳地突破1000万，直逼2000万元台币。

这两件作品并非个案或单一现象，在这之前的几天之内，罗芙奥、金仕发两场拍卖会上，包括黄楫、连建兴、苏旺伸、杨仁明、侯俊明、李真、吴天章都是一破再破，每位艺术家都在拍卖场上接连创下自己作品的新高价、新纪录。

与此相关的是原本处境极为不妙，在台湾报纸版面上快要被铲除殆尽的美术消息，最近这大半年，不但从原本小小的艺文版向外扩大领域，而且开始经常性地占领财经版、投资理财版面的头条新闻。全台湾各种媒体突然之间都开始大量开辟跟艺术投资有关的节目、版面，甚至股市的重量级名师也开始在各财经媒体撰文、开节目强力推荐。台湾市面上仅仅2008年4月号的各种时尚杂志，就有至少五六本出现艺术专题，其中一本的专题分量超过60页。台湾的当代艺术作品市场在短时间之内，已经迅疾扩张，成为企业界、财经界，乃至全民大众心目中最具潜力的投资新标地，同时也是人们心目中最具时尚感的新话题。

台湾当代艺术的F4

这一波在市场上大受重视的艺术家们，可以说都是活跃于上世纪90年代，并且在1990年代美术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艺术家，尤其是其中被

收藏家群封之为“台湾当代艺术F4”的4位艺术家——陈界仁、杨茂林、吴天章、侯俊明。

陈界仁可以说是目前最受国际当代艺坛重视的台湾本地艺术家。从1996年迄今，他已经参加了除德国文件大展跟哈瓦那双年展之外的，所有重要的当代艺术的世界大展。即使在全亚洲艺术家范围内，他也算战功最为彪炳的少数几位之一。他的作品海外收藏的数量可能多过台湾本地的收藏，是F4中国际市场最广泛的一位。

但是因为陈界仁的作品影像，早期多是采取历史图像经由计算机后制，画面阴森残酷，后期的作品则是以类纪录片的手法，制作取撷自社会底层弱势族群生活场景的影片，这些图像对于台湾本地收藏家而言，接受上仍有心理障碍，因此收藏并不普及，但仍然有一些严肃的收藏家默默追踪收藏他每一阶段的作品。陈界仁在收藏家心目中也算是口碑高过实质市场的一位。

杨茂林则是台湾当代美术史上，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对每一个世代都产生非常关键影响的一位。他于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的1980年代中期，即以神话题材中力抗天命的失败英雄，如鲧、大禹、共工等，直指对于独裁政权的批判；1980年代末台湾解严之后，他又以愤抗的大拳头、大肌肉，指喻国会与社会激荡的乱相；对于政治社会议题的关注，蔚为1990年代前半期台湾当代艺术家们共同的取向，这也是台湾现当代美术史上第一次，艺术家对于政治议题的集体发言。

1995年，杨茂林又推出将西方与日本的卡漫形象入画的作品，通过这两三代台湾人所经历的外来文化，省思、诠释台湾文化主体性的真意。这些作品引领台湾众多的新生代艺术家，通过“卡漫”这种在亚洲极其盛行的次文化视觉符号，进行更为多元的视觉、文化演绎。

杨茂林的创作能量尤其丰沛，油画、计算机影像、装置、雕塑，各种媒材他都质量俱丰。这7年来，一系列木雕、铜塑与不锈钢材质，神格化的卡漫作品，再次巩固了他作为领头羊的位置。

吴天章于1982年跟杨茂林、卢天炎等共组101现代艺术群，之后再组台北画派，包括现在台湾市场里正抢手的连建兴、杨仁明、郭维国都是当年台北画派，今天的悍图社成员，杨茂林与吴天章是其中最主要的领导者。

吴天章1990年发表了关于两岸强人统治时代的四个系列：关于蒋介石、蒋经国、毛泽东以及邓小平的统治。除了各有一件三、四米巨幅总括性的单件诠释之外，每个强人时代还各有四到六张一组的系列作品，

表达了来自人民对于国家领导人的强烈臧否，也奠定了吴天章在台湾当代美术中的影响与位置。

1990年代中以后，吴天章的风格丕变，他再制怀旧的影像，并在其中加入独特瑰魅异色的吴氏风格，成为台湾最先驱的几位计算机影像创作者之一，也是台湾少数几位跨两个世代都占据着领衔者位置的重要艺术家。

侯俊明甚为早慧，1990年代初，不到30岁的他就创造了极其独特、在当时可谓极其惊怵、挑战性的风格。他以挪借自传统木刻版经书与版画的形式，制作或者尺幅巨大，或者类同书册尺寸的版画作品。内容分为两页，图像与文字说明各占一页，图像多为幻想夸大的生殖器，或者各种奇特姿态的性交行为，文字的内容为图片说明，仿造古代的警世文章，巨细道来图像中的情事原委，最后给予救赎意涵的合理性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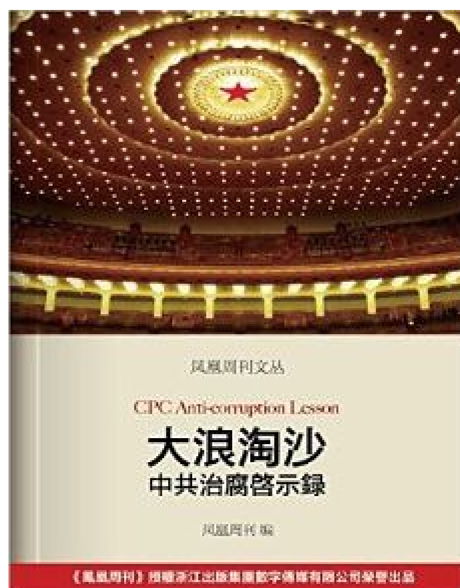
将近20年前，在那样一个刚刚解严的保守时代里来看，侯俊明的作品确实显得惊世骇俗，开辟了台湾当代艺术一块从未开发过的领域。

苦尽甘来的历程

台湾当代艺术发展30余年，现在，可以说是第一次迎来市场荣景。如今在美术史与市场上获得肯定的艺术家，都在四五十岁上下，创作历程也都经历了30年左右的时间。这些艺术家们比较鲜明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在面对创作与生活的压力选择之时，多数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与收入，选择全职做一位专业艺术家，因此，他们几乎都经历过很长时间的艰困生活，才一直坚持到今天。陈界仁有段时间是由他弟弟资助；杨茂林、吴天章都摆过地摊卖民艺首饰；郭维国帮太太的幼儿园开过娃娃车；李民中在太太的早餐店中打过工；黄楫青黄不接时曾把自己平日收藏的古董托卖变现。他们的创作场所，或者是租来的小公寓，或者是家人都安寝之后才腾出来的小客厅，或者是荒远郊区虫草蔓生的废工厂。无论如何，坚持创作下去，是这些艺术家面对自己的创作与人生所作的选择。

面对目前这一片荣景，这些奋斗多年的台湾当代艺术家们，显然都颇具忧患意识与自制力。毕竟，他们都曾亲眼看过1990年代初，上一波前辈艺术家市场鹊起，之后又衰颓殒灭的真实过程。经验与智慧让他们明白，市场起落的曲线是永远的常态，因此这一波荣景对他们而言最大的改变，就是多出些钱买一个比较像样的工作室，然后，继续工作。

精彩推荐：凤凰周刊文丛：大浪淘沙——中共治腐启示录



点此阅读

第七篇 孔子在台湾

特约撰稿员/苏惠昭

孔子的道德思想、个人修养、处世方法、教育主张和政治理想等等，形塑了台湾社会的道德观、伦理观、家族主义以及对待自然的态度，虽历经“全盘西化”和新科技的挑战，依然根深蒂固，不易摇撼，不被摇撼。

孔子2558岁了

一如过往几十年，2007年9月28日他老人家生日这一天，台湾各地孔庙依循往例举办祭孔大典。

台湾祭孔历史可上溯到1968年。当时，教育部奉蒋介石指示，邀集内政部等相关单位，并聘请学者、专家组成“祭孔礼乐工作委员会”，由蒋复璁担任主委，下设礼仪、服装、乐器和祭器4个研究组；召集人分别是方豪、王宇清、庄本立、孔德成；同年制订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释奠礼仪节，并在台北孔庙试行；再经过两年的研讨改进，最后在1970年定案，由内政部公布实施。祭孔典礼包括鸣奏炮、乐舞生就位，各祭官就位，启扉、迎神、进馔，行释典之礼，跳八佾舞，奏雅乐，读疏文，彻馔，送神，望燎，合扉，彻班，礼成，鸣炮，当然最受民众欢迎的是祭典后的拔智慧毛活动。

此后“祭孔”便成为台湾各地方16家孔庙的年度大戏。在庄严隆重，一丝不的仪典之外，随着孔子思想的全球化，“祭孔”近年来也开始担任文化交流暨观光大使的角色。

孔子释奠礼仪节确实一年比一年活泼有新意。当年孔子曾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如今女人与祭孔不再天各一方，反之女性的角色已经越来越重要。台北市、高雄县今年都出现女性纠仪官、女性分献官。台北市民政局正在规划与孔庙所在的大稻埕餐饮业者合作，推出“夫子餐”；也有五星级饭店计划明年推出以释奠大典菜色为内容的“夫子宴”。此外，在传统的“智慧糕”之外，尚分发给观礼民众新的周边零食曰“敬师糕”与“智慧梅”。高雄县则以改良式拔智慧毛取代过往的真牛上阵，司仪全程以中、英语介绍仪式。

今年祭孔，台北孔庙从清晨5时举行的家祭开始。孔子第79代嫡孙孔垂长、孟子第75代嫡孙孟祥协、曾子第75代嫡孙曾庆弘皆出席祭祀仪式。一小时后的释奠典礼，市长郝龙斌首度担任正献官；考试院参事郑

毅明代表孔子后代担任奉祀官；教育局长吴清基、文化局长李永萍、环保局长沈世宏、台北孔庙管委会主委廖武治等人担任分献官；民政局长黄吕锦茹担任纠仪官——她是继王月镜之后，20年来第一个女性纠仪官。陪祭官有北市明道国小校长谢素月、市议员王鸿薇、陈玉梅——也是女人当道。整个仪程共计37项，进行约1小时30分。

台北孔庙过去一直依循三献礼祭孔，今年首度与开平餐饮学校合作，推出189道释奠祭品、27样祭孔菜色，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遵照明朝古礼所烹调出来的“太子羹”，以及使用麦、糖、荞麦制作的黑饼和白饼。

到现场观礼的外国观光客比国内民众多。除了日本道德科学研究会的70名代表，日本论语协会、韩国代表团、越南河内文庙也都率团参加。结束后除依循往例分赠“智慧糕”给观礼民众，主办单位也不忘与时俱进，以“儒学相伴”手机吊饰当纪念品分送。

台南县的祭孔大典在归仁、佳里举行，有趣的是，归仁乡供奉的至圣先师塑像在去年遭窃。这已经是第二度不翼而飞，庙方人员推测是有人偷偷把“孔子公”请去供奉。

孔子果然神力无边，与民同在

因为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台湾无可选择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基地，而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虽然无可避免要面对知识分子的质疑与批判，却从来未曾被破坏或者以“打倒孔家店”的名号连根拔起过，于是就像基督教故事已成为西方社会普同的文化背景和行为规范，孔子的道德思想、个人修养、处世方法、教育主张和政治理想等等，形塑了台湾社会的道德观、伦理观、家族主义以及对待自然（“天”）的态度，虽历经“全盘西化”和新科技的挑战，依然根深而蒂固，不易摇撼，也不被摇撼。

应该说孔子以3种身份根深蒂固存在于台湾社会。第一种身份，他是印在《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教科书上的“至圣先师”，由他口述而由弟子记录的《论语》为每一个国民中学学生在国语课上的必修，必须逐章逐节背诵默写，也是考试的热门题目。

与孔子一起存在于国语课本中的，还有发扬孔子思想的孟子，所谓性善性恶、王道霸道，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要受过国民基本教育，几乎人人可以脱口而出。

莘莘学子如果记不住孔子说的话，至少也听过罗大佑唱的《之乎者

也》：知之为知之，在乎不在乎，此人何其者，孔老夫子也。虽然不一定感知有“儒学相伴”，卜学亮唱的饶舌歌《子曰》至少也让人感觉蛮新鲜有趣：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仁/仁的表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以仁为本体/表现在具体行为上/Come on everybody一起来/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对人则有爱心。

这个孔子从教育体系钻入意识深处，延伸到流行文化，又成为“命名学”的依据。有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父母选择“耀宗”、“忠信”、“弘道”、“义德”或具有类似的意义为儿子命名。女儿则为“淑惠”、“秀娟”、“宜静”，这是儒家尽忠尽孝顺服化的外显。孔子思想源于《易经》，直接出自《易经》或《四书》的命名亦所在多有。当今教育部长杜正胜的儿子名为“明夷”，就出自《易经》的第36卦。

第二种身份，孔子是神

台湾至少有16座孔庙，被视为道教而未以孔庙为名，但祭祀孔子的庙也有23座。这些庙宇每逢考季便香火鼎盛，因为在信徒心目中孔子乃是“考试之神”：“礼乐射御书数”，他又通晓所有学问，又有教无类，所以只要虔心敬拜，一定可以保佑金榜题名。

第三种身份，孔子是思想家、哲学家，他的学问似浅还深，让人似懂非懂。就像颜渊说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台湾民间私塾之一日月书院的《易经》老师马叔礼便曾指出：“国中老师在学校讲授的《论语》许多都是错的，大错特错。”为何会错？“这是因为不懂《易经》，如‘举一隅以三隅反’，孔子说的话必须以《易经》来理解，不懂《易经》就会错读《论语》。”“孔子是所有老师的老师，也是所有领导者的老师。”马叔礼说。

马叔礼曾以3年的时间开讲《易经》，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统一集团总经理林苍生就是他的学生。而在中国大陆，于丹还未以《论语》讲座暴红之前，研究儒家思想20年的台大哲学系教授傅佩荣所译写的《论语》一书在台湾已炙手可热许多年。《论语》有多伟大？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举行的例行聚会中，谈到21世纪人类需要什么思想时，大家几经斟酌，最后出来的答案不是别的，正是《论语》，所以它的普世价值已不容怀疑。只是这1.6万多字的“小书”包藏了太多的障碍和太多的曲解，到底孔子说的“天”、“命”、“鬼神”、“生死”或者“仁、义、道、德”其义为何？有没有“正确”的解法？谁对谁错？“即使背诵了孔子的言论，也未必知道他真正的用意，更谈不上付诸实践”，这促成了傅佩荣投入时间心力去解读《论语》，虽不能说是定于一尊，却是他认

为的“《论语》的理想读本”。在位者“半部论语治天下”，而平民百姓阅读《论语》则可“化解现实的困境与压力，常保心中的喜悦”。

《论语》的阅读年龄也在向下扎根中，一直在推广儿童读经运动的王财贯教授开发9册“儿童心灵环保经典”，其中之一便是《论语》。他认为，一个人的自我反省力与自我负责力必须从小培养，而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多接触有文化意义的教材，也就是“读经”。经典字字珠玑，无论难易，无论长短，只要顺着章节一字一句读下去，它们就像种子撒入心灵，“人格之陶冶、气质之变化，其效能不可测度”。

这也是为什么有小朋友因为起大早而在祭孔大典中打瞌睡，但仪式必须长久维系不可废的理由。仪式维系认同，透过仪式的提醒和转化，孔子才能永远与我们同在。

第八篇 台湾电视：越过底线的战争

特约撰稿员/苏惠昭

十几个台，上百个频道，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播报。

“史镇康事件”

那一幕确实抓住了电视机前的观众。

3月26日晚间，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播出一则独家报道：黑道小弟周政保持枪对着角头老大刘瑞荣呛声，并在镜头前展示各式火力强大的武器，之后其他新闻台相继播出这段画面，黑道小弟一夕之间变成“台湾本拉登”。

接下来的剧情急转直下，TVBS在28日出面“自首”，坦承这是一则假新闻，影带系由TVBS驻地记者史镇康匿名送往中部新闻中心。台北新闻总部对来源虽然展开调查，并向警方报备，但在独家新闻压力下仍然抢在第一时间播出，其他媒体随之跟进。

假新闻事件发生第4天，“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副主委石世豪指出，TVBS涉及违反卫星广播电视法第17条（节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或禁止规定、妨害儿童或青少年身心健康、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将对TVBS行为做出“最严厉处分”。

同一天，周政保遭缉捕到案，警方搜出其所拥枪枝为一比一的仿真枪，换句话说，新闻不是真的，“强大火力”也不是真的，宛如魔幻写实小说才有的情节。而TVBS除被课以重罚外，还导致两位记者被免职，以及总经理李涛下台，但他仍继续主持指标性政论节目《2100全民开讲》。

姑且不论“史镇康事件”是否将成为“台湾电视新闻史上最大丑闻”，旧恨迭上新仇，NCC的“最严厉处分”显然不符合当权者期待。民进党开始猛轰NCC，继而衍生出行政院对NCC委员吴忠吉、刘孔中开铡的案外案，而不满NCC的团体则喊出发动10万人包围TVBS，最后目标在逼使关台；“友台”的三立新闻也以讨伐乱世狂魔的“媒体正义使者”姿态对TVBS展开追杀。

什么样的新闻符合观众口味

这一切只是因为TVBS是作为“倒扁中心”与“唱衰台湾总部”的“统派媒体”。而如果它不是呢？如果三立新闻台恰好不是深绿的电视台呢？政

治立场遮掩了事件的本质，也重创新闻专业。“史镇康事件”的本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它赤裸裸凸显了电视新闻恶性竞争的生态。有上百个频道，十几个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台要一起瓜分6001000亿新台币的广告大饼。电视仰赖广告，广告仰赖收视率，而收视率唯“观众口味”是问。当AGB尼尔森以每一分钟为变化单位将收视率呈现给电视台，电视台主管很快就知道观众对怎样的新闻感兴趣，看到怎样的新闻才不会换台了。

新闻主播很大程度上决定收视率，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戴忠仁。当中天新闻当家主播方念华跳槽到TVBS，空出来的大位由已经淡出新闻圈的戴忠仁接手，但中天与戴忠仁仅只签约3个月，双方约定3个月内如果收视率没有起来便要走人。3个月后戴忠仁黯然离去，尽管曾经名重一时，风采也依旧，妇女观众终究还是摒弃了这位后来传出家暴事件的男主播。然后中天把张雅琴从三立挖角过来，走权威路线的张雅琴果然了得，中天新闻收视率立刻向上攀升到第一名。

每分钟收视率让电视新闻台总算彻底摸清了观众口味。观众喜欢怎样的新闻呢？耸动的、滥情的、温馨的、八卦的、名模的、名牌的、命理的、好玩的、好吃的，基本上这些新闻都能冲高收视率。所以女明星许玮伦车祸身亡、首富郭台铭与香港女明星刘嘉玲牵手、首富郭台铭与第一名模林志玲拥舞、“总统夫人”吴淑珍戴的冰种翡翠和蒂芬妮钻戒、总统女婿赵建铭的万宝龙钻笔及其全身上下行头、马英九酒醉时不小心流露出的媚态、王建民旋风、蔡依林买豪宅、周杰伦掉头发、小S再度怀孕、一客一万元的顶级牛排、一只百万元的包包、每日大排长龙的小吃摊、五个穷小孩合吃一碗面、与生命拔河的罕见病症、算命先生的国运预言、全民疯Wii游戏机，以上皆属“好看的新闻”。但是为了让新闻更“好看”，记者也不再只是站在新闻现场播报，那太传统古板了，记者需要拿着麦克风亲自下场仿真演出，语调则要高亢兴奋以加强渲染力。这似乎解释了何以时下越来越多的主播或记者转行为艺人如侯佩岑、王怡人，不然便是以完全不同的形象出现在综艺节目当来宾，如《康熙来了》。

“一切都是为了观众”

“好看的新闻”的最佳主角从来就是超级大名人加上一段扑朔迷离的多角迷情，有金钱、有情欲还有谎言。以这样的标准来说，近日由《壹周刊》点火的“郭台铭、陈崇美绯闻事件”就成了电视新闻台最努力追逐的头号新闻。虽然是20年前便尘封的往事，记者还是亲临传说中的两人同居处，手握一把大钥匙做开门状以便让观众深刻了解陈崇美曾经握有

郭家大门钥匙；明知不会得到答案，也是要尽责地去按邻居门铃问一声：“请问有没有看过陈崇美进出？”

附带一提，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的专题或报道往往立刻成为当日电视新闻的题材。电视记者被“跑新闻”的压力压榨到没有时间以及能力挖掘新闻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独家新闻”又是太过诱人的饵，没有记者不想去抢，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抢。

去年7月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偕同妻子翁帆来台开中研院院士会议，如果只是杨振宁只身前来，电子媒体不会大做文章，但因为有了相差54岁的妻子——年轻美丽的翁帆陪同，媒体从他俩下机后便以大阵仗相迎。翁帆一下机就被问对台湾的印象，愣住了。

往后数日，只要有公开行程，电子媒体便贴身采访翁帆，密集报道院士夫人活动。资深媒体人陈挥文一句话撕开媒体那藏在表面言语背后隐晦不宣的意图——他说：其实媒体最感兴趣，真正想问的是：“请问你们有没有性生活？”

一切都是为了观众。因为观众想知道，特别是公众人物不为人知的隐情秘事。而媒体是如此贴心地为观众设想，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被当事人骂到臭头亦在所不惜。公众人物就像小说《香水》中滴了香水的葛奴乙，葛奴乙天生无味，但他所调配出来的香水，只消往身上滴一滴，就能产生一股把四周的人吸附过来的旋涡；不但吸附过来，还开始啃噬，于是香水葛奴乙就这样一块块被肢解，被吞了个精光，分食者脸上还浮现出幸福的光辉。

媒体就是一直在寻找香水葛奴乙的分食者。只要是观众想看的，大事不说，再怎样鸡毛蒜皮的事，电视新闻一定播。有观众想看而挖不到的新闻吗？一位博客回答了这个问题：“没关系，它会想办法去制造出来。”

立委诸公向来最是深谙做怎样的动作，说怎样的话才能够成为香水葛奴乙的一群人了。不管正面负面，搏得画面最重要；结果观众总是不记得，或者根本无从知道所为何来，记忆仅只停留于王淑慧如何向立法院长王金平丢鞋子、李敖又如何把鞋子丢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林国庆与李镇楠假“关心学生安全”之名大闹台大校园，以及林重谟打“玻尿酸”抚平皱纹、邱毅戴假发种种。国会议员透过电视媒体的再现，个个彷佛成了为娱乐大众而存在的人物。

第五章　台湾边角料

第一篇 台湾苗栗负巨债陷破产危机

记者/马军

“拜托大哥，请在政论节目里向刘政鸿县长呼吁一下，让他赶紧把苗栗国际艺术季的费用结了吧，我知道县财政紧张，但国际艺术家的钱如果不付，台湾会在国际上丢脸的。”2014年苗栗国际艺术季后，迟迟拿不到演出费用的活动主办方无奈之下，只得给各路政论名嘴打电话，寻求舆论上的帮助。

睽违5年后来台，“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9月14日应邀参加2014苗栗国际艺术季活动，在苗栗开唱，现场逾5万名观众听得陶醉入迷。

舆论压力并未让主办方就此拿到尾款，他们只是得到了苗栗县政府优先支付的口头承诺。由于财政紧张、负债高企，苗栗县政府已经无力支付近亿元的演出费用。去年“九合一”选举后，国民党籍县长刘政鸿卸任，同党县长徐耀昌接任，苗栗财政空洞才浮现众人眼前：苗栗县财政缺口高达百亿（新台币，下同），欠债更是超过600亿，遑论国际艺人的演出费用，苗栗已经穷到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临近破产状态。



睽违5年后来台，“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9月14日应邀参加2014苗栗国际艺术季活动，在苗栗开唱，现场逾5万名观众听得陶醉入迷。

前任留下债务大坑

国民党内名不见经传的徐耀昌，去年的“九合一”选举中当选苗栗县长。作为为数不多延续下蓝色血脉的县市，蓝营对徐耀昌期待满满，希望他能治理好苗栗这个仅有56万人口的客家山城，维持住国民党的执政口碑。

但徐耀昌上台后发现，前任县长刘政鸿留下来的却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过去八年，前任县长每年花掉260亿元，支出和有80万人口的屏东县几乎持平。更严重的是，这笔钱中不少都是借债而来，徐耀昌接管苗栗后发现，县财政“没有半粒米可以下锅”，前任还给自己留下了648亿元的巨额负债。

苦苦支撑半年多之后，徐耀昌再也找不到资金来源维持县府的运行。今年7月，苗栗县账面上只剩4亿资金，但下半年公务员的工资和退休金都有12亿要支出，苗栗政府已经穷得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不得不裁员时徐耀昌才发现，县政府已经超编1000人，这些人都是前任县长安插进来的约聘人员，解约还要付额外的解约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徐耀昌才砍掉其中的300人。

面对财务危机，徐耀昌只能从软柿子下手，删减警察和消防人员的超勤津贴。面对县政府财政的窘境，苗栗消防队员也很无奈，“被砍掉几千块薪水没关系，总比发不出来要好吧。”

不仅公务人员发不出工资，县政府向民间厂商的一些应付账款也面临违约的风险。今年下半年，苗栗至少要结清欠厂商的三十几亿应付账款。苗栗县政府官员表示，如果这笔钱无法及时结清，很有可能造成厂商周转不灵甚至倒闭的困局，苗栗县经济或就此陷入恶性循环。

2005年底，刘政鸿从傅学鹏手中接过苗栗县时，县政府总共负债202亿元。刘政鸿上任之后，不到十年债务增加两倍。虽然台湾官方并未公布具体数据，但根据苗栗县议会公布的历年预算统计，苗栗目前总负债为648亿新台币。

苗栗县财政困局已经让公务员领不到薪水，在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江明修看来，这种情况在财政制度已经十分健全的台湾“根本不应该发生”。

“公教人员的薪水是预算里已经编列的项目，也就是说当初在做预算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笔钱该从哪里出，怎么可能发不出薪水呢？”根据“马政府”审计部门公布的《2012年度苗栗县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至少2008-2012年四年间，苗栗县的支出都是远大于收入，且财政预算和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以2012年为例，苗栗县原计划该年度财政能够结余2亿，但最终结果是亏损56亿，相当于计划与实际有58亿元的偏差。

该报告指出，“苗栗县政府未能积极达成余绌目标，持续短绌，须举债因应，致公共债务金持续上升，并超逾法定债限比率甚多，亟待检讨改善”。

“没有用的，台湾历史上就是‘重预算，轻决算’，民意代表们在电视上可以为了预算书吵架甚至大打出手，但是年底决算的时候民代也不管，媒体也不管。一年到头预算书是不是严格执行，财政是结余还是欠债，这些问题没有人关注”，前“监察委员”马秀茹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道。



2012年10月10日晚间在苗栗后龙以“客家山城迎国庆、缤纷同花喜迎宾”为主题，施放逾**8**万发绚烂烟火照亮夜空璀灿夺目。

穷地方的大手笔

“让世界看见苗栗，让苗栗赚进商机”，2009年台湾《远见》杂志将刘政鸿评为五星级县长，在接受专访时，刘政鸿讲出自己诸多大手笔建设就是为了在世界面前让苗栗曝光。

此后，苗栗多次大手笔活动甚至让台北都黯然失色。每年一度的苗栗国际艺术节上，卡雷拉斯、多明戈、莎拉布莱曼先后献唱，每年花费近1亿元；2011年举办的台湾灯会花费5亿；2012年的“国庆”烟火，苗栗更是破纪录地连续施放二十二场，直接“烧”掉1.8亿……

2012年10月10日晚间在苗栗后龙以“客家山城迎国庆、缤纷同花喜迎宾”为主题，施放逾8万发绚烂烟火照亮夜空璀灿夺目。

除此之外，台湾知名的“马屁工程”、“政绩工程”也都齐聚苗栗。出生于香港的马英九为了表示融入台湾，每年选定在苗栗客家马家庄祭祖，这也让刘政鸿有了“拍马屁”的机会：先是宣布修建“马英九奋斗馆”，后来又斥资2.6亿修建“马家庄游客服务中心”，甚至出资找学者撰写论文，证明马英九家族与台湾苗栗的马家有血缘关系。在花费了几百万的科研经费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马英九和苗栗马家没有关系。

去年11月，就在刘政鸿卸任前一个月，其还在为刚刚落成的客家圆楼剪彩。实际上，刘政鸿任内已经修建了一座“客家大院”，两个建筑总造价超过2亿。伴随着刘政鸿的大手笔，其本人的声望也直线上升，2009至2012年，刘政鸿连续四年获得《远见》杂志评选的五星级县长，期间也连续位居《天下》杂志县市长评比的前三名。梳理刘政鸿的得奖记录，《凤凰周刊》记者发现，苗栗县负债率增加越多的年份，刘政鸿的评分与名次就越高。

曾在苗栗县长选举中败给刘政鸿的民进党“立委”吴宜臻表示：“苗栗县民就认刘政鸿这一套，越穷的县越认这种大手笔，刘政鸿可以通过发包工程的方式满足地方桩脚的利益，他自己的选情也会因此得利，民望也会提高。”



苗栗县在后龙高铁站区规划北势溪环境营造工程中的“客家圆楼”，于2014年10月25日开幕，在夜间灯光照映下，显得格外亮眼，也让高铁站区呈现独特风情。

苗栗县在后龙高铁站区规划北势溪环境营造工程中的“客家圆楼”，于2014年10月25日开幕，在夜间灯光照映下，显得格外亮眼，也让高铁站区呈现独特风情。

无论是《远见》还是《天下》，评价方式都是以民意调查为主，专家意见所占比例极小。准确地说，这些评鉴都只是民意支持度，测不出执政者的具体能力。台湾资深民调专家戴立安表示：“全台湾医疗满意度最高的地方在台北，但这不能说是郝龙斌或者柯文哲做得好，只能说是台北的大医院多，民众就医方便而已。”

虽然大手笔让苗栗在国际上屡次曝光，但对刘政鸿式大手笔的质疑声也从未间断。几年前台湾《商业周刊》就曾给全台所有县市的地方财政进行了评估打分，当时得出的结论就是全台总共有七个县市财政“病危”，一个县财政“脑死亡”，这个“脑死亡”的县市就是苗栗。并且预言几年后苗栗的财政状况将成为一个炸弹引爆全台。

苗栗爆发财政危机，宣布7月后发不出公务员薪资之后，绿营执政的云林县也步其后尘，表示公务员薪资只能发到10月份。此外，宜兰、花莲、屏东、彰化、嘉义、台东等地均爆出或大或小的财政危机，由苗栗引发的公共财政危机或就此引爆全台。

为了给“中央”政府施压，徐耀昌在自己的个人社交网站上呼吁“一人一信救苗栗”，全县民众写信给马政府陈情，要求“马政府”给苗栗增加统筹分配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止，“马政府”对于是否救苗栗还未有明确态度。

一向与刘政鸿关系要好，被视作是刘政鸿最大靠山的台湾副“总统”吴敦义对媒体表示：“苗栗破产是危言耸听，接下来苗栗很多工程都要完工，会有收入进账，缓解目前的窘境”。但吴宜臻表示，“苗栗县政府花钱大手大脚背后就有‘中央’的支持，‘马政府’独厚苗栗等国民党执政县市，给了好多钱支持，这才让刘政鸿敢这样肆无忌惮花钱。”

第二篇 台湾高铁面临破产窘境

记者／马军

台湾的“交通部长”叶匡时这个生日过得很不快乐。

1月7日，叶匡时生日这天，其携带着挽救台湾高铁财务状况的高铁增资案进入“立法院”备询。原准备接受民进党强烈炮轰的叶匡时突然发现，这个案子还没到民进党面前，就已经被国民党党团以“0票赞成、18票否定、8个不表态”否定掉。台湾高铁增资尝试失败，即将面临破产窘境。

面对这个苦涩的结果，叶匡时当即表示辞职并获准，在临别感言中，叶匡时表示，“希望自己的离去可以让大家认真严肃面对高铁问题”。

最大BOT已成笑话

台湾高铁2007年1月5日通车，造价4600亿，全长345公里。高铁财务年报显示，运行至今台高铁已经累计亏损470亿元，现资产为5010亿元，负债4528亿元（文内货币如未特别说明，均指新台币），资产相交负债略有盈余。今年三月，台湾高铁将按照约定从股东手中赎回超过500亿股份，此后台高铁将正式资不抵债，财务意义上正式破产。

高铁通车后，台北至高雄原需要的六小时高速公路车程缩短为90分钟。由于投资巨大，台当局无法承担，其修建伊始便通过“BOT”（建设—经营—转让）方式经由民间出资建造。

1997年，由五家台湾企业联合出资成立的台湾高铁公司以“政府零出资”的方案击败了国民党背景的中华高铁公司“政府出资1495亿新台币”的方案，成功揽下高铁建造权。此案也被视作是当时全世界“最大BOT”案。

但随后，台湾高铁公司便以“无法筹措资金”为由向政府施压，李登辉、陈水扁两任政府为防止台铁失败，先后从台当局公共基金、日本银行和台湾银行贷款超过3000亿新台币，才将高铁建成。

自此，台湾高铁实际出资为民间16%、政府84%，“BOT”模式沦为笑柄。

高铁修建时，台当局评估运量为每日20万至30万人次。2007年高铁通车时，运量只有4.3万人次，发展八年至今也只有12.2万人次，不足

预计的一半，高铁连年亏损。截至2009年已经累计亏损高达700亿元。这也被视作是台高铁破产的最大原因。

前“监察委员”、政治大学教授马秀如表示，高铁在立案时的财务规划就不恰当，而且高估了载运量。“为了筹措资金，高铁修建过程中发行了太多的特别股，这种股份看起来是融资，但是到期之后就得拿钱赎回，本质上就是负债，只是为了财务报表好看，才弄成一个叫做‘特别股’的名称”。

实际上，台铁在运营伊始就是“小钱玩大案”。2007年通车时，高铁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就已经高达80.7%。这些来自私营银行的贷款利息高达8%甚至更高，高铁公司的还债压力十分巨大。

“当时两家公司竞标高铁，中华高铁公司要求政府出1500亿，但台湾高铁公司不仅表示政府零出资，还表示能够回馈政府1000亿，在这种情况下高铁被台湾高铁公司标走。但台湾高铁公司根本没钱，只出资2%来做5000亿的计划。这就好比是用400万首付去买2亿的豪宅，当然利息非常重。”卸任后的叶匡时，对媒体如此表示道。

除台铁修建时财务结构状况不佳以外，运营不如预期也是其面临破产的重要原因。据台湾交通部门统计，目前高铁每年的折旧费约232亿元，每年偿还的贷款本金为192亿元，加上重大支出和特别股股东要求的赎回款，每年至少要有400亿营收才够用。但目前高铁的营收勉强超过300亿。

破产后，台当局准备接管高铁，但接管费用也相当昂贵，先期费用就需要3900亿元。如果算上未来面临的诉讼求偿，接手高铁的整体成本将高达7000亿元。当初台当局为了省钱托付民间修建的高铁，绕了一大圈之后，以更高的价格又回到了自己手上。史上最大“BOT”案正式破功。

蓝绿恶斗下的高铁命运

实际上，高铁财务改善并非没有可能。从去年起，叶匡时率领台湾交通部门便逐步提出高铁财改方案。但在蓝绿恶斗的台政治环境下，该方案最终没有通过。

就在叶匡时进入“立法院”备询、试图提出财改案供“立法院”讨论的前一天，民进党还在准备再次以霸占主席台等方式杯葛。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鉴于陈水扁释放等原因，要求民进党释放和解信号，不要在此事上大打出手。但让叶匡时没想到的是，拦下这个法案的竟然是国

民党“立法院”党团。

对于高铁连年亏损的状况，高铁原始股东认定台当局会“接盘”进而拒绝再度投资。无奈之下，台“交通部”提出方案，准备让现有股东减资六成，减少部分由民间其他公司增资介入，原始股东特许经营权延长40年。但此方案在被蔡英文定调为“图利特有财团”后，国民党“立委”决定不背黑锅，亲自封杀该案。

按照“交通部”的原有规划，解决高铁财务危机的方式是希望透过减资打消亏损，并与银行团取得共识，盼银行团为确保债权冻结的400多亿元高铁资金能解冻，部分赎回特别股，部分作为泛公股增资高铁的资金，同时搭配特许期延长40年，吸引新的股东投资。

民进党认为，按照每年高铁200亿的净现金流量计算，“交通部”的计划将为这些原始股东图利8000亿元。

民进党此说法得到了台湾民间的支持，其支持者普遍认为，国民党当局此举目的是图利大财团。但实际上，如果任由高铁破产，高铁原始股股东、特别股股东和6万名小股东将全部血本无归，损失最大的不是大财团，反而正是这6万名小股东。

在之前台湾高铁公司与台当局达成的协议中，特许经营权的期限是35年。由于时间过短，盈利几乎全部被高额的折旧费抵消。若将特许经营权延长40年，高铁财务将至少减少一半的折旧费，盈利也会因此增加。与台湾高铁齐名的英法隧道、英法高速两个“BOT”案，特许经营权都是99年。

但是，虽然“交通部”的方案看起来十分合理，但在目前台蓝绿恶斗的环境下显然无法通过：民进党试图以反对该案的方式给国民党扣上“图利财团”的帽子，而马上迎来选举的国民党“立委”们也不愿意在此时为台当局背书，宁可让当局背上千亿元的包袱收回高铁，也不愿意让自己背上“图利财团”的恶名。

台高铁破产之后，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政府接管。1月10日，台“行政院”院会表示，将朝着接管高铁的方向前进。已经捉襟见肘的台湾财政，将再背上至少每年千亿新台币的高铁债务。

但政府接管并非一劳永逸。叶匡时预言，高铁财务改善做不成，未来十年内，高铁问题不会结束；走上破产接管的话，料想将有很多法律诉讼及争议。

最近几年，台湾接连爆出债务危机。2012年，台湾劳保基金财务精算报告发布，2018年台湾将迎来劳保入不敷出的窘境，2027年将正式破产。而从1995年开始实行的台湾健保也每年亏损超过500亿新台币，健保基金长期入不敷出。

近年来，台湾经济长期不景气导致岛内民众实质收入减少以及超高福利被视作是劳保、健保无法长久运转的根本原因。此外，台湾蓝绿恶斗的政治文化也加速了其债务危机的凸显。

高铁即将回归当局管辖之后，台湾某亲蓝媒体发表社论称，此时高铁财改案被封杀正落在2016大选前没有人要承担责任的时刻，所以“朝野”才一起撒手。而台湾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则无奈地表示，“高铁即便回归政府管辖，也最多变成下一个台铁（台湾铁路管理局），不管是效率还是盈利能力都不会比外包给民间更好。”



第三篇 台湾爆发“灭顶”计划

记者 / 马军

“夫妻间还有些事情不知道，更何况兄弟。我是爱台湾的，我在外面（大陆）赚了钱，也是要回馈台湾的”。10月28日上午，出席台北101股东大会时，101副董事长、总经理，顶新集团董事魏应交面对逼退声浪如此表示。

魏应交没有想到的是，他说服了股东，却没说服“上面”。当天下午，在魏本人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台湾“财政部”召开记者会，表示魏应交已经辞去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董事长宋文琪将兼任总经理职务。

在此之前，台湾馊水油危机已经延烧近20天。这场两年内岛内第三次的食安风暴，终于延烧到了台湾食品业霸主顶新集团身上。全台政界媒体不分蓝绿一致对顶新大加挞伐，顶新恐遭遇“灭顶”之灾。

成败皆因油

“这已经是两年内第三次因为油品涉及的食安风暴了，顶新早就应该被查，它躲过了前两次，这次终于没有躲过”。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郝培芝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去年10月，台湾爆发食用油含铜叶绿素事件时，顶新公司就曾因隐瞒19天而遭民众质疑。今年9月台湾再次爆发馊水油，即地沟油事件，顶新集团下属的味全公司就被爆多款产品使用问题油。今年10月，顶新集团下属的正义制油公司被查出使用进口饲料油混入食用油中售卖，以榨油起家的顶新公司终因油品问题彻底曝光在民众面前。

曾以“康师傅”品牌风靡两岸，顶新集团原是榨油起家的魏家四兄弟

创办。1990年到大陆后名声大噪，1998年入股台湾老牌食品公司“味全”杀回台湾，至今被视作是台商赴陆投资成功后返台的“鲑鱼”代表。20年间，顶新收购或参股了大部分台湾有影响力的食品品牌，这也让身处此次油品风暴中的台湾民众惊呼，“不管换什么牌子的油，不管换多贵的油，都跑不出顶新的魔爪”。台湾已经有家庭主妇联盟表示，“现在只能自己买猪肉炼猪油吃了”。

每次顶新陷入食安风波，总会上演“弃台保陆”戏码，发表声明表示大陆产品与台湾产品配方不同，大陆产品没问题，如同火上浇油。馊水油事件发生后，顶新故伎重演，让深受其害的台湾民众十分不满。台湾知名网络论坛PTT有评论称：“顶新不敢在大陆卖黑心油，却敢把黑心油卖给台湾人吃。是因为大陆的食品安全法比较严格，还是因为每年执行的死刑比台湾多？”

因为顶新几乎影响了大部分台湾饮食业，馊水油风暴中，顶新也受到极大冲击。除味全、正义等品牌的油品被下架之外，连味全旗下的某大品牌鲜奶都受到影响，不仅销量锐减，相关下游奶茶、咖啡业者也为避免被波及，宣布不再使用顶新旗下的任何食品原料。

几乎同时，台湾教育部门也明令所有顶新产品退出校园、台湾银行业全面缩紧顶新的银根，顶新正在台湾投资的相关产业也遇到阻碍。向来不关心大陆民众的某独派媒体甚至呼吁大陆民众：“要像台湾‘灭顶’一样抵制顶新在大陆的商业利益。”

甚至呼吁习近平主席帮台湾打掉顶新这只“大老虎。”

无论大陆是否出手，舆论压力下，顶新制油董事长魏应充都应该跑不掉了，目前逃脱了前两次油品风暴的他已经被羁押。10月底，台湾五地地检署已经因顶新、正义、味全三大公司的黑心油案分别提起公诉，其中彰化地检署认为魏应充明知油源有问题，仍裁示采购，毫无悔意，向法院求刑30年。如果加上台北等地的地检署求刑期限，魏应充总共被诉刑50年。

去年台湾爆发油品风暴，大统董事长高振利遭羁押，后被判刑12年，而几乎同样状况的魏应充则以1000万台币交保，并未遭到管制。而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此次被羁押，魏应充的态度是：“至今不认为用饲料油喂台湾人有什么不对”。

幕后“门神”马英九？

“有一次我和魏董一起吃康师傅泡面，我问他：‘听说康师傅在大陆

很畅销，顶新需不需要我的帮忙？’魏董跟我说：‘不用帮忙，你少管我就行’。正因如此，我才决定两岸经济要开放再开放。”这是马英九在2008年7月刚刚上任后在陆委会的表态。

当时马英九正在极力推动两岸经济开放互利，魏家的顶新和蔡家的旺旺集团经常被马英九挂在嘴边，称其为台湾经济的“补药”。

同样，2010年上半年，马英九在ECFA的双英辩论中，为回应蔡英文对两岸经贸融合的担心，马英九再次以旺旺和顶新举例，直接盛赞其对台湾的贡献。

而魏家对马英九的“投桃报李”同样不遮遮掩掩，2009年马英九提出“鲑鱼回流”政策，鼓励在大陆获得成功的台商返回台湾设厂拉动就业刺激经济。当时顶新便回到台湾发行康师傅TDR（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已上市，把部分股票拿回台湾二次上市），包括连胜文在内的台湾政治人物纷纷认购。此次顶新共募集到170亿新台币资金，成为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金募集案。

但根据台湾官方追踪，这部分资金除少部分流向大陆外，剩下的主要用来购买台北101股权。顶新回流后，又在台湾地标性建筑“帝堡”内购买9处豪宅，其中购房款99%通过银行贷款。曾作为马英九“鲑鱼回流”政策成功代表的顶新集团，回台后并没有如约增设厂房创造就业，反而间接炒高房价。

台湾资深媒体人周玉蔻说：“从‘太阳花学运’之后，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政商联盟的忍耐度几乎降到零，魏家和马、和连家关系之密切也是民众反感顶新魏家的原因，这就是人民的反应，跟蓝绿无关”。

黑心油事件爆发，便有传闻称马英九是顶新最大“门神”。2012年选举时，马英九、蔡英文民调十分接近，选举后期马英九阵营募款十分不顺，包括郭台铭等台商大佬开始缩手。有传闻称，正是此时魏家投入10亿新台币作为政治献金给马英九阵营，才使得马英九最后反败为胜。

根据台湾政治大学一份民调显示，2012年大选选战最后一周，国民党祭出的以郭台铭为首的一系列支持马英九和“九二共识”的台商广告，提升近5%的选票，使选情逆转。

根据台湾“检察院”资料显示，马吴竞选团队在2012年收到的政治献金总额为4.4亿元，如果马英九收受了这笔政治献金，一定没有如实申报。

对此传闻，马英九10月28日亲上火线，以国民党党主席身份发表声明，驳斥自己是顶新“门神”的不实指控。但一位接近马英九的媒体人表示：“马英九阵营的确收到过这笔钱，而且没有入账，不过马英九很可能不知道有这笔钱的存在，他并不了解自己手下在做什么。”

虽然马英九亲自否定是顶新“门神”这一说法，但馊水油风波中，马执政团队总被认做是有意替顶新遮掩。

去年10月，大统和顶新油同样出事，结果两厂负责人“同命不同价”，今年9月5日，台湾爆发强冠馊水油事件，味全受到波及后主动将产品下架，当时便有人向台湾“卫生福利部”投诉正义和顶新油涉案，“部长”邱文达并未查办。民进党“立委”段宜康和陈其迈先后在“立法院”质问江宜桦正义和顶新油是否安全，“卫福部”和江宜桦本人均表示油品没问题。

此后，油品风暴剧情大逆转，10月3日，被视作是马英九“御医”的邱文达辞去“卫福部长”一职，他一周后表示，其实“卫福部”对馊水油事件早有清查，除正义品牌使用饲料油之外，还有两家“未爆弹”。

邱文达说的两个“未爆弹”让台湾上下猜测不已，舆论基本确定“卫福部”未第一时间积极处理馊水油事件，肯定有“更高层”授意。

第四篇 杀警案促台湾新一轮大扫黑

记者 / 马军

台北警察局信义分局刑警薛贞国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在自己的辖区出事。9月14日凌晨，还在休假期的薛贞国接到电话称自己辖区内某夜店发生口角，要他过去摆平。薛贞国到场后现场一片混乱，随即遭到群殴。40多秒后，体壮如牛的薛贞国被帮派分子群殴致死，此时他所在的位置距离信义分局只有200米，距离台北市政府只有1000米。而几米之外的夜店里，他的长官正在开趴庆生。

杀警案爆发之后，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江宜桦宣布高调扫黑，台北市长郝龙斌也宣布台北市对夜店加强临检，“没有时间表”。但在岛内舆论看来，台湾出现杀警案不仅是单纯的治安问题，背后更隐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警匪关系。

说不清的警匪关系

最近林圣哲的生意不太好，杀警案出现之后，他所在的夜店顾客呈直线下降的趋势。他的收入也下降了不少。对此他向记者抱怨称，都怪他的“同行”下手太狠了。

9月14日凌晨，信义区刑警薛贞国在台北某夜店门前被超过50多名帮派分子群殴致死，死时嘴里还插着一把刀，头部多处骨折，颅骨损伤严重，惨状犹如黑道电影。事情发生之后，台北市警方随即加强了临检，使得台北几乎所有夜店都受到了影响。

但在林圣哲看来，这次警察被当街殴打致死，并不是一个“加强临检”就能解决的问题，这其中有着太多“说不清”、“不能说”的事情。

林圣哲就读于台北某高校的夜间部，同时也是某帮派成员。他向《凤凰周刊》记者表述，自己的生活就是白天睡觉，晚上上课，夜里在夜店工作，主要负责代客停车。“周边所有夜店的趴车小弟都是道上的兄弟，只是分属不同帮派、不同堂口而已。”

在台北，几乎众所周知的是，台北的夜店和传统的八大行业（KTV、理发、桑拿、舞厅、舞场、酒店、酒吧、特种茶室或咖啡厅）门口的停车小弟几乎全都有黑道背景，且和店中的保安暗中勾结。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停车小弟便可和保安一起迅速解决。一旦事件扩大，停车小弟就要负责向所在堂口报道。“在台北东区的这些夜店，基本上都被竹联帮忠堂霸住，很多店里的安保负责人都是退休的警察，这些店为了

不被其他黑帮骚扰，黑白两道都会雇佣，当然，价格也会比较高。”

“去年在台北京华城，就有好几次集体械斗的事件，打的也挺惨烈的，只不过都没像这次弄出人命来”，林圣哲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

一般来说，在全台湾号称“首善之区”的台北市，除非是枪击要犯、亡命之徒，黑道都会给刑警几分颜面，绝对不会招惹警察。这是因为警察可以通过加强临检、严打甚至以“定点找麻烦”的方式影响夜店的生意，从而控制黑道的经济收入。但这种警察对黑道的“控制”也造成了另一种现象的出现：台湾警察对待黑道的态度过于“高调”。

台湾媒体报道，根据一份流传出的调查笔录显示，薛贞国在夜店撮合事情时，是以一种“乔事情”（指德高望重或能力极强的人撮合事情）的高调姿态出现，并且用脚踢了某位黑道青年一脚，正是这一脚惹怒了黑道青年，最终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台湾绿色和平电台主持人王瑞德表示：“台湾真正的、传统的黑帮都不会选择和警察对立的，即使出事之后，也十分配合警方办案，要人给人，要枪交枪，就是为了可持续发展。但这次不一样，这50多个黑帮青年来自三个帮派五个堂口，每个人都想搏出位，下手一个比一个狠毒，四十几秒就把一个壮汉警察打死了。”

据传，此次殴打薛贞国致死的大部分帮派黑道都来自于一个名为“中山联盟”的松散组织，大约有300人，来自四海帮、竹联帮和天道盟的多个帮派，之间并不认识，也不属于任何一个金字塔式的黑道，好勇斗狠。

“按以前的做法，只要黑帮一闹事，警察一下子就扫黑，而且是哪个帮派出事就扫哪个帮派，哪个堂口出事就扫哪个堂口，但扫完之后一切回到原点，警察无法彻底扫清黑帮，只是暂时打压一下黑帮的气焰而已。”王瑞德表示，“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中山联盟’的小弟们做的事，‘中山联盟’的人算不上黑帮的干部，他们凶起来连自己的大哥都敢杀，更何况是警察。”

官方高调“扫黑”

杀警案发生之后，平时内部矛盾重重的国民党执政团队内部难得有了共同的反应。由于年底即将举行“九合一”选举，为了防止重大治安事件发生，台北市长郝龙斌在9月16日的市政会议上指出，要打击帮派围事和组织犯罪，市政府绝对不手软。

郝龙斌表示，台北市将加强临检强度，所有的临检、道路拦检没有

时间表，只要是有公共安全、治安疑虑的地方，随时加强临检，最容易发生公安危险，造成危害治安的时间，都是警方的临检时间。主要目标将对准堂口、毒品和黑枪。台北市的夜店也随即风声鹤唳，安管人员要求客人配合临检，也导致客人大幅减少。

9月19日，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内政部长”陈威仁均作出宣誓，“内政部”“警政署”和台北市警察局已经规划了绵密的扫荡行动。

陈威仁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称，“内政部”已要求“警政署”通令各县市警察局，加强特定场所临检，也已规划全面性扫黑行动，近期就会开始。“行动的速度与时间绝对不会让‘委员’失望！”

早在江宜桦宣布全台扫黑的前三天，王瑞德就预计台湾当局接下来肯定会祭出扫黑这一绝招：“之前每次台湾夜店治安出问题，警方就会扩大临检，店家也就干脆顺便歇业应付检查。但这次薛贞国就死在台北最繁华的地方，‘天子’脚下，全台警察肯定同仇敌忾，要让黑道知道，赚钱可以，但杀人不行，杀警察更不行”。台湾上一次全岛警察动员，还要追溯到白晓燕撕票案。

台湾当局在注重扫黑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警察本身纪律的约束。马英九在23日的国民党“中山会报”中表示，最近发生警察当街遭到黑帮分子围殴杀害事件，令人痛心。他特别表达支持警察依法执行公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坚定立场。

同时马英九也指出，他曾经数度强调，警察代表执行公权力，必须重视“效率”与“纪律”，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台湾当局的责任，就是要让第一线的警察“有尊严、有士气、有勇气”。

严格意义上讲，台北夜店杀警案并不代表台北的治安恶化，截至目前，作为“首善之区”的台北市是全台湾唯一一个能做到报案三分钟后小区域巡逻车到、五分钟分局警员到、十分钟保安大队到的城市。但由于警察和黑道之间的关系始终暧昧不明，才导致杀警案的出现。有传闻称，台北市的规矩，警员调动是150万，警官调动是300万，肥缺局长调动是1800万新台币。也正因如此，大量警察以收取规费和安插干股的形式为夜店提供保护的事情在台湾屡见不鲜。

对于台湾当局的雷霆扫黑行动，王瑞德并不表示乐观，他称“当年警察和三教九流都有联系，通过人员的往来和黑帮建立沟通管道和默契，这个在台湾被叫做‘灰道’。但是自从本世纪初陈水扁整风之后，规定警方和黑道不能往来，一批和黑道有关系的老刑警退休之后，这条线就断掉了。年轻刑警靠科学办案，靠的是监听和监视器，根本打不进黑

帮的组织里，才使得现在的黑帮如此猖獗。以前台北市只要枪响，警方15分钟就知道开枪的是谁，现在一天都未必查得到。而且以前警方还能通过监听获得黑帮的通联记录，现在黑帮青年都用智能手机和Line来传输信息了，警方肯定查不到。这次扫黑看起来雷霆万钧，但扫完之后，一切还会回到原点”。（注：林圣哲为化名)

第五篇 直击“全能神”在台湾

记者 / 马军

“主耶稣早已驾着白云重归，他就是末世道成肉身隐秘降临在中国的全能神”。

这是一则近日刊登在台湾《联合报》上的广告。在广告标题的上方，是一幅电闪雷鸣的图片，广告的下方则是一个联络电话，以及“全能神教会”的署名。

如果拨通这个电话，接线员则会要求与致电者私下见面，但无论致电者如何询问，接线员通常都不会告知“全能神教会”的具体所在地。

一方面高调大手笔的刊登广告，一方面私下里秘密发展组织，这就是去年开始肆虐全台的“全能神”在台湾的发展方式。一年多来，“全能神”已经成为台湾基督教界的头号“心腹大患”，吵吵闹闹150年的台湾基督教界因为“全能神”的出现史无前例地团结了起来。



2013年3月17日，台湾街头全能神教的推广摊位。

大手笔买广告

2014年初，台湾《今日基督教报》依照惯例，评选出了2013年最具代表性的十大基督教新闻。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排名第一的新闻不是反同性恋、反对堕胎等基督教长年坚持的立场，而是《异端“全能神”在

陆港台澳引恐慌，众教会合一站稳脚步》。

对于台湾基督教界，2013年最头疼的事情莫过于“全能神教会”的“异军突起”。从年初开始，在台湾早已蛰伏多年的“东方闪电”突然出现，以“全能神教会”的名义在全台北中南大行其道。不仅渗透进台湾的各个教会，利用各种方式“抢羊”（基督教用语，意为争抢信徒），还大手笔的在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主流报纸和电视台上买下大篇幅宣传广告。宣传力度之广、投入财力之雄厚，让台湾基督教界猝不及防。

2012年12月21日是传说中玛雅文明预测的世界末日。上世纪90年代发源于大陆河南省的“全能神”以此为由在大陆多地制造恐慌，通过宣称“花钱买平安”等言论进行敛财。2012年11月起，大陆各省公安掀起打击“全能神”浪潮，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此次严打，大陆共抓获控制相关人员近千名。

正是在此次严打之后，“全能神”开始渗入香港和台湾，2012年12月，香港街头开始出现带有“东方闪电”和“全能神”字样的宣传摊点。2013年1月，台湾销量最大报纸之一的《自由时报》首次出现以“全能神”教会为名义的宣传广告，此后一周，几篇同样的广告连续出现在《自由时报》《联合报》等大报上，广告的末尾“全能神教会”表示愿意免费给基督徒和其他教会送书，留有联系电话，但没有联络地址和负责人的姓名。

“全能神”广告的出现让林俊翰吓了一跳，从小生长在教会的他还从未见过台湾有哪家教会曾如此大手笔的在报纸上包下一个版做广告。在仔细研究了广告内容之后，林俊翰初步断定这就是早先在台湾曾经出现过的“东方闪电”，只是改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他们做这么大的一版广告，肯定花了大价钱，但是只留下电话，不留联系人和地址，这是很奇怪的事”，林俊翰对《凤凰周刊》记者说，“如果我想向你介绍我的教会，我肯定会把我教会的地址、教会负责人的姓名告诉你，没什么不敢公开的，像‘全能神’这种花了钱还不敢暴露姓名的，肯定是不敢在阳光下行事的人。”

阔气、排场大，这是“全能神教”给台湾民众留下的第一印象。从第一个广告出现至今，“全能神”已经在台湾各大报纸上持续打了一年半的广告，半版、整版甚至两个版的广告都有。在媒体竞争激烈，整体广告运营都不太景气的台湾，这种情况实属非常罕见。就连民进党这个台湾最大的在野党，2012年选前也只在《自由时报》买过半个版的广告而已。

“全能神”到底在台湾砸了多少钱，目前没有任何机构能给出具体数据。对此，台湾某基督教研究机构负责人罗也松给《凤凰周刊》算了一笔账：“《自由时报》是台湾最难搞定的报纸，也是广告费最贵的报纸，一个版的广告至少要90万新台币，《联合报》的比较便宜些。‘全能神教会’几乎每个礼拜都得有几个版的广告，去年八九月是他们最猖狂的时候，最多甚至一天两个版。按最保守的算法，‘全能神’在台湾一年的广告投入至少有一亿新台币（2000万人民币以上）”。

而根据本港媒体之前的报道，2012年底“全能神”赴港时，所携带的从大陆信徒手中搜刮的资金至少有1.2亿人民币。在台湾宣传所花掉的1亿新台币，只能算是这1.2亿人民币的零头。

虽然在广告上至少有一亿新台币投入，“全能神”却几乎从来没有公开自己的联系人和地址。如果按照报纸广告电话打过去索要书籍和咨询，接电话的人通常会要求和致电者私下联系。据台湾媒体报道，“全能神”在台宣传的早期，接电话的人员都持明显的大陆口音。一段时间之后，“全能神教会”的接线员已经变成了持台湾口音的人。有牧师在台湾报纸上撰文称，早期还能以接线员口音来分辨某些教会是不是被“全能神”“占领”了，后来这一招也不灵了。

目前在台湾唯一能确定的“全能神教会”实体所在地是位于桃园县国华街二号的“新歌教会”。据罗也松介绍，“新歌教会”注册于2011年8月，是当时名为“东方闪电”教在台湾“借壳上市”的壳。“东方闪电”行事极为低调，不仅注册教会时改换名称，在注册地的选择也颇为讲究：桃园“新歌教会”并没有注册在台湾“内政部”，而是以地方教会的名义注册在了桃园县政府，这让外界调查起来更为困难。

“但我们能够确认‘新歌教会’就是‘东方闪电’，也就是后来泛滥的‘全能神’”，罗也松说，“第一，在‘新歌教会’的所在地，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的人员出入；第二，不管‘东方闪电’后来改名为‘全能神’还是‘新歌教会’，他们的出版物和宣传册上的闪电标志是从来没变过的；第三，他们出版的书籍我们也进行了严格的比对，虽然书名经常改变，但是内容往往都是一样的，而且和大陆‘全能神’散发的小册子内容几乎百分百一致。所以我们断定‘新歌教会’就是大陆来的‘全能神’。”

除以上三点外，从在台湾出版的“全能神”系列的书刊名称中，也能判断“全能神”的出生地：《关于传福音工作的原则》《关于教会工作的交通讲道与教会工作安排历年汇编》《三步作工纪实精选》《基督与教会工人的座谈纪要》等书名便带有浓重的大陆风格。目前，“全能神教会”已经以“新歌教会”为名取得ISBN书号，出版了十本书，且在台湾各

大书店都有上架。罗也松担心，这些具有国际书号的合法出版物很有可能由台湾再回流到香港甚至大陆。

暗地里搞组织，如“新歌教会”般被“全能神”渗透甚至彻底掌握的教会并非一家，桃园、中坜等地已经有一些小教会“沦陷”。而更多的教会组织正在面临“全能神”的渗透，台湾基督教论坛基金会旗下的《基督教论坛报》去年就曾发表名为《辨别异端“东方闪电”进入南台湾》的报道，文章称“东方闪电”的势力已经进入南台湾，深入到教会、夜市、百货公司等地方接触人群。

同样无法统计“全能神”在台湾到底发展了多少人，到底有多少组织。由于行事低调、组织秘密，又擅长以现有教会为目标“抢羊”，让台湾各个教会既紧张又不知所措，“一开始，‘全能神’的信众表现的和一般信众没什么两样，教会很难分辨。”林俊翰称。而罗也松认为，“全能神”大张旗鼓的做广告，但私下里偷偷摸摸的“传道”，根本目的不在“传道”，而是在“发展组织”。

在台湾最早传播“全能神”的信徒大多是嫁来台湾生活，或是假结婚、真打工的陆配。这些陆配或因为思乡、或因为生活不如意需要得到精神支持，“全能神”便以此为突破点对陆配进行思乡和生活上的控制。在已知的“全能神”发展组织的案例中，以及早期街头传播“全能神”的摊位中的人员多以陆配居多。

早在2011年，便有一余姓陆配加入台北某教会，在白天妈妈小组学习《圣经》。混熟之后便以种菜、收菜为由陆续邀请其教友去她家做客。在做客过程中，余姓妇人向教友介绍“我认识一位来自香港的牧师，很会讲《圣经》，我们在大陆便是听他在讲经”。结果该牧师在余姓妇人家中讲经时不仅讲的全是“全能神”的内容，事后该妇人和牧师还警告这些教友不可以告知其小组长，“免得他们因不懂真理而反对你”。

台北该教会得知此事后，曾和该余姓妇人深谈，劝其放弃“全能神”信仰，但余姓妇人最终没有放弃“全能神”信仰，理由是“离开他们，我的生活就没有了办法”。

罗也松得知此事之后感慨道：和“全能神”的斗争会是非常艰难的，没想到“全能神”不仅控制他们的思想，还要控制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离开了组织之后就没法生活下去。

最终，该名余姓陆配并没有回到该教会，而是留在了“全能神”的组织中，而该名陆配的丈夫最终因“无法面对教会里异样的眼神”，离开此教会，加入了“全能神”的组织。

据“全能神”出版物《关于传福音工作的原则》一书称，“全能神”信徒传播福音要进行名为“摸底铺路”的四个步骤：一是摸底细，利用参加基督教家庭聚会点的活动了解情况；二是拉关系，寻找共同语言；三是转观念，设法改变对方的信仰；四是作见证，介绍“全能神”的“神迹”。

书中还称，在“摸底铺路”的过程中，“如果有教徒在聚会中流泪的，要比他们哭得更凶；如果有教徒在聚会中大声呼求主名的，要比他们呼喊的更大声。”

台湾基督教界对“全能神”的“摸底铺路”工作比较头疼，因为“全能神”教徒“摸底铺路”的方式各式各样，且潜伏期很长，很难辨别。

据台北某教会负责人许可天向记者介绍，规模越小的、资金实力越差的教会越容易被“全能神”盯上。在某小教会，有“全能神”信徒潜伏超过三个月，最终和牧师达成协议：“全能神”教徒用自己的书籍带领平日的小组学习，而牧师负责周日的讲道，二者互不干预。如果牧师同意，“全能神”教徒将许诺带领更多的人加入教会，也会给教会更多的奉献（基督徒对给教会捐款的称呼）。而等到“全能神”信徒逐渐占据教会多数时，教会就被“全能神”占据。

而在台湾另一个教会，“全能神”信众直接以介绍婚姻的方式对神职人员进行拉拢并且成功，结果这位神职人员也成为了“全能神”的一员。而在香港某教会，也有一名女牧师被“全能神”策反变节，以“无间道”的方式拉拢多名教友加入“全能神”，最终被教会开除。

对此，许可天表示，“全能神”最喜欢找两种人下手，一是对《圣经》不熟悉的人，二是不满教会的人。

“如果有基督徒对《圣经》不够熟悉，他们就以带领读经的方式对基督徒进行陪伴和引导，信众也不会注意，牧师也不会警惕，结果时间一长，读着读着就引导到‘全能神’那边去了。如果是对教会不满的基督徒，他们也会利用挑拨离间等方式骗取信任，最终把他带到‘全能神’那边去。”

实际上，如果是对《圣经》比较了解，或者基督教理论知识扎实的信众，是很难被“全能神”“偷羊”的，虽然“全能神”以基督教为幌子，但是其教义和基督教有着重大差别。“全能神教会”认为，基督教所信仰的“三位一体”的神并不存在，《圣经》所讲的东西早已过时，神在世间已经有了新的工作。

在2014年6月3日《联合报》的广告中，“全能神教会”称“主耶稣早

已驾着白云重归，他就是末世道成肉身隐秘降临在中国的全能神”，“全能神开展了审判从神家起首的新工作，开辟了国度时代，发表了拯救人类、成全人类的一切真理，在中国作成了一班得胜者。如今，神在中国秘密降临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即将向万国万民公开显现。”

“全能神”在台湾以教会为主要渗透目标和“全能神开展了审判从神家起首的新工作”的“最高指示”有关，更大一部分的原因和“全能神”本身就是打着基督教的幌子有关。在“潜伏”期间，“全能神教徒”表现得和正常的基督徒一样，很难认清。但一旦“摸底铺路”工作完成，“全能神”教徒便开始向基督徒宣称其教义，这时熟悉《圣经》或者坚定的基督徒很容易辨认出这是“全能神”的宣教，而不熟悉《圣经》的信徒则很容易误入歧途。

“对于不熟悉《圣经》的人，他们先以带你读经的方式获取你的信任，然后告诉你《圣经》只是一本过时的教科书，你还需要更多的参考书。而这时他们拿出的参考书就是‘全能神’出版的那些书”。



2013年8月12日，台湾65个教会机构连署签名发表抗异端（“全能神”教会）联合声明之后，在信基大楼B2举办“国际反邪辩证座谈会”

基督教大团结

2013年2月25日，台湾基督教多达56个主要宗派、教会、神学院、机构和媒体单位聚集在台北灵粮堂召开联合会议，针对全能神教的异端教义和种种行为，共同拟定声明。随后，台湾基督教界联合在台湾六大

报斥资购买广告，提醒信众注意异端“全能神”在台湾的发展。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基督教这么团结过”，林俊翰表示，“我甚至查阅了我出生前的历史，至少能够断定，1949年以来，这是台湾基督教最大的一次团结。”

事实上，这是台湾基督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团结，自基督教传入台湾150年来，台湾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近百个基督教流派，这些流派之间或多或少也存在对《圣经》的不同理解，之间的辩论从未停止，甚至有时也互称“异端”，但是面对“全能神”的“侵门踏户”，台湾基督教各个流派终于站到一起。

此次基督教大团结中，有牧师表示，虽然“全能神”事件对教会来说是一场危机，但这次众教会不分教派联合在一起征战，是很好的现象。他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来表达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他认为，这一事件不仅让台湾教会，而是各地华人教会都一起并肩作战。

面对着基督教界的团结，“全能神教会”也明显感觉到了威胁，就在台湾基督教界发表联合声明之后，“全能神教会”明显加大了刊登广告的力度和频率，两个版规模的广告数次出现，甚至不惜提前占据版面，防止基督教界刊登声明。罗也松回忆到，“我们刊登声明的那天，报社就支支吾吾的称那天不方便，能不能改天。我们追问原因，报社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把版面卖给‘全能神’了”。

面对“全能神”的反扑，基督教界举办了多场针对“全能神”的研讨会，请来大陆和国际上的牧师进行两岸和国际的合作。2013年8月12日，台湾基督教界举办了“国际反邪辩证”座谈会，不仅邀请到了美国基督教研究院的负责人进行演讲，还在演讲题目“邪教、普世宗教和你”之后，用明显的字体特别标注：“本活动专门针对‘全能神教会’至今仍在台湾刊登宣传广告的论证。”

而在2013年9月，台北某教堂专门请到广州某基督教的主任牧师，分享自己教会的会友被邪教绑架、教会内出现邪教卧底时的处理情况。

在教会的日常运作中，台湾各教会加强了对陌生人和新信徒的注意，也加强了之间的沟通，如果发现有异常的人，各教会之间会互通有无。“我们教会就收到过几次可疑人士的照片，但那段时间台湾《个人资料保护法》刚刚通过，在不确定他们是异端人士之前，我们也不好公开把他们的照片打印下来贴在墙上，只能自己注意一下了。”林俊翰表示。

在基督教界的联合反击之下，从去年冬天起，“全能神”在台湾的广告攻势有所减退。这也让台湾基督教界看到一点希望。但是随着台湾反服贸运动的兴起，今年5月13日起，“全能神”新一波的广告攻势再度来袭。至6月初，短短20天时间，“全能神”在台湾各大报刊登了近40次广告。山东招远惨案发生后，“全能神”更是逆向操作，不仅没有低调行事，发广告的密度反而更加密集。

“今年5月以来，‘全能神’的广告发生了一些变化，去年的广告以理论为主，用大篇幅宣传他的教义。但是今年以来，‘全能神’的广告以见证为主，主要宣传的是他们在大陆如何被公安机关打击”，罗也松说，“他们新的广告上登了很多所谓信徒被大陆公安殴打的照片，但这些照片很可能是假的，原因很明显：如果殴打是真的，那么这照片是谁拍的呢？”

“不过他们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罗也松补充道，“反服贸运动发生之后，台湾民众的‘反中’情结再度被点燃，他们就是看清了这一点，才改变了宣传策略。当然，我们判断‘全能神’也可能撤换了在台的负责人，因为去年的宣传攻势失败了”。

面对“全能神”新的宣传攻势和宣传策略，台湾基督教界下一步希望能够和大陆方面进行合作，共同建立预警机制和信息沟通的平台。林俊翰认为，“‘全能神’给台湾某些教会敲了警钟，如果教会不重视信徒，对信徒关心不够的话，‘全能神’很容易趁虚而入”。而罗也松也表示，对抗“全能神”，除了两岸联手之外，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教会自身的传道。事实证明，越了解《圣经》的信徒越不容易被“全能神”拉走，“真钞摸得久了，假钞一摸就摸出来了。”

台湾：邪教垃圾场？

相关宗教界站在第一线保护信众，而政府和警方则站在第二线，是台湾面对此类现象时的惯用做法。目前和“全能神”进行属灵争夺战的主力军还是团结起来的基督教界，台湾政府和警方并没有和他们统一战线。但在山东招远凶杀案爆发后，台湾官方也发出声明称，如果“全能神”在台湾做出同样事件，绝对会“依法严惩，决不轻饶”。

近年来，打着基督教和佛教名目的各色教派在台湾频繁出现，其中不少都是从中国大陆和周边国家移居台湾。对此，甚至有不少台湾宗教人士笑称，台湾是“邪教垃圾场”。究其原因，罗也松认为，一方面台湾有着几近于“完全自由”的社会环境，不管是正教还是邪教，在台湾落地都不会遇到政策的阻碍，另一方面台湾民众心地善良，更容易被这些邪

教盯上。“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日本海啸，台湾民众的捐款都非常可观，可见台湾民众的善良。招远事件之后，‘全能神’不仅不低调行事，反而高调的登广告，控诉自己在大陆被打压，大打悲情牌，其实也是为了博取善良的台湾人民的同情”。

政策环境宽松，官方对邪教的发展也持“不出事就不出手”的消极立场，对抗邪教发展的任务自然也就落在了普世宗教的身上。事实上，在台湾历次对抗邪教的过程中，起到主力军作用的都是正统宗教或者普世宗教。而恰恰因为如此，台湾的宗教界同时呈现出了两种看起来有些矛盾的特性：一方面，由于环境自由，台湾本地成为了诸多邪教和宗教诈骗集团的“乐土”，成为“邪教垃圾场”；另一方面，由于普世宗教和正统宗教的发达，台湾宗教界又有着极强的自净能力，不用政府出手，邪教的发展也能被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而且，台湾宗教界已经达成“自己事情自己做”的不成文默契，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异端由基督教团体负责对抗，而打着佛教旗号的邪教则由佛教团体进行抵制。一位台湾基督教牧师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如果‘全能神’不打着基督教旗号，不抢基督教信徒，而是叫‘全能功’，或者‘全能佛’，那我们也是不会去管的。”

本刊记者曾专门致电在台湾的“全能神”教会，接线员的标准国语让记者无法分辨其是大陆口音还是台湾口音。记者留下采访问题，询问“全能神”教会如何回应台湾基督教界的联合声明以及山东招远麦当劳事件。“全能神”教会人员表示需要时间准备，但承诺回复。

当《凤凰周刊》记者约定时间再次拨通“全能神”教会电话时，对方接线员改口称无人有权代表教会进行回应，但愿意提供一些微博资料供记者查询。不过截止本刊发稿时止，仍未收到“全能神”提供的任何资讯。

早在上世纪末，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摄理教便由韩国传入台湾，当时台湾基督教界便向信徒发出警示，不要随便轻信异端。而直至该教人员性侵台湾女性之后，才被台湾官方起诉。

同样，打着佛教幌子在台湾发展组织的邪教也经常遭到台湾佛教团体的抵制。在台湾街头，经常能够看到佛教界人士向往来市民、游客发放小册子，提醒远离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于上世纪40年代传入台湾，并在80年代时发扬光大，红极一时。但由于距今年代久远，加之藏传佛教本身的神秘性，使不少以藏传佛教为名的邪教和诈骗团伙在台湾落地，藏传佛教在台湾佛教界因此背上恶名，而数起真假活佛在台湾性侵女信

众的案例更是让台湾佛教界害怕藏传佛教有骗色之嫌。在台北、新北等地，台湾佛教团体还租借城市大型霓虹灯和广告牌，刊登巨幅广告，提醒民众远离“骗钱骗色”的“藏传佛教”。

第六篇 台湾土壤污染治理启示录

记者 / 曾鼎

上世纪80年代，台湾也曾爆发过严重的镉米事件。从那时起，台湾将治理土壤污染提上议程。长达30多年里，台湾一直持续对污染农田展开调查、修复与相关工作。台湾“行政院环保署”是台湾最高级别的环保部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会则是直接负责处置土壤污染相关业务的机构。何建仁担任该基金会下辖4个小组之一的技术组组长，迄今他已与台湾土壤污染打了20多年的交道。

与大陆相比，台湾重金属污染土地的面积可能较为有限，但依旧是一个难得的参照对象。它所经历过的污染和应对措施，以及为污染受害者建立的保障体系，都可以为大陆解决重金属污染问题提供启示。

凤凰周刊：台湾经历了怎样的土壤污染时期？

何建仁：1982年，台湾桃园县发生第一起镉米事件。当时化工厂排放含镉废水造成农地污染，致使种出镉米。后来台湾还发生多起农地污染事件，土壤污染的问题就这样首先从农地暴露出来。当时台湾“环保署”尚未成立，但鉴于镉米在1960年日本引起过“痛痛病”，已确定有高度人体危害性，促使我们启动土壤污染立法的工作。亦从那时起，“环保署”开始针对台湾的农地进行完整的系统性全面调查。　台湾近年来偶尔还是会曝出重金属稻米的事件。2004年，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曾检测16个地区、共241笔稻米样品的重金属含量，结果发现共计11笔、4.94公顷农田生产的稻米含镉量超过食米重金属限量标准，最后销毁污染稻谷近3万公斤。

凤凰周刊：台湾的土壤污染调查进行得如何？

何建仁：从80年代开始正视此问题后，我们就试图摸清台湾土壤污染的背景，这大约花费了20年，直到2002年才算完成第一阶段的调查。这个阶段我们筛选出319公顷可能有污染的农田。2002年之后是做更细密的调查，称作“319调查计划”。调查技术上采用网格法，从100公顷、25公顷到1公顷来筛选。按照土壤重金属含量，台湾将农地分为5级，到1991年，共调查出有1024公顷农地属于第5级，也就是“土壤中有外来重金属介入，需要重点监测的地区”。2002年，我们筛选出其中319公顷高污染潜势的农地。到2013年年底，这大部分农地已完成整治改善，同时为照顾农民生计，改善期间提供了合理的作物收购销毁与停耕等补偿金。

凤凰周刊：台湾对土壤污染的数据和信息保密吗？

何建仁：依据《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及《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定，土地是民众的重要财产，事涉民众权益、资讯全部都会公开，各种调查结果、监测结果都需依法公开。从1982年到2000年做调查摸底，台湾地区做的土壤地下水污染调查报告都要公开，每一个计划完成后就上网发布成果。一个调查计划一般都要一年以上，也有可能要跨年，做两三年。以前是发布纸本，现在网络很方便，报告直接发布在网上。

凤凰周刊：台湾治理土壤污染的主要经验是什么？

何建仁：相比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地下水污染更具有隐蔽性，也更难治理。目前台湾治理土壤污染，主要依赖的是一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这部法律的制定也可以说是台湾治理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主要经验。立法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明确了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调查及整治的基本规则。

80年代台湾开始对土壤污染立法时，本来只有土壤内容，最初叫做《土壤污染防治法》。大约在1994年，台湾发现有些工厂的地下水污染非常严重，地下水污染会跟土壤污染联动发生，不能只处理土壤而忽略地下水。于是在1999年，我们把地下水污染纳入，成为亚洲第一部结合土壤及地下水于一身的法令。由于“防治”强调预防，“整治”意味着被动改善，又将“防治”改为“整治”。2000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正式完成立法程序。立法工作前后花了将近20年。在执法10年后，2010年针对不足之处又做了一次大修正，同时将底泥纳入，成为三位一体的完整法律。

凤凰周刊：这部治理土壤地下水污染的法律为何能起到重要作用？

何建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共分8章57条，对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调查评估、管制及整治、复育措施、财务及责任与相关罚则均有详细规定。这部法令前后章节都环环相扣，都互有逻辑的相通性。主要是怎么样去调查污染，调查完怎么管制，管制后怎么改善，改善后如何恢复等。由于每个环节都需要动用资金，因此特别有关于基金的规定，以推动执行相关工作。

因为要完善管理，所以各级行政机关皆需依法律执行。这部法律主要有两个支撑。第一，各个环节都要有行政机关完备地执行它。各地的执行法令必须一致，没有区域差异性，不能在A地一个方法管，在B地用另一个方法管。第二，它要有很好的资料支撑，就是不管谁来做，在什

么地方做，调查资料都会是没有问题的。有这两大支撑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

凤凰周刊：台湾针对农田被污染的农民，政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何建仁：台湾早期相关法条法令较不完备的时候，民众习惯用环保抗争的方式争取权益。如果农田污染严重，政府又无法可管，民众可能就会围堵工厂索赔自力救济。后来台湾为了解决公害纠纷问题，特别制定了《公害纠纷法》，来处理这种纠纷案件。

有土污法可依后，每一个污染案例都一视同仁。台湾一旦发现农地污染，政府将会公告它是污染场址，把它列为管制区，不得耕种。对于失去生活经济来源的农民来说，他是无辜受害者。政府仍会按照规定给予停耕补偿。同时，政府不但会寻找造成污染的工厂，还会尽快改善农地，以求恢复农用功能，再返还给农民耕种。

凤凰周刊：台湾针对造成土壤污染的责任人，政府如何处置？

何建仁：现在的土污法里有一个重点，就是针对造成污染的“污染行为人”给予赔偿责任。2000年土污法实施以后，谁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谁就要负最终无限责任，所有损失行为人都要赔。除了改善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污染造成的连带损害，譬如居民的健康损害、有毒稻米的铲除销毁、农地改善期间农民的生活收入，“污染行为人”全部需要负责赔偿。今年我们甚至还有一个案例：污染造成民众房价损失，民众也可以按照相关《法律公害》纠纷法规定，向污染行为人索赔。

只要找到污染行为人，政府就会要求该行为人赔偿污染引起的所有损失；如果先期没有及时找到，政府会以基金先垫付补偿农民、修复土地。但最后如果政府又找到了污染行为人，企业（污染行为人）必须补付政府之前垫付的钱。除了污染行为人之外，如果是管理人、使用人未尽管理人应尽义务，致使土地遭受污染你都要与污染行为人共负连带清偿责任。总之，污染责任主体扩及到所有应尽义务的关系人，只要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就要负相应地责任。

凤凰周刊：对于追究不到责任人的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台湾如何解决？

何建仁：法律上要认定污染行为人，证据必须完整。台湾也有认定失败的案例。比如一块农地被污染，但当年的化工厂搬迁了，时间比较久远，找不到明确的责任人；再比如工厂已经破产的。这些原则上都是政府负责，由“环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负责改善及相关费

用。有的污染案例一发生，政府没法马上找到污染行为人。但是政府不应让这些污染农地的危害状态持续下去，必须要处理改善它，同时寻找污染行为人，找到后再追加责任。

从2001年台湾成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会迄今，台湾政府已代为支付金额9.1新台币，而从企业补偿回来的只有1.9亿新台币。

凤凰周刊：台湾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简称土污基金）是怎么运行的？

何建仁：土污基金目前已累积滚存新台币40亿元，每年投入10亿新台币在土壤与地下水调查和整治工作，约可创造7倍的产值。但动用基金在土污法中有严格规定，不能随便使用。我们系统性地透过调查、修复，投入资源研究并推动产业发展，这也是台湾推动环境保护与促进产业经济发展双赢的具体实践。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的资金来源有一小部分是政府公务预算投入，主要还是向企业收钱。主要对象是一些对土壤、地下水比较容易造成污染的行业类别，比如影响最大的石化行业，约占基金来源的70%，其余还有煤、钢铁等。我们对不同的行业征收不同的费率，业者按照指定化学物质的输入量、产生量来缴费。基金刚开始比较多的用在调查上，少部分是整治，因为整治工作多为污染行为人在改善，所以目前还是以调查为主，慢慢增加整治工作。

凤凰周刊：台湾现在治理土壤污染，还能提供哪些经验？

何建仁：台湾地区地少狭多稠，土地资源有限，如何创造这些污染土地的再开发利用价值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我们希望让政府的介入越来越少，让民间的参与越来越多，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益。这就要靠金融、保险、财务参与进来，这样政府支出可以用在更有效益的地方。比如企业要买保险，保险公司会详细调查你的土地有没有污染，向银行贷款也要看你的工厂、土地有没有污染。政府只负责去定法律制度、把游戏规则定清楚，让企业很清楚地看到政府未来会做什么事，就可以了。

其实，台湾目前的法律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期望以后在工厂、企业贷款时，银行、保险能介入这个部分。从整体的环境面、经济发展性、社会接受面这三个方面考虑，这才是真正的“绿色永续整治”。

第七篇 台湾高官政要如何“居住”

记者 / 马军

从台北“总统府”出发，沿重庆南路向南500米处，树木环绕下，有一栋重兵把守的独栋别墅，如果凑巧，还能看到“副总统”之子站岗放哨。这便是台湾地区现领导人马英九所居住的“中兴寓所”。台湾领导人直选以来，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三任“总统”皆居住于此，只是名字从李登辉时期的“大安官邸”、阿扁时期的“玉山官邸”，改为了目前的“中兴寓所”。

除最高领导人外，台湾副领导人、行政机构负责人、各部委负责人及各县市长都有权入住公币开支的“官邸”。陈水扁时代，初次掌权的民进党更是将“官邸制”作为制度确定下来，让每一位高官都能体会到做官在居住方面的便利。只是随着“立法院”、“监察院”以及媒体舆论对各官邸的监督，涉及官邸的丑闻接连曝出，政党二次轮替后上台的国民党官员对官邸开始“不屑一顾”——与其住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下，不如住在自己家里自在方便。



一个官邸三个名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历任的领导人都住在台北市区。蒋介石在全台湾有超过34处行馆，最长居住的就是阳明山下的士林官邸，蒋经国继任后则是住在台北中山区的七海寓所。台湾民主化后，直选出的领导人都搬进了中正区重庆南路与爱国西路交汇处的寓所，也就是今天

常被提起的“总统官邸”。民进党上台之后，领导人副手们的官邸也固定在了台北市仁爱路的“副总统官邸”。

有趣的是，堂堂“总统”住处的名字要听从警卫室的代号：蒋介石的士林官邸因地处士林区而得名，蒋经国七海寓所的名字则是为了纪念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而来。李登辉的维安代号是台北地名“大安”，陈水扁则以东亚第一高峰“玉山”为自己的维安代号，借以体现自己的本土色彩。马英九上任之后，则把维安代号改回了具有浓郁国民党风格的“中兴”二字，为了表示亲民，甚至连“官邸”二字都不再使用，改称“中兴寓所”。

而“副总统官邸”的规矩和“总统官邸”一样：李元簇官邸名为“崇实”，连战为“敦化”，吕秀莲是“仁爱”，萧万长为“长安”，目前吴敦义的维安代号则是“和平”。

民进党上台之后，台湾的“行政院长”们也有了自己的官邸，由于官邸处在台北金华街，所以历任行政机构负责人的维安代号皆为“金华”，只有谢长廷例外——这位出身高雄市长的“阁揆”为了凸显自己的高雄特色，坚持将自己的维安代号改为“爱河”。

目前，马英九中兴寓所的维安工作由“国军宪兵”332营负责。除中兴寓所外，332营还要负责马英九母亲在台北景美的住处以及吴敦义的和平寓所。有趣的是，吴敦义的幼子吴子均当兵时便被分到332营，镇守马英九家的门口，引起了台湾舆论的有趣猜测：到底是吴敦义想监视马英九，还是耍特权给自己儿子找了个清闲的差事？

民进党高调，国民党节俭

台湾高层官员官邸的制度化要“归功”于陈水扁。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街头运动出身的民进党获得执政权，由于大部分官员出身草根，在台北没有住处，所以官员们的住变成了问题。对此，游锡担任“行政院长”时便向台湾省政府借调了前警备总司令的馆舍居住，后来固定成为台湾“行政院长”的官邸，而吕秀莲则搬进了前“监察院长”陈履安的故居，此后这里也固定成为了台湾的“副总统”官邸。

根据台湾“行政院”与2001年的规定，台湾“中央各部长”官邸的室内使用面积不得超过45坪（1坪＝3.3平方米），每坪的装潢费用则不得超过3万新台币。而“正副总统”“五院院长”这种高级别的单位则不受规则的限制。陈水扁搬入玉山官邸时，光是装修就花了960万新台币，还特别请了著名的园林设计师按吴淑珍的喜好来设计园林和庭院，主房和花园

相接的地方甚至铺上了木栈道，地下室还有理发室、电影院、健身房等设施。此外，“国安局”还耗资3000多万新台币全面装修了官邸的围墙，里面都加入了防撞钢板和雷达，甚至连干扰遥控飞机的超强电波发射器都有安装。

而从游锡开始居住的“行政院长”官邸则占地1500平方米，土地面积更是超过3000平方米，除随扈外，这么大的面积仅提供游锡一家四口居住。

马英九上台时，恰逢陈水扁因贪腐事发之时，为凸显自己简朴的风格，马英九入住“总统官邸”时显得非常低调：装修能省就省，仅仅更换了天花板和地毯，连陈水扁留下的洗衣机、旧家具都基本留用，甚至连为吴淑珍设计的无障碍通道都全部留下。

喜欢在媒体面前展现清廉形象的马英九甚至还撤掉了“总统官邸”的厨师和总管，在官邸无论办公还是接见客人，都请吃台铁便当或者叫外卖。当然，这种连节省带作秀的行为并不一定比请厨师省多少钱，因为为了检查“特供总统”便当的安全，台铁厨房要在严密的“国安”监视下做菜，效率大打折扣，维安费用也有所增加。若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马英九甚至要求要骑自行车上班，特勤人员极度反对下才作罢。

相比于出身清贫的民进党官员，马英九手下的“博士官员”“教授官员”们都不太愿意居住在官邸内，官邸只是用来开会和聚餐，甚至干脆丢给随扈居住。

众目睽睽下的官邸制

官员宁可住在家里，也不愿意住在免费官邸的原因很简单：官邸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体制内有“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三院管着，体制外还有媒体和社会舆论盯着。与其小心翼翼地住在官邸，不如自由自在地住在自己家。国民党内那些不差钱的官员们更是如此：官邸大多是些老宅旧居，还不如住在自己家里舒适方便。

2010年郝龙斌连任台北市长之后，就耗资7亿新台币在中山北路、新生南路和基河路等高级地点购置了24套豪宅给首长们当宿舍，其中在新生南路为正副市长购买的四栋豪宅便被民进党籍市议员王世坚爆料说，不仅面积达150多平方米，还有全新装潢和家具，甚至豪华浴室照片都被爆出。被舆论称为“官员住豪宅，市民住棺材，有房还买官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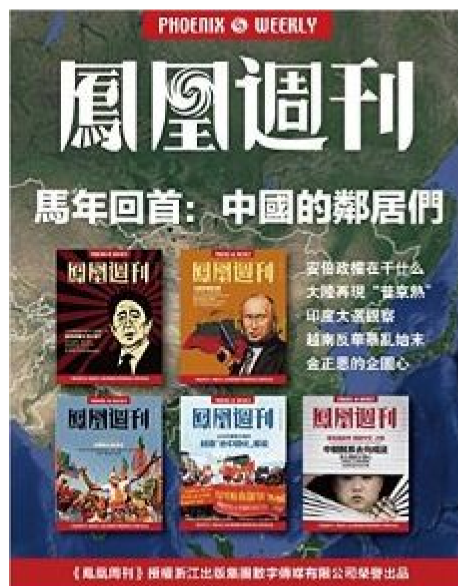
而2011年夏天“新闻局长”杨永明130多平方米的官邸被发现月电费账单高达两万多元新台币时，更是招来一阵批评，不仅在“立法院”被“立

委”狂批，还被网友在网络上大加挞伐和讽刺：“局长家里可能是在养企鹅”“可能局长家人要练习溜冰”。一周之后，杨永明不仅向社会公开道歉，还表示尽快搬离官邸，自己花钱去外面租房住，再也不申请官邸居住了。

其实，杨永明的电费并不算高，根据台湾“监察院”的数据，台湾“行政院长”官邸每月平均的电费更是高达五六万新台币，高雄市长陈菊的官邸以及“外交部长”官邸用电量也都比杨永明多很多。但来自反对党民代的监督，已经让有地方居住的官员对官邸能躲就躲，大学校长出身的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蒋伟宁甚至宁可桃园、台北两边跑，也不愿意入住位于台北的“部长官邸”。

而位于台北厦门街的“国防部长官邸”，则因为年久失修、草木茂盛，更是多年未有“部长”入住，这座何应钦的故居不仅成了废弃的“老鼠蚊子馆”，还因树木过于茂盛屡遭邻居投诉，历任“国防部长”不仅选择不住，有时还要自掏腰包对房屋进行修复。据台湾媒体称，除上述原因外，历任“部长”选择不住这里的原因是院里大树有阴气，风水不好。阿扁任内八年就更换了五位“国防部长”。但这种解释看来并不成立，因为马英九任期尚不足六年，也已经更换了五位“国防部长”了。

精彩推荐：《中国的邻居们》



点此阅读

第八篇 台湾特色的医疗困境

特约撰稿人 / 郑惠文

10月17日至27日的短短10天内，大陆接连出现6起伤医杀医暴力事件。悲剧的一幕发生在10月25日浙江温岭市，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遭患者刺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此事激起全社会对“医患冲突”议题的关注。医师协会对此表态：“我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动和加大医疗体制改革力度，从根本上改革医患关系。”

然而，医疗制度改革似乎在全世界都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海峡另一边的台湾就走过一条十分缓慢、艰难的医疗改革之路。

虽然台湾“全民健康保险”（以下简称“全民健保”）制度让每位患者都能看得起病，但在现行制度下，台湾医生成为弱势，不仅劳动权益未受到基本保障，还常常卷入刑事诉讼案件。近3年内，频频出现“医师和医护人员过劳死”、“医师短缺”、“医师出走大陆”的新闻。在医患关系中，医师所承受的压力和遭遇的不平等待遇，渐渐成为台湾媒体关注的对象。

不受《劳基法》保障的台湾医师

在《劳动基准法》（以下简称《劳基法》）的规定下，台湾劳工可以在5月1日休假一天。然而，“受雇医师”这个职业却从来不被视为“劳工”，不仅没有这天的假期，更无法享受《劳基法》对员工的保障。

每年台湾劳动节的街头百花齐放，各个社会团体上街表达诉求，希望争取政府与各界的关心。2011年开始，“医师”加入到劳动节原有的抗议队伍，为自己的权益走上街头。

那一年劳动节当天，蔡太太是第一个为医生打抱不平的人。她的丈夫原是奇美医院的医生，2009年在做手术时，疑因过劳导致心肌梗塞昏倒，苏醒后失忆。蔡太太称，这两年里只拿过62000元新台币（约人民币12400元）的急难救助与慰问金，医院没有针对过劳向他们道歉，就连续聘也不和他们讨论。蔡太太在接受采访时还愤怒地说：“他们说我先生本来就有心脏病，不是过劳害的，但为什么明知有心脏病还让他每个月工作360小时？”“他是人，不是机器，不能等他倒下就被踢一边”。

针对受雇者的最低工资、最高工时、退休、职业灾害赔偿，《劳基法》都有明文规定。根据2003年“行政院劳工委员会”的资料所示，台湾医师每月平均工资高达10万到30万新台币(约人民币2万到6万元)，虽然

拥有高薪，但医师的工时上限并未有明确规定，因此常有医师过劳事件发生。

高雄医学院学生林彦廷在成大医院实习近一年，2011年4月27日被发现陈尸宿舍浴室，家属怀疑他是连续值班36小时，加上要准备“国家考试”的压力，年仅27岁的“家庭的希望”因此陨落。成大医院的医师指出，医师原本精神压力大，同时也需要体力，特别是在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阶段，“超时工作很平常”，常半夜值班、睡没几分钟就被叫起来处理病人问题，一早又要开会。

“医师过劳”近年来成为劳动节游行的重要议题，医师工时过长，病人也无法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因此台湾医师自发组织“台湾医疗联盟劳动正义与病人安全促进联盟”，要求将医师纳入《劳基法》保障。然而主管公共卫生、医疗与社会福利事务的“卫生福利部”却响应道：若接受此要求，因工时缩短住院医师人力将短缺三至五成，亦会损害患者就医权利。因此他们会与“劳工委员会”进一步协商、讨论配套措施。

强势的病人、弱势的医生

2012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到台湾拍摄“全民健保”专题，内容强调全民健保对全民的照顾，却只字未提医护人员的辛苦，以及台湾整体医疗工作环境。台湾护理师林美琪主动投书CNN，揭露台湾“血汗医院”的黑幕。

她在这篇《台湾护理师的黑暗期》的文章中指出，台湾全民健保提供民众随手可得且廉价的医疗，但医护人力却被严重剥削：超时工作、低水平薪资、病护比悬殊。此外，台湾护理人力短缺状况已至少有10年，因此“只要还能走路，主管就会希望员工继续上班，医院经常能看到护理师边打吊瓶边工作，每天工作常超过10小时，却没有加班费。”

诚如林美琪所说，台湾全民健保制度虽让民众看得起病，但也造成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精神科专科医师卫汉庭以台北市的医学中心为例，他说，台湾门诊看诊费低廉，“使得许多民众即便在假日依然频繁使用急诊室，不论大病小病。医学中心的急诊室总是人满为患，比院外的夜市还要热闹。”今年4月台湾健保局公布去年门诊就医次数，共有4名患者就医次数均超过500次。看诊次数最多的一名男性平均一天到院看病近2次，他自称下背痛，找不出原因，尽管吃了止痛药，还是觉得痛，因此四处挂号看病。光是他一人去年就医次数多达582次，健保支付金额高达28万元新台币（约人民币5.6万元）。台湾民众平均一年就诊次数为15次，为了节省部分民众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从今年5月

起，民众若一年门诊就医次数超过20次，健保局就会让诊治医师主动关心、了解患者病情，予以辅导。

卫汉庭也指出台湾消费社会的特点，“以消费者为中心，造成个人意识上升，逛急诊室就有如逛便利店一样，要求快速且立即的消费服务，对传统医疗体系与儒家社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台湾特色”的医患矛盾就此加深。

为医患矛盾雪上加霜的还有民主社会里自由结社的组织。今年9月底，“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以下简称“消基会”)站在病人的角度批评医疗机构绩效不彰，抨击医院左手要钱、右手却未增加护理人员。

对此，医师公会联合会秘书长蔡明忠发表严正声明，指消基会“仇医”，若全民健保总额分配停滞不前，将会加速医师出走外流。他强调，台湾健保支出与国际比较已经是长期偏低，2011年台湾的民众医疗保健支出仅占GDP的6%，远低于先进国家与亚洲邻近各国及地区，但台湾病人住院等满意度却排名世界第二。消基会一味要求医院减少支出，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实在矛盾。

根据“行政院劳工委员会”的资料，自1993年起，在台湾政府的管制下，全台每年医学院招生总数仅为1300名。目前台湾有12所公私立医学院，医学系学生一般7年毕业，毕业后根据住院医师训练制度，先接受2到4年以上的住院医师训练，经过考试，之后增加行政历练，才能成为主治医师人选。

如此看来，培养一名合格的专科医师需要10到12年的时间，但现在台湾医疗环境却留不住这些长年培养的医师。有些医师不愿意承受台湾高工时、高风险的医疗环境，转往美容整形业发展，不仅工作稳定，还能拿到更高的薪水。多数医师选择较低风险的眼科、牙科、耳鼻喉科，甚至还有医师不满台湾的医疗环境，选择前往其他地方发展。

蔡明忠指出，目前已有400多名医师出走海外，尤其偏好前往中国大陆，甚至有上千名医师以“短期支持”名义到大陆执医。出走医师当中以妇科居多，而台湾本地妇科医师平均年龄已高达56岁，一半以上的偏远地区甚至没有妇科医师，再招募不到新生力量，断层只会更严重。蔡明忠批评，消基会资料引用错误，抹杀台湾医疗人员的努力，造成民众仇医心态，只会加速医护人力短缺的问题，最终受影响的还是民众医疗质量。

“钱少、事多、离监（狱）近”

台湾妇产科医师高添富说过一句玩笑话，优秀的年轻医师纷纷避开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和急诊科，因为“钱少、事多、离监（狱）近”。这五科的医师除了必须承担较高风险、健保给付低、工时过长之外，他们还可能挨打、挨告。

今年5月，曾在台湾本土剧《台湾龙卷风》中饰演角头老大的艺人陈清达陪母亲到医院急救，到了急诊室后，陈清达认为医护人员动作太慢，不断咆哮，甚至挥拳殴打急诊室医师，造成医师左后脑血肿。

据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学者统计，台湾医师的“犯罪率世界第一”。他们调查在2000年到2008年间，台湾医师的“有罪率”高达25.6%，平均每38.8天就有一位医师被定罪。相较于台湾，美国百年来却只有一例医疗刑事案件。

台湾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王皇玉指出，台湾医疗纠纷案件80%都是以“刑事诉讼”方式提出，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多以“民事诉讼”来处理医疗纠纷案件，因此造成医师高犯罪率的现象。他解释，台湾病人、家属偏好提出刑事诉讼的原因是成本低、便利性高。从病人和家属的角度而言，若提起民事诉讼，提告人必须聘请律师并担负举证责任，证明医疗行为与病人死伤之间有因果关系，同时还要缴纳裁判费用，故成本较高；但若以刑事诉讼提告，他们可以请求检察官介入，利用公权力帮助搜集证据及强制处分，造成医师心理压力，还无须缴纳裁判费用，并同时在刑事诉讼中请求附带民事赔偿。

因此，一旦有医患纠纷，病人、家属都会选择用刑事诉讼解决，造成台湾医师“高犯罪率”的现象。根据“行政院”网站，台湾各地卫生局每年受理600多件医疗纠纷申诉，法院也约有400到500件医疗纠纷诉讼案。有鉴于此，台湾自2012年年底提出“医疗纠纷法”的草案，希望能够有效解决医疗纠纷事件，预计在今年完成立法。

“医疗纠纷法”草案中明定“强化调解机制”以及“及时补偿制度”，未来台湾医患纠纷将先采取调解方式解决。在调解的过程中，尤其注重病人及其家属的权益，规定医院必须在一定时间内提供病历表，并成立调解小组主动联系病人家属。另一方面也将成立及时补偿金，不过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苏清泉表示，目前争议条文主要为赔偿是否采用无过失补偿，但赔偿金额粗估一年要新台币200亿元新台币（约人民币40元），届时如何负担、负担比例都是难题，也可能有道德风险。

“医疗纠纷法”看来是台湾医疗改革当中踏出的一小步，但台湾医师过劳、医师短缺、医师出走，甚至整个全民健保体制下的医疗制度问

题，至今仍没有清晰的解决方案。若要追究台湾医疗问题，还是得回归到“物美价廉”的全民健保制度。

医疗价格管制是主因

在1995年之前，台湾只有劳工、农民、军公教人员（公务员）享有健康保险，其他人看病都必须负担相对较高的医疗费用。1995年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之后，每位患者凭着低廉的保费，就能享受专业的医疗资源，全民健保也获得美国、德国等外国媒体的赞扬。

然而，有了全民健保的保障后，民众看诊需求大量提升，过去看病成本高，一般人小病直接去药店买成药，但有了健保以后，看病成本骤降，不如走一趟医院。随着民众就诊需求变大，医疗开支节节上升，医院乐得享受业务量和收入的大幅提高，而全民健保却面临高债务的危机。

针对医疗开支过度增长的问题，台湾健康保险局（以下简称“健保局”）在2010年7月引入“健保总额支付制度”来控制财务风险。此制一出，健保局将不再全额给付医疗院所的医疗支出费用，而会在事前划定一个医疗支出费用总额，由各医疗院所分别申请。如果医疗院所申请总额超过原定总额，健保局会按比例打折给付。这个制度虽然延缓全民健保因医疗开支而破产的危机，但却把财务风险交给了医院。

医院的好日子结束了，在“健保总额支付制度”下，医院预期收入大幅减少，医院管理人员为了控制成本，只能降低医护人员的待遇。原先台湾医生月薪普遍为20万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4万元），规模较小的地区医院可以拿到30万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6万元），有些讲求业绩的私人医院医生薪水高达四五十万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8万元、10万元），自行开业的医生薪水则有高有低。新制施行之后，医生薪水大大减少，一个年轻主治医师的月薪只有约15万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3万元），约为过去的一半。

“健保总额支付制度”让医师的薪水大幅减少，但病人看病仍然无需自己掏钱，仍然热衷于只要有病就去医院，这一制度等于强迫医院低价提供服务。无怪台湾医生会大喊不公。除了薪水缩少、工作量上升，台湾医生无法享受《劳基法》保障其基本工作权益，还常卷入刑事诉讼案件，诸如此类的事件近三年获得台湾媒体的关注。未来医师权益若未受到合理重视，只会让“医师出走”“医师短缺”等问题更加严重，而原本立意良善的“全民健保”恐怕也将造成民众“有病无人可医”的现象。

综观过去台湾医疗改革，全民健保曾是解决良药，如今也成为问题的根源。大陆若要发展出一套医疗改革的新制度，恐怕也将面临种种难题。

第九篇 台湾器官移植的非市场化经验

特约撰稿员 / 杨泰兴

受惠于长期与美、日主流技术接轨，台湾医学一直维持较高水平，器官移植技术与环境尤为成熟。

根据台湾卫生署记录，台湾各类的器官移植存活率从79%到98%，堪称亚洲第一，亦不逊色于欧美。台湾的器官移植保持高水准的另一关键因素，是对器官移植以及脑死亡判定的立法较早，同时观念较为进步开放。器官移植与国家的立法息息相关，日本就受限于国内对于相关法令的保守，器官移植落后于台湾甚多。

台湾民间团体的蓬勃，也推动台湾相关立法的不断松绑与国际接轨。台湾骨髓库建立以及废除了“骨髓捐赠只能限于三等亲内的限制”，便是来自女病患温文玲的推动与慈济功德会的努力，台湾得以于1993年顺利修法完成“非亲属造血干细胞移植合法化”。

严格立法下的器官捐赠

台湾对器官买卖订立了严格罚则，禁止非五等亲内的活体器官指向性捐赠。此器官移植法令之严格，甚至有不近人情的情形。2003年，一位40余岁急需换肝患者的家人，透过管道找到适合捐赠人，但受限于法令中五等亲限制，患者亲妹只能离婚后再与捐肝者结婚，以谋求捐赠合法。

而2008年，一位患者病危等待捐肝，他的弟弟却刚好意外脑死，家属希望两人至少救回一命，欲以弟弟肝脏移植给哥哥。但受限于弟弟生前未签署意愿书，而法令规定死后捐赠不得指定捐赠对象，最后两人均不幸过世。由此两例可知，台湾器官移植相关法令执行之严。

台湾难成非法器官买卖渊薮，严令重典只是因素之一。台湾医师地位崇高，因而违法成本过高，通常不会参与非法器官交易。但更关键的是，台湾建立了现代化的器官捐赠系统，拥有统一的捐赠登录与分配平台，以及与之配合的OPO(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器官劝募组织)制度。

台湾设立器官捐赠系统的时间并不长。2002年之前，台湾也是放任各医院自行劝募器官自行使用，当年6月，台卫生署在“国会”压力下，成立“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统筹器官捐赠移植事务。但因欠缺网络系统作基础，该中心最核心业务——捐赠移植的管理和登录无法

推动，致使中心空转一年。

直到2005年4月，台湾大学创伤医学部主任柯文哲医师主导完成网络系统，台湾现代化器官捐赠制度才算进入新时期。“器官捐赠登录系统是实践社会正义。器官捐赠应是社会公共财，人们因爱心而捐出器官，我们就应让它发挥最大功能造福社会，而非当做医生的生财工具或是公关用具，”基于改善器官分配黑箱情形的朴素想法，柯文哲开启这项得罪各医疗山头创新，“此前台湾并无官方机构在负责器官捐赠、移植之业务。有人捐赠器官，该医院若无适当的受赠者，则打电话询问其他医院是否有需。这种一一打电话的情形范围有限，效率低下，通常也不是移植给最适当的等候者，甚至根本浪费了很多器官。”

以台大医院为例，该医院在全台拥有最多的器官移植病例，2005年前，此院有三位肾脏移植医师，但三人各自有移植等候名单，从无汇整，遑论全台湾整合。因此，柯文哲花费两年，设计了所有的表格、配对规则、软硬件，并建立OPO制度。

2005年器官捐赠登录系统运行后，台湾捐赠器官的信息都须透过OPO体系医院（台湾现共有11家）来登录器捐中心进行计算机配对。此系统使得捐赠器官运作过程实现公开透明，但亦出现不少缺失。

有利益，有江湖

在美国，OPO是独立机构，器官公平分配于地区内所有医院。较之美国，台湾的OPO实际上有诸多妥协。台湾OPO并不独立，而是附属于移植医院。

成立OPO之初，为了增加器官劝募诱因，故意在制定分配规则时，令捐赠医院和同一OPO体系医院可优先使用捐赠器官，此举使得OPO医院一旦发现配对的受赠者非自己医院的病人，就意态阑珊，从而增加了转介捐赠器官的难度。

台湾曾发生过受捐赠医院为了取得捐赠者病历与报告，与OPO医院争执，担任过器捐登录中心执行长的长庚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江仰仁指出，在器官被分配到其他医院时，“院际资料交换、隐私保护”都引起法律争议，院际信息交换仅停留在电话对电话口语传述。

曾有长庚医院劝募来的心脏分配至台大医院，台大医师要求检视捐赠者X光片，但长庚医师仅口头告知，以保护隐私为由予以拒绝传送影片。以致台大协调人员亲赴长庚，双方发生口角。

此外，台湾医疗界山头林立，都不想合并。OPO体系创建之初便宜行事，刚开始OPO医院竟高达15家，现仍有11家，以台湾每年仅200多人捐赠的数量，此情况“规模不经济”。

这套捐赠系统在使用6年、完成5000次以上的配对后，终于爆发严重失误：2011年8月，“艾滋病患器官移植事件”致使5名受赠者遭遇感染危机，这是国际上有记录的最严重艾滋病器官移植事件。此前，2007年意大利曾发生3人移植艾滋器官事件，而这次意外事件也导致台湾社会的深刻反省，影响器官移植势头甚巨。

2011年8月23日，台湾新竹一位38岁男子因忘带钥匙，攀楼回家不慎坠楼身亡。在判定脑死后，其母同意捐赠器官。器官捐赠中心完成配对后，台湾医疗界龙头台大医院的协调师（大陆称协调员）开始忙碌联系，一日内拨打百余通电话，敲定台湾南北共五床器官移植手术。这些手术均在其后2天内顺利完成，不料8月26日，台大医院发现捐赠者艾滋检验报告为阳性。

此次悲剧源于医检师与器官移植小组协调师确认失误所致。该案当时震撼台湾，不但5名受赠者身陷感染艾滋危险，医疗团队亦有感染可能。其后风波迭起，捐赠者隐私曝光、捐赠家属遭到非议，台湾爆发器官捐赠卡退卡潮，器官捐赠制度创始人柯文哲甚至因此辞去台大器官移植小组召集人职位，并遭到“监察院”弹劾。

柯文哲反省出错的原因，认为这套捐赠体系“便宜、有效，但不安全。为了节约我们省略了很多步骤，没有复核机制就是这次出事的原因”。

岛外供给靠大陆

台湾捐赠系统的挫败也在于OPO医院规模不经济。

出于成本考量，为节省人力成本，此捐赠系统没有医师复核机制。台湾每年仅200例捐赠案例，由11家OPO医院分配，连移植案量最多的台大医院平时也只维持两位专职协调员。而器官移植时间急迫性、程序复杂且高难度，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大祸。台湾200多捐赠案例不以地区作为分配考量，而迁就现有各医院的医疗体系，也让团队在面对紧急的器官移植案时，人力调度不易，极容易出错。

从器官捐赠需求来看，根据捐赠系统记录，截至今年7月22日，台湾有8089人等待器官移植。而台湾器官移植渠道主要有三方面：五等亲内家属的活体捐赠；脑死器官捐赠者；到海外进行器官移植。

台湾脑死器官捐赠者每年仅有200多人，无法满足需求。而台湾民众境外器官移植的主要地区就是大陆。台湾卫生署调查显示，从2000年到2011年保守统计，台湾民众境外器官移植共有1979个例，其中在大陆地区1754例，占整体的88.6%。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发言人黄士维称，台官方对赴大陆换器官，“不鼓励但也不禁止”。

2006年，台湾官方曾委托台移植医学会进行一项调查，境外移植信息6.8%到9%来自中介，另有11%到38.5%由医师提供，其他多为病友间介绍。

换肝主要为救命，多是病友间义务介绍。但换肾主要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市场更大，已经彻底商业化。台湾的器官捐赠协会秘书长吴英莱称，不时有大陆器官掮客到他们留言板上留言，希望中介器官买卖。

然而，过往5年到10年的追踪记录显示，境外换肝肾者的死亡风险较高。尤其是境外换肝，比境内风险高出八成，存活率低至三到四成。而境内外换肾的死亡风险与存活率差距不明显。

到大陆器官移植至少要花费200万台币，多者需要千万新台币。而台湾全民医保机制完善，器官捐赠移植大部分费用都可以用医保支付。

目前大陆器官移植存活率平均有七成，2007年之前，甚至传出大陆医师来台湾办“病友会”，后遭台卫生署禁止。此后，由于大陆设立器官移植法，管制渐趋严格，台湾赴大陆移植器官比率大跌，但这几年仍时有所闻。

这种以邻为壑的器官移植争议甚高，台湾医师基于体谅病患苦衷，大多愿意协助病患进行术后追踪。香港则恰恰相反，97回归之前，香港医生用拒绝术后服务的办法，联合抵制港人赴大陆陆器官移植，但回归之后，此抵制也渐趋崩解。

来源困境待解

据统计，台湾脑死器官捐赠人数从2002年66人增至2008年的195人之后，就停滞在200人上下。台湾器官捐赠协会秘书长吴英莱称，台湾每年花上数千万新台币的劝募经费，加上器官捐赠中心、医院、学校以及协会大力倡导，这200人的捐赠数字却迟迟不见变化。

欧美捐赠率约为每百万人20-30人以上，台湾仅每百万人群7人捐赠。其间差别除了脑死亡判定的严谨程度（欧美国家部分可接受一般医师判定），也与文化观念、法令相关。欧美采取“推定同意”（没有拒绝

即认定同意），而台湾脑死亡者即使已签署器官捐赠卡的制度，若最终家属不同意，仍无法实现捐赠。

意外死亡一直是台湾器官捐赠的主要来源之一，台湾过去相当比例的器官捐赠者为机车车祸脑死亡者，但在政府推动强制戴安全帽后，有效减少了机车骑士意外死亡人数。这亦是近年台湾器官捐赠源减少的原因之一。

此外，由于医保完备急救设施ECMO（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在台湾普遍使用，甚至滥用，造成许多无效急救，同时错失很多器官捐赠的机会。

全世界唯有台湾与大陆接受死刑犯捐赠器官，但近年台湾废除死刑声浪高涨，死刑执行率偏低（仅为个位数，更有数年为零），而死刑犯捐赠器官是否合宜的争论也频频。尽管死刑个案稀少，但也让器官来源更加困窘。

华人对“全尸”的执念也是困境之一。台湾虽有37万人签署器官捐赠卡，但事实上，判定脑死后，医院启动劝募程序时，往往遭受家属强烈情绪反弹。除了眼角膜捐赠阻力较小，其他器官其实成功率不高。

医院为了保持器官堪用状态，须常年保有一支器官维持团队待命。鉴于劝募成果不见得会配对给自己医院，且说服的成本过高，在现有的医疗给付制度下，一般医院并无充分的经济诱因进行劝募。

由于一般人很少携带器官捐赠卡，台湾在器官捐赠协会与有识者的推动下，近年成功推动了健保卡加注捐赠意愿。这让医院社工、协调员有了切入说服家属的契机，也成功降低了说服成本。

相较于亚洲其他地区而言，台湾捐赠数字仍属于最前沿，2008年的一份数据显示，台湾捐赠率在亚洲居第二，仅次于以色列。

“悲伤照顾”是助力

台湾过去仅着力于捐赠倡导，近年才意识到对捐赠者家属的“悲伤照护”不足，目前正在积极改善，这也是让器官劝募成为长期良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吴英莱秘书长回忆，美国南加州的器官捐赠协会来台交流时就表示，该地劝募绩效良好，关键在于一旦捐赠完成，该机构便会每周关怀捐赠者家属，成为其支持系统。这直接影响了后继捐赠者家属的决定。

台湾捐赠者家属对于物质补偿部分，包括医疗费用减免、丧葬补助

等大多并无满，但院方过去让家属有着严重“用过就丢”的感受。台湾推动器官捐赠20年，对于遗体处理家属的情绪支持，往往都不够细腻而成为负面营销。

家属无偿捐赠器官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为了让亲人的一部分继续存活，同时帮助他人。吴英莱身为器官捐赠协会秘书长，本身亦是捐赠者家属，他回忆当年捐赠亲人的感受，“庆幸保留亲人最多的部分在世间”。这样的情绪亦普遍存在于其他捐赠家属身上，让他们对于受赠者有着特殊而微妙的情绪，但台湾法律规定二者之间资料不能透露，以规避道德风险，如何成熟处理其中的矛盾，也可堪商讨。

捐赠者家属常面对社会上的误解与不友善的歧视眼光。吴英莱介绍，曾有一名捐赠丈夫、哥哥器官的单亲母亲，因遭邻里嘲讽“一定不够爱他们”而自杀，这些情形都会成为器官劝募的阻力。“载舟覆舟一念之间，与悲伤照顾关系甚大”，如何让曾经捐赠亲人器官的家属成为劝募帮手，是台湾当前努力的方向。在这个方面，慈济医院已有口碑，而器捐登录中心一开始就着手于此。

非市场化经验

台湾从1925年首次眼角膜移植以来，器官移植近90年一直推行非市场化。例如涵盖广义器官捐赠之内的血液捐赠体制，以及骨髓捐赠体制即是如此。

台湾早年也曾经历过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的混杂时期，即便严格立法“非市场机制”后，也出现过平台统一、垄断权力过大的争议。以献血为例，而台湾早年献血风气不盛，血液来源相当部分必须靠各家医院循“血牛”卖血管道补充，这样的情形到上世纪80年代依然存在。直到台湾“血液之母”林妈利医师投入改革制度才获得解决。

“血牛”血液质量不佳是最大问题，林妈利曾有言：“在美国就发现，血牛的血所引起的肝炎及感染机会，比捐血得到的血高十几倍。”而中国河南爱滋村的出现，也是类似的后遗症。而今台湾献血活动已经是民众生活中的一部分，台湾马“总统”就是知名定期献血人。自1991年起，台湾民众捐血率即达到5.18%，台湾医疗用血100%由自愿无偿捐血来供应。2012年的统计显示，台湾每年每千人有高达78.9人次的捐血，是发达国家每千人口36.4人次的2倍以上。

捐髓制度更是值得探讨。自1993年慈济推动骨髓库，台湾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骨髓移植来源，收集案例数一直到2007年才被大陆的中华骨髓

库超越。截至2013年6月，慈济一共收集37万多笔的验血案例，完成台湾移植达1144例。其中提供大陆移植案例多达1363例，造福两岸甚大。

但2002年，香港壹周刊登载一则盛传已久的网络消息：一家独大的慈济骨髓库，利用其垄断资源，向受髓者家属劝募款项12万元。在家属不同意之后，“巧合”地出现捐赠者反悔而无法完成移植的情形。

慈济作为全台最大慈善团体，每年坐拥大笔捐款，其经营的骨髓库到底该收取哪些费用？该自负盈亏还是捐款支持？收取配对费用，配对成功后，捐赠者反悔的不确定情形，是否有操作空间？这皆是引发争议之处。

舆论监督之下，慈济废除收取配对费用而改采自行吸收，更加强弱势移植病患的经济补助（每案补助5到10万台币）。由此可见，任何独大的垄断平台其寻租空间必定引发议论，在欠缺市场化竞争下，唯有垄断平台公开透明，以及更清晰、简化的游戏规则，切断逐利联想的可能性，才能维系一个独大平台的公信力。

台湾经验提供了“非市场化运作”机制成功的可能性，例如台湾献血机制运作的成功，让早年卖血情形完全断绝，器官移植的非商业化，也让台湾医院不以器官移植为营利主要手段。“悲伤照护”亦是值得借鉴的重要经验。

总之，器官移植是医学、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甚至人性的复杂现象纠结，台湾提供了华人世界的另一种观照。

（本文实习记者倪珊珊亦有贡献）

第十篇 台湾出租车治乱之路

特约撰稿员 / 杨泰兴

北京打车难，服务差积弊已久，北京市交通委公布将出台一系列的综合改革措施缓解打车难，提升服务质量。其中包括增加司机运行时间、改单班为双班，推行电话预约候客服务等。

台湾出租车也曾跟大陆一样，曾经因为数量管制而享有垄断性利润，其间成员良莠不齐，车辆老旧、不洁、绕路、不照表收费等恶劣行为层出不穷。

而今，台湾出租车成为台湾服务的亮眼名片，多年的出租车制度演变之下，消费者自觉地改善、业者的制度创新加上政府因势利导，才有今日风貌。台湾多年经验，或有值得北京参考之处。

薄利高质

在台湾只要年满20岁、考取营业登记证的居民，便可租车或买车执业，每位司机都是自己的老板。2010年台湾“行政院”研考会的研究报告显示，台湾主管机关将出租车产业视作“完全竞争市场”，以为更多的出租车司机加入市场，就可以让无竞争力、劣质的司机自动退出。

台湾现有出租车8.7万辆，是一个薄利的萎缩市场。以大台北地区为例，登记在大台北市的出租车截至2013年第一季，共有30412辆，邻近新北市、桃园、基隆、宜兰等地出租车也不时越界到台北抢客，统计下来，全台超过6成出租车每天穿梭在大台北讨生活。

台北市常住人口265万人，平均每万人拥有114辆出租车，而北京共6.6万辆出租车，按照现在常住人口约2069万人的比例，每万人拥有仅32辆。台北的人均出租车比例将近北京的4倍，亦远超过其他国际都会。（每万人比例，上海18辆、广州15辆、深圳12辆、香港26辆、伦敦27辆、纽约17辆、东京33辆）

台北市交通部门2010年的调查报告显示，该市出租车司机平均每月工作27至28天，每天工作时数为10.49个小时，空车时间约6.63个小时，空驶率（距离）高达六成，时间空驶率也超过六成。而北京的空驶率为40%，根据《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到2015年，车辆空驶率将降低到35%以下。台大土木系教授、出租车产业研究的权威张学孔教授估计，最理想的空驶率为33%。相较之下，北京司机的竞争环境激烈程度远远低于台北，而收入却略高于台湾。

台湾平均每天载客15.81趟，里程为169公里，司机营收平均每天2657元新台币（约546.5RMB），扣除油费、停车费、定期保养等支出，平均每月只赚2万多台币（约4114RMB）。

从乱到治

台湾当前的出租车模式类似北京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混合体，一方面施行挂靠制度（靠行），另一方面采取人车合一的产权制度，并且引入卫星约车服务公司作为第三方平台。

回顾台湾出租车发展的历史，台湾有车行、个人与合作社三大类型，大部分选“靠行制度”（也就是大陆的挂靠制度），与北京车辆产权为公司不同，台湾出租车产权归属司机个人，车行每个月仅收取1000台币(约206RMB)的规费。

1975年之后，台湾开放绩优司机申请“个人车行”，台北市30412辆出租车当中，车行占18000多辆，个人车行者为5763辆，合作社为6354辆。也有司机向车行承包车辆驾驶（类似北京制度），但大多三年期满，车辆归司机所有。这一承包规则，使得司机保持了照顾车辆的积极性。

台湾出租车大多光鲜亮丽，不少司机每日精心布置爱车。在台北搭出租仿佛是买彩券开奖，常有意外的惊喜。有的车每天换花，满车清香，有的司机是音响玩家，不吝在汽车音响上砸下重金，甚至有司机匠心独具地发挥特长，笔者就曾搭乘过一辆插满捏面人的车子，原来司机的前一份职业是捏面人师傅。

台湾司机如此费尽心思装点车辆亦是激烈竞争所致。乘客一招手往往同时来两三辆车，台湾人遂养成挑车的习惯。很多台湾司机每日出门前必会洗车上蜡，整洁是招揽生意的首要条件，否则消费者宁愿多等一会儿。

台湾出租车行业形成今日之品牌也经过磨练。早年台湾司机多衣着不整，拖鞋短裤便出门做生意，甚至一边开车一边向窗外吐槟榔汁。1986年，台湾放开出租车牌照管制，大量劳动力投入这个行当。新司机往往组织车队、联谊会，并且占据热门排班地点，画地为王，聚啸街头，气势不亚于社会帮派。

这些司机出自草根，对当时政治运动怀抱着高度热情，大选时常看到出租车头插着不同阵营旗帜，车上大放政论广播。他们还多次参与街头冲突事件，令搭乘者生惧。

并且，出租司机的流动特质更成为台湾治安隐忧。台湾第一起银行抢劫案即是出租车司机所犯，1996年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彭婉如深夜约车遇害，更让出租车司机形象跌落谷底。

谷底也往往孕育新机遇。2002年卫星约车平台被引入台湾，这一制度成功改变了台湾出租车形象。

良性循环

最早进入台湾的卫星约车平台台湾大车队公司培训出300位模范司机，每日穿衬衫、背心、打领带上岗。这些模范司机禁止吃槟榔、抽烟及其他不良习惯。并且，公司录用司机前，会到警察局调阅该人是否有前科或不良犯罪记录。这些举措引发台湾出租车业界重新洗牌，也开启这一产业良性循环。

约车服务公司要求加入司机必须要安装车机、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接收器和无线通信调制解调器等。这些设备成本约新台币3万元(约6174RMB)，由公司负责，但司机须缴纳2000－3000台币（400—600RMB）不等的会费，获得公司提供派车单机会。

现在台湾最主要的观光酒店几乎是约车平台的签约客户，司机一旦不遵守公司的要求，或者损害品牌形象的行为，公司可以停约车派单数日作为惩罚。因为有监督机制，司机跟乘客短暂的一次性相逢与交易，转变成为司机与平台、平台与签约客户、乘客与平台形象之间的三项长期关系，为了维持长期合作，司机自会表现出色。大陆作家韩寒在台湾出租车遗落手机，被观光酒店的排班司机返还亦不足为奇。

约车平台不仅严格监督司机，也要求车辆上路期限必须在五年之内，部分服务例如“微搬家”更是限制商务旅行车型（如丰田wish）才能接单，因此，台湾每三辆出租车就有一辆是商务旅行车。

也因为供过于求的情形，在北京手机APP约车服务高峰期可能需要加价，台湾却是电话约车享有打折优惠，目前约车达标率高达97%。台湾大车队协理唐立武告诉《凤凰周刊》，司机不敢载非约定乘客，以免被诉，台湾的乘客没看到约定的车号亦不会上车。

约租与路招的成功结合，让红海市场的出租车生意有了转机，更造成台湾出租车业者整体的良性竞争与质量提升。

一般出租车大多六成空驶率，而台卫星约车的空驶率却仅只有42%。卫星约车不仅改善了空驶的情形，且降低耗油，提升了效率，车

队司机普遍都有4万台币（8196RMB）以上的收入。

因此卫星约车盛行台湾，而之前无线电约车，因采取信息分享，众司机竞逐乘客的模式易生事故，逐渐式微。一度横行台湾街头的全民车队也受卫星约车与合法签约排班的冲击，分散成十几个小车队经营。

台湾卫星约车市场之所以成功，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出租车形象在上世纪末走到谷底，舆论普遍支持出租车行业改革。加之台北市区人口密集，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品牌效益大，最重要是，当时因为台湾制造产业外移中国，大量中年但优秀的台湾工厂干部与生意失败小企业主纷纷进入出租车行业，这批优质人才提升了出租车产业形象。

开放市场是根本

由于竞争激烈，台湾卫星约车平台为了留住下属司机，多采用各种措施，降低司机成本，增加他们的客源。这些平台主动跟大型酒店、机场、高铁站、企业客户签约，这些客户公司职员因公乘车时，必须搭乘指定公司出租车才能报账，如此即增加了平台下属司机的固定客源。

一些公司还引入车体广告，分享利润，车上同时营销保健食品，甚至近期也开始营销财经杂志。台湾出租车还有微搬家等业务，市区内搬家，公司除车资之外，仅加收500新台币，如果数量不多，远比叫小货车搬家划得来。通过这些方式，车租车司机开车的同时，还有多种业务。

一些约车平台总公司为司机们设立了休息站，提供全套半价汽车保修，而剪发洗衣用餐等服务也都特低价提供，用低价满足司机们的日常固定开销。

台湾大车队公司总经理李琼淑认为，要使散漫的出租车司机积极改善服务，其关键因素在于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建立监督机制，提升司机收入。相较之下，北京提升出租车价格或许可以改善司机工资，但司机在堵车时段依旧处在亏本状态，可以预期，他们还是会在不堵车时更卖力些。

而从台湾经验不难看出，出租车服务质量的改善空间，与司机是否赚得到钱没有直接关系。台湾的司机们在微薄利润之下，仍然走出创新之路。可见，给予司机们提升服务的实质报酬，作“有改善有奖励”才是王道。并且，北京的出租车实质产权归公司所有，司机并无改善车辆和服务的积极性，加之北京出租车市场没有放开，公司的品牌竞争效益并不存在，缺乏自由竞争之下，要提升北京的出租车行业，恐难促成。



第十一篇 台湾调涨最低工资背后

特约撰稿人/王彦晨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台湾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10244元新台币乘以每个劳工薪资抚养2.26人，基本工资应以23151元为合理标准。台湾劳工的基本工资调高后仅有19047元，尚有4000多元的差距，仍达不到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

“行政院长”江宜桦于本月初宣布，台湾经济成长值已连续两季超过3%，基本工资从4月1日起由原本的新台币18780元增至19047元。这一举措的背后有更复杂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值得解读。

劳工团体并不领情

去年，劳委会下设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一度决议，调高基本工资267元新台币，但当时的“行政院长”陈冲和“政务委员”管中闵认为经济情势不佳，调高基本工资对企业主产生冲击，因而订下两个前提：台湾的GDP连续两季达到3%以上或失业率连续两个月达到4%以下，才调高基本工资。现在前提条件并没有实现，江宜桦却宣布调资，显然出于政治考虑。

原因是，去年劳委会主委王如玄接连几次送案调高基本工资，法定机制也已审议通过，“行政院”却以行政职权喊卡，台湾的劳工团体因而批评这是“违法冻涨”。这说明马政府的施政是向资本家；企业主倾斜，习惯性压低企业主的经营成本；但反过来，工薪阶级资水不多，消费捉襟见肘，当然不利内需，对经济不见得是好事。

马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施政，可以说完全倾向资本家。2008年他宣称的“633”政见，即经济成长率6%、失业率3%以下、年所得3万美元以上，迄今执政第五年，但并未达到，工薪阶级的不满正由此而生。

台湾目前的失业率为4.2%，达不到调高的前提条件，而GDP第二

季度的数字，政院主计处尚未公布，何以抢着就要宣布调高基本工资呢？因为江宜桦自2月25日就任以来，迄今未见正面的施政，反而深陷“核四”风暴和马团队贪腐疑云中，为求政治做多而不得不使出安抚性政策。可惜劳工团体认为这是去年就该给的，并不领情。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最低工资标准，是让劳工能照顾家庭，以台湾每人每个月最低生活费10244元新台币乘以每个劳工薪资抚养人2.26人，基本工资应以23151元为合理标准。台湾劳工的基本工资调高后仅有19047元，尚有4000多元的差距，仍达不到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

众所皆知，现在台湾劳工的工资是14年前的水平，也就是2013年拿的是1999年的薪水。如果以马政府执政前2007年到2012年计算，台湾劳工劳动生产力指数增加20.5%，但劳动成本却只有2007年的八成，这意味着每位劳工的生产效能愈来愈高，但薪水打折，老板的负担愈来愈轻，一来一回就是剥削。

马政府曾经有口号：政府挺企业、企业挺劳工。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政府出资，让企业可以雇用劳工，再向政府领取补助，以降低失业率，此立意良善的措施，不料执行下去竟让22K（两万两千元台币）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新入职场的年轻人自此竟有了22K的“公定价”，公私部门纷纷以此为行情，新人的工资再也拉不起来。

两岸红利看得到吃不到

马政府让薪资水平固化，工作10年左右年资的劳工也不过月入新台币3万多元，这是工薪阶级怨气深重的理由。影响所及，中产阶级消失，年轻人自己都养不起也就不敢结婚生子，逐渐成为社会问题。说明劳动薪资低、工作没有前景已成结构性问题，正冲击着下一个世代。

两岸交流频密，签下包括ECFA在内的多项经济合作协议，大陆方面往往自觉“让利”许多，但何以台湾基层劳工和一般民众感受不明显？原因很简单，台湾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有利资本家和企业主，而不利于劳工阶级。因此，大陆让利，“利”却达不到基层，在中间就被拿走了，还给台湾人民的是剥削的结构和体制，工薪阶级累积饱饱的怨气，又怎么会感谢大陆呢！

企业不加薪，政府各项政策却倾向企业主，为了不损及企业竞争力，而让便宜好用的台湾劳工在工时、工作量和薪资上不断受挫，“加面加汤不加价”，工作超负荷，一个人当两人用，但薪资领的是14年前水

平，不想干的话就沦为失业率数字的一部分，如此下去，两岸上层交流再频，往来再密，礼貌客套话说得再足再多，基层民众的感受全不是那么回事。

台湾社会和经济的结构性因素，不能怪罪大陆，但大陆施惠让利却不能不知道这种结构因素所导致的后果，否则还以为台湾人得了便宜还卖乖，人心不足，其实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商高层拿走了两岸互惠的绝大多数红利，基层民众看得到吃不到。

第十二篇 台湾“政论节目”退烧

记者 / 马军

2013年3月15日晚上23点30分，台湾TVBS电视台政论节目《新闻夜总会》播出了由当红主持人李艳秋主持最后一期节目（此前盛传该节目将被停播，此后电视台改版后，更换主持人重新播出），这是继台湾三立电视台《大话新闻》节目去年停播之后台湾又一知名政论节目发生重大变动。

随着这两个节目的停播或者人事变动以及模仿类准政论节目《全民大新闻》（改版前称《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党》）的熄灯，曾经在台湾红极一时的政论节目大有退烧趋势。

从台湾红到大陆

3月15日晚上，主持人李艳秋身着招牌粉色时装，邀请周玉蔻、陈凤馨、董智森、江岷钦、游梓翔等名嘴进行了最后一场由其录制的《新闻夜总会》的播出，在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TVBS电视台的总经理杨鸣送上水晶麦克风向李艳秋告别，工作人员也推出蛋糕向李艳秋致意，蛋糕上插着2985的标志，意味着这最后一期的告别节目是《新闻夜总会》的第2985期。

最后一期《新闻夜总会》，李艳秋一开场直接向观众说，这是最后的主持，希望能够不谈时事，只进行回忆和反省。在节目中，李艳秋表示除了生活和健康原因之外，决定停播节目的原因，还有台湾新闻节目水准的全面下滑。

在节目中，李艳秋提出台湾新闻节目和娱乐节目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新闻主播和艺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政治评论人和政治人物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并表示希望自己放下主播的身份之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反思自己，从自己做起，为发挥台湾媒体的良知再做一份努力。

作为台湾家喻户晓的殿堂级主播，李艳秋在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之后就进入新闻界工作，1980年起就频繁获得台湾电视节目最高奖“金钟奖”，与沈春华和李四端并称“台湾老三台”（台湾最早的三家电视台，分别是台湾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和中华电视公司）当家主播。

1993年3月20日，时为华视主播的李艳秋在金钟奖颁奖典礼上发表

获得“新闻节目主持人奖”感言的时候，说自己所领的是“最佳傀儡奖”，表示一位电视主播不但要有自己的主见，也应该要有自己选择采访题材的权利。

当年，台湾党政军势力还没有从电视台退出，政治势力对电视台的控制还非常严密，“这是一个台湾还处在‘拍到李登辉家中的狗都能成为电视头条’的时代。”时任“立法委员”的前电视主播周荃说。

台湾在1987年“解严”之前，包括解严之后的一段时间，只有中视、台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后来民视成为第四家无线电视台），因此在这之后的有线电视台被统称为第四台。老三台有着浓厚的政治背景，一度曾分别代表了当时台湾的党政军三股政治力量，由于政治力的介入，导致三家电视台的节目内容无聊乏味，不仅在收视上无法与后来成立的有线电视台进行抗衡，而且在台湾民主转型的过程中被看成是一个重要的标靶，成为反对势力攻击的对象。

1995年，台湾爆发“党政军退出三台”大游行，抗议政治力对媒体的介入。2003年，台湾“立法院”通过“广电三法”，规定政府及党务人员等公职人员不得投资广电事业。2005年，台湾政府通过条例，规定华视走向公共化，台视走向民营化，中视走向非党营化。在此之后，台湾制度上政治对媒体的干预便不复存在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台湾的政论节目开始大行其道。台湾最早的政论节目要数1993年开播的《2100全民开讲》，当时台湾社会爆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民主气氛涌遍全岛，地下电台举不胜数。1994年台北与高雄市长的选举和台湾省长的选举，更是在最高领导人开放普选之前最高级别的选举。

1994年的选举首次采取了电视辩论的形式，台北市长候选人辩论中赵少康和陈水扁的精彩对决更是将台湾民众对政治的关注炒到了最高点。在这种背景之下，台湾涌现出了大量的地下电台，地下电台最受欢迎的特点就是接受观众的call-in，而《2100全民开讲》就借鉴了这种形式，首度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引入call-in形式，一时之间成为群众热捧的对象，影响力大到甚至可以影响选举。

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政论节目曾经成为台湾老百姓必看的电视节目，连2012年选举之时，蔡英文也曾经在凯道“总统府”门前的造势晚会上公开抱怨说“台北人不喜欢走上街头，台北人喜欢窝在家里看政论节目”，甚至台湾有新闻报出因争看政论节目而夫妇反目离婚的事件。

随着台湾开放大陆游客和学生赴台旅游和学习以及互联网的发展，

大陆民众也逐渐接触到了台湾的政论节目，其对政治人物的大尺度批评让不少大陆民众如当年台湾民众般痴迷，东森电视台《关键时刻》中对于山东蓝翔技校是中国黑客培训学校的报道更是一段时间成为了某视频网站的最热视频之一，逼使蓝翔技校一度发布声明稿进行澄清。

只有数量，没有质量

然而随着台湾最高层级选举的开放，“立法院”打架丢鞋掀桌喷瓦斯等事件层出不穷。政论节目也逐渐口水化，在广电秩序刚刚开放之时，电视的政论节目被视作是电子审议政治的代理者的厚望，而今天则越来越被批判者看做是和黄色暴力新闻一样的言论自由的“负资产”，在言论自由中涌现出的政论节目，似乎陷入到了言论自由的漩涡之中。

据台湾传媒学者统计，1998年台湾三合一选举期间，台湾政论节目中政党候选人出现的次数最为频繁，大概能占到一半左右，如果再算上政党发言人、政党代表以及现任的民意代表，政治人物能占到政论节目来宾的2/3。而到了2002年前后，媒体记者的参与频率已经开始逐渐增加，达到两成，政治人物的参与频率下降为四成。而到了2009年，媒体记者的比率开始上升至四成五左右，若算上职业政治评论员，其比率早已超过六成，而政治人物的参与比率已经下降至两成左右。

早期政论节目的参与者多属于政党专业人士，政论节目的论坛功能更接近于政党政治互动的平台角色，尤其是选举期间，各政论节目成为了候选人展示施政纲领，“混个脸熟”的重要机会。

而目前，媒体工作者已经成为了各政论节目的主力军，各大政论节目来宾中最常见的头衔就是“资深媒体人”。这些媒体人和职业政论人物为了凸显自己的特点和信息之灵通，在政论节目中或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或引经据典故弄玄虚，政论节目的重心开始从政党互动的平台，转为了对政治人物工作和生活的挖掘和批判。几乎每个台湾电视频道都会有政论节目，但是数量多的同时，政论节目的质量却一直下降。

失焦的蓝绿“舆论场”

2005年11月，时任台湾新闻局长的姚文智认定TVBS资金为港资，并怀疑其背后有中资背景，认为“港资就是中资，中资就是匪资”，违反了当局《卫星广播电视法》的规定，勒令整改，并扬言关台。

当时正是处于TVBS揭发民进党高雄捷运弊案之时，TVBS电视台认定民进党当局的关台恐吓是政治动作，于是在《新闻夜总会》节目中开放民众call-in。李艳秋回忆道，当晚五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总共接到将近

30万通电话，“机房接近爆炸”，台湾民众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支持TVBS揭弊，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时任“行政院长”的谢长廷表示不会有任何一家媒体在自己任内被关台，“媒体不会再受到政治的干扰了”。但是2008年卸任后深陷洗钱丑闻的陈水扁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当初没有能把TVBS关掉，“觉得很遗憾”。

而也是从2005年TVBS揭弊开始，政论节目开始各说各话，蓝绿分界越来越明显。在《新闻夜总会》第一期，为了凸显节目的公正性，现场来宾还被分为泛蓝军代表、泛绿军代表和独立媒体人三个部分。节目的重心还在于对于某些事件，不同颜色的来宾互相交流甚至辩论，而随着台湾民主的发展，政论节目也越来越蓝绿分明，国民党曾经建议党员尽量不要参加色彩偏绿的《大话新闻》，而民进党也已报道不平衡为由，建议自己的党员不参加色彩偏蓝的《全民开讲》。2011年，艺人吴宗宪曾经开玩笑的说《全民开讲》是国民党开的，《大话新闻》是民进党开的，虽然两个节目出于媒体中立的立场和价值都对此言论表示反对，并扬言要提告，但是对绝大部分台湾百姓来说，这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情。

2008年马英九上台，一直占据”立法院”席次多数的国民党重新执政，台湾也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朝小野大”的政治局势，“立法院”不再丢鞋掀桌，政论节目可以播出的题材也越来越少，不少政论节目不得不临时抓一些娱乐新闻来凑数。

2012年初，台湾女星Makiyo殴打出租车司机，一时成为收视最红的台湾新闻热点，作为政论节目的《全民开讲》竟拿出时间采访Makiyo的男朋友，甚至让其在节目上当众下跪道歉。绿营三立电视台《大话新闻》节目主持人郑弘仪顶住压力，拒谈此娱乐事件，后来有人称郑弘仪因此惹恼电视台领导，被休假了五天，也成为其最后离开三立电视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艳秋的丈夫李涛，也是台湾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在TVBS主持《2100全民开讲》之前，曾担任中华电视公司新闻部副经理，并主持《李涛新闻广场》《华视新闻广场》等节目，是第一个在节目中开放观众call-in的台湾主持人。在李艳秋决定退出新闻圈的前四天，李涛已经决定暂别《2100全民开讲》节目，深入台湾南部善耕台湾。

李涛、李艳秋夫妇两人一周之内纷纷宣布离开节目背后原因引人遐想，按两人说法，离开节目是因为“看不下去新闻节目已经变质，媒体已经成了社会负能量的来源。想趁着体力最好、人脉最好、见识最好的年纪出去挖掘台湾最基层的真善美”。

但是根据台湾媒体年初的报道，两人的离开早就有预兆。TVBS大股东，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早就不满李涛夫妻节目一直下降的收视率和高昂的制作费用，想趁机将政论节目转型为国际、两岸政经等节目。据报道，作为政论节目大佬级别的《全民开讲》及《新闻夜总会》的收视率已然不如评论更犀利的年代新闻台《新闻追追追》以及娱乐化到“从黄帝讲到阴蒂，从外太空讲到内子宫”的东森电视台《关键时刻》。李艳秋在回顾《新闻夜总会》第一期时专门提到当时的来宾刘宝杰，并讲到台湾新闻主播娱乐化的趋势，疑似就是在暗讽刘宝杰。

台湾政论节目中漫布的口水曾经是台湾民主开放和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逐渐摆脱了政治的干扰之后，收视率和老板的倾向等经济上的考量则又成了政论节目生存的一大压力。根据一项调查，收看政论节目了解候选人及其政策的选民比例已经不到一成，此类节目和电视名嘴的黄金时代已开始远去。因此有分析称，政论节目的降温背后是台湾民主政治也一步步走向常态化。

第十三篇 台湾重启死刑再掀波澜

记者/段宇宏

高雄刑场，执法人员按照王国华要求，把一堆他亲人送来的符咒焚化后，王国华说了句“这一天迟早要来”，面部表情麻木。麻醉剂被注入体内，王国华很快瘫软，执法人员向他脑部开了一枪，王没有任何挣扎地告别了人世。

今年3月初，与王国华一道，管钟演、钟德树、王志煌、庄天祝四人分别在台北、台中、高雄刑场终结了生命。

五位死刑犯被处决，却引起轩然大波，岛内外人权和宗教组织纷纷提交抗议，欧盟发出措辞严厉的谴责声明，矛头直指马政府和曾勇夫。

台湾法务部长曾勇夫名如其人，上任不到一年连开两次“杀戒”：去年4月底，曾上任不久即签署命令处决4名死刑犯，不过这位“勇夫”在第一次签署执行死刑令时落下了眼泪，今年第二次签署心情仍旧沉重。此次执行死刑，有人欢呼“正义迟到但终于来临”，“行政机关开始作为”；亦有人批评马政府“两次杀人”，违背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使“台湾的春天弥漫着杀伐气息”，岛内死刑存废之争再次成为公众议题。

岛内外人权组织的讨伐：“不是文化问题”

欧盟发表谴责声明之外，德国的反应最为激烈。联邦政府人权政策及人道援助专员罗宁说：“我严厉谴责死刑的执行，我一向视台湾是一个民主及法治的楷模，此事让台湾传送出相当负面信息。”台北驻柏林代表处处长还被要求到德国外交部做出解释。

打造一个“尊重生命，没有死刑”的社会，是“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简称“废死联盟”)的目标，该联盟是台湾关注死刑问题最大的民间团体。对于台湾四年多后重启死刑，他们做出了动情的呼吁：“枪声不只在我们耳中响起，子弹也同时射进我们的心里。”

废死联盟2003年由司法改革基金会、各大学及研究院所的人权研究中心共同组成，成员多为岛内的律师、教授等知识精英，这个联盟长期得到法务部的资金赞助。目前他们的主张包括暂停死刑执行，提出“台湾迈向废除死刑”的步骤、时程表及提出替代死刑的刑罚方案，并寻求社会共识，加强被害人保护制度等。

“杀人者偿命”的观念在东方社会深入人心，具有雄厚的民意基础，因此在废除死刑问题上存在文化障碍。废死联盟的发起人，台湾著名的反死刑活动人士林欣怡女士不赞同这个观点。

“在前现代社会，全世界的刑法观念中，行刑方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西方国家同样有很多残酷的刑律，但是他们现在几乎都废除了死刑。”林欣怡对本刊记者表示，台湾废除死刑的最大障碍，首先是政治精英的推动意志不够坚定，在国际上承诺废除死刑，赢得“保护人权”光环，在岛内又经常向民意屈服，不愿做引导；其次就是制度建设上有缺失，如对受害者家属的帮助补偿力度不够，对死刑犯在死刑之外处罚的配套处置仍有问题。

林欣怡强调，西方国家废除死刑也不是一帆风顺，民意同样对于死刑问题曾有简单化的理解，而政治、知识精英的推动引导起到关键作用。

废死与反废死之争

一个令岛内主张废除死刑人士尴尬的事实是，历年来由法务部、媒体、民间组织发起的民调显示，尽管赞同废除死刑的人数在缓慢上升，但反对废除死刑的民众至少占七成以上，最高年份曾达到九成多。

反废死派中还有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具有较强的民众动员能力，如著名艺人白冰冰就站在反废死的第一线，“陆正案”(陆正是一名于1987年被绑架后遭撕票的小学生)的受害者之父陆晋德也是有名的反废死运动员。

废死派是基于人道主义、司法改良、杜绝冤案导致生命损失的立场，反废死派是基于社会正义、元凶必惩的立场，两派听起来都不无道理。

司法再透明再公正也不敢百分百保证杜绝冤错案，即使在美国也不例外。废死联盟最常举出的例子是著名的“江国庆事件”。1996年9月，台北市某空军作战司令部营区内，一福利站员工的五岁幼女遭奸杀，军方在社会压力下成立专案小组迅速破案，前空军士兵江国庆被捕，一年后执行枪决。江国庆的父亲曾悲叹：“天理何在，人道何在!”

至去年5月，监察院公布调查报告，指出当年涉嫌逼供。今年1月份，警方宣布江庆华案为冤案。但江庆华的生命无可挽回。

根据废死联盟及其他大学研究所的调查，如果加上前提条件，

如“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替代死刑”，“改善配套惩处和补偿措施”，支持废除死刑的民众会提高到三到五成。

可是民意往往又随着具体事件的发生而摇摆，当案件被媒体公开，凶残的作案方式、受害者的惨状、家属的痛苦经常促使支持死刑的民众数量反弹。

此次被处决的王国华，有“网络淫魔”之称，2002年7月将一对在读中学的表姐妹网友约出来，进行性侵害后，将她们捆绑起来放入麻袋，再丢入排水沟，表妹最后得以生还，但表姐惨死。此后，他又在2个月内连续犯下7起强盗、猥亵、强奸、杀人等罪，受害者达10人。王国华经8次审判都被判为死刑。

令废死联盟尴尬的是，大多数死刑犯都声称冤枉或乞求免死，但王国华执意求死，对多次审判不执行相当反感，还嘲笑法官“太没种”。废死联盟征集关押死刑犯签名，以向大法官提出“释宪”要求，王国华未同意。废死联盟找到王母，王母迫于亲友和社会压力，不愿签字，经过一番艰难说服，才勉强代签。孰料，王国华随后发表声明，不认同母亲签字，并嘲笑废死联盟“自作多情”。

废除死刑当下的确不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从马英九到郝龙斌等台湾重量级政治人物，皆认为此事未得到全民共识，尚须谨慎和努力。郝龙斌则称自己本意是反对废死的，绿营的天王级大姐陈菊支持废死，但也认为当下要废除难度很大，得慢慢来。

马英九的观点是，需要不断缩小死刑适用范围。他从当法务部长时就开始实施，但因这个议题太敏感，需要时间跟民众沟通，他主张“已经宣判执行死刑的案件，当然要依法执行”。

“杀人”难，“不杀人”亦难

截至去年4月，台湾有44个已定谳的死刑犯，目前还剩35个，他们是摆在司法部门眼前的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难题。

台湾虽未正式废除死刑，但要处决一名死刑犯，有相当大之难度，所以未执行之死刑犯人数才会累积到44人。

“陆正案”中的涉案者邱和顺等人，到今天已在11次审判中被判死刑，而且一直未能执行。陆正的父亲陆晋德说，每一次开庭都是对他身心的巨大创伤，痛苦至极。此次五个死刑犯被行刑，他表示，要尽速执行死刑才符合人道。

曾勇夫今年签署行刑令，经过一整夜思考，才挑选出作案过程极其凶残，身负几条人命，“民愤极大”的几位死刑犯给予执行，因为死刑问题的敏感性，执行完毕之前一直对外界保密。

曾勇夫的前任王清峰女士也不是简单人物，1996年还曾与陈履安搭档参加“总统大选”，是首位参加大选的女性，她的跟斗就栽在死刑执行问题上。

去年2月，在“立法院”的总质询中，国民党立法委员吴育升谈到死刑犯累积到44人时，痛斥“好人蒙冤，坏人大笑”，行政机关“玩忽职守”。吴育升表明自己并非反对废除死刑，而是认为假如没有“释宪”、非常上诉等问题，已判决的死刑就应执行。

王清峰随后撰写《理性与宽容━暂停执行死刑》一文，明言自己要保护囚犯的生命权，宁愿丢官也不会批准任何一桩死刑执行，所以拒绝签署过往44判死刑的案件。不过她强调，“并没有忘记被害人的痛苦，也没有看不到他们的眼泪”，但是基于对生命权的尊重，在有周延的配套下，才会全面废除死刑。

“如能替他们被执行死刑，甚至下地狱，我都甘心。”王清峰还对外界表态，她可能是首个因为暂缓或不执行死刑而下台的司法官员。她的观点引来大量抗议，法务部、国民党立委和文传会等反映民情的电话被打爆。

依据台湾的法律，对已定为死刑的判决，检察官须立即将案呈送法务部，按刑事诉讼法第461条，法务部长令准后三日内执行。可是何时令准，并无明确的时间期限，若检察官发现有非常上诉或再审理由，才能请法务部长重新审核，既不重审，又对法院之判决久拖不执行，的确容易给人留下“玩忽职守”的口实，尤其令受害者家属及同情者民意汹涌。

2010年3月11日，王清峰果真辞职，曾勇夫接替她的法务部长之职走马上任，并于4月份签署了四个死刑犯的执行令。

台湾著名艺人白冰冰对王清峰的辞职冷嘲热讽道：“王清峰是在告诉我们，在台湾只要犯了罪，你可以找人被执行，因为她可以代替别人被执行。”而从大趋势来看，废除死刑又是世界潮流，在国际政治中已形成“政治正确”之态势，政治精英不得不考量其影响，所以形成当下知识精英反死刑、政治精英谨慎对待死刑、民众普遍挺死刑的纠结状态。

第十四篇 岛内或将取消户口簿 台湾户籍与人口政策演进

撰文/郑东阳

“年底还有人口普查？我还真不知道，户口簿？好久没用了。”

受从政的父母影响，在台湾资讯工业促进会上班的公务员张宏生（化名）对公共政策十分关心。但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也不知道年底台湾将举行“第六次人口及住宅普查”。

和大陆一样，台湾也与世界各国每逢公元“0”年举办普查的潮流接轨，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随着人口普查的临近，户籍政策开始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人口普查需要用到的“户口簿”成为改革对象—据台湾媒体报道，由于台“内政部”积极办理户役政信息系统信息安全强化、作业流程简化及无纸化机制，户籍誊本（户政部门保留的反映人口信息的完整电子、纸面档案）亦可异地办理，“内政部”正研议废除沿用半世纪以上的户口簿。

官方拟废除户口簿

“大约在1个月前，‘内政部’在更新户役政系统信息化的项目小组会议上，有县市代表提案，既然户政系统都已信息化，是否可以把户口簿废除。因此，户政司发函给各县市户政机关，25个县市中，有11个县市赞成废除，有11个县市反对，3个县市没意见。”11月3日，台“政部长”江宜桦在接受台“立法院”质询时称。

造成台湾“户口簿”无用武之地，技术进步是重要原因。

近十年来，台“内政部”推动“强化户役政信息系统与应用推广计划”，联机启用后让民众可在全台湾任何一个户政事务所申请户籍誊本。与此同时，可以全台联机申办的功能越来越多，目前已有包括判决书在内的20多项服务都像申请户籍誊本一样可异地办理，让户口簿更无用武之地。类似大陆居民丢失身份证、户口本后不得不回到原籍办理的烦恼，台湾居民不会有。

台湾户籍管理部门称，户口簿理应是翔实登载户内人口异动的重要文件，但自从警方不再查察户口后，户口簿反映的信息是否准确其实都大有问题，甚至还不如随时更新数据的户籍誊本。“倘若户口成员没有把户口簿主动拿去户政机关更新、确认，对于户口内成员异动状况或是有

无更改姓名，户口簿其实很难显示出这些最新组况。另外，计算机全面联机让户口誊本申办手续变得简便，各政府机关及私人公司行号，也都认定户口誊本效力，反倒造成本尊户口簿逐渐失去舞台。”台北县府民政局户政科长陈健民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解释道。

台湾《联合报》的报道称，若从1941年起算，台湾实行户口簿制度迄今已有将近一甲子历史；随着台湾民智开放、人权观念开放，户口簿附带的查察户口功能，也在2009年因为警政署宣布废除查察户口、免签“家户访查签章表”而走入历史。

虽然赞成和反对各百分五十的意见让“台内政部”十分为难，但是无论“户口簿”是否会最终走入历史，历时数十年的改革已经让台湾的户籍制度趋近完善，户籍制度俨然变成一项方便政府行政的民事登记，并没有承载太多社会功能。除了法律不断进步外，户籍的背后是越来越人性化的全民健保、教育和人口政策。

彻底告别警察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不久，为改变户籍制度混乱、分离的状态，南京颁布了民国史上第一部《户籍法》。这部现代法律一改过去户籍制度征税派役的功能，转向个人私权保护，并为地方自治提供法律依据。在《户籍法》实施之后，又经历1934年和1946年两次修改，最后由国民政府带到台湾继续适用。

“南京政府制定的法律成为台湾现行户籍法律体系的构建渊源，而日据时期又为台湾留下相对完善的管理户籍政策的行政体系，共同构成了台湾现今的户籍政策。”台湾成功大学人口学研究学者杨静利说，她刚完成了一个名为《台湾家户组成的历史变迁》的课题。

日据时期，台湾实行的是严格的保甲制度，户籍政策的重要目的是维护社会治安，控制人口流动，户口调查是“总督府”重要的统治工具。台湾光复初期，南京政府延续日据时期的户籍政策，户口调查等业务还是由警察负责，户籍登记则由民政部门负责。

但是在南京政府迁台后，为了配合“动员戡乱时期”戒严的需要，两蒋在台湾实行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即“户警合一”政策。比日据时期更加严格的是，所有的户政业务都回归到警察局主管，还将乡镇、市区公所的户籍科改为在各县市警察局下设置户政事务所。

与今天大陆实行的户籍制度类似的是，户籍制度与社会稳定捆绑在一起。

戒严时期，台湾人必须到警察局办理有关户口的各项手续。虽然允许人口自由迁徙，但是对流动人口有严格规定：在异地暂住15日以上，必须到警察局申报流动人口登记。此外，警察以“查户口”为由强行进入民宅几乎已经成为那个时期台湾人的共同回忆。

和报禁、党禁等一切备受诟病的政策命运相同，在台湾民主化后，户籍管理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户籍法》和其他辅助性单行法规不断被修正，一些不人性的法规陆续被废除。

1992年7月1日，李登辉宣布“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户籍制度也进入了“户籍分立”时期，户政业务由警察系统回归民政单位，“内政部”下设户政司，而各地方民政局设立户政事务所管理户籍行政业务。

2008年，台湾当局宣布，各县市全面停止警察查户口，从日据时期即存在、有100多年历史的警察查户口制度在台湾走入历史。在这之前，虽然未废除此一制度，但是台湾民主化后，民众对查户口已不再像过去一样配合，管区警员为了交差了事，许多时候“查户口”只是沦为形式。为了持续维系小区警民关系，“查户口”有了新名字，叫“家户访问”—警察到访时，民众不必再拿出户口簿供警方查核，警方到访主要是访问民众对当地治安有何担忧与需求，主要以服务民众为目的。

当年9月，警政署唯一能涉及到的户政业务—管理流动人口，也被禁止。由于涉嫌违法“宪法”中有关“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的规定，《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办法》也被废除。这部原本只有十几条规定的法规，条文被逐年删除，除去三条固定格式（如“依据何法订定”、“颁布日开始施行”、“主管部门”等）外，到被废除前只剩下5条明文。

这项办法废止后，受益的还有大陆配偶。大陆配偶赴台后，已经不需要向所在地管区派出所办理流动人口登记，改由相关单位主动对大陆配偶进行登记。

1997年，台湾“内政部”完成“户政计算机化连线作业”后，台湾居民在台湾任何一个户政事务所都可以办理与户口有关的手续，而且户籍登记、变更等事项还可以通过书面、电子网络等形式办理。

2010年，台湾又对《户籍法》进行修订，增加“因人工生殖、器官捐赠、财产继承、国籍认定或经法院审判确有需求者，可至任一户政事务所申请亲等(亲属)关联数据”。

仔细阅读台湾《户籍法》及其辅助性法规后会发现，比如除了“户警分立”外，台湾的户籍制度更似民事登记，仅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

心，与就业、福利无关，“它只对婚姻、生死继承等法律制度的实施提供基础和依据。户籍回到本来的面目，户政早已经从‘行政’过渡到民政了。”杨静利说。

“早期因为台湾也实行类似大陆计划生育的‘人口计划’，户口是个有意思的研究范畴，培养了一群人口社会学家，精于人口、户籍、统计等，但之后就明显断层了，真正学界中人精于此道者无几，现在几乎沦为公务员的业务了。”台湾《天下》杂志一位资深媒体人称。

“虽然两岸有地域上的差异，但是在立法上可以借鉴台湾的做法。剥离目前附加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功能，建立健全统一、平等地保障人权的户籍法律体系是大陆当前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深圳大学法律学者姚秀兰称。

比户籍更可靠的是市场

在台湾，哪怕是户政部门，从户口信息上并不能看出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台湾没有农村和城镇户口之分，户籍的登记内容并不涉及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内容，也剔除了行业和职业登记、教育程度登记等，充分体现了户籍平等的立法原则。而这一点，在戒严时期，便已如此。

由于“户口”在台湾并没有承载太多社会功能，因此并非行政审批，而是市场和城市管理水平，最终成为台湾调整公民自由迁徙的手段。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的农村青年也曾大批涌向到处都是霓虹灯的台北、高雄等都市—1967年，台湾农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高达43%，到了1987年解禁前，这个数字变为15%。为了便利子女教育，在城务工的大部分农民将户籍已迁到台北等都市，但原来的户籍地耕地仍然存在，因此这些农民的“农保”福利依然被保留。

由于经济发展较为均衡，在施行全民健保等各项福利政策时，台湾并没有按地域区分。即便是外地人在台北、高雄等大都市工作，只要缴纳过健保费，都可以享受到几乎等于免费的医疗服务。

虽然允许自由迁徙户口一度也造成台北等都市人口不堪重负，但是此后随着南北高铁的开通，台北、高雄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差异并不像以前那么大。而且各县市为了拉动经济，纷纷推动税收等优惠政策。以金门为例，由于金门政府控股的“高粱酒厂”一直处于盈利状态，每年金门会给所有户籍在该地居民“分红”，因此，大部分在台北工作的金门人并没有选择“台北户口”。

大部分台湾人会在选举时想到“户口”，只有本地人才有选举县市长和分区立委的权利。根据台湾《选罢法》规定，选民必须在各选举区住满4个月以上，才具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也成为台湾允许户口自由迁徙的一大漏洞，有台湾媒体担心，这个漏洞可能出现卖人头集团、选民贩子，一些政治明星的支持者也有可能集体移动。

人口普查的补充

11月份，虽然大陆的“户口”包含了太多社会功能，但是此次大陆人口普查不依赖已有的户口信息，而是“按现住地登记”，侧重记录人口的“迁移流动、社会保障、住房情况”等基本信息。这种转变被视为户籍改革思路的结果和原型，大陆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寄希望于600万人口普查员的叩门能为户籍改革“开路”。

与大陆相对应的是，台湾也希望能通过年底的人口普查确定新的人口政策。两蒋迁台后，台湾的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中。

台湾上世纪60年代也实行类似于大陆计划生育的“家庭计划工作”。1959年，担任农复会主委的著名学者蒋梦麟发表了《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一文，呼吁重视人口问题，各界热烈讨论。当局于是在1964年全面推行家庭计划工作。

台湾的“计划生育”可以说是柔性政策，而且随人口数据的变化不断更改。比如1967年，台湾当局建议民众婚后3年才生育、间隔3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3个孩子、33岁前全部生完等。从1971年起，则变成了“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及“三三一”口号—即婚后3年生第一个小孩，过3年再生一个，理想的结婚年龄为男28岁、女25岁。

台湾当局没有强制剥夺公民的生育权，只是通过电视屡次播放产妇们分娩的痛苦记忆、男子因为太多奶粉钱被压垮的画面加以劝解，以及加大对少生孩子的家庭的补贴等政策鼓励公民少生孩子。经过台湾版“计划生育”的改造，1984年开始，台湾人口净繁殖率已降到人口替换率之下。

但是人口计划也造成了现今台湾的老龄化问题。为了鼓励台湾年轻人多生孩子，2008年的《台湾人口蓝皮书》上，台湾政府几乎跟保姆一样，假设了多种情况，包括害怕没时间照顾小孩、没钱生孩子、生理上有孕育障碍等多种情况，政府将为有这几类担忧者提供金钱和人力、医学上的补助。即便如此，生育率却不断降低。

由于户籍中并没有社会角色信息，因此台湾的人口普查有了重要的

补充作用，台湾的普查员将侧重了解人口的质量、家庭结构、就学就业及住宅使用状况，以弥补其户籍只作为身份登记制度的不足。

马英九政府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新的人口数据出台，并意识到寄希望于政府行政强制手段来调控人口结构将很难成功。

2010年9月份，马英九在台北称，虽然台湾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率高达11%，但只要把福利做好，就不需过度忧虑，当局会以“活力老化”概念照顾老人，使长者常保心理年轻。今年10月份，针对一些晚年生活无以为继、“穷得只剩下房子”的近贫老人，台湾“行政院”推出“以房养老”政策，只要将房地产抵押给政府，就可“活多久，领多久”，按月领取固定生活费到死亡。

第十五篇 解密岛内神秘情色应召行业 台湾“性工作”除罪化进行时

撰文/郑东阳

“我爱台妹，台妹爱我。”

台湾歌手张震岳的这首《我爱台妹》在大陆的传唱度不亚于任何一首流行歌曲。“台妹”总给人低俗、无内涵的印象，但同时她们也是年轻与活泼的族群，折射出另类的台湾文化。

无论是台湾南部高速公路沿线的玻璃小房子里，霓虹灯照射下，一个个穿着暴露的“槟榔西施”，还是活跃在日本AV界的台湾“女优”，都让“情色台湾”成为大陆公众对这个岛屿的另外一个印象。 如同当年美女政客璩美凤“性爱光碟”在民间被男女老幼各色人等争赏，这次，在前“总统”陈水扁之子陈致中陷入“嫖妓门”丑闻风波后，台湾媒体打出“致中寻欢，全民同乐”的口号，因为“人民不在乎真相，只想看笑话”。

随着“嫖妓门”愈演愈烈，台湾神秘的应召行业也浮上台面，与AV、性丑闻、红灯区共同拼出“情色台湾”的完整拼图。色情行业从业人员的生存状态更是再次受到广泛关注，“情色台湾”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展示了台湾社会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断探索。

庞大的“应召体系”

7月3日，一位30岁出头男子开着陈致中的座驾，与应召女郎相约街头会面，并共同到汽车旅馆开房。这一幕被擅长爆料的《壹周刊》偷拍，18岁的应召女郎妮可事后还接受了该杂志的专访，承认该男子为陈致中。被曝光后，陈致中称，当天自己将车借给一位“金融圈”的朋友，并称要告《壹周刊》和一些爆料民意代表毁谤。

陈致中的辩解让“你是不是金融圈友人？”成为台北金融圈数周以来最流行的问候语，白领们迟到时最冷的借口也变成“刚去还车”，而应召女郎妮可也身价大涨。

台湾新闻界忙得不亦乐乎，社会新闻记者继续追踪妮可和她的同行们，财经记者追问陈致中的“金融圈友人”是谁，政治记者则问政界反应，广大网友也加入对“妮可”的人肉搜索。

“应召女郎”成为这场全民闹剧最大的焦点。这也使得台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在2009年台湾主张性交易合法的“日日春协会”下跪哭求合法

营生之后，再次受到关注。

与“日日春协会”的会员们不同，应召女郎并没有固定场所，流动性较大。这些应召女郎隶属于应召站，应召站负责中介，大部分应召女郎会在接到应召站电话后，上门服务。

据台湾媒体报道，陈致中事件的女主角妮可便是隶属于高雄“雪夫兰”系统的“小姐”。据了解，该系统号称是高雄最大的应召站，“小姐”上百人，平常都是通过“马夫”将“小姐”送到饭店跟客人交易。熟客则可以和应召小姐自行约定时间、地点，省去“马夫”这一环节。

包括“雪夫兰”在内，在高雄市，通过“马夫”将“小姐”送到饭店交易的应召站，其实有4大系统，其余三个分别是“张老师”、“海军仔”以及“猫仔琪”。

由于竞争激烈，这些应召站的促销手段可谓五花八门。一名45岁郑姓女子在台中市开设应召站，还推出了“嫖10送1”优惠，设置集点卡。此外，警方还查获到应召站的“嫖客笔记本”，里面写到“小詹喜长腿、卷发辣妹”、“徐先生热爱学生妹类型”、“姚桑喜欢性感熟女”。

对于客人的喜好都做了详细记载。这位老板更将行销的概念运用到特种行业，会通过电子邮件与客人交换意见，询问客人的感受。

不仅广招台湾本地应召女郎，台湾警方在去年曾查获多个设在岛内的跨国应召站，查获的应召女郎籍贯几乎遍布整个亚洲。今年6月份，一位大陆新娘因在台湾专门“中介”对岸女教师假结婚来台卖淫被逮捕。

据报道，这位张姓大陆新娘曾经是大陆福建一小学教师，10年前嫁来台湾。一年多前在台湾经营“金字塔”、“白金”两大色情应召站，透过大陆友人，中介大陆籍中小学女教师来台卖淫，并据卖淫女学历、姿色、配合度等分级，高档卖淫女每次8000元新台币起跳，吸引不少男客前来买春。

今年4月，台湾女艺人萧依婷因吸毒被捕，还意外扯出前中国小姐凌葳威涉及媒介卖淫的新闻。警方竟赫然发现凌葳威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跨国卖淫集团，甚至有超过40名女艺人下海卖淫。而卖淫的地点也不局限于台湾，凌葳威就曾介绍多位女星前往中国大陆与“客人”接头。

一些“跨国集团”还将火烧到了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台湾警方今年4月查获的一起案件中，主犯将小姐输出到澳洲、加拿大等国家跨洲卖淫，情色版图横跨13国。据悉，主犯陈太太组成的跨国卖淫集团“中介

服务”十分周全，他们从7个亚洲国家招募女子，化名“雪莉”的陈太太负责台湾部分，包括登广告征人、用计算机合成照片、安排“枪手”代考雅思、托福后，再办理至澳洲等地就学的手续。 据悉，这位陈太太号称台湾应召界“祖师娘”，10多年前就打造色情王国，还率先引进俄罗斯等国的“金丝猫”来台卖淫，被判刑沉寂多年后重新崛起，改走国际路线。

性产业地下化的隐忧

在陈致中召妓疑云风波后，台湾警方开始再次加强监控。加上近一年来，由于娱乐行业涉黑，部分警察涉案，为了“清理门户”，台湾警方已经采取了系列“严打”措施，台湾应召站风声鹤唳。

不过，“严打”的执法其实还是较为人性，加上司法程序比较漫长，疑犯大多可以获得保释，并与公诉方平等对峙公堂，因此也并不能制止“应召行业”的蓬勃发展。

与大陆“扫黄打非”以净化社会风气、维护稳定为由，甚至将卖淫女“游街示众”不同的是，被台湾警方查获的应召站中，多数是因为“应召女郎”工作条件太恶劣、生存环境严峻，被舆论关注后才“引火烧身”。

上述案例中，应召界“祖师娘”陈太太的应召站就是因为对应召女郎太苛刻而被查获。据报道，陈太太手下的应召女郎的护照大多被扣留，性交易所得也先由其保管，有人甚至没拿到钱。这些应召女子哭诉遭剥削，行动被限制，甚至被迫服务有特殊性癖好的顾客，引起广大舆论同情。

很长一段时间，台湾曾允许公娼合法化。台湾光复后，管理者想尽办法，经过几十年努力，终于取消了公娼。1997年9月6日，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仓促废娼，引起百余名公娼上街头抗议，经公娼自救会和当时介入协助的女工团结生产线的长期抗争，在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于1999年3月争得缓冲两年执行废娼政策。

2001年，废娼政策执行。在“首都”台北的示范效应下，其他各县市纷纷效尤。2003年底，高雄市最后一家公娼馆预关闭,台湾合法的公娼业也走入历史。

但是在废娼政策施行后，问题却更严重。性工作者全面转入地下后，除了官方耗费大量公共资源取缔、查处非法营业者外，地下性工作者也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压迫与经济困顿。

“他们遭受警察的盘查、临检及‘钓鱼’恫吓，以及少数恶质嫖客的骚

扰和暴力威胁。”台湾《自由时报》一位资深社会记者告诉本刊记者。

台湾媒体称，这些地下性工作者大多数迫于生活压力，身上背负着经济重担，而且除了少数新生代可以通过电脑等“援交”外，大部分只能靠社区和人情基础，维持与老顾客之间有限的性交易互动，或者委托应召站，被这些“中介机构”残酷剥削。

“一些妇女协会经常上我们报纸登广告呼吁公众关注这个群体，她们没有合法的工作权以及福利保障，地下化生存只能让她们活在社会阴暗的最底层，守着仅有的生存条件喘息。”上述《自由时报》资深媒体人称。

而每当台湾警方查获一处应召站时，多数台湾舆论会对这些应召女郎抱以同情，因为根据台湾现有的法律，“罚娼不罚嫖”。

除罪化的艰难历程

“罚娼不罚嫖”成为台湾舆论批评当局的焦点。多数台湾舆论认为，这种处罚标准违反“宪法”的男女平等原则。“多少年来，当局执着于‘罚娼不罚嫖’的政策，让地下化的性交易始终脱离不了污名与剥削，却又在可见的或不愿看见的角落，春城无处不飞花。”台湾《联合报》的社论称。

有分析称，如何处理性交易议题，向来就是检测世界各国、各地区执政当局的诚实与魄力的政治标尺之一。从2009年下半年起，台湾当局已经开始诚实面对这一社会话题。

2009年，两名宜兰地院法官为不断受罚的弱势老妓向大法官申请“释宪”。接着台湾大法官宣告社会秩序维护法中的“罚娼不罚嫖”为“违宪”，并将于两年内失效。此举让台湾当局不得不限期面对性交易管理的烫手山芋。

2009年下半年，台湾当局开始研议开设合法的红灯专区。今年2月份，台湾“内政部”开始拟“成人性交易管理法”草案。彼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刘兆玄还曾宣示性工作政策将朝向除罪化、除罚化。为了解台湾社会民意对性工作除罪化的看法，台湾“内政部”在去年10月进行民意调查，有68%的人赞成把成人的性交易当成一项行业管理，83%民众支持设置专区(红灯区)管理。

对废除“罚娼不罚嫖”，台湾民众与当局有了共识。但是在台湾妇女界，却有不同声音。当年救雏妓起家的妇女团体另成立推动缩减性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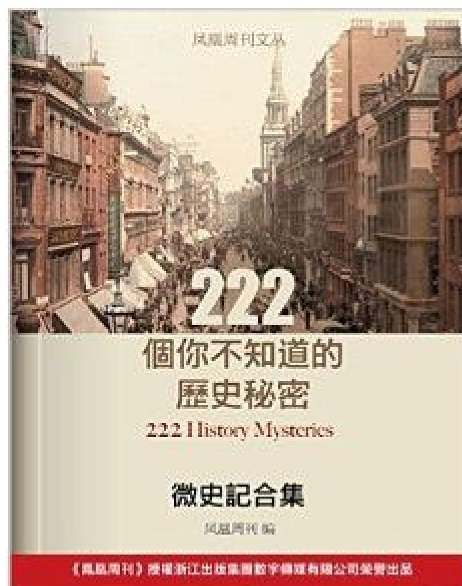
联盟，强烈要求“罚嫖不罚娼”，坚持“不罚嫖客，就不修法”，而与日日春协会等妓权派的“娼嫖都不罚”的主张对峙。而且大多数民意支持性工作除罪化，但是除罪化后，管理难度十分大，负面影响的可控度也受到质疑。

因此，台湾媒体讽刺当局，“遇上性工作的争议，拖延似是唯一对策”，“社会缺乏共识”至今仍是当局拖延不作为的挡箭牌，而类似陈致中等丑闻曝光后，台湾警方总是借机“扫荡”，代价一直由底层的街头娼妓承受。

今年上半年，台“内政部部长”江宜桦依马英九的“审议式民主”主张，针对性工作举行了公民会议，包含家庭主妇与性工作者的18位公民代表历经激烈的争吵、对话。这场对话得到的结论是:“现行政策不但无法减少性交易，还会造成性工作从业者污名化，并导致执法滥权、侵害性工作者人权。”宜兰的法官和“释宪”的大法官的观点与一般社会公众基本一致。

2010年8月2日，台“内政部”将再次举行公听会，广听各界意见。对这场听证会，岛内有团体称，为确保性工作者“不被剥削”，政府应广邀私娼，举办小区化民众对话，例如选择与性产业共生关系密切的地方，“有诚意、空间解决问题，才有意义。”

精彩推荐：凤凰周刊文丛·微史记合集：222个你不知道的历史秘密



点此阅读

第十六篇 Taiwan Health Care 全球排行第二优 台湾健保模式全揭秘

特约撰稿员/嘤鸣

2010年3月21日，美国医疗保险体系迎来历史性变革：众议院以219票赞成、212票反对艰难通过了奥巴马极力推动的医改案。此举意味着，继中国承诺将于2020年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后，又一个大国加入全民医保“全球化梦想”。

然而，目前看来，无论对于正在推动实施还是早已实施全民医保的政府，全民医保实属一个“艰难的公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环境恶化等因素带来的医疗负担加重以及医疗成本迅猛增长，低费率、高福利的全民医保在各国各地区都越来越难以维持。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国家或地区，当医疗福利制度遭遇财政瓶颈时，执政者要通过民主议事收缩福利或加收保费都万分艰难。因此，德、英等老牌发达国家早因“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屡次将沉疴累累的全民医保体系送上手术台，却难以找到能顺利通过民意关且行之有效的手术方案；在美国，奥氏医改还未付诸实施，就被“它是历史性成就还是历史性错误”的争议包围。

在华人世界，香港和台湾是两个率先实现全民医保的地区，尤其台湾曾以优质低价的公共医疗服务赢得全球第二优医保系统的国际声誉。不过眼下，它们正面临与老牌福利社会相似的“善门难久开”的困局，以至于“完美医保”实难为继，台湾卫生负责人只能以辞职相博，促请变革。

本刊此时刊发台湾、香港根植于各自社会土壤的医保系统完整过程，探究台湾医保制度成败奥秘，并呈现港台地区正在进行的新的医保改革尝试，以期为中国内地提供视距最近的借镜和较大历史跨度的认识和评价。

3月17日，台湾卫生署长杨志良确定打消辞意，留任原职。10天前，杨志良用薄薄的一纸辞呈，向他的长官“行政院长”吴敦义和“总统”马英九叫板，警告他们，也警告所有民众：“全民健康保险”因为入不敷出，就快要山穷水尽，无以为继，台湾社会即将退回“前健保时代”。

台湾全民健保开办15年，曾经被《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评鉴为全球第二名的健保制度，仅次于老牌福利国家瑞典。1995年3月1日，它在民众期待和国民党“为选举服务”的目的下匆匆开办。它由

政府统筹控管，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民众只需缴交低廉的保费，却能享受小自感冒大到癌症化疗的全套健康医疗服务。

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台湾健保成于物美价廉，也败于物美价廉。因为忌惮民意反弹，15年来当局只调涨过两次费率，再加上药价控制不当，以及使用者“不用白不用”心态下造成的浪费，“亏损”已成台湾全民健保的常态。

杨志良此次不惜以官位相搏，虽然成功说服执政者同意调涨费率，但已经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为时已晚。要想让健保恢复元气，还要看接下来的“二代健保”方案能不能顺利推动。

从倾家荡产到25元人民币

32岁的程晓伟（化名）是台湾一家纸媒的记者，他的月薪是5.4万元新台币（以下货币单位无特别注明皆为新台币，五元新台币约合一元人民币），每个月他的工资里需要扣除756元，单位和政府会分别添上1512元和252元，一共会有2512元（个人、公司、政府缴纳比例为3：6：1），用来缴纳全民健康保险费。

凭一张健保IC卡，去年他一共就医12次，包括内科、牙科、中医等，每次他只需付100200元的挂号费和少量检查费(约合人民币20~50元)，就可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

事实上，只要你是一位台湾居民，甚至只是在那工作或居住满4个月的“外籍”人员，都会被要求依法参加“全民健保”，这样一旦生病，你就可以到任何一家医院自由就诊，小到牙痛大到癌症，医疗开支均可由“健保”埋单。其给付的范围包括门诊、住院、牙医、中医、检验检查、居家护理、处方药品、预防保健8个方面。

“健保”买单后，自付比例十分低。例如，做个全身检查，在最好的医院，都只需要付20%的检查费，而且以300元为上限。哪怕你患上重病需要住院，此时个人也需要负担一部分费用，但仅限于病房的使用费，如慢性病房根据时间只需个人支付5%、10%不等，急性病房则是30天以内个人负担10%、61天后个人负担30%，收费均十分低廉。如果病人实在支付不起，可以选择四人（以上）的病房，便可省下病房费，全部由健保买单。

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2月的报道指出，“洗肾”是治疗糖尿病、尿毒病等手段之一，而台湾洗肾人口比例全世界第一，这些病人有些时候每个礼拜都会去趟医院“洗肾”。敢如此频繁去治疗，只因为台湾健保

会全额支付。

不过，台湾的穷人家庭不幸在1995年前患上重病的话，恐怕是另外一种情形。在1995年3月1日前，台湾民众也经历过一段“看病贵、看病难”的日子，“生重病”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几乎是“倾家荡产”的同义词。

当时的台湾《联合报》，曾报道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在宜兰开面包店的林姓男子，儿子罹患血癌，他关掉了面包店，和儿子一同住进台大医院，准备长期抗战。但这实在不是他打得起的战争，每天要打的“生长激素”，一毫升5500元。林家向县政府申请了一年的低收入户补助，总计30万元，一个月就弹尽援绝。

林家人后来如何？这篇报道没有交待。但类似林家际遇这样的催泪弹，一段时间就会在媒体上爆发一次。媒体的呼唤成为医保改革的“催化剂”之一，而更重要的“催化剂”是台湾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

在1995年施行“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前，台湾的健康保险制度可以归纳为四大种类，即军人保险、公教人员保险、农民保险和劳工保险。每个大类下面还有若干分险，总计11种。当时台湾人口近900万，除去这四类有保险的人士，约40%的台湾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即使是这四类健保，除了军人保险外，另外三种保险业务也是残缺且混乱。

进入1990年代，在台湾经济增长迅猛的同时，人口平均寿命延长，台湾地区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老人的健康维护问题成为台湾的社会话题之一。而没有保险的人群中，14岁以下的儿童和65岁以上的老人居多，这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极大负担。一时间，医疗保健问题成为社会福利追求的核心。

强烈的舆论压力和民众需求逼得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必须拿出一套能让民众安心的健保制度。而此时的台湾也的确有资本设计一套覆盖全民的健康保险制度了。蒋经国执政后期，解除戒严后，两岸关系有所缓和，军事预算比例下降，加上上世纪80、90年代的台湾经济增长十分迅速，创造了“台湾钱淹脚目”的奇迹，台湾当局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

正是在以上诸种背景下，1994年7月19日，由国民党牢牢掌控的“立法院”通过了“全民健保法”，来年3月1日“全民健保”正式上路。

全民健保方案诞生记

身为台湾公共卫生学界大佬，杨志良当年就以教授身份参与了这个

全民健保规划。他接受媒体访问时回忆，最早依国民党政府的规划，全民健保要到2000年才开办。但1989年，当时不太得人望的“行政院长”俞国华在“立法院”做施政报告时，“立委”原本没什么反应，直到俞国华宣布全民健保可以提前4年于1996年开办时，现场竟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全民健保自此愈来愈成为施政的焦点议题，接下来的“行政院长”李焕宣示提前到1995年开办，郝柏村再提前到1994年。到了1993年年中，连战指派副院长徐立德成立评估小组，把全民健保法通过的目标日定在1994年下半年。

“1994年下半年”这个目标期限，为的是政治操作。因为1994年年底是台北、高雄市长和台湾省长的选举，在台北市，国民党提名的黄大洲遭到民进党陈水扁和新党赵少康的强力挑战；台湾省长选举，民进党推出以清廉著称的陈定南，迎战宋楚瑜。

为了稳住即将到来的省长选举，更为了1995年年底的“立委”选举和1996年3月的首次“总统”直接民选，国民党必须推出能让每一个人打从心里觉得受惠的政策，开办全民健保是王牌中的王牌。

但根据台湾《天下》杂志当时进行的民意调查，有超过80%的民众认为应开办全民健保，不过只有22%的人认为全民健保可以由政府完全规划执行。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全民健保办不好，谁该负最大的责任，28.8%（该问题选项下的最高比率）的人回答是“立法院”。

今天拿着这份民调，对照后来的立法过程，不能不说，台湾老百姓对这块土地上的政治人物有超乎寻常的清醒认识。

要观察全民健保立法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7月以前，“全民健保法”从无到有。那时“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在“立法院”就已经受到同党“立委”、民进党版和个别委员提出的许多修正案，大幅度地增加支出，减少收入。

健保制度的要素，也正是各版本搏弈的焦点。以下就举“费率”和“政府、劳动者、雇主三方保费分担的比例”这两个关键要素，呈现台湾的全民健保法从政府规划之初，到立法完成后，其间发生了多少变化。从中可以观察，一个福利制度要稳健长久地经营，要遭遇多大的挑战。

就费率而言，政府原本提出的保费比率，是授权政府在4.5%到6%之间机动调整，但之后经过妥协，把下限调降为4.25%。这也成为健保

开办时的费率。

仅保费负担比例，就出现了四个版本，包括：国民党“立委”党团提出的劳工本人：雇主：政府为3：6：1；国民党立委黄昭顺主张2：6：2；民进党的主张是劳工和雇主为2：8或者2.5：7.5的比率分摊。在立法完成之初，原本政府守住了“3：6：1”的底线，但到了1995年2月，健保正式开办之前，为了顺利通过其他配套修法，国民党政府让步，改为“2：7：1”，也就是民众原本要负担两成的保费，现在把其中一成转嫁给政府。

这些修正造成多大的影响？例如费率从4.5%降到4.25%，导致政府每年支出增加120亿元；而保费负担比例退守为“2：7：1”，再使政府每年必须再多负担200亿元。

也就是说，从1994年健保法送进“立法院”讨论到1995年3月健保开办前，健保制度就比政府原先规划的版本，增加近320亿元的负担。最初的规划再怎么宽裕，也经不起这样的摧折。

当时“财政部长”林振国被问到财务问题，无奈地说：“只有增税一途了。”一再呼吁要慎重规划健保财务的民进党“立法委员”沈富雄则讽刺地说：“人民认为是福利，就给他福利吧！教育选民，不是我们的责任。”

立法完成后，健保正式于1995年3月1日开办，这时“立法委员”们如大梦初醒似地发现，健保是一个取悦选民的绝佳工具，因此纷纷提出修正案，设法减轻普遍或特定团体民众的负担。

于是，“立法院”1995年下半年的会期中，健保法修正案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民进党提案将费率从4.25%再降到3.75%。如果这个版本通过，健保保费一年将短收622亿元。

其他版本，也几乎都只有一个重点：减少选民的荷包支出。甚至包括“行政院”提出的修正案，也将劳工的费率计算基准限制在3.6万元，此外，“行政院”还打算放宽低收入户认定标准，以及减免山地居民(高山族)和离岛民众的保费。这些措施，用意在固守劳工这个“大票仓”，以及原住民和离岛等“铁票区”，但它也会使健保局一年短收超过百亿元。

2008年大选后接掌马政府卫生署长的叶金川，当年正是中央健保局总经理。他说：“如果一定要依民进党版来办健保，那健保就不必办了。”接着他又有气无力地补了一句：“办不成也好啦。”而沈富雄索性在“立法院”对前卫生署长张博雅说：“如果我是你或健保局总经理，这些

版本都通过的话，我就去跳楼。”张博雅满脸苦笑，无言以对。

眼看着情势日渐失控，国民党政府紧急叫停，搁置了1995年下半年这一波修法，让健保免于继续失血。

当时还是公卫学者的杨志良，在健保开办以前，就预期到政治极可能会粗暴地干预健保，其中当然包括国民党为了选举考量，在一切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强令在1995年3月1日实施健保。

“健保的实施日期应是视现实条件而定，而非政治需求而定”，杨志良在“立法院”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批评“行政院”一再宣示全民健保要在3月1日开办，不仅没有考虑到现实医疗环境能否配合，连政府早就应该公告的多项重要法规都还在“审查中”，“充分暴露了‘行政院’在全民健保政策上的进退失据，以及政治高于一切的考量方式”。

政治干预造成健保亏损，不仅仅发生在健保推出当年，事实上，这一问题一路延续下来，不只未改善过，还会有恶化，比如1999年的调降眷口数。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眷口数”这个概念：前头说过，受雇者的保费是由受雇者自己、雇主和政府共同分担，但受雇者的未成年子女及父母等家眷，是挂靠在受雇者名下加保，换言之，雇主和政府也要分担被保险人家眷的保费。

但每人家眷数目不一，为了保护家眷多的劳工不会被解雇，健保制度订定每户眷口的上限为五人，超过五人就不用付费，但一样享有保险。但到了1999年，在“民意”的压力下，“立法院”通过将眷口数从5人调降到3人，雇主和劳工一下子省了两个人的保费；再者，如果民众成心钻法律漏洞，让自己和兄弟姐妹的家庭“两户并成一户”，就能节省更多的保费。

“立法院”决议调降眷口数时，正值连战、宋楚瑜和陈水扁三强竞逐“总统”的前夕，调降眷口数和这场选举有没有关系？大家心照不宣。但更直接的影响，就是在调降隔年，健保年度收支就从勉强平衡转为亏损66亿元，对健保的伤害可见一斑。

回顾这段历史，从1994年的立法过程、1995年3月的匆忙上路到下半年的修法大战，再到1999年调降眷口数，15年来健保的历史，虽然是迎合民意的民主成果，但从今天其经营的难以为继来看，也同时是一页“政客为刀俎，健保为鱼肉”的负面教材。借着残害健保取得政治利益的，甚至包括执政党自己。原因无它，逐步民主化的台湾，选举的压力

愈来愈大。

“便宜又大碗”的制度

1994年7月19日，由国民党牢牢掌控的“立法院”，通过了“全民健保法”，隔年3月1日全民健保正式上路。全民健保15年来，除了费率调涨过两次、眷口数调降过一次以外，基本运作方式没有太大的改变：

首先，民众要以薪资为基础，缴交健保费。举调涨前的费率为例，健保费是民众的投保薪资乘上4.55%。如果投保薪资是33300元，每月保费就是1515元。这笔钱由地方政府、雇主和民众以4：3：3的比例分担，也就是地方政府每月要为参加健保的民众缴600.5元，由公务预算拨入健保局；雇主和民众各缴给健保局455元。

保费基准原则上是以被保险人的薪资为基础，但不是直接用薪资计算，而是在53000元和15800元之间分46级，雇主要选择和员工薪水最接近的数字作为基准。但可以想象，将高薪低报以求节省保费的情况非常严重。

如果被保险人本身就是企业主，政府就不再分担保费，需要由自己全额负担，若是以最高等级的13.17万元（以上）月薪计算，每月保费也不到6000元—就是说，王永庆、郭台铭的保费也不过如此。相对的，在贫穷线以下的家庭和民众，政府也会补贴保费，最高可以全额补贴。

至于看病，民众虽然缴了保费，但看病还是要缴交部分费用，称为“部分负担”，其他由医院向健保局请款。部分负担要交多少，视民众就诊的医院规模而定。

健保体系将台湾医院分成四级：诊所、地区医院、区域医院和医学中心。以感冒为例，如果到诊所，民众自己付50元，其他费用由诊所向健保局请款；如果直接到较大型地区或区域医院，就要自付80元或240元；如果只相信医学中心的医师，就得付360元。

分级的目的，是希望引导病患落实“小病先到小诊所”，碰上真正复杂难治的症状，再转送到设备比较齐全的区域医院或医学中心，这种制度称为“转诊”。例如生病民众到了诊所，但诊所医师认为设备不足，必须转送上一级的“地区医院”医治的，经转诊的病患自付额仍然是50元。

至于药费，100元以下的药费，民众不用付钱；100~200元，民众要付20元，等比例向上推算，直至1000元以上的药，民众付200元封顶，不会再加，剩下的都由健保局给付。

再以生孩子为例，自然生产的话一般住院3天，一份孕妇生产的收费账单如下：药品1200元、病房7100元、无痛分娩6700元、伙食费4000元、证明书等其他费用300元；新生儿住院3天，3000元。总计22300元。但如果住三人病房（病房费全部由健保买单）、伙食不用特别订的月子餐（普通伙食不用钱）、生产时不打无痛分娩针的话，扣除这三项，生个孩子只要4500元。

200元治个感冒、4500元生个孩子，台湾健保制度的优越性，单单从费用低廉一件事上，就能思过半矣。

2000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信息部在当年出版的季刊中，针对医疗品质和医疗资源，评比包括台湾在内的27个先进或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台湾健保以仅次于瑞典的名次，名列全球第二。从这个时候开始，台湾健保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注意。

2003年5月，国际知名的《健康事务》(Health Affairs)月刊以专题介绍了台湾健保制度，盛赞台湾健保制度“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尤其全民皆保、给付范围完整、病患无等待期、行政成本大幅降低、保险费率低等优势，都值得其他国家和地区参考。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在2005年11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公开撰文赞许台湾健保是“全球最好的健保制度”，人民可以平等就医，同时台湾在世界开发中国家的医疗费用支出是最低的，这些都值得还没有全民健保体系的美国学习。

为什么台湾健保能用这么低的费用，维持15年的运作？根据克鲁格曼的分析，关键在于“单一保险人”（政府），加上99%的全民纳保率。也就是缴费的群体达到最大，但在“公有公营”的体制下，所有健保业务一概由中央健保局负责，行政支出可以减到最低，也不以营利为目的。

相比之下，另一个极端—美国，享有医疗保险的民众不到85%，全国却有上千家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健康保险良莠不齐。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克林顿政府时代推动健保改革，曾经痛批美国的制度是“保险公司漫天要价、医疗体系盲目追求利润”。民间业者“逐利至上”的本质，造成民众缴得多、享受得少；再加上每家保险公司都要养行政人员，使得美国民众缴交的健保费，近20%用在行政事务上。难怪克鲁格曼会用“国耻”来形容美国的健康保险制度。

仔细比较台、美健保制度，可以发现台湾在基本经济政策上，当然是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为圭臬，但在健保制度上，台湾带有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色彩，最明显的印记，就是国家力量的高度介入，不仅主导

经营，也要求民众一律纳保。

这样的制度在台湾为什么可行？一来是台湾经历过国民党50年的威权统治，因此对政府集权还算习惯，而不会像美国人，对任何的国有体制都畏如蛇蝎。再者，三民主义毕竟是国民党的根本，民生主义要求政府介入经济运作，以达到“均富”的思想，原本就脱胎于社会主义。而台湾健保也就是把“均富”思想，从一般经济活动转用到公共卫生政策上，民众接受并不困难。

另一个造就“台湾健保奇迹”的，是台湾医师工作的勤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或地区。对健保有独到观点的沈富雄，接受媒体访问时多次提到，台湾医师太勤劳了，不少医师平均一天可以看120个病人，而美国只有30人；其次，台湾的医事辅助人员，例如护士、药师、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等，从业人员相对少，薪水低；第三，台湾医疗纠纷频率不高，病人鲜少到法庭控告医师，即便打官司医师败诉，赔偿金额也不高，误诊致死者，赔付甚至不到100万元，最多200万元。

正是对社会主义和国家集权不排斥、议会逼迫政府让利、医师安于低收入等诸多因素因缘际会，在一个历史时刻全体具备，才造就了台湾健保。但要汇聚这些因素，必须要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因此沈富雄曾说，香港曾经有意把这套制度搬到香港，但深入评估后，港府也放弃了，因为“这个制度只有在台湾才会成功”。

台湾健保的隐忧

也因为台湾健保的历史特殊性，沈富雄批评克鲁格曼等赞美台湾健保的人士“太外行”，认为他们只看到台湾健保的美，却看不到内在的隐忧。

沈富雄是有资格这么说的，因为从健保法之始，他就一路见证这个由政府作为“单一保险人”的健保制度，就像所有由政府提供的福利措施一样，一步步走上“享受者愈来愈多，但付费愈来愈少，至少无法涨价”的困境，甚至面临将要全盘失败。

和北欧这些老牌福利国家相比，北欧民众至少有接受高税率的政治传统，并且对政府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但在台湾，人民依照“资本主义的税率”缴费，要求的却是“社会主义的福利”，台湾健保最大的肯定和最深的困境都着落在这一点上。

沈富雄早在健保法订定之初就指出这个问题，因此他提出的全民健保法版本，基本精神是“保大病不保小病”。这样的主张下，一个人看个

小感冒，全自费可能要花300元（现在的健保制下是100元），差别并不大，但因为要全自费，所以民众不会乱用，也无法乱用，而且可以将健保资源留给真正罹患重症者或慢性病患者。

但如前述所说，国民党为了要最大程度打动选民，因此坚持选择了“大病小病都保”的版本，如此一来，令健保财务非常脆弱，除了头三五年中央健保局还能维持财务平衡，甚至小有营收外，后来十多年，台湾健保无时无刻不是躺在“财务危机”这个加护病房中。

根据统计，台湾政府每年健保支出近4000亿元台币，但收入的成长率远远追不上支出的成长率。健保局并不是没有尝试拉平收支，但拉平不了多久，又因为政治人物有选举需要，必须把优惠之门开得再大一点。

由于“全民健保”的福利，使台湾民众看病上瘾，华人社会有种根深蒂固的“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用药习惯，再加上药太便宜，使得民众争相向医院拿药、吃药。据统计，健保局一年支付药价超过1200亿元，相当于四分之一的支出。台湾学者将此总结为“爱逛医院、爱拿药、爱检查”。

台湾中央健保局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年均就医次数达15次，最极端的一个案例，一对老夫妇一年竟上医院700多次，平均一天两次，调查人员在其家发现了一个冰箱，塞满了各种药品。台湾《今周刊》的报道更是引述研究者的调查称，台湾居民的用药量是美国人的7.2倍。

健保支出居高不下，还有一个被称为“药价黑洞”的大问题。“药价黑洞”来自“药价差”，“药价差”是指医院进药的成本低于健保给付价格，这项制度使院方可以从中得到一定利润，但当这项利润大到“深不见底”时，就从“差距”变成了“黑洞”。

凡有弊端，必定有不肖民意代表（简称“民代”）上下其手，这几乎是议会政体的铁律。而台湾，举凡健保局将某种新药加入给付名单、定价多少、公立医院采购作业等，都逃不过民代勾结少数不肖官员从中干预牟利。这是人人都知道、但官员有口难言的问题。这其中被民代刮走的油水，自然就转嫁给健保。

再者，医院，特别是私立医院，本身既然是营利事业，就会和药商勾结，不向健保局诚实申报进价，而用“折让”、“捐赠”、“提供研究费”等名义将药价灌水，中间的差价就由医院坐收。虽然医院会申辩，这些钱没有流入私人口袋，而是用来改善病房、填补重症医疗等，但健保局无论如何是付出了不该付出的钱。而健保法对于不诚实申报，罚款只

有1万至5万元，对于利润动辄上百万元的药品采购，罚5万元只是说笑而已。

因为可以吃价差，所以医院采购药品宁愿就高价而舍低价，例如同样是阿司匹林，药效一样，有的厂牌一颗1元钱，有的60多元，但就有医院情愿采购60多元的阿司匹林，因为这是可以让自己和药商都赚钱的“双赢”策略。

目前药费约占每年健保支出的四分之一，每次要调整费率，“为什么不先查‘药价黑洞’”就成了民众最大的质疑。在最近的费率涨价风波中，工商团体甚至质疑健保累积的药价差高达1600亿元。

对于民众和工商团体的质疑，健保局表示，1600亿元的说法不知从何而来，但会要求药品供货商起按季申报市场交易资料，并固定进行药价调查，以缩小药价差。但现任健保局长郑守夏也认为，外界对“药价黑洞”有误解，民众也要接受有“合理价差”，这是医院和药商议价的动力。

改革健保之道

“(台湾健保)就像每个人发一张信用卡，刷完了却不知道钱在哪里。”这是杨志良在健保开办之初，对政客争相讨好民众、不顾健保财务健全的沉痛批评。没想到15年后，杨志良被迫自己下海，四处找钱偿还这笔“卡债”。

在“善门难开”效应造成的支出快速膨胀以及健保局无力解决“药价黑洞”的双重打击下，台湾健保面临严重亏损。杨志良2009年8月出任卫生署长，但早在他接任前7年，健保就已经入不敷出，累积债务达到1300亿元。除了调涨过一次费率以外，没有系统性的解决办法。

目前，健保局单一年度的收支短差达到580亿元，该局一年的预算，也不过4000亿元，收支短差超过一成。郑守夏用“不愿面对真相”形容台湾民众对健保财务的态度，“如果(中央健保局)是一个私人保险公司，早就倒了”。

2004年，台湾卫生署拟对健保制度进行小幅改革，结果引发地区医院协会万人抗议。此事最终以卫生署副署长张鸿仁辞职才得以平息。在黯然离职时，张鸿仁就曾直言：健保制度实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请他下台为10年来累积的后遗症负责，也未免太抬举他了！

如同今天的杨志良一样，当年张鸿仁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健保改革再难也必须改，再不提高费率，只能坐等破产，这就是杨志良

宣布辞职的背景。

杨志良此次提出的增费方案，是让健保费率由4.55%提高到5.09%，投保金额的上限由13.17万元，调高为18.2万元。虽然费率提高，但政府再针对收入较低者实施补贴，使得实际上要多交钱的人集中在高收入族群。

根据计算，依照杨志良的方案，至少可以让健保年度财务收支平衡，但有41%的人必须多交保费，平均每人每月增加保费78元。为了争取支持，杨志良甚至呼吁："每人每个月少吃一个便当(盒饭)，就可以挽救健保。"

依照杨志良的说法，似乎涨价一事没有这么严重，不过就是每月多交78元嘛！但杨实际上是避重就轻了，因为保费是政府、雇主和被保险人用4：3：3的比率分配交纳的，也就是说，被保险人多交78元的同时，雇主也要为他交78元给健保局，政府则要交104元。依此推算，一个有5000员工的企业，每年要增加多少成本？一个有2300万国民的政府，一年要多出多少开支？

话说回来，即令杨志良讲得一派轻松，41%的"打击面"还是让吴敦义觉得太广，年底的"五都选举"即将到来，因此国民党高层下发政治指示：必须把实际增加保费的人数，从41%降到25%。面对这项不可能的任务，杨志良决定求去，记者会上最后留下一句话：天佑健保。

杨志良求去，此间舆论一开始就将此事定性为"专业署长"不堪"民粹政客"的无理要求。马英九政府因"八八风灾"处理不当，那顶"无能"的帽子还没摘下，再因健保风暴被扣上一顶"民粹"。

经过10天的博弈，3月17日，折衷后的健保调涨方案终于定案，费率提高到5.17%。但投保薪资在5.6万元以下的保户，涨价的部分由政府补贴，收入高的少补贴，反之多补贴或全补贴，政府预计投入121亿元。

也就是说，经过这10天的博弈，杨志良要求调涨费率救健保，他成功了；吴敦义希望涨价的打击面不要太大的目标，他也达到了，不必多交保费民众的比率甚至从75%上升为78%。

这太神奇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看似神奇的结果，答案说穿后一文不值：从政府挖钱。也就是说，这个调涨方案的内容，除了对收入高的富人增费外，更大一部分是

把政府的钱直接挖到健保局，让健保达到财务平衡。但这样做，岂不是走回“政府出钱讨好民众”的老路？政府的钱说到最后还是纳税人分摊。

再者，这个急就章的方案，本身就有不尽周到的缺失。例如一个四口之家，由月薪8万元的父亲单独养家，每月保费原本是4300多元，涨价后增为4900多元，一年多付超过7000元；但一对夫妇，假设两人每月薪资各4万元，家里可能还有祖产出租的收入，闲来做股票也赚不少，但他们每月的健保费才1200多元，这一波涨价中，还因为被认定为“低收入”而获得政府补贴，免于多缴保费。岂非不公？！

二代健保：健保存续，在此一举

杨志良和吴敦义达成的妥协方案，可以让健保至少达到单一年度收支平衡，至于累积的1300亿元债务，只能先祭出“锯箭法”，眼不见为净。但杨志良也坦承，这个方案不是长久之计，真正要解决健保沉疴，还是要靠“二代健保”。

所谓“二代健保”，重点只有一个：就是现行健保是以个人薪资乘上费率计算保费，而二代健保则改用“每户总所得”或“个人总所得”计算保费。保费与所得税有连动关系。

之前举例的那两个家庭对照，就是用来说明二代健保的最好例子。如果以“个人薪资”计算保费，就会得到那个不公平的结果；但如果改用“每户总所得”计算，则两家保费几乎相同，事实上，那对夫妇还会因为多加了股利和房租所得，而使保费超过那个领薪水的四口之家。

再者，1990年代规划健保方案时，当时台湾社会绝大多数民众主要所得都是薪水，但十几年来，社会经济形态早已变化，民众特别是高收入阶层来自股票股利、股东分红、海外投资或不动产出租的收益愈来愈多，如果只依薪资计算健保费，势必难以公平。

但正因为如此，二代健保被视为一场“保费重新分配”的高难度工程，而且受害者多是中、高收入者，他们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对政策的影响力和游说力，远超过一般薪水阶级。因此二代健保草案送进“立院”两年以来，“立委”始终不闻不问。

这次为了慰留杨志良，马英九、吴敦义除了同意调整保费外，还公开保证，一定会推动二代健保过关。对杨志良而言，丢出这张辞呈的结果，竟然是退一步进三步，既解决了健保燃眉之急，还拿到推动二代健保的“御赐尚方宝剑”，这意外的收获恐怕是杨志良丢出辞呈之际，始料未及的。

余韵：政治人物的角色和身段

健保风暴到此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但仔细观察结果，可以发现此事余韵无穷。因为最后公布的这份号称“折衷后”的方案，费率竟然从杨志良原本要的5.09%调涨到5.17%。然而循其本，杨志良之所以要辞职，原本就是因为国民党执政高层担心涨价会造成民怨因此强力阻挡调涨造成的，但为什么最后明明涨得比预期更多，民众竟然没有太多反弹？

杨志良能“要五毛，得一块”，除了因为政府补贴了大半费用外，另一个解释的角度，是“角色”和“身段”的差别。

如果把政治人物比成演员，选民就是台下的观众。一台戏里的角色有忠有奸，包公、关羽让人尊敬、喜爱；秦桧一上场，就注定要被人憎恨。因此政治人物很容易陷入一种迷思：人人抢着唱“白脸”，希望能被民众认为是一个体贴民意的好院长，对于推动健保涨价的这种“黑脸”，丢给别人就好了。

但政治人物所扮“角色”的好坏和演戏时“身段”的高低，往往是两回事。有些演员，就算抢到扮演人见人爱的诸葛亮，但如果他一开口就忘词，一开腔就倒嗓，要台下观众不喝倒彩也难。反之，就算演的是刘瑾、曹操，只要唱功声情俱备，武功干净利落，内行的观众一样会喝彩叫好。

也就是说，人民其实重视政务官的“身段”多过“角色”，涨价的确不讨好，但杨志良以辞官相博，展现的道德高度，反而说服了人民确信涨价有必要，也让人民相信这些多缴的钱可以交给像杨志良这样的官员来管理，而不是口里说着关怀民瘼、实则机关算尽的政客。

这一场健保风波，如果对台湾政治人物有什么启示，或许就是让他们发现：民众观察政治人物的睿智程度，可能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第十七篇 “台湾式诈骗”西进揭底

撰文/郑东阳

近一段时间，台湾内政部警政署公关科不断接到来自境外媒体的采访申请。

该科室接线员告诉记者，包括日本共同社及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电视台，都打进电话来“要采访长官们”，主题一律是报道台湾的反诈骗经验。而台湾方面刑事局纯熟的侦办、预防工作以及“165反诈骗专线”的运作方式，的确让他们大开眼界。

谁让台湾是“诈骗之岛”呢！

近年来，在东亚及东南亚一带，越来越频密发生的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等诈骗术几乎都以台湾为起点，渐渐蔓延至中国大陆、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而请求与台湾警方合作的各地警方，除了希望能与台方合作打击跨境犯罪外，也希望能从经验丰富的台方“取经”，因为岛内诈骗集团猖獗多年，“反诈骗”早已成为全民运动，警方和民众都称得上“久病成医”。

而台湾的诈骗始祖们向外拓展“业务空间”时，莫不以大陆为第一选择，尤其是临近的福建沿海一带。

正因如此，2009年4月26日，第三次“陈江会”上签署的《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成为当期会晤最令人关注的焦点。只是，两岸司法合作花20年才建立起来，令双方付出巨大代价。

“诈骗之岛”

在诈骗现象最为严重的2005年，时任台湾刑事局侦七队的警官洪汉周，在破获一个诈骗集团案后于电视节目上透露，当天庭上，法官慨叹“台湾已成了诈骗之岛！”

法官所言并非哗众取宠，几乎常见于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各种诈骗模式之“首发版”都出自台湾。而在台湾，每种骗术都在流行不久后就花样翻新，令人防不胜防。

最早出现的是1990年代末期风行一时的刮刮乐、六合彩明牌等“中奖”诈骗。

而后出现的是“亲情”诈骗，比如歹徒谎称被害人子女被绑，要求付

款赎人。当子女正好不在身边又紧急联络不上时，许多父母一听到电话那端小孩哭喊求救的声音，便乱了心神，即使警方要求暂勿汇款，父母却宁愿被骗也要立即奉上“赎款”。

2000年后，“电信诈骗”成主流，其中以假冒公务机关和援交等诈骗最多。

此后，由于岛内不少民众因电视、网络购物导致个人资料外泄，不法分子冒称“购物平台”或“金融机构”，要求被害人到自动取款机前取消分期付款设定，然后趁机行骗。至2007年底，这种以“网络、电视购物”进行诈骗的模式，已列居岛内诈骗案第一位。而东森电视购物频道、“MOMO电视购物频道”等8家电视购物频道，也因其会员数据外泄，被各界批评。

“现在，最让我们头疼的是网络诈骗。”台湾警政署刑事局局长黄茂穗说：“我们去年开始和中华电信合作，令电话和手机用户都能显示来自国际的来电号码，而不再是未知号码，这样，电话诈骗会少不少。”可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网上注册、博客等个人主页外泄个人资料严重，加上黑客入侵邮箱，为诈骗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网络入侵加诈骗电话堪称为被害人“量身订制”一套骗局，许多被害人接到电话后，都因为对方能清楚描述自己的种种生活习性、实时行踪等，第一时间很难不信。

除却技术手段不断更新之外，台湾诈骗集团最令人称奇的是其具有异乎寻常的“学习能力”和诈骗天分。他们总是第一时间掌握新闻热度，并利用新闻事件行骗，就连“陈水扁家族弊案”都不放过。

今年3月，台湾警方破获两个假冒“特侦组”侦办扁家洗钱案的诈骗集团，逮捕39名嫌犯。该诈骗集团假冒特侦组等单位，佯称受害人的账户已牵扯进扁家洗钱案，务必要将所有存款交由“特侦组”保管。两个集团作案地点遍布全台，不法所得约3亿余元新台币。

台湾消基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度全台被诈骗金额高达65606万元新台币，平均每个被害人损失25万元新台币，几乎是一个台湾普通工薪阶层人士的半年所得，令人咋舌。而台湾刑事局仅依据警方接获的实际报案，估算2008年诈骗金额至少达到123亿元新台币。

“没有接过诈骗电话、简讯的人，可以去买乐透了！”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郑瑞隆，无奈地对媒体形容近年来肆虐全台的诈骗乱相。

好在台湾全民“反诈骗”意识不断提高，特别是2005年4月台湾警方建置“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以来，警方的破案率不断提高。台湾警政署

提供的数据显示，诈骗案破获率近两年来都保持在85%左右的水准。

在台湾诈骗市场越来越小后，台湾的诈骗团伙开始把眼光投向海峡对岸。

骗术西进

今年2月25日，在刑事局与高雄市、台中市等地警方联手的一次抓捕行动中，36岁的汤振雄（化名）在台中落网。

汤振雄原本是在大陆投资的台商，金融危机袭来，汤在大陆的公司难以为继。本来决定认赔返台重新开始，但在大陆赔了那么多钱，汤实在不甘心，于是干脆以台湾为据点从事诈骗，并把诈骗对象锁定在海峡对岸。

被拘后，汤对警方坦白："一方面，大陆人民对于诈骗电话还没有很大戒心；另一方面，也算是从大陆把当初赔本的钱骗回来。"黑白颠倒的理由令警员们啼笑皆非。

虽然生意场上失败，但诈骗行业里的汤振雄倒成了非常"优秀"的CEO，他把企业管理的方法运用到自己组建的诈骗集团中。

对"公司员工"，汤严格监控上班纪律，准时上下班。员工们被严禁与外界联系，以确保集团作业机密性。各据点门禁控管森严，非集团成员绝对无法进入该集团据点。而且集团内部结构缜密，福利完善，外地前来从事诈骗的成员，由集团提供食宿。员工的薪资采用奖金制度：一旦诈骗得手后，第一线的"中国电信客服人员"从诈骗金额中抽得5%奖金，第二线的"各级领导"从中抽取7%奖金，其余金额作为老板获利，用以支付各项设备、电信、水电、租屋、食宿等费用。

严格管理下属外，汤的集团还拥有良好的"企业文化"。该集团搜集到大陆公安机关、检察院、人民法院电话及地址，并拟定了一册《诈骗用语教战守则》供内部学习。汤专门以昔日在大陆经商的经验，训练下线员工们习惯大陆用语及口音。

为了更好行骗，汤还经常和另外两个诈骗集团的负责人分享设备，交流诈骗技术。

他们的诈骗采取流水作业：第一步，由一线女成员假冒中国电信公司客服人员向被害人讹称其名下申请的电信门号未缴费，可能是遭人冒用身份申请了电话，并建议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随即，将电话转接至第二线假冒的"大陆警方工作人员"，告诉其身份被冒用的情形将违

反“国家金融秩序法”，必须尽快将账户内的资金投保，并指示被害人前往ATM汇款——在对话期间，还以无线对讲机发出警频声及敲打计算机键盘发出的声音，假冒公安人员查询资料，以取信被害人。若这时被害人仍有疑问，再转由其他成员假扮金融监管局科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或人民法院法官等不同身份人员出面接受咨询，并要求被害者将存款汇款至诈骗集团在大陆收购的人头账户。

该案被破获后，台湾警方发现该集团在成立不到3个月时间内，骗得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

其实，在岛内，这样的诈骗手段早已“过时”。“电信欠费”是两年前流行于台湾各地的诈骗由头，也正因为这样，汤从一开始就将目标指向骗术远未升级换代的大陆。

比较这种以台湾为基地诈骗大陆民众的诈骗集团，早期的跨海诈骗模式其实是台湾诈骗头目将总部安在大陆，再对岛内民众行骗。

早在台湾诈骗最猖獗的2003年至2006年，不少台湾诈骗集团即选中离台最近的大陆省份福建——尤其是其闽南地区——建起总部。进入2000年，台湾移动电话业者为了改善金门等外岛的通讯，纷纷在金门搭建基地台，使得台湾和厦门等福建沿海城市可以直接用手机联系，且不产生漫游费。但没有想到，来自台湾的犯罪集团却抢先利用通讯便利，躲在厦门用手机指挥岛内成员作案。选择闽南地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诈骗团伙可以招聘懂台语的闽南人当接线生。

“这类隔海犯案，使得台湾警方的侦查工作格外棘手。”黄茂穗表示。一时之间，“台湾人以大陆为基地骗台湾人”的报道在台湾媒体中铺天盖地，不少台湾媒体呼吁大陆警方给予配合。

2003年，台湾警方侦破一个跨越两岸的超级规模“刮刮乐”诈骗案。据报道，诈骗集团首脑以福建厦门为诈骗总部，用手机指挥在台湾的手下犯案，至少有3000台湾人受骗，骗取金额逾11亿元新台币，其中包括不少退休公务员和高学历知识分子。

此后，台湾诈骗集团的犯罪动向引起了厦门警方的注意。2003年，厦门警方捣毁了24个台湾电话诈骗窝点，抓获73名涉案人员，其中台湾籍人员56名。

除了骗台湾人以外，这些诈骗分子甚至以大陆为基地，对韩国、新加坡甚至俄罗斯等周边国家民众实施诈骗。由于电信诈骗活动的受害者均在境外，深入调查案件十分困难，大陆警方也“十分苦恼”。

但没过多久，令大陆警方更为“苦恼”的现象发生了。这些台湾诈骗集团开始布局大陆，类似汤氏集团的“以台湾等境外地区为基地诈骗大陆人”的时代来临——台湾骗子们开始发现大陆是一个更大的“市场”，便将总部转回台湾，专门针对防范意识较弱的大陆居民行骗，同时派少数台湾人或直接聘用大陆当地人在大陆负责取款。

从此，大陆沿海居民开始经常接到操有闽南口音的电话告知自己“中大奖”、“购买汽车退税”，自己的银行卡莫名奇妙增加了“银行卡消费记录”，明明没买过六合彩却经常收到“六合彩特码”的短信，这些早已在台湾“过时”甚至淘汰的诈骗手段，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再度流行。

据警方提供的数据，2007年2月至今，福建警方开展的“猎狐”行动，破获此类台湾人组织的诈骗犯罪案件达1400多起，摧毁60多个以台湾人为首的虚假信息诈骗犯罪团伙。

全国蔓延

如同数年前将战场转移大陆沿海地区一样，一伺沿海警方风声加紧，这股诈骗风潮再度西进，从福建、广东等地蔓延到内地各省市。

进入2008年以来，每隔一段时间，大陆各县市的都市报上都出现“台湾诈骗团伙”报道。

“以前负责取款的诈骗团伙成员基本集中于福建的泉州、厦门、漳州，广东的深圳、珠海和广州，共6个城市。但是近期我们发现，骗子们的取款地点已经向内地省份蔓延。”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反诈骗专家金大志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初步侦查显示，如今湖南的邵阳、长沙、娄底，湖北的武汉、鄂州、随州都已经出现台湾诈骗集团内地取款人的踪迹。而在个别诈骗案中，骗子在境外遥控作案，“取款地竟已转到了泰国、越南等周边国家，这也对警方侦破案件、追缴赃款制造了障碍”。

金大志还向媒体介绍，北京地区的“电话欠费”诈骗案最早出现在2008年春节前后。当初骗子只是冒充电信局工作人员，骗局比较容易识破。随着犯罪团伙不断丰富骗术，发展到后来冒充警察、公证处，现在又开始冒充法官、检察官，令上当者不断增加。截至目前，全国个人被骗数额最高达600万元人民币。

最令人惊奇的是，有案例中，被害人电话上显示的竟是“10000”等电信公司服务号码和公安局号码，令不少人信以为真。台湾的黄茂穗办

案多年，也不由惊叹，不少诈骗集团通过吸纳高级技术人才甚至法律人才，已使骗术达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境界，“让被呼叫人的手机来电显示变成警方、检方、银行或电信服务部门的号码，绝对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他们甚至会伪装成‘反诈骗中心’行骗！”大陆著名法律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称，“有些诈骗集团制造的电话背景噪音惟妙惟肖，比如在办公室里安放几十部对讲机，发出各种模拟报案的对话声音，让人觉得他们就是警方。境外诈骗集团会不断研发新骗术，加大科技投资，而这种‘标准化’作业的骗术很容易复制，几乎以几何级数增长。”

跟台湾一样，大量的大陆居民个人资料外泄也是助长诈骗案的因素之一。前述被破获的汤氏集团，其掌握的近5000笔大陆地区人民个人资料包括手机号码、金融账户资料等。而王大伟所称的“极容易复制的骗术”在他们的“诈骗标准手册”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手册采取问答形式，连在何种情况下回答“是”、“不是”以及“对”都标得一清二楚。

两岸联手

台湾诈骗集团在“人员西进”的同时，也不断输出诈骗技术。“因此，出现了不少大陆诈骗团伙由台湾人组建的情形。”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的常务理事、曾受理过多起涉台诈骗案件的知名律师夏卫对《凤凰周刊》表示。

王大伟的研究显示，起初这些诈骗团伙是诈骗“自己人”，后来开始诈骗大陆民众，再后来东南沿海的本土诈骗团伙开始形成，并与这些境外组织联系在一起。

而位于台海西侧的福建泉州安溪县的诈骗团伙可能是最早开始“自立门户”的。此地一度成为大陆“本土系”虚假信息诈骗罪犯的重镇，直到去年情况才有所改观。

也正是在“本土系”越来越猖獗的情况下，两岸警方的联手合作也越发显得迫切。在夏卫律师看来，台湾建立的反诈骗机制比较完善，很少出现类似受骗人数如此众多的诈骗案件，这值得本土学习借鉴，以防更新换代的诈骗手法在大陆被复制。

不过，在两岸警方看来，跨海诈骗最让他们头痛的地方在于，在这种共犯结构中，罪犯远在对岸，遥不可及。

黄茂穗表示，过去几年，刑事局与广东、福建等大陆沿海省份公安单位都有直接联系管道，彼此还会互访，主要是交流经验，并就个案侦办提供协助。但两岸的合作并未形成机制，合作仅止于“个案协查”，司法互助存在巨大缺陷。当受害人为台湾居民时，大陆警方难以向受害人调查取证，大陆法律也难以追究台湾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诈骗集团窝点在台湾，受害人为大陆居民时，警方只能抓到负责细节的下线人员，台湾籍犯罪嫌疑人往往无法缉拿归案，被骗赃款难以追回。

1990年9月，两岸红十字会（当时海协、海基会尚未成立，红十字会是充当两岸“白手套”的单位，编者注）签署了《金门协议》，开启了两岸司法合作形态。但当时的协议仅止于互相遣返刑事犯。据台湾警政署最新统计，从1990年截至去年底，经大陆公安部门协助逮捕并送交台方处理的刑事犯有205人，其中重大诈骗犯87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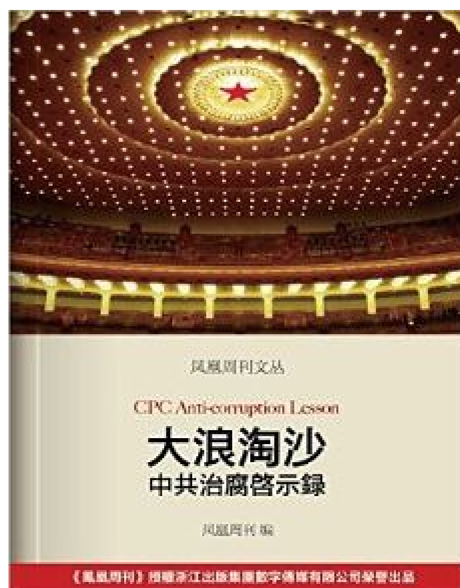
2009年4月26日，第三次“陈江会”登场，两岸签署了三大协议，其中《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将成两岸司法合作的里程碑。该协议涵盖了“设置犯罪情资交换平台”等6大部分，而资讯交换正是缉查跨境跨界犯罪中最重要的环节，两地警方将据此进行即时犯罪通报。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刘德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协议签署后，两岸最大宗的犯罪案件，也就是电信诈骗，将难以继续生存，过去无论是以台湾为基地诈骗大陆，还是以大陆为基地诈骗此地的方式，都将因两岸合作而难以为继。”

不过，情况也许难以迅速乐观起来。事实上，台湾法律对于诈骗犯罪量刑过轻，也是歹徒一再铤而走险的主因之一。对诈骗犯来说，在台诈骗根本是“低风险、高获利”的犯罪行为。依据当地法律，若非多次犯罪，诈骗犯最高只判罚5年监禁，一般在3年以下，一线作案的从犯更常常以罚款了事。因此，在台湾刑事局近期于高雄市破获的一个案子中，会出现诈骗集团数十名成员在被带回警局的路上打打闹闹、毫无担心的情形，直至被警察斥喝“怎么不知羞耻”嫌犯才知收敛。

因此，有关方面指出，在此次“陈江会”达成的协议之下，两岸相关技术部门未来可能会探讨更为深入的合作细节，包括刑责抵押等深度司法互助及司法领域的全方位合作议题，而不仅限于打击犯罪。

精彩推荐：凤凰周刊文丛：大浪淘沙——中共治腐启示录



点此阅读

第十八篇 台湾选战拼创意

特约撰稿员/Bonnae

选举并不复杂，并不麻烦，基层群众并不是不懂。

2008年台湾大选，在许多方面创造了台湾选举史上的第一。国民党重新执政，完成了民主体制下完整的政党轮替，两岸关系的新格局有望开启。在此次大选中，更为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五花八门的选战方式。

随着新媒体的盛行，如何吸引对政治冷漠的年轻人行使投票权，是此次蓝绿阵营十分注意的重要环节。别出心裁的选举创意通过传统媒体，并与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结合，起到了飞天遁地般的渗透力，着实为枯燥的政见、无聊的口水增加了不少夺目的光彩。

蓝绿砸重金 攻陷电视台

自从台湾开放“总统直选”之后，电视就成为所有候选人必须拿下的传播渠道。候选人用形象的画面和感性的肢体语言，抓住了无数选民的眼球。很多默默无闻的候选人经由出色的包装和通俗、亲和的选民印象一战成名。

相对于马、谢的高知名度，电视的意义已经从混个脸熟上升到了用平民化的视角向观众解释深奥、艰涩的政见，同时双方都少不了攻击对手的负面文宣。就在农历新年后，马英九推出了众多广告中的一则——大陆人称之为“孔明灯”的天灯，成为很多朴实的台湾人手中的吉祥物，他们在孔明灯上写下新年愿望，祈盼“直达天听”，保佑愿望实现。

经过前期的铺垫，片尾的字幕打出马英九的“六三三”政见。这则广告一播出，瞬间引发民间的共鸣。不过，选举文宣毕竟不会总是温馨、感人的。围绕马英九的特别费、谢长廷高雄市长任内的腐败、一中市场的争议等发烧话题，双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更是在第二场候选人电视辩论会后，立刻推出剪接后的马英九前后反复的政策宣示，继续猛攻开放一中市场的弊端，是为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上乘之作”。

除了在电视广告上互别苗头，由中央社、《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苹果日报》等主流媒体主办的电视辩论会，也是本次大选文宣公关战的看点。第一场辩论，主办方公共电视台运用网络公民提问的模式，招徕网民对候选人的提问，最终筛选出20个公民提问，在辩论会上依次得到候选人的回答。较之以往纯粹只有主办方和参

选人幕僚“暗箱操作”的旧招数，公民提问开启了“总统选举、全民参与”的先河，民主投票的权利已经由注重结果转到了过程、结果并举的全新阶段。

另一方面，由谢长廷竞选总部掏钱买断电视时段、自己制播的《挑战谢长廷》也是台湾“总统直选”以来的第一次候选人电视文宣。谢长廷不仅重金买下被认为高度倾向蓝军选民的电视台时段，还邀请多位参与过倒扁的绿色学者，用座谈会的形式接受学者们辛辣、刻薄的提问，尤其针对陈水扁与谢长廷之间的关系，以及如果当选，如何纠正扁政府八年来的乱象一一作答。只不过，这样刻意为之的动作，被舆论广泛解读为主动切割陈水扁，以理性、中道的谢长廷，平衡掉选举造势场合激进、市侩的谢长廷，可谓用心良苦。

新媒体崛起 选战新武器

部落格（大陆称博客）是时下台湾年轻一族维系人际网络的重要渠道，马、谢当然不会落于人后。只是他们玩博客的目的就要复杂多了，既要拉近与年轻选民的距离，分享人生经验，回应重大问题，又必须兼顾新媒体的互动性。谢长廷前不久面对一群大学生时就自爆会抽空去PTT（批踢踢实业坊，台湾最大的网络论坛）闲逛，看看是不是有大学生“偷着骂”他。网络相比传统媒体更大的优势还在于许多创意、火花能够活灵活现表现出来，类似MSN符号、Flash、恶搞视频等都充分发挥了网络得天独厚的优势。

不仅网络激战正酣，就连手机吊饰、公仔、玩偶、对杯、抱枕都成了各自支持者争相追捧的周边商品。许多年轻的蓝营支持者争相购买、赠送名为“九万”的手机挂坠。其中的“九”和“万”是马英九和萧万长的名字。这只麻将牌，是不折不扣缩小比例的九万“麻将牌”，只不过将常见的绿底换成了“蓝底”。

催生“九万”的，是马萧总部的青年军。最早只是打算作为青年军的“头衔”，后来觉得九万太逊，好歹也得吹个“百万大军”，众人后来发挥商场行销创意，脑筋就动到了“144号文件”上，于是把真的麻将“九万”依比例缩小，化身成为手机吊饰。

如果觉得手机吊饰不够看，遍布于街市的卡通版、网游版海报也是不错的选择。其中有一张是马英九化身网络游戏中的男主角，以贴近玩家的心理状态量身定做的竞选海报，稍不注意，他的逼真程度丝毫不亚于专业网游的宣传封面。

也有小脚委员会

在正规军集团作战的后方，游击部队的行动也关系到选战的走向，特别是中南部选民普遍对谣言的分辨能力较弱，蓝绿双方都绞尽脑汁、搏命演出。对于民进党，由于中南部长期存在地下电台，而且多数听众知识水平有限，制造话题、打擦边球往往就是他们的任务。最近热炒的一中市场、“马萧卖台集团”都是地下电台的杰作，他们利用简单易懂，甚至是粗鄙的俚语来阐释复杂、拗口的候选人政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南部农民的投票倾向。

面对民进党的执政优势，加上国民党日益凋零的基层党组织，马英九先后建立了国民党青年团和马萧青年军。每每遇见一群年轻人洋溢着青春活力、朝气蓬勃的队伍，南部人都会好奇地张望，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间，游走在热闹集市之中，发挥着国民党地方党部远远无法匹及的魅力、亲和力。

当然，有了青年军的马英九，不会就此满足。2006年10月，他萌发了组建一支由婆婆妈妈为主力的“土豆志工团”的构想，并迅速于2007年3月3日誓师。这路编外游击队已在各乡镇建立组织，目前以台中市为例，就已有77个分团，1540个团员，民进党的“民主圣地”宜兰县，“兰阳分团”已超过300个成员，台东、高雄、嘉义均已各自成立了数十个分团，而他们的总领队是马英九的心腹、前台北市副市长叶金川。

这群资深马迷以女性成年公民为主，她们带有在家赋闲的“姐妹淘”到竞选总部参与团体生活，打扫，接电话，交流厨艺、弄孙心得、养生之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选后，这群姐妹依旧相聚，马英九若行程排得出来，通常都会和她们相聚。其后，组织系统进一步扩大，发展到南部时，特别盯住家庭主妇最集中的菜市场，婆婆妈妈们此时摇身变成“菜市场夫人”，以聊家常的方式扑灭社会上流传的谣言，阻止地下电台毁马宣传的效应扩大。

2008年的总统大选创造许多个第一次，也颠覆了以往人们对选举模式的想象，那么新鲜事物、新奇手法到底有多大功效？2008年大选的最终结局就无言地说明了这一切。选举并不复杂，并不麻烦，基层群众并不是不懂，只要愿意，选举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第十九篇 台湾物业管理的“居家宪法”

撰文/昭君、杨素

台湾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赋予管委会的权限非常大，甚至赋予管委会决议坏住户强制迁出的权力，对住户具有相当的约束力。

大陆近年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以社区为单位的公民社会，惜乎相关立法并未有所体现。而隔海之台湾，则早已完成相关立法动作。

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刚起飞，传统平房、透天厝等独立门户的住宅形式转为四至五层楼无电梯的公寓。但随着地价飙涨，房子也越盖越高，1990年代初期，七至八层楼渐次林立。在很多新开发的小区，已有逐渐取代公寓之势，根据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统计，到1990年代中期，已有80%的台北市民住在大厦中。

随着集合式住宅成为住宅新主流，邻里间不再只是守望相助关系，还有更多权利义务须当厘清，避免住户间彼此不愉快或是争执的事件。在这种实际需求的压力下，有关部门只能前瞻性地预先看到问题，推动立法，让住户间的权利义务仲裁有规则可寻。

台湾在1995年之前，和公寓大厦最密切相关的法律，大概只有《民法》第799条的规定：“数人区分一建筑物，而各有其一部者，该建筑物及其附属物之共同部分，推定为各所有人之共有，其修缮费及其他负担，由各所有人，按其所有部分之价值分担之。”但这只简单处理共同部分所有权及修缮分担问题而已，不足以应付一栋少则30余户，多到上千户的复杂多样的公寓大厦管理问题。

台湾内政部出面汇整多部相关法规与单行办法，推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草案）》。1995年6月，经立法院通过，台湾公布了这部有“居家宪法”之称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并号称是部相较西方国家都要更为先进的“进步立法”。

台湾立法委员称该法具有“民法物权立体化、敦亲睦邻法律化、管理组织民主化和公共安全入刑化”4项特质。至此之后，台湾的公寓大厦管理才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可用，也让台湾地区，尤其是大台北地区的住宅居家质量的软硬件维护，逐渐依规则而步上轨道。

这部条例针对几个关键问题作了明确的规范。首先是所有权的问题，由于公寓大厦属于同一立体空间而划分出数个住户所持有所有权，

故称这种所有权为“区分所有权”，至于所有权人就称为“区分所有权人”。

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中，特别将公寓大厦的所有权主要分成“专有部分”和“共享部分”两种。前者是指住户各自拥有供自己独立使用不受他人打扰的空间；后者则指可供住户共同使用的空间，俗称“公共设施”，例如供住户进出的门厅、中庭花园等。

该条例特地强调，各公寓大厦必须强行设置“管理委员会”，负责集合住户内的公共事务管理规范问题。管理委员会的权限上至干预住户的产权，甚至包括拆除各种违法隔间、加建和任意变更使用用途，下到宠物问题，只要和公共事务有关，管理委员会都管得着。例如住户想要养狗，但如果通过住户公约决议，认定宠物不能养的话，当然就不能养。

另一方面，该条例更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传统连带关系败坏的问题，希望借法令形成新的小区意识，提升守望相助与居民权利意识，并达到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借集体力量从源头开始拆除埋藏在大厦里的治安、安全的不定时炸弹，以提供合法住户的安宁空间。

被认为是建筑与交通管理专业民意代表，并曾担任台北市六福皇宫等重要指标建筑主建筑师的台湾亲民党立委李鸿钧表示，该条例中扬弃了政府主导公寓生活管理的想法，把自主权还给一般平民，也就是大楼中的实际住户，让住户以协调、协商的方式自主管理，处理争议。

李鸿钧表示，台湾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是相当符合中国人社会性格的立法，外国一切依法论法、有问题法院见的社会惯例，会让中国人觉得压力很大，百姓对打官司能免则免，类似争议处理模式也很难在中国社会中执行，反倒是以小区为发动源的协商模式，由群体对个人施加压力，在台湾出现很好的效果，其他国家的小区管理、公寓大厦管理也渐渐有采用这种多数协商模式的趋势。

该条例用法律清楚规定住户须受集体规范的事务，当建筑物所有权登记的区分所有权人达半数以上且区分所有权比例合计半数以上时，开发商就必须依法在3个月内召集区分所有权人成立管理委员会，没有任何例外。

负主管职责的管委会，最主要干部有3名：主任委员、财务委员和总干事，其中主任委员和财务委员一定要由住户出任，总干事可聘专人担任。由于总干事是实际总理小区事务者，台北市台北县等地方政府，还会定期举办总干事讲习训练，提供专业交流机会。

至于小区里的公共设施是区分所有权人共同所有，但也要共同管理，除了水电、清洁等经常性支出，一般公寓大厦电梯的使用年限是20年，时间到了就必须要更换，若届时才向住户收一大笔钱，难保不会有人拒缴，因此平常就要累积公共基金应付大额修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正规范了这项公基金机制。

对于拒不履行义务的坏住户要有强制执行机制，这部法律甚至赋予管委会决议坏住户强制迁出的权力，管委会的权限非常大，对住户具有相当的拘束力。他并指出，法规清楚完整是世界各国房地产投资的重要基础，唯有与住户关系最密切，也是最长久的小区管理能落实，才能确保小区质量与秩序。

由地产开发商提拨小区的公共基金制度，是台湾公寓大厦条例中用以小区自主管理的核心财源。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建筑商在取得大楼使用执照前须提拨一定比例经费给大厦所有权人会议设置的公共基金，未来大楼住户的管理费，也必须转入这个由管理委员会控管的基金中。这笔公共基金，将用来支付公寓大厦共享部分、约定共享部分的修缮、管理和维护。

住户积欠管理费或行径恶劣，往往是大楼管理最头痛的问题，引发纠纷或是小事，如果住户屡劝不听，甚至肆意改建、违建，危害到公共安全，就成为性命攸关的问题。在台湾，管委会为了避免这种恶邻居的嚣张行为，可以依法诉请法院强制迁出，甚至声请法院拍卖房屋等强硬手段，用以避免问题持续恶化。

依法住户只要积欠费用逾二期或达相当金额，管委会就可以展开催告程序，寄邮局存证信函催告区分所有权人缴费，然后向法院起诉，或请法院发布支付命令，这就到了属于私人间债权债务纠纷的民事诉讼。一般而言，如果区分所有权人无法证明自己已经缴清管理费，依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多半是区分所有权人败诉。

加上中国人不喜欢打官司，在实务上，通常走到存证信函这一步，就显示管委会的态度强硬，欠钱的区分所有权人就会知难而退，乖乖缴钱，否则等败诉时，不只该缴的钱少不了，还要支付延迟利息。当然也可以由管委会发函至县市政府工务局使用管理课，请求其发函给欠费住户，依违反《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规定处以罚款。

此外，《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最具威力的条文之一，就是所谓强制迁离的法律规定。社会上的人千奇百怪，当然偶有恶劣的住户会拒不执行法院裁决，或是隔一阵子又故态复萌，不过为了避免恶客危害，依法

只要是经强制执行后再度积欠金额达其区分所有权1%者，在管委会促请改善3个月内未改善者，管委会得依区分所有权人会议之决议，诉请法院强制其卖房子、搬家，最严重者，可声请法院拍卖房子。

这种要求住户出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主要是针对积欠公基金及相关费用，或是违规情节重大又不改善的住户，因此被称为“恶邻条款”。至于行为恶劣的租屋者，则可以“强制搬离”，要求法院强制承租人搬离住所。

第二十篇 台湾的十月

撰文/蓝博洲

那天下午，在办公室写稿，忽然，一阵《义勇军进行曲》的乐声，从远处逐渐传来；还在莫名所以时，从窗口看到一辆插着五星红旗的灰色小汽车，正穿越不远处的十字路口。这是怎么回事？我讶异地想着，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日历：原来今天是10月1日。

问题是，在两岸关系外弛内张的此时此刻，是什么人敢这样旗帜鲜明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呢？我望着窗外茂盛的台湾栾树遐想着。天气刚刚有点凉意。栾树的绿叶上衬托着一簇簇色彩艳丽的花儿，随着偶尔拂过的秋风婀娜款摆，煞是好看。

是啊！10月，是美丽的；10月，也是台北最舒适的季节的开始；而10月又是光辉的！在反共戒严时期（1949～1987），“光辉10月”是最受台湾地区学生欢迎的月份；因为10月有“普天同庆”的双十节、台湾光复节和蒋介石（从“总统”到“故总统蒋公”）诞辰纪念日3个额外的假日。只是，一直到今天，这“光辉10月”的第一天却还是禁忌的日子。

2000年政权变色以来，台湾的“光辉10月”早已不再发光生辉了。所谓“故总统蒋公诞辰”的纪念假日被取消；台湾光复节被易名，“光复”变成“终战”；到了今年的双十节，“中华民国”的字眼也几乎完全消失。

自从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以来，在“双十”期间，台北国府总要在那座彷如殖民者阳具般插向天空的所谓“总统府”塔楼上，悬挂“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的字样，可今年它却被“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广告牌推翻了。台风过后的10月10日，天空是阴沉的，低气压依旧笼罩着海岛，当陈水扁不得不以他否定的“中华民国”的“总统”身份发表谈话时，除了一开始提到“今天是2007年的双十国庆”之外，整篇讲稿全部以“台湾”取代“中华民国”原有的位置；当他谈到“中华民国”的时候，也是以负面的态度来对待。

针对政敌说他“想要消灭中华民国”的批评，陈水扁刻意引用蒋介石1950年“复行视事”时说过的一句话——“中华民国随着中国大陆的沦陷已经覆亡，我们都是亡国之民”加以反击，然后强调：消灭“中华民国”的是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台湾的存在，才让蒋介石能够用“中华民国”借壳上市。他还借题发挥说，“中华民国”创建的时候，台湾是日本殖民地，因此“中华民国”并没有包括台湾。

的确，中华民国创建的1912年，台湾早就割让给日本了。这是谁都知道的历史。即便如此，殖民地台湾的人民却依然心向祖国。从1907年起，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形势影响下，坚持传统的汉民族意识的台湾人民，继1895年至1902年的武装抗日游击战之后，又分别进行了6次比较有组织的武装抗日起义，其中以具有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的罗福星领导的苗栗事件（1913）最有代表性；通过这个事件，殖民地台湾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从此开始与祖国大陆的革命运动相联结。

1937年中华民族展开全面抗战之后，台湾青年纷纷冒着生命危险，间关万里，潜回大陆，寻找重庆或延安的抗日根据地，积极投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台湾的解放寄托于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我曾经采访过的苗栗山区几名客家农民的故事就很能说明历史。当年，这几名农村青年基于“中国是我们的祖国，希望祖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意识，从抗战爆发第二年起的10月10日，总要设法聚在一起庆祝。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他们迎来国民党所代表的“白色祖国”，也同时面临贪污腐败的接收官僚带给他们一度幻灭的祖国像而苦苦地思索着台湾往何处去的苦闷；历经1947年“2·28”事变之后，如同广大的台湾青年那般，他们终于通过对内战中国政局的进一步认识，重新找到新的身份认同，迅速投入以全中国的民族解放为志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10月1日，在山区流亡的他们通过收音机时断时续的音波，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其后，美国第七舰队阻断了海峡。他们也终究难逃遍布全岛的“扫红”天罗地网，被捕入狱，并且以“叛国”罪名判处死刑或15年以上的徒刑。即便如此，那些幸存者依然高声唱着“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的歌，为就义者送行。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台湾海峡依旧波浪滚滚，暗潮汹涌。历史留给两岸中国人的台湾问题依旧没有解决。长久以来被政治野心家玩弄历史浪涛而打晕了头的台湾人，于是就像精神病患者般，到了季节变换的10月，总要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发作起一时错乱的妄症！

第二十一篇 百万台湾老兵归乡内幕

特约撰稿员/彭佳予 王丰

老兵返乡探亲，掀起台湾民众寻根之旅的高潮，岛内民众的眼界心胸也随之愈加开阔。那群逐渐消失中的“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老兵心中，是不是有着“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感伤呢？时代伤痕的隐痛，何时得以愈合？

前不久，外省台湾人协会在“光点台北”举行大型展览，纪念台湾开放居民赴大陆探亲20周年。1987年10月，在国民党退伍军人的经年努力下，台湾当局宣布“荣民弟兄”可以返回大陆探亲，结束了两岸近40年不相往来的历史。

1949年，蒋介石的部队在大陆败局已定，百万大军跟随蒋介石进入台湾。百万大军，意味着超过百万家属仍然留滞大陆。岂料，这一别就是40年。

40年，青丝早成白发。这40年中，国民党军人上演了一出当代台湾最无奈的悲剧。在无数个孤寂的夜晚，人们可以听见岛上千万声难眠的叹息，像海峡的潮水一般难以平息。

1987年10月14日，蒋经国掌控的国民党中常会，决定终结乃父制造的这些数不清的人伦悲剧。走了40年返乡路的老兵们，至此才真正踏上归途，也正是他们，启动了两岸关系和经贸往来的前奏。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固然我们革命事业今天是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我们在一年以前，有500万的军队，而现在只剩下50万。我们去年拥有全国2/3以上的土地，而现在缩小到台湾一省。”

“我认为台湾地位，无论国际上如何变化和联合国态度如何，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归我们政府所统治。何况我们政府在台湾有80万人的陆海空军，这就是一个事实。”

蒋介石刚刚撤退到台湾之时，在1950年的几场讲演里，几次提及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竟然至少有3种以上不同版本的数字：50万人、80万人与100万人。蒋后来又声称国民党在台湾有60万大军。

姑不论国民党军队的准确数字，这“百万大军”或者“50万军队”，都是蒋介石从大陆调集到台湾的天真无邪的年轻人。这些年轻小伙子，十

之八九是单身汉，到台湾之后，举目无亲，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因为长年战乱，这些孩子们多半没受过高等教育，有的人甚至目不识丁，拥有中学水平的，已算是其中佼佼者。

一旦脱下两尺半军装，这些囊中羞涩而身无长技的年轻人，便四顾茫然。早年军人退伍离开部队时，只领一顶蚊帐，包袱里塞几套换洗衣服，一张单程火车票和几百元新台币徒具形式的“退伍金”。

在当时的台湾，这些钱只够两三个月生活开销，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些孤独的灵魂，不知如何立足于陌生的热带岛屿。除了少数闽南籍的老兵，对大多数大陆其他省份的老兵而言，台湾的语言、风俗、民情都异于大陆。

初来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闽南话。更可悲的是，由于台湾社会长期沉埋着“2.28事件”的省籍仇恨，台湾本地人私底下以“老芋仔”的贬抑称呼，泛指所有的大陆籍退伍老兵及大陆籍人士。

“老芋仔”在闽南话里，和“老黑仔”发音相同，这“老黑仔”的叫法又隐喻“猪仔”。可见这些退伍老兵当年从部队进入人海茫茫的台湾社会，他们的内心是如何的彷徨无助，受到歧视对待时，又是如何的孤立无援。

来自大陆各省的退伍军人，这百万之众的“失根兰花”，像浮萍般漂洋过海，离家时不过弱冠之年。一般人的弱冠之龄，正是黄金岁月，然而，这些追随蒋介石到台湾的第一代国民党军，受限于当局早年之军人禁婚规定，许多人终生未婚，更遑论养儿育女。

在那个两岸敌对、天天喊打喊杀的年代，台湾地区军民稍与大陆方面联系就有可能被冠以“匪谍罪”论处。小吴是“外省第二代”，他的父亲是军人，当时只能偷偷摸摸地从海外亲戚那里辗转得知老家的事情，稍解乡愁。

有些老兵想跟老家通信，一是台湾当局禁止，二是大陆重新进行过行政区划，记忆中的地址已成历史，连只纸片字都传递不到朝思暮想的亲人手中，返乡探亲是难如上青天的奢求。诗人余光中写过，“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这样的诗句抚慰不了老兵，却是老兵的集体哀怨。

何文德是“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的会长。他回忆说：“那时请他们（华侨）回家经过香港时，帮我把信丢到邮筒里，就是这样和家里联络上的。”除了透过与大陆一水之隔的香港，美国、日本也是外省老兵转

信的中间站，“大信封里的小信封”，是外省人的共同记忆。

“有家归不得，无处问死生”，是当时老兵们的无奈。毕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娇妻美眷无法相伴，“反攻大陆”的声音日渐稀少。老兵们只能自力救济解决问题。当时的电影《老莫的第二个春天》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老兵老莫“买”了原住民少女玉梅为妻，但年事已长的他无法吸引年轻的玉梅，而正值壮年的瓦斯工人金树则对玉梅产生爱慕之意。老莫有意成全金树与玉梅，但玉梅终以老莫淳朴善良而情归老莫。电影以喜剧收场，但真实生活远比电影惨烈。

原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去世前不久，写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这首题为《望大陆》的诗，正是数十万退伍军人的心声。

国民党安抚无效

长期严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三不政策的国民党当局，早年惟恐退伍军人离开台湾，偷偷回到大陆老家，担心他们一去不复返，致使台湾兵员缺额，没有人为国民党打仗，影响到台湾当局的“安全”。

因此，以严刑峻法禁止退伍军人返回大陆家乡，长期以来始终是国民党当局牢不可破的基本政策。最早，蒋介石担心假如不妥善安置退伍军人，恐怕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影响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成立了“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辅导会成立初期，当局还争取了不少美国军援经费，投入相关设施和工作项目。

闻名海内外的台北“荣民总医院”就是一个最具体的例证。此外，安置单身老兵的全台各地“荣民之家”，更如同官办的养老院，提供了老兵颐养天年的最佳园地。

但是，不准老兵返乡，长期压抑的结果，终于把老兵积压心底二三十年的怨气，一股脑全发泄出来。中国历朝历代，有哪一个政权，不准自己的人民回家？中国有那么多的独裁君主，纵使再怎么残暴不仁，也不敢禁止黎民百姓回自己故乡。

一个政权竟然能够“划海而治”，不准许人民越雷池一步，禁止人民回故里和亲人团聚，如此的政治局面，亘古未有。

蒋经国是辅导会的创会副主任委员，第一任主委是从来不出头的严家淦。第二任主任委员就是蒋经国。对“荣民弟兄”的安置和照顾，向来是蒋经国自我期许责无旁贷的任务。他曾亲自带领退伍的“荣民弟兄”，修筑台湾著名的中部横贯公路，直到蒋经国正式接班，脍炙人口的台湾“十大经济建设”，犹处处可见退伍老兵流血流汗，老兵为台湾的经济建设与经济奇迹，立下了汗马功劳。

逐渐进入垂暮之年的国民党老兵，再也按捺不住内心澎湃汹涌的想家心绪，思乡心切却有家归不得。受当年走街头抗争路线的民进党党员启发，这些一辈子忠于国民党当局的老兵，也模仿民进党群众，不断透过街头示威抗议、议会陈情、媒体喊话等等呼吁途径，向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强烈要求准许老兵回大陆老家，与亲人团聚，落叶归根。

返乡运动系民进党推动

2007年6月，当时推动老兵返乡运动的灵魂人物重新齐聚一堂，忆起1987年4月，他们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老兵们穿的白色衬衣，正面印有鲜红色“想家”，后面是“妈妈我好想你”，在街头上散发了8万张传单。

他们只不过是要找回亲情，但是在当时这个运动被视为大逆不道。老兵何文德遭行政院退辅会人员围殴，被骂“台独分子”、“没有反攻大陆，怎么可以返乡探亲！”当年的要角之一姜思章回忆说：“连想家都是罪名！”他为这场老兵返乡运动撰写了文宣：“想回家，怎么办？”这句话打动了很多人。

那一年的母亲节，老兵首度集体以“母亲节遥祝母亲”的名义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大会。当一整排的“想家”在台上一字排开，台上台下哭成一团。他们展示着“捉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等标语牌，合唱歌曲《母亲你在何方》：“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经过那万里可能看仔细。雁儿呀，我想问你，我的母亲在哪里？”斯情斯景，在场者无不动容。

这就是“老兵自由返乡运动”的缘起。这个运动台面上的主角是老兵，幕后的推动者却是范巽绿、杨祖、许国泰等民进党人士。他们号召老兵打破“绝对服从”与“忠党爱国”的政治信仰，向当权者要求自己的权利。

老兵返乡运动对国民党形成莫大压力，姜思章回忆说，再大的权力

也不能阻挡想家的亲情、回家的人性本能。加上当时社会的同情，不分党派、不分省籍的群众支持，因而终能促成返乡探亲的开放。而当时整个台湾的政治氛围则是国民党在不久前已宣布了解严、开放党禁、报禁。

当时台湾媒体对于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亦持支持态度，1987年《中国时报》在社论中明确呼吁："此间人民或由于有亲人在大陆，或由于向往大陆河山，乃多循各种管道从国外前往大陆，政府主管机关，亦无从禁止。据估计至少已超过1万人，而在安全单位有记录的，亦达4000余人，因此我们认为此间人士如确有探亲、扫墓等需要，经过事先核准没有安全顾虑者，应规定时限准其赴大陆。"

1987年8月，台湾《自立晚报》报道了一份民意调查，认为民众前往大陆探亲"早就应该开放了"的比例达到64%，"现在正是适当的开放时机"亦达24.6%。此一数据显示老兵的诉求已成为"普台价值"。

蒋经国开放探亲

一位接近蒋经国的人士，亲口告诉笔者，有关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所引爆的一场台湾政坛风暴。

1987年5月，由于大批"荣民弟兄"聚集在"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门口，并且和辅导会的安全警卫人员发生肢体冲撞。重病缠身的蒋经国，在病榻上听闻老兵冲击辅导会，对辅导会主委张国英的临场处置颇为不满。

蒋经国向人表示，"荣民弟兄"是建设台湾的功臣，怎么可以不理会他们的情绪反应，一味弹压抵挡他们想返乡的情绪呢？

他一方面决定立即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同时决定撤换张国英。蒋经国自忖无法再以任何理由禁锢人民回家的大门，被迫宣布"荣民弟兄"可以探亲的名义，返回大陆老家。

消息发布之后，全台湾近40万老家在大陆的老兵，心中无不欢欣鼓舞。千盼万盼，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家了。

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堪称少数了解蒋经国决策心路历程的国民党高层之一。他在《见证台湾》一书中回忆说，蒋经国召集有关大陆探亲措施的会议，指示开放老兵探亲不必加限制条件，以尽量放宽为原则，才能收号召效果。而从日本光华寮判决中共败诉时中共的态度来看，两岸关系紧张已达相当程度，蒋经国早已察觉，此时为缓和台海局势，出

此一招可能性至大。不过，李登辉也认为，此一分析是否属实有待查证。

1987年10月14日，蒋经国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有关探亲的决议案。主要内容如下：“反共国策与光复国土目标不变；确保国家安全，防止中共统战；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国民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之亲属者，得登记赴大陆探亲。以上两点送请行政院主管同志处。”

10月15日，时任内政部长的吴伯雄正式宣布行政院的决议案。民众赴大陆探亲，一年可有一次，一次3个月。美国国务院当日发表声明，对台湾这一举措表示极大欢迎。当日，《联合报》就开放探亲一事刊登40余位学者访谈录，同时发表社论《探亲迷雾拨清之后——兼谈大陆政策的相关问题》。

当日全岛上下无不欢欣。立委和学者举行集会，欢迎当局开放探亲政策，希望进一步放宽限制。当时，两岸根本没有协商管道，但是在双方都有意开放之下，台湾老兵终于突破长达38年的禁忌，可以名正言顺地返乡探亲。当日的民调显示，台湾地区民众13%的家庭在大陆有三亲等以内的亲人，其中12%的家庭已有人决定回大陆探亲，另有37%的家庭在考虑中。

10月16日，台湾经济部长李达海就开放探亲发表讲话称，对台湾厂商与大陆直接通商，将采取干预手段，予以法办。台交通部观光局当日决定，台湾旅游行业不得直接与中国旅行社接触，也不得直接带团进入大陆，禁止旅游行业安排或协助旅客进入大陆。显示出当局对开放探亲仍有保留，力争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台湾媒体记载，1987年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探亲登记及信函转投，当天预定上午9时开始登记，凌晨就人山人海，几乎冲破大门，办妥手续的多达1300多人。12月，第一批探亲老兵终于踏上返乡路。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作业，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就被索取一空。

1988年1月19日，由民进党人、现任立法委员王拓率领何文德、杨祖等25人组成的探亲团抵达北京。他们手持“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返乡探亲团”的小旗子，旗子上印着两岸地图，一群白鸽正由台湾向西飞进大陆，旗子的意涵当然是诉求和平。当时探亲团还仿贺知章诗句以自况：“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争传客从台湾来。”

民众拥抱，官方角力

大陆当局对于台湾老兵返乡探亲也抱着开放的态度。“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夫人陈香梅女士回忆说，“其实，台湾老兵回乡探亲也是邓小平先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老兵回乡探亲问题在台湾已经非常突出。在我第二次回国时，小平提议，可以先让在台湾的老兵回家探亲。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这样，我才去台湾，向台湾方面转达了这层意思。双方一拍即合。没有两年，就出现了台湾老兵的回乡潮。”

开放台湾民众探亲后，大陆方面立即响应，当时两岸官方依然遵循不接触的原则，中国旅行社、中国青年旅行社等民间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老兵在大陆的亲属，很多人接获中旅的通知，告知亲属回乡的时间。那时候，很多宾馆都给老兵打了折扣。

1987年10月15日，台湾行政院通过《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宣布自12月1日起，民众可赴大陆。就在宣布的前一天即10月14日，中国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探亲一事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对此表示欢迎，并“保证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并希望台湾当局也能让大陆民众去台湾探亲。

同日，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负责人发表类似谈话。10月16日，中国国务院即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其反应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随后，大陆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及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的负责人发表相关谈话。当时，两岸最热的话题就是探亲。同时，老兵回大陆探亲后，中共意识到这是两岸关系的巨大转折，从而也改变了一直以来秉持的台海政策。

1987年12月13日，香港《亚洲周刊》在创刊号中以《笑声泪影回乡行》为题刊发了封面文章。文章说，对国共双方而言，“探亲热”既是严峻的考验，又是难得的机运。文章援引北京一位西方外交家的评论说，“显然，这是蒋经国和邓小平演出的最后一出戏，可能会大大推动政治经济改革以至统一。但是要迈向对话，前途崎岖。”

对北京来说，主要的困难是如何说服台北，由局部“沟通”扩展为全面对话。分析家说，北京首先要自我克制，放弃传统的统战。因为台湾朝野对此的反应欠佳。而事实上，大陆在获知开放探亲之后，曾经举行过一系列统战工作会议。但其后在宣传上低调处理，并不热衷向探亲的

台湾民众宣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平统一”等口号。

而在台北，当局也曾试图对“统战”展开反击。国民党在当年年底，以“政治心理战”取代“反攻大陆”或“武力剿共”的旧调子。行政院长俞国华说：“我们已准备好发动一次攻势，不是用武器，而是用更有力的东西——思想。”俞承诺，给“大陆同胞一个比目前统治他们的共产制度更实际而吸引人的选择，那就是自由、民主、自由企业、法治”。

随后不久，大陆在中共中直系统内成立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作为早前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办公机构，并在国务院系统内仿照港澳办成立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计委副主任的丁关根为首任主任。随后，各个地方政府也都成立了台湾办公室。

几家欢喜几家愁

开放返乡探亲，对老兵来说固是一喜。但是，跟随而来的却是忧、是愁，甚至是更大的悲伤。小吴从小就听爸爸说，爷爷、奶奶应该早就作古了。可是，小吴的爸爸返乡探亲前，还是抱着那么一丝期待，希望海外亲友的转告都是错误的。

当时算来，如果小吴的爷爷、奶奶都还活着，也该是80多岁、接近90高龄了。但是小吴的爸爸少小离家，千盼万盼，总还是期待着见上他的父母一面；然则，结局只是印证了海外亲人的转告是真实的。小吴爸爸的第一趟返乡探亲之旅，竟是扫墓之旅。

小吴在眷村（即国民党帮老兵们安排的宿舍区）的儿时玩伴小张的爸爸张伯伯是山东人，在旧社会时当地有娶童养媳的风俗。那年，张伯伯带着张妈妈回到山东老家探亲，回台湾之后张妈妈闷闷不乐，小张则很“雀跃”地跟小吴说，“我竟然是爷爷辈了！”

原来，张伯伯老家家境富裕，张伯伯很小的时候就收了个童养媳，而且还生了孩子。两岸隔绝近40年，小张成了“爷字辈”当然并不意外，只是小张的妈妈想也没想过，只不过是一趟探亲之旅，自己就从“元配”变成“二房”。

当时正值两岸开放之初，两岸到底该怎么定位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之后不久，赖声川执导了他的第一部相声式的舞台剧《那一夜，谁来说相声》，其中一个段子就写到某老兵“第一次出国就是为了回国”，在这句无厘头对白引发的笑声中，隐含了两岸之间更为

严肃的问题。

另一个在开放探亲之初所始料未及的“麻烦”是，两岸隔绝近40年之后，“台湾人有钱了”，于是有些老兵在台湾的家属总以为“大陆人很爱钱”，甚至有“一直在要钱”的印象。

一位“外省第二代”说，“1989年，两岸才刚开放没几年，爸便一个人回湖南的老家，那时我才只是个国中生。老爸的老家位于湖南省桂阳县，祖父祖母早在1960年代便相继过世，老爸的亲弟弟也于1980年代去世，家乡的亲人只剩老爸亲弟弟的老婆及3个儿子。照理说至亲都不在了，但不知为何从那次探亲回来之后，老爸便陆续寄了不少钱回去，对此我非常不谅解，甚至生我父亲的气。因为我们的家境也不是很富裕，爸何必为了寄钱回老家而苦了在台湾的家人。当时觉得大陆的亲戚每个都死要钱而且好吃懒做，自然对他们产生反感。”

然而，开放的好处就是可以相互增进了解，缩短距离感。这位始终排斥陪父亲返乡探亲的人士大学毕业结婚后，终于跟老公陪着父亲走上探亲之路，也跟着父亲去拜祖坟：“老爸边拜边哭，大家也都很难过，一同啜泣。父亲说他对不起我爷爷，没有尽到孝道，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说真的，两岸分离造成的历史悲剧，骨肉分离、妻离子散，不是父亲的错，但痛苦却要父亲这群老荣民承担。”

她同样想起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湾，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老兵境遇宵壤有别

老兵返乡探亲，固然在大陆出现了悲喜交织的画面；但是，在台湾同样又出现了另一种始料未及的现象。在老莫的年代是被迫出现老夫少妻，开放探亲之后却出现了年龄差距更大的老夫少妻。

据《中国时报》2003年11月的报道：“隐身在台北市信义区的大我山庄，是近千名老兵的家。上百间单身老兵宿舍，现在成为部分大陆淘金女的落脚处。除了有地方可以住宿外，也分享老兵的退休薪俸。大我山庄在最近五六年间，大陆新娘人数从原仅几十人猛增到300多人，现在的山庄早已悄悄变身为‘大陆新娘村’。”

报道还称，“大陆新娘‘老少配’引起台湾境管局的注意，认为年龄差距太大是大不幸。然而在台北的大我山庄，有300余对老夫少妻，夫妻

年龄相差30岁仅是起步，差40岁以上均属正常，而其中绝大多数新娘年龄约在20岁35岁间，与老兵的岁数差距颇大，差35岁50岁的都有。”

夫妻之间相处是苦是乐，外人无从评断，大我山庄在老兵探亲后，大陆新娘纷纷进驻，老夫少妻在添了喜乐之后却也有了悲苦：“56岁的江西籍李大姐，是山庄里的资深大陆新娘，嫁到台湾7年多，老公却在她差9天即将领到身份证的时刻，因为心脏血管栓塞，在荣总医院手术台上从此没有醒来。最后关头拿不到台湾身份证，李大姐有遗憾，但对过世的老公，李大姐心中有更多的不舍。”

有的人好不容易临老找到终身伴侣，风烛残年老来得子，可惜天不假年，想要享受含饴弄孙之福，难如上青天。有的老兵弟兄娶妻时已是花甲之年，老夫少妻，妻子多半冲着老兵手里的积蓄，即使老兵年纪够当她父亲，为了钱，一切好谈，等钞票骗到手，一走了之，使其终生心血一夕成空，类似的悲剧时有所闻。

当然，众多老兵之中，儿孙满堂、不愁吃穿的也不在少数。有的老兵，由于吃苦耐劳，再加上天时地利人和，做生意发了大财，成为海峡两岸知名大老板、坐拥亿万财富的人，也所在多见。机遇不同，各人的晚年生活，也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而尽管若干台籍人士对老兵怀有敌意，但相处日久，彼此之间培养了深厚情谊的也时有所闻。

近年来，台湾传媒经常报道某退伍老兵，亡故之前把毕生积蓄全数捐给贫苦人家的故事。有的慷慨解囊的老兵，半辈子靠捡拾破烂维持生计，一块钱一块钱地积攒，凑成100万，这钱本应是他的棺材本，最后竟然全部捐给社会弱势团体。诸如此类的感人事迹刻画了大陆老兵遗爱台湾的伟大人格。

探亲开启两岸开放大门

让老兵回家，是国民党继其解除戒严之后，蒋经国送给老百姓最实惠的一项精神礼物。然而，一旦两岸打开了自由探亲、自由旅游的“闸口”，不仅仅为数近40万的老兵受惠，其他近2000万不是老兵的台湾老百姓，也共蒙其利。

紧接着老兵获准回大陆，一般老百姓也以探亲之名，行观光旅游之实。台湾的老百姓沾老兵之光，也可以借机回大陆寻根、祭祖、饱览大好河山壮丽风光。开放之初，台湾当局心里也有数。台湾中正机场进进出出的旅客中，往返大陆的台湾民众，真正具有老兵身份的不过十之一二，其他8成以上的通关旅客，都是如假包换的土生土长的台湾民众。

老兵带着复杂的心绪，带着“近乡情怯”的心情，步上返乡旅途；而本籍台湾的民众，则是带着尝鲜的心态，到大陆走马观花。两类人的心态，完全不同。

紧跟着开放民众赴大陆观光，大批富于冒险精神的台商，也随之成行。他们拎着简便行囊，往来两岸，为开创事业第二春而打拼。两岸“人流”和“金流”的逐步开放，为两岸关系开创了全新的局面。愈来愈多的台湾民众，终于能够实地亲睹祖国的壮丽山河。

20年前的开放探亲，国民党当局的考虑是为了老兵；但是，这一步跨出之后，开放的势头就停不下来。这也是两岸开始交流的第一步。根据台湾陆委会在1997年出版的《跨越历史的鸿沟—两岸交流10年的回顾与前瞻》一书中的《交流10年大事表》，首开两岸交流滥觞者即为“政府基于传统伦理与人道考虑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后才有开放大陆农工产品间接输入、开放大陆台籍前国军人员及眷属返台定居、开放大众传播事业赴大陆地区拍片等措施。老兵的一小步，造就了两岸交流的一大步。

开放大陆探亲一路走来已过20年，两岸人员往来仍然极不对称。开放伊始，台湾方面仅允许在大陆有三亲等以内的台湾民众前往大陆，现在则早已百无禁忌。根据中国国家旅游总局统计，20年来台湾前往大陆的民众累计已超过4400多万人次；台湾民众前往大陆的目的也早已不只是探亲。旅游、经商、投资、学术等等需求，都吸引着台湾民众频繁地往来于两岸之间。

据台湾“内政部入出国及移民署“统计，历年来赴台的大陆人士约181万人次，仅为台湾赴大陆总数的4%左右。这种单向不对称的人员往来明白显示，两岸人员交流的鸿沟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跨越。

老兵返乡探亲，掀起了台湾民众展开寻根之旅的高潮，岛内民众的眼界心胸也随之愈加开阔。那群逐渐消失中的“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老兵们，心中是不是有着“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感伤呢？时代伤痕的隐痛，何时得以愈合？恐怕永远没有人能答复这个疑问。

540元/年
共计36期
挂号邮费为648元/年

订阅热线
（0755）2593 4567
（ 010 ）6528 1005



第六章 下一代 争夺战

第一篇 台湾高校的复兴

特约撰稿员/周为筠

3月15日，马英九在宴请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时表示，希望在立法机构本届会期尽快通过陆生赴台就读法案。而就在几天前，台湾教育部发布了“大陆学生登台就学及停留办法草案”，对台高校招收陆生的方式及陆生在台期间的管理做出了规定。

其实马英九早在2008年上任之初，视察大陆事务部时即指示加快陆生来台就读步伐。但是，当行政部把相关方案送交“立法院”审查时，受到了民进党民意代表的干扰。在2009年年中时，马英九也曾明确希望立法部门能加速推动，按原计划今春陆生就能够顺利来岛，但同样因受民进党反对而搁浅。近期马英九和“教育部”如此心急地重提此案，是想在今年9月新学年前解决陆生赴台就读问题。

过去陆生只能以“交换生”的身份赴台就读，但是随着新草案出台，意味着会有更多的陆生赴台读书。在港校之后，台校将成为下一个报考热门。

台湾高等教育发达而完备，大学分为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两类，加起来有上百所之多，其中有十几所大学跻身世界五百强之列。在台湾公立大学中有个沿袭多年的排名顺序——“台政清交”，即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私立大学名列前茅的则是——辅仁大学、东海大学、东吴大学、淡江大学。

看完这些大学的名称之后，我们会发现有几所高校与大陆校名重名。事实上不只是简单的重名，而是北京清华与台湾清华、上海交大与台湾交大，本来就是同一所大学。只不过，台湾清华、交大跟许多台湾人一样，当初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台。这些学校在台湾复校后，大陆没有被废校，并一直维持着原来的校名，所以出现了“一边一校”与“一老一新”的有趣现象。

于是，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一个中国出现了两个清华、两个交大，还有两个中山，遥遥相望。甚至有的学校在大陆早已不复存在，在台湾却依然欣欣向荣，比如政治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

因此，台湾一些大学一说起校史，一下子就能说到百年前，与不少

大陆大学有着剪不断的血缘关系。这又不得不说一下那一段远去的历史。

台大的傅园与清华的梅园

早在1948年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之时，蒋介石已开始着力经营台湾。他让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安顿好最后的去处。由于当时的台湾教育落后，蒋介石和陈诚为了复兴文化，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

台大的前身是日本人所建的台北帝国大学，傅斯年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下接手这个烂摊子，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设帐授徒。他经常以校为家，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刻休息。他一边在校内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采取强硬措施裁汰冗员；一边积极延揽人才，像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几乎都在台大兼课。

作为老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实际是在另起炉灶办一个新北大。台大在他引领之下成为台湾的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光其校区占地面积就达全岛陆地的百分之一，并以丰富的研究资源以及自由的校风而闻名。连战、马英九、陈水扁、吕秀莲、李敖等风云人物莫不出自台大。

不过这些是傅斯年生前没法看到的，因为他在1950年底的一次会议上倒在校长这个位子上。台大在校园内择地安葬了这位校长，并专门建座纪念亭。从此，这里被称为“傅园”，而上下课的钟声就由此处“傅钟”传来，数十年来不停歇。

同傅斯年和台大相仿，梅贻琦与清华大学亦是血脉相连。梅贻琦自1914年留学归国即任职清华，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此后他有生之年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在1948年12月初的易帜之际，梅贻琦仍在清华主持校务和上课，但偌大的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国共两军在清华园外进行拉锯战。在傅斯年主持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梅贻琦是专机“抢救”的首选。梅贻琦离校那天对同事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

梅贻琦为了清华庚款基金确实走了，他选择去美国但并不是去做寓公，而是以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学人研究，并以学术书刊仪器赠送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就在他旅美的第三年，大陆院系大调整开始了，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综合大学变成工科大学，他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民主制度荡然无存。

而国民党政权来台因国库空虚，没少打清华基金的主意，但梅贻琦坚决不为所动。直到1955年“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协定”正式签字，蒋介石决定设立原子科学研究机构，召梅贻琦返台筹议，他方才感觉清华基金派上用场。

同年12月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设立，以张其昀、梅贻琦、蒋梦麟、陈雪屏、钱思亮等为委员。翌年1月即在台北成立筹备处，于台湾新竹市复校，命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复校工作由此紧锣密鼓地开展着，虽然名为复校实则为建校，因为除了校长梅贻琦，并无一物从大陆搬来。这是一项筚路蓝缕的开拓，择地、建屋、购置图书仪器、装配实验室，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不仅缺少资金，人才更是难得。梅贻琦决定先行招考原子科学研究所研究生，没有考场就借台北师大的体育馆，没有课舍先借台大上课。这些在梅校长的眼里要比盖大楼更重要，因为有限的资金要用于“实在的科学发展”刀刃上。

在梅贻琦的艰辛努力下，清华慢慢地发展壮大，逐渐形成理工大学的雏形，进而进入人文科学园地，终成一座综合性大学，陆续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十几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等。梅贻琦对清华功莫大焉，“梅贻琦纪念奖章”理所当然成为清华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随身带着的手提包封存。两周后公开启封发现，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清清爽爽。虽然清华基金雄厚，他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如此高洁。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死后的殡葬费都是由校友捐助。他像台大校长傅斯年一样，逝世后葬在校园里并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

梅贻琦既任过北京清华的校长，也是台湾清华的创校校长。由于这份骨肉可分浓情难割的渊源，让两所清华内外皆十分相似，校训都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外观上可以说台湾清华校内建筑及布局几乎是北京清华的翻版。在大学的行政大楼前，同样树着与北京清华一模一样的“清华园”门楼。清华园内亦有山水罗布，相思湖、昆明湖、成功湖等如出一辙，这一切都在无声地诉说，同根之源的两个清华办学理念和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传承和历史使命是两肩同担的。

岁寒三友梅、竹、松

在台湾复校的清华不是孤例，自从1954年后由于“反攻大陆”遥遥无期，而台湾社会急需各方面人才，所以原先在大陆的学校纷纷异地复校。其实这些学校大多和清华一样，离开大陆已5年多时间，所以名虽为复校，其实仅仅只是继承了校名，教职员工、组织多已毫无直接的关系。

这批学校中与清华齐名的当数交通大学。交通大学的前身是晚清南洋公学，著名铁路先驱凌鸿勋于1924年被任命为校长。在他任校长期间举办了工业展览会，修订了规章制度，让他在校内外拥有巨大声望。后来凌鸿勋也跟着数千交大校友一样随国民党来台，他们与大陆交大各校校务均告中断。

1956年美国交大同学会赵曾珏等校友，认为科学发展应为原子科学与电子科学。其中原子科学之研究，已由清华成立原子研究所肇其端，而电子研究则尚付阙如。他提议假电贺交大创建60周年之便，力倡在台成立国立交大电子研究所，期以当时新兴之电子科技学术植根宝岛，兼可解决交大校友无母校可归之憾。

不久交大在台北举行建校60周年纪念大会，由老校长凌鸿勋促请当局协助电子研究所建立。1957年10月“行政院”决定筹备，聘请凌鸿勋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熙谋为副主任委员。次年6月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成立，在台北市罗斯福路设立办事处，并于新竹市博爱街营建校舍。

像台湾清华初创时一样，交大在新竹校舍未建成前，不得不“借腹生子”。于7月借台大工程馆举行首届招生考试和工学院教室上课，并租民房为学生宿舍。但其时教授俱为一时之选，教学质量也毫不含糊。在凌鸿勋与李熙谋带领下砥砺发展，1967年台湾“教育部”令电子研究所改制为国立交通大学工学院，学校终于初具规模。

交大与清华相似，都是在台复校时由研究所发轫，由老校长身先士卒地“二次创业”。两校复校的创业史有着太多相似，所以互动紧密的两校于1969年联合创办“梅竹锦标对抗赛”，包括球类比赛、中英文演讲及辩论等项目。

梅竹赛系分别纪念两位有着卓越贡献的老校长，即代表清华“梅”的梅贻琦，与代表交大“竹”的凌鸿勋（凌鸿勋字竹铭，交大内有竹湖、竹轩、竹铭馆纪念他）。两校以梅竹冰清高洁，并立于岁暮严冬，表示彼此之间友谊永固。梅竹赛多年来已形成两校文化传统，学生及校友们皆以参与为荣。

在台湾除了梅与竹，还有“岁寒三友”之一的松——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的丰功伟绩，特于1926年将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并在广州石牌建立新校址。而台湾中山大学复校比较晚，直到1980年7月才正式在高雄建校，由蒋经国钦点李焕出任校长，并以国父诞辰日为校庆。

相对而言，在台复校最早的公立大学要属政治大学。作为昔日国民党党校，政大在撤离大陆时师生矢志追随的较多，所以在1954年即成为复校的先驱。

政大复校首任校长是曾任北大代校长的陈大齐，初期设立行政、公民教育、新闻及国际关系四个研究所，这些都是为“反共政治作战”而准备的。但陈大齐第二年就把三个所改名了，他是想让政大走学术而不是“政治作战”的路子。1955年政大恢复成立大学部（本科），全面整改为公办全日制大学。

当然政大一直是国民党政府培养专业技术官僚及党工、党籍学者的摇篮，从大陆时期即是国民党培育政治人才的主要基地。当初于1927年北伐期间创立就是为了培训国民党干部，地位与性质如同中共中央党校之于大陆一般。在台复校数十年，其国关中心与东亚研究所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台湾当局两岸关系重要的智囊机构。

政大可谓是“国民党的亲儿子”，蒋介石一直担任永久名誉校长。复校后建有中正图书馆、果夫楼、志希楼，一看便知道是纪念蒋介石、陈果夫、罗家伦的，由此可见与党国关系的一斑。

教会大学浴火重生

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对我国近代教育发展贡献极大，曾在大陆先后创办了十几所颇负盛名的大学。然而，1952年大陆实行院系大调整，燕京、圣约翰、东吴、辅仁、金陵、齐鲁、之江等著名教会大学悉数被迫停办，校舍均遭没收，集体人间蒸发。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教会大学的消失，让台湾和海外的校友感到无比痛惜，各校纷纷欲走复校之路。

来自苏州的东吴大学乃复校的急先锋。这所教会大学以法律而闻名，校友们看到母校面临瓦解随即筹组董事会。但因为时局和法令的限制，便先在台北汉口街租房设立东吴补习学校。1954年当局以东吴补习学校办学绩效卓著，核准先行成立东吴大学，恢复法学院，成为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

东吴复校再也没有像在大陆时期受到美国基督教会的资助，物质条

件极其窘困。但在石超庸、桂崇基及端木恺三任校长苦心经营、海内外校友热诚捐助下，度过一个个难关。1961年东吴由台北市汉口街迁到外双溪现址，至此师生终于有了自己的美丽校园。

东吴凭借着坚强的毅力走过惨淡岁月，成为一所结构完整的综合性大学。蒋经国庶子蒋孝慈、“行政院”院长刘兆玄都曾任过校长。如今东吴已成为台湾著名大学，其法律系更是闻名遐迩。她依旧秉持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校训精神，培育“朴实热诚坚毅，专业通识宏观”的青年学子。

东吴的复兴让同为教会大学的辅仁大学校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多方奔走成立在台校友会，上书罗马教廷呼吁母校在台复校。1959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委托于斌在台北恢复辅仁大学，并任命他为校长。

1960年，于斌由美返台成立校董会，有了罗马教廷的投资和美国教友的捐助，辅仁筹足了复校的初步经费，并在台北新庄兴建校舍。1961年，辅仁的哲学研究所设立，这是全台最早的哲学所。到1963年时学校已有三个学院十个系，几年下来赢得了广泛赞誉，1967年宋美龄出任辅仁名誉董事长。

辅仁与清华、交大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的是校友声望、国际资源与社会声誉都位居全岛前列，不同的是辅仁以神学、文史哲、新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闻名。其中，辅仁新闻系自设有电台，知名主播辈出，像胡一虎、吴小莉皆是；于斌引进优秀的神父、修女担任外语教师，使得该校外语教学水平十分突出；体育也是辅大一大特色，学校同时拥有53支运动代表队，其中“辅大棒球队”是台湾最早最知名的大学棒球队。

校长于斌将辅仁校训由“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改为“圣美善真”，但校风由大陆迁台这些年并没有改变。在北京时期有顺口溜说：“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新辅仁继承了之前的活跃因子，对社会关怀和参与始终热情不减。早在1985年学生即发行地下刊物《改造》，首开台湾校园民主活动的先河。

于斌校长自1934年受聘为辅仁董事长，在台复兴辅仁后长期担任校长，一生与辅仁紧密相连。1978年8月16日，作为枢机主教的于斌在梵蒂冈教廷去世，遗体被运回辅仁校园内安葬，像傅斯年、梅贻琦一样伴着心爱的校园日升月落。

新创大学的典范

教会大学能够复校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像燕京、金陵、之江一样永远成为历史，让远走天涯的校友和教会人士无不扼腕长叹。当时的权宜之计是在台另创一所理想的大学，以传承十几所教会大学的优良传统。

1950年，台湾教育界与教会人士联名投书负责襄助过去13所教会大学的美国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请其本着过去培植中国青年的精神，新办一所大学藉以延续基督教在华的教育事业。

联合董事会秘书长芳卫廉1952年来台，与教育及宗教领袖讨论设校条件，并成立建校筹备处及董事会，推举杭立武为会长。经过多方考虑后，选定台中市大度山为校址，并定校名为东海大学，校园委托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贝聿铭与陈其宽、张肇康负责设计。

1953年11月10日，董事会公示“私立东海大学设置的目的和方针”。恰好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东海特请他于11月11日莅临破土典礼，以象征中美两国间之教育合作。典礼于是日上午隆重举行，“总统府”及各界人士一千余人与会，一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东海大学的首任校长为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嫡孙、曾纪泽之子曾约农。曾家家学渊源深厚，约农弱冠之年即考取第一届庚子赔款，赴英伦敦大学留学，可谓学贯中西。他早在大陆时和姐姐曾宝荪创办艺芳女校，后自己又独立创办克强学院。曾家姐弟两人都终身未婚，毕生投身于教育事业。

蒋介石素来崇敬曾国藩，将其著作及语录悬为终生治军与修为之圭臬；曾约农和宋美龄又同为基督教教友，所以他受蒋介石夫妇极高的推崇，在台湾学术文化界有着很大的威望。他受命执掌东海后，认为东海不应是大陆任何一所教会大学之翻版，而是一个能自由寻求真理的学术园地；不是制造白领或士大夫的地方，而是造就具有独特眼光并能投入生活的人。

曾约农创造了劳作教育和通才教育两项制度，采纳了徐复观所取校名中的东海精神，认为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文化基本目的与精神是相同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推之南海北海，莫不皆然”。

作为校长的曾约农平常总是一袭长衫，遇有典礼则加件马褂。他不穿西装，偶尔到美国开会也是如此。但是看似老派的人物英语却极其流利，每逢重要会议往往在中文阐述之后，即席译作英语，方便在场外籍教师了解。他凡事以身作则，东海教育精神的奠立，端赖其垂规立范。

历经现实的动荡后，东海所蕴含的思想新生命与新力量，透过对独特教育理想的追求，彰显出勇于创造与实验的信条。这所教会大学无论在师资阵容还是校舍软硬体设施各方面，实乃台湾重点新兴大学之典范。

1958年曾约农任期届满，将告别“两载桃畦手自栽”的校园，全校师生极力慰留，甚至有学生绝食以示。曾约农临别前赋《留别东海》一诗抒怀，东海特聘他为终身荣誉校长，并将校门口连接到教学区的主要道路命名为约农路。

在这些复兴的每所大学背后，我们发现几乎都有一位把生命融入其中的校长，无论是傅斯年、梅贻琦，或是凌鸿勋、陈大齐，还是于斌、曾约农，他们都成为大学的精神领袖。他们抱着为华夏学术保存一脉的理想，在那个物资和知识极度匮乏的年代，以无畏的拓荒精神复兴学校，在南国海岛重整河山，影响了日后台湾的学术走向。

这一切都无声地验证着梅贻琦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第二篇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 台湾新竹清华建校始末

特约撰稿员/王丰

台湾清华“复校”初衷

1948年冬季，内战的炮火，声声逼近北京西郊，国民党军从城外退居城内，共军先头部队进入清华园，就在共军进抵清华校园的前一天，校长梅贻琦以进城洽公的名义，悄悄挥别了他服务了二十多年的“水木清华”校园。一架从南京飞来的专机，奉蒋介石之命，到北京接运此间望重士林的知识领袖。追随蒋介石南撤的知名文人寥若晨星，梅贻琦是其中顶有分量的一位。北平故都和平解放，意味国民党当局永远失去逐鹿中原的冠冕，但是，梅贻琦等少数文人南下，勉强残存冠冕上一两颗璀璨的珠宝。

在国府摇摇欲坠的时刻，孙科组织内阁，力邀梅贻琦担任教育部长，梅氏婉拒之，他推辞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

1949年6月，南京、上海已相继解放，国统区日渐萎缩，梅贻琦从广州，途经香港辗转奔赴法国巴黎，旅行目的为出席在巴黎召开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他是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梅贻琦此行的另一目的，是要去美国确保清华基金，这笔巨额的教育经费，便是俗称的庚子赔款。

梅贻琦离开北平，乃至去国之后，清华大学并未随同国民党当局搬迁至台湾，国府的教育版图上，几乎四五年间，不再有人提及清华大学四字。1954年12月，情势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一场题为《原子能和平用途》的演讲。随后，美国与台湾当局签署了《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协议》，打算把部分无关宏旨的原子科技，转移给台湾。心心念念东山再起，时时高喊反攻大陆口号的蒋介石，忽然想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蒋先生把清华复校、“原子能和平用途”，乃至原子武器制造这些概念想法勾联在一块。不光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更希望运用“原子炸弹”在战场上的无穷威力去实现他那反攻大陆美梦。此时美国既有推广原子能和平用途的计划，自可运用此一大好时机，实际接触原子科技，好为未来将原子科技转移到军事上，作好进一步之准备。

斯时台湾方面可资运用的经费有限，虑及兴建原子炉需要较大经费，为了解决钱的问题，蒋介石当局便让有清华基金为后盾的清华大学在台“复校”，成为台湾原子科学研究的先驱。1955年12月，国府行政机关组成“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1956年1月1日，清华大学正式于台北成立筹备处，迈出清华大学在台“复校”的第一步。有关方面原本提供的校地有两处，一处位于台北南港，另一处在新竹。因为南港腹地较小，而且时任新竹县长朱盛淇向清华“复校”单位积极争取，所以清华最后落脚新竹赤土崎。

蒋介石于1955年11月，命曾任其机要秘书、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其昀，通知梅贻琦兼程返回台湾。在此之前，梅氏很少到台湾，唯一的一次，是1954年3月，到台湾出席“国民大会”，梅氏勾留一个月，即匆匆返回美国。蒋介石命梅贻琦以前清华大学校长的身份，筹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蒋先生知道梅贻琦手上掌控的那笔为数不小的清华基金，足供台湾当局初步研究原子科技所需。易言之，清华大学在台湾“复校”的初衷，是在蒋介石意欲发展核武的意图之下，起心动念的。在刀兵未休的1950年代初期，国府当局有何能力奢谈太平盛世的兴学育才大计。

和梅贻琦堪称知友的叶公超，曾经如此叙说台湾当局运用那笔存在美国人手上的“清华基金”，如何筹划一项“长期科学计划”，乃至清华大学在台湾“复校”的经过。叶公超说：“这个基金是中美两国政府当初共同决定交给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保管的，而这个董事会是由中美两国人士组成的，要动用这基金的款项，必须大多数的董事同意，而事实上假使有一两个董事不同意，案子是提不出来的。”叶公超接着说：“那时就有人—我也在内—认为清华基金的利息，不应当完全用于美国维持少数中国的研究人员，而要拿回台湾来，用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事业。”

做任何大事业，都得要动员两种“软实力”，一种是人脉，一种当然是金脉了。这也便是蒋介石力邀梅贻琦兼程从美国赶到台湾的原因。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志在岛内秘密制造原子弹，和毛泽东领导的北京当局对抗，至于清华大学“复校”事宜，却不期然成为研发原子弹过程中的“副产品”。蒋介石当初没有料想到，研发原子弹之计划固然有如南柯一梦，反倒是为日后台湾科技人才的培育与经济之蓬勃发展，创造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效果。

原子科学发展任务

在蒋介石力邀梅贻琦定居台湾之前，叶公超就已得知梅贻琦心目中有一个酝酿已久，可惜力不从心的心愿。“梅先生沉吟了许久，只说了这

样一句话：‘我很想弄一个长期的科学计划出来，不过清华的钱太少了，任何长期的科学计划都不够。这一点，我还没想出办法来。’”梅贻琦想搞一套“长期科学计划”的心愿，不多时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一个“各取所需”的想法，在彼此之间酝酿，而“教育部长”张其昀，正是为这项计划敞开大门的引路人。

应邀到台湾一展长才，不但可以实现梅贻琦为社会造就科学人才的人生愿望，也可以结束他长达6年寄人篱下，受尽洋人闲气的漂泊岁月。从1949年旅居美国以来，梅贻琦每个月靠从“华美协进社”月支200美金过日子，在美国高消费的社会里，过得相当拮据清苦。

梅贻琦到台湾之前，眼尖的人其实早就察觉到若干动态。1955年6月，台北恢复出版清华大学早年发行的学术刊物《清华学报》，并且延聘了若干学者主持这份学报。同年12月16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的牌衔，在台北挂上。梅贻琦同时主持了首次会议，会上梅贻琦指出，清华大学“复校”之前，将先设置原子科学研究所，地点选择在台湾新竹，而学校的建筑与经常费用，将由国府拨付，图书设备费用则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

1956年元月，清华大学“筹备处”在新竹初步清理建筑基地，兴建第一批校舍，同年秋季招考的第一班原子科学研究所研究生，入学之后，暂借台湾大学的教室上课。师资方面，梅贻琦在国府大力资助之下，延聘了物理学大师吴大猷博士，吴博士于1956年11月到台湾，为清华及台大学生讲学。同时应聘来台的还有袁家骝博士（袁世凯嫡孙）、邓昌黎博士等大师级师资阵容。第二年，亦即1957年，又陆续迎来外籍教授小谷正雄、李德曼、刘易等国际知名物理学权威，到台湾为清华大学“复校”助阵。其后3年，又陆续有冯彦雄博士、钱家骐博士、陈省身博士、孙观汉博士、傅瑞雪博士，到台湾为清华学生讲学。随之而来的中外学术泰斗，犹如过江之鲫，接踵而至。中外大师云集台湾清华，这印证了梅贻琦在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影响力，也说明了昔日“水木清华”余荫所及，形成遍地开花的效果。

然而，真正让台湾当局关注的，不光是望重士林的大师，而是清华大学肩负的原子科学（或者是原子弹研发之学术支持）发展任务。1957年，清华大学兴建物理馆的同时，也完成了一处加速器实验室。1958年5月，清华大学在冠盖云集的场面下，破土兴工原子炉。1960年4月13日，新竹清华大学所属的原子炉装置完成，并且顺利进行临界试车。1961年12月2日，当局为清华大学原子炉举行落成典礼。

台湾当局为了让美国原子科技雨露均沾，惠及所有的公民营企业，

清华大学原子炉的土木工程交给毕业自清华大学之华泰建筑师张昌华设计，原子炉装置工程由清华自行设计施工。原子炉机件装置时，由中国石油公司、台湾电力公司、台湾铝业公司分别派员操作，且在经济部联合工业研究所协助下，成为早期台湾工业界与学术界首次齐心合作之成功典范。回顾梅贻琦生命最后三年，几乎都在忙乎清华大学"复校"的事务，而该校核子工程学系事务，又占了其中相当比例时间。

梅贻琦的学生浦薛凤，在追忆文章中亦可看出清华在台"复校"初期之梗概，"清华在台复校，先成立原子科学研究所。梅校长主持此事，费尽心力。先生在新竹觅定校址，洽办接管，继则设计若干校舍，请拨经费，举办借款，再则订购图书，商聘教授，为此赴美两次，奔走接洽，最后则为子炉之装置，自设计、洽商、订货以至完成，诚不知费去多少心血。"

清华大学在台"复校"初期，孙观汉是远渡重洋到台湾应聘的重量级教授。孙博士在一篇文章中，回顾初到台湾应聘，备受梅贻琦礼贤下士，更可借此即景，明了当时台湾清华教授的生活片段。孙观汉在文章中写道："那时他（按：指梅贻琦）掌教育部，住在台北。但每次来新竹清华园的时候，总是带了东西叫人送到东院五号来—台湾的土产和水果，菲律宾的世界闻名的雪茄烟，和祖国的书画等。他在校内有一架汽车，过去舍不得用它，但舍得拨给我自开驶用，我因原子炉各地路远，车对做事增加效率，就接用了。每有宴会，他总是顾想到我们。"

台湾通识教育之典范

梅贻琦之后，台湾清华大学继任校长迄今已有13位，毕业自北京清华大学（包括早期之清华学校）的校长，计有陈可忠、阎振兴、徐贤修、张明哲等四位，尔后的历任校长，从毛高文、刘兆玄、李家同、沈君山、陈信雄、刘炯朗、徐遐生、陈文村到现任校长陈力俊，都是毕业自台湾各大知名大学和留学国外各大学的硕彦之士。

梅贻琦以降，初期几位校长的建树，亦在台湾清华大学的校史上，铭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陈可忠校长任上，台湾清华恢复设置大学部，设核子工程、数学、物理和化学四个学系。在台"复校"后第四任校长徐贤修任内，将大学部划分为三个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和原子科学院。工学院设动力机械、材料科学、工业化学、工业工程四系。徐贤修任内也推动了大型研究发展计划如：电动车的研制等。第五任校长张明哲于1975年接掌校务，任内先后新成立电机工程学系、中国语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使得台湾清华朝人文学科领域拓展。在台"复校"的第六任校长毛高文，于1981年起接任后，陆续创办人文社会学院，并增设人文社

会相关科系，强化了台湾时期较弱的清华人文学风。

从在台湾“复校”以迄两蒋时代结束，台湾在政治上走进所谓的“本土化”时期，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办学风貌，也与过去梅贻琦时代，乃至与过去北京清华园时期，迥然不同。1956年在台湾新竹“复校”初期的办学重点是原子科学，其后陆续扩展至理工领域。

1982年，台湾清华大学首创“长期发展委员会”，制订五年发展计划，从事有系统校园规划。并为鼓励教学与学术研究，设立杰出教学奖与杰出研究奖。1984年增设人文社会学院。1989年，将学生共同研修科目改为通识教育中心，树立台湾通识教育之典范。1992年7月，又购进新竹十八尖山南面约15.6公顷之土地，增设生命科学院。

台湾清华大学拥有人文社会、生命科学、电机信息与科技管理等领域科系，近期又逐步转化成为以人文社会、理、工、生科、管理领域均衡发展的学府。清华自有历史以来，向来是吾国最具学术权威与传统的大学府，国共内战的悲欢离合，固然铸成民族流离灾难，然而，台湾清华大学犹如从故都北平飘散南方的一株风信子，它的绿芽在祖国南疆茁壮成长，它的花朵在南方土壤里吐露着芬芳，花开并蒂，北京清华和台湾清华，永远交互辉映着耀眼的荣光。

第三篇 台湾拟重修教科书排“独”

特约撰稿员 / 韩福东

台湾“教育部”终于要向历史教科书动刀了。

针对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期间国中课本的“去中国化”表述，马英九政府决心来一番“拨乱反正”。这在台湾是高度敏感议题，“教育部”选择在马英九已成功连任之后做此决策，时间点的掌握上恰到好处。

具体修改内容尚未最终定案，但大体方向已经基本清晰。“教育部”希望高中历史教科书审定委员会，能够根据一份民众建议意见做成决议，而后由出版社进行相应修改。这份民众建议意见书的核心内容包括：教科书谈到日本统治时期，不能谈日治时期，要叫日殖时期；不应提及台湾地位未定论；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不应简称“中国”，应称“中共”、“中国大陆”或“大陆”等。

民进党籍“立委”郑丽君为此特地召开记者会，高分贝反弹。她表示，“教育部”正试图以“太上皇”意见书干预委员会决议，这是马英九政府执行历史教学“去台湾化”三部曲之一，其主要执行者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亚中。

民进党一直都在反击，但此次中学历史课本的修订已箭在弦上。在两岸交流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语境下，执政的国民党PK在野且内部正检讨“台独”路线的民进党，结局不言自明。

郝柏村挑战“一边一国”

今年4月，张亚中在《中国评论》刊文《异化的史观与认同：从我者到他者》。他说，在我读书时候的认知，毫无疑问的，“中国”是“我者”，“中共”才是“他者”。曾几何时，“中国”与“中共”均已从“我者”变成“他者”。为何如此？

类似张亚中的发问，早些时候也从前“行政院长”郝柏村笔下流出。今年2月，郝柏村投书媒体，以《正视中学史地课本》为题，直呼“台湾政治社会的乱源，是国家认同的分歧，淡化了“中华民国”，并不能安抚“台独”的主张。要拨乱反正，必须旗帜鲜明，遵照宪法，认同“中华民国”，这是国民教育的基本宗旨，首应改正中学的史地课本。”

在投书台湾《联合报》之前，郝柏村曾私下表示，依照其外孙女所用的教材，自己已成“亡国之人”。

郝柏村外孙女所用的教材，是台湾“教育部”审定，由康轩出版社出版的国中历史地理课本。该教材颇为强调“台湾地区”，回避“中华民国”，但在谈及中国（大陆）海岸线外的岛屿时，又独举香港，而绝口不提“台湾地区”。更能表明其“台独”立场的是该书142页，2002年“世界主要国家”老年人口比例图的说明文字：台湾地区9%，日本18%，南韩7.6%，中国7.3%。将“台湾地区”列为与“中国”平行的国家，显然已经违背了“中华民国”的“宪法”——“宪法”仍坚持一个中国（只是这个中国，他们认为是“中华民国”），下分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

此外，“教育部”审定，由三民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历史第一册，亦令郝柏村不满。该教材关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的描述，偏于民进党立场；而对中华民族史的叙述中，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等都简单掠过，甚至于连“八年抗战”四字都没提及，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篇幅中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民政府赢得对日抗战的胜利”而已。

郝伯村难耐愤怒，奋笔疾书。他认为，“教育部”审定的史地教材，是在暗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误导了中华民国国民的国家认同”。他甚至丢下了“欲亡人国者，必先亡其史”的重话。

郝柏村今年已经93岁，曾任台“行政院长”，是国民党尚健在的最资深元老。他的文章引发民进党反弹，但从台媒报道看，民进党的反击主要集中在郝柏村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表述上，在“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相关论述上着力不多。这当然和二二八事件周年临近且此话题已形成政治正确有关，民进党大选败北后亦在检讨所谓“台湾共识”。

这篇文章刊发在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一个月之后。郝柏村作为国民党元老，当然知道有关“统独”的意识形态话题，最好在非选举季提出，使民进党失去操弄文宣的时机。这篇文章顺理成章引起“教育部”注意，以此为由头，订立原则，要求教科书回归“宪法”与法令用语。

从“侵占台湾”变“取得台湾”

台湾1987年宣布解严之前，中小学历史教材中，台湾史都是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而出现的。解除戒严后，情况开始发生细微变化，在李登辉执政期间，1994年修订了《国民中学课程标准》，有了明显的“去中国化”企图，“台湾史”开始与“中国史”切割。

按《国民中学课程标准》标准撰写的中学课本完成于1997年。国中教科书《认识台湾》共分历史、社会、地理三部分。其中地理部分较少

争议，而历史、社会部分则甫一问世，即在台湾社会引发强烈反弹。

该书历史篇编审委员会主委黄秀政声称，“课程标准草案研订期间，对台湾的定位虽有‘台湾的台湾’与‘中国的台湾’之争论，但最后终能各让一步，取得以客观中性的用词来解读台湾历史的共识”，“不论统独，单纯描述史实”。

所谓的“客观中性”用词，体现在如下地方：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变成“取得”台湾，至于其他方面，则难见“客观中性”，如片面歌颂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无视17世纪前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等，被很多学者诟病。台湾世新学院（现世新大学）教授王晓波称其为“皇民化的台湾史”，“充满了政治宣传”。

国民党籍“立委”李庆华为此发表《我对国中〈认识台湾〉教科书的质疑》，还主持“国中认识台湾教科书公听会”，将辩论引向高潮。但在“蓝皮绿骨”的李登辉操作下，台湾国中教材的“去中国化”进程仍在稳步发展。

这一阶段，“认识台湾”教科书的主要参与者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杜正胜，开始因“同心圆构想”理论而名声大噪。他的主张是，“历史课程设计应有先后缓急之别，从学习者的时空环境作中心，一圈圈往外推移，先详内而后详外，才算是完整的历史教育。”台湾乡土史、台湾史被他作为圆心，特别做了强调。

在陈水扁2000年执政之后，执行“九年一贯”课纲。高中历史课程改造开始提速，在2003年“教育部”发表的《高中历史新课程纲要草案》中，拟将中国明代中期以后至民国历史全部放入“世界史”，在社会压力之下，最后不得不决定再行修订，延缓一年公布。

一年后，陈水扁连任“总统”，且延揽杜正胜出任“教育部长”。国中教材“台独化”脚步加快，强硬的杜正胜将当时高中历史课程中台湾史、中国史和世界史比例，由1:2:1改为1:1:1，“台湾史”独立成册，与“中国史”完全分离。且在台湾史的篇目中，完全不提1683-1895的清朝统治时期。新课纲在2006年正式实施。

直到陈水扁卸职前一年，高中历史教材还在不断“去中国化”：将“本国史”改为“中国史”，“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也全部改为与“台湾”对应的“中国”。

修改课纲两头不讨好

2007年1月31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表示，新版历史教科书扭曲历史，利用审查委员进行思想控制，这是违反学术思想自由和人权的作为。他质疑杜正胜作为“中华民国教育部长”，竟编订教科书来否定“中华民国”的历史。“难道要把“中华民国史”改成“台湾共和国史”，才能符合民进党的史观吗？”

一年后，马英九击败陈水扁，赢得执政权。但出于缓和朝野矛盾考虑，他最初启用的“教育部长”是政治色彩偏绿的郑瑞城。郑瑞城主持修订“98课纲”（即2009年课纲）时，所聘委员多倾向民进党，只有王晓波持鲜明蓝色立场。课纲的修订充满争吵，直到2009年马英九政府内阁改组，吴清基替换郑瑞城之后，课纲修订召集人和部分委员也进行换血，高中历史课纲才于2010年9月14日公布。

新课纲并没有改变台湾史单独成册的现象，但将中国史、台湾史的比例改为2:1。即便如此，仍遭到部分本土社团“中国史太多”的抗议，他们在教育部门前高呼“台湾史是本国史、中国史是世界史”的口号。

这个课纲，也同样引发统派学者不满，可谓两头不讨好。借着郝柏村发文的时机，“教育部”开始酝酿新一轮的教科书修订，今年5月，一直对教科书“去中国化”持批判立场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亚中，也加入了高中历史课教科书审定委员会。

除要求不能以“中国”代替“大陆”外，台“教育部”还建议审定委员会，在涉及政治层面与国际关系，应避免以“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不应该提及“台湾地位未定论”，凡提及台湾地位时，应明确说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该份民众意见还要求历史教育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原则。

不过，依据台湾的惯例，课纲的修订每十年一次。依此，新课纲的完成大概要在2019年前后。

第四篇 台湾对外华语教育阵地收缩

记者 / 陈祥

台湾媒体4月底报道，越南的三所台教中心最近已经全部关门，印度台教中心的6名台湾老师被欠薪超过4个月。台教中心遭遇的困境，给台湾的对外华语教育罩上一层阴云。

马英九一再表示要大力推广“正体字”，要让台湾发展为“亚太高等教育中心”，扩大软实力输出。但“教育部”削减海外台湾教育中心的辅助经费，让承办这些中心的台湾院校措手不及又无可奈何。

“中研院社会学所长”萧新煌对台湾媒体表示：在争夺华语发言权的战场上，大陆以每年超过12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规模，在全球设立358个孔子学院，尤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将成立常春藤盟校第一所孔子学院。“教育部”缩减经费的做法是严重缺乏战略眼光，台湾不应该自废武功。

首当其冲的台湾教育中心

为执行“行政院”扩大招收外国学生来台留学方案，以及推动国家对外华语教学政策，“教育部”在2007年2月颁布《“教育部”补助国内大学境外设立台湾教育中心要点》。

此后台教中心逐个成立，有文藻外语学院在越南河内，暨南国际大学在越南胡志明市，龙华科技大学在越南岘港，铭传大学在韩国首尔、蒙古乌兰巴托和美国密歇根州，“清华大学”在印度新德里和诺伊达等等。台湾共计在8个国家设立11所台教中心。

各个台湾教育中心在当地的任务略有区别，但总体上是以学术交流、招收国际生来台、华语教学等方式在当地推广华语。这一模式由“教育部”出钱，从场地到师资，事无巨细都是各院校自己解决。各院校给自己规划了营利计划，但迄今难有营利的。

当前形势的逆转来自“教育部”去年对补助办法的修改，修改之后，学校需要自己承担一半费用。“教育部”国际及两岸教育司属下的海外台湾学校及华语教育科科长陈立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因为整个政府预算都减少了，‘教育部’不得不在各项目上削减开支，我们必须要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做事。为此，我们采取了一个国家由一所学校去开拓的方针。”

对比大陆的孔子学院四处开花，陈立颖表示大规模办学对台湾没有意义。“50多年的华语教学经验是我们的优势，在此基础上我们以小而精、小而巧的方式去做事。”他所在的海外台湾学校及华语教育科，是“行政院”组织改造后于今年成立，管理各台湾教育中心是其职责之一。

不久前，“教育部”国际及两岸教育司长林文通接受“中央社”采访时承认，目前的办学模式经费庞大且效益和预期有一些差距，故在教育经费吃紧时以一国一教育中心的原则进行调整。

台湾教育中心的协调工作受“教育部”委托，由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负责。基金会在台教中心项目上的任务是协调各校招生在内的工作，并和“教育部”一道在年中和年底开展考核，年底请各中心来做工作报告。基金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教育部’拨款并不经过基金会，我们尚未跟‘教育部’做进一步的讨论，大家都有点措手不及，但我们尊重‘教育部’的意见。”

“我们被迫取消了去年设定好的计划，不得不跟印度方面违约。”“清华大学”全球事务处负责印度台教中心的专案经理陈佳惠告诉本刊记者，“50%的费用对学校是很大的负担，印度情况特殊，官方语言繁多，治安低效尤其是近期发生多起侮辱女性的恶性事件。这些都迫使我们的老师必须聘请当地助理方便沟通，以及保障人身安全。因此费用也随之增加。”

“清华大学”原本计划今年在工业城市金奈、“印度硅谷”班加罗尔、文化名城加尔各答开设台湾教育中心，并针对印度地域辽阔的现状发展网络教学。殊为不易的是，尼赫鲁大学和印度理工大学希望参与合作，但目前计划搁置。“清华大学”全球事务长王伟中声称，“教育部”最近才核准本年度的补助经费，待走完全部程序后，老师们才能领到薪水，那得5、6月份了。

虽然困难，但“清华大学”不准备放弃印度业务，只是暂时中断扩张。“清华大学”通过了“教育部”今年发放经费的考核，在拿到钱之前先跟校内的基金会借支。

在越南设立的台湾教育中心文藻外语学院、暨南国际大学和龙华科技大学已经撤离回台。陈立颖说，它们没有再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学校经过评估觉得划不来，就不再申请。我们一向是公开征集学校，只要有学校觉得能在越南立足，一旦通过我们的考核，台湾教育中心将立即在越南恢复。”

官方认为，在越南遭遇的挫折不是终结，而是配合财政的状态调节。今年4月底，“教育部”长蒋伟宁在“立法院”保证，在重要的外籍学生来源国越南，肯定会保留一所台教中心。

优势渐失的台湾华语输出

当大陆引进自由市场的部分做法，使得经济总量猛增时，台湾在硬实力的较量上不可避免地落于下风，软实力成为了台湾的主要宣传方向。尤其是华语教育输出，在1971年台湾被挤出联合国后，成为外交突破的重要手段。

当两岸关系紧张时，大陆通常指责台湾的华语教育不是政治反动就是煽动“台独”；在两岸关系缓和时，大陆会赞誉台湾虽然道不同，但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可嘉。不过，无论是大陆官方还是学术界，不得不承认台湾在华语教育上的丰富经验和成就，尤其是当孔子学院兴起之际，缺乏经验的大陆经常会从组织建设、教材制作、宣传推广等方面借鉴台湾的经验。

两岸除了在简、繁字体，汉语拼音和注音上争夺正统性外，还包括了对历史、政治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种种阐释权。在汉语拼音和注音之争上，台湾有落败的趋势，因为大陆凭借在联合国的地位，让汉语拼音在1982年被国际标准化组织作为汉语罗马字母拼音写法的国际标准，1986年被联合国公布为汉语标准语音系统。繁体字微弱优势尚存，因为研读古籍的需要，但此需要远不及做外贸的需求。

在对史政的解读上，台湾的史观与西方基本一致，故占据优势。而西方发达国家因担心中共的意识形态输出，对孔子学院授课会采取监视手段。比如说，仅仅在定义朝鲜战争的起因上，孔子学院就会给自己惹来很多麻烦。

台湾历史最长的华语教学机构，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成立于1956年。2004年，“教育部”协调行政院各部会，成立了“对外华语教学小组”。2006年，华语教师认证考试制度设立，被称为“中文托福”。所有台教中心的授课者都要经过统一的考试，陈立颖说通过率约是20%。在建立一个统筹机关之前，华语教学一直由台师大和《国语日报》语文中心等非官方机构办理。

因为历史传承的原因，台湾的华语教学在东南亚华人群体中有很强的吸引力，如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国。“侨务委员会”在文化教育上的口号是“无侨教即无侨务”，1951年以来，辅导侨生来台湾升学一直是

施政重点。随着全球化进程，非华裔学生也开始来台湾留学，当前人数最多的是没有中文底子的印度生。

上届“教育部”长吴清基说过，台湾高等教育在少子化驱使下，需要从“内提供服务”走向“外交流竞争”，未来的教育产业输出将以泰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为主。高等教育层面上，台湾的优势在于对东南亚华裔特别有吸引力，本身教育水平不错，以及学费比西方发达国家低。

“现实的考量是，欧美学生不太会来东南亚接受高等教育，崛起中的印度将会成为留学生大国。”“清华大学”的陈嘉惠说。“清华大学”是吸收印度学生最多的台湾高校，每年来台湾清华读硕博士和博士后的印度学生约有100多人，约占全台湾印度留学生的1/4。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清华”才决定在印度办学，而且“清华大学”尤其看重与印度理工大学即将开展的合作，此校出产太多的印度精英。

从硬件设施来看，各地的台湾教育中心都很简单，以跟当地大学合作为主。以“清华”在印度为例，从办公室、教室和教师宿舍到文具、宽带网络，都是印度学校免费提供的。作为交换，印度的校内学生前来听课是免费的。“清华”赴印度的教师都有硕博士学位，月薪约相当于36000新台币，换在台湾的话也能到这个收入，只是生活环境要比在印度舒适。陈嘉惠介绍，这些人以年轻人为主，具有较强的探险心理。

受经费限制，台湾的华语教学在师资、场地、教材等规模上落败于大陆。但陈立颖为台湾简朴不失精湛的教学感到自豪。他说台湾曾派两个外国学生参加大陆在温哥华举办的“汉语桥”中文演讲比赛，拿了第一名和第三名。

精彩推荐：《大陆中产阶级沉浮》



点此阅读

第五篇 台湾“十二年国教”改革引争议

记者 / 马军

2013年6月9日中午，台湾“国三”生考完最后一科“基测”（国民中学学生基本学力测验，相当于大陆“中考”），走出考场。

自此，在台湾延续了13年的“基测”制度正式走入历史。因为马英九政府已经宣布，将于2014年全面实施“十二年国教”计划，“基测”将被“国中”教育会考和特色招生考试替代。“十二年国教”计划在一片质疑声中，悄然上路。

艰难出炉

“十二年国教”全称“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将现行的“九年国民基本教育”向后延长三年，包括高中高职的三年以及五年专科学校的前三年。“十二年国教”政策的出炉可谓困难重重，经过了近20年的规划和近10年的争论，才初步成型。

2007年，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苏贞昌曾经在“立法院”发表施政报告时宣示，将从2007年开始逐步推动“十二年国教”，由“教育部”公布36所明星高中职学校，进行联合或者单独招生，而另外的学校则以学区分发入学。然而两天之后，苏贞昌便改口不提“明星学校”四个字，4天后时任“教育部长”杜正胜也宣布各种配套方案尚需研议，之前的发言都不算数，“基测”制度继续实施。“十二年国教”议题在一周以内反反复复，但也让民众看到了未来改革的趋势，学生家长纷纷投资明星学校附近房产，造成明星学区房价飙涨。

2008年马英九政府上台，当年台湾“教育部”便通过决议决定推动“十二年国教”，改变高中职入学方式，获得民众正面响应。2009年，台湾民间成立多家呼吁“十二年国教”的民间团体，或以召开记者会，或以上街游行的方式表达对“十二年国教”的期盼，7月12日，台湾各县市83个家长团体及教育团体发起“我要十二年国教大游行”，提出诸如“不要采计在校成绩”“废除基测面试上高中职”“不要应试教育，要健康快乐成长”的口号，表示对“基测”考试入学的反对以及对免试入学的诉求。

2010年，台湾“教育部”召开第八次教育会议，会议闭幕时，时任“行政院长”的吴敦义表示：“十二年国教‘坐而言’的时代已经结束，要进入‘起而行’的阶段。”2011年元旦，马英九在“建国百年”文告中提出，将启动“十二年国教”，在2014年高中职学生达到全部免学费，大部分免

试入学。同年5月，“教育部”宣布预计2020年完成十二年过金教育，七成学生免试入学，三成学生通过明星高中特色招生的形式入学。原本应民众呼吁而进行的“十二年国教”改革，在推出之后又引起了民众的反对。支持高中职均质化的民众表示明星高中进行特色招生依旧是“旧瓶装新酒”，学生依旧需要准备考试，甚至难度要大于“基测”，而反对高中职均质化的民众则认为这种改革会使得学生素质变坏，要求政府暂缓实施“十二年国教”。

明星高中的存与废

“建国中学”（简称建中）是台湾最早设立的公立中学，也是台湾最富盛名的明星中学之一，马英九即毕业于此校，而坐落于“总统府”对面的台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学（简称北一女）则是台湾最出名的女校之一。每年建中有四成以上的毕业生考入台大，北一女则有三成五以上的毕业生考入台大。每年台大大一新生中，来自建中和北一女两所高中的学生就超过两成五，最多时候能超过三成，可谓是台湾最优质的两所高中。在马英九宣布2014年进行“十二年国教”之后，现有高中生中反对声浪最大的也来自这两所中学。

2012年4月，建中几名高中生利用课余时间对北北基（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3000位国中生进行调查，结果有45%的学生接受目前的考试制度，50%的学生认为“十二年国教”会使得学生的素质变差，因此建中学生和教师要求暂缓实施“十二年国教”。一个月之后，北一女学生发起“反对十二年国教匆促上路”运动，来自全台北中南总共数十位高中生向“教育部”请愿，并在“教育部”门口召开记者会，反对“十二年国教”的仓促实施。

台湾“清华大学”李家同教授认为，“十二年国教”一直给民众一种打倒建中这类学校的印象，这种反精英分子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的，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要靠一小撮精英分子的，民众不应该希望人人都成为所谓社会的精英分子，也不能将精英分子的学业程度拉下来。建中校长陈伟泓则公开要求“十二年国教”延后六年实施，以免“失去的比得到的多”。

对此疑虑，马英九曾以亲身经验保证，“十二年国教”上路之后，明星高中不会因此江河日下。马英九说，他和他女儿都是明星高中毕业，了解明星学校的感受。但是“十二年国教”的目的不是让明星高中变差，而是让其他高中变好，让更多学生有更好的教育品质。

明星高中对“十二年国教”的反对主要集中在免试入学的方式上，并在此与台教育部门持续拉扯。根据“十二年国教”“免试为主、特招为

辅”的招生方式，建中和北一女纷纷要求只开放15%的免试入学比率，以控制生源。对此，台湾“教育部”不得不祭出强硬手段，通过修改“高级中学学校多元入学招生办法”明文规定，2014年起，总计免试招生名额须达到75%，各校免试比率至少25%，如有明星高中不遵守该规定，以违法处理。

免学费引发“排富争议”

除入学方式发生了变化之外，“十二年国教”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为了达到教育均等，保障学生受教权益的目的，实施了“免学费”的政策。2012年9月，台湾“教育部”宣誓一口气编列未来五年“十二年国教”的经费，平均每年投入340亿（新台币，下同），总计1700亿。目前台湾每年教育总经费约为5000亿，也就是说，“十二年国教”上路之后，台湾每100元的教育经费，将有7元花在“十二年国教”上。

对于高中职的“免学费”政策，台湾民间纷纷表示高中高职全部免学费也会造成高职的招生问题。根据台湾“教育部”统计处的统计，2002年台湾“国中”毕业生已经低于30万人，预计到2020年更要跌破20万人，在高中高职学校数量总额不减的情况之下，如果高中高职同样免学费，会使得高职学校招不到学生。对此，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江宜桦与“教育部长”蒋伟宁开会后表示，将采取“适当排富”的原则进行政策推动。为鼓励学生进入高职学习，台湾全部高职学生免学费，而高中则进行“适当排富”的原则，以家户所得是否达到114万元作为门槛进行衡量。但此项政策也被抨击，台湾全家盟荣誉理事长谢国清认为，这种方式是对高职“贴标签”的方式，让弱势者不要去念高中，有歧视嫌疑，并不妥当。

此外，不分公立私立一并补助的问题也让民众有“劫贫济富”之感，公立私立学校通通补助会导致“公私颠倒”的情况，让私立学校也拿到补助，学生会逐渐抛弃公立学校。目前，台湾诸多明星高中职中以公立学校为主，收费相较于私立院校便宜不少，然而“十二年国教”上路之后，由于公立私立通通补助，有人担忧会使这种情况颠倒。台北市补教协会总干事张浩然说，“十二年国教政策”之下，以往“先进入私立国中，再考建中、北一女，再考台大”的思维会逐渐被“在明星私立学校读六年中学再考台大”所取代，“十二年国教”会让“私立学校”占尽好处，他们在“国中”阶段先通过入学考试挑选较聪明或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学生，之后又以“直升高中”、“免学费”等诉求吸引学生和家长。

对于这种疑虑，台中市教育局长赖清标指出，现在私立高中职有两极化的现象，有些学校很热门，也有学校招不到学生，而私立学校的教学热忱以及对学生的关注是更加投入的，如果公立学校失去学费便宜的

优势之后，公立学校想要维持过去很高的声誉的话，可能要加强老师的教学及对学生辅导的热忱。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私立高中职跑到公立高中职的前面去。

免考试，学生压力不降反升

“十二年国教”实施之前，台湾采取每年两次的“基测”方式对准备升入高中职的“国三”学生进行考察，对学生的英语、自然、国文、数学、社会以及写作能力进行测验，其中前五项满分为80分，写作满分12分，总分满分412分。学生凭借“基测”成绩进入高中职进行学习。而“十二年国教”之后的取代“基测”的“会考”考试科目不变，但成绩只分为三个层级，即“精熟”、“基础”和“待加强”。而入学方式则是学生申请加学区分配的方式，学生可以依靠“会考成绩”和特长参加明星中学或心仪学校的单独招生，也可以在自己所在学区注册入学，已达到高中“社区化”的目的。

由于明星中学仍需单独考试以及申请之需要，台湾“国中”学生表示入学压力未降反升，以前只需要准备好“基测”考试，现在在此之外还需要应对申请而准备一些“志工”经历和“学生干部”经验。据台湾媒体报道，为应对“十二年国教”的要求，台湾“国中”竟然出现了全班皆干部的怪象，甚至连午餐之后回收垃圾都设置了“回收长”、“垃圾长”、“板擦长”的职位，让人哭笑不得。而台湾“清华大学”李家同教授也认为，为了免试入学时占据优势，学生为升学抢当志工，则是对志工的侮辱。

台湾“国科会”主委朱敬一在台湾一场校园演讲中说，最近他看到路边一家补习班广告上写着“十二年国教我们准备好了”的字样，感到非常讽刺。台湾电视名嘴、前台北教育大学校长庄淇铭在记者会上也说，这项政策只会让教育成为有钱人的专利，看似要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最后却迫使“国中生”沦为证照数量的竞赛，最后还是肥了补习班。庄表示“国中”是培养学生人生观和人生方向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让学生们考证照，是揠苗助长，目前台湾证照报名费少则500，多则上千，对弱势家庭更是一个大的负担。

对于“十二年国教”造成的补习现象，台湾“教育部长”蒋伟宁表示，补习如果是补强正规教育的不足，那不是坏事，但是如果补太多，学生的创意、斗志都会补不见。蒋表示，在“十二年国教”下，学生可以多元发展，并且到家里附近不错的社区高中就读，学习压力会减轻，二三年后补习状况就会缓解。

除高中职入学方式和学费进行改革之外，台湾高校还推动了名

为“繁星计划”的改革引导“国中生”就近入学，推动高中就学社区化。

2006年，台湾“清华大学”校长陈文村为缩减城乡差距，以“推荐报送”的方式办理单独招生，为台湾每一所高中一个推荐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的名额。2007年，又有25所大学加入该计划，总共提出1700多个名额进行招生。到2011年，台湾共有68所大学加入繁星计划，招生名额增加至8500多名，共计有近400所高中参与报名，为台湾偏乡高中、社区高中以及原住民高中的毕业生提供了更好的升学机会。但是台大校长李嗣涔曾表示，台大长久以来招收明星高中毕业生的主要目标不会变，但繁星计划是台大招生计划突破的一个策略，如果台大要做到向高中一样就近入学开放名额给社区，并不可能。

第六篇 台湾国学教材“登陆”幕后

特约撰稿员 / 徐伟

9月22日16时，热带风暴“天兔”即将登陆广州，城市主干道的荧光屏上，发出了橙色预警，山雨欲来风满楼。

此时的华南师大附中，刚刚举办完2013年两岸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交流研讨会，主办方之一大陆中华书局副编审祝安顺、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前院长董金裕等人，匆匆走出会场，准备赶上最后一趟去上海的列车，以参加次日在复旦附中举办的相同主题的研讨会。

这样紧锣密鼓的研讨会还有五场，分别在合肥、武汉、衡水、郑州和北京，几乎都是选择在当地最好的中学举办，而目的正是为了推广中华书局从台湾引进的高中国学教材——《中华文化基础教材》。祝安顺是中华书局经典教育推广中心主任，也是引进、修订和推广此书的全程负责人，而董金裕则是台湾原版教材的主编。

这套教材的引进，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巨大轰动，国务院台办公开发言表示支持，两岸媒体更是视之为双边文化交流迈出的重要一步。如此广泛的关注度，是中华书局没有预想到的。

教材8月底才印出，便已有近200所学校的老师表示有意向使用此书，有30多所全国重点中学，已经确定在今年高一或高二年级开始使用。“但我们并不着急全面推广，也没太在意销量，而是想在部分学校先做实验”，祝安顺说。

并非首套台湾教材“登陆”

中华书局向来以古籍整理闻名，出版教材不过是近几年的事。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于丹的《〈论语〉心得》系列丛书，前后发行逾700万册，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同时，还在大陆掀起了持续至今的“国学热”。

一时间，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读经班”“孔子班”，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国学总裁班”遍地开花。作为《〈论语〉心得》的责编之一，祝安顺看到了国学的巨大市场需求和生命力，进而产生了要在中小学校推广国学教材的想法。

在他的建议下，中华书局成立了“经典教育推广中心”，任务有二：一是在中小学校推广国学经典教材，二是培养一批中小学国学教师。到

目前为止，已经陆续出版了《中华经典素读本》《中华国学课本》《中华经典义理教材》等6套国学教材，而此次从台湾引进的《中华文化基础教材》，正是此体系中的一种。

《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在台湾的原名是《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此课程在台湾已经开设了整整60年，虽历经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然国学传统弦歌不辍。

许多大陆人旅台归来，都会对台湾人的温良恭俭让深有感触，并叹息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得以更好的保留，这套教材在其中功不可没。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经历了“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后，大陆延续数千年的文脉断绝（陈丹青语），国学已成稀罕物，竟落到要从台湾取国学之经的境地。

实际上，《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在台湾有五六个不同版本，而此次从台湾引进国学教材，亦非“开历史先河”之举。早在2008年，叶匡政就引进过由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所长李主编的版本，命名为《国学基础教材》，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当时也想引进此套教材的祝安顺，误以为这是唯一版本，遂多次代表中华书局，找叶匡政商量版权转让事宜，但最后未能如愿。

众多“巧合”铺平引进之路

正为难之际，众多的巧合为祝安顺引进另一套，即董金裕版教材，开了一路绿灯。

祝安顺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师从国学大师钱穆之子、历史学家钱逊先生，而董金裕曾在台湾多次亲聆钱穆先生教诲，以钱穆“学生”自居。同时，钱逊与董金裕皆为“国际儒学联合会”成员，两人颇为熟稔。

在2012年5月四川大学举办的弘扬儒学会议上，董金裕向钱逊介绍了自己主编的这套教材，并赠送一套给钱逊。更为“凑巧”的是，在这套教材新增的“今人今事”栏目中，正是以其父钱穆作为教育家的典范案例。

在此次会议结束后两个月，祝安顺在拜访老师钱逊时，向钱逊谈到了想引进台湾版国学教材，却找不到版权单位的问题，没想到老师正好跟此书主编认识。于是，接下来的版权转让过程就比较顺利了。

钱逊从中穿针引线，向董金裕介绍了祝安顺，并转告其想法，董金

裕亦欣然答应，随后的版权转让问题两位老人都未插手，而是让中华书局跟版权所有方台湾康熹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直接交涉。康熹公司专门从事教科书、参考书出版，在2006年买下董金裕版《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版权，并于2012年完成修订再版。

董金裕告诉本刊记者，中华书局和康熹公司的联络都是通过邮件或电话，没有直接见过面，竟洽商成功，而中华书局企图引进此书的计划，亦没有受到有关部门的阻止或诘难，只是在国家版权局进行了登记。

相比之下，叶匡政在5年前引进李版教材的过程，则坎坷得多。他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在出版界有很多熟人，但当时找了许多家出版社，都没人敢出版。“实际上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引进台湾教材，但他们都进行自我审查，不敢出版，直到找到新华出版社，才最终答应下来。”

台湾教材如何“大陆化”

当时，叶匡政对引进的版本并没有作太多修改，只是在个别地方改成了大陆人习惯的表述方式，比如把“蒋公”改为“蒋介石”，把一些过度政治敏感的地方予以删除等；但中华书局在引进董版教材的时候，改动颇大。

根据中华书局方面介绍，修订版教材与原教材在内容和体例方面基本一致。分上下两册，配以教师用书。上册为《论语选读》，下册为《孟子选读》与《学庸选读》，内容以儒家经典《四书》为主，面向高中学生进行分类讲解，分为22个单元，共计选入《论语》168章、《孟子》50章、《大学》4章、《中庸》4章。

每个单元之前均附有“引言”，之后则设计有“问题与讨论”，各章中穿插“章旨”、“注释”、“解读”、“相关名言”等板块。教材在编选上打散《四书》原有篇章次序，采用分类编辑的形式，分为孔子的为人、论学、论仁、论教育、论政治等主题。

中华书局邀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机构的学者，对正文的字、词、句、章节的注释和解读进行了修订，增删了部分内容。并邀请北京四中、北大附中、华南师大附中、上海光明中学等高中一线语文骨干教师，对原教材中的“今人今事”和“历届大考试题”等教学模块，进行了全面改写。

原著中“今人今事”模块，所选人与事以台湾地区为主，而在中华书局修订版中，扩大了选入范围，选择了更多大陆学生所熟悉的案例。

而“历届大考试题”，原教材选择的是台湾地区高中大考试题，修订版则改为以大陆的全国高考试题、地方高考试题，以及高校自主招生试题为主，少量添加了港澳台和新加坡的相关试题。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在分工修订完成之后，中华书局并没有重新组织所有修订者集体讨论，亦没有将最终修订版交给原主编董金裕和版权所有方康熹公司审核。董金裕对此略有微词，他认为其中一些章节相互“打架”。在他的原版中，为了前后统一，所有的注释都以南宋朱熹所注为准，而在大陆修订版中，几位学者有的参照朱熹版，有的参照魏何晏版，有的则参照北宋邢版，他们的注释各不相同，甚至有相互矛盾的地方。祝安顺回应称，将在试用一年后，收集各方意见，在明年重做修订。

第七篇 台湾国学教材之演变

特约撰稿员 / 徐伟

董金裕版《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在1989年便开始使用，此后的25年间，经过数次修订、增补完善，是台湾高中使用范围最广的版本，目前约占48%的市场份额，有5.3万学生使用，包括桃园高中、台南二中、台南女中等知名学校。

据董金裕介绍，台湾高中的国学教材演变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最开始命名为《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于1954年在师范学校使用，这种“师范学校”是国中（相当于大陆的初中）毕业后所读的3年制学校，毕业后可以当小学老师。试行两年之后，反响不错，遂于1956年在高中推广，附属于国文课，被列为必修课程。高中3年的6个学期，每周授课1小时。

所用教材最开始的版本是白文本，按原著篇章次序，选录《论语》《孟子》的白文，没有注释，目前已经找不到这一版的教材，所以主审定者是谁也难以考证。随后经历了李曰刚编注本，以及陈立夫、林品石编注本。

抗战时期，陈立夫曾担任了七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主导了战时教育制度改革，包括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贷金制度等。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读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他建立的贷金制度。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陈立夫因陈家失势而退出政界，旅美近19年，并从事《四书道贯》一书的写作。至1969年才回台定居，专事文化工作，并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而他所编注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正是以《四书道贯》为蓝本。

此书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篇归纳讲解，使之成为有系统的整体，但内容过深，超过了高中生的学习能力，不被教师和学生接纳。自1983年推出后，反对声不断，才有了改编的下文。

董金裕时任陈立夫的秘书，与之关系甚笃。即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每提到陈立夫，亦必加上“先生”二字。陈立夫向董征询修订意见，董认为不如另起炉灶重新编著。

1988年，董金裕遂挑起了国立编译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编辑小

组召集人的重担，开始接手改编教材。他曾任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任政大名誉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专研理学及儒学。这一次的编写，用董金裕的话说，最大的突破在于不以《四书》原篇章次序段的框架，而是将所选录的《四书》重要篇章依内容分类排列。

国立编译馆于1932年成立于南京，后随国民党迁往台北，是“中华民国政府”最高编译机构，也是“中华民国”各级中、小学教科书的“唯一”供应者，升学考试基本上以其教科书为范围。

1994年，台大教授黄武雄发起“教改”大游行，有近1.5万人参与，统编教科书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99年，台湾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统编教科书时代终结，民间编写教材放开，各校也可自行决定采用何种版本的教科书，而台湾的教育部门负责制定教材标准，这就是所谓的“一纲多本”，而目前在台湾中学流通的有五六个版本。

由于董金裕1988年版的教材极受欢迎，所以其后的各个版本，几乎都是按照董版的方式来编写，架构和分类方式大同小异，而其中一些版本也在使用过程中被淘汰了，包括李的版本。

从1954年至2006年的半个世纪，该课程都属于“必修”。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一直高喊“去中国化”的论调，这种政治斗争亦波及到教育领域。

董金裕介绍，“陈水扁本来想把这个课废掉，因为原来的课程名称叫做《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但是陈的主张遭到反对，因为大家觉得这套课程长期下来效果不错，他最后妥协了，但要求把必修改为选修，从国文课独立出来，学时由原来的6个学期改为两个学期，以前教3年的课，现在最多只教1年。同时，《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这一沿用几十年的课程名字，亦被改为《论孟选读》。”

这样的闹剧并没有持续多久，根据台湾“教育部”2011年的调查，开设选修课《论孟选读》课程的学校达到70%以上，而购买此书的达到80%以上，有的学校虽然没有开课，但是要求学生要买这套书作为参考，每次考试，都划出一部分列为考试内容。

2011年3月，国立编译馆并入教育研究院，改组为教育研究院编译发展中心、教科书发展中心。在台湾“教育部”的组织下，再次以董金裕为召集人，在原版基础上，重新修订《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经过调查，他们建议恢复该课程为必修课，但是已经被占掉的课时，难以再让出来，所以改为“必选”。两个学年，4个学期，每个礼拜

一堂课，授课的时数有所增加。这一次修订增加了“今人今事”等内容，但“去中国化”的呼声并未在岛内消除，于是书名亦由原来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变成了《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第八篇 生源危机重创台湾私立高校

记者 / 马军

“为彻底解决部分私立大学生源不足的困境，政府将鼓励一些不达标的学校自主退场”。台湾“内政部长”李鸿源近日作出这样的表示。

这些学校退场后，政府将核准学校用地转变为价格更高的商业用地进行变卖或开发，以补偿运营造成的亏空。长时间困扰台湾高校的招生问题，或许能够通过一些学校的关门消失得以解决。

台湾官方为何鼓励私立高校退场，或许从这个场景中能得到点灵感。今年初，一场台湾大学生足球联赛中，虎尾科技大学足球队吸引了诸多观众的注意。这所来自台湾云林地区的科技大学派出的首发阵容11人全部来自于越南。三场失利之后，虎尾科大一分未得被淘汰出了复赛。赛后虎尾科大的教练表示，球队成绩不佳的原因是去年初赛队伍中的主力队员全都毕业回了越南，导致复赛只能依靠替补队员应战。

与虎尾科技大学一样，不少参加台湾大学生足球联赛的大学校队都依赖外籍学生打天下。究其原因，一方面和台湾民众对足球热情不高，本地大学生并不热衷有关；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体现了台湾大学的“招生危机”，类似于虎尾科大这样的身处台湾偏僻地区的非名校无法招到足够的本地生源，只好通过各种方式招收海外学生以填充，避免关门窘境。

台湾大学生源危机由来已久，曾经的广设大学政策与如今的少子化趋势都被认为是造成这一危机的重要原因。台湾历任“教育部长”均曾提面出诸如“合并学校”“增加补助”等在政策试图扶持招生困难的学校，但都成效不彰。

“少子化”的冲击

近年来，台湾每年仅有不足20万人的新生儿，来面对160多所高校所产生的将近30万入学名额的等待。根据台湾世新大学校长赖鼎铭的预言，最迟2016年便会有大学倒闭。赖鼎铭的算法很简单，1998年台湾只有28万人降生，就算这些人2016年全部进入大学，依然无法填满大学名额。而1998年之后，台湾的年出生人口更是逐年下滑，未来更是看不到大学招满的可能性。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出生人口就从40万人一路缓步下降，每年以1万-2万人的幅度跌落。到2009年，全台仅有19万人出生，为避免

生出“虎”娃，虎年2010年台湾仅有不足17万人出生，再创历史新低。虽然台湾从“中央”到地方都推出了生育补助政策，但每胎2万台币的生育奖励和每月2500元台币的育儿津贴显然不足以刺激台湾民众的生育率。据统计，台湾最近几年的平均生育数仅有1.05个左右，不仅远低于周边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比照“（生）两个不嫌少，（生）三个不嫌多”的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更是差距明显。

少子化给台湾带来的危机不仅仅是大学招生问题，按照台湾“教育部”给出的数字，未来几年内，台湾的中学招生都会出现问题。目前，台湾“国中”平均每个年级约有30万人在读，而今年小学三年级生仅有24万人，即便这些三年级生三年后全部升入“国中”，也至少有6万的缺口无法填补。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台湾开放大陆学生赴台读书之后，通过吸引陆生的方式拯救台湾濒临关门高校的呼声也一时四起。但是根据已经结束的三届招生情况来看，每年两三千人的名额都无法招满，陆生只对台湾排名靠前的名校感兴趣，偏乡地区的私立高校根本无法招到陆生，依靠陆生拯救台湾高校的想法并不实际。

广设大学的迷思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职业教育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每每提及自己的成功经验，台湾首富郭台铭总会将一部分的原因归结于自己曾经在“中国海专所”接受到的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发达的台湾，并不需要太多高校吸收高中毕业生，因此，在1993年之前，台湾只有50所左右的大学。

1994年，台湾开始实行“广设大学”政策，为了让校名更响亮更有吸引力，台湾诸多技术学院纷纷升级为科技大学，技术专校则顺势更名为技术学院。20年不到的时间，台湾高校数量增加了两倍，现在已经超过160家大学。

目前遭受“招生危机”的高校中，绝大多数都是“广设大学”政策之后升格或新成立的学校。在台湾各科技大学中，除老牌名校如“台湾科大”“台北科大”以外，其余各校招生情况均不理想。位于东部、南部等偏乡地区的私立学校，即便推出“免住宿费”“入学送平板电脑”等优惠政策，招生情况依旧不让人满意。据台湾“教育部”给出的数字，台湾每年科大系统和职业院校的缺额高达1.6万多人。在大学遍地的台湾，听起来“低人一等”的科大和职业院校将是高校关门潮的第一批浪花。

“招生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首先体现在了大学教师上。此次台湾大学退场争议源起于屏东永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欠薪风波。9月初，永达职业技术学院二十几名教师包车北上“教育部”表示已经被校方欠薪八个月，要求“教育部长”蒋伟宁给条活路。

面临“饭碗危机”的并非永达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一个群体。近年来，由于僧多粥少，继“流浪教师”之后，四处代课谋生的“流浪博士”团体也在台湾出现。据统计，博士生毕业一年后，待业或失业比率高达4.5%，比高中职学历的民众还高。

造成“流浪博士”现象的原因很简单，最近十年，台湾超过160所大学院校培养出的博士毕业生，从每年1500人，到将近每年4000人。而最近十年台湾所有高校才增加6000个教学职位。非名校毕业的博士连面试机会都找不到，只得四处代课以求温饱，代课费每小时仅有600元新台币上下。曾经有“流浪博士”投书台湾报纸，表示自己月薪不足2.2万新台币，低于法定大学毕业生最低薪资。

此外，“广设大学”政策使得台湾大学生的品质逐年下滑。1990年以前，台湾的大学入学率仅有不到30%，大学毕业生被认为是人中龙凤，而目前这个数字已经超过97%。2008年，一位学生以7.69分考入大学，创下当年台湾大学入学分数新低，也让全台湾人大跌眼镜。目前，台湾大学毕业生月薪已经不足2.5万元新台币，和16年前的薪资持平。在各个学历的比较中，大学生的就业率也是最低的。

引发争议的无奈之举

面对少子化的冲击以及“广设大学”政策的负面遗产，台湾历任“教育部长”都曾提出“合并”“补助”等政策扶持排名后段的私立学校,但效果均不甚理想。由于不少学校都是当地政治桩脚，甚至干脆是当地政治人物所经营,政府一般不敢得罪，此次作出的以土地为诱因鼓励私校退场也是无奈之举。然而即便如此，提出此政策的台湾“内政部长”李鸿源还是被批的满头包。

根据台湾相关法律规定，如果私立学校破产或解散，校地需要充公。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任何一家私校愿意退场。“广设大学所造成的后遗症在法律上已经无解，是政治问题，通过地政手段鼓励私校退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李鸿源所提出的地政手段，指的是私校退场后，政府收回部分土地，其余校地返还给校董进行买卖或开发，所得用于教职工的遣散费

用。然而台湾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却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谴责李鸿源为私校退场争议恐吓社会，批评李的政策是“假退场、真图利”。声明中说，如果台北市精华地段的私校退场，将获得上百亿元的暴利。若此政策最终出台，将会有没有招生问题的私校恶意退场，校方得利，教师遭殃。

声明中还提到，私校退场后给予教师遣散费用的不是校方，而是由“教育部”督导的私校退抚基金管理会，如果教师拿不到遣散费用，是“教育部”的失职。面对这些批评，李鸿源只是简单地回应道，“内政部”是在为未来五到十年会发生的问题积极寻求解决之道，希望各界给予意见，而不要急着批评政府。

目前，台湾教育部门已经编列出了包含29所私校在内的辅导名单，包含21所高中职与8所大专院校，如果这些学校发生招生或欠薪的问题，“内政部”和“教育部”将对其进行转型和退场的辅导。至于这29所学校的具体名称，官方则不愿透露。

精彩推荐：《你能拿到多少养老金》



点此阅读

第九篇 台湾课纲“微调”之争

撰文 / 杨素

虽然才过农历新年，但近日台湾政坛并不宁静，尤其教育部门最近计划推动的课程课纲，更意外成为蓝绿相互争议、指责的焦点。事实上，台湾社会表面看来风平浪静，但每逢选举或重大议题，两岸与统独争议即时常浮出台面。课程课纲是历史教育等意识形态的“战场”，自然也是冲突连连。

其实，李登辉在执政末期，就根据他的“两国论”观点，由杜正胜等泛绿学者撰写了一本国中历史教科书《认识台湾》，启动了一连串教科书去“中国化”的大工程。陈水扁执政时期更据此主要架构，特别针对台湾史的内容，要求台湾教育部门发动过一波课纲与内容的调整，决定去除教科书中“不当文字”，大规模改写历史教科书，也引发蓝营反弹和民众恐慌。因此这波意识形态上的争议，表面上是文化之争、教育题材之争或名词用语之争，其实，其中统独之争正若隐若现。

拨乱反正？政治介入？

争议的起源，导因自台湾教育部门在1月中下旬宣布将“微调”高等中学教科书中的国文、社会科课纲，内容包括把“中国”改成“中国大

陆”、“日本统治时期”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于慰安妇的描述增加了“被迫”二字；“郑氏统治”改为“明郑统治”，“清代统治”则改为“清廷统治”；以及对日据时期大东亚共荣圈解释加入“侵略”概念等。

事实上，台湾现行社会科课纲在陈水扁时期调整实施后，的确出现一些明显缺失；马英九上任后虽删去“台湾定位未定论”等内容，但教科书中明显违宪的用词与概念仍未修正。例如教材中，从清朝统治到日本殖民统治间，没有提到甲午战争、清廷战败或割让台湾，也没有提到对日抗战、大批军民流离失所。简言之，学生通过参考书或课本接触的是片断且遭刻意扭曲的观点，导致台湾史与明清、民国历史无关，反而以荷兰、西班牙、日本为主体的印象，与中国历史“一刀切”。

也因此，这次在马英九主政下，台湾教育部门所持理由，是质疑现行教科书台湾史与中国史切割太清楚，造成不连贯，且许多内容偏离宪法与史实，所以决定调过来。全案预计8月1日实施。

尤其内容方面，增加了早期汉人来台、清廷在台现代化建设，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对台影响等史实；也增加了国共内战及两岸分治的中立描述，增加反共政策原因等；并提到日本殖民政府是为“扩大其殖民利益”从事建设，且新增“讨论殖民政府对台湾人民经济与土地的侵害，以及多数贸易由日本商社所垄断”。

但此举却立刻遭到民进党与独派人士连番炮轰，质疑相关做法违反程序正义、“黑箱作业”，其中充满“亲中仇日”的历史观，凸显“马政府”试图在教育上“去台湾化”；言下之意，直指台湾当局想把统一思维纳入教育当中。是以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台南市、宜兰县、嘉义县、云林县、屏东县等六县市，立刻联合宣布将抵制台湾官方版的高中历史课纲微调，将续用2011年通过的旧课纲与教科书。许多亲近绿营的教育与团体更痛批“马政府”是“对学生洗脑”、“粗暴乱调”，早已涉及实质修改，并起用非历史专业者来制定历史课纲，都让人无法接受。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更跳出来批评，台湾教育当局的手法是一种“谎言教育”的政治手段，一如早期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人们从小被教育“反攻大陆”、“杀朱拔毛”，后来被证明谎话连篇。所以这些调整是走回头路，不仅民进党坚持反对到底，“人民也会唾弃”，盼“马政府”悬崖勒马。

但蓝营则立刻反击。从2004年民进党执政开始，就大幅调整教科书内容，大幅灌输“一边一国”的思维，甚至将孙中山视为“外国人”，将“台湾地位未定论”纳入教材中，相较之下，谁在“政治洗脑”、“政治绑架教

育”？

更有学者指出，过去民进党版的教科书，说日本人在台湾建设铁路，成为台湾铁路发展的基石，但事实上，在日本人之前，清朝的刘铭传就已在台湾建设铁路。又说日本人在台湾卫生做得很好，但真正原因是为了让更多日本人愿意移民台湾，出发点根本不是为台湾人着想，都应该在教科书中讲清楚。

不过面对绿营与亲绿媒体的批判一波接一波，台湾教育部门还是被迫站出来亲上“火线”，正面回应各类质疑。例如“教育部长”蒋伟宁就表示，课纲微调的做法“合宪、合法、合程序”，尤其将现行在历史、地理课本中的“中国”，改成“中国大陆”，也绝对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所以“完全没有去台湾化，去日本化倒是有一点”。

统独争议 愈演愈烈

有趣的是，“独派”之所以反弹这么大，就是因为对这些反对人士而言，国民党所强调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独派”人士深恶痛绝的“大中国”史观、“统一”史观。对泛绿人士而言，这部宪法中强调台湾与大陆都是“中华民国”领土，只是台湾当局管辖着台澎金马，对岸则是大陆地区。所以一些特殊规定与调整都着重在描述“国家统一前”需要，也预设了“国家统一”愿景，也就是所谓“一中”原则，所以讲穿了，这一连串的争议，实质上争议点还是“统独”的认同问题。

事实上，台湾许多宪政学者均强调，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即同属“中华民国”，自然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如果民进党想反对，最根本之道，就应该公开提出“修宪”，将“宪法”的“一中精神”加以废弃，而非不断杯葛与反对。但反观民进党执政时不敢主张“修宪”，推动法理“台独”，却拐弯抹角地在历史课纲中塞进与“中华民国宪法”格的元素。所以现在国民党只是改回到现行“宪法”的史观，民进党却加以斥责，无异于是自我矛盾、政治诈欺。

参与课纲修正的世新大学教授王晓波则说，课纲用过后发现有问题，本来就需要调整，“补强”原本内容。他强调，这次的微调具有坚持“中华民国宪法”、台湾主体性的两大原则，更把“228事件”、白色恐怖各列为一个主题，不仅加大台湾化，更提升台湾人尊严。反倒当初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委托外界研究，因议题敏感，而导致一堆学者“一点道德勇气都没有”，根本不敢答应接受委托。

他也强调，过去国民党戒严时期，他就曾去函要求在历史课本加入

台湾史内容；但殖民是破坏人权与世界和平的手段，至今已成普世价值，任何高中历史教科书都不应再过度美化日本殖民历史。尤其部分教科书写到慰安妇，竟然还加上“自愿参加”等字眼，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他才坚持要在慰安妇后面加“被迫”二字，避免书商解读不符史实。

另有参与修改课纲的学者也强调，这次把课纲“中国”改为“中国大陆”，是因过去民进党推动的课纲主打不合宪的“一边一国”，事实上，全世界的历史教育皆是立国精神教育，由公权力主导，何错之有？这波反弹声浪，其中有些人是假多元之名，实际在鼓动反对“中华民国宪法”之实。事实上，“民进党没必要把台湾和中国对立起来、把回归‘中华民国宪法’等同于回归中国”。

不过亲绿团体则依旧质疑课纲微调根本是政治力涉入，“黑箱作业”，“处处显见精心安排和不合常理”，却偷偷摸摸进行。立场较激进者甚至公开主张台湾史应该属于世界史的一环，“中国史只是整个台湾史其中的一环”，不该被外来单一政权强加大中国史观；也有泛绿学者认为“教育部”既称课纲微调是“宪法”问题，就应该举行光明正大的“宪法”和历史的公开辩论。

甚至，由于刚好台湾大陆事务负责人王郁琦出访南京，绿营人士更祭出民粹言语及批评，把课纲调整与两岸关系牵扯在一起，质疑国民党将教科书中的“中国”将一律改称为“中国大陆”，是企图搞党国思想复辟，导致台湾教育为意识形态服务，沦为“王张会”顺利举行的“贡品”、“伴手礼”，以替代迟迟无法过关的服贸协议给大陆交代；更藉此在推动与中国“思想统合”，设置好未来有一天走向与中国“政治统一”终局的既定轨道。

谁关心教纲争议？

说来好笑，泛绿人士团体对微调一事视为万般重要的大事，不但要求教育当局撤回课纲微调案，更有许多人打出公民团体、公民教师的招牌，计划发动网络联署与陈情，以及后续的大型公民行动，要“焦土抗争”，直接展现公民意志。但许多受访的高中生却直言，不太在乎课纲怎么改，只想知道课业会否变重，考非选择题是否有不同答案。

这就是台湾内部所呈现的巨大差异，蓝绿争执，对史观认知的南辕北辙，以各种形式占据了太多版面，导致媒体的高度关注，但一般人并不十分在乎这些争议话题；一如此间政治观察家所指出，民进党虽疾呼蓝营此举“不符合主流民意”，但什么才是主流民意？又如何解释当初陈水扁阵营把许多“独派”思维偷渡到教科书内容中？如果日本对台湾的统

治不叫“殖民”，掩饰日军历来屠杀台湾人民的罪行，如此史观追求的到底是台湾主体性，还是日本的主体性？

讲述台湾历史，必然要面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对这块土地源源不绝的影响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反观许多绿营人士，近期常把维持现状之说，甚至不排斥现行“中华民国宪法”架构等主张挂在嘴边，甚至举行“华山会议”，在其“2014对中政策检讨纪要”也稍微转变两岸态度，并期待进行深入的民共对话，但为何又在课纲议题上被拉回基本教义派的主张，突然又反起“中华民国宪法”？

说来简单，一切无非为了选举。为吸引中产阶级与中间选票，稳定两岸情势，需要抑制“独派”色彩；但要进行党内竞争，拉拢群众在小规模选举中的支持，又最好能获得深绿选票的青睐，持续高举“台独”旗帜。所以绿营的矛盾与摇摆，无非是政治的现实主义使然。但总让人不够放心，不知未来何去何从；无疑地，这将是民进党迈向执政之路无可回避的难题。

至于蓝营人士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当然也可以说是经历过“扁政府”时期课纲攻防，许多立场较激进的蓝营势力已在主动选择意识形态战场，为自己的主张与愿景而挣扎；企图在言论战场的焦土上打好这场攻防战。毕竟，从李登辉以降，统派言论市场一度受到紧缩，但这次争议，连国民党团都主动跳出来，宣称完全肯定并支持微调课纲；并称课纲微调经多次会议审议，有公共讨论和专业审查，一切符合程序，的确与过去制式反应大相径庭。

因此对蓝营而言，似已展开更明确的言论霸权争夺攻势；随着两岸情势改变，能否争取更多一点沉默大众支持，甚至愿公开表态挺蓝，当是未来台湾政情观察的重点之一。

第十篇 台湾野草莓学运 炮轰集游法

记者/段宇宏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最后，他们奔向我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是德国神父马丁·尼莫拉在反思二战时写下的一首著名短诗，在全世界被广泛引用，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更成为左翼激进派的口头禅。为期一月的台湾“野草莓学运”，在12月7日的台北千人游行之后，落下帷幕，尼莫拉的诗句也是他们最动情的标志性语录。

学运期间，置身于自由广场，有机会听到动情的演讲、颂扬自由的摇滚乐；可以欣赏各种祭悼人权的行动剧、形形色色的民主自由标语，除规模偏小之外，有点当年美国学运的味道。学运三大诉求是：马英九和行政院长刘兆玄下台，警政和国安首长下台，修正集会游行法。

“野草莓学运”是台湾近十几年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参与者多为1980年代末期出生的一代。引爆学运的起因颇为有趣。张铭清与陈云林先后访台，鉴于张铭清的遭遇，马英九政府加强对陈云林的安保措施，围攻和抗议的绿营民众与警方发生冲突，有些甚至是流血冲突，双方均有人负伤。部分台大的师生认为，政府维安太过，台湾人权已死，有回到戒严时代的趋势，于是就发动了学运。

学运命名为“野草莓”，有承袭当年“野百合学运”精神之意，据说发起者中不乏几个当年的“野百合”。

野草莓的颜色论战

“野草莓学运”发起人是谁，台湾媒体猜测不断，有诸多说法。一般认为是台大的范云、李明璁和中研院的吴人，三人皆是当年野百合学运的干将，在此次学运中频繁吹风点火，从学运命名等各方面情况看，这种推测的逻辑顺理成章。

台湾蓝绿激烈争斗的政治生态下，任何政治社会运动试图摆脱党派色彩，几乎不可能，野草莓是何种颜色的争执自然难以避免，颜色论战的热度甚至超越学运本身的热度。野草莓自己声称，他们不带有任何党派色彩，诉求完全中立。岛内主流舆论与大陆媒体的观点，均认为野草莓是一颗“绿草莓”，身后有民进党背景。

“抱歉，由于种种原因，我真的不能透露发起人的名字，只能说是一些台大的师生发起的，参与学运的人，各种政治观点的人都有，有蓝也有绿。”野草莓学运媒体联络组这样告诉记者。自从学运发生后，他们专设了媒体组，每天更换能言善辩的同学负责与媒体打交道，并于互联网上开设“联播网”，媒体公关颇显成熟。

的确，从各方面把野草莓鉴定为绿色，证据颇为充分，即使不乏个别野草莓的确是无色的。曾有野草莓在广场上喊“小蓝莓闪学运”，有时在演讲中偶尔奚落陈水扁与蔡英文，但主要矛头仍集中于国民党，对历史和现状的悲情式叙述，也符合绿营的一贯风格；民进党官员和立委对野草莓的关注与支持，与蓝营的低调和质疑也呈鲜明对比。

对野草莓进行声援的岛内外团体，几乎是清一色的绿色组织，如“全美台湾同乡会”、“世界台湾人大会”，连一个贯以“中国”和“中华”字样的台湾社团都没有。参与学运的很多老师和学生也被认为有绿营背景，并曾帮民进党助选。学运进行数天后，台湾多数媒体的关注度趋向冷淡，而亲绿的《自由时报》始终保持着报道热度，并配发措词激烈的评论予以声援。

“倒莓”一族来呛声

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有近六千学生从南北台湾汇集到中正广场，要求改革“万年国代”。学运的核心人物，后来不少成为民进党高层。尽管野百合迄今仍存争议，但此次学运对台湾民主进程的确产生过重大影响。

野草莓比他们奉为前辈的野百合更加有争议，正如媒体组所说：“我们还很不成熟，我们也犯过一些错误，我们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人们印象中，只要是学运，并且表达“民主自由”诉求，必定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追捧。孰料，此次学运在台湾社会遭到了强大的质疑与反对，甚至是另一部分师生和民众劈头盖脸的痛斥，还有人发起了反野草莓运动，“倒莓一族”因而诞生。

台湾民主化进程行至今日，政治运动已不再是单纯的官民之争，往往是“一部分人民抗议另一部分人民”，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色彩更加凸显。马英九和行政院长道歉，警政和国安首长下台，这是学运前三天的诉求，受到“是否是借机为绿营搞呛声运动”的质疑后，第四天又增加了修改集会游行法的诉求，此后更成为学运的重点。

学运进行到11月14日时，由于反应冷淡，马政府也未给予太多回

应，野草莓准备第二日举行南北会师大游行，吸引更多关注。本来预料将至少有千人集会，结果只有一百多人聚集到自由广场，备遭反对者奚落。广场一祭台上摆着马英九照片，照片上写着“夭寿”二字，也遭人讥为幼稚可笑。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参加学运的学生更加强调理性和非暴力，总体上得到赞赏。一蒙面女子曾在晚间集会现场批评野草莓，发言毕，学运领头人大喊：“保护她离开，不要让她受到伤害。”

野草莓说：“这一个月的学运，让我们变成熟了，增长了很多运动经验。”他们初步设想，在运动结束后，成立人权组织，将长期与公权力侵犯人权的行为抗争，随时都会站出来。

《集游法》修订的角力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发布命令，自第二日零时起，台湾地区解除戒严令。尽管直到1991年，才终止戡乱动员体制，但随着党禁报禁的解除，街头运动来势汹猛，必须要有相应法律出台。

1988年1月20日，《动员戡乱时期集会游行法》正式颁布，共35条。其中规定：“游行不得违背宪法或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总统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和各级法院等地区及其外围属禁制区，不得游行，但经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

台湾关于政党社团和集会游行的法律法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较，虽有自己的特色(如禁止“共产主义和分裂国土”)，但其他方面不比西方森严；民主化之后，实际执行中，好多限制也形同虚设，执法十分宽松，主张共产主义和分裂国土的运动和社团照样轮番上场。

此次“野草莓学运”要求修改“集游法”的诉求，具体包括：申请许可制改为报备制，把集游法由刑法改为行政法，废除禁制区，取消警察示牌解散的权力。野草莓的月末千人游行，即在法律未修改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次报备制“非法演练”，游行中警方给予了三次举牌警告，但未加以驱离。

1992年，《动员戡乱时期集会游行法》更名为《集会游行法》，并对其中15个条款进行修正，比之初版更为成熟。如初版第18条规定，集会、游行之负责人，要在场主持，并负责维持秩序；修订后增加了对集会游行场所废弃物、污染物进行清理的规定及处罚措施。2002年，再次进行修订，使之更加完善，但“严禁共产主义和分裂国土”的第4条一直

保存下来。

不过早在1998年1月23日，最高法院大法官对《集游法》多项条款作出了解释，其中认为第4条违宪，自大法官释法之日起失效。大法官将游行集会分成“内容”和“形式”两部分来解析，认为游行民众主张什么，属言论自由范畴，政府不当干涉；但以何种“形式”进行游行集会，如暴力或非暴力，是否危害社会和他人权益，司法部门得依法干涉。

在大法官对此释法前的5年中，台湾警方共受理集会游行申请31725起，其中未许可的108起，只占千分之三点四，比例甚低。

修改《集游法》、把申请许可改为报备制也是马英九的主张，他曾说过“把街头换给人民”。因“野草莓学运”，行政院和立法院再次把《集游法》修订提上日程。修改草案目前有民进党版、国民党立委朱凤芝版、国民党行政院版、“集游法修改联盟”版。

关于第4条，争议不大，在12月4日行政院会上通过的草案，已将之删除。各方争执的焦点主要是实行何种“报备制”，是否取消“禁制区”和“警察要求解散权”。其中，民进党版、朱凤芝版和集盟版相似度高，均主张采用“自由报备制”，即小型集会无须报备，大型集会需要使用道路时才向警方报备和请求协助；此外还主张取消“禁制区”和“警察要求解散权”。

行政院版则主张“强制报备”，用“安全距离”和“管制线”代替禁制区，警察在警告、制止无效后，始得命令解散。另三版的支持者则认为，“管制线”等实际上是变相的禁制区，大型集会解散不了，小型集会根本没解散必要，警察拥有解散权反而容易导致冲突。野草莓中还有“废除集修恶法”等更激进的声音，更遭到专业法律人士的嘲笑。

此外，还有比较中立的声音认为，高质量的民主社会必须由公民支撑，台湾作为民主宪政还不非常成熟的社会，不少人仍不具备公民素养，而蓝绿双方大玩民粹，正在共同“歼灭集修法”，有可能开启更大的乱源。

第十一篇 台湾学运中的网络战

特约撰稿员 / 小窗 记者 / 马军

2014年以来，围绕《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下称“服贸”）的话题在台湾岛内持续发酵，除了传统的蓝绿政治对立，突然间又冒出莘莘学子的民意团队。

据岛内公民团体沃草团队建立的监督平台“国会无双：一天一分钟、国会大小事”3月17日披露，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张庆忠在“立法院”采取突袭方式宣布服贸协议的审查通过，引爆长年监督服贸审议进程的岛内公民团体与政党不满，紧接着发生了学生与公民团体闯入“立法院”事件。以此为起点，岛内出现名为“太阳花”的学生运动，这让原本低估民意的马英九当局在岛内外媒体关注与社会团体直接抗议的双重压力下，被迫同意重新审查服贸。

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运用社群网络情报以及电脑、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等信息产品，通过WIMAX无线宽带规划行动区域，分配人力与物资的特殊社会斗争模式是太阳花运动给人们带来的新思考。甚至有人用时髦的军事信息战术语将太阳花运动的网络行动手段总结为“指挥、控制、通信和电脑、情报、监视、捕获目标、侦察”七大要素，英文缩写“C4ISTAR”。

新媒体重构情报网

台湾抗议学生占领“立法院”时，其中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首领就注意到网络信号强弱与对外通信是否畅通对行动影响。为太阳花运动效劳的台北网页工程师张龙侨称，对外传递准确的学运信息，扭转以往只有公营媒体拥有学运解释权的单边现象，就必须搭建属于自己的现场实况转播平台、向岛内外传递即时学运动向，此举不仅削弱亲当局的公营媒体的解释权，更能直接影响与催化潜在群体支持学运。凭借网络科技与新媒体，太阳花运动掀开台湾学生运动乃至社会运动的新篇章，更是重构了C4ISTAR的运用规则。

此次运动的集成工作分为人员调度、物资补给与运送、信息集成与传播等三方面，从而让这场约50万人参加的太阳花运动（警方估计为11.6万人）发挥综合实力。

在指挥层面上，太阳花运动的决策分为内圈与外圈，内圈决策（九人决策小组，战略层次）以主要学生代表参加，负责运动路线与政策论

述主轴；外圈决策（各学生团体分组讨论与决策，战术层次）负责任务执行与政策辩论。受网络实况转播影响，主动参与学运的个人与团体日益增加，使得指挥工作面临挑战。为了缩短指挥落差，贯彻行动指导，学生团体采用Loomio共同决策应用程序，强化指挥链。

Loomio采用共同决策模式与组织决策模式，该软件适合多数团体活动使用，通过达成共识，让决策更有共鸣，从而强化指挥链。值得注意地，Loomio程序让指挥者与被指挥者具有共享指挥权的特色，不容易发生不服从指挥的情况，因为被指挥者也参与了决策。

控制层面上，学运主要通过“谷歌地球”、“人民力量展现图”与“太阳花运动”等程序及网站，学运指挥层可控制运动参与者数，调动“服贸东西军”（台湾网络名词，系指参与反对服贸暗箱操作的抗议者），同步调动“正兵”与“奇兵”对抗警方镇压，并且及时填补人力，支援抗议现场。其中，ANDRIOID程序让指挥层面具有实时控制能力，即便抗议者与现场指挥代表失去联系，抗议者也可通过该程序接受直接控制，从而落实行动。

参与太阳花运动的学生被外界称作“刷屏人类”，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不离须臾，除了常见的脸谱与LINE即时通信软件，他们还使用FireChat与TOX程序——TOX具有文字信息加密功能，而FireChat具有短距离离线通信（off-the-grid）功能，使得台湾情报机构不易掌控学运内部情况，很难一窥学运决策与指挥层全貌。

在具体工具选择上，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成为他们的数字化武器。通过这一平台，抗议者能够依据自己所能提供的人力与物力，支援抗议现场或协助管理学运物资。从综合性互动式电脑运用来看，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的便利化与国际标准化，让战场中枢走向国际化。另一方面，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结合云计算科技，共享软件资源与信息，能够集中管理资料并且分散运算。

此外，太阳花运动成员还会进行侦察工作，比如搜集防暴警察与刑事警察动向，以便修正运动战斗指导。智能手机上的SkyWatch程序与网络摄影机，加上“一键连通”无线安装技术，能够采用“实时录像”或“事件录像”将影像资料存在云计算空间，并随时将资料分享给岛内外人士。而充斥学生与警察肢体冲突的录像资料也可作为日后法律诉讼的参考证据，避免警方片面搜集证据，平衡证据力。

为掌握防暴警察行踪，抗议者除了使用SkyWatch即时录像监视外，还采用AMO TV程序观看媒体拍摄画面，补充漏网镜头。

WhatsTheNumber程序则可建立快速联络电话本，让负责监视警方行踪的学运干部在第一时间汇报情况。据称，太阳花运动干部用该程序与法律扶助基金会合作，并建立“陪侦专线”，让被逮捕的抗议者充分获得法律保障。由于现场实况传播呈现许多一手信息，诱发更多学生与公民自发参与并捐赠物资。

“键盘敲击国际”策略见效

在太阳花运动中，除了学生与防暴警察的对峙外，学会干部还同步推出“键盘保护抗议者”、“键盘敲响国际”、“键盘对抗警棍”等策略，让社会人士通过键盘直接参与学运。“键盘保护抗议者”策略，是要求网络社会参与者在相关社会网站发布信息，直接对案件侦办警员与“立法委员”施加压力，并通知媒体进行“第四权力”监督。

“键盘敲响国际”策略，是让学运参与者动员其人脉，串联岛内亲朋、海外人士、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与国际媒体第一时间将反制当局的新闻与信息翻译成近35种语言，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学运爆发仅一个月，已获得670多条外电报道。“键盘对抗警棍”策略则通过社会网站参与者24小时接力，实时对岛内外媒体与公民团体传送防暴警察镇压的情况，让社会网站参与者持续关注学运，并揭露防暴警察警械使用过当，引发岛内社会介入。

台湾“外交部国际传播司”发布的《国际媒体有关反服贸抗议事件后续报道之汇析报告》称，“学生抗议行动持续，群众人数有增无减，国际媒体持续密集报道篇数激增，其内容虽以事实陈述为主，但已出现正反面评论。示威学生积极运用社会网站争取国际主流媒体之同情，时日拖延，全球舆情动向值得密切观察。”

面对不利局面，台湾当局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如要求撤回或更正国际媒体新闻报道、宴请与亲马英九的留学生与侨团代表、打探海外华侨与国际人士响应太阳花运动的情况、并抄录侨团与留学生社团所提供的网络社会资料；捐助国际思想库、大学与研究单位，通过马英九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进行视频研讨会的机会，安排驻外单位常年接触的亲台学者与会，委婉地宣传服贸协议意义并批评学运；宴请国际媒体，游说其撰写肯定服贸的文章，并安排其来台访问等。

但这些应急措施效果却遭遇失败，不但收买细节被岛内媒体披露，连绿营“立法委员”也纷纷通过“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质询要求当局停止“海外白色恐怖”。这些过犹不及的反制行动激起了更多台湾学生与民众响应“键盘敲击国际”策略，揭露当局控制言论的行为。

太阳花运动活动与诉求引起台湾社会热烈辩论，表面上社会陷入分裂，却也让攸关台湾生存的服贸协议摊在阳光下充分讨论。虽然正反两方立场僵持不下，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台湾民众意识到网络科技左右着太阳花运动的发展命运。为学运提供信息技术支持的IT奇人虽然没有直面学运参与者的赞许，但他们的专业背景为太阳花运动树立了里程碑。

信息科技已然影响到两岸关系发展，台湾执政者也应引以为戒，抛弃过去打电话和传真机的老旧情报控制模式，认识到社群网络情报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调整两岸政策。

第十二篇 现场直击：谁的“立法院”？

记者 / 马军

“退回服贸，捍卫民主！”在高呼完口号之后，几十万身着黑衣的人潮逐渐从台北“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散去。

3月30日晚七点多，在台北举办的“反黑箱服贸大游行”正式落下帷幕，超过三十万的抗议民众各自回家，而部分学生在学运达人、总指挥林飞帆的带领下，再度回到了“立法院”。此时，台湾“立法院”已经被学生占领了13天。

3月18日起，声称不满国民党在服贸议题上的操作手法，数百名学生冲入“立法院”议场，并掀起一场名为“太阳花”的学生运动。民进党“四大天党”也走上街头，力挺学运。霸占“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不论是人数，还是影响，都成为了台湾民主转型以来最大的一场学生运动。

服贸协议是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所签协议之一，此协议到底对台湾是利是弊争执激烈，但从文本来看，台湾对大陆开放较少，大陆对台湾开放较多，专业的主流评论还是认为有利于拉动台湾经济，可为执政的马英九加分。绿营反对“服贸”，自然另有一番政治用意，此次学运无论如何收场，受伤最大的是台湾，民进党未必是赢家。

张庆忠的“立法院”

“开会，将服贸协议案送院会存查，散会”。张庆忠不会想到，他这短短30秒的发言，会在台湾引发一场“革命”。

此时是3月17日，周一下午，“太阳花”学运开始前一天。

自那周起，台湾“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轮到国民党当轮值主席。作为国民党党团的副书记长和“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召集人，张庆忠算是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干部。当民意与党意冲突时，张庆忠要站在党的这一边。对于张庆忠来说，最能向马英九交差的结果就是让服贸通过程序委员会，送到院会讨论。一旦送入院会，服贸就变成“行政院”向“立法院”的一项报告事项，是否通过，需要全体委员进行一次性表决。而民进党则希望服贸协议能够实质审查、逐条表决。

当下午两点半张庆忠走入程序委员会时，民进党立委已经霸占好主席台严阵以待。强壮的张庆忠两次试图通过不同的门走入委员会，但全

部被民进党立委推出会场。最终在同党立委的“掩护”下，张庆忠站在会场的角落，用别在身上的隐藏式麦克风做出了著名的“30秒决议”，将议案送进院会。

“隐藏式麦克风是议事处人员给我的，因为只有通过公物宣告，议案才算有效。”张庆忠解释到。

相较于那些“立法院”的老油条和电视上口若悬河的名嘴“立委”，不论是资历还是知名度，张庆忠在台湾都不算是知名。2005年起一直担任“立委”的张庆忠为了打造自己憨厚、可靠的形象，每逢选举，都要在文宣上标注自己是“矿工的儿子”。

而实际上，张庆忠本身是新北市中和地区的“Motel”（汽车旅馆）王。在“30秒发言”之前，他最被台湾人熟识的言论则是之前国民党“立委”深陷桃色新闻时，张庆忠表示过的：“以后开房去我的旅馆，再被拍到就找我。”

张庆忠的“30秒发言”被台湾媒体广泛流传后，次日学生便冲进“立法院”，“太阳花”学运就此开启。学生冲入张庆忠办公室之后，从抽屉里翻出大量大陆企业老板的名片，似乎做实了学生对服贸是“大陆和国民党进行政商黑箱操作”的“指责”。

“那些都是台商协会拜访“立法院”时交换的名片”，张庆忠委屈地解释到，但此时已经没有人相信他的解释。3月24日，在国民党籍委员全体缺席的情况下，“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宣布服贸协议送往院会存查属于“非法无效”。而3月31日张庆忠在“立法院”提出《都市更新条例》修正案时，被泼了一身茶水。

对于这种尴尬，抗议者认为是张庆忠违反程序，活该被泼。而张庆忠则认为是民进党在杯葛。

叶宜津的“立法院”

2013年6月21日，民进党“立委”叶宜津一觉醒来，惊讶的发现两岸“海基”、“海协”两会在上海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

此时距离太阳花运动的爆发，还有270天。

和叶宜津一样惊讶的，还有包括王金平在内的所有台湾“立法委员”，以及服贸所涉及的台湾相关产业的业者和工会。此次服贸的签订，台“行政院”没有向“立法院”报备、也没有事先和相关产业沟通。

当然，按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惯例，其实这个流程也没什么问题，最后都会由国会一揽子表决批准或否定。但因为两岸关系特殊，外加台湾独特的蓝绿政治，即便合法合理的程序也会被绿营认为是黑箱。即使是在国民党答应了民进党逐条审查的要求之下，民进党还是发起了对服贸议案的杯葛。尽管杯葛服贸并不会给民进党加太多分，但是在两党政治体制下，国民党的失分，就间接给民进党加了分。

自马英九第二任期开始，两岸贸易从大陆单方面开放逐渐变为了互相开放。两岸贸易不再是大陆单方面的让利，而越来越接近两岸的互相竞争。在经济持续疲软十几年后，台湾面对大陆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少。面对可能受到陆资冲击的产业，让号称维护草根利益的民进党就有了操作议题的空间。

和陆客来台、陆资来台、两岸签署ECFA等议题一样，一旦涉及到大陆，台湾内部意见便极易被撕裂。诉求情绪的绿营，往往能够在声势上战胜诉求道理的蓝营。

2013年7月起，台“立法院”外就陆续爆发了好几场抗议“黑箱服贸”的活动。7月31日，数百名大学生在“立法院”门口静坐，发起“占领立院、夺回未来”的行动。

记者见到叶宜津的时候，她正在“立法院”议场的门口坐镇。当记者出示证件之后，叶宜津将记者带进了议场。台“立法院”规定，除非委员邀请，任何人不得进入议场。即便是“革命”中的学生也无法随意出入议场。

占领“立法院”之后，警察和学生达成了默契：警察把住大门，学生只出不进；但面对学生通过梯子和阳台爬进“立法院”的方式，警察不加阻拦。

为了方便媒体报道，叶宜津和其他几位民进党“立委”则排好班表，每天轮流坐镇议场的正门和侧门，将记者带进议场，让记者帮忙报道议场里学生的秩序。

记者在议场内部观察到，议场像极了台湾大学生的卧室：凌乱中带有秩序。主席台分为媒体区和外文区，为采访的媒体提供便利；医疗区有从全台各地赶来的医师为学生提供医疗服务；物资区放有饮水、便当、洗漱用品、拖鞋和一次性内衣裤；垃圾更是分五、六类分开回收，比常规状态下的分类还要细致。若不是墙上凌乱的贴有恶搞马英九的漫画以及堵住议场各个出口的桌椅，根本无法看出这里曾经爆发过数次学生和警察的争夺战。

实际上，作为民主殿堂的“立法院”议场，历来都不平静。服贸协议签署之后，叶宜津和她的同事们一直在“立法院”和国民党团斗智斗勇。不管是在内政委员会，还是在程序委员会，国、民两党“立委”在对方担任轮值主席时，不是霸占主席台，就是藏起发言登记表，即使瘫痪议程，也不能让对方达成目的。无奈之下，张庆忠才被迫采取“硬闯关”的方式将服贸送入院会。

“立法院”数次对服贸的审查会上，几乎全部以动武结束。3月12日讨论服贸的内政委员会上，叶宜津被国民党“立委”一拳打到眼角，流出鲜血。

在去年9月，叶宜津还曾借由反对黑箱服贸的理由，提出了对江宜桦的“倒阁案”。最终在国民党祭出一级党纪的多数优势下，倒阁案并没有通过。

学运爆发之后，叶宜津和她的同事们都退到了二线，为学生提供服务和支持。这些刚刚或者即将年满20岁的人，将是未来几十年内民进党选票的重要来源。

自此“立法院”从委员拳打脚踢式的瘫痪变成了正式的瘫痪。代表人民的机构不再代表人民，任由服贸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街头相遇。

林沛然的“立法院”

“刚才我们游行的时候居然有学运人士来呛声，差点打起来！”记者见到林沛然时，他正和几个朋友一起高喊口号，参加“白色正义联盟”在台北车站南2门举办的“反反服贸”游行。

这一天是3月29日，太阳花学运的第十二天。

台北车站南2门距离学运的主场地“立法院”仅有500米之隔，从人数和气势上，“反反服贸”都无法与太阳花学运相比。相较一直招来周边社区投诉噪音的学运音响，“反反服贸”运动的演讲分贝可算蚊子级别：人群之外，几乎就无法听清演讲者的讲话内容。

但这已经算是学运开展以来最大的一场反学运的集结。同一天由国民党青工会举办的活动，仅有200多人到场，这其中还包括不少大陆官方媒体和前来力挺的大陆学生。由于人单势孤，不少学运的学生还举着标语到场互呛，双方差点开打。

“2006年这里是倒扁运动的一个主要的战场，我曾经在这里睡过一夜。”家住台北士林的林沛然，对政治和社会运动并不陌生。1987年出

生的他，在2007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有朝一日当选为国民党的党代表，是林短期的目标。“那时‘脸书’好像还刚刚出来，大家都是靠传统媒体和手机简讯纠团出来抗议，现在靠‘脸书’就够了。”

“立法院”外的学生大部分比林沛然要小。出于对马英九执政的不满和对自己未来的迷茫，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几百人占领“立法院”后一天之内迅速集结到“立法院”周边倒班静坐。陈水扁时代，台湾大学生的起薪是2.6万元台币，而马英九执政六年之后，这些大学生的薪资只剩了2.2万元。念书却看不到希望的网路一代，干脆放下书本，来到街头，以“革命”的方式宣泄对自己未来的焦虑。

在“立法院”外的民主课堂中，当演讲者问道“有谁看过完整的服贸协议”时，举手者寥寥。大部分参与学运的学生并不了解服贸，他们来“立法院”的主要理由，是要打败“独裁”的马英九，捍卫台湾的民主。

“太阳花”学运开始之后，除了被占领的“立法院”之外，最大的战场就是“脸书”上。对服贸持不同意见的同学在“脸书”上互相争辩，讨论服贸对台湾的利弊得失。但由于学生对服贸并不十分了解，“脸书”上的服贸之争很快就变了味道：轻者互丢“服贸懒人包”（一个由不同团体制作的解释服贸利弊的电子档案），说“等你看懂之后再来找我辩”。重者直接互删好友，甚至不少情侣因对服贸的不同看法而分手。

林沛然曾经在和一个朋友辩论时互丢了20个“懒人包”，之后他决定关上电脑，来到线下发声。因为“在网上吵架已经没有意思了”。

林沛然曾经在大陆吉林大学做过交换生，知道大陆学生最常上的网站不是“脸书”，而是人人和微博。在“太阳花”学运之后，林一直将“脸书”上支持服贸的声音转贴到他的个人主页上。“我发现，有几个在台陆生在学运中还蛮核心的，他们一直在微博上传播反对服贸的声音，我想，我应该让他们知道台湾理性的声音。”

“施明德说他对台湾民主最大的贡献是倒扁时没有冲击‘总统府’，这一点我是十分同意的。”林沛然说，“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因为这场运动，两岸青年人会越隔越远。”

林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反反服贸”活动中出现最高频的词汇除了“理性”“法制”之外，就是“我们都是台湾人”。而这个场合满场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学运中只出现过一次：当学生冲入“行政院”面临警察驱离时，他们举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试图以此保护自己。

林沛然和记者告别时，说接下来要去健身房健身："有朝一日碰见陈为廷，我要和他打一架"。

陈林魏的"立法院"

"陈为廷，我爱你！"在记者会召开之前，陈为廷听到了几句表白的女声。当发现发出声音的是几个四十几岁的大妈之后，陈为廷摇摇头，转过身，把头对向了摄影机。

这一天是3月27日，学运开始第十天。

此时他身边的林飞帆已经开讲，在怒声痛斥马英九之后，林飞帆宣布3月30日号召抗议民众全部出来占领凯达格兰大道。演讲之后，掌声雷动。

虽然"立法院"内的学生不承认学运内部有高下之分，但是在媒体看来，陈林二人都是这场学运的领袖，而另一个学运领袖魏扬则已经离开了台北，返回新竹的清华大学"疗养心伤"。

23日晚，由于不满马英九迟迟未对学生要求进行答复，魏扬带领学生冲击"行政院"，并因此以"现行犯"被捕。虽然最终台北法院宣布对魏"无保释放"，但魏扬还是忍不住压力大哭一场。 整场学运中，除24日凌晨学生占领"行政院"被镇爆警察驱离造成百人受伤之外，警察对学生还算客气。对学运最大的外部压力是对学生领袖党派色彩的猜测。

学运中，陈为廷、林飞帆和魏扬先后被爆出曾经担任过民进党青年军的工作人员和蔡英文基金会的实习生。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立法院"警察也向记者表示，他曾经多次看到陈为廷和民进党大佬一起出入"立法院"。陈为廷在台湾的成名之作，便是2012年在"立法院"大骂"教育部长"蒋伟宁在课纲修改问题上的"伪善"。陈能够在"立法院"行使"立委"指责对部会首长进行质询，就是叶宜津帮的忙。

由于学运开始几天媒体先后爆出学生在议场内喝啤酒、开派对的照片。议场内已经不对全部学生开放。全台各地到台北参加学运的学生全部分布在"立法院"南北两侧的公路上睡纸板、睡袋和帐篷。学运的核心干部则睡在议场地毯上，而据台湾媒体报道，学生领袖住在"议场"二楼的会客室，并且出入自由。

3月28日晚间，陈为廷和林飞帆分别参加了三立和年代电视台的政论节目录制，表达学运的立场，表示要和马英九宣战到底。

在节目中，林飞帆身着一件绿色风衣。学运开始后，林飞帆同款的

这件风衣风靡一时，风衣已经脱销，尚有库存的网店则被挤爆。但当发现风衣是“made in china”后，不少买家表示抗议，对此卖家解释到“中国是‘世界工厂’这件事，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不能决定这件衣服的出生地，只能决定这件衣服的发光地”。

在3月30日的“五十万人大游行”的集会上，林飞帆同样身着这件绿色风衣，向马英九喊话，要求马英九“听从人民的指挥”。

马英九的“立法院”

“马英九，干你娘！”在一句标准的台语“三字经”之后，一记带着黑色拳击手套的重拳狠狠地揍在了“立法院”北侧，青岛东路学运现场悬挂的一个沙袋上。沙袋上贴有一张照片：马英九的耳朵里长上了鹿角。

学运前，马英九出席某活动中称鹿茸是鹿耳朵里的毛，被台湾舆论一片奚落。也因此留下了“马卡茸”的外号。当天是3月15日，距离学运还有3天。

相较于平和的抗议现场，贴有马英九照片的沙袋几乎是全场唯一“暴力”的出口。记者发现，喜欢带上手套揍马英九一拳的人几乎都是三十岁以上的社会人士，而参与学运的学生更喜欢将对马英九反感体现在绘画作品上：整个抗议现场，几乎贴满了各式恶搞马英九的照片，其中不乏创意和技法都相当不错的佳品。

对于全场被恶搞的马英九，林沛然感慨道：“别说是‘总统’的威严了，马英九现在连做人的尊严都该没了。”

3月18日开始的“太阳花”学运，从一开始反对黑箱作业，逐步延伸到了反对服贸本身。在民进党加入之后，又逐渐延伸成为反对国民党的运动。当非国民党籍的“立委”全部答应学生“先立法、再审查”的诉求之后，学运又把矛头指向了马英九。而由于“挺扁”、“公投”、“台独”的各种势力加入，整场运动大有蔓延到“反中”的趋势。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这个世代的大学生对“反中”并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作为阿扁时代起开始接受教育的一代人，他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国家最高峰不再是喜马拉雅，而是玉山。国家最著名的河流不再是长江黄河，而是浊水溪和淡水河。

反观马英九，极低的民调让任何反对马英九的声音都显得“政治正确”。洪仲丘事件后，马英九全盘接受了抗议民众“废除军法”的要求，也让马英九显得越来越“好欺负”。

3月30号，主办方号称50万人走上凯道的游行中，“退回服贸”和“马英九下台”出现的频率，几乎相等。曾经担任过马英九“国策”顾问的郝明义，更是在演讲中秀出了一段马英九在2010年ECFA的承诺影片：“我们和中国大陆签任何协议，都会事先向‘立法院’报备，事后再请‘立法院’审查，审查通过之后，我们才会实施。”

影片播放完毕之后，全场先是掌声雷动，然后嘘声四起。面对事先未经报备，事后又准备强硬过关的服贸。抗议民众的嘘声并非难以理解。

去年11月的国民党十九全代会上，身为党主席的马英九通过了“总统”视为“当然党主席”的党章修正案。当时台湾舆论普遍认为，马英九此举就是要保住自己党主席的位子，以党纪约束党员的投票行为。

“我们选了200多个委员出来，但是国会里只有两个声音，国民党的和民进党的。”议场中，一位学生向记者表示。“他们利用党纪，让支持我们的委员也不敢站出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否则将来民进党上台来，也会这么硬干。”

而占有“立院”多数席次，本可通过人数优势轻松过关的马英九选择在服贸上“硬闯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同党同志王金平，并不帮他的忙。

王金平的“立法院”

3月19日，王金平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台北地方法院宣布王金平确认党员资格存在的诉讼胜诉。“九月政争”后，被马英九开除党籍的王金平终于保住了党籍，也顺便保住了“立委”和“立法院长”的位子。

此时，“太阳花”学运刚刚开始不到24小时。

而在两天之后，王金平再获一个好消息。向马英九报告逮到王金平“关说”的“检察总长”黄世铭一审被判泄密，获刑一年两个月。因“九月政争”而起的法律战中，王金平几乎获得了完胜。

自1999年起，王金平至今已经连续担任了15年的“立法院长”。实际上，王金平自1976年便开始担任“立法委员”。那一年马英九才26岁，还在美国纽约大学读硕士，刚刚和周美青结婚。

作为目前台湾最资深的“立委”，王金平在朝野协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立法院”因重大事件意见分裂时，游走蓝绿的王金平往往能够通过政党协商的方式调解争端，达成共识。反对王金平的人认为王金

平“蓝皮绿骨”，支持王金平的人则认为其能力超群。

之所以蓝绿都会在重大议题上给王金平面子，是因为王担任“立法院长”以来，从未动用过警察权，即使民进党“立委”连续霸占几天主席台，即使“立法院”打成一锅粥，王金平也只是始终保持微笑，为蓝绿撮合共识。

此次学运中，占领“行政院”的学生两个小时内便被震爆警察驱逐，而在“立法院”内的学生却能一直安然无恙，外界始终认为，是王金平对学生提供了庇护。

在服贸议题上，王金平始终站在民进党一方。即便是在目前台湾法律规定服贸这种条约只需在“立法院”备查便可通过，甚至自动生效的情况之下，王自去年8月份起就坚持服贸协议逐条审查，不能自动生效。并在公开场合批评台湾行政部门藐视“国会”，独断专擅，妨碍台湾进步。在服贸上的阻拦，也被认为是马英九发动“九月政争”，下决心除掉王金平的最主要原因。

而如今，王金平已经逐步摆脱了“九月政争”带来的阴影。反倒是马英九在服贸议题上深陷被动。3月21日，马英九两次致电王金平，邀请王共商计策。对此，王金平向媒体发布了三点声明表示回绝。在“脸书”上，台湾网友对王金平文绉绉的声明进行了通俗的翻译：“一、我去你那开会是违宪的，所以我不去；二、我已经说了不去，你还一直打电话给我，是很烦的；三、大家是在反对你，不是在反对我，我干吗要替你背这个黑锅呢？”

(应采访对象要求，林沛然为化名)

第十三篇 台湾学运：世代焦虑还是政治斗争

记者 / 马军

“谢谢周边的住户，谢谢支持我们的伙伴，谢谢所有的人，台湾加油！”随着一曲学运主题曲《岛屿天光》的大合唱和现场主持人的加油声，“太阳花”学运如一场嘉年华般就此散去。4月11日，王金平率众“立委”重新回到“立法院”开会，被霸占接近一个月的“立法院”终于回到了台湾民众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手中。

从3月18日至4月10日，太阳花学运维持了24天。这场学运到底是台湾的“民主之光”还是“民主之耻”，台湾和国际舆论也为此争吵了20余天。失焦的学运到底是反黑箱、反服贸，还是反马、反国民党甚至反中国？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世代焦虑还是政治斗争？虽然学运已经结束，但其背后深层原因的探讨也许刚刚开始。太阳花留下的“遗产”，也许在未来的十几年内，都会对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世代焦虑总爆发

“其实，这场运动跟服贸没什么关系，年轻人有几个懂得服贸的？”当被问及为何台湾大学生会出来反对服贸时，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杨景尧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年轻人纷纷站出来，理由很简单，对未来焦虑。”

而对未来产生焦虑的具体原因，杨景尧教授给出的答案十分简单：“活不下去了”。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台湾经济成长出现了世代结构的问题。虽然人均两万多美元的收入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看上去很美”，但对年轻人来说，台湾的经济环境已经不足以让他们享受到舒适的生活。

2000年至今，经过了陈水扁八年和马英九的六年，台湾的GDP总量增长了37.39%，但是民众平均薪资的增长只有9.4%。换句话说，经济成长的四分之三没有惠及到一般民众。而年轻人在经济分配的过程中更是处在劣势地位。

目前，台湾的一般失业率是4%，相比亚洲其他国家并不算高，但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14%。而年轻人的毕业起薪从陈水扁时代的2.7万新台币（以下类同），已经降到了马英九时代的2.2万元。如果算上物价上涨指数，台湾年轻人的薪资水平已经倒退至1997年的水平。

而实际上，有接近四分之一的台湾年轻人拿不到最低薪资。这也让参加学运的学生对于外界的指责有了底气。在台湾的某政论节目中，支持服贸的人士指责台湾现在的学生太过娇贵，不够努力。但学生代表回呛到：大学生薪资倒退到十七年前，这笔账不能算学生不努力，应该算在政府不争气。

记者在“立法院”外和抗议学生一起守夜时，曾和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算过一笔账。这位就读于台湾某“国立”大学社会系的学生毕业之后只能找文员类的工作，房租约为八九千元，手机通讯费1000元，吃饭8000元，娱乐1000-2000千元，对于预期薪水不会超过2.5万元的他，“根本攒不下钱”。

根据台湾“劳委会”的调查，2013年台湾新鲜人的毕业起薪为2.6万元，比2000年第一次调查时还少了700块。

“如果毕业工作攒不下钱，不要说买房不可能，结婚、生子都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起来反抗政府，是很正常的”，杨景尧表示。而面对台北动辄百万一坪的房价，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文茜撂下重话，认为“这个地方的房价已经是暴政的地步了”。

根据全球房地产指南的调查报告，2012年底台北市房价排在全球第十八，亚洲第四，仅仅排在香港、新加坡和东京之后。目前，台北市房屋贷款负担率是64%，也就是说，在台北中等收入的人购买中等价位的房屋，每月贷款约占收入的64%。

这种极大的剥夺感也导致了台湾“少子化”现象十分严重，台湾的生育率只有1.1，这个数字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在第三低。这不仅导致未来十年内台湾大量大学要倒闭，也让十几年后的台湾军队无兵可征。

除了收入和房价不成比例带来的焦虑，台湾现行的福利政策也让年轻人屡遭“剥夺”。台湾具有全世界罕见的全民健保政策，农民的“老农年金”以及都市工人的“退休金”也都相当丰厚。根据去年台湾媒体的一则报道，台湾健保、劳保制度如若不加改革，未来八到十年内将有破产的风险。最近几年，台湾福利支出已经超过经济支出和军费支出，成为每年预算的第一大支出，而这类支出绝大部分惠及的是台湾的中老年人。而健保、劳保体系一旦破产，受到最大影响的则是台湾的年轻一代。未来充满迷茫和不确定性，让年轻人走上街头，试图向政府喊出自己的声音。

此外，马英九的执政不力也让年轻人不满。“马英九说签了ECFA，我们的未来就会好，结果没有。马英九说开放了美牛，美国就会和我们

签FTA，结果也没签。”一位现场抗议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到，“‘马政府’说‘政府’挺银行，银行挺企业，企业挺劳工。结果呢？‘政府’的钱都去挺了大财团，结果老板们并没给我们加薪，而是都去养了小三。”

蓝绿、马王大乱斗

4月10日下午5点，学生退场前一个小时，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出现在“立法院”外，向准备迎接学生出场的支持民众挥手致意，随即迅速离开现场。记者发现，在为时24天的运动中，蔡英文似乎是唯一受到欢迎的政治人物，其余政客不管蓝绿都被学生排斥。

3月22日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出现在“立法院”与学生对话，结果几乎以被学生骂回的方式离开现场。3月23日苏贞昌、谢长廷、游锡等绿营大佬出现时也遭到学生的嘘声。4月6日晚，台湾社会运动资深大佬施明德出现在“立法院”外，不仅没有得到学生的欢迎，甚至还被呛说“可不可以还我100块”（施明德曾以每人100块小额募捐的方式完成了倒扁运动）？

至于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们，则完全被当成了“看门狗”，被学生们呼来唤去。而民进党籍的市议员们连“看门”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在议场外围轮班为现场的学生送水送饭。

学运结束之后，民进党迅速召开了党内会议对这场运动进行检讨。本以为能在学运中捞到些许政治筹码的民进党，事后发现自己失去的不比国民党少：服贸议题上除了杯葛拿不出具体意见、为了选举微调的两岸政策又彻底回到“台独”路线、除了窝囊的看门根本无法主导局势走向，更重要的是，学生以独立运动者的姿态站上了台湾的政治舞台，一旦学生后续宣布组党参加之后的各项选举，民进党的选票将会被分流不少。

从单纯的政党之争，发展到连民进党都不可控的学生运动，太阳花背后也隐藏着社会民众对蓝绿恶斗的极度不满。在去年6月服贸签署之后，民进党曾经以占领主席台、藏起发言登记表等方式杯葛了服贸审议八个月，而国民党也利用程序委员会多数的优势，108次封杀了民进党关于针对两岸协议立法的提案。

无奈之下，民进党搬起了学运的石头，给国民党当头一击，也砸中了自己的脚。

4月10日出关之后，学生领袖之一的陈为廷称，在媒体和民众的簇拥下，走出“立法院”比走进来困难多了。进入“立法院”之所以容易，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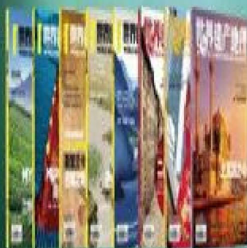
国民党籍“立委”费鸿泰和记者的说法，“学生顺利的从车道进入立法院，就是民进党立委的助理们给开的门！”对于运动后出现的窘境，民进党只猜对了开头，没猜对结尾。

整场学运除被视作是蓝绿恶斗的衍生物之外，还被视作是国民党内部的马王政争2.0。费鸿泰透露，在这个会期伊始，“立法院”民进党党鞭柯建铭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了国民党团，“这个会期，民进党让服贸通过的概率是零，国民党想都不要想了。”

去年9月，马英九就曾以抓住王金平为柯建铭关说为由，召开记者会将此事公开。之后柯建铭与王金平正式结盟，在服贸议题上持反对态度。

4月6日上午十一点，在柯建铭的簇拥下，王金平走入“立法院”议场，劝说学生离开。之后宣布在两岸条约监督条例完成立法之前，不会召开任何针对服贸的党团协商会议。对此态度，学生和民进党给出了高度的评价，而国民党党团的评价是：“整个党都被王金平出卖了”。

4月10日，学生走出议场的当天，国民党再次对王金平确认党籍案提出上诉。这也意味着，原本可能有所缓和的马王之间再度撕破脸，国民党想通过王金平的帮忙服贸过关，已经绝无可能。



征订 2016年全年（12期）杂志
每期20元 | 共计240元
0755-25934567 (69) / 010-65281005(06)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第七章 起底两岸

第一篇 两岸侨务争夺战

记者/马军

两岸隔海分治六十年来，双方在不同战场上的争斗从未停止过。作为两岸斗争中不太常被人们提及的侨务争夺，先后经历了意识形态的争夺、统独议题的争夺以及文化正统性的争夺等不同的阶段。作为两岸关系的一个缩影，两岸侨务争夺战在不同的阶段所呈现出的形式、双方争夺的主战场以及呈现出的力量对比均有着各自时代所特有的烙印。

意识形态下的侨务争夺

国共内战伊始，1946年6月，中共便开始制定侨务政策配合当时对于苏联“一边倒”的大战略方针，在侨务战场上，一面支持苏联的动作，一面打击国民党在海外侨社中的势力。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便开始筹建自己的侨务工作的官僚体系，从1949年至1988年，由国务院侨办、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人大华侨委员会、政协华侨委员会等侨联组织所构成的侨务工作体系基本建设完成，除西藏外，大陆各省市区都设置了侨联组织。

在建立庞大的侨务管理体系的同时，新中国侨务工作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便是华侨国籍的认定问题。国民政府时期侨务政策中的国籍认定采取的是血统主义的认定方式，及只要证明自己拥有华人血统，便被认定为中国国民，此政策后来被台湾几乎沿用到2004年。1949年至1954年，新中国成立的前五年间，大陆政府也延续了相同的侨务政策。

随着二战之后东南亚各国的相继独立，东南亚拥有双重国籍的几百万华侨的法律地位便开始存疑，这不仅成为困扰华侨自身身份的认同问题，更是成为新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外交问题。由于海外华人拥有自己的社团、商铺、学校，又固守着自己强大的文化，包括印尼在内的许多东南亚国家都认为，华侨对他们本民族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更有当地报刊公开声称“华侨是中国对东南亚抱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实证”“华侨是潜在北京的第五纵队”等等。为缓解这些国家的猜忌和敌对，1952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海外侨民工作的指示”，强调华侨不应参加以直接推翻当地政府为目的的活动，声明中共不在华侨中建立组织，原有组织“应经过一定步骤做到最后取消”。

1955年的万隆会议，为平息亚洲新兴国家对华侨、华人是中共同路

人的忧虑，大陆宣布放弃既有的华侨政策，与印尼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确定华侨只能拥有单一国籍，效忠一个政府的原则，并鼓励当时的华侨尽量留在所在国并加入所在国国籍。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坚持原有的侨务政策，承认双重国籍，只要华人华侨能够提供证明自己有华人血统或者祖籍地在中国，就发给“中华民国”护照。一位美籍华人向《凤凰周刊》表示：“当时大陆放弃海外华人的做法让很多华侨寒了心，而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做法为当时没有拿到当地国籍的很多华侨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身份，也是这些华侨后来坚持支持和认同台湾政权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随后中国大陆进入政治动荡期，不论是归国华侨和海外华侨在大陆的资产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土地合作化过程中，华侨的出入境及侨汇的使用都受到严格的管制，这些做法都使得华侨更加不信任中共，而在其后的土改和文革中，华侨在身份划定、土地和房产等资产的问题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消息经由香港、台湾传到国外之后，在华侨界更是掀起轩然大波，当时更是有华人立下重誓，表示再也不会跟中共有任何来往。而此时，台湾在既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海外华侨的联系，照顾与争取。一正一反之间，台湾吸引不少侨胞的支持，侨资的汇入为台湾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1971年国民党政权退出联合国，外交上陷入困境，此时大陆陷入文化大革命，时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认为侨务工作重点应该除意识形态和经济之外再加上话语的教育，此阶段台湾支援海外各地的华侨推广华文教育，目的是厚植下一代新生力量，为复兴中华文化做准备。由于中国大陆的外交突破以及台湾内部的变化，维持以意识形态作为两岸侨务竞逐的理由显然已经过时，由于大陆陷入文革之中，此时台湾与大陆的竞争开始以“政治正统”向“文化正统”上进行转变，大量补助海外中文教育。而大陆财政枯竭，大量紧缩教育经费，政府开始鼓励各级侨生回国升学，仅欢迎高中毕业生回国投考大学和积极鼓励海外华侨发展中小学教育。

两岸在海外侨务争夺的较量真正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位在美资深媒体人向本刊表示，在1971年大陆取代台湾成为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常任理事国、1979年中美建交之前，大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到西方社会中，而能够美国的大陆人士更是少之又少，在此阶段以前，美国华人社区遍布的都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根本没有五星红旗的存在。纽约华人社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应该要算到八十年代末，大量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之后的事情了。

白热化的时代

八十年代末，台湾宣布解严，官方不再将中共政权视为是割据叛乱之共产武装，也不再将中国大陆视为是沦陷等待反攻解救的领土，此阶段两岸的侨务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世界各地都能传来两岸进行侨社争夺的消息。大陆在历史上与台湾的侨务争夺中一向处于下风，然而此阶段中国大陆的国力日盛，加上台湾民主化之后立法院权利大增，当局无法无限制的编列侨务工作预算，导致此阶段的侨务争夺处于大陆主攻，台湾主守的局势。尤其是在2000年陈水扁政府上台之后，大陆更是以“反独促统”的名义在海外辅助和建立了不少亲大陆的侨社，与台湾方面进行侨务争夺。

两岸侨务争夺的主战场就是对于侨社的争夺。改革开放之后离开大陆的华人华侨普遍认同大陆，而从台湾走出去的台侨一般则不分蓝绿都支持台湾。而1949年之前便在海外成立的传统侨社则成了两岸争夺的重点。在传统侨社工作比较难做的情况之下，另起炉灶设立新的侨社则成为了大陆重点的工作之一。2000年之后，大陆官方以“促统反独”的名义鼓励和支持华人在所在地建立侨团，在非洲、南美、加勒比海地区国家都建立了亲大陆的侨团组织，甚至在台湾邦交国巴拿马都建立起了自己的侨团组织，举行反对台独的活动。

两岸侨务争夺最明显便体现在舆论阵地的争夺。2002年2月，马来西亚华人领袖邱维廉在澳大利亚成立了“中华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且在悉尼举办了“中国和平统一与世界和平悉尼大会”。在澳台湾侨团准备组织名为“悉尼大会师”的游行以抵制这次大会，并且准备在澳洲日报社刊登广告号召台侨参与游行。据台湾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消息，当时有大陆驻澳洲领事馆人士致电澳洲日报社要求该报不要刊登该游行广告。澳洲日报社拒绝此事之后，大陆驻澳洲领事馆人员称愿意付同样或者加倍的费用，要求该报勿以刊登。

同样是澳洲，2003年8澳洲华文报纸《世界周报》台湾籍发行人员陈文重前往斐济主持该周报在斐济发行的开幕典礼，大陆驻斐济大使馆动员当地侨团不出席该开幕式，并派人收购并销毁放置于各个商店的报纸。

在美国，2002年起，大陆驻芝加哥总领事馆即不断向当地侨社及媒体大量赠送“台声”月刊。该月刊内容主要以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两岸交流现况以及台商在大陆的发展情况为主，此为该领事馆继赠阅《人民日报》海外版之后所发动的另一波文宣攻势。

2004年，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张富美在立法院宣读侨务施政报告时曾称，大陆“新华社”“中新社”免费提供新闻稿给予海外各媒体使用，央视海外频道更是以中英文24小时向全球播出节目，其“海峡两岸”“天涯共此时”等特别制作的对台节目已经为海外侨社带来了新一波的冲击。而台湾则以“台湾宏观电视台”作为对抗，对海外台商和侨胞进行文宣和服务。

在抢夺舆论阵地之外，两岸还在为当地华人华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进行争夺。2003年，台湾侨委会辅助泰南地区华文教师联谊会在合艾大智大学开设“泰南地区华文教师研习班”，大陆驻宋卡总领事知悉之后，通令泰南十三侨团所属华侨学校不得派人参加该研习班，并且同时在合艾国光中学等地免费开办“华文教师暑期培训班”，封杀台湾方面举办的补习班。

两岸侨务争夺战中，也少不了两岸外交战中常见的“金元”战术。两岸政府在争夺邦交国的过程中，曾经不止一次的爆出通过金钱收买或经济补助的方式“互挖墙脚”的情况，非洲国家乍得更是在与两岸政府建交、断交、复交的摇摆当中收获颇丰。在侨务争夺中，此种战术也并不罕见，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驻巴拿马商贸处代表就曾要求巴拿马亲台侨社“中华总会”不要在双十期间举办“国庆餐会”，并且表示如果台湾侨委会因此停发补助费，大陆方面将予以补助。

2001年，洛杉矶中国领事馆为了造势以及给台湾方面难堪，决定将十一国庆活动举办地定在台湾“双十餐会”场地金龙酒店，并以高价和五六十桌的规模成功游说餐厅承办下该项活动，引起当地侨界哗然。

面对大陆方面的“金元”优势，台湾也在某些事件中进行反击。2013年初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问美国洛杉矶，不少台侨坚持参加陈云林侨宴。宴会之后有台侨向媒体投诉，指控台湾驻洛杉矶官员龚中诚“威胁侨胞”，甚至以取消侨委会顾问的名义要挟“秋后算账”。

龚中诚表示，“驻外单位的本职工作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尊严，陈云林在美国访问明显是挖墙脚的行为，陈云林访问结束的时候在当地华人报纸上大幅报道，突出台侨欢迎陈云林，明显是别有用心。”面对指责，龚中诚表示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指控，“侨胞都具有美国籍，不可能以公权力威胁侨胞。”

侨委会委员长吴英毅也说，侨胞是美国人，侨委会只能呼吁他们不要参加政治性活动，若他们坚持参加，侨委会也没有办法，但是侨委会委员、咨询委员，一概不能参加。

两岸在海外进行侨务资源争夺的同时，台湾内部关于华侨资源分配的问题也有“内斗”。陈水扁上任之前，备位“侨委会”委员长的张富美便提出“侨民三等论”，主张将有限的资源主要分配给从台湾走到海外的台侨以及在台湾接受过教育的新侨身上，而传统老侨则受到忽视，这受到海外传统侨社，尤其是美国传统侨社的强烈反对。虽然张富美在美国面对传统侨团时表示了道歉，但是传统侨社还是以拒绝参加诸如双十国庆之类的台湾方面的节庆活动表明了态度。

民进党在国家认同上认同台湾，统独选择上最终选择是台湾独立，所以在侨务工作的认知上也于国民党不同，认为侨务工作服务的对象应以台湾为主。民进党执政之前，时任立委的陈水扁、叶菊兰、蔡同荣等人就多次在立法院表示要裁撤侨委会。直至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期间，民进党外交与国防政策白皮书依旧主张裁撤侨委会，不仅使得海外传统侨社对民进党有不重视侨务的感觉，更是让时任监察委员的张富美在获得陈水扁再三强调不会裁撤侨委会的情况之下才接任侨委会主委的工作。

民进党上任以后，张富美虽然口头对“侨民三等论”提出道歉，但是还是配合民进党“爱台湾”的本土化政治理念，对侨委会进行人事改革。2000年之前，台湾历任侨委会正副委员长均为大陆出身的人士，民进党第一任委员长、副委员长共五人都是“新台湾人”，侨委会委员中台湾籍委员也首度过半，曾为侨委会主流。李登辉期间，侨委会台湾籍委员与广东籍委员人数几乎相当，民进党上任一年之后，台籍委员与广东籍委员的比例演变为三比一，导致传统侨社与侨委会陷入关系紧张的局势。

此外，2004年民进党政府修改“国籍法”，对华侨身份从严认定。原本在国民党时期，只要提供华裔证明文件便可获得华侨身份。陈水扁时期则必须有在台配偶等亲属户籍登记为华侨者才能认定，在国外生活三四代且无法举证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华人，一律视为外国人。从严认定的华侨身份本意为防堵少数违规的假侨生，却损失了多数华侨对台湾的认同。

在美亲台的传统侨社普遍立场偏蓝，政治立场上支持国民党，并在两岸议题上支持“终极统一”，由于不少在美老侨同时拥有美国和“中华民国”国籍，在台湾大选时拥有选举权，因此颇受国民党的青睐。每次选举，国民党都会向海外侨团拉票，希望拥有投票权的海外华人能够积极回台投票，支持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而民进党的海外支持者多以台侨为主，多以“台湾人大会”“海外台湾人联谊会”等名称为自己的组织命名，借以与传统侨社进行区隔。

民进党也曾经以取消补助为由，对传统侨社所举办的支持国民党的活动进行要挟。

2007年9月，台湾大选进入最后半年的冲刺期，国民党准备替马英九萧万长举办全球台商造势活动，结果台湾媒体曝出陈水扁当局以断绝补助活动预算为要挟，要求该活动不得在圆山饭店举行。“世界台商马萧后援总会”会长饶颖琦在造势活动中明确的表示：“我们台商千里迢迢回来台湾，却被台湾当局相关单位打压、骚扰，要大家不要参加今天的活动，甚至有不少台商代表接到侨委会的电话，明示或者暗示不要出席挺马萧的造势活动。”

针对当时的这件事，时任国民党副秘书长的廖风德表示，有不少台商会长还曾接到“侨委会副委员长”杨黄美幸的“劝退”威胁电话，扬言如果他们执意要参加蓝营挺马造势活动，就要取消包括“经济部”、“外交部”或“侨委会”补助侨团或是台商协会的预算，或是取消这次举办世界台商总会年会的补助款。

“侨务休兵”下的争夺

马英九上台之后，在“外交休兵”之外，喊出“侨务休兵”的口号。2009年5月的胡吴会上，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提出，两岸外交事务避免内耗的概念，可以运用到侨务事务上。一个月后，马英九出访中南美洲时表示，要推动“侨务休兵”。

在陈水扁八年两岸侨务争夺的斗争中，台湾无疑是惨败给了大陆。根据时任台湾“侨委会”副委员长的任弘的说法，经历了阿扁时代，有三分之二的美国老侨社由青天白日满地红改挂五星红旗，许多侨社和华人会馆也取消了原来悬挂的孙中山像。而侨委会委员长吴英毅表示，阿扁八年，向中华民国登记的社团从9000多个下降至4000多个，流失一半，侨民回台投资从八年前的两亿多美元降至2008年的2000万美金。陈水扁重视“台侨”忽视“老侨”的做法对台湾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陈水扁时代对两岸关系的挑战也使得两岸对立加剧，大陆使馆人员以“拔掉”在美侨社和中华会馆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自己的政绩。马英九上任之后，两岸外交侨务休兵，“但是很多大陆使馆人员没有跟上这个句式，还是把拔掉中华民国国旗当做政绩，这种休兵就不是休兵，休兵应该是大陆方面休兵，我们（台湾方面）都没有出过兵。”吴英毅说。

马英九视“外交休兵”政策是自己第一任期最成功的政策之一。陈水扁时代，台湾的邦交国损失惨重，而马英九上任之后，在保有现有邦交

国的情况下又大幅拓展了免签证国家，成为了其重点的政绩之一。而“侨务休兵”的政策在不少人看来则是一项失败的政策，旧金山中华总会馆撤旗以来，便有舆论称“外交休兵”中国大陆给足了台湾面子，但“侨务休兵”却是台湾方面的一厢情愿。

在美侨社纷纷撤旗易帜，并非马英九能够左右。旧金山撤旗风波之后，便有美国华侨表示“这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很多传统侨团领导层的年纪逐渐老迈，新进一批领导层接受侨社运营，他们没上一代对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历史情感，很多新进侨领为侨社动向做出决定时，都以大局势做为参考依据，由此可知他们当然倾向改挂五星红旗。”

然而，在传统侨社的争夺之外，一块新的战场正在形成。

早在马英九2008年竞选时，就曾经承诺，要建立与大陆孔子学院相抗衡的台湾书院。2012年5月20日，马英九第二任宣誓就职的当天，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升格成为文化部，在马英九市长任内就曾担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成为台湾第一位文化部长。建设台湾书院的担子显然也就落在了龙应台的肩上。

随着中国的国力日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汉语逐渐成为国际强势语言，然而越来越多的汉语学习者中，大部分选择了简体字的学习，台湾在海外的华文教育阵地却日渐萎缩。台湾书院在其官网中写到：“正体字是中华文化三千多年来所使用的文字，全球使用正体字的人口主要在台湾，台湾对正体字的发展及保存自有着重要且不可取代的地位”。目前，台湾已经在纽约、洛杉矶和休斯敦建立了三个台湾书院。

自台湾书院建立起第一天，外界就对其寄托了对抗大陆孔子学院的愿望。面对孔子学院短短数年间三百多所的数量，仅有三所的台湾书院显然并不算是“对手”。龙应台在面对外界对台湾书院和孔子学院的比较时说，“香蕉不会去和苹果比，看谁比较圆，台湾的文化基本上都是从下到上的，台湾书院不会去宣传意识形态，台湾没有宣传部，文化部也绝对不是宣传部。台湾书院不需和大陆孔子学院竞争，也没有政治目的。”

第二篇 冈比亚台湾断交始末

记者 / 马军

台北时间11月15日清晨，冈比亚总统府声明基于国家利益，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消息突然到不仅让台“外交部”感到震惊，甚至冈比亚驻台“大使”事先都不知情。对于此次断交，冈比亚给出“感觉台湾不需要我们了”的理由，更是让台湾“外交部”一头雾水。四天之后，台湾在挽回无效的情况下，由马英九拍板决定与冈比亚“断交”。至此，马英九执政五年来“零断交”的努力破功，台湾的“邦交国”数量减少为22个。

冈比亚与台湾“断交”之后，并没有和中国大陆建交，这使得冈比亚成为继不丹之后，第二个既没有和北京“建交”，也没有和台湾建交的国家。

突如其来的“断交”

2013年11月15日早上，就读于台湾屏东科技大学的冈比亚学生西塞，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祖国和台湾“断交”了。这让西塞感到很恐慌，因为他和另外17个在屏东科大念书的冈比亚学生，完全依靠台湾奖学金、“外交部”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奖学金和屏东科技大学的奖学金念书和生活。在木材科学与设计系念到大四的西塞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五年，虽然还剩一年就要毕业，但是西塞还是很想留在台湾工作。但是冈比亚和台湾的“断交”很可能让西塞在没有拿到毕业证之前就被迫回到自己位于西非的国家。

像西塞这样的冈比亚在台留学生共有218名，其中126人在大学部，84人念硕士班，8个人在攻读博士学位。这些学生大多就读于台北科技大学土木系冈比亚专班和高雄医学大学生物技术专班，由于这两百多位冈比亚学生中大部分都是拿台湾“外交部”提供的奖学金念书，所以冈比亚与台湾的突然“断交”，让他们的未来变得非常模糊。台湾“外交部”提供的奖学金以学期计算，也就是说，这些冈比亚学生至少可以读完这个学期，但是下学期他们是否还能回台湾继续念书，目前没有人知道。

台北科技大学校长姚立德表示，目前有50多名冈比亚学生在台北科大就读，尽管已经“断交”，但是学生是无辜的的，校方会尽力照顾到他们回国为止。在台湾大学生足球二级联赛中，由冈比亚学生组成主力的台北科大和屏东科大一向都是冠亚军的争夺者，台北科大依靠冈比亚“外援”的力量曾经三次捧杯。听闻冈比亚与台湾“断交”之后，台北科大总教

练陆志成很沮丧地说到："我们校足球队30个人有12个来自冈比亚，其中8个人还是主力，他们一走，我们球队成绩肯定受影响"。

在冈比亚与台湾"断交"风暴中，西塞和他的同学们显然还不是最难过的在台冈比亚人，冈比亚驻台"大使"贾掬才是最郁闷的人。因为即便是身为"大使"，贾掬在媒体披露之前，对他的国家与台湾"断交"一事也一无所知。

11月15日早上九点半，贾掬被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叫去"外交部"，当贾掬走进"外交部"时，还发现自己国家的国旗仍然摆放在"外交部"大厅内。当时他还不知道，这面冈比亚国旗在清晨六点贾梅总统宣布和台湾"断交"时已经被取下，后因台湾仍想挽回这段关系而再度被挂起。在与林永乐密谈50分钟后，贾掬走出"外交部"，随即便被闻讯赶来的台湾诸媒体的长枪短炮团团围住，面对如潮水般的问题，贾掬只是低声地说："如果我知道问题的答案，我就会告诉你，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请让我离开，请让我离开。"

摸不透的总统

在贾梅总统的声明中，冈比亚与台湾"断交"的理由是：台湾不需要我们了。无论从任何角度说，这都有"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之嫌。

冈比亚与台湾"断交"前一天，台中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刚刚被派驻到冈比亚；三天前，台湾刚刚支付完援助冈比亚的渡轮引擎的二期款；半个月前，冈比亚观光教师团队才刚刚到台湾受训；20天前，台湾刚刚才帮冈比亚修建好军事受训中心。冈比亚此时宣布与台湾"断交"，让人捉摸不透。

"应该不是老共搞鬼"，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怡忠分析道："贾梅在'断交'声明中称很骄傲这18年与中华民国的关系，虽然'断交'，但是仍然希望能够和台湾人民建立友谊。这并不是和老共建交的语言。"

而台湾"外交部"给出的判定是，这是贾梅总统个人的行为。

台湾"外交部"次长柯耀森表示：冈比亚总统贾梅有他个人的行事风格，之前冈比亚退出大英国协的时候也是无预警的。据我们的了解，这完全是贾梅总统的个人决定。基于这个判断，在得知"断交"的消息之后，台湾第一时间派前驻冈比亚"大使"石瑞琦赴冈比亚与贾梅见面沟通，但始终没有见到贾梅。

台"外交部"的判断不无道理，贾梅的行事风格的确让人捉摸不透。

这位29岁时依靠政变夺得冈比亚政权的总统，在1996年、2001年、2006年和2011年四度连任总统。2007年1月18日，贾梅宣布他的祖先给他托梦，向他传授了治疗艾滋病和哮喘的秘方。贾梅说，只要一天的治疗，艾滋病人可以在三天内转为阴性。冈比亚国家电视台在晚间新闻播放了贾梅能治疗艾滋病的新闻之后，前来找总统就诊的患者就排起了长队。面对成群的患者，贾梅后改口称自己看病要限量：治疗哮喘不能超过100人，艾滋病则不能超过10个人。这位军旅出身的总统在签字时总要在自己的总统头衔前写上教授、博士的字眼。而博士的这个头衔，则是台北科技大学给他的。

此外，台媒也有消息称，贾梅曾经表示过，一旦中共武力侵犯台湾，1000冈比亚军队便能解决掉解放军。

针对贾梅做出的“断交”决定，实践大学副教授赖岳谦表示，台湾并没少给冈比亚物资，但是“断交”的理由恰恰可能是因为给的是物资而不是钞票。马英九上任之后台湾在国际上走的是正派外交路线，对外援助一定要到位，要到人民手里。冈比亚总统不喜欢这一套。有消息称，贾梅一直对台湾给予冈比亚的援助项目进行个人的控制，即便是台湾资助冈比亚大学生的奖学金也要过一遍贾梅的手，由他决定给谁。

两岸关系经受考验

冈比亚和台湾“断交”风波也考验了脆弱的两岸互信，好在台北和北京方面表现的都很不错。

贾梅宣布与台湾“断交”的第一时间，已经五年多没有经历邦交国断交风波的台湾，还是想起了陈水扁时期与大陆争夺邦交国的“烽火外交”时期。马英九上任以来，一直以“活路外交”作为外交政策，而以“外交休兵”的口号来处理与大陆在国际社会上的外交争夺。相比于陈水扁八年丢了六个“邦交国”，五年来未失一地的成绩似乎成为了执政低迷的马英九的唯一亮眼成绩单。

按照陈水扁时期的模式，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往往当天就与大陆建交，但是冈比亚此次宣布对台“断交”之后并未有后续动作，这使得台湾纷纷将对未来或出现的断交潮的担心转移到了大陆。若一年或半年后冈比亚与大陆建交，很有可能其他国家也比照此模式办理。冈比亚与台湾的主动“断交”，将新一轮两岸外交争夺战的先机送给了北京。

冈比亚宣布与台湾“断交”之后，马英九当天上午便召集相关部会研商对策，并且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根据我所获得的的情报，冈比亚在

宣布与台湾‘断交’之前并没有显露出任何与大陆有关的迹象，这是一起单独的事件，北京与此无关。”而“行政院长”江宜桦也表示，冈比亚没有马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两者没有关联，应该是个案，不会有骨牌效应。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冈比亚前外长迪奥普，迪奥普认为这是冈比亚总统贾梅个人的决定，北京并没有插手此事。还期望北京能够对冈比亚总统不负责任的外交行为做出惩罚。北京与冈比亚并没有建交，迪奥普所指的惩罚，很有可能是希望北京政府拒绝与冈比亚建交。

马英九、江宜桦和迪奥普的说法基本说服了台湾舆论，在基本确定北京没有插手此事之后，台湾媒体并未大肆炒作两岸外交上的争夺，此时反倒是贾梅的一则声明掀起了一点小波澜：宣布“断交”之后，贾梅在自己的个人“脸书”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冈比亚政府承认的唯一中国。这条消息下仅有300多名冈比亚网友按“赞”表示支持，却有上千条留言：这些留言大部分来自台湾网友，留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还钱”。

11月18日，台湾宣布正式与冈比亚终止外交关系。台驻冈比亚前“大使”石瑞琦陪同贾掬离开台湾。贾掬离开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对台湾“除了感谢，还是感谢”。而贾掬不知道的是，他离开台湾的这条新闻在台湾网上接受到的最多的留言则是，“快滚！”。

第三篇 大陆城镇化中的台湾商机

特约撰稿员/王彦晨

台商能否在大陆金融、服务和交通建设的城镇化“大饼”中占有一块，除了商人自己争气之外，也应该有整体的战略作为。

即将接任国务院总理的副总理李克强最近频密提到城镇化，认为中国发展不平衡矛盾突出，最主要的就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大陆推动城镇化建设，主要目标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也就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换言之，这也是大陆由贫穷国家转型为先进国家的关键性一步。

以中国大陆而言，农业大约占GDP10%，服务业大约占GDP43%，工业大约占47%，一般先进国家的服务业都占GDP70%以上。所以综合来看，大陆农业和服务业占全年GDP的配比，有检讨修正的必要。

李克强所强调的生态、节能、集约的城镇化路子，其中的生态，就是要提高城镇化质量、破解城市二元结构，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也就是往更健康精致的农业方向前进，有别于以往依赖钢筋、水泥堆垒的工厂所建构的经济成长。

城镇化的另一层意义就是农民进城。伴随此一概念，必须掌握住大陆未来经济走向相当程度要以提振人民消费为前提，增加人民消费支出才能支撑住经济成长，而消费的前提是收入增加。所以，大陆全境普遍让农村人口收入增加，进而让消费支出同步增加，才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房地产虽然是经济火车头，但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投机以及由此积累的泡沫风险不容忽视。房地产炒作是扩大贫富差距的黑手，应该遏阻这股歪风，未来应转型为棚户区改造及协作农村建设宜居小区的助力，而不该是拉大城市贫富差距的主力。

大陆服务业占比不足，如何以人为本、提高素质，发展服务业，是重要课题。好的城镇化会将人民收入带上去、消费带上去，服务业的活络和生机也就可期，不过，这需要时间。如果要让农村人口收入增加，农产品的通运是关键，这就牵涉到交通建设事业。举京广高铁通车为例，有人说京广高铁8小时比不上飞机3小时，这不正确，不能只看头尾，中端的郑州、武汉、长沙，藉高铁线发生辐射经济效益，这才是重要的效果。

大陆国家发改委“十二五”期间主打以高铁路网构建的“二横三纵”城

市群，大则容纳5000万到1亿人口，少则容纳1000万至2500万人口，将成为吸纳农民工进城，转为城市人口的主要载体，并使得城市化人口比例快速提升。

原先“二横二纵”的“井”字形城市群格局—沿着陇海线的徐州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兰州城市群、泛乌鲁木齐城市群；沿长江流域的长三角城市群，皖江城市群，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南的长株潭、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江西的昌九地区)，宜荆荆城市群(宜昌、荆州、荆门)，成渝经济圈；“二纵”是从大连沿着东部沿海一带直到湛江；从哈尔滨、沈阳、北京，再沿京广线到广州、香港。新增的一纵指的是呼包鄂城市群到关中城市群，再到成渝经济区城市群。京广线通车后，高铁路网将实现城市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连接，也势将加快农民城镇化。

力推城镇化还有一项基础因素不能忽视，就是大陆现有的金融业不够健全的问题。多数的陆营银行大多依靠利差获利，国企、央企之外的民企、中小企业要融资贷款始终不易，这点如果不打破，农村取得资金难，消费和收入的结构就很难撼动，其他的变革就不必提了。所以不仅要金融改革，甚至连乡镇银行的发展都该着手，给予一定助力。

在大陆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之下，台湾该把握什么？往哪里落子呢？

首先，是ECFA后续要解决的部分。诸如尚未签署的《服务业贸易协议》，除了应该赶快完成外，服务业本身还有很多潜规则，也必须借着实际体验来累积经验加以克服。

其次，台商升级转型更紧密和地方与市场结合扎根，制造业往生产型服务业转型；金融业早日开放面向大陆中小企业贷放款、经营人民币业务和消费性金融等业务，让健全的台湾金融业者进到大陆市场公平竞争。

此外，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例如证券业。国企释股不足、民企规模不够，大陆股民对股市逐渐失去兴趣，暴起暴落的大陆股市能否藉由引进台湾证券业而令股民重拾信心？或是继续坐视不利股市的负面因素吞没陆股生机？

总而言之，台商能否在大陆金融、服务和交通建设的城镇化“大饼”中占有一块，除了商人自己争气之外，也应该有整体的战略作为。

第四篇 台湾老兵遗产大陆防骗记

特约撰稿员/陈思

2012年10月下旬，包括台北市议员李新质在内的不少台湾地方民意代表在媒体上质疑大陆籍女子以“收尸队”模式嫁给老荣民，但目的却是觊觎财产。对此，台“退辅会”官员回应，人民有婚嫁自由，对老荣民的婚姻关系无从干涉，但若发现有可能涉及诈财或另有特殊目的者，会从旁劝阻，不希望有遭到诈财或是谋财害命的情形出现。

在台湾开放老兵探亲25周年之际，台湾负责退伍老兵事务的“退辅会”却在为如何确保在世老兵的抚恤金、已故老兵遗产不被诈骗发愁。由于国共分治60余年，大批赴台官兵与大陆亲属分隔多年，其中不少赴台老兵勤俭一世累积大量财富，也引来骗徒垂涎。

根据台官方统计，目前单身已故“荣民”遗产缴交“国库”的总金额已近100亿元新台币。根据2012年9月官方的最新统计，全台有44万多位荣民，其中将级军官3000余人，校、尉级军官将近23万人，士官兵将近21万人；其中65岁以上者约24万人，每年减少人数约1万人。老荣民与大陆女子结婚的人数，约有3万人左右。

老兵们有多少钱？

在台湾，退伍老兵称为“荣民”，是“荣誉国民”的简称。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失败，撤退来台的残兵，总数号称60万。1952年起，国军就开始对部队实施“汰弱留强”整编。惩于抗战胜利后，复员军人缺乏辅导安置，成为社会乱源之一。因此对被列为编余、离开军队的退伍军人，政府替他们发明了“荣誉国民”的名称。

由于实施征兵制，因此现时多数台湾男性都只服过一至三年的义务兵役，这些人当然不够格称为“荣民”。根据现行法令，荣民必须担任志愿役军人满10年以上退伍，或服役期间曾经因公受伤，或曾参加过1958年“八二三”台海战役等，才能领取到“荣民证”。

44万荣民人当中，于1949年前在大陆入伍者，大约有21万人。国民党政府迁台初期退伍的官兵，待遇很差。1952年台“国防部”军闻社的新闻稿曾称，“此批除役士兵，大部均为从军多年；且籍隶内地各省，在目前大陆尚未收复之时，均无家可归，其于除役后，除一律发给三个月薪饷，及主副食作为退役金外，更应妥为安置，方能鼓舞士气，安定军心。”

彼时的退伍军人待遇微薄的主因，当然是政府没钱。不过另一方面，当时退伍的军人，也未必是“被迫离军”，因为不少人是为了躲避战乱，误打误撞从军，甚至不乏国军各部队撤退台湾途中强拉而来，其实根本不想从事军旅生活，因此等到有机会退伍，就立刻离开军队。后来在台湾卖小笼包与面点起家，如今甚至红回大陆、红至海外的“鼎泰丰”，创业老板杨秉彝就是早年退伍的军人。甚至台湾四大佛教界“山头”中，除了慈济的证严法师外，佛光山的星云法师、法鼓山的圣严法师、中台禅寺的唯觉法师，年轻时都曾是军人。

为了安排老兵就业，1954年11月，官方正式在“行政院”下成立“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1956年由蒋经国接掌。1960年代之后，当初来台的国军干部逐渐迈入中年。由于退伍人数增加，而且官方的财力已经改善，因此从1968年起，开始实施“终身俸”制度。

1980年代后期，台湾民主浪潮中，街头抗议的对象中有一大群人是老兵，这些体制内的弱势群体。上街抗议的是1968年之前，当初领取一次退伍金的老兵。1987年，这些老荣民到台北抗议，并且向“退辅会老主委”蒋经国指名喊话。当时蒋经国已经重病（次年1月即去世），但对于这些当初追随国民党政府来台、更是自己政坛发迹之始的老荣民，居然困窘到要向政府抗议，感到非常震惊。不久，“退辅会主委”张国英因处置老兵街头抗议事件不当，结果遭到撤换。

为此，台湾官方推出“荣民就养金”政策——61岁以上或因公伤残，未领取终身俸且每月收入与家庭财产总额低于一定门槛的低收入荣民，可以领取就养金，目前的数字是新台币14150元。目前领取就养金的荣民，总数为6万余人，并以每年约400～500的人数减少。

跨海诈骗遗产与养老金

自1987年10月，蒋经国开放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后，不少孤寡老兵在大陆找到了亲人，并选择在大陆度过余生。台湾官方统计，约有2500多名健在的老兵目前在大陆养老。

为了方便这些年迈的老兵，台湾主管机关的规定，领取就养金的荣民，可以留在海外申领。但这些老兵是否仍在人世、会不会发生死后亲属继续冒领的情况，就成为一大问题。

虽然这笔就养金还没到台湾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18780元新台币），但14150元新台币的每月养老金折合成人民币仍然超过3000元，这比不少内地城市的平均工资要高。以2010年为例，台“退辅会”抽

查了330个定居大陆的就养荣民，结果查获38人已故，但亲属隐匿不报，意图继续领取就养金。

为防止冒领，台“退辅会”近年来可谓用心良苦。目前，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指纹验证法——每次发放款项前，会先寄发指纹卡到大陆，让老兵们捺印之后寄回。指纹卡每次都采用不同的颜色，如果发现寄回的指纹不符、模糊，就会列为查核的重点。

除了冒领已故老兵的就养金之外，单身在台湾的老兵死后，巨额遗产也经常被盯上。由于不少老兵终身未娶，留下不少积蓄。仅单身已故荣民遗产缴交“国库”的现金和不动产就超过100亿元新台币。

根据台湾现行的《两岸关系条例》，单身老兵在台去世，台湾老兵在大陆的“二亲等”(血亲及姻亲，如兄弟姐妹、养子女等)遗属可拥有最多200万元新台币的遗产继承权。于是在这些孤寡老兵逝世后，却突然“五世其昌”，大批自称身在大陆的亲属来信“退辅会”，要求继承遗产。

为此，台湾官方设计了一套极为复杂的遗产申领程序，老兵在大陆的遗产继承人的申请材料必须有大陆公证单位开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然后交由海基会进行验证，最后再由“退辅会”进行审查。此外，“退辅会”也会派员前往大陆访视抽查，以了解这些“近亲”到底是否属实。这些台湾官员到大陆后，会要求亲属提供户籍资料、过去往来信函照片等证据，以了解是否真为“二亲等”内近亲。

2010年为此类案件案发数量最高的年份，共发生诈骗老荣民案86件，73件防堵成功，遭诈骗有13件，其中9件是大陆假亲属骗领遗产。这些老兵的总遗产包括新台币4022万元、黄金2359公克、美金517元、股票7357股、金条2根、戒指3个、房屋1笔。

而在2010年之前的5年间，台官方共在大陆查访71宗“高额遗产继承”资格，调查133名继承人，透过访谈继承者本人及检视平时往来书信或家谱、照片，并查访邻居或儿时玩伴等方法验证继承者与死者的关系，结果发现其中12人不符合继承资格，挽回逾5000万元新台币可被继承的遗产。

让台官方哭笑不得的是，由于大陆的公证单位并非官方机构，需靠发出公证书的收费来牟利，正因如此，有不少公证行愿意“为钱做事”，向不符继承资格的骗徒出售具效力的公证书，他们设计的申领程序的第一道关卡便被无情的“无障碍”过关。

主管老兵遗产的“退辅会”官员郭建忠曾对台湾媒体举了一个自己调查过的案例。曾有一位88岁老兵在大陆旅游，“只是吃顿饭，就多了个26岁的妻子”。他指该名妻子平常根本没有探视该名老兵，却在该名老荣民去世后，以“未亡人”身份跨海争产，甚至买通大陆认证机构发出“关系证明”，企图诈领遗产。

曾多次前往大陆调查老兵亲属情况的官员程春正对《凤凰周刊》记者透露，他们除了访视宣称为近亲的当事人，也会利用其他侧面打听等方式，不少大陆邻居实在看不惯自己的邻居一夜间变得富有，主动向台湾调查员爆料，才查获这些家属根本是为了“多一个人就多领200万台币”，把远亲硬凑成近亲。

程春正回忆，早期两岸关系不密切，“退辅会”等于私下前往调查。尤其就养老兵多半住在偏远乡村，往往要搭一整天的车，既辛苦又有风险。他曾在贵州乡下遭遇劫匪，连原本打算送给老兵当礼物的耳温枪都被抢走，“抢匪不知道这是干啥用的，还要我们示范给他们看”。他至今都狐疑，到底是单纯遇上强盗，还是大陆有关单位发现他们的身份，藉此来“探底”？不过近年“退辅会”官员前往大陆调查，已经不必遮掩身分，这种风险大为减低。

“收尸队”难题

除了骗领遗产、养老金外，婚姻诈骗也是老兵常遇到的问题。1950年代，国军军中的“高帅富”往往被一些文官和名流看上，大多自由恋爱而结婚，对象也以外省籍女性居多。1960年代后，“反攻大陆”梦想逐渐褪色，许多人开始体会要在台湾落户，此时结婚对象多半是本省的乡下女孩，往往是透过相亲介绍认识。

而1980年代之后还未结婚的老兵，年龄、收入相对条件愈来愈差，结婚不但要靠相亲，甚至必须到山地乡村找原住民女孩，愈来愈像“买婚”。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1990年代之后随着两岸开放探亲，“大陆新娘”对许多晚年亟欲结婚的老兵，几乎是唯一的选项。

这些只身嫁到台湾的陆配，不乏相夫教子、给“老丈夫”一个美好暮年的伟大女性，替台湾社会福利体系减少了大量负担。但也有来台之后就不安于室，弃老兵丈夫于不顾，一旦获得居留权或身份证就离婚的例子。甚至某些女性被挖苦是“收尸队”，专门找年龄老迈的荣民结婚，等到丈夫死后就继承其财产。

据《中国时报》报道，一位现年87岁的老士官长王士龙，近10年

来，陆续迎娶了三任大陆妻子，结果一生的积蓄全被骗光，就连最后的养老住宅，也被第三任大陆妻子徐连英贱价变卖，得款2200万元新台币逃回大陆。

自2008年以来，不断有民意代表在各种场合质疑台官方对此状况无作为。对此，台“退辅会主委”曾金陵曾在“立法院”坦承，老荣民与大陆籍配偶婚姻的离婚比率的确偏高。因此这些老兵要结婚前，“退辅会”辅导员都会向他们分析利害。但是婚姻究竟是个人自由，有时候明明看起来很有问题，但老荣民脾气很拗，觉得“反正死了钱也带不走，如果有人照顾我晚年，全部都给她又如何？”他们极力劝阻也没有用。

目前，针对年龄悬殊的跨海老兵婚姻，台官方采取的方式是，将其列为每月必须访视一次的“较需照顾”对象。

第五篇 台湾政治人物的大陆退休生活

撰文/郑东阳

“你们别笑，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用不了多久，你们的电视、平面媒体会和微博一样厉害、多元。”在西安一个若干高校联办的总裁学习班上，来自台湾的前“立委”邱毅告诉他的新学生们该如何应对媒体。

他手举着南京的一份都市报，指着头版头条，讲述如何面对食品安全引起的负面报道。激动时，他还引用宋楚瑜等台湾政治人物失败或成功的危机公关案例，台下的学生则报以热烈掌声。

教师背景板上显示这门课程的名称是“企业危机管理”，下面是邱毅长长的履历，如美国康纳尔大学博士后、台湾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头衔。比起他正在解释的几起企业并购案，他的企业家学生们更关心他与陈水扁的恩怨。提问时，有人甚至将邱毅赞美为“民族英雄”，并不断提及他在台湾揭弊的历史。

“你打倒陈水扁的动机是不是为了中华民族？”一位脸色红润、微胖的企业家问，话语刚落，迎接提问者的是一阵掌声，高潮来临。

面对这样的掌声和提问，邱毅仍然十分心平气和。他礼貌地称男学员为“先生”，为了避免误会，又入乡随俗地称呼女学员为“女同志”。

课间休息时，学员们排起长龙，争相合影。在年初“立委”选举中败选的邱毅，在大陆依然人气高涨，他在新浪上的粉丝仍有百万之众。在岛内退下“火线”的邱毅，就这样开始了频繁往返两岸的新生活。

邱毅的经历，可能是很多台湾政治人物未来的退休生活模式。

高校任教

“现在我来大陆自由、轻松了许多。”邱毅说。一年前，他在微博上呼吁保护南京法国梧桐树，得到南京市委的亲自回复。当时的他，作为台湾的明星“立委”兼国民党的中常委，几乎每次大陆行，都会有地方官员和台办官员陪同。

自年初搬出“立委”办公室后，邱毅开始更频繁地出现在台湾和大陆各地。他的新名片上印的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专任教授，同时还兼任台湾义守大学的客座教授和多个企业的顾问。而在大陆，他为包括西安交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在内的高校的EMBA学生讲授危机管理，或为大学生开讲座——5月初，在太原，主办方高校为他庆祝生日；接着他第

一次来到了西安；6月初，他又要辗转扬州、盐城、上海、郑州，巡回授课。他忙碌得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包括接受记者的采访。

“文化大学给我专任教授的聘书，还兼任义守大学的讲座教授，（义守大学的）老板还负责我之前的‘立委’团队里助理薪水等的开销。还有好几家上市公司要聘我为独立董事，大陆这边我也在授课，身兼数职，经济收入自然就增加很多。算一算，我现在的经济收入比以前增加了5倍以上，还不包括可以预期的其他收入。”邱毅说。

在台湾，并不是每个退休的政治人物都可以获得在高校授业的机会，更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教授——上世纪90年代，哈佛博士生马英九在卸任“法务部部长”后，由于只有学历和实务经验而无授课经验，因此在台湾政治大学只混到“法律系副教授”这一职称。而邱毅在从政前，曾是台湾知名考研补习班“陈伟补习班”（“陈伟”系邱毅的别名）的创办者和经济学王牌讲师，是台湾版本的俞敏洪。拥有台大经济学博士和美国康纳尔大学留洋经历的邱毅成为政坛名人后，更是被多所高校聘用为研究员、教授，因此在不担任“立委”后，邱毅轻易就能重拾看家本领，回归本行。

自陈水扁时代，一些“蓝营”政客便已开始频繁登陆。对每年都要举办许多涉台活动、迎接各种台湾政治人物的厦门等城市来说，这些早为本地市民熟悉的面孔很难再有市场。但在他们第一次踏上的西安等城市，他们将收获前所未见的热情。在大陆一个知名售票网站上，他在西安的另一场名为《国际金融形势与中国经济》、时间与地点尚未确定的讲座已经开始提前售票，售价为1800元。这相当于这个中国西部城市人均月收入的80%，或者一线明星的演唱会VIP座位票价。

不难料想，敬业的邱毅老师会获得更多大陆高校、地方政府、电视台的邀请。也许，他还会遇到一些台湾政坛的老朋友。

在大陆拥有最多高校名誉教授头衔之一的台湾人是李敖。这位前“立委”是海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的名誉教授。与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相比，较为不知名的海南师范大学为了邀请李敖可谓费尽心思。

2005年，这所高校派出一位副校长前往上海聆听李敖的一场讲座。历尽千辛万苦，这位女性副校长获得“一票难求”的门票，海南当地媒体如此形容这段艰辛的历程，“她的诚意打动了母校，母校最终给了她一张李敖演讲会的门票，帮这个老学生圆一个李敖梦。”接着她设想了举手发

言、强行发言、托母校将邀请函转交李敖三个方案，试图接触李敖。最终，在迟迟未获得点名的情况下，这位手里没有麦克风的副校长直接站起身，发言邀请李敖。演讲结束后，她顺利得到一张李敖助理的名片。

而在大陆拥有高人气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似乎此生都与“荣誉”离不开，他拥有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以及西安交通大学名誉教授的头衔。这得益于其登陆之旅曾在这三所高校有过演讲或参加过公开活动。而未能获得连战亲临的福州大学则在一项高校赴台访问团的交流中，通过负责人拜访连战，向其颁发了福州大学“名誉教授”证书。连战拥有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返台后亦曾在台大担任政治系主任。因此，一些大陆高校称，授予其荣誉教职，是为了表彰其突出的学术贡献。

此外，拥有大陆高校荣誉教授等职务的还有民进党创党元老（但之后转战新党，成为统派）的朱高正和台中市市长胡志强。朱高正在1998年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特邀教授，此时正是他在台湾政坛当红之时。而胡志强则是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他在2008年厦大的一场讲座上称，如果同学们不反对，任期满后，他会来厦门大学教教书的。

另外国民党副主席、现任“考试院院长”关中，2006年受聘于吉林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虽然曾经也是资深学者的关中足以胜任此职，但2008年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以其担任的“考试院院长”一职，登陆并不方便，唯有退休后才有可能性。而新党主席郁慕明在2011年访问辽宁抚顺期间，同时成为当地两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包括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和抚顺职业技术学院，授予聘书时，当地台办主任和市领导也在场。

另一种退路

“我觉得并不能说大陆就是我的新舞台。我的性格比较随意而安，有谁愿意邀请我，只要我觉得很合适，就会参加。现在我频繁来大陆，而且没有官方频繁的接待，很自由。”一向口无遮拦、毫不掩饰自负的邱毅说，“我很多元，不只是教书，还写剧本。中央电视台已经和我签约了，我写的剧本《大陆渔工台海喋血》，他们已经准备投入拍摄。”

他承认自己享受在大陆受到的欢迎，但不认为这是“统战”，而认为这是他的能力和专业本该获得的。“我写得真的感人，是我在2007年入狱时写的。主人公是在台湾被判刑、死于台湾的山东籍船员刘长峰。这个大陆年轻人，没有身份证，本来想着到台湾渔船上捞捞金，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可是上了台湾渔船后，却受到了不人道的凌虐。”

与依然拥有知名度的邱毅相比，一些已经让人几乎忘记的台湾政客则选择了在大陆度过余生。这包括新党前召集人、“立委”谢启大。谢启大现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的“首席仲裁员”，她在大陆还通过了司法考试，获得法律从业资格。大部分时间，这位曾经与李登辉还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打官司的前民意代表居住在大陆，除了帮助在大陆的台商处理一些法律事务、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外，也是一些大陆涉台节目的常客。

此外，由于大陆学制的弹性大，在职读硕士与博士的手续方面显然轻松不少，台湾不少政治人物兴起了一股大陆求学的热潮。2002年，时任亲民党籍“立委”的沈智能获得天津南开大学企研班硕士学位。在她之前，前国民党籍“立委”林宏宗已成为她的师兄。北京大学，则是台湾政治人物的最爱，除了曾任亲民党党团办公室主任的陈振盛，自“立委”时期就在北大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外，前国民党籍“立委”韩国瑜等多位知名人士也曾在北大就读。

除了教书与读书、当律师、电视名嘴等选择外，一些政治人物还选择了投资房产，以便未来定居。2008年，郁慕明被台湾媒体曝光其上海拥有豪宅一事。这位颇具大中华情结、经常出现在大陆举办的涉台活动主席台上的统派政党领袖，被质疑其买豪宅的钱来自新党公费，或和大陆有关。“我有6个姐妹在大陆，我购置上海房地产纯粹是个人理财，资金来源是个人美金贷款。”他如此解释。但无论如何，他在大陆受到的欢迎程度远比台湾大得多。今年年初选举中，新党的选票尚不足一些“打酱油”的环保团体和福利团体，无一人当选“立委”。

不只名人受到欢迎，其字画也受欢迎。一位台湾收藏家对台湾电视台称，台湾政治人物参加活动常被要求题字，连战和宋楚瑜“登陆”之后，字画在大陆一度颇有行情，连战的落款题字，大陆可以喊到人民币10万元。“现在大陆买家很多，政治人物的题字确实有询问度，还有大陆买家跟他要马英九的墨宝。但马英九的价格比不上连战，连战在大陆不得了。”这位收藏者对着台湾电视的镜头说。

当然，也有极其落寞者，他们将大陆视为“流亡”的去处。在陈水扁时代，有不少惹上官司的台湾政治人物和企业家为了逃避官司，选择海外流亡，而不少人被指隐蔽在大陆。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前“立法院”院长刘松藩，2004年因“广三案”而逃亡并遭到台湾当局通缉，至今下落不明。曾有《中国时报》记者在香港九龙发现其行踪。2009年，其妻蔡云卿在台病逝丧礼，也未见刘松藩身影。前高雄市长王玉云及前“立委”王志雄父子，极有可能潜藏在大陆。由于政治人物身份较为敏感，虽然不

少媒体曾拍摄到这些人在大陆出现过，但均未得到大陆官方的确认。但一些大陆地方报纸的公开报道中，这些在“海外”流亡的台湾政治人物和商人曾出现在这些地方，与地方领导大方地洽谈投资等事宜。

精彩推荐：《东正教在中国》



点此阅读

第六篇 一部台湾电影 两岸为何视角不同？

撰文/王彦晨

在台湾映演引起轰动的电影《赛德克·巴莱》，从开拍以来就不断创造台湾电影界的各项纪录，但至今最令人遗憾难解的，却是大陆对这部台湾电影的负面评价。何以如此？

中秋节期间，台北最热闹的信义区华纳威秀影城，大排长龙等待入场观赏的人气，充分说明这部描写台湾原住民在日本殖民时期遭遇的“雾社事件”，以电影元素精心制作后的戏剧张力和娱乐效果；这背后也同时承载着国人对国片复兴的期许和支持本土电影的热情。导演魏德圣的努力，已生动地彰显出怀抱理想、无悔筑梦的幕后故事，让观众一波波涌入。

然而大陆媒体却一面倒地批评；《环球时报》9月2号的标题是《赛德克·巴莱遭冷场，嗜杀不能成就一部史诗片》。新浪娱乐网的标题是《赛德克·巴莱：华而不实的伪史诗片》。《中国青年报》的标题则是《赛德克·巴莱大倒热灶》。报道指出，包括新浪、网易、《外滩画报》、《文汇报》等媒体记者，在威尼斯看完首映之后，都给出低分，有的甚至给0分。

其实大陆媒体的负面评价是很值得探索的两岸议题，为何一部原汁原味台湾电影，大陆人看来，却骂声不断呢？笔者认为，这其中包含着理解、认同、文化和视角的巨大鸿沟。

“生番”欢庆跳舞，日籍山地警察步入会场，为表示亲善的番人欲与日警共饮表示同心友好的小米酒，却被日警视为野蛮，用警棍毒打一顿；电影用种种细节交代族人在日本警察管辖下的处境，被认为是台湾共产主义者的苏慕红在《关于台湾的民族革命》已经指明“雾社事件”的本质是日本人的“理番政策”。

“（日本人）收买番人头目或有势者，让长相出色的女儿或番妇与日本警察结婚，让头目的儿子或有势力者以官费受教育，对家伙们（日本人）最忠顺的人赠与结婚费用，或带他们去东京等大都会参观。而一方是没收番人的土地、强夺其番产，这就是家伙们的理番政策。”“他方没收番人的土地造林，强制兄姊们（指原住民）做无报酬劳动。集合青年兄姊强制其从事劳动。”这些载于文献的史料、出自台湾左翼文人的评述，说明了本片用影视打造呈现的雾社事件，是一次台湾原住民反抗殖民压迫的暴力行动。

我们关心的是，这部片子表达了在当时背景下，自认为强势、优越、文明、先进的族群，用一个上对下、优对劣、尊对卑、文明对野蛮的视角，否定、歧视、唾弃地看待占领地的族群，从而衍生出残酷的政策，进而造成压迫，最终演变成反抗。对于庞大且正崛起的中国，难道没有任何启示意义吗？何以某种程度算是大陆精英的媒体记者，会对这种用心普遍地嗤之以鼻？透露出怎样的心态呢？

有一个台湾人难以明言却可能会产生的疑问是，如果大陆精英都看不懂文化差异撞击下应该存在体谅这样的电影语言，不能明白和个子矮小的人对话，不妨倾下身子表达尊重，万一有一天台湾真要让“外来政权”（异族）统治，那又是如何的下场？带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而来的统治者，台湾岂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台湾人早年到大陆，普遍存有的优越感，曾经让人很不舒服，这也是相同道理，日本人对生番，就有一种优越感，这和德国人看犹太人相似。中国人自认是泱泱大国，但甲午战败后，对帝国主义没有少批判过，自卑之后的国族自大主义，会不会让大陆人再次形成文化上的自以为是，重演偏狭的压迫呢？台湾很多人存在上述的疑惧，正是由于岛屿的历史中的确有过这样的压迫；荷兰人、日本人、国民政府，未来呢？大陆人看不透这点，台湾人怎么会放心呢！

第七篇 实存名亡的“外交休兵”

记者 / 马军

冈比亚与台湾“断交”后，马英九维持了五年的“零断交”破功。虽然马英九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台美、台日关系是几十年来最好的时候，但冈台“断交”还是让马英九的“外交休兵”政策背上了过度依赖大陆的骂名。

与陈水扁时期的“烽火外交”相比，马英九的“活路外交”虽然避免了和大陆在“外交”争夺上的直接交锋，但却始终没有摆脱以金援换友谊的“凯子外交”模式。在现有22个“邦交国”中，已经传出至少五个有意和大陆建立外交关系，冈比亚与台湾的“断交”，也将台湾是否迎来新一轮“断交潮”的主动权交给了大陆。表面平静的台湾“外交”，实则背后暗潮汹涌，风雨飘摇。

好朋友的背叛

冈台“断交”前，台湾23个“邦交国”中，有18个“邦交国”的“大使馆”位于台北天母西路62巷9号楼里，每个国家的“大使馆”都只占据大楼的一层进行办公，甚至有的楼层两国共用：冈比亚和洪都拉斯就共用这栋大楼的9层。

这栋大楼的12至15层，是一个叫做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的单位，这个看起来像是民间机构的单位实际上是台湾“外交部”给予“邦交国”金援的白手套。而大楼的前面，耸立着二十几根旗杆，除悬挂着各“邦交国”国旗之外，还预留了十根空旗杆已备台湾“外交”有所拓展时的“不时之需”，但是冈比亚和台湾的“断交”，让这空着的旗杆从十根，变成了十一根。

这是冈比亚第二次和台湾“断交”。1965年刚从英联邦独立出来的冈比亚，1968年就与台湾政府建交，但是在1974年“断交”。1995年7月13日，冈比亚在发生军事政变后与台湾政府复交。虽然冈比亚人口只有180万，面积只有1.1万平方公里。但是相比于那些南太平洋的“珍珠国家”，作为非洲最小国家的冈比亚对台湾来说，已经是很大的“邦交国”了。

2012年4月，马英九访问冈比亚时，大家欢迎的人群绵延数公里，数百人的冈比亚民众身着绿色衣服且跳且走，始终伴随着马英九和贾梅的车队。访问过程中，贾梅还邀请马英九和其一起比赛足球射门和俯卧

撑，过程相当亲密。贾梅回访台湾时，出手也极其阔绰，四五天的时间，光是小费就花了90万新台币。“冈比亚和台湾就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只要星星和月亮在，冈比亚和台湾就在”，马英九访问冈比亚时，贾梅曾经如此形容冈台关系。

冈比亚对台湾也不薄，几乎每届联合国大会上，冈比亚都会提出让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议，即使是在马英九上任后，台湾不再强求加入联合国的当下，贾梅依旧执着的在联合国提议让台湾加入。

当然，为了维持冈台“星星与月亮”般的友谊，台湾历年来花了不少钱。

近年来，台湾每年都要援助冈比亚2.9亿新台币，此外还有很多的物资援助：2009年，台湾援助冈比亚价值约两亿台币的武器，此时任“外交部政务次长”的夏立言和“国防部副参谋总长”严明还亲赴冈比亚参加仪式；2012年冈比亚粮荒，台湾“外交部”金援一亿新台币以购买粮食和种子；2013年11月6日，台湾再度援助冈比亚四部渡轮的引擎，18年来，台湾对其提供了大量援助。

台湾的金援使得冈比亚一次又一次的狮口大开，2008年5月21日，马英九上任的第二天，前来道贺的冈比亚使团带来两封信，第一封祝贺，第二封直接要钱。此次“断交”，台湾外交部判定，应该和冈比亚此前提出的1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遭到拒绝有关。今年1月，贾梅曾经透过台湾驻冈比亚“大使馆”向台湾当局提出财政请求，而且摆明了只要现金。台湾方面要求必须列出计划和用途，否则不予支持。

这并非是冈比亚第一次威胁台湾。陈水扁时期，贾梅就曾以“断交”威胁要求援助，为此台湾政府先后派遣两批特使团前往冈比亚，重新调整专注款项后才避免“断交”。马英九上台后推动“活路外交”，对对外金援进行了调整，不再随意向“邦交国”支付现金，这才引得贾梅说出那句“感觉台湾不要我们了”。

“外交休兵”的警钟

已经五年多没有失去“邦交国”的台湾民众在疑惑为何冈比亚会突然提出“断交”之外，还对马英九政府提出了另一个质疑：“为何事先毫无预警？”

当“断交”消息传来时，“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江宜桦、“外交部长”林永乐都是通过看电视才知道的消息。事先一点情资都没有掌握。“断交”前一天，马英九在接见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时，还拿冈台友

谊举例："台湾八八风灾时，冈比亚那么小的国家还捐出了十万美元，这让台湾很感动。"

台湾驻冈比亚"大使馆"事先对此毫无预警，甚至台湾"大使馆"人员刚刚与冈比亚副总统贾沙迪碰面，没有察觉到有任何的异常。实际上，当今年年初要钱未果之后，冈比亚总统已经和台湾"使馆"日行渐远。根据台湾媒体披露，"台湾驻冈比亚大使馆"平时与冈比亚高层的经营并不顺畅，反倒是军事辅导团到达冈比亚后建立了很多联系。贾梅接见台湾军方人员的次数要比接见"大使"陈士良的次数多很多。而台湾驻冈比亚军事辅导团人员也是从当地媒体才得知冈比亚台湾"断交"的消息，但却始终没有接到台湾驻冈比亚"大使馆"如何应变的通知。直到当地时间午夜，台驻冈军事辅导团才接到"陆军司令部"的秘密指令："保持低调，尽速回国"。

面对冈台"断交"风波中被动的局面，岛内舆论纷纷将责任归到了马英九"外交休兵"的政策。批评者指出，马英九过度的将外交"零断交"的期望寄托在大陆身上，认为大陆只要不挖角，台湾就能保住现有的"邦交国"。但冈比亚对台"断交"则是在没有大陆挖角的情况下产生的，这对马英九是一个警钟。

根据BBC之前透露，此前有不止一个中南美洲国家试图与大陆建交，但是被大陆以"维护两岸稳定"的理由拒绝，面对是否要与冈比亚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时，大陆外交部给出的答复是："我们愿同台湾方面共同维护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

民进党"立委"蔡煌琅干脆认为，冈比亚的"断交"只是一个开始，萨尔瓦多、多米尼加、洪都拉斯、巴拉圭和梵蒂冈等五个国家与台湾的关系都岌岌可危，其他友邦也都因为"外交休兵"而变得感情淡薄，"马英九的'外交休兵'变成了外交休克"。

台湾"外交"的"实"存与"名"亡

虽然冈比亚与台湾的"断交"让马英九的"外交休兵"政策备受质疑，但是马英九任内，台湾国际空间的拓展也是不争的事实：2009年5月，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了世界卫生大会，截至2013年10月7日，共有131个国家和地区给予台湾护照免签和落地签的待遇。

"外交休兵"让台湾民众感受到了两岸关系的和缓所带来的国际空间上的拓展。免签国家的增加更是让台湾民众出国时感受到了实惠。甚至台"副总统"吴敦义在公开场合曾骄傲的称赞"外交休兵"的好处："隔壁有

个国家那么大，才二十几个免签国，我们小小的台湾有100多个。”

但“外交休兵”也带来另一个坏处：那些以在两岸之间摇摆而获得好处的国家，因为两岸外交和解，无法向台湾进行“敲诈”了。除去冈比亚，剩下22个“邦交国”中，巴拉圭、海地、贝里斯等国，在“大使”任期到期之后不再派驻“新大使”，只有代办代理馆务。

随着两岸经济实力的逆转，越来越多的台湾“邦交国”开始向大陆倾斜。

上一个与台湾“断交”、和大陆建交的国家是马拉维。2008年马拉维与大陆建交之后，得到了许多项目的资助，包括新国会大楼、国际会议中心、卡隆加-齐提帕公路和马拉维科技大学。中马双边贸易增长很快，2012年达2.97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87.5%。而包围着冈比亚的塞内加尔，自2005年与北京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年增长30%，2012年达到8.45亿美元。有台湾专家分析，冈比亚最重要的资源是冈比亚河，但是贾梅没有武器来保障自己的资源。面对邻国塞内加尔的觊觎，在寻求武器援助方面中国大陆显然是比台湾更好的选择。

除冈比亚外，台湾在中南美洲的“邦交国”也都变得松动了许多。

巴拉圭是台湾最大的“邦交国”，是在南美洲唯一的一个“邦交国”，也是和台湾关系最为紧密的“邦交国”之一，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有一条长约四百米的蒋介石大道，街道中间有一座蒋介石铜像。2007年陈水扁发动去中国化运动时，曾有巴拉圭左翼社会党欲要求政府将蒋介石大道改名为巴勒斯丁诺街，但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至今没有改成。历史上巴拉圭许多的军人也是在台北复兴岗军事训练中心受训。2008年8月15日，卢戈政府上台之后，上任不足半年的马英九曾经率领庆贺团队亲赴巴拉圭参加就职大典。六个月后，时任“外交部长”的欧鸿炼再度现身巴拉圭，当时便有传闻说巴拉圭准备放弃台湾与大陆建交。最后，在付出超过千万美元的“捐赠”之后，勉强保住“邦交”。

第八篇 旧金山中华总会馆“撤旗”风波

记者/马军

2013年5月25日，美国旧金山中华总会馆通过动议，撤下大堂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总领事袁南生成为第一位拜访中华总会馆的中共官员。从“青天白日满地红”飞扬到传统侨社纷纷易帜，两岸侨务争夺力量的此消彼长由此可见一斑。

侨社龙头撤旗引风波

2013年5月25日，美国旧金山中华总会馆的商董会议上，来自宁阳总商会的商董黄楚文提出临时动议，要撤下会馆大堂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理由是会馆属于美国民间组织，不应该涉及政治。会议在轮值主席黄荣达的主持下，以21票赞成、20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动议，并且在两天之后的27日正式撤下了大堂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此事震动了旧金山侨界，并在全美传统侨社引起连锁反应：纽约和洛杉矶等地的传统侨社侨团也开始针对是否撤旗问题进行争论，本来相安无事的侨团开始分裂为撤旗派和护旗派。

位于旧金山华埠的中华总会馆是美国传统侨社的龙头老大，成立于1854年，1901年与美国加州注册立案。中华总会馆前身由美国北加州六家较大的华人社团联合组成，具体职责是协助华人商铺或个人处理意外事件和法律纠纷，并提供诸如华侨医院、华文教育等基本的公共服务，目前总会馆下属一个机构，即位于旧金山斯托克顿街的美洲中华中学校。会馆服务的华侨以广东人居多。中华总会馆旗下由宁阳总会馆、肇庆总会馆、合和总会馆、冈州总会馆、阳和总会馆、三邑总会馆以及人和总会馆七大会馆组成。采用商董制进行内部管理，下属每个会馆各自推荐一名商董进入总董会，总董则由各个会馆推荐的商董轮值担任。

6月29日，中华总会馆决定撤旗一个月之后，主持会议决定撤旗的总董黄荣达、商董雷华钦等人收到另外几位商董以及肇庆总会馆委托律师送来的诉状。当天中华总会馆举行的月会上，肇庆总会馆主席黄梦恂本打算宣读致中华总会馆的15项宣言，但是被会议主持黄荣达以内容太长强行喊停，而后宁阳、三邑及阳和三个会馆支持总会馆5月撤旗的书信则顺利宣读。

中华总会馆已经28票全票通过的程序宣布为因执行总会馆公务而遭到起诉的总董黄荣达和雷华钦聘请律师，应对诉讼。黄荣达在收到诉状之后曾经对媒体表示，之所以做出撤旗的决定，是因为从长期来看，总

会馆去除政治倾向性，更有利于侨胞的团结，也是为了“方便两岸官员能在总会馆走动”，并无不妥。

美国侨界关于认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是五星红旗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尤其是在中美建交之后，这种争论愈演愈烈。旧金山中华总会馆就曾经有人私自将大楼楼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拿下引发争端，而保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商董和主席也曾经提出议案要“永远效忠中华民国”。今年年初，中华总会馆楼顶的旗帜已经被撤下，此次撤下的旗帜位于会馆大堂国父孙中山的画像两旁。而组成中华总会馆的七个会馆早已经自由决定悬挂何种旗帜，目前，人和、阳和、三邑会馆早在十年前便已经开始悬挂五星红旗，而肇庆、和合两家会馆还坚持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至于另外的两家宁阳和冈州两家会馆则悬挂的是美国星条旗。

撤旗之后中华总会馆将会升起何种旗帜？黄荣达表示，中华总会馆撤旗后，会重新设计一个旗帜，代表全体海外华侨和中华民族，以此促进侨社团结。中华总会馆方面还表示，今后总会馆的大门也将继续向两岸的政府和民间敞开。

目前，黄荣达已经卸任中华总会馆总董职位，新一届总董由合和总会馆主席余习文担任。7月4日，驻美中华总会馆当天在旧金山会所举行美国国旗升旗仪式，中华总会馆总董余习文、宁阳总会馆主席黄荣达等多位会馆商董出席仪式。余习文表示，旧金山华侨身为美国公民，在美国独立日升起美国国旗，表达了侨胞对美国政府的认同与忠心。

“开启新的一页”

撤旗发生一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总领事袁南生便拜访了中华总会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馆官员第一次走进中华总会馆。参观过后，袁南生在会馆大堂，与中华总会馆的相关人员合影。大堂中孙中山先生的大幅画像依然高挂，以往两侧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地方则早已空空如也。对于此次中国总领事的参访，黄荣达在欢迎辞中说道：“袁南生的到访带来祖国和13亿同胞的问候，这对中华总会馆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中华总会馆的官方主页对于袁南生到访的报道口吻同样热情，“中华总会馆于6月3日开启历史新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领馆总领事，自中美建交三十四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华总会馆。总董黄荣达致辞，欢迎总领事率团到访。总领事袁南生致辞说很高兴和同事们一起应邀来到中华总会馆拜访，也为是中美建交以来之首次拜访感到荣幸。”

在此次撤旗之前，一直悬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中华总会馆被视为长年支持台湾的华侨势力。中华总会馆对于到访官员给予高度评价，在历史上也多次出现，只不过之前中华总会馆评价的对象，都是到访的台湾政治人物和官员。

2003年8月24日，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曾经拜访中华总会馆，表示他对海外中华公所的深厚情谊。时任中华总会馆总董的余臻发对马英九就称赞有加，他说“马市长不怕苦不怕累，勇往直前的精神与热心令人感佩。作为台北市长，马英九的作风正大光明，有口皆碑，民望极高，是台湾浑浊政坛的一股清流。”在称赞完马英九之后，余臻发还不忘对年轻的马英九进行期许，他希望“年轻有为的马英九可以为和平统一中国做出贡献。”

2011年，身兼国民党马英九主席办公室主任的国民党海外部主任夏大明拜会了中华总会馆。会上总董周大昌宣布台湾“侨委会”已经宣布将拨款十万元补助胜利堂社区中心的改建计划。在夏大明拜会之际，中华总会馆商董们讨论了是否在给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文书上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最后，对于国民党带来的十万元补助的“礼物”，商董们一致认为，应该按照章程办事，既然中华总会馆的章程上注明了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只要章程一日不改，中华民国“四个字”自然应该得以承认。

2013年2月15日，新上任的台湾驻美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金溥聪到达旧金山第一站也是选择了中华总会馆，对于金溥聪的到来，轮值主席黄荣达非常聪明的使用台湾人喜欢的头衔，称呼金溥聪为金“大使”，表示欢迎金“大使”的到来。

从欢迎金“大使”到“方便两岸官员能在会馆走动”，中华总会馆内部“历史新的一页”算是就此掀开，然而在总会馆以外，此次撤旗的风波则愈演愈烈。

撤旗引发抗议

5月30日，北加州立场亲台的一百多个侨团，于当地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刊登“致中华会馆公开信”全页广告，呼吁“旧金山中华总会馆遵守章程，撤销撤旗临时动议”。6月8日，即中华总会馆撤旗后半个月，旧金山传统侨社人士与国民党人士在中国城举行护旗行动集会，抗议中华总会馆动议撤下已经悬挂60年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旧金山华埠侨社林立，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华侨社团都支持中华民国政权。究其原因，一名在纽约唐人街的华人资深媒体人向本刊表示，最早来到美国的华人大多数都是广东人，清末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就经常找这些人募款，美国老侨对孙中山既有老乡之情，又有革命友谊，导致满清推翻之后，在美老侨对中华民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新中国建立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美国华侨在大陆的家人都被划成地主、资本家身份，华侨寄钱回家盖得房子都被充公或拆除，消息通过香港传到美国之后，当地不少华侨都曾宣誓不再与大陆来往。此外，台湾政府一直和海外关系良好，东南亚各国独立时，当地华人身份面临尴尬的局面，当时的台湾当局推出政策，只要能证明有华人血统者，台湾当局就发给他们中华民国护照，，解决了很多当地人的身份的问题，也使得华人对台湾政权的好感要远远多于大陆。

青天白日旗飘扬的旧金山华埠，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和台湾侨务政策逐渐向台侨倾斜，支持大陆的侨社越来越多。李登辉任期后段，曾经有台北驻旧金山官员称，本来华埠一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是每年都会有变化，悬挂台湾的旗帜逐年减少。这种两岸侨社力量的逐渐失衡也给一向支持台北政权的侨社带来了苦恼和焦虑，而这种焦虑在这次中华总会馆撤旗事件中得到了爆发。

五洲洪门致公总堂盟长赵炳贤担任旧金山护旗集会主席。洪门当年帮助孙中山赢得辛亥革命胜利建立中华民国居功至伟，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六十八位是洪门兄弟。赵炳贤在集会上说："这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很多革命先贤流血牺牲换来，我呼吁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侨胞，都应该站出来保卫我们的国旗。"

中华总会馆主席团成员林炳昌在撤旗动议表决时，投了反对票。他发言说："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代表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自由、民主、平等、均富。有人为了让害怕这面旗的人进入中华总会馆，竟然视这面旗为眼中钉，这非常可悲、非常不幸。"而来自于全美各地中华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总会联谊会的声明最为煽情和坚定："对于任何会所未依合法程序移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做法，本联谊会均坚决反对，绝不认同""悬挂代表自由民主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是我们全体华侨的荣耀，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骄傲。再次诚恳呼吁全球各地中华会馆、公所，永远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侨社纷纷"易帜"，而东岸的纽约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却还算"坚挺"。纽约华埠传统侨社中华公所主席吴国基声明支持中华民国的立场坚定不移。吴国基说，国父孙中山先生"平等、博爱、正

义、和平”的治国主张，与美国的立国精神一致，有利于侨胞在美国安身立命。新会同乡会主席黄达良则认为，旧金山是孙中山先生百年前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城市之一，现在旧金山中华总会馆把先侨悬挂了上百年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撤出，相当于“把祖宗的旗给撤了。”

对于中华总会馆的撤旗行为，台湾政界也给予的相当多的关注和评价。旧金山侨社出身的国民党前“立委”孙国华表示，台“侨委会”多年来的侨务政策错误，现在台湾只与台商侨领有互动，与传统侨社几乎没有互动，双方感情淡了，侨社自然容易被对方拉走，尤其民进党执政八年，传统侨社都被民进党的“侨委会”断绝往来，直到马英九当选后，双方关系才稍微解冻。

中华总会馆决定撤旗之前，台“外交部”北美司司长令狐荣达曾表示，侨社若要在政治上改变认同，他希望侨社三思。

从亲台到亲陆

旧金山中华总会馆历史上曾经是北加州最牢固的“反共堡垒”，用当地华侨的话说，是“针扎不进的，但是这几年却大变样了。”

中华总会馆在2003年3月29日的例行月会中，三邑总会馆主席关洛章提出撤去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议题。 4月26日，经过表决之后，支持无限期搁置者有三十七票，高达出席商董之七成，撤旗议题被无限期拖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继续置于中华总会馆内。然而，出于对陈水扁及民进党台独政策的担忧，中华总会馆面对两岸侨务争夺时的姿态，悄悄的做出了改变。

2003年8月29日，中华总会馆总董吴国宝在面对新闻界时就曾表示，中华总会馆主席团除了反对台独、支援统一次外，也决定自力更生，不再接受台湾侨委会“美洲及全美中华会馆中华公所联谊会年会”的资金补助。而实际从前一年开始，中华总会馆便开始了与中国大陆官方的实质接触，中华总会馆2002年工作报告中写到：“在挂满青天白日旗和挂有国父孙中山先生、蒋中正老总统和蒋经国先总统照片的总会馆大厅，接见了前来拜会的大陆开平市政府代表团。”而中华总会馆下属的旧金山人和总会馆于2002年10月20日在会馆顶楼升上一面五星红旗，并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成为第一个易帜改悬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的旧金山中华总会馆所属侨团。

半年之后，中华总会馆的认同转向表现的愈加明显。2004年3月2日，旧金山中华总会馆新任轮值总董谭逸良就任时，只同意向孙中山画

像致敬，拒绝在会馆举行由中华民国官员监交，拒绝接受升中华民国国旗和唱中华民国国歌的仪式，而是另行在新亚洲饭店升起五星红旗，唱义勇军进行曲进行就职，谭逸良因此被告上法庭，但是后来撤诉。

2005年，旧金山掀起的易帜风波逐渐延烧到了洛杉矶。3月5日，美国大洛杉矶地区促进中国统一联合会在洛杉矶唐人街举行会址揭牌仪式，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钟建华的注视之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是洛杉矶唐人街80多年历史以来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6小时之后，由于台湾方面的打压，五星红旗不得不被暂时撤下。

大洛杉矶地区促进中国统一联合会会长刘建民七十年代从香港辗转来到美国，在美国洛杉矶侨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曾任洛杉矶唐人街最有影响力的传统侨社中华会馆的主席，也曾经长时间认同中华民国政权，担任过国民党洛杉矶党部委员，并被陈水扁授予过“中华民国”侨务委员头衔，享受台湾官方“部级”待遇。刘建民中华会馆主席任内，由于不满陈水扁的台独主张和忽视传统侨社的政策，曾取下会馆中的陈水扁总统玉照，并且打破传统，首度率领会馆重要干部访问中国大陆。刘健民后来干脆辞去中华民国政府侨务委员的职衔，并创立以推动两岸统一为宗旨的洛杉矶促统会。

根据美国当地侨报报道，刘建民决定“易帜”之后，台湾驻洛杉矶办事机构人员曾出面对刘健民“做工作”，例如在其母亲因病住院时主动前往医院表示关怀，并向刘许诺提供高额长期无息贷款供其做生意，但被婉言拒绝。后台湾当局工作人员通过对联合会房东施压，以旗杆可能影响大楼楼顶安全为由，要求撤下五星红旗。由于联合会与业主签定租约时未明确约定可以在楼顶悬挂物品，业主据此在升旗日前两日向联合会发出律师信，并要求法院下令禁止悬挂，五星红旗在洛杉矶侨界首次升起六小时便遭撤下。

侨委会的无奈

中华总会馆的撤旗转向只是两岸侨务争夺此消彼长中的一个案例而已，2013年1月，前海协会会长陈云林造访洛杉矶之时，已经有台侨坚持出席陈云林晚宴；4月，一向亲台的洛杉矶侨社客家会馆，不仅接受了央视采访，还要请中国领事馆总领事邱绍芳见面，并主动撤下了会馆内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对于美国侨社的认同转向，台湾内部指责声纷纷指向了马英九的“外交休兵”“侨务休兵”政策。对于岛内舆论的质疑和反对派的批评，台湾“侨委会”官员的回应既显得无力，也显得有些无奈。

对于中华总会馆的撤旗行为，台湾“侨委会”副委员长任弘表示，中华总会馆现任总董黄荣达主导的撤旗决议，不符合该会馆章程，其他董事已经酝酿提起法律诉讼。对于台湾政府能否干预此事件，任弘无奈的表示，中华总会馆是美国注册的社团，侨委会无法指挥，只能“柔性劝导”。至于能否以经济补助的形式拉拢侨团，任弘表示，中华总会馆由七个会馆组成，有些侨团对台湾友善，有些对于中国大陆则更为亲近，侨委会无法统一删减补助，只能对每年中华总会馆举行的四月蒋公追思活动及十月双十国庆两大活动提供象征性的赞助，“额度很少，只有几千美元而已”。

对于侨社如何逐渐转向亲近大陆，除中国大陆近年来国力上升，国际影响力增大之外，旧金山侨界还盛传中国大陆官员以现金收买侨社领袖。十年前，便有传闻称当地的中国领事馆官员手持百万美元，用于收买亲台北侨界领袖，引诱其亲近北京。每当侨社领袖接受中国大陆领事馆的邀请参访大陆之后不久，其所领导的会所屋顶的旗帜，也会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在面对外界对中华总会馆撤旗事件中的政治力涉入的猜测声中，中华总会馆决定今年对双十庆祝低调进行。7月27日，商董会上讨论了是否举办国庆庆祝的问题，有商董明确表示反对举办双十国庆，也有商董主张延续以往政策。最后经过争论后达成共识，双十国庆只举办全侨公宴，一定条件下可以举办小型巡游，但是参与的队伍必须自行负责安全事宜。

宁阳会馆商董黄惠喜认为，基于撤旗风波，庆祝可以低调，建议只举办全侨公宴。宁阳商董黄华玺和三邑会馆主席张冠荣表示，之前由于巡游燃放鞭炮和车祸导致伤亡，导致中华总会馆赔偿100多万美元，同时也不希望节日活动被操纵，被政治化。

540元/年
共计36期
挂号邮寄为648元/年

订阅热线
（0755）2593 4567
（ 010 ）6528 1005



第八章 看见台湾

第一篇 台湾的失忆与失意

特约撰稿员/王晓笛

初到高雄的时候，是从左营站下的火车，向西不远处就是左营港，一个留下太多悲欢离合的感伤之地。漫步于左营港的晚霞，眺望着一片波光的海浪，视线中偶尔飞过几只白鸟，在落日的余晖之中，斑驳陆离，像极了铺陈在碧海蓝天上的水墨。这场景如痴如醉，让人心神宁静，已然见不到当年风雨飘摇中的混乱与嘈杂。我不由自主地哼起了JS的《东北老家》："大约半个世纪，故事在山东港边，奶奶带着一家人，从此告别熟悉的家园。乘风破浪的军舰，从青岛经过福建，终点落在左营港，未知的命运就要上演……"

从青岛登船而来的不止这对东北后裔兄妹，还有我的台湾好友小闻。小闻的爷爷是个传奇的人物，随同远征军进入缅甸，做过美国人的翻译。1949年，小闻爷爷离开了发妻，随军从青岛启程前往台湾，本以为只是一次常态的撤加快退，却不曾想，此生再未回过家乡。

90年代，李登辉荣登大宝，表面上推动国统纲领，但私下积极向台独靠拢，台湾内部局势暗潮汹涌，民进党和绿营势力开始蠢蠢欲动，老人家经常会坐在电视机前失神。一次他喝了点酒，一把抓住年幼的小闻，表情严肃地问她，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小闻一时语塞，随后怯生生地说："台湾人？"老人家勃然大怒，咆哮道："你是中国人！你给我记住你是中国人！"

岁月已逝，尽管老人已殁多年，但小闻至今还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老人留下狠话，谁要选票投给民进党，就不准进这个家门！也从那个时候起，小闻家从来没有投过民进党的票。这也是无数蓝营家庭的心声，即便国民党是扶不起的阿斗，也要含泪将选票投给国民党。蓝绿的对决与纷争，成为了生活必备的一部分。

不知何时起，台湾人失去了身份。

离开上海前，导师分给我的课题任务并没有做完，来到台湾后经常要泡在图书馆里，查找资料，修改文稿。有时会翻开一些尘封已久的论文合集，都是二十年前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精华。字里行间透露着大国国民的骄傲和不可一世：中国是世界文明的贡献者，中国也要承担起世界进步的责任，台湾是中国的先行者，不仅要紧密的连接世界，也要对

大陆和香港有标杆作用！这种奋发有为和敢于天下先的旷世情怀，一如大陆现今的精神面貌，大气磅礴，让人心情振奋。

只是，这种精神，终究留在了那堆纸张发黄的论文之中，只是一纸考据的材料。

我的方法论课程老师老刘，年过古稀，已临杖朝之年，本应该是颐养天年的岁数，却主动回到学校上课，按他的讲法，自己就是喜欢教书，这是他生活的方式。然而现实却令他倍感失落，他经常会在课堂上抱怨现今台湾学生的种种顽劣和懒惰。他时常回想起，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台湾社会的那种奋发向上的精气神，人们信心满满，对美好生活充满了期盼。可如今这一切都变了，台湾的目光，不再关注于世界，而是热衷八卦隐私；台湾的精神，不再奋斗进取，而是耽于安逸，沉浸在莫名的“小确幸”之中。谈及他之前在大陆讲课的经历，他双目放光，身体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地讲述他是如何的受到学生的尊敬和仰慕，他作为一个老师的尊严如何在大陆得到了实现。

他委托我为他给我本科时代的母校写推荐信，希望表达他可以到大陆去教书的意愿。他为自己规划好了未来的生活：半年在台湾，半年在大陆。他希望在生命余下的时间里，在大陆重温在台湾已经失去的东西，那种情感与气节，是他这种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终生难忘的烙印。

不知何时起，台湾失去了精神。

没有了身份，没有了精神，台湾是亚细亚边缘的一个可怜的孤儿。这个在大陆如神话一般的美丽存在，正变得让人陌生与捉摸不透。2014年12月13日凌晨，国家公祭日，我在脸书上，写下一条状态：“约摸台湾这边是没什么纪念活动了，在台陆生们记得都默哀一下死难同胞，八年打得不容易啊……”这一天，一个休闲的星期六，繁忙一周的台湾人匆忙丢下手中的工作，开始享受周而复始的愉快假期，台北街头莺歌燕舞，小吃夜市人声鼎沸。大家在茶余饭后，调侃一下马英九对抗日不痛不痒的声明。这才是轻松愉悦的生活！遥远的南京，只不过是一个书本上的地名。中韩FTA，也不过是“砖家叫兽”危言耸听的把戏。这片乐土，有她自己的行为方式，正如一位台湾网友所言：“我们无力也无愿承担那么多的期盼和责任。”

曾经的那个台湾，已经被忘记，也许未来，忘记得会更多。

第二篇 为什么要有两岸青年交流

特约撰稿员/罗鼎钧（台湾）

回顾冷战时代各个因意识形态下分裂的国家，南越最终被北越并吞了、东德在柏林围墙倒塌后也被西德统一了、朝鲜半岛南北韩仍旧互不往来，金三胖三不五时还是要跟全世界宣战。从前面各个分裂的国家观察到，基本上民间都是互不相往来，两边不定时都有军事上的冲突。

反观在现今的海峡两岸之间，自1987年以来台湾老兵赴大陆探亲以来，民间的交流每年开始也都以等比级数的增长交流，直至今日两岸每周都有近600架民航飞机在台海间上空穿梭，每年往返两岸的民众整年都要以千万人次来计算，两岸的官方迄今也都能保持正常的交流往来，与现今的朝鲜半岛一对比下来，可以说是高下立判，因为海峡两岸间的同胞们可以互相往来自由交往。

海峡两岸彼此间的交流现在看似风平浪静稳定增长，但是两岸间仍旧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回到现实层面，两岸青年交流交往多了，两岸青年彼此间自由恋爱的人也多了，但是为何仍有不少误解，尤其在去年台湾发生的一连串运动，导致了两岸关系的停滞不前，是台湾青年人不喜欢大陆吗？不了解大陆吗？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两岸青年间都不了解彼此，两岸政府间仍需多多搭桥让更多的两岸青年们更多机会了解彼此。

也回顾我这一年多以来观察以来，两岸青年间的交流型式仍然是非常的多元，但两岸青年间打从真心交流的人仍属少数。



要怎么做最重要的是在于两岸青年彼此的心里，即使每年办那么多的两岸活动夏令营，两岸青年将这最美好的记忆都留在一个暑假里或是在这短短的营队里，不管在台湾还是在大陆，短暂开心的时光永远定格在某年某个时间段里，活动结束后回到各自的地方不再联系，久而久之这样的两岸青年交流仅仅只能起到个开端的作用，要如何深化持续让两岸青年彼此间深厚的友谊保持不间断，都值得两岸间的当政者出台出更多的多元政策，让更多的两岸青年可以友谊长存。

因为有着两岸青年友谊的长存，青年学子由校园走出来进入职场，台湾青年可以选择至大陆工作和创业，反观大陆的青年学子在台就学后，其实要是没有三限六不，大陆优秀的青年学子和人才能够留在台湾就业和创业，也不失为两岸青年人才间的自由流动更加顺畅。

就如同在清朝末年抗法保台的中法战争之际，不管是湘军淮军还是大陆各省军人，与台湾本地民众一条心共同保卫台湾固守东南海疆，时至今日，两岸青年交流仍有非常多的不足，必须要呈现多元点线面的深入交流，不仅从校园里一直到青年创业就业相关的政策完善，我想在现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两岸青年们都必须以身作则，彼此多交流打从真心的交流，这样才能共创两岸青年的双赢。

第三篇 台湾美食X宗罪

特约撰稿员/邱辰

到了台湾上学以后，经常有小伙伴羡慕我能吃到各种台湾美食，有一些微博达人，还翻出来一些收藏给我看，让我照着这个攻略去吃。

相信这也是大部分人，对台湾的既有印象，就是美食极多。恨不得遍地都是美食，街边小摊，遍布各种卧虎藏龙不出世的美食。

可是，刚到台湾没到一个学期，我的台湾美食梦想就破灭了。刚开始还找理由，说“新竹是美食荒漠啦，你看一个正经的夜市都没有”。的确，在几乎所有我认识的台湾人眼中，新竹就是一个十足的「美食荒漠」。唯一比较拿得出手的所谓特产，也是没甚么滋味的贡丸&米粉。

可是原因不在这里，因为我跟我身边的不少吃货，可是把台湾所有的知名夜市都逛了个遍。士林夜市、宁夏夜市、瑞风夜市、六合夜市、罗东夜市等等等等，凡是那些叫得出名字的，有点名气的我们几乎全去过了。甚至有些地方，我们就是奔着夜市去的，别的景点直接忽视。

又因为我们在台湾上学，所以时间充足、也有当地的同学带领，一些仿冒的店铺直接就被踢出局，我们去的都是正宗到不行的各式招牌门店。我们呢，也会有闲情雅致一家一家的去尝，一家一家的去碰。总之，不敢说台湾很多美食都吃过，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是有涉猎的。那会记得还美其名曰，采风。

可是采风没过多长时间，我和我的吃货朋友们，就被残酷的现实打败了。在台湾，作为一个北方人，作为一个长期生活的北方人，被台湾的饮食虐的惨惨的，细数一下，有几大宗罪：

一宗罪：过于“同质化”的夜市美食

就像我之前举得例子一样，很多人对台湾美食的印象，大部分来自于微博上、微信上传播甚广的一些夜市美食大搜集。什么「大肠包小肠」、「月亮虾饼」、「蚵仔煎」、「手切鸡排」、「大屌烧」等等，都是各种攻略中常出现的，相信大家看到名字就能联想到很多图片。同时，这些夜市美食，也是各种大陆游客、交换生同学最爱拍照分享的，所以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台湾美食的认知，就是这些夜市美食。

可是，吃遍台湾夜市的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同类型的美食在几乎所有夜市上都见过。比如说「大肠包小肠」，几乎所有夜市都

有，吃过几次以后就再也不想吃了。每家都说自己是最正宗的，可是即使我去逢甲夜市上的正宗店铺吃，吃起来也就那样子。

这点最明显的是逢甲夜市，在这个号称全台最大的夜市上，几乎集中了台湾各地的美食。你如果先去了逢甲夜市，再去其他的夜市，都会发现名字、做法差不多的小吃。

我在google台灣搜索「便當」二字 ，出来的几乎都是以炸为主的便当，也基本覆盖了我说的几个种类、鸡排、鸡腿、猪排、虾卷。少数一些烧腊便当会混进去，不过烧腊作为便当的主菜，一样也被大家吃吐了。

二宗罪：没完没了的油炸

众所周知，食物的烹饪方法有多种，蒸、煮、煎、炸、炒、烤，数不胜数。大陆的各个地方小吃，也都是多种烹饪手法并存的。但是在台湾，几乎所有平价美食，都是油炸出来的。鸡排、鸡腿、猪排、虾饼，能用炸解决的，台湾人绝对不会用另一种方法给你做出来。为什么？油炸学习成本低，制作成本低，推广快、易复制是最大的特点。大部分的台湾厨房，做不了鱼香肉丝以及宫保鸡丁一类的炒菜或者烧菜。因此，简单的素菜搭配上一个香喷喷的炸鸡拍，duang，一个便当就完成啦。

刚到台湾的时候，觉得好幸福，天天都能吃上这种猪排饭、鸡排饭一类的便当，比之前的食堂好太多了。后来，当我悲催的发现，平时只能吃这些猪排饭、鸡排饭的时候，我就哭了。所以，那些台湾待过一年以上，便当吃到吐 的人，估计都会有同感。

三宗罪：似是而非的火锅

据说有一个理论，是城市人压力越大，越喜欢去吃一些重口味的食品去减压。可是这套理论，拿到台北完全失效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北的麻辣锅。

恩，请跟我重复念一遍，麻辣锅。

而且请牢记，麻辣锅≠辣的火锅。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我是一个在四川上了四年学的人，对于火锅应该是什么样还是有基本概念的。可是到了台湾，无数次吃麻辣锅的经历，颠覆了我对台湾火锅的概念。

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台湾火锅的麻辣汤底是可以喝的。看到这里

很多人要吓一跳，怎么可能？大陆的火锅汤底都是油，完全不能喝。但是到了台湾，为了适应台湾人淡口味的习惯，同时也主打养生，各家的火锅比拼的竟然不是谁最有滋味，而是谁更养生。醉了，吃火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要酣畅伶俐的爽一把，你在这强调养生是要闹哪样。

台湾的火锅不是比哪家的锅底最有滋味，而是看是否养生。因此，到台湾最让我头疼的事情，就是同学约着吃这种麻辣锅，每次吃完都意犹未尽，最后回想起来，就是油以及辣椒都太少了，火锅中最精髓的麻辣香，都体现不出来。

四宗罪：永远都吃不完的高丽菜

这个配合上面第二条说，在平常吃饭过程中，便当中的素菜是我们最大的素食来源。可是，作为一个水果极其丰富的地区，台湾在素菜方面表现的太为差劲。

具体表现就是，我在台湾，吃了我过去20年都吃不完的高丽菜！没错，高丽菜在大陆就是被称之为包心菜。是台湾人民所有蔬菜摄入排行榜，当之无愧的NO.1。在高丽菜女皇后面，经常在便当中出现的是地瓜叶、莴苣叶等常见蔬菜品种。

这些蔬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宜、好种。因为台湾的气候，很多蔬菜不适合种植。同时因为台湾农地的保有量越来越小，大部分农田要不是种庄稼了，要不就是一些水果。所以台湾的蔬菜特别贵，具体有多贵，摘录一下给大家看看。

高雄市的公有零售价格表，下表就为7月20日的个别蔬菜价格信息。单位是 台币/kg。

蘿蔔		56.0
胡蘿蔔		47.0
麻竹筍		100.0
馬鈴薯		50.0
甘藍		67.0
小白菜		83.0
包心白菜		76.0
菠菜		133.0
青江白菜		83.0
空心菜		52.0
青蔥		100.0
韭菜		58.0
茄子		85.0
蕃茄		100.0
菜豆		116.0
大黃瓜		50.0
花椰菜		108.0
絲瓜		42.0
花胡瓜		67.0
苦瓜		75.0
青椒		80.0
芹菜		116.0
四季豆		133.0

可以看见，有些叶子菜，贵的没治，以133台币一公斤的菠菜为例，差不多大概25人民币一公斤，13、14元人民币一市斤。所以，受苦的只能是我们这些大陆学生，七八十台币一份的便当，就不指望商家能够给我们多少好的蔬菜了。

五宗罪、六宗罪。。。。X宗罪

其实除了上述的一些，还有一些诸如，永远都要排队但是永远都不好吃的美食。

温州大馄饨、天津手抓饼一类挂着大陆名字的伪大陆美食。

陆陆续续还有很多，我姑且称为X宗罪。

背后的原因

1.台湾缺少一个新东方厨师培训学校。隐含的意思，就是八大菜系之类的传统中国菜系，N多小店的厨师根本不会做类似宫保鸡丁一类的菜品。留存下来的，顶多就是一些小吃。而稍微有特色一些的，就会成

为当地的名小吃。普通百姓根本吃不到。从成本考虑，从厨师会的种类考虑，炸鸡腿、炸鸡排这一最简单的方式，才会被各种便当采用。

2.缺少丰富廉价的食材来源。前面看到，少而贵的蔬菜供应，必然限制了很多菜品的发展。

3.注重养生，摒弃重口味。福建的同学经常跟我表示，台湾待着还算合适，口味都比较相近。但是北方人，真的接受不了台湾的清淡口味。而且吊诡的是，台湾的重口味美食，几乎是绝技的。至今未能找到一个重油、重辣的火锅。

4.不健全的美食营销。在台湾，想要扩展你的饭店知名度的大招之一，就是请工读生排队，制造一个你很火的假象。另外一些招数，比如说请知名博主撰写软文。很多店靠这种店火一阵子，品质、味道没有太突出的，就会走向衰败。

正是因为这些种种原因，陆生群体才会对台湾所谓的美食有着不一样的看法。进而对台湾的美食进行各种吐槽～

更多精彩文章点击查看：

亚马逊kindle电子书

微信微页面

恶性竞争的深层原因

严肃来看，这里面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怎样的法规和制度致使电视新闻台暴增到已经无法良性竞争的局面？二是怎样的广告购买机制让收视率掐住了电视新闻的咽喉？事实上还有第三个问题：怎样的环境造就了电视记者的弃守专业，并且豢养出一批以膻色腥为主食，但偶尔也有光亮、温暖与良善一闪而过的旁观者？ 最后一个问题的简单答案是人性。

台湾解严20年了。20年以前，政府以各种理由封阻新媒体诞生，直到1993年，“立法院”通过有线电视法，开放设立新闻台。1997年出现第4家无线台民视。新闻局的思维是，新闻台一多，彼此自由竞争，可以破除多年来媒体的一言堂和垄断，百花齐放，却未曾料到会有今天的恶性竞争与对峙局面。后者来自不同的政治立场，新闻台所代表的颜色观众都心知肚明。

传播界人士认为过多的电视台来自“错误的媒体政策”，台湾新闻从业人员人数密度可能居世界之冠。但财团又为何热衷经营24小时电视台呢？“目的就是赚钱”，有传播学者指出。在各种类别的节目中，电视新闻所吸引的观众数量最庞大，也涵盖各年龄层、性别与职别。有了观众便有收视率，有了收视率就有广告，有广告才能赚钱。其中，政府又是最大的广告主——这是政府在“宁可不要政府，也不能没有媒体”的宣誓背后，以另一种形式操控媒体。

电视频道多到爆炸的结果，就是收视率普遍都太低，所以广告主片面实施的“保证CPRP”的广告购买方式已成为电视广告购买的主流。传播学者解释，所谓的“保证CPRP”，意思是广告商在购买广告时并不在意电视内容好坏，只锁定收视率，以固定金额购买收视点；收视率如果偏低还可以少付点儿广告费，如果没有达到事先要求，电视台则要设法补足。至于新闻台的“每分钟节目收视率”所代表的意义其实是“每分钟广告收视率”，节目收视率高几个小数点，理论上广告收视率也会高几个小数点。为了“每分钟节目收视率”所带来的“每分钟广告收视率”，电视新闻

台卯足全力寻找或制作低廉的、方便取得的，但观众爱看的新闻，这就是新闻乱象背后的真相，也是“史镇康事件”的由来。

有人提出“媒体自律”。事实上就在2006年3月29日当天，东森、三立、年代、中天等34家电视公司、72个频道才成立“中华民国卫星广电同业公会”，下设“新闻自律委员会”，并订立《卫星电视新闻频道自律公约》，白纸黑字“力求精确查证，完整平衡、尊重多元，以不偏不颇的专业原则处理及呈现新闻信息”，“尊重隐私权，凡属非关公众利益的私人事件避免报导”，“犯罪新闻的报导，应谨守社会教化意义，尽量避免描述犯罪情节，不可过于煽情夸大，审慎考虑社会风气及影响。”说时容易做时难。更何况自律公约的白纸黑字之间充满了灰色地带，又有人开始期待合并与退场机制的出现——在那之前，是一场没有底线的战争。

第九篇 台湾掌中戏 “通天教主”黄海岱仙逝

特约撰稿员/陈佳鑫

被台湾掌中戏曲界尊称为“通天教主”的布袋戏大师黄海岱，2007年2月11日凌晨，病逝于云林县虎尾镇他的第5个儿子黄逢时家中，享寿108岁。3月9日，大师移灵火化，永远放下玩弄于掌中的百年布袋戏偶，仙化成一则永恒的传奇。

出身戏剧家庭

出身云林虎尾的黄海岱，诞生于台湾布袋戏界风起云涌的时代，一生横跨了3个世纪。

1900年，台湾处于日治时代，黄海岱出生于嘉义厅西螺堡埔心庄。父亲黄马是出道不久的掌中戏师父。由于生于戏剧家庭，父亲让他成为“戏神”西秦王爷的入室弟子，不只传授黄海岱与弟弟操弄掌中戏偶，11岁时，还偷偷送他到学堂去学汉文(中文在日据时期称汉文)。

年轻时代的黄海岱，举凡《诗经》、《春秋》、《史记》等无所不通，连充满江湖侠义的章回小说，也成为他腹中积淀。他能一口气说出《水浒传》108条好汉的姓名和外号，且从盘古开天，举凡各朝典故、风土民情、才子佳人无不熟稔。

18岁时，黄海岱已可以独当一面，正式跟着父亲的“锦春园”出团演出。当时布袋戏多以北管音乐为伴奏，演出戏目多为对白文诌诌、教忠诲孝的传统“古册戏”，但黄海岱以深厚的文学底子取材章回小说，改编成江湖正邪对立的“剑侠戏”。

黄海岱与弟弟两人默契十足，以精彩的开打动作与武术设计，轰动中南部，带起一股“剑侠戏”的风潮。“过去演出就是油火3盏，做完戏，脸都熏得黑黑的。”生前，黄海岱曾笑呵呵地回想当年情景。

他说，那时布袋戏的演出十分原始，一个戏团五、六个人，担着两担戏笼，有人请戏就去那儿演出：“日日眼睛一打开就是演戏，经常做到半暝才回家，洗个澡，吃点宵夜，三弄四弄就天光了，眠床还没躺热就又要出团。”

日治后期遭停演

24岁，黄海岱正式拜师西螺“锦成斋”门下，学习北管音乐，不仅掌头手鼓，还习唱老生、小生和小旦，手中一尊木头戏偶，演出生、旦、

净、末、丑“五音”，斯文、沧桑、逗趣、哀怨，各种年龄、性格及心境，都在他的十指中活灵活现。

26岁时，黄海岱结婚，次年长子黄俊卿出生。又一年，父亲黄马往生，黄海岱接掌戏班。因日治时期台湾行政区域分为“三厅”及“五洲”，他遂将团名改为“五洲园”。

日治后期，传统戏曲受到严厉管制，“五洲园”是7个通过审核演出的布袋戏团之一，以“米英击灭推进队”名义，巡回各乡镇演出日本宣传戏，戏码为官方钦定的“样板戏”，台词多了“阿里嘎多”、“莎哟哪啦”。

但“皇民剧”很难吸引观众，黄海岱遂暗渡陈仓，调包开演传统汉乐伴奏的布袋戏，结果被督察逮个正着。“五洲园”遭到吊销执照停演，黄海岱不得不靠卖黑市猪肉维生。

另外，黄海岱曾在台上卖力演出时，弟弟的仇人在台下挑衅，双方一阵混战后，仇家中有人被殴毙，黄氏兄弟因此入狱9个多月，这段时期，反倒让他沉思创作。

当时，黄海岱创造出布袋戏史中空前绝后的“超级偶像”——“云州大儒侠”史艳文（布偶角色名），也结下他往后赴中国大陆探访的楔子。他根据清代小说《野叟曝言》，写出10集的《忠勇孝义传》，除创造出史艳文这个角色外，还有甘草人物(可以搞笑并化解紧张气氛的人)刘三等。

被尊为“通天教主”

国民党政府来台后，传统戏曲重出江湖。黄海岱扛着“五洲园”的金字招牌演出一片天，最盛时期曾创下一天连演5台戏的惊人纪录。他的长子黄俊卿及次子黄俊雄，也都在这时期加入戏班，传承父亲的手艺。

“五洲园”成为台湾偶戏第一大门派，浩浩江山其来有自，黄海岱之子先后独立门户，创立“五洲二团”、“五洲三团”。黄海岱还将一身的绝活，不藏私地传授给二十几位入室弟子，他们也打着“五洲园”名号另立剧团，创下不错的成绩。

黄海岱第二代、第三代的徒孙与徒曾孙，总共加起来至少有两百团以上，如新港宝五洲团的郑一雄，在南部的广播电台雄霸一方；云林廖万水的新省五洲园，在云嘉地区雄群一方，都曾受到老先觉黄海岱的庇护。

黄海岱乐见弟子另起炉灶，师徒间维持着友好关系，不怕弟子将来

和自己打对台、抢生意，所以，徒子徒孙们将他尊为布袋戏的“通天教主”，实至名归。

子孙不断创新布袋戏

1950年后，长子黄俊雄继承父亲黄海岱打下的基业，把布袋戏偶加大，以现代人脸孔及华丽衣服崭新出现，用火药及干冰制造出电光石火、舞台机关取胜的场面，以“金光戏”蹿红剧坛。

“金光戏”摆脱以传统戏曲为伴奏的“古册戏”，甚至超前于“剑侠戏”，以西洋流行音乐，加上流行歌手演唱，有别于坚持传统北管唱腔的小西园及以京韵唱腔著称的亦宛然戏班，使布袋戏呈现出多种风貌。1970年，“金光戏”一举跃上当时前卫的现代电视荧屏，黄俊雄带着史艳文连“演”583集，时间长达两年，轰动台湾，全民争相收看，甚至出现“学生逃课”、“工人怠工”的奇特现象。

1974年，国民党政府以“妨害农工正常作息”为由，颁出“停播令”，造成社会一片哗然，但这个创造自黄海岱手中的英雄人物史艳文，已成为四、五年级儿童心中永远的英雄，一代大侠就此隐没，义行长留心中无限怀念。

黄海岱孙子黄强华及黄文择克绍其裘，继承“五洲园”声威，以电影手法分镜拍摄，营造出武侠绝技的“霹雳布袋戏”风格，用专业的编戏，塑造出素还真、叶小钗等新一代布偶角色，成功地吸引年轻世代。

“霹雳布袋戏”成为台湾校园学子及学术网络世界中缺一不可的热门话题，在台湾扭曲的政治发展中，“霹雳布袋戏”中的角色，甚至被政治人物拿出来比喻及造势，更显示出布袋戏在台湾社会受欢迎的程度。

孙子们还将阿公黄海岱的生平，录制成《掌中风云一世纪——黄海岱回忆录》10集节目，于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偶戏一夏”活动中播出，记录黄海岱传奇的一生。黄海岱96岁时，还远征到法国演出，102岁更曾为外国贵宾即席表演，博得满场掌声。

一生即台湾布袋戏的发展史

终其一生，黄海岱获得台湾教育部的民族艺术薪传、民族艺术艺师殊荣，为最高龄及地位最崇高的布袋戏宗师；来年获得全球中华文艺艺术薪传奖、终身奉献奖；还获得台湾艺文界最高荣誉“国家文艺奖”，他的一生即台湾布袋戏的发展史。

值得一提的是，黄海岱创造出来的“云州大儒侠”史艳文，为解救天

下黎民苍生，行侠仗义奔波于神州大江南北，“义行”虽然全出自想像力，但他认为从未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将是毕生唯一憾事。

由于戏剧情节中史艳文初出江湖时，便是到杭州西湖去凭吊岳飞，并在西湖结交许多江湖豪杰并结识了共患难的妻子，黄海岱认为西湖对他而言意义特别重大。1991年，91岁的黄海岱带领着“五洲园”掌中剧团走入大陆。

黄海岱亲眼看见史艳文的足迹，还去了万里长城、北京紫禁城及颐和园。游杭州西湖时，还亲自到中华民族英雄岳飞坟墓前凭吊，并至布袋戏发源地福建的泉州及漳州，与当地布袋戏艺人交流，用布袋戏串连两岸的情感。

2003年，台湾的台北艺术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给黄海岱，“掌中风云一世纪，五洲威名震九州，百龄艺师戴方帽，千万荣耀集一身，光照云林桑梓地，一片绿畴在嘉南”一语，成了黄海岱一生最好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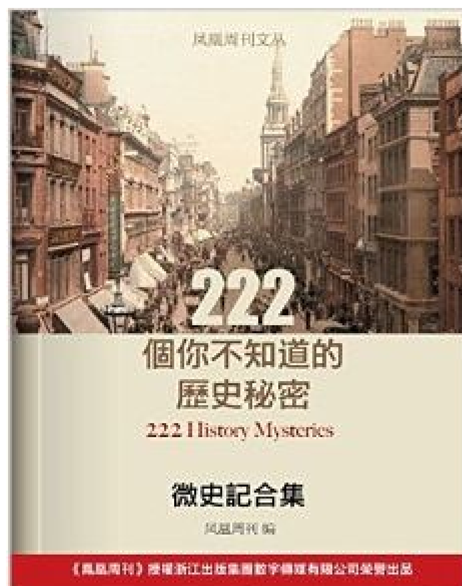
今年1月，黄海岱过107岁高寿，当时台湾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苏贞昌及马英九先后前来祝寿，好不热闹。岂料同月16日，黄海岱因感冒住院，结果并发肺炎、肺积水转入加护病房治疗。2月11日凌晨，因肺炎引发心肺衰竭的黄海岱，由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送回云林县虎尾镇黄逢时家中，凌晨零时15分过世。

3月10日的告别式中，4辆游览车载满全台布袋戏迷，吊唁偶像巨星“阿公”黄海岱，甚至有一名年轻女戏迷激动表示“他是国宝！他比蒋中正过世还重要！”

俗谚“一声呼出喜怒哀乐，十指摇动古今事由”，黄海岱写下台湾的布袋戏传奇，在戏迷们的爱中，画下一生传奇的句点，正式从人生舞台谢幕。

（编者按：台湾为表达对高龄老人的尊敬，在老人去世时，如已过当年生日，则将年岁增加一岁，黄海岱仙逝时已过107岁生日，故其高寿108岁。）

精彩推荐：凤凰周刊文丛·微史记合集：222个你不知道的历史秘密



点此阅读

第十篇 台湾繁体中文保卫战

特约撰稿员/昭君

汉字应否简化？这个争议起于“五四”运动，经历国民党迁台、新中国成立、两岸各用各的文字，至今快90年，还很难有定论。如今却因为一则乌龙新闻，意外引发岛内繁体中文保卫战。

最近台湾网络上流传一封“向联合国2008年废除繁体中文说不”的电邮，援引大陆学者的谈话为蓝本，呼吁网友联署反对联合国打算于2008年停用繁体中文的计划。

这封电邮相当引人瞩目，大约两星期就吸引全球四万五千人次联合署名，台湾本地入口网站“蕃薯藤”注意到这股网络效应，立刻将相关议题与部落格（台湾对个人博客blog的中文翻译）集合成专区，吸引台湾网友转寄催票，“捍卫繁体中文”；中时电子报则办起“你觉得简体字如何？”的线上民调。结果，自称完全看不懂简体字的民众约占四成五，反对台湾改采简体字的比例更高达七成五。

引发这次转寄邮件热的并不是一向满天飞的网络谣言，而是3月23日数家台湾传媒转载的一则来自大陆的新闻：“北京中国应用语言学会会长、原中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章太向《北京晨报》表示，联合国已决定自2008年以后，原在联合国同时使用的中文繁体、简体字，一律使用简体字。”

报道指出，“中华民国”未退出联合国前，联合国所有的中文文件，都是使用繁体字。由于北京当年推动简体字有许多阻力和障碍，长久以来，联合国一直是繁、简字并行。但近年因大陆政经实力大增，联合国与其它国际组织有关中文版几乎都朝简体字的趋势走。

报道又引用大陆著名语言学家、现已百岁高龄的周有光的说法，指“联合国正准备把所有的中文文件都改用简体字，因为用两种字体没有必要”。他说，如果用了简体字，就证明简体字的方向是对的，是得到全世界多数人同意；同时证明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各国学中文的人逐步增多，在这种情况下，简体字慢慢会变成中文惟一标准。

报道还列举，目前只有台湾、香港、澳门和北美的华人圈还使用繁体字，人数仅3000多万；大陆、马来西亚、新加坡及东南亚华人社区则都已改用简体字，使用人数超过13亿。另外，日本、韩国原使用的汉字，近年也陆续出现简体字，其中日本的131个简体字有53个与简体汉

字相同；韩国则有29个简体字与简体汉字相同。近年受“中国热”影响而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也多从简体字入门。

消息刊出后，立刻在使用“正体字”的台湾引起热烈讨论。台湾主张的“正体字”，早在蒋介石主政时代就已基于复兴中华文化的原则而全面推动，台湾官方因为基于争正统的考量，不但不使用“繁体字”而用“正体字”这一名称，另一方面，台湾原本还认为，是大陆将中国文字简化，台湾并未将中国文字繁化，所以长期来坚称：汉字并无简繁争议。

50多年来，在学校教育和联考的强制手段下，现在的台湾人不但习惯使用正体字，除速记外少用俗体字、简体字，主观认知上也普遍认为方方正正的正体字比较好看且符合造字原则。不但改学简体字意愿不高，看简体书籍目前也只属于少数学术界人士嗜好。

虽然“五四”运动中“以简化文字为手段提高识字率”的主张，是否真的达到效果，还有赖数据佐证，但在仅使用繁体字的台港澳，识字率早已不是问题，尤其计算机普及后，李敖等学者更大声疾呼，技术上已经一并解决方块字不好书写的问题。

对使用繁体字的民意共识度既然这么高，台湾人民自然高度关注。参与讨论的不只是关心中国文化的台湾学者，还有年轻人也高呼：“我的名字很美！请不要更改我的名，换了名字，我就不是原来的我”、“请不要让中国文明的通路断绝”……在蕃薯藤专区的留言板上，人们记下各种反对理由，包括有年轻网友认为繁体字比较漂亮，反对联合国的决定。网络上发起“向联合国2008年废除繁体中文说不”的倡议。

分析报纸、电视新闻节目和网络留言板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艺文界人士从“中国文字之美”出发，幽然感伤使用象形文字的文明古国恐将一点一点丧失与天地万物沟通的机会；学界感叹象征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字不保，文化传统也会被通通反掉；有政治人物担心台湾因此更被边缘化，“逢中必反”的台独人士更痛骂简体字不当。

但也有务实派认为应开政治意识与文化之争，不带感情地将文字视为“载具”，主张追随国际潮流，或抱持“多学一种文字也不错”的想法，建议学习简体字。如国民党籍的新竹市长林政就表示，新竹市已朝向国际化发展，为学子未来竞争力考虑，计划提供简体字与繁体字对照表，并在课外辅导及社团活动中让喜爱学习者多一个学习简体字的机会。

然而，这场繁简体之争吵嚷十多天后，台湾中央社发出来自日内瓦一则事实陈述式的报道指出：“联合国废繁体中文”根本是一则官方所称“闻所未闻，从天上掉下来”的乌龙报道。

原来在1971年以前，联合国流通的中文确实是正体字；但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联合国席次后，联合国基于尊重会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文习惯，早已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联合国体系内组织流通的中文，由正体改为简体。

换句话说，1971年后，简体中文即是联合国内正式及惟一的中文版本，没有所谓繁、简并存。至于当初透露这项信息的陈章太，发言的依据是引自网上公布的“2005年世界主要语种、分布和应用力调查报告”内容。不过，该网址并非联合国官方网站。

陈章太也在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时表示，即使联合国仅保留简体字文本，也不会影响繁体字的使用。因为据大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繁体字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使用。诸如中国的历史文献和书法等，都是采用繁体字，大陆年轻人学习繁体字的人也不少，繁体字不会遭淘汰。

在此期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再次提出正体字是世界文化遗产等语，因为他早已多次在公开场合倡言，应向联合国申请将正体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以这次站出来说话并不让人意外；而向来亟欲“去中国化”的独派人士，也俨然在论战中成了中华文化的保卫者、捍卫正体字的急先锋，倒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例如台北教育大学校长庄淇铭主张用“文化字”、“简化字”代替“繁体字”、“简体字”的说法，因为他认为繁体字是一种艺术，曾被称为世界最美的文字，他并不认为繁体字会被边缘化；独派人士张富美主掌的侨务委员会宣称正在规划反制活动，争取海外侨民和外籍友人声援正体字；获独派团体力挺的“教育部长”杜正胜更在“立法院”侃侃而谈正体字有“历史文化意义”，书写或应用都很方便，还说台湾的学校教育一定会坚持使用正体字教学。

甚至有人主张，“既然自诩为正统中国的大陆不要传统中国文字，不如台湾先注册专利，将繁体字命名为‘台文’，以后也就不用去中国化了。”

文字繁简体之争竟也能卷入统独议题，实在让人叫绝。

当然最无辜的，恐怕还是台湾面临测验考试的中学生，之前因为简体字风波发烧，引发各界讨论，今年学期测验中的写作项目能否出现、使用简体字突然成了热门话题。更有媒体立刻报道官员说法，指考生赴试须养成使用教科书上文字习惯，简体字将被视为“别字”遭扣分。虽然官方之后适度放宽限制，表示有些相约俗成的简体字，例如“”写

作“台”也能接受，但是标准如何认定？教育部如果公布俗体字表供评卷人员参考，考生要不要也一并学习一下？总之，台湾这批青年学子无端受到这则乌龙新闻影响而添困扰，应该也是各方始料未及的新鲜事。

第十一篇 制造台湾？创造台湾？

撰文/刘荣

在胡德夫的经典民谣《美丽岛》中，曾闪现出先民拓荒的磅礴气象，“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后，几经试探验证，而后笃定，渐变于今日的高山静谧、大湖安详，乡野清朗，城市井然，一处处清新得仿佛波澜不惊的小小确幸。气象蒸腾，面貌已改。

以旁者观之，昔日以“台湾制造”著称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仿似心甘情愿地从“大”走向了“小”，从“宏观”走向了“细部”。然而身入此境，才知小中不曾失大。

这种气象在哪里？是生活中的创造和坚持，从古早时代一直延续至今。是山中原住民，打磨一块原木，化为弓箭、桌椅、建筑，造出家的样态——是平原汉人，将海峡彼岸的古陶器，储之煨之，把食物的温度化作生命的活性——是闽南移民，古老的蓝印花在布匹上染出花色，围住身体，走出一个人字，穿出一身乡愁——以上种种，在这座美丽岛上，化入了普通人的生活中，也许是在台北小小的宅所里，也许是观光客的收藏清单中。我们看到背后的文化和历史，不仅是儒家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还有多元移民文化融合带来的，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面上的“以人为本”的文化。

于是，用心做事的人就有了说法：“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当20年后，大陆同样走向了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接轨世界，欲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造之势，分出一部分研磨细部，加入本土文化、科技和创意。文化同根同源的台湾，无疑是一个最值得借鉴的样本。

于是，我们从南到北，访遍位居闹市的博物馆、宁静巷陌中的工作坊。寻找“台湾创造者”们，尤其是传统手作的“创造者”们，观察“把根留住”的传承，怎样变成灵感、文化和产业三位一体的新气象？在传统和创意之中，有怎样的平衡之道和经验教训？



台湾松山创意园区陈列的鱼雕塑

台湾制造的转型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胡德夫《美丽岛》

大巴前往台北故宫这一路，台北在一片阴雨中。但是天光之下的绿草却润泽清新，一片片楼市和厂房趴在这片绿茵中，气定神闲。

相比两年前，眼前的台湾更安静了，即使经济的衰退信号亮起，生活还是如此不紧不慢，很难让人想起惊涛骇浪的上个世纪——1979年，中国台湾与香港、韩国、新加坡被亚太经合组织列入新兴工业化社会，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上世纪80年代，台湾工业基础完备，国民教育普及，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股市指数一度高达万点，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个人电脑主板产量居世界首位。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即使退出联合国后，面对巨大的转型压力。台湾依然在代工经济的基础上迅速崛起，总之，一切都符合“台湾制造”的奇迹。

然后，大陆改革开放，接收代工产业，台湾被迫面对转型。在资源全球化流动、制造优势消失的情形下，如何在新的经济和技术环境里，用有限资源创造更大的使用效 率与价值？

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在这时出现的一份答卷，利用人的创造力、技能与传统文化艺术的结合，具有高附加值、技术密集、高融合性、高回报率、高经济影响力、低污染、低消耗等特点，不仅能带动传统产业升

级，还能实现知识　　经济效益。文创，不是台湾独有的，20世纪90年代，最早在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西方国家兴起。

行走在台北故宫工艺部展示厅，一只印有古典纹样的手镯，一个蓝印花的发夹，一份改良过的宣纸……它们被纳入客人的收藏中，用于当下生活。每一个都是这份答卷中的一行字，看似漫不经心，却经历了台湾文化创意的诸多探索。

为了接受经济转型的挑战，活化地方文化、振兴地方产业。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萌芽于在1995年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在经历了萌芽(1994-2002年)、初步发展(2002-2007年)阶段后，逐渐进入到不断优化调整的快速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

台湾自2002年起，确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目标，提出了传统、创意、国际化和科技化四个核心价值。2013年华研音乐、霹雳国际于上柜及兴柜挂牌交易，此时真正进入了一个起飞阶段。今日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具备商业化和产业潜力的探索成功者已经不在少数。

当今日我们抵达台湾时，“台湾制造”在以下五个重点行业，全面转变为“台湾创造”：创意动漫产业、创意精致农业、创意陶瓷业、产品创意设计产业和新媒体创意产业。殊为难得的是，它们渗透于每一街市的每间书店、咖啡馆、艺术馆、创意产业园区和学校等公共空间，也流向了民间家庭，构建起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氛围。

这场以当政者为导向，全民参与的文化创意产业探索，不亚于一次新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伍佰在他的《台湾制造》中这样唱到：“成败／亦原在／同根树／偃未来”，从制造转向创造，也有这样一棵同根之树——传统文化。



台北松山文化园区，为台北增添一处新的创意交流空间。

小而美：手作人的世界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胡德夫《美丽岛》

怀抱对传统文化的探访之心，在红砖砌就的台北三峡老街，走了很久。才找到了这家低调的、以草木染为主题的私人工作坊。

使用天然的植物染料给纺织品上色的方法，称为“草木染”。漫山遍野花果的根、茎、叶、皮，都可以用温水浸渍等不同方式来提取染液。经过历史复原的草木染，营造出一种无可言说的传统氛围，弥漫在整条三峡老街。工作坊之外，还有一个专题博物馆，以及过去制作草木染的染布房。草木染，是一种会变老的颜色。但它背后的传统，却是不会变老的传统。

在台湾文化促进会的支持下，已经中断了近三十年的草木染和蓝染工艺，再次在台湾勃发新生。在曾启雄等大师的执导下，更多的成员加入进来。先是前往大陆收集、研究和整理，再回到台湾的试验田里，把布料、色彩和产品放在一起，实验出新的文创产品，化为品牌，促成行销。

和晓芳窑一样，植根于传统的草木染，是台湾染、木、竹、瓷、布等传统工艺中的一种。它们都萌发于近十年的台湾工艺培养，也融入了当地文化的人文特色和精神。

汉声出版社负责人黄永松这样向我介绍台湾的手作人们、原乡和中华文化的精致灵魂。农业社会的步调，隐隐留在台湾人的精魂里。认清现实后，台湾工艺不再托大，而是敢于做小，做细，这里似乎是一处“小

而美”的沃土。

切身感受后，我发现，作为台湾传统手作工艺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折射，也是在大的文化氛围中出现的，是产 业、文化、历史、艺术、设计的缩影。

第十二篇 台湾发明了文创？

撰文/陈念萱（台湾知名作家）

小时候，眷村里的婆婆妈妈们，总在自家客厅或院子里，堆满各种论件计酬的代工，以简单费时的劳力，换取餐桌上额外的奖励，多一碗红烧肉，或出现两条鱼，便是这重复动作几小时的回馈。那是个人人奋发向上的年代，有付出便能有收获，台湾经济，便仰赖这不起眼的代工，而在退出 联合国后，另辟蹊径，开创“钱淹脚目”的新局。然后，大陆改革开放，接收了代工产业，台湾被迫面对转型。

最典型的案例，便是风灾频仍的南投县信义乡，满山遍野的梅花林，因日本改向大陆采购，而烂梅落地无人拾。却偏偏有历尽天灾的生存毅力，让当地农家子弟，发明了营养价值更高的浓缩梅精，热销日本，创造出更高的经济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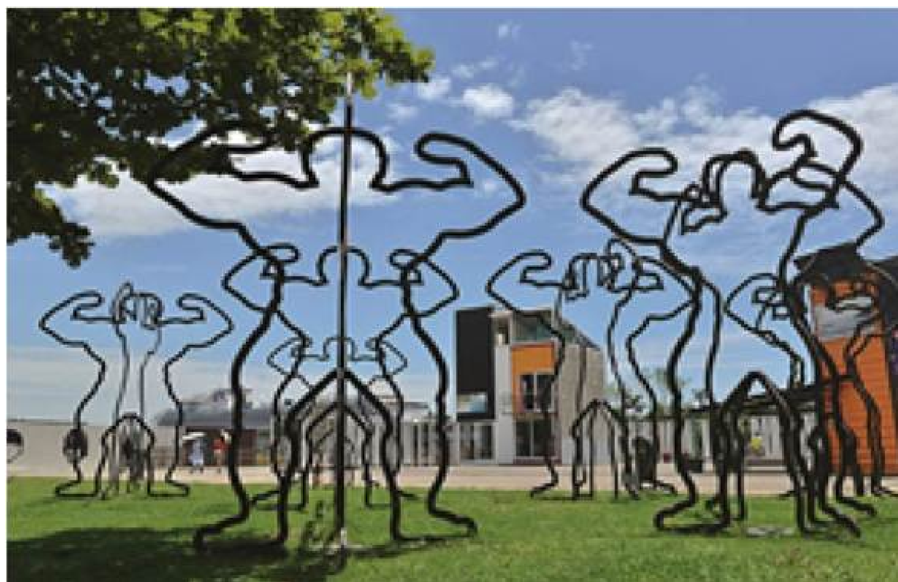
著名建筑师汉宝德出版《文化与文创》时，曾说：“政府轻文化，文创难开花。”政府长期重“文创”而轻文化，发明了“文创”这名词，却造成文化环境贫瘠，文创产业亦无法开花结果。著名学者龙应台则表示：“推动文创成效低。”汉宝德认为台湾假借“文创”模糊“文化”的定义，而利用“小聪明”赚钱，在他眼里，台湾根本没有“真正的文创产业”。他认为：“文化只要普及，就能产业化。”文创的创意，是把文化从少数精英手中转为人人都能欣赏的文化，而不仅仅是门赚钱的生意。“只要人人能欣赏，消费市场扩散，文创产业自然形成。政府该做的是推动文化普及，提升美感教育。”

我认同汉宝德教授的想法，但不赞成他的说法。文创，绝非政府喊出来的口号，亦非台湾人自创的概念。这是一种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的生存之道。

20年前，我在香港巧遇上海水彩画家李沙，而在台湾寻找支持的画廊，学院派名师皆以极高的“技术”评价观展，甚至俄罗斯国家芭蕾舞蹈家观赏时也赞叹：“仿若一眼便能走进画家的生活世界。”艺术品的共通性，在专业人士的生活里，信手拈来，感受雷同。但在询问刚刚开辟展览空间的诚品书店时，得到的答复：“我们必须利用这仅有的资源，来支持自己的艺术家，只展出台湾创作者的作品。”这虽让我错愕又挫 折，却十分期待台湾艺术家能因此开创新局，至少，诚品书店商场里陈列的许多自创品牌，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汉宝德在《文化与文创》中说：“自从发明了‘文创’这个字眼之后，

热心文化的朋友们就兴奋起来，逐渐与真正的文化分家了。文化界因此分为明显的两派：一是传统的文化人，一是前卫的文创人。”


2014年5月11日，台湾高雄土驳二艺术特区，青年实验艺术作品。

姑且不论“文创”这名词是否是台湾人的创意，至少，以我个人旅游经验来看，台北目前最受欢迎的文创产业，如诚品书店商场、华山创意园区、松烟诚品以及大稻埕古迹修复区等等，经营风格样貌，在许多国际城市里早已开花结 果许多年，远非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自诩“独创”。如纽约Skyline的Chelsea Market，以废弃老旧铁轨改造为美丽的城市空中花园，不无仿效穿越巴黎早已四季如春从十区到十二区的空中花园，却更具创意地在铁轨通道里，打造了生气勃勃的雀儿喜商场，无论从空间利用的创意到商品多样化，以及支持新生代设计师、艺术家的种种优惠租赁条件，都给纽 约增添了一道丰盛的市景荣光。

恰如台大校园附近的“女巫店”，延续我曾经服务过的“我们咖啡屋”支持剧场艺术而带起小剧场风潮。咖啡店以小型演唱会为经营主题，成功地培养出许多新生代歌手如陈绮贞、张悬、苏打绿等等。“紫藤庐茶馆”属于反向运作，庐主周渝先支持艺术家，而不得不以自家老房子开放经营茶馆，来继续支撑文化活动需要的各种金援。

作为台湾首府的台北市，这几十年下来的文化活动运作，几乎皆以野蛮生长的方式，自生自灭，甚至必须在政治环境转换之间，声嘶力竭维护自己小小的存在权益，如土地房舍的使用租赁权。这很像北京798早期艺术家进驻时遇到的难题，身份不明的“地主”或“屋主”，借由各种

公权力驱赶为其开创利益的艺术家元老们。废弃之地，必须仰赖艺术家开创生机，一旦声名远播，艺术家又变回人人可打的跳蚤，四处逃窜。

入选全球最美20家书店的台北“好样本事”VVG Something，即便是选书、菜单、装潢到商品摆设，再没有品位的人，也能感受到现场散发的独特风格，你能说这不是一种“文化创意”吗？即便是这家店以赚钱为目的，从小对象到餐饮，样样贵，但人家没有拿政府的钱嚷嚷文创，却呈现出扬名国际的美学场景。

说白了，文化，这件事，本来就该野蛮生长，政府插手，立即里外不是人；文创，既然是有价值的文化创意，就该自负盈亏，更不该由政府补贴，如汉教授所言，政府应该着手在“看不见政绩”的文化扎根上，而非立竿见影的商业营收上，如眼前最有商业价值却最受文化人诟病的“华山创意园区”。

这两年开放大陆自由行观光市场后，台湾最好看的风景是“人”，忽然让生长于台湾的我们大梦初醒：“真的吗？我们有那么好吗？”

台北市最吸引人的风景，对我而言，是咖啡馆。单单在大安区，随便数数都有几十家风格迥异的小店，可以让人随意自在进出，而挖掘出老板自己的创业故事。我问过台北市 负责编辑推荐生活文化刊物的公务人员，是否计算过台北到底有几家咖啡馆，当场让所有人哑口无言。也许，每天都有人在计划着开一家咖啡馆吧？

台北最好看的风景，应该是咖啡馆里的“人”。咖啡，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媒介，在有无之间，奇妙地发酵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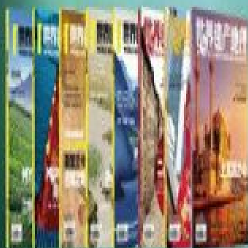
从我18岁高中毕业至今将近四十年来，台北市的咖啡馆，从上海外侨风移植过来，成为当代文青们的书房与沙龙，然后在我混迹其中的年代，转变成支持小剧场的据点，紧接着在下一代，进阶为流行音乐的温床，乃至小书店背后支撑的现代时尚梦。多元经营，早已是咖啡生活文化自己凝聚而成的台北甚至全台湾的文创风貌。

就像紫藤庐周渝说的，茶文化，来自于生活，而不是用文化口号驾驭生活本质。喝茶，是生活需要，乃至成惯性，而非制定一个装模作样的仪式，让想要好好喝口茶的人，忽然绑手绑脚。

我不认为“文创”是台湾人发明的，不管官方或名人怎么看，亦如我不认同文化与文创之间有什么必结或必解的冤情。吃茶也好，喝咖啡也罢，时尚与否，都来自于周遭生活圈养成的惯性，时间，是唯一的催情剂。在国界日渐模糊的年代，多种文化的融合与刺激，早已无法分清谁

才是真正的原创，就像土耳其与希腊人争执Doma（地中海肉粽）的鼻祖，对我而言，好不好吃才重要。

真要说台湾有自己的文创，在民间，在部落，在每个生活圈的巷弄里，各自品茗着自己的生活景况，点点滴滴构筑着生存品位，在一个个小店铺的摆饰里，找到各自的惊喜。如此说来，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找到同样滋味 的“文创”。



征订 2016年全年（12期）杂志
每期20元 | 共计240元
0755-25934567 (69) / 010-65281005(06)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更多精彩文章点击查看：

亚马逊kindle电子书

微信微页面